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一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说　　明

这套参考资料，是适应我室教员备课和研究的需要而选编的。除公开发表的文件、材料外，还收入一些内部文件、材料，仅供内部参考。如须引用，请查对原文，以原件为准。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

1840——1894年

企　　业	国别	设立年	所在地	情　　况
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英	1843	上　海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所办的印刷所。
柯拜船坞（Couper Dock; J. C. Couper & Co.）*	英	1845	广州黄埔	修理船舶，1860年后有船坞4座。 1863年售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
美华书馆（Mei Hwa Printing Office）	美	1845	宁　波	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印刷所，后移至上海。
字林西报馆（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英	1850	上　海	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字林沪报等。 （按自五十年代以降上海厦门各地外人所办报纸杂志很多，印刷情况不详，除较重要者外，不悉列。）
美商船厂（Purvis & Co.）*	美	1852前	上　海	修理船舶，五十年代停业。 （按在此以前，上海应已有外商经营的小型修船厂，纪录不详。）
浦东船坞公司（Pootung Dock Co.）*	英	1853	上　海	修理船舶。初名董家渡船坞，后改为浦东船坞公司，资本94,000两，其船坞经常租与耶松船厂。
老德记药房（J.Llewellyn & Co.）	英	1853	上　海	制造药品、化妆品、汽水，使用机器。1889年资本120,000元，有工厂。
埃凡馒头店（H.Evans）	英	1855	上　海	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并经营酿酒。
下海浦船厂（M. L. Potter）	美	185?	上　海	修造船舶，有干船坞。1858年（？）停业。
望益纸馆（J. H. Carvalho）	葡（？）	1857前	上　海	印刷。
浦东铁厂（M. Lamond & Co.）	英（？）	1857前	上　海	修理船舶。
上海船坞公司（Shanghai Dock Co.）*	英	1858	上　海	修理船舶。资本220,000两.其船坞经常租与耶松船厂。
厦门船厂（Amoy Dock Co.）	英	1858	厦　门	修造船舶，有船坞3座。1892年改组为厦门新船坞有限公司，资本67,500元，工人约200人。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续1）

企业	国别	设立年	所在地	情况
隆茂洋行（Mackenzie & Co.）	英	1858(？)	上海	打包厂，使用水力压机。
祥安顺船厂（E.Hawkins & Co.）	英	1860	上海	修理船舶。
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	英	1861	上海	英商怡和洋行嘱英人美哲(J. Major)所建，缫机100车。1866年停业。
祥生船厂（Boyd & Co.）	英	1862	上海	修造船舶。1879年工人1,000至1,400人。1891年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800,000两，在浦东有大型船坞与机器厂。
旗记铁厂（Thos.Hunt & Co.）	美	1863	上海	修造船舶，有船坞。1865年为李鸿章、丁日昌所购买，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基础。
得利火轮磨坊（Shanghai Steam Flour Mill）	英	1863	上海	用机器磨面粉。
末士法汽水公司（Farr, Brothers & Co.）	英（？）	1863	上海	制造汽水。
卑利远也荷兰水公司（H.Peel & Co.）	英（？）	1863	上海	制造汽水。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 Whampoa Dock Co.）	英	1863	香港与黄埔	初设时资本240,000元，在香港与黄埔皆有船坞。1876年将黄埔的设备售与广东地方政府。1886年增资至1,560,000余元。十九世纪末，工人2,500至4,500人。
顺丰砖茶厂(S.W.Litvinoff & Co.)	俄	1863	汉口	最初雇佣工人以手工制造砖茶，1865年俄商在汉口附近共有3个砖茶厂。1873年移至汉口，建立使用蒸气机的砖茶厂。
福州船厂（Foochow Dock Co.）	英	186？	福州	修造船舶。大约九十年代初停业。
旗记铁厂（Thos. Hunt & Co.）	美	1863	广州黄埔	修理船舶，有船坞3座。
高阿船厂（Gow & Co.）*	英(？)	1863	广州黄埔	修理船舶，有船坞2座。
船厂（Bellamy & Co.）	英	1864前	厦门	修理船坞，有船坞1座。
柴工师文(Botefuhr & Co.)	？	1864前	汕头	修理船舶。
正广和洋行(Caldbeck,Macgregor & Co.)	英	1864	上海	主要从事制酒及各种饮料。
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n Gas Co.)	英	1864*	上海	制造煤气。最初资本100,000两，1896年增至300,000两，工人200至300人。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续2）

企　　业	国别	设立年	所在地	情　　况
于仁船坞公司(Union Dock Co.)	英	1864	九龙与黄埔	修造船舶。资本500,000元，黄埔有船坞四座。1870年为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所并。
耶松船厂(S.C.Farnham & Co.)	英	1865	上　海	修造船舶。长期租用上海浦东两船坞公司的船坞。八十年代已能修造2,000吨的汽船。1892年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 750,000 两，约有工人2,000余人。
江苏药水厂(Major's Acid Works; Kiangsu Chemical Works)	英	186?	上　海	制造酸碱，熔铸金银。二十世纪初约有工人250人。
上海砖瓦锯木厂(Shanghai Brick and Saw Mill Co.)*	英	186?	上　海	制造砖瓦与机器锯木。
缫丝局*	法(?)	1866	上　海	缫机10车，系试验性质。开张后数月就迁往日本。
科发药房(Voelkel & Schroeder)	德	1866	上　海	售药兼制药。
法商自来火行(Compagnie du Gaz de laConcession Francaise du Changhai)	法	1866	上　海	制造煤气。最初资本30,000两，1890年增至50,000两。1892年停业。
新泰砖茶厂(Tokmakoff, Molotk-off & Co.)	俄	1866	汉　口	规模及发展情况与顺丰砖茶厂类似。
福格森船厂(Ferguson & Co.)*	英(?)	1867前	广州黄埔	修理船舶，有船坞一座。
牛庄豆饼厂	英	1867	牛　庄	用机器榨油及制造豆饼。1870年停业。
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	英	1870	上　海	印刷西文书籍兼制文具。
厦门鸦片制造厂*	英	1870	厦　门	把生鸦片制成烟膏。
平和洋行(Birt & Co.)*	英	1870	上　海	打包厂。
申报馆(Shun Pao Office)	英	1872	上　海	英商美查（E.Major）所创办。初用手摇轮转机，1891年始用煤气机。
烟台蛋粉厂*	德	1872	烟　台	制造蛋粉，系试验性质，不久即停闭。
英商砖茶厂*	英	1872	汉　口	制造砖茶。不久即停业。
福州俄商砖茶厂*	俄	1872	福　州	1872年俄商开始在福州建立砖茶厂。至1875年俄商在福州一带已有五、六个厂。1876年有9个厂，规模皆较小。
汉口熔金厂*	英	187?	汉　口	熔炼金银，与上海江苏药水厂类似。数年即停业。
阜昌砖茶厂(Molchanoff, Pecha-	俄	1874	汉　口	至1877年汉口有阜昌、顺丰、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续3）

企业	国别	设立年	所在地	情况
tnoff & Co.)				新泰等三个俄商茶行所办的四个砖茶厂，1878年有6个厂，八十年代之初复并为3个厂。
九江新泰砖茶厂(Tokmakoff, She-veleff, & Co.)	俄	1875	九江	制造砖茶，系汉口新泰砖茶厂的分厂。
点石斋石印局(Tien Shih Chai,Photo Lithographic Publishing Works)	英	1876	上海	英商美查所创办，石印书籍。工人约200人。
美查肥皂厂(Major's Soap Factory)*	英	187?	上海	英商美查所创办，初用手工制造，九十年代之初始用机器。
烟台缫丝局(Crasemann & Hagen)	德	1877	烟台	缫丝织绸。初用手摇机，有织机200架。1882年改为中德合办，1886年复改组。1892年始用蒸汽机。
台湾樟脑压制厂*	英	1877	台南	压制樟脑以便利出口。
上海机器洗衣局(Shanghai Washing Co.)*	英	1878	上海	规模较小，资本5,460两。
旗昌丝厂(Kee Chong Silk Filature)	美	1878	上海	美商旗昌洋行所办，最初缫机50车，数年后扩充至400车，工人1,100余人。1891年由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
汕头怡和糖厂(Swatow Sugar Refinery)*	英	1878	汕头	香港英商怡和洋行中华火车糖局的分厂。工人200余人。1886年停业。
文汇报馆(Shanghai Mercury Office)	英	1879	上海	印行文汇报，使用煤气机。
上海机器制冰厂(Co-operative Ice Co.)*	英	1880	上海	资本30,000两。
燧昌自来火局(Sui Chong Match Factory)	英	1880	上海	英商美查所办，制造火柴。工人400余人。
上海熟皮公司(Shanghai Tannery Co.)	英	1881	上海	资本112,500两。1882年毁于火，翌年公司解散。
上海华章纸厂(Shanghai Paper Mill Co.)	美	1881	上海	最初资本75,000两；至二十世纪初，增至450,000两。
上海自来水公司(Shanghai Waterworks Co.Ltd)	英	1881	上海	最初资本75,000英镑，1894年增至144,000英镑。
厦门铁锅厂(Gerard & Co.)*	德	1881	厦门	制造铁锅。
英商铁锅厂(Ewe Boon & Co.)*	英	1881	厦门	制造铁锅。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续4）

企业	国别	设立年	所在地	情况
伍德铁厂(G.A.Wood & Co.)*	英	1882前	上海	制造钢铁器具与机器。
公平丝厂(Iveson & Co.)*	英	1882	上海	缫机200车，工人数百人。
怡和丝厂(Ewo Silk Filature)	英	1882	上海	英商怡和洋行所办，最初缫机200车，至十九世纪末，资本500,000两，缫机500车，工人1,100人。
上海玻璃公司(Shanghai Glass Works Co.)*	英	1882	上海	主要出资者为平和洋行，不久即停业。
九江顺丰砖茶厂(S.W.Litvinoff & Co.)	俄	1882	九江	制造砖茶，系汉口顺丰砖茶厂的分厂。
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	英	1882	上海	资本50,000两。1888年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1893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改为工部局电气处
福州机器制冰厂*	英	1882	福州	制冰。
广州机器制冰厂*	英	1883	广州	制冰。是年为广州人民所毁。
祥泰木行(China Import & Export Lumber Co.)	英	1884	上海	英商沙逊洋行所创设，从事木材加工。
苏尔兹洋行榨油厂(Schultze & Co.)*	丹麦	1884	牛庄	榨蓖麻子油。疑不久即停业。
福利公司家具厂(Hall & Holtz Co-operative Co.)	英	1885	上海	用机器制造家具。
天津时报馆(Chinese Time Office)	德	1885	天津	机器印刷，规模较大，印行中英文天津时报，1893年停业。
福利公司酿酒厂(Empire Brewery)*	英	1886	上海	福利公司收买埃凡馒头店的酿酒厂扩充而成。
屈臣氏大药房(A.S.Watson & Co.)上海分店	英	1886	上海	售药兼制药及饮料。总店在香港，上海天津各地设有分厂。
德隆打包厂	德	1887	天津	打包。
亚古船厂(Acum's Boat-building Yard)*	英(?)	188?	上海	修造船舶，规模较小。
大成机器厂(The Hungkew Engine Co.)	英	188?	上海	修理船舶。
怡和丝头厂(Ewo Silk Spinning, Weaving and Dyeing Co.)	英	1888	上海	怡和洋行所创办，清理废丝，系与怡和丝厂相联系的企业。
上海机器轧花局(Shanghai Cotton Cleaning & Working Co.)	英、日、美、德	1888	上海	资本75,000两，轧花机32部。1902年停业。
旗昌机器焙茶厂*	美	1888	台北	美商旗昌洋行所创办。
新上海制冰厂(New Shanghai Ice Co.)*	德	1890	上海	资本36,000两，收买上海机器制冰厂扩充而成。
天津煤气公司(Tientsin Gas Co.,	英	1890	天津	资本30,900两，其中有中国资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续5）

企　　　　业	国别	设立年	所在地	情　　　况
Ltd.)*				本参加。
宝昌丝厂(Shanghai Silk Filature)	法	1891	上　海	法商继承旗昌丝厂，缫机近1,000车。
纶昌丝厂（LunChong Silk Filature）	英	1891	上　海	资本200,000两，缫机188车，工人250人。
汉口机器制冰厂*	英（？）	1891	汉　口	制冰。
老晋隆洋行(Mustard & Co.)	英	1891	天　津	小规模制造纸烟。
上海洋灰公司(Shanghai Concrete Co.)*	英（？）	1891(？)	上　海	以入口的洋灰加工制造建筑材料。
乾康丝厂	美	1892	上　海	缫机280车。不久即转售于华商。
泌药水厂(The AQuarius Co.)	英	1892	上　海	英商正广和洋行创办，制造汽水、啤酒等饮料。规模较大。
上海榨油厂*	英	1892	上　海	美查兄弟公司所创办，经营棉子榨油，兼制酒精。
美国烟草公司（Mercantile Tobacco Co.)*	美	1893	上　海	机器制造纸烟，规模较大。
信昌丝厂(SinChong Silk Filature Co.)	法	1893	上　海	资本530,000两，缫机530车，工人约1,000人。
厦门机器公司(Amoy Engineering Co, Ltd.)*	英	1893	厦　门	修理船舶。资本30,000元。
上海火油池(Arnhold karberg, & Co.')	德	1893	上　海	德商瑞记洋行所设，附设工厂制造铅铁煤油箱，工人约600人。
瑞纶丝厂	德	1894	上　海	资本480,000两，缫机480车，工人约1,000余人。
天津印字馆(The Tientsin Press)	英	1894	天　津	出版京津泰晤士报。
厦门火油池*	英（？）	1894	厦　门	附设小规模的工厂，制造铅铁煤油箱。
汕头火油池*	美（？）	1894	汕　头	附设小规模的工厂，制造铅铁煤油箱。

编者注：凡标“*”符号者，都是现在尚未找到中文行名，或原来没有中文行名的厂号，因此不得不暂时用音译或意译。其他未标“*”符号者，都是原有的中文行名。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辑）

历年设立的重要外国厂矿明细表

1896——1913年

说　　明

一、本表包括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外资工厂和全部已开的外资矿场。中外合资的厂矿亦包括在内。

二、所列各厂矿的资本，只限于在中国的部分，凡总公司或总厂在本国者，只录其在中国的分公司或分厂的资本。工厂由进出口洋行附设者，只录附设工厂本身的资本。

三、所列各厂矿资本，一般系创办时的投资额，创办以后的变动；没有加以统计。少数创办时投资额不详者，以稍后的资本代替。

四、资本以银元为单位，原为外币或其他币值者，一律加以折算。

五、本表系初步统计，错误遗漏之外，有待于陆续的修正和补充。

(1)工　　厂

设立年代	所在地	厂名	国别	资本(千元)	资料来源
1896	上海	上海油厂	不详	250	捷报，1896年7月10日，页68。
1896	上海	增裕面粉厂	英	182	捷报，1896年12月4日，页974；1897年4月30日，页789。
1896	上海	和丰船厂	英	687	捷报，1897年8月6日，页265。
1897	上海	怡和纱厂	英	1,399	捷报，1897年11月26日，页955。
1897	上海	老公茂纱厂	英	839	捷报，1898年2月28日，页333。
1897	上海	协隆纺织局	英	1,049	捷报，1897年12月10日，页1,042。
1897	上海	鸿源纱厂	美	1,096	捷报，1897年11月5日，页825。
1897	上海	美国烟公司	美	105	捷报，1897年；东西商报，1900年，商47，页9—11。
1897	上海	瑞记纱厂	德	1,399	捷报，1898年2月7日，页180。
1897	上海	云龙轧花厂	中、日	140	在支那本邦人进势概览；商埠志，页623。
1897	上海	美昌机器碾米厂	美	140	捷报，1898年；1901年3月13日。1901年资本始招足。
1899	福州	耀明火柴厂	英	150	福建事情，页151。
1899	武昌	亨达利有色金属精炼厂	法	1,091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卷1，页305；阁钞汇编，华北译著编，光绪28年10月，页10。
1900	上海	瑞熔造船厂	英	234	中华民国实业名签，页860。

（1）工厂（续）

设立年代	所在地	厂名	国别	资本（千元）	资料来源
1900	上海	谋得利洋行乐器厂	英	125	捷报，1900年各期。本年正式成立公司。
1900	上海	文汇印刷馆	英	147	捷报，1910年6月17日，页687。
1900	上海	华昌制冰厂	英	280	捷报，1901年3月27日，页598。上年合并上海制冰公司，本年新成立。
1900	苏州	延昌永缫丝厂	中、德	420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苏州口，页545；江南事情，页284。
1900	哈尔滨	第一满州制粉会社	俄	413	北满洲之资源与产业概观，页100。
1900	上海	裕光胶厂	美（？）	140	捷报，1900年。
1901	上海	华章造纸厂	中、美	629	捷报，1902年2月19日，页233。
1902	上海	上海纺绩株式会社一厂	日	425	捷报，1902年3月9日，页530。
1902	上海	祥泰木行	英	350	捷报，1903年3月12日，页485。该行本年设锯木厂。
1902	沧口	华德缫丝公司	德	500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胶州口，页251；关册，1906，中文，页112。根据工人数目估计。
1902	天津	天津电车电灯公司	比	2,500	吴蔼宸：华北国际五大问题；中国股份检查书，1914，页263。
1902	天津	天津法租界电灯厂	法	119	北支五省电气事业，页96。
1902	天津	济安自来水厂	德	1,072	中国股份检查书，1914，页123。
1903	天津	天津使馆界发电所	英	260	支那年鉴，1927，页975。
1903	上海	龙飞公司	英	378	捷报，1909年2月17日，页169；英国在远东经济利益，页81。
1903	上海	威麟洋行	英	125	捷报，1909年3月22日，页468。
1903	上海	英美烟公司	英	1,500	英美烟公司档案。系1905年发行额，包括各地工厂在内。
1903	哈尔滨	巴巴利啤酒厂	捷	100	北满概观，页294。小林庄一：英美烟草托辣斯，页61。
1904	哈尔滨	老巴夺烟厂	俄	1,000	系1913年合并于英美烟公司以后之资本。
1904	上海	江南制革厂	中、日	210	江南事情，经济编第1，页156。
1904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中、日	1,000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中国实业杂志，1914年6月1日，页3。本年加入日本资本。
1904	青岛	英德麦酒制造厂	德	400	捷报，1905年2月24日，页382。
1905	上海	上海绢丝公司	中、日	559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
1905	上海	万隆铁工厂	英	435	捷报，1908年1月10日，页98；商埠志，页590。亦说为德厂。
1905	汉口	恒丰面粉厂	英	280	汉口，页121；支那之工业与原料，页783。

（1）工厂（续）

设立年代	所在地	厂　　　名	国别	资　本（千元）	资　料　来　源
1905	汉口	金龙面粉厂	荷	168	同上。
1905	汉阳	日信豆粕第一工场	日	530	汉口，页124；支那之工业与原料，页140。
1905	上海	上海纺绩株式会社二厂	日	839	支那省别全志，卷15，页646。
1905	上海	怡和洋行制材厂	英	150	商埠志，页574。根据工人数目估计。
1906	上海	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法	1,136	支那年鉴，1927，页956。
1906	汉口	汉口电灯厂	英	182	汉口，附录，页78；第四回支前年鉴，页1,103。
1906	北京	北京电灯厂	英	364	北支五省电气事业，页31。
1906	汉口	日信豆粕第二工场	日	487	汉口，页124。
1906	营口	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	中、日	487	在满主要会社要览，页59；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82。
1906	长春	日清磷寸株式会社	日	292	满蒙全书，卷4，页212；在满主要会社要览，页10。
1906	牛庄	牛庄小寺油坊	日	1,558	支那之工业与原料，卷1下，页1,279。
1906	大连	秋田商会制材部	日	420	满蒙全书，卷4，页538。
1906	铁岭	满洲制粉株式会社	日	1,000	满蒙全书，卷4，页324；东三省经济调查录，页108。
1907	汉口	东亚制粉株式会社	日	487	上海总商会月刊，2卷3号，调查，页18；支那之工业，页341。
1907	上海	振华纱厂	中、英	420	中国股份检查书，1914，页244；江苏省纺织业状况，内编，页44。
1907	上海	九成纱厂	中、日	461	中华民国实业名鉴，页501。
1907	上海	增裕榨油厂	中、英	168	捷报，1910年4月29日，页91。
1907	大连	满铁沙河口工场	日	64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第一次，页932；第二次，页386。
1907	大连	满铁煤气工场	日	59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61、932。
1907	大连	西森造船所	日	148	满蒙全书，卷4，页460。
1907	辽阳	满铁辽阳工场	日	251	满蒙通鉴，页783。
1908	上海	东方百代唱机唱片公司	法	500	法国对支经济势力之全貌，页21。
1908	大连	川崎船厂大连分厂	日	500	满蒙全书，页460，本厂在日本，总资本2,000万日元，此系根据工人人数估计。
1908	大连	小野田水泥株式会社大连工场	日	1,000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卷1，页129；支那年鉴第四回，页178。
1908	大连	大连电灯厂	日	2,595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45。系以开办费代替。
1908	大连	日清豆粕制造株式会社	中、日	892	支那之工业，页268。

（1）工厂（续）

设立年代	所在地	厂名	国别	资本（千元）	资料来源
1908	哈尔滨	阿什河制糖厂	俄	1,074	满洲之资源，吉林省，页273。
1908	哈尔滨	一面坡面粉厂	俄	107	支那之工业与原料，页665。
1908	天津	德国北辰电业公司	德	260	北支五省电气事业，页47。
1908	上海	东方织物公司	不详	210	捷报，1908年。
1908	汉口	和记洋行冰冻食物厂	英	351	关册，1908年，页48。
1909	上海	固本肥皂厂	德	500	时报，1911年6月17日。
1909	上海	上海机器硝皮公司	英	210	捷报，1911年1月27日，页207。
1909	大连	大矢组精米所	日	123	东三省经济调查录，页161。
1909	大连	满洲石硷株式会社	日	307	满蒙全书，卷4，页278。
1909	大连	三泰油坊	日	357	支那之工业与原料，卷1下，页1,293。
1909	营口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日	1,227	满蒙全书，卷4，页447—448。
1909	长春	长春电灯厂	日	539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45。系以开办费代替。
1909	汉口	法华蒸酒公司	中、法	490	关册，1909，中文，页48。
1909	上海	立德油厂	中、英	364	捷报，1911年4月15日，页157。
1909	哈尔滨	依尔库茨克面粉厂	俄	430	满蒙全书，卷4，页327。
1909	哈尔滨	图鲁卡斯库面粉厂	俄	430	同上。
1910	上海	公益纱厂	中、英	750	捷报，1912年1月20日，页179。
1910	沈阳	奉天电灯厂	日	41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46。系以开办费代替。
1910	大连	小寺油坊	日	238	支那之工业，页268。
1910	哈尔滨	奥麦公司粉厂	俄	107	满蒙全书，卷4，页430。
1911	上海	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三厂	日	750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351。资本系根据纱锭数估计。
1911	上海	可的牛奶厂	英	122	中国股份检查书，1914，页101。
1911	上海	联合酿酒公司	德	400	中国股份检查书，1914，页127。
1911	大连	斋藤油坊	日	118	支那之工业，页268。
1911	安东	安东电灯厂	日	15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47。
1911	铁岭	铁岭电灯厂	中、日	13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83。
1912	上海	汇芳公司锯木厂	美	1,000	诸外国对支投资，中卷，页90。

（1）工　厂（续）

设立年代	所在地	厂　名	国别	资本（千元）	资　料　来　源
1912	安东	鸭绿江制材厂	中、日	105	关册，1914，页119；政艺通报，艺学文编，卷1，页8。
1912	哈尔滨	烧夫（磨斯启次库）面粉厂	俄	107	满蒙全书，卷4，页327。
1912	大连	大连制冰株式会社	日	523	满蒙全书，卷4，页299。
1912	开原	开原电灯厂	日	249	支那年鉴，1927，页979。
1912	辽阳	辽阳电灯厂	中、日	125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83。
1913	上海	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四厂	日	1,399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351。资本系根据纱锭数估计。
1913	哈尔滨	缶沙德金面粉厂	中、俄	108	满蒙全书，4卷，页327。
1913	哈尔滨	北满制粉会社	日	132	上海总商会月刊，2卷3号，调查，页14。
1913	安东	安东自来水厂	日	233	关册，1914，页119。
1913	安东	安东煤气公司	日	106	关册，1913，页123。
1913	大连	大连寺儿沟油坊	日	400	关册，1913，页162。
1913	大连	满铁印刷厂	日	14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页681。

编者注：1895年中没有开设资本在100,000元以上的重要工厂。

（2）矿　　场①

设立年代	所　在　地	矿　　名	国别	资　本（千元）
1896	直隶宛平	通兴煤矿	美	70
1897前	直隶西山	天利煤矿	中、德	28
1898	奉天朝阳	暖池塘煤矿	中、英	203 ②
1898	奉天烟台	烟台煤矿	中、俄	80
1899	贵州铜仁	英法水银公司	法、英	280
1899	山东坊子、马庄	山东华德矿务公司	德	1,527
1899	蒙古图车两盟	蒙古金矿公司	中、俄	1,612
1900	新疆塔城	塔城金矿	中、俄	140
1900	直隶唐山	开平煤矿	中、英	10,038
1901	奉天抚顺	抚顺煤矿	中、俄	224
1902	黑龙江胪膑	札赉诺尔煤矿	俄	198
1902	奉天辽阳	义胜鑫公司	中、俄	490
1902	安徽铜官山	伦华公司	中、英	120
1902	热河平泉	平远金矿	中、英	559
1902	湖北阳新	万顺公司	中、法	1,119②
1903	山东威海卫	范贼金矿	英	600
1903	奉天义州	华美公司	中、美	60
1903	奉天尾明山	天利公司	中、俄	28
1904	四川江北厅	江北厅煤矿公司	英	690
1905	直隶临城	临城煤矿	中、比	1,810
1905	吉林天宝山	中和公司	中、日	200
1907	河南焦作	河南福公司	英	13,986
1907	奉天抚顺	抚顺煤矿③	日	656
1907	山东茅山	华德山东采矿公司	德	476②
1908	直隶井陉	井陉煤矿	中、德	699
1908	山东博山	博东公司	中、日	92
1910	奉天本溪湖	本溪湖煤矿公司	中、日	2,000
1911	奉天本溪湖	彩合公司	中、日	100
1911	直隶唐山	开滦煤矿	中、英	11,594
1912	黑龙江胪膑县	察罕敖拉煤矿	意	50
1913	直隶宛平	裕懋公司	中、比	140
1913	吉林东宁	绥芬金矿公司	中、俄	100

资料来源：见本章第二节，附录，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已采各矿简表

编 者 注：①1895年中没有外资矿场的开采。

②以赎款代替。

③包括烟台煤矿在内。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二辑）

中国煤矿生产中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

（一）机械及土法开采

1912——1937年

年份	全国总产量	帝国主义控制下					
		合计		直接攫夺下		参加投资	
	吨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1912	9,067,862	4,749,294	52.4	2,202,651	24.3	2,546,643	28.1
1913	12,879,770	7,136,545	55.4	2,865,081	22.2	4,271,464	33.2
1914	14,182,330	7,147,924	50.4	2,819,431	19.9	4,328,493	30.5
1915	13,496,666	7,617,227	56.4	2,990,050	22.2	4,627,177	34.3
1916	15,982,616	7,606,906	47.6	3,184,828	19.9	4,422,078	27.7
1917	16,982,260	8,322,555	49.0	3,382,832	19.9	4,939,723	29.1
1918	18,432,285	8,595,409	46.6	3,786,334	20.5	4,809,075	26.1
1919	20,146,818	9,691,751	48.1	4,056,764	20.1	5,634,987	28.0
1920	21,318,825	10,856,472	50.9	4,416,409	20.7	6,440,063	30.2
1921	20,507,390	10,135,465	49.4	4,122,773	20.1	6,012,692	29.3
1922	21,139,918	11,046,985	52.3	5,227,199	24.7	5,819,786	27.5
1923	24,552,029	13,441,749	54.7	5,687,753	23.2	7,753,996	31.6
1924	25,780,875	14,123,786	54.8	6,296,733	24.4	7,827,053	30.4
1925	24,255,042	13,138,588	54.2	6,076,629	25.1	7,061,959	29.1
1926	23,040,119	12,242,069	53.1	6,406,575	27.8	5,835,494	25.3
1927	24,172,009	13,534,714	56.0	7,605,255	31.5	5,929,459	24.5
1928	25,091,760	14,083,406	56.1	7,048,550	28.1	7,034,856	28.0
1929	25,437,480	14,682,352	57.7	7,432,582	29.2	7,249,770	28.5
1930	26,036,564	15,060,998	57.8	7,378,111	28.3	7,682,887	29.5
1931	27,244,673	14,584,894	53.5	6,711,000	24.6	7,873,894	28.9
1932	26,376,315	15,544,624	58.9	8,403,482	31.9	7,141,142	27.1
1933	28,378,783	18,395,965	64.9	10,888,072	38.4	7,507,893	26.5
1934	32,724,842	20,538,835	62.8	12,535,843	38.3	8,002,992	24.5
1935	36,091,747	25,200,286	56.0	12,809,607	35.5	7,390,679	20.5
1936	39,902,985	22,218,437	55.7	14,083,880	35.3	8,134,557	20.4
1937	37,230,946	22,760,545	61.1	14,746,265	39.6	8,014,280	21.5

资料来源：（1）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页14，表二；第三次，页212，表一；第四次，页34，表二六；第五次，页54，64，表四七，五六；第七次，页55，表四二至六八。

（2）佟哲晖，战时华北矿业，附表五，社会科学杂志，10卷1期，页44。（修正矿业纪要数字）。

（3）参加投资下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产量，1912—1917估计每年为三万吨，1918—1922估计每年为四万吨。

（4）全国历年煤矿所有权沿革表（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者注：（1）帝国主义直接攫夺下，指全部为帝国主义投资，1932—1937，除包括山东南定外，全为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占领的东北产量。

（2）帝国主义参加投资，指帝国主义通过中外合办的形式及借款形式而实际控制的煤矿。

（3）土法开采，包括在内。

（二）机械开采

1912——1937

年份	全国机械开采总产量	帝国主义控制下					
		合计		直接攫夺下		参加投资	
	吨	吨	%	吨	%	吨	%
1912	5,165,862	4,749,294	91.9	2,202,651	42.6	2,546,643	49.3
1913	7,677,570	7,136,545	93.0	2,865,081	37.3	4,271,464	55.6
1914	7,973,930	7,147,924	89.6	2,319,431	35.4	4,328,493	54.3
1915	8,492,966	7,617,227	89.7	2,990,050	35.2	4,627,177	54.5
1916	9,482,914	7,606,906	80.2	3,184,828	33.6	4,422,078	46.6
1917	10,478,560	8,322,555	79.4	3,382,832	32.3	4,939,723	47.1
1918	11,109,965	8,587,242	77.3	3,783,167	34.1	4,804,075	43.2
1919	12,804,636	9,682,399	75.6	4,052,412	31.6	5,629,987	44.0
1920	14,130,543	10,850,786	76.8	4,415,723	31.2	6,435,063	45.5
1921	13,350,400	10,129,393	75.9	4,121,701	30.9	6,007,692	45.0
1922	14,059,646	10,999,787	78.2	5,185,001	36.9	5,814,786	41.4
1923	16,973,488	13,389,938	78.9	5,640,942	33.2	7,748,996	45.7
1924	18,524,732	14,074,434	76.0	6,252,381	33.8	7,822,053	42.2
1925	17,537,630	13,079,786	74.6	6,022,827	34.3	7,056,959	40.2
1926	15,616,713	12,235,269	78.3	6,406,575	41.0	5,828,694	37.3
1927	17,693,507	13,509,714	76.4	7,605,255	43.0	5,904,459	33.4
1928	17,980,450	14,021,906	78.0	7,048,550	39.2	6,973,356	38.8
1929	18,854,458	14,624,352	77.6	7,432,582	39.4	7,191,770	38.1
1930	19,892,177	15,040,993	75.6	7,378,111	37.1	7,662,887	38.5
1931	21,092,720	14,581,894	69.1	6,711,000	31.8	7,870,894	37.3
1932	20,212,864	15,544,624	76.9	8,403,482	41.6	7,141,142	35.3
1933	22,074,954	18,395,965	83.3	10,888,072	49.3	7,507,893	34.0
1934	25,801,182	20,538,835	79.6	12,535,843	48.6	8,002,992	31.0
1935	30,093,484	20,200,286	67.1	12,809,607	42.6	7,390,679	24.6
1936	33,793,930	22,218,437	65.7	14,083,880	41.7	8,134,557	24.1
1937	31,386,933	22,760,545	72.5	14,746,265	47.0	8,014,280	25.5

资料来源：（1）同表14：减去土法开采产量。（帝国主义控制下各矿；直接攫夺栏减去炸子窑，参加投资栏减去石门寨、田师付等矿）。
（2）同表6（一）：中国历年煤铁机械开采及土法开采产量表。
（3）全国历年煤矿各矿所有权沿革表（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中国生铁生产中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

1900——1937年

年份	全国总产量 吨	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					
		合计		参加投资		贷款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1900	25,890	25,890	100.0	—	—	25,890	100.0
1901	28,805	28,805	100.0	—	—	28,805	100.0
1902	15,800	15,800	100.0	—	—	15,800	100.0
1903	38,875	38,875	100.0	—	—	38,875	100.0
1904	38,771	38,771	100.0	—	—	38,771	100.0
1905	32,314	32,314	100.0	—	—	32,314	100.0
1906	50,622	50,622	100.0	—	—	50,622	100.0
1907	62,148	62,148	100.0	—	—	62,148	100.0
1908	66,410	66,410	100.0	—	—	66,410	100.0
1909	74,405	74,405	100.0	—	—	74,405	100.0
1910	119,396	119,396	100.0	—	—	119,396	100.0
1911	83,337	83,337	100.0	—	—	83,337	100.0
1912	7,989	7,989	100.0	—	—	7,989	100.0
1913	97,513	97,513	100.0	—	—	97,513	100.0
1914	130,000	130,000	100.0	—	—	130,000	100.0
1915	165,969	165,969	100.0	29,438	17.7	136,531	82.3
1916	199,135	199,135	100.0	49,211	24.7	149,924	75.3
1917	187,635	187,635	100.0	38,971	20.2	149,664	79.8
1918	158,118	158,118	100.0	44,966	28.4	113,152	71.6
1919	237,063	237,063	100.0	70,967	29.9	166,096	70.1
1920	258,868	258,868	100.0	124,939	48.3	133,929	51.7
1921	228,733	228,733	100.0	89,125	39.0	139,608	61.0
1922	231,164	231,164	100.0	67,492	29.2	163,672	70.8
1923	170,807	170,807	100.0	97,789	57.3	73,018	42.7

中日生铁生产中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续）

年份	全国总产量 吨	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					
		合计		参加投资		贷款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吨	占全国总产量 %
1924	190,124	190,124	100.0	147,972	77.8	42,152	22.2
1925	193,156	193,156	100.0	139,674	72.3	53,482	27.7
1926	228,352	216,054	94.6	216,054	94.6	—	—
1927	257,945	253,945	98.4	253,945	98.4	—	—
1928	298,119	287,491	96.4	287,491	96.4	—	—
1929	300,675	286,743	95.4	286,743	95.4	—	—
1930	376,080	373,493	99.3	373,493	99.3	—	—
1931	344,749	335,114	97.2	335,114	97.2	—	—
1932	413,391	394,108	95.3	394,108	95.3	—	—
1933	470,565	436,018	92.7	436,018	92.7	—	—
1934	520,727	500,087	96.0	500,087	96.0	—	—
1935	647,974	626,324	96.7	626,324	96.7	—	—
1936	669,696	648,096	96.8	648,096	96.8	—	—
1937	831,143	811,643	97.6	811,643	97.6	—	

资料来源：（1）贷款栏（汉冶萍公司），1900—1922中国铁矿志；1923—1925，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页133。

（2）贷款栏（其他公司），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页125；三次纪要，页297；四次纪要，页122；五次纪要，页181；七次纪要，页100。

（3）参加投资栏（1931后为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占领，包括本溪湖、鞍山），1915—1936，东北经济小丛书，钢铁，页77—79、82。

（4）总产量栏，同上。

编者注：（1）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参加投资者：鞍山、本溪湖两厂矿；贷款者：汉冶萍、焦作（1915—1931）、扬子（1921—1926）三厂矿。

（2）土法制生铁不包括在内。

（3）1926—1937全国总产量中，不属于帝国主义控制下产量，均为商办，包括扬子、保晋二铁厂，由总产量减去帝国主义控制项下的合计额即得。

（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中外纱厂纱锭、线锭、布机比较

(一)实　数

1897——1947年

年　　份	纱	锭	线	锭	布	机
	华　厂	外　厂	华　厂	外　厂	华　厂	外　厂
1897	234,304	160,548	—	—	2,016	—
1898	306,180	160,548	—	—	2,016	—
1899	336,722	160,548	—	—	2,016	—
1900	336,722	160,548	—	—	2,016	—
1901	336,722	160,548	—	—	2,016	—
1902	312,810	184,460	—	—	2,016	—
1903	316,678	184,460	—	—	2,016	—
1904	341,028	184,460	—	—	2,016	—
1905	355,588	184,460	—	—	2,016	—
1906	480,780	204,852	—	—	2,016	—
1907	417,316	215,388	—	—	2,016	—
1908	439,236	221,668	—	—	2,016	—
1909	469,588	215,844	—	—	2,016	—
1910	497,448	215,844	—	—	2,316	—
1911	497,448	238,884	—	—	2,316	—
1912	499,348	238,884	—	—	2,316	—
1913	484,192	338,960	—	—	2,016	19 86
1914	544,780	464,976	—	—	2,300	2,310
1918	647,570	486,858	—	—	3,502	2,736
1919	658,748	577,010	16,436	2,100	2,650	3,839
1920	842,894	607,946	14,000	?	4,310	4,139
1921	1,248,282	631,466	58,272	?	5,825	4,139
1922	1,506,634	879,694	38,072	?	6,767	5,786
1924	1,750,498	1,183,244	33,048	?	9,481	6,792
1925	1,866,232	1,473,496	41,272	58,744	11,121	9,553
1927	2,018,588	1,497,294	65,470	77,632	12,109	11,973

（一）实数（续）

年份	纱锭		线锭		布机	
	华厂	外厂	华厂	外厂	华厂	外厂
1928	2,059,088	1,550,592	68,352	117,544	13,117	12,701
1929	2,146,152	1,615,480	68,920	185,484	15,205	13,367
1930	2,345,074	1,757,004	70,420	233,504	15,718	16,034
1931	2,453,304	1,886,402	113,338	232,236	17,629	18,674
1932	2,625,413	1,973,944	135,860	272,700	19,081	20,483
1933	2,742,754	1,988,392	143,042	297,412	20,926	21,908
1934	2,807,391	2,131,440	144,045	298,812	22,567	24,497
1935	2,850,745	2,171,652	157,734	346,716	24,861	27,143
1936	2,746,392	2,356,404	173,316	358,954	25,503	32,936
1947	4,376,287	45,260	351,053	?	53,779	24

资料来源：1897—1913，严中平，中国纱厂沿革表，并参考中国棉业之发展，第五章。其中宁波通久源纱厂成立于1896年，严著假定为1897年，兹加以订正。凡中外合资者，其设备中外各半计算；惟1910年开车之公益纱厂初开时外资甚少，其设备全计入华厂项下，1913年卖归英国时，始计入外厂项下。

1914，奥德尔，纱厂与工业的前途，载中国的更生，1915，页62—66，大陆报版。

1918—1936，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供给之材料编成，其中1919，1922—1929，均经订正。

1947，全国纺织联合会1947年12月调查，1948年6月出版之中国纱厂一览表，转见中国棉纺统计史料，页65—70，表70—77之"已开"数字。其中有纱锭1,646,393枚，线锭231,130枚，布机32,322台，为官僚资本之中纺公司所有。

编者注：表中数字，系实际开工之数目。

（二）百分比

1896——1947

华厂、外厂之和＝100

年份	纱锭		线锭		布机	
	华厂	外厂	华厂	外厂	华厂	外厂
1897	59.3	40.7	—	—	100.0	—
1898	65.6	34.4	—	—	100.0	—
1899	67.7	32.3	—	—	100.0	—
1900	67.7	32.3	—	—	100.0	—
1901	67.7	32.3	—	—	100.0	—
1902	62.9	37.1	—	—	100.0	—
1903	63.2	36.8	—	—	100.0	—
1904	64.9	35.1	—	—	100.0	—
1905	65.8	34.2	—	—	100.0	—
1906	65.0	35.0	—	—	100.0	—
1907	66.0	34.0	—	—	100.0	—
1908	66.5	33.5	—	—	100.0	—
1909	68.5	31.5	—	—	100.0	—
1910	69.7	30.3	—	—	100.0	—
1911	67.6	32.4	—	—	100.0	—
1912	67.6	32.4	—	—	100.0	—
1913	58.8	41.2	—	—	50.4	49.6
1914	54.0	46.0	—	—	49.9	50.1
1918	57.1	42.9	—	—	56.1	43.9
1919	53.3	46.7	88.7	11.3	40.8	59.2
1920	58.1	41.9	100.0	?	51.0	49.0
1921	66.4	33.6	100.0	?	58.5	41.5
1922	63.1	36.9	100.0	?	53.9	46.1
1924	59.7	40.3	100.0	?	58.3	41.7
1925	55.9	44.1	41.3	58.7	53.8	46.2
1927	57.4	42.6	45.8	54.2	50.3	49.7
1928	57.0	43.0	36.8	63.2	50.8	49.2
1929	57.1	42.9	27.1	72.9	53.2	46.8
1930	57.2	42.8	23.2	76.8	49.5	50.5
1931	56.5	43.5	32.8	67.2	48.6	51.4
1932	57.1	42.9	33.3	66.7	48.2	51.8
1933	58.0	42.0	32.5	67.5	48.9	51.1
1934	56.8	43.2	32.5	67.5	47.9	52.1
1935	56.8	43.2	31.3	78.7	47.8	52.2
1936	53.8	46.2	32.6	67.4	43.6	56.4
1947	99.0	1.0	100.0	?	100.0	•

资料来源：根据表22（一）实数计算。

编者注：•不及0.05。

（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之中国工业

杨　　铨

编者按：本文原载申报馆编辑一九二三年二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本文作者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如认为不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只要改进工业的组织和技术就可以发展民族工业；称太平天国革命为"洪杨之乱"、称汉奸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中兴名臣"、称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为"拳匪之乱"等等。但本文对近代工业发展的情况，提供了比较有系统的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故特转载于此。文中有一些统计数字不精确，因一时无法核对，故仍保持原状。

一　绪　　言

誉中国者，每谓中国为世界最古最大之农业国，中国人亦往往以此自豪，以为四千年来既以农立国矣，则居今日而言富强中国，其惟振兴农业乎！若工业则本非我所长，固不妨取诸他人也。然而一览吾国历年对外贸易统计，则吾国每年商业上之最大漏卮即为工业品之输入，举出口农业品之全额不足相抵也。光绪二年至民国九年，四十五年中吾国出口货较进口货绌三千二百零七兆两（三、二〇六、八七四、五七〇海关两）之巨，其中工业品约占进口货百分之六十五。是四十五年来，吾人因工业不振，为外人所吸收之金钱，已达二千一百兆两。以其半数，已足偿全国之政治外债。（民国五年末中国之外债总额为一千一百零八兆七十七万元）以四十五年平均之，每年之金钱损失约四千六百五十万元，以之赎还胶济路，所差不过三百五十万元。若以最近十年之统计平均，则一年因工业品所输出之金钱足赎还两胶济路。此仅就进出两抵不足之数言之也，若以每年进口工业品之全额计，且八九倍于上述之数。工业不振之影响不可谓不巨矣。夫农非不当重也，无工商为之辅，终难独胜。故今之强国三者并进，不肯以一得自足。美，农国也，南北战争以后，努力工业，奖励发明，卒为世界第一制造国。英，工业国也，十九世纪以来，提倡农业不遗余力，三岛之土地有限，则注其全力于各属地，今印度之茶，非洲之棉，皆于世界市场占重要之位置，其功效可见。欧战以后，此风益甚，平时仰给外货者，皆知一旦战争发生，必受来源断绝之困，争师德人故智，各业并重，以谋自卫。故欧战以前，各国之实业趋重国际分工；欧战以后，皆趋重闭关自给。吾国之农远不如美，而工业品之需要则相伯仲，国际贸易仰给于人之处尤视英美为多，则居今而欲不兴工业，其可得乎！

中国数千年来闭关自足，不知海外尚有世界。明清之交，印度航路发见后，中西始有国际交通。道咸之交，鸦片战争起，英法联军入京，为中国受创外力之始，亦为外商势力膨涨之起点。自是而后，列强之武力侵掠与经济侵掠并进，中国兵战失败以后，继之以商战失败。就出入口贸易统计言之，彼所取诸吾者大抵原料，而所供给于吾者多为制造品。故所谓商战

失败者，实为工战失败也。咸同之交，西人机械始为吾人所重视，当时士大夫每谓中国长于形而上之学，西人所精者形而下之术而已。彼此已自知工业不如西人，其觉悟不可谓不早，然而五十年来工业之进化几何？外货之输入既日增而未已，固有之丝茶市场，复为印度日本所攘夺，处今日之机力世界，而全国所用之马力数竟不及英美一中等工业城，其事诚可耻，其原因更不可不知。

本篇所论事实，由同治元年起，至民国十年止，实包括新工业诞生发展以迄今日之全史。然以月余之力，搜罗六十年之史料，其事已属甚难。盖以国人向不重视工业，竟无专书可供参考，篇中材料，仅就力所能得之书编摘。中间复因病肺咯血，时作时辍，漏误之处知必甚多，改正补遗，惟有俟诸异日矣。旧工业记载尤少，原有规模洪杨乱复迄未恢复，零星破碎，至不易为综括之论，今于工业统计中择其重要者言之，旧工业之大势可得而见焉。

二 新工业之进化时期

中国新工业虽进化于近五十年间，然其发源则在同治初年。故言新工业史者皆自同治初始。为便利研究计，此六十年可区分为数大时期，以见时代之变迁与进化之趋势。中外作者于分期段落大同小异，今摘录许衍灼君与日人安原美佐雄及东亚同文会所编“中国的工业”中所分时期如下：

	许衍灼（见“中国工艺沿革史略”）		安原美佐雄（见“中国的工业与原料”）		“中国的工业”		每期包括年数
第一期	官督商办时代	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年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三十三年
第二期	外人兴业时代	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九年
第三期	国人兴业时代	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	利权收回时代	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	同上	光绪廿九年至民国元年	七年
第四期			自觉的发展期	革命以后	国货维持时代	民国元年末至现在	十年

以上三书所分时期大致相同，惟名称略异耳。第四时期所包括之年数因作书之迟早不同，遂各异。然皆从民国元年起至作书之时止。若引伸至今日所括皆十年也。就每期所括年数观之，第一期失之过长，其名称亦太笼统，今改为两期。其他时期名称亦略有增改，共得五时期如下：

第一期	军用工业时期	由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	约二十年
第二期	官督商办时期	由光绪八年至二十年	约十三年
第三期	外人兴业时期	由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	约八年
第四期	政府奖励及利权收回时期	由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	约九年
第五期	自动发展时期	由民国元年至十年	约十年

军用工业时期 西人机械流入中土，最早者为天文仪器之类，明以前已有之。明代西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辈，皆能自制仪器，其精巧往往为朝野所叹赏。然以其与国计民生无关，见者多以淫巧忽之，故仿造之心不生。及洪杨之役，两军皆有西人参战，所谓洋枪队者始出

现于中国之战场，而西人机械之利乃大彰。当时为清室尽力者，如美之华尔，法之买忒勒，英之戈登辈，皆以善用西式枪炮轮船见重于当局。中兴诸臣目击西器之制胜，遂有仿造军舰军器之举，此所以光绪年间提倡新工业最力之大吏，皆为中兴名臣也。鸦片之战，英法联军入京，中国军队当之辄败，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政府于创痛之余，知受辱之故实由军器陈旧，痛定思痛，遂有大兴西式军工之决心。同末光初，疆吏朝臣凡章奏举办军工者，多以国耻为言，可见当时君臣之心理也。故中国之新工业滥觞于军工，军工所以勃兴之故，则由于：一、洪杨之役得西人枪炮兵轮之益；二、鸦片之战受西人枪炮兵轮之祸。军用工业时期最长，由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凡二十年。今日国内规模伟大之兵工厂造船厂多成于此二十年内。择其要者言之，如同治四年曾国藩设江南造船厂，五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六年李鸿章设江南制造局，光绪三年丁宝桢设四川兵工厂，皆为国内重要之军用工厂。此时期中之新政，如曾国藩李鸿章之遣送幼童出洋，李之开设天津水师学堂，皆以造就军工人材为目的，当时朝野绝少注意于制造商品之工业。惟李鸿章奏设江南制造局折中，有"数十年后，农贾必有仿造洋机以求利益者"之语，薛福成治平六策奏疏中有奖励制器造船两条，其眼光不可谓不远矣。军用工业虽为新工业之先进，然其成效之劣则远出始创者意料之外。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国既屡战屡败，庚子之乱复受八国联军入京之奇辱，卒致国耻未雪而反日增，终且习惯而成自然，亦大可悲矣！推原其故，则效法不彻底误之也。制造军器轮船，岂仅仅购西人机器，用西人工程师，训练若干中国工头工人，而以总办大权委之不学无术之官僚所能收效？必同时讲求基本之科学与工程原理，造就独立之制造人材，乃可推陈出新，应变不穷，此岂当时官吏所知，即今日之官吏恐亦未足语此也。虽然，中国之兵工厂雪外耻则不足，助内争则有余，今日直奉之徒方各拥其兵工厂以自豪，此又曾左诸人始料所不及矣。

官督商办时期 由光绪八年至二十年之十三年间为官督商办工业时期，以光绪八年始者。是年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其出品只完上海海关正税一道，内地厘税一概免除，实开官办工业之先河，立国货免税之创例。虽机器织布局至光绪十六年始实行筹备，十九年厂毁于火，卒未成立，在新工业进化史上要为空前之举，李氏之功不可没也。官办工业，前乎此者尚有左宗棠在甘肃设立之织呢机器厂（光绪四年），惟时期略早，甘肃又地处边僻，故影响甚小，谈新工业者几不知有此事。若论创办商品工业，终当推左为第一人也。此时期中之工业，其始大都为官办，继因成绩失败，渐改为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之期，大抵在光绪二十年以后。官办工业之功臣，李鸿章而外，当推张之洞，李所发起之实业，以航业（招商局）电报（北洋电报局）为最重要。制造工业仅有织布局。张则在粤在鄂皆锐意提倡织布炼铁，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织布纺绩制麻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计划之周，数十年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惜夫所用非人，不能兴利，反为外资输入之阶，亦中国新工业之大不幸也。本时期中有官商合办之工业，如上海道唐松岩所设之机器纺纱局；有原拟官督商办，终因款绌改为完全商办者，如盛宣怀所发起之华盛纱厂；亦有纯粹由商人自办者，如祝大椿所设之上海源昌机器五金厂。然大多数之工厂则皆官吏主动也。

官督商办之工业几于无不失败，即其变相之商办工厂，因官习未除亦百弊丛生，鲜克生利。其失败之原因有二：一、信任官绅万能，不重专门人材；二、依赖外人过甚，工程大权遂为外人所专揽。其人大率为工头之流，月得多金，远过其在本国之享用，遂百计谋把持其地位，其后中国虽有相当人材，亦不能取而代之矣。某铁厂炼钢工头，至今尚用此人，其例也。

外人兴业时期 由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为外人兴业时期，亦为华商觉悟时期。中

日战争以二十一年终，中国政府既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更被迫缔结马关条约（亦曰下关条约），许外人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工厂权，一时外商工厂纷起，如日商之东华公司，英商之怡和、老公茂、鸿源（现为日人购去改为日华纺绩会社第二厂）、德商之瑞记（后改东方）等纱厂相继成立，树上海纱业之先声，亦为外人在中国经营工业之起点。卧榻之侧他人酣睡之声既起，中国商人亦渐悟利权之不可放弃，有起而集股开厂者矣。二十年官督商办时期所提倡不起之工业奋斗精神，至是受外人之猛击而醒，苏州之苏纶（今由宝通公司租办）、上海之大纯及裕源（民国七年为日商收买改为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九厂）、与无锡之业勤（今由福成公司租办）等纱厂皆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此时清政府以战败之余，一筹莫展，百政俱非。朝臣有主张鼓励制造以求富强者（如李端棻之奏设仪器院），有谓西法不能制胜，归罪于学堂制造局等之无用，而主张一律裁撤者（如管廷献之奏议）；亦有以战败归罪于官办船机等局之办理不善，而主张招商承办者(如褚成博之奏议)。群喙纷纭，政府对于振兴工业遂无一定之计划。湖北之汉阳铁厂竟于次年（二十二年）由盛宣怀组织公司改归商办，张之洞之奏议虽以官办不经济为言，当时朝论对官办工业多抱怀疑态度，亦其原因之一也。然张氏提倡工业之志未尝因之稍挫，由鄂至苏，则移在鄂所订购之纺纱机于苏，以谋振兴苏之纱业；至鄂复设工业学堂劝工劝商两公所，又在汉口上海设商务局，联络工商，讲求制造。此时期中疆吏之能知工业重要，而以全力提倡者，张氏当首屈一指矣。

此时期中有一最足纪念之事，即南通大生纱厂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皆于此时期中成立也。大生创议于二十一年，开办于二十四年，所用纺机即为鄂督移苏之物，集股管理皆由张謇一手成之，为南通新事业之基础，中国工业能直接造福社会者，自大生纱厂始。张氏缔造经营之艰难，详载其所著经理大生纱厂十二年之历史，工业史中至可宝贵之文字也。商务印书馆成立于二十三年，由夏粹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创办，其始规模甚小，二年后毁于火。二十九年中日合资重兴，复得张元济加入经理，营业大发达。三十二年在农工商部注册，为纯粹中国公司，复将日股完全收回，自此一日千里，执中国印书业之牛耳，诚中国实业界之好模范也。有人以该馆曾用日资为病，不知中日合办之实业甚多，能如该馆之出淤泥而不染，卒收回自办者，何可多得。此正该馆不可及之处也。

政府奖励工业政策，此时期之中叶已开其端。二十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定奖励新学新法章程，凡发明军用船械者颁特赏，专利五十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给工部郎中实职，专利三十年；仿造西器之制法未传入中土者，给工部主事职，专利十年。当时朝野见通商口岸外人工厂日渐增多，知经济亡国之祸日迫，非提倡国内工业不足抵制，所谓“洋商改造土货”之恐慌即指此也。奖励新法章程实为此时期外商势力膨涨之反响。今则外人工厂方日增而未已，国人亦司空见惯，视若无睹矣！

政府奖励及利权收回时期　由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为中国政府奖励工业最力之时代。中日战争之后，继以庚子事件，联军入京，清政府武力复仇之念至此殆完全绝望。同时复增加日本赔款二亿万元，与列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之负担，此时之中国不特国威扫地，经济亦濒于破产矣。而外人工商侵略之势力复深入中国之腹心，政府至是始憬然大悟，尽弃旧日练兵之主张，而注全力于振兴工商业。振贝子（载振）遂于是时被遣至欧美日本考察实业，既归，力言东西各国振兴实业之利及奖励之法。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政府遂有商部之设（三十二年改为农工商部），以载振为尚书，陈壁、伍廷芳为左右侍郎，奏定商律及公司注册章程。一时官吏提倡于上，绅商响应于下，收回权利之声洋溢国内。风起云涌，朝野咸有振作之精

神。三十一年因美国禁止华工，复有抵制美货之举，提倡国货之心，因以益坚。此时中国之实业，如红日初升，前途希望正复无穷。此时期中之重要提倡事业，如三十一年袁世凯在天津设工艺总局，商部在京师设劝工陈列所，及奏设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三十二年商部奏订奖给商勋章程，鼓励制造新器，学部考验游学生设工商科进士学位；三十三年农工商部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办一千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二千万元以上者赏子爵；宣统二年端方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皆为六十年内仅见之盛举。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吾人于此不得不叹当时清廷望治之切也。即以南洋劝业会而论，规模宏大，收罗精备，为远东诸博览会之冠。今之巡阅使日言爱国，有以劝业为心如端方其人者乎？江河日下，亦可慨矣！

自动发展时期 由民国元年至十年，政争兵乱，无年无之，举清末奖励实业政策之成绩尽破坏之，而无以为继。各省军人官吏不特不能提倡保护其省内之实业，且加之以剥削摧残；兵匪劫掠，官吏敲诈，几于相习成风。受之者亦视同不可幸免之天灾。故就政府对待实业之态度与影响言，六十年中清末之九年为黄金时代，而民初之十年为黑暗时代。此由当局者有贤不肖之分，与国体无关。吾人虽酷爱共和，无所用其讳也。幸而欧战发生，欧美之商品来源断绝，其人从事远东商业者，亦皆归国从戎；日货又以二十一条之要求，而受国人之抵制。于是吾国工业乃得千载难逢之自动发展机会。试就进出口统计观之，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进口货总额为五万七千余万两，次年为五万六千九百余万两，已因欧战而略减。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竟跌至四万五千余万两，约减五分之一。终欧战之期，未复民二之旧额。出口货民二总额为四万零三百万两，次年因欧战初起，跌至三万五千六百万两。以后即逐年增加，终欧战之期，皆超过民二之旧额。当此时期，国内之需求既未尝减少，则供给国内市场之缺乏，与应付出口货之增加，当胥赖本国之工业。宜乎此时国内实业之进步一日千里也。故民三至民七之五年中，注册工厂成立者亦较他时期为多。此诚天与之机，使果上下一心，并力赴之，未尝不可如日本之坐收渔人之利；无如自甘暴弃，二次革命后继之以袁氏称帝，皖直交锋，民无宁日，安有生息教养之暇。惟少许通商口岸之工业，借外人之庇荫，尚得自由发展，略沾欧战之余润。然视日本因欧战造成之百万富翁以千百计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多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试就九年对外贸易统计言之，入口较上年增六分之一，为六十年中最高之额；而出口反较上年少六分之一。一消一长，绝非偶然。起衰制胜，是在吾国之工业家，记者窃愿所言不中也。

本期中政府对于工业之设施，舍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民三张謇长农商部时，宣布其棉铁政策，定工业保息费章程，提倡制造，拟以二千万元为基金。当时耳目一新，颇有朝气，未几张氏因袁图谋帝制去职，棉铁政策亦成陈迹。民五因袁氏帝制将成，欲有以见好于国民，故虽当政府财政困难之际，予算中竟列商工业振兴资金一千五百万元。云南起义，袁未帝而死，所谓振兴工商业资金者，亦与帝制同灭。继任之执政者，并此纸上空谈之予算，亦不可复闻矣。民间之提倡事业，惟民十上海总商会设立之商品陈列所，设备收罗皆为国中所仅见，虽不能如南洋劝业会之规模博大，然一为官办，一出商力，一供短期观览，一备随

时参考，性质即异，自不可同日语也。

三　新工业之统计

工业统计为工业之数量的历史。欲研究最近五十年中国工业之盛衰，自不可不知其统计。惜乎吾国统计事业尚在幼稚时代，政府所刊惟农商统计，仅出至第五次，调查手续又不完备，不足据为信史。实业界自刊者惟纱业尚有全国纱厂一览表。此外间有见者，大都散见书报。外人所刊者有英文之“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 Book），已出至一九二二年，与日人之“中国年鉴”，仅出至第三回。收罗宏备，日人之年鉴似胜英文，惟关于工业者仍多转钞农商统计。外人论中国工业之书，亦以日人所著为详尽，如“中国之工业”“最近中国经济”（善生永助著）“中国之工业与原料”及“中国经济大全”等书，其收罗宏博，西人固不能及，即中国人自知亦不如远甚。至求五十年之统计，则惟海关报告中进出口统计可略窥五十年来工业之盛衰。今惟择其重要言之，为篇幅所限也。温故知新，察往知来，欲求工业之进步，必研究过去之统计而得其成败之因，此理明甚。甚望吾国实业团体早着手此事，勿使日人越俎代庖也。

工厂设立年别　是最足代表新工业之胜衰者，莫如每年设立之工厂数。惟此种统计，欲求全国无遗，亦殊难得。至注册工厂，则以农商部有详录，故甚可信，今分录如下：（见第一表）

第一表　全国工厂成立年别

年　　　别	全国工厂数	民国五年存在之全国工厂	注　册　工　厂	注册公司总数
光绪二十九年以前	12,415	7,390	24	1
光绪三十年	1,166	794	9	8
光绪三十一年	442	336	18	47
光绪三十二年	631	489	35	65
光绪三十三年	423	420	36	49
光绪三十四年	513	458	23	55
宣统元年	1,646	1,134	26	61
宣统二年	1,203	849	26	74
宣统三年	821	657	18	35
民国元年	2,001	1,282	17	10
民国二年	1,249	1,019	37	23
民国三年	1,027	891	37	85
民国四年	672	672	50	99
民国五年	556	558	33	98
民国六年			34	80
民国七年			29	88
民国八年			23	122
民国九年				167
总　　　计	24,765	16,957 注一	475	1,167
民国十年正月至十一月注册公司共119家				

表中第一行之全国工厂成立年别，乃就民国元年农商统计，参加以后四年之每年新工厂数，并改正以前之矛盾处编成，元年以前关闭之厂数皆不在内。第二行为民国五年存在工厂之成立年别，其总数为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七家，以与民元之总数二万四千七百六十五家较，是五年之中关闭之厂为数乃至七千八百零八家，平均每年约一千五百八十家，远过每年成立之新厂数。使此数果确，则中国之工业死亡率（即每年每千厂中关闭之数）必大。惟农商统计中矛盾之处甚多，例如民元之工厂中成立于光绪三十年者，数凡一千零三十九，至民二反增至一千一百六十六，绝无已死之厂复活之理，必为民元调查未周无疑。故上述之统计仅可供参考之用，未足据为定论也。表中第三行为每年注册工厂数，第四行为每年注册公司总数，其趋势可观第一图。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为外人兴业时期，每年之厂数甚少。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为工业发达之第一峰，盛于三十二及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稍衰，殆受光绪母子逝

世之影响。宣元复有兴起之象，至宣三民元复衰，辛亥革命之反响也。政府奖励时期至此告终，乃入工业发达之第二峰，是为自动发展时代。以前两时期工厂弧与注册公司总数弧起落大致相应，即工业盛衰与全国实业之盛衰，其趋势大致相同，至自动发展时期情形乃略异，工业极盛于民四（欧战之第二年），而衰于民七（欧战停止之年），全国公司注册盛于民四民五，至民八民九乃大盛，几倍于寻常数之，与工业完全背驰，此即全国若狂交易所信托公司风起云涌之时也。其结果遂酿成民国十年之经济恐慌，工业衰落。徒兴投机商业之不可恃，亦可见矣。

第二表示注册工厂分类设立年别，此为农商统计与各书所无。今从"远东时报"一九二一年十月所出之"中国工业公司"增刊中摘编。第一表之注册工厂数即由此表得来。原书中同一工厂设立年别有重出而两歧者，虽加选择，苦乏参考，或与农商部之记载小有出入，工业名称由英文翻译，亦恐与他书不能尽同，读者会意可耳。

第三表示全国工厂种类分期比较，从"中国的工业与原料"（安原美佐雄著）中摘编。原表分三部，今合为一表。凡有银两者悉依农商统计例以库平银六钱六分七厘折成银元。表中不尽为工业公司，如表末之交通与矿业，固不在本篇范围之内，杂业中所含何业更不可知，惟所分时期甚便比较，故录之。第一期由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为政府奖励时期之极盛时代；第二期民二至民四为自动发展时期初盛时代；第三期为同时期之极盛时代。第三期每年平均公司数三倍于第二期，第二期又两倍第一期，其增加之速可见。惟每期各厂平均资本，反以第一期为最大，虽汉冶萍公司一家（铁工中）之数占二千万元，足令平均数加高，然即去此数，仍较他期为多也。（约二十五万元）三期中继续发展之业有五，而速率各不同，兹分述于第四表。丝电及火柴三业资本在第一期最大，大都官商合办，故资本雄厚；第二、三期厂数虽增，资本反减少。易言之，即小厂增多也。棉业进步最速，资本亦增加甚多。面粉次之。

第二表　注册工厂分类设立年别

中历	道光九	二十六	光绪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宣统元	二	三	民国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数
西历	一八二九	一八四六	一八八六	一八九四	一八九五	一八九六	一八九七	一八九八	一八九九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	一九〇二	一九〇三	一九〇四	一九〇五	一九〇六	一九〇七	一九〇八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一三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印刷及文具	1	1					1						1			2	1	1		1	2	2	1		3		1			18
蜡烛、肥皂												1	1		1	2	3	4	2	1			1	2	1	5	1	1	2	28
炼糖																			1							1				2
铁工			1									1					1			1	1	1		2					2	10
碾米、米粉								1								1	1	5	1	1							2		1	13
面粉								1		1	1		1	1	2	2	3	2	4	2		1	9	9	10	4	3	4	2	62

中历	道光九	二十六	光绪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宣统元	二	三	民国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数
西历	一八二九	一八四六	一八八六	一八九四	一八九五	一八九六	一八九七	一八九八	一八九九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	一九〇二	一九〇三	一九〇四	一九〇五	一九〇六	一九〇七	一九〇八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	一九一二	一九一三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造纸																2	1				1	1					1		1	7
榨油												1			1	2	3		1		1		1		3	1			1	15
砖瓦																1	1	4							1			1		8
磁器														4		1			1	1				1	1					9
玻璃															1										2		1			4
石灰、水泥																1	1		1			1								4
制革								1									2		1			1			1			1		7
棉、纺织染				1		2								2	6	7	10	1	5	4	2	4	2	3	6	12	5	5	3	80
电														2	2	2	2	2	5	3	2	2	8	13	12	3	14	9	2	83
丝纺织													1		1	4	2		1	3	2	1	2	2				1		20
樟脑																		1											2	3
火柴						2									1		1	2	2	4	4	3	8	4	6	4	2	2	3	48
火柴干、匣																												1	1	2
自来水															1	2									1			1		5
炼盐													1											1						2
石棉																				1					1					2
制碱																									2		1			3
烟草												1			2	5	1	1					2			1	1	2	1	17
制蛋																					1						1		2	4
制冰																	1			1							1			3
麻袋																					1									1
造酒					1														1	1			2							5
冷藏																1	2			1	1		1			2				8
硝酸、漂白粉																												1		1
豆腐																				1										1
总数	1	1	1	1	1	4	1	3	0	1	1	4	5	9	18	35	36	23	26	26	18	17	37	37	50	33	34	29	23	475

第三表　注册工厂种类分期比较表注二

		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共六年）		民国二年至四年（共三年		民国五年至七年（共三年）	
	工业种类	公司数	资本额（元）	公司数	资本额（元）	公司数	资本额（元）
1	生丝、纺织	5	1,085,000	1	50,000	5	882,000
2	棉纺织染	24	9,266,300	18	8,050,400	17	17,320,000
3	面粉	12	2,320,000	17	1,684,000	17	2,850,000
4	陶瓷	11	1,850,000				
5	烟草	11	840,000			2	90,000
6	碾米	5	845,000			1	50,000
7	电业	7	4,130,000	12	1,663,000	22	3,512,000
8	榨油	9	1,640,000	2	170,000	3	365,000
9	肥皂、蜡烛	6	98,000			5	274,000
10	火柴	3	629,500	13	397,000	9	655,000
11	玻璃	2	1,120,000				
12	铁工	2	20,525,000			1	1,400,000
13	罐头			3	442,000	2	320,000
14	制茶			1	170,000		
15	炭酸水			1	110,000		
16	印刷			4	1,024,000		
17	制帽			1	30,000	1	20,000
18	炼盐			1	280,000	1	30,000
19	制蛋					1	110,000
20	制糖					1	200,000
21	制纸					1	50,000
22	自来水					2	1,440,000
23	建筑	6	1,665,000			1	700,000
24	交通			16	502,900	7	1,625,000
25	矿业			3	145,000	4	700,000
26	杂业	24	2,111,000	31	9,705,400	20	927,000

总数	127	51,219,800	124	24,424,000	374	74,633,000
本期平均每年	21.1		41.3		124.6	
本期平均每公司		405,000		196,000		199,000

第四表 五种注册工业分期比较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工业种类	每年平均公司数	每公司平均资本	每年平均公司数	每公司平均资本	每年平均公司数	每公司平均资本
生丝纺织	六分之五	217,500元	三分之一	50,000元	1.67	176,500元
棉、纺织染	4	385,000	6	448,000	5.67	1,018,000
面粉	2	194,000	5.67	99,300	5.67	168,000
电业	1.17	590,000	4	139,000	7.35	160,000
火柴	0.5	209,833	4.33	30,500	3	73,000

工厂内容比较 工厂内容统计惟农商统计中有之。然元年以前五年以后皆不可得。政府社会日言提倡工业，并此而不注意，其效可知矣。第五表示全国工业动力情形，五年调查不全，故不能代表全国。大概言之，用原动力之厂数逐年加增，不用原动力之厂数则增减甚微。注册之工厂类皆属于用原动力，盖资本较多也。动力机关与马力数亦逐年增加，然较之他国尚不逮远甚。五年之机关数（即机械——编者）为二千零三十，马力总数为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吕马（C. F. Remer）谓全国用动力厂之资本不及美国辟支堡一城之大，其言殊不易证实，此类统计尚不可得，惟以马力言，美国一纳割雷瀑布现在已用之马力数已在二十八万左右，足供全中国之需要两倍有余矣。

第五表 历年工厂动力比较

		民国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工场数	原动力使用	363	347	360	488	490
	不用原动力	20,386	21,366	19,992	20,258	16,467
	合计	20,749	21,713	20,352	20,746	16,957
蒸气机	机械数	379	296	357	353	642
	马力	20,351	43,448	55,120	53,597	87,745
电机	机械数	144	146	332	261	318
	马力	2,853	20,193	12,153	16,105	17,269
其他	机械数	214	212	476	381	1,070
	马力	1,340	2,220	9,092	12,277	6,837
	煤炭消费额	557,833	900,959	2,337,745	1,206,322	2,461,833

第六表　各省动力状况及职工数（民国四年）

省别	工场数			煤炭消费额吨	男女职工数
	动力使用	不用动力	合计		
京兆	6	216	222	6,135	6,483
直隶	26	2,241	2,267	10,162	43,183
奉天	24	759	783	80,806	12,908
吉林	6	631	637	22,719	10,911
黑龙江	—	276	276	21,646	3,751
山东	121	815	936	15,886	24,774
河南	3	839	842	4,941	14,891
山西	1	1,293	1,294	50,680	14,047
江苏	149	1,139	1,288	122,039	142,678
安徽	—	386	386	6,096	24,680
江西	—	1,610	1,610	286,169	60,802
福建	—	1,129	1,129	—	23,095
浙江	13	2,488	2,501	121,663	73,739
湖北	17	515	532	38,051	36,790
湖南	6	680	686	260	22,661
陕西	—	465	465	3,049	2,058
甘肃	—	234	234	1,016	5,329
新疆	—	31	31	—	417
四川	4	1,951	1,955	184,092	38,201
广东	101	755	856	1,938,326	54,181
广西	—	74	74	—	953
云南	—	—	—	—	—
贵州	—	17	17	41,420	606
热河	1	172	173	5,231	1,586
察哈尔	—	127	127	182,412	1,001
合计	478	18,843	19,321	1,204,582	619,725

第六表示各省动力状况及职工数。不用动力之厂以浙江为第一，直隶四川江西次之，手工业发达之区也；用动力之厂江苏第一，山东广东次之，用机工业发达之区也。职工之数江苏最多，浙江广东次之，为吾国工业最盛之省。第八表示各省注册工厂分类比较，江苏几于每类皆占多数，直隶浙江广东次之。未附资本比较，仍由远东时报工业公司增刊中，分类计算得之，仅供参考，恐与部中记载未必尽合。大抵注册公司最多之省，其注册工厂之数亦最多。工业与其他实业之关系，固如是其密切也。

第七表 工厂种类逐年比较

工场种数	民国元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织染工场	4,150	4,642	4,273	5,069	4,370
机械及器具	2,393	2,524	2,182	1,643	1,735
化学工场	7,567	6,030	6,910	6,373	5,706
饮食品工场	4,801	6,145	5,308	4,384	3,610
杂工场	1,746	2,184	1,329	1,506	1,511
特别工场	92	158	350	346	25
合计	20,749	21,683	20,352	19,321	16,957

第八表　注册工厂分类省别（民国八年止）附资本比较

	京兆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河南	山西	江苏	安徽	江西	福建	浙江	湖北	湖南	陕西	甘肃	新疆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海外埠	总数	基本总额（元）	平均每厂资本
印刷及文具		2						1	6	1			4						2	2					18	3,819,960	212,000
蜡烛、肥皂		3	1			1			17	1	1		2	1	1										28	1,938,000	69,000
炼糖												2													2	700,000	350,000
铁工		1		1					4				1	2					1						10	21,467,000	2,147,000
砻米、米粉	1								7	2	1		1	1											13	2,869,000	220,000
面粉	3	4	2	8	2	5	3	1	29		1			2	2										62	13,710,000	221,000
造纸		1				2			2										1	1					7	1,765,000	252,000
榨油		1	1	1		1	2		6	1										2					15	3,011,000	205,000
砖瓦	1					1			1	1	1				1				1	1					8	444,000	55,000
磁器		1		1			1		1		2	1			1				1						9	1,170,000	130,000
玻璃	1					2									1										4	540,000	135,000
石灰、水泥		2												1						1					4	2,725,000	681,000
制革		3							2										2						7	4,102,000	587,000
棉、纺织染	2	11	3			1	2	2	35	4	1	1	6	4						5	1			2	80	46,128,000	578,000
电	1	2	5	1	1	8	1	2	17	1	2	10	14	3	4				2	9					83	17,100,000	205,000
丝纺织									9				9							2					20	3,285,000	164,000
樟脑											1		1	1											3	153,300	51,100
火柴	2	6	3	2		2	4	3	3	1		1	2	2	1	3	1		6	6					48	5,434,000	113,500

第八表　注册工厂分类省别（民国八年止）附资本比较

	京兆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河南	山西	江苏	安徽	江西	福建	浙江	湖北	湖南	陕西	甘肃	新疆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海外埠	总数	基本总额（元）	平均每厂资本
印刷及文具		2						1	6	1			4						2	2					18	3,819,960	212,000
蜡烛、肥皂		3	1			1			17	1	1		2	1	1										28	1,938,000	69,000
炼糖												2													2	700,000	350,000
铁工		1		1					4				1	2					1						10	21,467,000	2,147,000
碾米、米粉	1								7	2	1		1	1											13	2,869,000	220,000
面粉	3	4	2	8	2	5	3	1	29		1			2	2										62	13,710,000	221,000
造纸		1				2			2										1	1					7	1,765,000	252,000
榨油		1	1	1		1	2		6	1										2					15	3,011,000	205,000
砖瓦	1					1			1	1	1				1				1	1					8	444,000	55,000
磁器		1		1			1		1		2	1			1				1						9	1,170,000	130,000
玻璃	1					2									1										4	540,000	135,000
石灰、水泥		2												1						1					4	2,725,000	681,000
制革		3							2										2						7	4,102,000	587,000
棉、纺织染	2	11	3			1	2	2	35	4	1	1	6	4						5	1			2	80	46,128,000	578,000
电	1	2	5	1	1	8	1	2	17	1	2	10	14	3	4				2	9					83	17,100,000	205,000
丝纺织									9				9							2					20	3,285,000	164,000
樟脑											1		1	1											3	153,300	51,100
火柴	2	6	3	2		2	4	3	3	1		1	2	2	1	3	1		6	6					48	5,434,000	113,500

第九表　工厂职工逐年比较

年　次	男　工	女　工	合　计
民国元年	421,994	239,790	661,784
二年	418,304	212,586	630,890
三年	391,126	233,398	624,524
四年	403,448	245,076	648,524（注四）
五年	334,152	231,103	565,255

第十表　工厂职工分业逐年比较

工厂类别	民国元年	二　年	三　年	（附男女工分类）男	女	四　年	五　年
织　染	228,497	249,324	288,212	（122,978	165,234）	302,666	277,309
机械及工具	33,267	36,697	37,515	（36,997	518）	25,965	26,096
化　学	154,621	94,745	118,066	（104,509	13,557）	119,789	110,505
饮食品	208,900	181,732	141,566	（91,450	50,116）	151,677	122,408
杂　工	30,726	64,052	30,004	（26,045	3,959）	35,085	27,780
特别工场	5,773	4,040	9,161	（9,147	14）	13,093	1,157
合　计	661,784	630,890	624,524	（391,126	233,398）	648,285（注四）	565,255

工厂职工状况　工厂中男工约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女工占百分之三十五。以工厂类别言之，织染业工人最多，女工亦最多。更就第十一表观之，广东江苏之工厂中女工较男工多两倍有余，山东则男女工约相等，其余诸省男工皆多于女工，黑龙江热河绥远三地工厂中竟无女工。工资以江苏最高，贵州陕西最低，男工工资大抵皆多于女工，最多者约四倍有余。

第十一表　各省男女工人数及工资额
（本表以五年农商统计为根据，调查不全者改用三年数）

省　别	男　工	女　工	工人总数	每日工资 男工 最多	男工 最少	女工 最多	女工 最少
京　兆	7,057	259	7,316	.30	.14	.09	.07
直　隶	39,339	3,515	42,854	.29	.14	.26	.15
奉　天	17,639	110	17,749	.33	.18	.15	.12
吉　林	8,564	33	8,597	.45	.20	.10	.06
黑龙江	3,200	—	3,200	.28	.17	—	—
山　东	17,795	22,176	19,971	.25	.19	.26	.14
河　南	12,233	2,033	14,266	.24	.12	.20	.11
山　西	16,228	1,264	17,492	.23	.12	.13	.08

江苏	44,286	100,594	144,880	.53	.23	.35	.28
安徽	11,080	16,204	27,284	.24	.16	.21	.16
江西	36,157	22,319	58,476	.25	.15	.15	.09
福建	17,202	3,434	20,636	.37	.21	.22	.12
浙江	53,263	25,902	79,165	.28	.17	.24	.14
湖北	22,992	9,083	32,075	.32	.15	.20	.12
湖南	14,233	3,642	17,875	.26	.14	.19	.15
陕西	3,537	645	4,182	.19	.10	,13	.08
甘肃	1,538	955	2,493	.22	.14	.21	.09
新疆	355	45	400	.40	.26	.22	.14
四川	43,141	8,198	51,339	.47	.14	.14	.09
广东	16,148	42,255	58,403	.46	.23	.22	.18
广西	853	64	917	.45	.23	.25	.14
云南	2,698	1,141	3,839	.33	.17	.11	.07
贵州	1,507	367	1,874	.16	.11	.07	.05
热河	674	—	674	21	.18	—	—
察哈尔	1,294	21	1,315	.21	.15	.08	.05
绥远	279	—	279	.25	.11	—	—
总	393,292	244,259	637,551				

注册工厂资本组织 农商统计对于工厂之资本与资本组织付诸缺如。此种调查本极困难，各国工业统计中，最不可信者即为资本统计。因调查时厂主或经理人有种种猜疑，往往不肯以真相示人。至资本组织惟注册之工厂可查，然历年农商统计所载甚简。兹从“中国之工业”中转录民国二年之工业公司资本组织表，借知大概而已。（表中工业包括矿业）

第十二表 注册工厂资本组织（民国二年）

	一万元以下	一万元至五万元	五万元至十万元	十万元至二十万元	二十万元至五十万元	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	一百万元以上	总计	资本总数
股份	12	6	1		1	1		21	1,039,520
股份有限	86	85	22	29	23	9	7	261	39,244,905
合资	29	26	4		1			60	1,165,571
合资有限	47	24	5	4		1	1	82	2,924,551
未详	84	39	9	6	2		1	141	5,500,613
总计	258	180	41	39	27	11	9	565	49,875,160

全国工业概况 第十二表以前皆限于工厂，兹更编第十三表示全国工业之概况。

第十三表　　民国四年全国工业分类统计摘要

出品分类	制造户数	职工数			出品		数量最多之两省	价额最大之两省	出口价额（元）	进口价额
		男	女	总	数量	价额(元)				
油	247,774	1,204,310	146,073	1,350,383	7,906,675,354斤	126,306,384	江苏　安徽	安徽　江苏	31,269,660	
酒	147,144	748,052	23,792	771,844		104,983,397	江西　江苏	江苏　浙江	1,693,401	4,638,167
糖	27,908	913,139	19,899	933,038	472,707,244斤	43,462,679	福建　江西	福建　江西	1,821,203	44,779,082
烟草	64,811	281,660	63,765	345,425		2,723,106		浙江　江西	4,990,861	19,310,549
淀粉	212,961	913,468	122,220	1,035,688	694,932,792斤	46,580,761	陕西　江苏	陕西　浙江	1,269,671	
罐头食物	30,038	88,333	7,300	95,633		22,911,185		江西　湖北		
丝织物	36,806	122,489	56,247	178,736		40,123,016		浙江　江苏		
棉织物	581,871	1,157,944	954,848	2,112,792		343,462,057		湖北　江苏		225,026,782
麻织物	71,730	80,291	120,196	200,487		10,611,424		江西　江苏		
毛织物	5,478	56,470	1,478	57,948		2,338,446		直隶　新疆	247,253	3,731,399
丝棉交织物	1,731	3,482	4,045	7,527		904,849		江苏　安徽		
编物	148,615	24,401	35,058	59,459		6,367,928		江苏　湖北		
胰皂	7,001	11,267	2,618	13,885		4,606,654		江苏　江西	31,163	3,486,458
蜡烛	43,911	151,984	7,968	159,952		18,405,701		江苏　湖北		
漆液	8,908	26,904	768	27,672	3,276,422斤	2,130,387	湖北　陕西	湖北　陕西		
蜡	9,202	25,801	2,185	27,986		1,134,520	湖北　安徽	安徽　湖北		
靛青	35.388	621,156	21,627	142,783		17,067,085	浙江　安徽	湖北　安徽		234,453

第十三表　　民国四年全国工业分类统计摘要（续）

出品分类	制造户数	职工数			出品		数量最多之两省	价额最大之两省	出口价额（元）	进口价额
		男	女	总	数量	价额(元)				
火柴	482	77,412	14,273	91,685		23,309,816		陕西　江苏		9,076,058
玻璃制品	705	3,166	124	3,290		2,031,259		湖北　奉天		1,829,429
砖瓦	83,221	686,767	17,970	704,737		62,150,732		江苏　江西		
簿荷樟脑	286	887	100	987		398,835		江西　福建		
纸类	55,868	274,987	23,551	298,538		54,860,795		福建　江西	6,391,580	6,952,016
皮革	20,016	199,385	2,339	201,724		63,132,713		奉天　江苏	1,417,686	8,626,937
化妆品	1,631	5,176	1,166	6,342		1,112,333		江苏　浙江		
业用药品	2,955	17,709	152	13,861	236,968,868斤	2,344,278	江西　浙江	山西　江西		
陶瓷器	141,607	509,155	38,891	548,046		13,120,743		江西　奉天	3,804,662	2,635,275
漆器	23,730	109,656	2,449	110,105		15,667,176		湖北　江苏		
五金制器	69,139	384,676	11,039	395,715		93,193,205		湖北　江苏		
眼镜	548	2,278	19	2,297	766,727付	811,060	江苏　福建	江苏　湖北		
钟表	192	1,240	—	1,240	60,630件	347,966	福建　江苏	江苏　福建		868,980
雕琢器	7,062	53,619	626	54,245		2,806,141		浙江　广东		
杂工产物	295,614	741,113	400,808	1,141,921		71,796,400		江西　江苏		
	2,394,334	8,656,377	2,103,594	10,759,971		1,200,403,031				

（本表从五年农商统计摘编，五年调查不全故不录）

表中之制造户数包括工厂及旧式工业而言。全国工人约一千万，男工占五分之四，女工占五分之一。工厂之工人仅占总数百分之六左右（约六十多万人），则旧工业之重要可见矣。一年出品总值仅一千二百余兆元，与进口之工业品较，相差不过二百余兆耳。（民国九年进口总额约九百七十七兆两，中约百分之六五为工业品，得六百三十三兆两，更折成银元约九百五十兆元。）以中国之大，每年所需要之工业品，自造者不过百分之五十六，仰给外人者乃多至百分之四十四，亦可惊矣！表中统计未必完备，然大致相去当不甚远也。出品之中以棉织品价额最高，达三百四十三兆，占总值百分之二八点五，亦新工业之好现象也。其次则为油酒，皆在一百兆元以上。丝茶为中国大宗产品，皆未列入。

外人在华所设工厂　自马关条约订立后，外人在华之工厂逐年加增，民国二年其数已达一百六十六家。十八年中进步如是之速，亦可惊矣。第十四表从"最近中国经济"摘录，仅及民二为止。近八年中，外商之工厂增设者必多，惜无详细统计可供参考。欧战期中，日人在山东及津沪等地，增设之厂甚多。青岛之德人工厂几全为日人所占有。单就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为数已一百三十九家，资本皆极雄厚。今胶济路赎还有期，青岛亦将复为我有，然经济势力恐不免终为日人所劫留，此亦国人所当早为之计者也。一九二一年三月之远东时报载有在日本治权下之山东中外工厂详细调查，计日厂一百三十九，华厂九十三，美厂二。他处日人工厂虽无确数，然就纱厂一项而言，上海有日厂二十二，青岛三（已包括上述厂数中），津汉等处四，总数共二十九家。（见民国九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之中国纱厂一览表）民二所有外人之纱厂不过十家，今日人竟独有二十九家，可推知他种工业日人之发展亦必甚大。吾人苟仍不自奋作，行见他国资本家之势力，将满布关中，政权未失，先为经济奴隶矣。

第十四表　　外人在华工厂

工厂类别	厂数	工厂类别	厂数	工厂类别	厂数
蛋白质	9	家具	6	制钢	1
炼瓦	9	煤气	4	肥皂及蜡烛	12
化学用品	1	制冰及冷藏	9	制糖	3
棉纺织	10	铁工	1	烟草	9
造船、机械	22	制革	6	羊毛净压	12
面粉	17	油业	13	杂业	22
总					166

重要进出口统计　进出口统计九十九与工业有关系，盖非为工业之原料，即为工业之出品，无论进口出口，均足见一国工业盛衰状况也。兹仅择最重要者四种言之，一、进口机器。（见第三图图略）海关报告有机器分类，自光绪十三年始，至民国九年共三十四年，其趋势极足表现工业时期之变迁。十三年至二十年在官督商办时期，平均进口额亦最低。二十一年马关条约成，入外人企业时期略高。二十八年受联军入京之影响大降。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为政府奖励时期，继长增高。至民元因革命之影响而略跌，遂入自动发展时期渐升。至民四受欧战各国禁止机械出境之影响再跌，民七以后欧战告终，三年之中涨至原额五倍有余，民九之

总额达三千三百万元，图中弧线直入霄汉，海通以来未有之速度也。其中一大部分当然为数年中已订购，因禁令未得出境之积货。然工业发展之量，亦由此可得其大概。其中以纺织机为最多。二、蚕丝，三、绸缎，四、陶瓷器（见第十五表）。四十五年中丝绸出口皆逐渐增加，似甚可喜，然世界市场贸易之数增加尤速，故中国丝绸在世界市场来源总额之百分数反年有退步。以丝而论，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之十年间中国占世界总额百分之四十，至一九一四年已降至百分之二五点九，几削减半数。日本在同一时期则由百分之十四而增至百分之四四・五（见科学杂志三卷三期著者所作“中国之实业”），人进我退，得失相较如是其巨，是四十五年来中国之出口增加，实受世界工商业兴盛之赐，而非中国工商界努力得之，则他日人愈进，我之出口额亦必有日减之势，食人唾余且坐待之，诚可耻矣。陶瓷器出口之增加不多，惟民七至民九之三年中骤增，几两倍原额有余，当亦战后商业恢复，需要骤增所致也。每年进口之陶瓷器加增之速度亦至可惊，民国六年进出几于相等，进口大抵为日本磁。窑工不求精，而国人之嗜好则日趋西化，是亦工业界所当注意者也。

第十五表　　　中国主要工业品对外贸易之消长

中历	西历	蚕丝	绸缎		陶瓷器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光绪2年	1876	31,653,900	4,158,438	1,764	417,451	
3	1877	18,134,372	4,620,296	4,797	402,111	—
4	1878	20,376,237	4,749,967	6,777	548,501	—
5	1879	23,872,388	4,748,945	6,187	491,683	—
6	1880	24,175,756	5,655,488	5,372	548,706	—
7	1881	22,017,006	4,851,194	8,010	584,501	—
8	1882	18,898,950	3,938,302	6,725	706,149	—
9	1883	19,258,469	4,679,427	5,287	538,460	—
10	1884	18,305,822	4,876,519	5,554	454,853	—
11	1885	15,201,946	4,745,729	6,474	486,072	—
12	1886	21,832,530	7,002,313	6,605	489,513	—
13	1887	24,607,528	7,082,686	—	1,404,638	—
14	1888	23,765,467	8,414,831	—	1,090,022	—
15	1889	28,642,418	7,759,549	—	1,099,998	—
16	1890	24,491,370	5,764,535	—	952,498	—
17	1891	29,884,375	7,017,651	—	1,173,731	—
18	1892	30,341,113	7,951,017	—	1,432,766	—

第十五表　　中国主要工业品对外贸易之消长（续）

中　历	西　历	蚕　丝	绸缎 出口	绸缎 进口	陶瓷器 出口	陶瓷器 进口
19	1893	29,326,155	8,788,070	—	1,572,874	—
20	1894	33,604,291	9,040,291	—	1,626,149	—
21	1895	39,723,871	11,963,231	207,696	1,983,543	46,898
22	1896	31,671,540	10,417,795	233,710	2,019,564	65,534
23	1897	44,460,990	10,789,670	280,848	1,735,132	151,554
24	1898	45,412,818	10,691,101	327,224	1,934,192	132,174
25	1899	71,582,849	10,526,521	461,977	2,232,527	184,012
26	1900	39,732,031	9,711,838	657,364	1,999,471	105,892
27	1901	50,027,282	10,888,338	757,860	2,090,846	61,128
28	1902	68,954,140	10,258,067	414,249	2,294,772	155,349
29	1903	59,334,758	14,954,945	845,835	2,696,703	305,968
30	1904	65,687,302	12,568,110	991,542	2,059,992	298,534
31	1905	59,614,102	10,779,731	1,009,028	2,055,942	536,898
32	1906	60,436,061	10,859,464	1,693,898	1,918,906	564,257
33	1907	75,202,955	13,881,079	1,901,451	1,983,563,	533,543
34	1908	68,334,347	14,580,017	1,270,917	2,002,978	399,051
宣统元年	1909	71,154,364	18,866,907	1,258,598	2,227,990	486,938
2	1910	80,326,688	19,072,340	1,764,250	2,361,172	686,546
3	1911	74,509,684	18,165,948	1,697,184	2,364,972	772,012
民国元年	1912	76,544,640	17,013,001	1,270,309	2,311,726	815,771
2	1913	83,156,282	21,718,532	1,742,418	2,504,538	1,210,833
3	1914	62,919,246	17,071,834	2,520,841	2,349,219	1,042,867
4	1915	78,406,476	22,393,243	1,652,065	2,995,025	779,591
5	1916	90,042,152	20,975,288	2,021,308	1,787,399	967,515
6	1917	86,088,250	17,987,445	2,523,360	1,513,413	1,318,037
7	1918	87,634,561	20,502,641	2,725,005	2,585,941	1,258,905
8	1919	113,957,908	26,194,636	2,969,228	5,083,505	1,291,748
9	1920	76,998,360	28,138,544	2,240,472	6,096,917	965,424

本表统计由“中国商战失败史”及“中国年书”（The China Year Book）摘录。

四　中国工业之位置与前途

五十年中中国之工业不可谓无进步矣，然其行也迂缓。军用工业时期国人犹在梦中，可置不论，若官督商办以至政府奖励之三时期，则官倡于上而社会退缩不前，故其效甚微。自动发展时期，社会似有觉悟矣，而官吏军人又从而挠之抑之，故其效仍不大。清末之官贤而民不肖（此句应改为清末之官不贤而民贤——编者），民国之民贤而官不肖，中国之政府与人民对于工业遂竟无一日之通力合作，五十年之光阴草草过矣。在此时期中，日本由岛国而跃登世界一等之富强地位，而中国之出口额尚不能与进口额相抵，亦大可怜矣！五年欧战，天与中国以自新之机，又以政争自扰而虚度。今试以中国工业与日美为简要之比较，则知中国工业所处之地位。

第十六表　　中日美工业之比较

	人口	面积	工厂或制造户数	工人数	出品总值	调查年号
		方哩			元	年
中	439,425,000	4,278,352	2,384,333	11,095,971	1,237,810,613	1915
					日元	
日（本部）	57,070,936	148,756	20,966	1,280,964	1,867,000,000	1917
					金元	
美	105,253,300	2,970,138	275,791	10,658,881	24,246,475,000	1915

中国之人口八倍日本，四倍美，面积三十倍日，较美约四与三之比，而出品之值仅及日百分之六十，美百分之五，工业之不发达尚可以道里计哉？更就工人之数言，中国九倍日本，与美则相近，而出产悬殊如是其远，人力之不经济又可见矣，其故果安在乎？曰中国工业资本太少，组织太幼稚也。试就制造单位数比较，中国每单位平均不过六人，则知中国尚在家庭工业时代，机器之用仅少数之新式工厂有之，大规模之组织用工人在一万人以上者，竟无闻焉。恃一二人之五官心思，数十工人之手足与体力，以与东西科学方法之组织与数千马力之机器相竞争，乌得而不败？故中国工业不进步之原因有三：一、资本少；二、组织小；三、管理不得法。论者乃归罪于中国人富自大思想及保守主义（日人安原美佐雄语），非确论也。吾以为今日思想最足为中国实业之障碍者，莫过投机心。无论何人，无论何业，苟其人日日沾业外之名，谋业外之利，则其业必败，而况实事求是之工业哉。然而今之政客军人失势则办工厂，曰吾将以实业救国也。既办厂矣，朝开会，暮投机，而明日又为官，工厂遂为传舍。本业工厂者宜可以专心一业矣，又日思从外国汇兑与交易所得分外之财，厂业未亏，而竟因投机倒闭。故吾敢曰，自大思想保守主义绝不足为中国工业患，即资本缺乏组织管理不良亦有补救方法，惟投机心乃万不可有。资本少，苟任事得人，信用昭著，则资本自趋之如归。组织与管理之学识，虚心求之，亦不难得。惟在业厂者安分专心，以工业为终身之事业，则工业必有兴盛之一日。孔子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西谚亦云，久转之石，不能聚苔。未闻有为官之卡尼基，亦不闻有办厂之威尔逊。二十世纪为人才专门时代，愿吾国之工业家专心本业，尤愿吾国军政界之伟人，勤修已职，勿污工业界之干净土，然后乃可言振兴工业之道。振兴工业之道亦至简：一、政府与工业当合作，凡妨碍工业之法令制度皆当革除；二、工业组织当大，则资本与人材皆可经济，而得多量制造之益；三、当多设制造机械之厂。机器为工业最要之资本，故孙中山有机器借款之议。然中国本有煤铁，与其仰人供给，不如退而自造。仅购基本之机械，即能源源供给各业之需要。今者关税已有修正之机会，各国对于

中国通商之待遇亦将渐趋平等，此正吾人发展国外贸易之日。工业革新，不容更缓。自动发展时期之后，若继之以通国合作，吾知中国工业史上之黄金时代，不难立致也。

五　最近六十年中国工业大事年表

中　历	西　历	工　业　大　事	附政治要事
同治元（军用工业时期始）	1862	曾国藩于安庆设立军械所，仿造火轮船，逾成年，可用。 李鸿章在上海苏州设制炮局，上海两局以丁日昌韩殿甲分管。	
2	1863	曾国藩命容闳赴美采办机器洋铁。（后并入江南制造局。） 李鸿章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以为习西人理算制器之阶。	
3	1864		洪杨乱定。
4	1865	曾国藩设江南造船厂于上海。	
5	1866	左宗棠设船政局于福州。	
6	1867	崇厚筹备天津机器局。 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以唐国华等四万两赎罪金购得之虹口西人机厂，及原有两制炮局合组。 金陵机器局亦由李设立。	
7	1868		
8	1869	福建机器局购机建厂。 李鸿章奉旨筹划拓展天津机器局。	
9	1870		中日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10	1871	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幼童赴美肄习技艺。	
11	1872	陈兰彬，容闳护送幼童詹天佑等赴美习艺。 内阁学士宋音，奏请停造轮船以省经费。李鸿章力陈轮船之重要，宋议卒不果行。	
12	1873	沈葆桢奏请选派闽船政局学生出洋学习制造驾驶，因台湾有事不果行。	
13	1874		
光绪元	1875		
2	1876	李鸿章、沈葆桢奏派闽船政局学生魏瀚、萨镇冰等至英法各国学习工程制造，由李凤苞护送监督。 李鸿章奏派军官卞长胜等赴德习军械技艺。	中英缔结芝罘条约。
3	1877	丁宝桢奏设四川机器局。（即今成都兵工厂） 薛福成奏陈治平六策，有制器宜精造船宜讲两条。	
4	1878	左宗棠在甘肃省城南关外设织呢机器厂，用德匠。 御史曹秉哲，奏请仿用西法开采，以利器用。	

5	1879		
6	1880	李鸿章奏开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管轮两科。	
7	1881	吴大澄设立吉林机器厂。	中俄缔结伊犁条约，许俄商在蒙古及天山南北无税贸易。
8（官督商办时期始）	1882	金陵制造火药局兴工，越二年成立。 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其出品奏准只完正税一道，免沿途厘捐。	
9	1883	商人祝大椿设源昌机器五金工厂于上海，资本十万元。	
10	1884		中法战争。
11	1885	中法战争中国水师失败后，左宗棠、李鸿章等奏请拓增船炮大厂。 李鸿章奏开天津武备学堂，授军器、炮台、算法等学。	中法天津条约。
12	1886	张之洞奏准两广铁斤铁器出洋销售。 又以四万两在粤设缫丝局。	
13	1887	御史陈秀莹奏准明算学人员一体乡试。 李鸿章奏准天津水师武备两学生学作教员一体乡试。 张之洞在粤奏设机器铸制钱局，购机费二十五万两，造厂五万两，英喜敦厂机。 又设银元局附设钱局内。 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购机铸制钱，定名宝津局。又于保定设厂。	
14	1888	贵州镇远府青谿县设炼铁厂，由官商合股。	
15	1889	张之洞在粤奏设织布局，开办费四十万两。 又奏准将粤省铸铁炉饷、炉税停征三年，以示鼓励。 又奏设炼铁厂定英国熔炉两座，银十三万千余两。	
16	1890	上海纺织新局成立，由官商合办。（今之恒丰纺织新局） 李鸿章奏设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筹备。张之洞奏准，将在粤定购之织布机、炼铁炉移鄂，在汉阳建厂，以大冶铁苗，当阳白煤为原料，汉阳铁政局至是正式成立。（今汉阳铁厂） 又于汉阳设枪炮厂。（今之汉阳兵工厂）	
17	1891	上海道唐松岩，设上海机器纺纱局，由官民合资。	
18	1892		
19	1893	张之洞在武昌设织布、纺绩、制麻、缫丝四局，后更名湖北纺纱织布官局。（今由楚兴公司租办） 李鸿章奏设筹备将成之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	
20	1894	盛宣怀由李奏派招商股八十万两，为重兴洋布局之计，因股款不足，改设华盛纱厂。（今之三新纱厂） 湖北聚昌、盛昌等火柴公司成立，多属官股。	中日战争。
21（外人兴业时期始）	1895	马关条约许外人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工厂权，故是年日商之东华公司，英商之怡和、老公茂、鸿源（后为日人收买），德商之瑞记（后改东方）等纱厂，相继成立。 苏州苏纶纱厂（今由宝通公司租办）由官商合资开办，上海商办之大纯及裕源纱厂与无锡之业勤纱厂（今由福成公司租办）成立。	中日缔结马关条约。

		张之洞奏陈马关议和条约妨碍中国工商业发达之害。 津海道盛宣怀，奏请就博文书院屋，办头等、二等学堂，造就制造人材，以伍廷芳等为总办，丁家立为总教习。 李瑞棻奏请各学堂须设仪器院，注重格致、制造、实习。 御史管廷献，以西法未能制胜，奏请裁撤所有学堂、台坞及各省机器制造等局，以节财用。 给事中褚成博，以各省船械机器等局，徒耗巨款，无济实用，奏请一律招商承办，以节糜费。	
22	1896	张之洞奏准汉阳铁厂，由盛宣怀组织公司，改归商办，其历年用去官款五百数十万两，由公司将来偿还。 又奏准以在鄂定购之纺纱机四万零七百余锭，约银七十万两，移苏振兴纱业。 依克唐阿在奉天奏设银元局，购德国礼和洋行机。	
23	1897	给事中褚成博以洋商改造土货，奏请饬南北洋大巨，各筹款二三百万元，在内地广设丝纱机厂，以为倡导。 张之洞奏准将机器造货值百抽十之新章缓办，以振兴土货。 又在鄂设毡呢、造纸、制革、红砖、针钉五厂。（此五厂不详何年立附于此） 又在鄂设铸钱局，购美汉立克纳浦厂机约三万两。 上海商务印书馆成立，资本十五万元，营印刷及制造业。	
24	1898	张之洞在鄂设工业学堂，及劝工、劝商两公所，以广人材。 又奏准在汉口、上海设商务局，联络工商，讲求工厂制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定奖励新学、新法章程，发明制造船械、枪炮等器新法者，颁特赏，专利五十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给工部郎中实职，专利三十年；仿造西器之制法，未流传中土者，给工部主事职，专利十年。 张謇在南通设大生纱厂，资本一百十三万两，即用张之洞由鄂移苏之纺机。 孙多森在上海设阜丰机器面粉公司，资本一百万元。	康梁变法，戊戌政变
25	1899	胡聘之奏准在山西绛州三十三林镇，设纺纱织布局。	
26	1900	汉阳铁厂由张之洞及盛宣怀与日本订十五年购买矿石契约。 英人在上海设瑞瑢机器轮船工厂。	美国提出开放中国门户条件，经列强承认。 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京。
27	1901		北京和约，海关税率改正为值百抽五。
28	1902	北洋烟草公司成立于天津，资本十万五千两。	
29（政府奖励及利权收回时期始）	1903	政府设商部，以载振为尚书，陈璧、伍廷芳为左右侍郎。 商部奏定商律，又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设注册局专司其事。 朱志尧在上海设求新厂，制造船舶机械，资本约六十万两。	
30	1904	鲁督胡廷干，在山东博山设玻璃公司。 苏绅张謇、许鼎霖等集股五十万两，在江苏徐州宿迁设耀徐公司，制造玻璃。 汉阳铁厂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三百万元，订立三十年借款契约。	
31	1905	商部在京师设劝工陈列所。 直督袁世凯在天津设工艺总局，举办工业学堂。教育品陈列馆。考工厂。实习工场四事。 商部奏设高等实业学堂。 御史王金镕奏请添设初等中等实业学堂。	美国禁止华工，中国抵制美货。

32	1906	商部奏订奖给商勋章程，鼓励制造新器。 学部奏定考验游学生章程，有工商科进士等。 商部改称农工商部。 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四头业大兴，纱厂多增布机。 鄂督张之洞在鄂设制麻局，并奏准麻布免税，以裕销路。 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并向日商兴业，正金，三井三银行及大仓洋行借款六百万元。 江南造船厂改为官督商办。 奉天本溪湖煤铁公司成立，由日商大仓组经营。 英人设上海造船厂，资本五百五十七两。 上海泰丰罐头公司成立，资本七万元。 农工商部奏准独资商业得援公司例，一体注册。	中央官制改革。
33	1907	鄂督张之洞奏设大冶水泥厂。 鄂督张之洞、川督赵尔丰等，奏请于武昌省城外下新河设厂，造铁路、桥梁、车辆，铁轨等件，备川湘鄂粤四省铁路应用，开办费四十万两，由四省路股分提，将来出品并请暂免出口税银。 农工商部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凡办一千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二千万元以上者子爵。又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农工商部工艺局附设工厂成立，分织绣染等十二科。江督端芳奏准江西景德镇磁器公司改归商办，其出品，照机器出品例，仅完正税。 农工商部与度支部奉旨会订权度划一制度。 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公司成立，资本一百万两。 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资本一百万元。	
34	1908	农工商部与度支部会奏权度仍遵定制，以营造尺、漕斛、库平为准则。	
宣统元	1909	武昌举行物品展览会。	
2	1910	江督端方发起之南洋劝业会是年秋举行。 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日人大仓喜八郎订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契约。	
3	1911	农工商部奏定度量衡两制并用，一为营造尺库平制，一为万国通制，并设权度制造所。 武汉起义，汉阳铁厂解散，机炉多受弹毁坏。	武汉起义。
民国元（自动发展时期始）	1912	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以张謇为部长。统一后改设农林、工商两部，陈其美为工商部长。 江南造船厂改归海军部直辖管理。 盛宣怀、李维格代表汉冶萍公司与日人订中日合办契约，经汉冶萍股东大会全体否决。 伍廷芳、王文典在上海设国货维持会。 工商部议决用万国通制为权度标准，经国务会议通过，为参议院搁置未议。	清帝逊位。 袁世凯就大总统任。
2	1913	工商部另订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十八条，裁注册局归工商司直辖。 詹天佑联合粤工程师会、沪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组织中华工程师学会。	二次革命失败，议会解散。
3	1914	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张謇为部长，宣布棉铁政策。 政府定工业保息费章程，提倡制造，拟以二千万元为基金。	
4	1915	农商部设劝业委员会，附商品陈列所、工业试验所及工商访问所。 王正廷等发起劝用国货会于上海。 直隶省立模范纺纱公司成立，资本四十万元，英国机器。	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抵制日货。 袁世凯帝制阴谋。

5	1916	政府预算列商工业振兴资金一千五百万元。 王锡彤等在天津设华新纺织公司，资本一千万元。	袁氏取消帝制。
6	1917	农商部设实业协进会。 国务院设经济调查局。	
7	1918	江南造船厂与美国航务部订承造美国运舰十二艘。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五百万元。	
8	1919	上海求新厂改为中法合办，资本一百二十万两。	
9	1920		皖直之战。 解散安福。
10	1921	上海总商会之商品陈列所成立。 江苏实业厅在南京举行全省物品展览会。	

注一：将历年创设至民国五年尚存在的工厂数加起来，与此总数不符。农商统计表原表如此。

注二：本表统计数字，各类与总数有不符合处，因一时无原材料核对，故仍保持原状。

注三：将各省煤炭消费额加起来，与此总数不符。农商统计表原表如此。

注四：这两个数字不符。农商统计表原表如此。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中国矿业

丁 文 江

编者按：（一）原文污蔑中国少数民族之“迪化”改为“乌鲁木齐”；（二）原文清朝年份一律改为公元年份。

吾国五十年前之所谓矿业，仅限于贵重之金品，若煤若铁，今日国人之所视为根本实业者，在当日仅以为农余之附产而已，与国民之经济无与。惟金银铜铅锌锡，久为国家之所注意，且半为政府之所专利。然银为吾国所不产，金则困于苛税，锡则阻于交通，惟铜与铅锌，乃鼓铸货币之原料，自乾隆3年以部款100万两经营川滇之矿，至6年解铜之额达63,314担，至38年，达135,000余担，而分解各省之余铜，尚不在其列。铅锌产额，亦皆十倍于今。其盛况可想见也。嘉道以还，吏治废弛，矿业渐衰，然每年解京之铜，尚不下60,000——70,000担。迨滇中乱作，秩序荡然。铜厂汉回，复相仇杀，官逃丁没。峒废山封120年来之经营，乃毁于一旦。自咸丰8年至同治13年，16年间，未尝炼一斤之铜，一担之铅。光绪初叶，虽屡有恢复之尝试，而自元年至13年，共产铜不过83,700担，尚不及乾嘉盛时一年之供额。其后唐炯任为督办，竭公私之力以经营之，先后用款30余万，而近三十余年，每年产铜不过万担，铅锌称是。追忆乾嘉盛时之景状，不能不叹息于破坏之易，而建设之难也。

光绪4年，以资本27万两，（至光绪8年增至120万两）设开平矿务局于津。是为吾国以西法开矿之始，亦即京奉铁路开创之始，开平之外，文忠之所提倡者，尚有热河四道沟之铜矿，朝阳金厂沟，黑龙江漠河，山东招远之金矿，峄县之煤矿。

综溯近世纪矿业之历史，可分为三期。自光绪之初，迄于甲午，士民固陋，甚于官府，资本集合，难于聚沙，开创提倡，端赖当局。是为官矿时代。甲午以还，国势骤弱，慢藏诲盗，外力内侵，矿权给许，动以省计。是为外资时代。日俄战生，国民自觉，风气所趋，波及于矿，外籍所攫，或赎或拒，官府所创，旋改为商。迄于民国，矿法改良，资本渐集，公司制兴，是为民矿时代。然此三时代，虽情势各异，而界限相重。一时代中其所建置，或一成而不废，或名存而实亡，故至今商矿之外，仍多官矿，华商之外，不乏外商，而官商又尝合办，中外不妨联资，组织既烦，头绪益杂。兹为叙述便利起见，仍以官矿外资民矿为目，先略举其历史，再分考其地点资本及兴废年月，各列为表附焉。

一 官 矿

开平矿务局，为近代矿业之嚆矢，前既已略言之矣。然当日李文忠奏请设局之时，其资本220万两，实多为广东人唐廷枢之所召集，故奏案以官督商办称。同时修铁路，开运河，购地设厂，经营秦皇岛海港，规模极为宏远。至庚子年，总办张翼，为德璀林所诓转售于胡华，遂开今日开滦中外合资之局。同时文忠所提倡者，尚有热河之四道沟铜矿，开办于光绪13年，

黑龙江漠河之金矿，开办于光绪15年，山东峄县之煤矿，开办于光绪6年。四道沟铜矿，开办3年，用款48万而停歇，峄县之煤，今已改为商有，惟漠河则尚为江省四大官矿之一焉。闻文忠之风而兴起者，为光绪11年，贵抚屠某之清溪铁矿，光绪13年唐炯之东川白锡腊铜矿，光绪21年，四川之冕宁麻哈金矿，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官矿局，而张文襄之汉阳铁厂，亦发起于光绪16、17年之间，是为官矿之第一期，其后清溪麻哈皆各费银数十万而停歇。东川改用土法，汉阳铁厂，亦于光绪22年改归商办，惟湖南官矿局，至今尚存，则水口山铅锌矿之功也。

庚子以后，疆吏鉴于川黔之失败，困于赔款之摊派，不复敢轻尝试矣。至光绪30年，清廷有矿政调查局之设，复置矿务议员，官矿之议乃复活。于是31年，有广西之富贺煤矿，陕西之延长石油矿，33年，有山西之涑川铜矿，江西之赣州铜矿，余干煤矿，广西之官炼锑厂，34年有吉林之磐石铜矿，宣统元年有直隶之鸡鸣山煤矿，云南之个旧锡务公司，宣统2年有四川之彭县铜矿，而湖南官矿局，亦推广改良以新法采水口山铅锌，渐获厚利。北洋大臣所办之黑龙江金矿，于庚子年为俄人所占者，亦于光绪33年陆续收回，于宣统3年，改归江省自办，耳目较近，收入骤增。是为官矿之第二期。然迄于今日以上所举十有二矿，其未停办而尚能获利者，惟湖南黑龙江两局。

民国成立，矿法重修，矿权主张开放，依法领照者遂多。然3年收铁矿石油为国有。故是年特设筹办全国煤油事务处，与美孚公司订约，合资探矿，四年财政部复有采金局之设，派员调查，建议开采。农商部亦于是年立黑龙江梧桐河金矿试验场，湖北复设官矿局，开采大冶象鼻山铁矿煤矿及其他金属。其后采金局于五年取消，煤油事务处因探矿失败，美孚废约而裁撤，梧桐金矿改归商办。现中央政府所直属经营者，惟对德宣战后，收回之井陉矿务局，及7年所成立之龙烟铁矿公司，然前者为暂时制度，后者为商官合资，未可遽举为官矿之成绩也。

此就其年代言也。至其办法，则殊不一律。购机建厂，雇员招工，资本营业，一出于官，是为完全官办之矿，如湖南之矿务总局，湖北之官矿公署，彭县铜矿，延长石油，以及鸡鸣山煤矿是也。开办或借官力，营业则为公司，资本之来，半由招股，是为官商合办之矿，如个旧锡务公司龙烟铁矿公司是也。开采之方法，营业之盈亏，一切任之于商，官不与其事，亦不负其责，惟其所采矿物，所制金品，悉归官收买，不准私售，间或为之设厂招工，而专其贩卖食物之利，按工定税而分其每日所得之金，其名目或曰官督商办，曰官办，曰包办，要皆不副其实。兹改名之曰民办官收，如黑龙江吉林新疆之金，广西富贺之锡，贵州铜仁之锑是也。兹就农商部有案可稽各矿，照上所言，分类列表，其中外合办及商办各矿，虽政府派有督办，或附有官股而事权不在政府者，仍分见于外资民矿，不列本表，以期名实相副焉。

(一)完全官办者

矿质	省份	地点	矿区	资本	主办者	成立年	最近产额	备考
金	湖南	会同县漠滨	23,400方丈	40,000元	湖南矿务局	1913	700两	盈
〃	〃	平江县黄金洞		300,050两	〃	1897	1,000两	亏
〃	〃	桃源县蓼叶溪			〃	1914	100两	亏
铅锌	〃	常宁县水口山	100方里	约500,000两	〃	1907	铅9,684吨 锌6,104吨	盈
〃	〃	常宁县松柏炼厂		71,600两	〃			
锑	〃	新化县锡矿山	60亩	50,000两	〃	1915	闻已暂停	亏
〃	〃	沅陵县银矿坑			〃	〃		〃
〃	〃	溆浦县管叶塘			〃	〃		〃
锑铅铜锡	〃	常桂县白河			〃	〃		〃
锡	〃	临武县萝坪		20,000两	〃	1912	2吨	〃
煤	湖北	阳新县炭山湾		800,000两	湖北省署	〃	19,215吨	
铁	〃	大冶象鼻山		共用500万元	湖北官矿公署		69,191吨	
铜	〃	大冶阳新			〃			亏
煤	江西	萍乡湘东			〃			〃
金	山东	沂水红石桥		8,000元	山东省署	1915	1,200两	盈
铜	四川	彭县大宝山	799亩	41,000两	彭县铜矿局	1911	124吨	〃
煤	河北	宣化县鸡鸣山	36方里	500,000两	京绥铁路局	〃	63,894吨	亏
〃	广西	富川贺县西湾		595,000元	富贺官矿局	1907		〃
〃	江西	余干县枫港		约200,000元	余干官矿局	〃		〃

(二)官商合办者

矿质	省份	地点	矿区	资本	主办者	成立年	最近产额	备考
锡	云南	个旧县马落革	3,460亩	商股760,000元 官股2,540,000元	个旧锡务公司	1909	820吨	亏?
〃	〃	个旧炼厂				〃		〃
铅锌	〃	东川县矿山			东川矿业公司	1913	各600吨	盈
铁	河北	宣化龙关		500万元官商各半	龙烟铁矿公司	1918		尚未开炼
煤	〃	临城		3,000,000佛郎	临城矿务公司	1905	265,040吨	原为中比合办，八年收回
〃	〃	宛平斋堂		官股30,000两	斋堂煤矿公司	1915		尚未开办
石油	新疆			商股5,000两	新督杨增新发起	1915		〃

（三）民办官收者

矿 质	省 份	地 点	矿 区	资 本	管理机关	成立年	最近产额	备 考
金	黑龙江	漠 河	2,820亩		漠河金矿局	1889		盈
〃	〃	奇乾河	1,026亩		奇乾河金矿局	〃	25,479两	〃
〃	〃	观音山都鲁山	5,600方里	80,000元 37,700两	观都金矿局	1891	4,100两	〃
〃	〃	呼玛县库玛尔河	10,538亩		库玛尔河金矿局	1908	1,096两	〃
〃	吉林	依兰县三姓		80,000元	同 前	1915	142两	亏
〃	热河	承德县三道沟				1916		〃
〃	新疆	于阗等五厂			乡约包办		3,571两	盈
锡	广西	富川贺县		136,000元	富贺官矿局	1909	200吨	〃
〃	湖南	江华上伍堡	100方里	192,000两	湖南矿务局	〃	60吨	〃
锑	贵州	铜仁梵净山等处			铜仁官矿局	1910	闻已暂停	亏

（四）民办而官商合收者

矿 质	省 份	地 点	矿 区	资 本	管理机关	成立年	最近产额	备 考
金	黑龙江	呼玛县余庆沟	344,600亩	40,000卢布	黑官商合办公司	1911	25,479两	盈
〃	吉林	穆陵凉水泉窑山兴隆沟		官商股小洋各10,000元	吉林省署	1915		
铜	云南	东川项家各厂		官股100,000元 商股200,000元	东川矿业公司	1913	500吨	盈

上列四表，均系民国6、7年存在之矿。近年来外省对于中央报告，渐不完备，其中有无变迁，无从稽考。然军兴以后大概有减无增，可断言也，溯自光绪初年至今，官营矿业之失败销减者，殆数倍于现存之官矿。但其成立，或在农工商部设部以前，部中无案，而本省旧档，或毁于兵，或散于吏，其兴废历史，不尽可考。兹搜集其存案可稽，及散见于公私文牍者，为列表如下。

官矿之停办或改归商办者

矿质	省份	地点	资本	开办年月	停办或改办年月	备考
煤	湖南	湘潭县小花石	82,200两	1896	1900	停办
〃	〃	宁乡县青溪	84,500两	1896	1900	〃
〃	黑龙江	嫩江县甘河	136,000两 36,000元	1905	1921	甘河煤矿局所办民国十年停办
〃	黑龙江	呼兰县金怀马	50,000两	1905	1921	金怀马煤矿局所办民国十年停办
〃	湖南	醴陵县豆田	5,500两	1896	1897	〃
〃	〃	宁乡苦竹寺	31,000两	1898	1900	〃
〃	〃	醴陵棵树山	35,000两	1898	1901	〃
〃	〃	芷黔县黄坡鸭绿	50,000两	1898	1900	原兼办铁矿后均停办
〃		江流域平山太平山景山	30,000两	1907		以煤线太深停办，原定为官商合办商股未招
〃	河北	密云县东智庄	15,000两	1908		原为官商合办
金	四川	冕宁县麻哈	300,000两 100,000元	1895年开办 1914年复开	1915年复停	现归商办机器废置无用
〃	〃	盐原县木褒		1895	1911	原为官督商办因出产衰微而停
〃	湖南	沅陵县大有溪	4,700两	1897	1898	停办
〃	〃	黔会	3,500两	1899	1914	〃
〃	〃	辰州桐树面	12,100两	1913		〃
〃	河北	密云县桃园		1912		
〃	热河	平泉州密云乡		1899		改归商办
〃	〃	承德县碾子沟		1904开办 1911复开	1915复停	停办
〃	〃	滦平县八道沟				停办
〃	黑龙江	汤原县梧桐河	40,000元	1915	1919	改归商办
〃	新疆	阿尔泰山哈图山	240,000两 20,000元	1899年开办未几停 1903年复开		初为华俄合办后为官商合办
〃	山东	招远玲珑山				改归商办
铜	云南	东川县白锡腊处	约100,000两	1887	1889	唐炯官商公司用日本人所开
铜	热河	滦平县四道沟	480,000两	1887	1895	李鸿章开办置机器出铜共十余万斤
〃	湖南	永定县大米界	1,500两	1896	1907	停办
〃	〃	桂常县	24,200两	1896	1899	〃
〃	〃	石门汤家台	5,200两	1897	1898	〃
〃	江西	赣州珑下长桃岭	约200,000两	1907	1908	购有机器出铜 837 磅硫化铜 644 磅

矿 质	省 份	地 点	资 本	开办年月	停办或改办年月	备 考
〃	山西	闻喜簸子沟绛县铜互沟	36,600两	1907	1911	恩寿所设之川铜矿公司
〃	江苏	句究铜冶山		1895年开办1906年停，1908年复开		曾购机器因亏本停办
〃	吉林	盘石县石嘴山	银30,000两 钱25吊	1908	1922	吉林省署所办1921年停办
〃	湖北	竹山县四果树		1905		停办
〃	〃	竹山县邛家台	20,000两	1908		1913年为五丰五盈两公司所有
〃	〃	阳新大冶	52,000元	1912		
〃	新疆	库 车	官股5,000两 商股5,000两		1915	马绍武承办因每日出铜三斤亏折停止
〃	〃	乌鲁木齐南山 马喀库尔泰山	2,000两			广济铜矿公司所办现完全停办
〃	〃	乌什县麦里克	1,500两	1913	1914	哈什观察使王炳坤委彭永年办，亏折停歇
铁	湖北	汉阳铁厂大冶铁矿	500数十万两	1891	1896	改归商办
〃	贵州	清 溪	30余万两	1885	1893	潘抚奏办因无煤停止1898年陈明远接办未果
锡	湖南	桂阳县野鹿滩	26,800两	1912	1914	停办
〃	〃	临武县香花岭	30,000两	1914	1915年9月	改归商办
铅锌	〃	衡阳县三官町	200两	1896	〃	停办
〃	〃	桑植园莺嘴山	2,600两	1896	1897	〃
〃	〃	浏阳县曾家湾	800两	1898	1897	〃
〃	〃	麻阳县潭石约	1,400两	1900	1897	〃
〃	〃	桂阳县虎形山	13,700两	1904	1905	〃
〃	〃	兴宁县大脚岭	2,400两	1905	1905	〃
〃	〃	长河城外提铅炼厂	170,600两	1909	1910	〃
〃	〃	常宁县呼头	1,800两	1913		〃
锑	〃	泸溪县	2,200两	1896	1897	〃
〃	〃	辰谿县	2,500两	1896	1897	〃
〃	〃	益阳县西村	145,600两	1896	1904	华昌接办
〃	〃	沅陵县牛婆溪	8,200两	1897	1898	停办
〃	〃	安化县木李坪	31,400两	1900	1904停	华昌接办
〃	〃	芷口县罗田坪	26,000两	1900	〃	停办
〃	〃	沅陵县银矿坨	26,000两	1898	1900	1915年复开
〃	〃	安化县仙溪	4,300两	1899	1900	停办

矿　质	省　份	地　　点	资　　本	开办年月	停办或改办年月	备　　考
〃	〃	邵阳县龙山	1,900两	1899	1900	〃
锑	湖北	安　化		1913	1921	原为湖北官矿公署所办1921年停办
〃	〃	武昌炼锑厂		1913	1921	〃
〃	〃	新化邵阳两县收砂局	327,900两	1905	1906	停办
〃	广西	梧州炼厂全省官局	200,000两	1906	1910年9月	1916年王祖同改归官办未果
〃	广东	曲江县赖老顶等	200,000两	1910	1911	宝昌公司官商合办实亏约20,000元停办
朱砂水银	湖南	凤凰厅猴子坪	47,100两	1912	1914	改归商办
硫磺	〃	兹　利	13两	1901	1914	停办后改归商办
〃	〃	郴　州	348两	1906	1914	〃
硝磺	〃	辰　州	1,000两	1896	1897	〃
石油	陕西	延　长	290,000两	1906	1922	陕西省署所办1922年停办

综观以上各表，五十年来停办之官矿，所费资本，有数可稽者，不下千万。其现存之矿，除官商合办者，开办未久，成败未见，姑不具论外，其民办官收者，资本不过百万，每年获利，计亦不下百万。然括穷民汗血之资，且因以为功，苛政虐民，以是为甚。至于完全官办之矿，资本可考者，银270余万两，洋580余万元。而当民国5、6年欧战期中，金属腾贵时，亦仅彭县之铜矿获利4万，湖南矿务总局获利48万元。其他亏折实数，虽不可详，然计算当亦不下数十万。

二　外　　资

甲午以还，国势浸弱，外侮之来，不可终日，发其难者，实始于光绪24年之曹州教案，而胶济铁路30里内之矿权，亦随胶州及铁路之敷设权，同入德人之手。同年英商福公司攫取山西平定盂县及潞泽之煤铁，明年德商瑞记洋行得山东之五矿。当时士大夫分为仇外改革两派。言改革者，颇以外资输入为可行．故李鸿章西使，英人摩尔根以中外合办之说进，遂有光绪26年四川会同公司之约。立约者以开采委诸外人，而政府坐享其利。后因庚子事件，约不果行，然是为中国政府与外人合资办矿之始。至于以私人资格与外人合办者。则光绪22年。已有门头沟之中美煤矿。固不自摩尔根始也。自庚子事件，直隶开平煤矿，经德璀琳而移于英人之手，外人之要求矿权者，踵且相接。溯其方法，不外四端，一因铁路之敷设，而傍及其附近之矿权者，如光绪29年之中俄南满协约，光绪28年之中俄吉黑煤矿协约是也。抚顺烟台之烟煤，即根据前者而移于南满铁道会社，满州里札赉诺尔之褐炭，亦根据后者而归于东清铁道公司，要皆引胶济铁路之条件为先例。二与政府直接交涉，取有全省或其一部之矿权者，如福公司之于山西，瑞记洋行之于山东五矿，隆兴公司之云南七府是也。三指定矿地得政府之特许者，如凯约翰之铜官山铁矿，立德乐之四川江北煤矿，科乐德之外蒙金矿是也。四先向私人订立合同，事后由政府追认者，如直隶之井陉临城各煤矿是也。

以上各矿，其原起皆在日俄战争以前。光绪30年以后，国民奋起，力图挽回，争路争矿，遂成政治上之运动，外人对吾国之观念，亦因之而一变。于是向之所攘夺者，或因失败而消灭，或得巨款而放弃，或经交涉而改组，以迄于今，其完全为外人所有者，惟奉天之抚顺烟台，吉林之宽城子等煤矿，及外蒙之金矿而已。唯民国3年10月大仓洋行矿师为盗所杀，遂以合办热河阜新煤矿为赔偿条件，4年5月，日本以东三省九矿为二十一条要求之一，盖犹有庚子诸年之遗风焉。又自民国3年，修正矿律，外资不过半数，法所不禁。虽各国政府，屡以条件过酷为言，不肯公然承认，然其私人之照章合办者，实繁有徒，盖近年来矿业之新局也。兹特详考与外资有关各矿，就其性质历史，分别为表如下：

（一）完全外资者①

矿质	地点	国籍	矿权者	最近产额	备考
煤	辽宁抚顺千台山	日本	南满铁路会社	3,064,958吨	初为中俄合办，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1909年由中国政府正式承认
〃	辽宁辽阳烟台	〃	〃		〃
〃	吉林宽城子	〃	〃		1902年俄人所有，日俄战争改归日本，因煤质劣未开
〃	山东潍县坊子村	〃	日本政府	130,000吨	1900年北京条约让与德人，1914年为日本所占
〃	山东淄川县黉山	〃	〃	504,250吨	〃
铁	山东益都金岭镇	〃	〃	34,165吨	〃
金	外蒙图车两盟	俄			1903年9月俄员柯乐德呈请试办，1912年柯乐德被逐近又与美商订立合同案尚未结
褐炭	满洲里扎赉诺尔	〃	东清铁路公司	1,200,000吨	1902年中俄条约

（二）中外合资者

（甲）有特别契约者②

矿质	地点	性质	矿权者	资本	成立年月	原因	最近产额	备考
煤	河北临城等县	中比合办	临城矿务局	3,000,000法郎	1905	1902年钮秉臣盗卖	265,045吨	现比国部分已由华商收回惟原约未废
〃	河北井陉县冈头	中德合办	井陉矿务局	中德各250,000元	1896	张风起与汗纳根私办	418,691吨	现暂归农商部与本省合办
〃	辽宁本溪县	中日合办	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	中日各1,000,000元	1910年4月	日俄战争后大仓所占	409,729吨	

①按山东之煤铁矿，近由华盛顿会议，改归中国政府所特许之公司承办，其资本中日各占一半。兹以历史关系暂列上表。

②临城已列入官商合办表，兹因原约未废，且为历史关系，故复见于此。又阜新煤矿及天宝山银铜矿，表面虽系遵照矿章领照，然历史与寻常不同，盖其初起时均有契约关系也。

矿质	地点	性质	矿权者	资本	成立年月	原因	最近产额	备考
铁	辽宁本溪湖庙儿沟	中日合办	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	5,000,000元	1910年4月	日俄战争后大仓所占	铁48,800吨	
金	热河建平县霍家地城子山平泉县王家村	中英合办	平远金矿公司	中英各400,000两	1911年	王绍林、孙世勋与伊德所立合同	欧战停工	
煤	河北开平滦州	〃	开滦矿务局	中英各2,000,000磅	1911年12月	开平公司于庚子年为德璀林盗卖	4,416,010吨	张翼讼英廷不得直
〃	河南修武沁阳焦作	〃	福中公司	福公司1,240,000磅	1915年合并	豫丰公司借款20万磅	福公司561,834吨 中原公司734,895吨	两公司分采合销
〃	热河阜新县新丘	中日合办	（周圭璋与今井邦三）大兴公司	中原公司5,000,000元	1915年10月	赔偿大仓	尚未出煤	
〃	〃	〃	（顾志康与河野久太郎）大新公司		1915年10月	〃		
银铜	吉林延吉县天宝山	〃	天宝山公司	中日各500,000万元	1916年9月	程光第私借中和公司款项	铜100吨	政府派有监督
铁	辽宁辽阳弓长岭	〃	弓长岭铁矿公司	1,000,000日元	1919年	政府特许	尚未采矿	

（乙）二十一条所要求之九矿

矿质	地点	国籍	矿权者	矿区面积	最近产额	备考
铁	辽宁海城盖平及辽阳鞍山等地	中日合办	振兴公司	共8处23方里	163,596吨	秦日宣于汉冲及镰田弥助出名炼厂则为南满铁道会社所有
煤	辽宁本溪湖田什付沟	〃	孟凌云与浅田龟吉彩合公司		65,244吨	1916年5月7日之换文言明"中国政府允诺日本国臣民在上列各矿除业已探矿或开采各矿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仿照现行办法办理"（按现行中外合资办法）惟至今尚未全数领照
〃	辽宁本溪湖牛心台	〃				
〃	辽宁锦县暖池塘	将来中日合办				
〃	辽宁海龙县杉松岗	〃				
〃	辽宁通化县铁厂山	〃				
〃	吉林省城附近缸窑	中日合办	阎庆山与峰簇良充			
煤铁	吉林旬桦夹皮沟	将来中日合办				
金		〃				

（丙）遵照矿章领照者

矿质	地点	性质	矿权者	发照年月	面积（亩）	最近产额	备考
煤	河北宛平门头沟	中英合办	通兴公司	1912年	4,770	现不出煤	原为36亩后两次增区旋改名门头沟公司并收并通兴
〃	〃	〃	裕懋公司	1914年8月	4,486		
金	吉林东宁县绥芬支流	中俄合办	绥芬金矿公司	1913年10月	2,800		
煤	吉林县火石岭	〃	裕吉公司	1915年6月	670		合同未批准
〃	吉林额穆县望宝山	中英合办	邢哲臣与李赖	1915年11月	420		
〃	安徽怀宁县董家冲等处	中日合办	中日实业公司	1916年4月	8,467	1,843吨	
〃	河北宛平杨家坨	〃	杨家坨煤矿公司	1917年2月	560	30,000吨	
铜	凤城青城子小边沟	〃	刘鼎臣	1918年1月	1,820		与日人森峰一合办
煤	抚顺县东五十里石门寨	〃	张顺堂	1919年4月	933		与日人峰八十一合办
〃	抚顺县得古土口子	〃	姚铭勋	1919年6月	1,598		〃
〃	抚顺	〃	大兴公司	1916年6月	921		日人饭田义一合办
〃	西安县北五里许半截河子	〃	邹立贤	1919年1月	4,297		与日人守田辰得合办
〃	西安半截河子西岭地方	〃	杨魁元	1920年3月	1,711		与日人松本健次郎合办
〃	西安孟河亮东北	〃	梁北璠	1920年3月	3,662		〃
〃	锦西县大窝沟龙尾巴等处	〃	陈应南	1918年12月	5,378		日人安川敬一郎
煤	锦西沙窝屯	中日合办	李润身	1919年3月	2,931		与日人守田辰得合办
磁土	复县南兴华乡五湖嘴	〃	孙以萍	1916年6月	1,620		与日商韦津耕次郎合办
铅	开源	〃	冯竹初	1919年7月	451		与日人筱崎军吉合办
〃	本溪吉祥峪	〃	孙世荣	〃	681		与日人浅田龟吉合办
煤	克山	中俄合办	马熏卿	1920年4月	5,040		
〃	〃	〃	〃	〃	5,175		
〃	章丘普济镇	中日合办	旭华公司管象坤	1921年2月	435亩		与日人冈崎忠雄合办

（三）经政府赎回者

矿质	地　　点	前矿权者	成立年月	赎回用款	现矿权者	附　　录
煤　铁	山西盂县平定等处	英商福公司	1899	银2,700,000两	保晋公司	本地官绅请求集资
铁	安徽铜陵县官山	英商凯约翰	1904	520,000元	泾铜公司	以逾限废约
煤　铁	四川江北厅	英商立德乐	1905	220,000两	江合矿务公司	〃
各矿质	山东五处	德商瑞记洋行	1899	340,000两		
〃	沿胶济路十里内矿权	德国政府	1898	210,000元		
〃	云南七府	英法云南兴隆公司	1902	1,500,000两		债权至今未了
磷	东沙岛	日本政府				日本强占交涉撤消
煤	湖北阳新县炭山湾	法商蒲旭		800,000两	湖北省署	黎副总统提议

（四）经政府取销或消灭者

矿质	地　　点	矿　权　者	成立或发起年　月	取消年月	备　　考
煤铁砂	贵州铜仁	奥商戴玛德	1899	1905	试办期满营业失败
金	福建邵武	法商大东公司	1902	1907	因不缴照费
煤	江西余干	中日实业公司	1914年7月	1915年2月	赣省以重复力争取消
〃	江西丰城乐平	顺济公司	1914年	1918	探照逾期取消原为中日合办
金	辽宁海龙海仁	香炉盘子金矿公司	1910		唐元湛呈请中英美合办迄未实行
〃	河北滦平县八道河	泰丰金矿公司		1918	
石　棉	热河凌源县青石岭		1914年3月	1918	
〃	热河丰宁宽沟			1918	以上三矿均于对德宣战时取消
金　银	河北迁安热河建平平泉	周家鼎李士伟与美商订立合约			部批修正合同事遂中止

（五）悬案未结者（附议订合同中央尚未核准者）

矿　质	地　点	国名	备　　考
金	黑龙江右岸	俄	1901年订立草勘草约，1907年取消两国互索赔偿，迄未解决。
各矿质	四　川	英	1898年四川矿务局与摩尔根订立合同，逾限应废，累次争执未决。
石　油	新　疆	〃	1920年中华矿业公司（中英合办）呈请有案，因新疆反对未决。
煤	广　东	〃	英商嘉素于1920年与广东省订立勘矿合同，中央未准。
煤及石油	山　西	〃	1920年福公司与山西省署订立合同，中央未准。

（六）有借款关系者

矿质	地　　点	公　司	开办年月	欠款数	债权者	抵押品	备　　考
煤铁	湖北大冶汉阳与江西萍乡	汉冶萍公司	1884年6月	12,000,000日金	日本八幡制铁所	新旧财产	订有40年供给矿砂及生铁合同
铁	安徽繁昌挑冲	裕繁公司	1914年7月	200,000元	中日实业公司	矿砂	遵照铁矿暂行条例

按矿商之借外资者，不止于此，如安徽当涂宝兴公司之于开滦，当涂利民福民公司之于日本均有售砂借款关系，惟远不及上列两矿之重要耳。

上所列七表，虽不敢谓全无遗漏，然光绪初年至今外资矿业之有案牍可稽者，实皆具备。兹综观其结果，完全外资之矿，大抵由于外国政府之强求，其国籍今仅限于俄日，而尤以日本为最多。中外合办之矿，有特别契约者，初皆由于私人之结合，其名目或为借款或为合资，而事权则无不完全操于外人之手。且无论完全外资，或中外合办，其资本之国籍，无不与所谓势力范围有关，故在云南者为英法，在四川者为英，在山东者前为德，而今为日，在东三省者，则非俄即日，其利害得失，可令人深长思矣。尤可异者，赎回矿权，公私所费，共计洋70余万元，银560余万两，其分期交款者，尚有利息。（如隆兴公司）故合计当在1,000万元以上。然当日让与矿权时，政府固未得分文，取得矿权者，亦未尝有所设施也。盖此辈大抵非业矿之人，初未尝有一定之矿，惟指某某省某某府某某铁路为模范，而以其矿权为投机之具，间或于其中有所发见，则售其余各地之矿权于吾国政府，以为资本。故福公司得款275万两而开煤矿于焦作，胶济铁路公司，收费210,000万元，以开煤矿于坊子黉山，而吾国官吏之任交涉者，犹以收回利权为功，诚可怪也。

自民国3年矿业条例颁布以后，中外合资，遂有定律，然迄今7年，照章领照者，90%以上，殆为日本国籍，且均在山东与东三省。其章程合同虽均以中日资本各半为准，然资本之来历，事前既无从稽查，事权之分配，事后尤无从干涉，名实之不副，固其宜也。民国以来，朝野之所注意者，莫如铁矿，故民国3年有铁为国有之政策，非经政府特许，不能领照，其用意未尝不善。但吾国炼厂过少，矿石苦无销路，有矿而无厂者，势不能不借出口以自给，于是售砂借款，遂为采铁矿者惟一之生活，而条件之苛刻，事权之旁落，亦不可免。如表中所列之汉冶萍与裕繁公司，均为契约所束缚而不能解脱，盖将来吾国钢铁事业发展之大障碍也。

三　民　　矿

50年前之重要金属品，若金银铜铅，均为政府所专有，开采不得自由。乾隆盛时，铜与铅锌，视为要政，民办官收，颇著成效，前既略言之矣。若金若银，则内地原无佳矿，边徼又为禁地，虽无苛政重税，固亦不易言发展也。惟云南人吴尚贤，曾于滇边之耿马开采铅银，遂致巨富，然卒为滇中大吏所捕，瘦死狱中。私采金银，悬为厉禁，其后无复敢问津者。若煤与铁，则政府视为农余之生计，初不干涉。故其开采之权，大半操之地主。然其时交通不便，迷信复深，地主居奇，外人裹足，既无法律之保障，亦无事业之可言也。迨光绪初叶，李文忠督直，始有提倡开矿之举。又以创兴海军，缺乏燃料，故尤注意于煤。然其始款则出

之于商，而事则操之于官，故开平矿务局以官督商办称，即山东峄县之煤矿，亦开始于光绪五年之官窑总局，其法律手续，均根据于奉案，其事权则出于北洋通商大臣，非寻常商民之所敢过问者也。厥后路矿设局，钦简督办大臣始渐有开放之议。然所立章程，均多苛简窒碍，不能实行。直至光绪33年，张文襄入枢府，始有大清矿务章程之规定，是为吾国矿法之嚆矢，其内容多参照各国矿律，颇以保护提倡为主义，然其第十八款规定，凡各矿所得利益，“除开支一切用费外，净存余利，业主（即地面业主）应得十成之二五，国家酌提十成之二五，矿商应得十成之五，”国家与地主，坐分矿商利益之一半，又孰肯以资本心力为他人作牛马者。况开矿领照，必先得地主之同意，为迷信者开阻挠之门，奸猾者留敲诈之具，宜商民之

重要民矿一览表

公司名称	矿质	股本（万元）	地点	注册年月	最近产额（吨）
中兴公司	煤	500	山东峄县枣庄	1905,9	683,112
汉冶萍公司	煤铁	2,000	湖北大冶汉阳与萍乡	1908,2	铁 824,491 煤 790,168
江合公司	煤	20万两	重庆	1909	?
贾汪公司	〃	200	江苏铜山贾家湾	1915	143,093
六河沟公司	〃		河南安阳	1907	232,618
柳江公司	〃	72	河北临榆柳江	1918	94,492
天源公司	〃	15	山东章丘埠村	1919	尚未出煤
井陉正丰公司	〃	17.82	河北井陉	1919	82,974
山西保晋公司	〃	300万两	山西平定阳泉	1906	185,560
鄱乐公司	〃	100	江西鄱阳乐平	1919	尚未出煤
长兴公司	〃	220	浙江长兴	1920	1,840
普益公司	〃	30	安徽风阳蚌埠	1922	13,000
同宝公司	〃	300	山西大同胡家湾	1921	尚未出煤
中和公司	〃	24	河北磁县		5,000
怡立公司	〃		河北磁县		24,148
北票公司		500	热河朝阳北票	1921	尚未出煤
昌明公司			江西吉安		13,230
华丰公司			山东宁阳		37,761
华昌公司	锑	150	湖南长沙	1908	近已暂停
裕繁公司	铁		安徽繁昌桃冲		62,220
宝兴公司	〃		安徽当涂		44,389
杨子机器公司	炼铁		湖北汉口	1920	约日出 100
裕甡公司	锰		湖南湘潭	1916	4,653

裹足不前，毫无成绩也。盖官吏之勒索，与地方之牵制，为矿业发展之大障碍，终前清之世，不能革除。兹就呈部立案各大公司，考其资本数目成立年月，矿质产额，同列一表。而附以各矿质领照注册面积之总数，以供参考焉。（见《重要民矿一览表》《领亩照数表》）

领 亩 照 数 表

矿质	探 （亩）	采 （亩）	矿 质	探 （亩）	采 （亩）
金	93,607.5	187,813	笔铅	5,473	3,980
铜	24,594.4	20,138.5	弗石	166	7,893.9
铁	22,973.9	141,558.6	长石		1,080
铅	32,624	42,966.5	滑石	554.3	6,025.9
锰	6,348.1	9,254.7	磁土		2,269.7
煤	1,804,020.9	1,468,836.9	苦土	50	18,706.9
石棉		16,535.7	铅银	2,139.8	2,700
重晶石		55.5	银铜	1,537.4	32,400
硫化铁		1,297.5	锑	30,705.3	19,571.3
颜料石		156.9	铜镍	1,856.6	1,572
银	7,600.2	5,831.2	石膏		850
钼	4,301.1	5,841	磺		133.7
钨		295.4	磷酸灰		2,179.5
云 母	61	1,097.9	大理石		60
硫 磺		3,217	锌	1,038.3	5,484.2
铜 铅	1,075.8		锌 铅	554.1	1,253.6
银 铅	2,700	960	铅 铜	255	
水 银	2,417.5		铜锌铅	295.6	
绿松石		26	砒		148
铁 锰		806	汞	170	
煤 铁	30		雄 黄		64
锡	1,784	13,385又5里44丈9尺	石 灰	810	
锡 砒	1,219	96	铝	3,671.9	
铅 锑	52		朱 砂	726.5	
铅 锌		277	金 砂	8方里56亩8丈	163
铅 砒		136	总 计	3,225.47方里	3,749.6方里
铅 钨	384.5				

民矿之历史，多极复杂。兹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仅举汉冶萍与中兴两公司为例，以类

其余。盖不特其成败得失，有关于吾国国势之盛衰，且其因革变迁，实足以代表时代之朝流也。

光绪16年，张文襄督两广，议设铁厂，使驻英公使薛福成转请英国梯赛特厂，代为计划。然于原料之来源，矿石之性质，初未遑计也。迨机炉购定，文襄去之鄂，继任者为李翰章，颇不善其所为。文襄乃移其厂于湖北。适光绪20年，盛宣怀以所发现之大冶铁矿献之文襄，其明年文襄遂建厂于汉阳。然有铁矿而无焦炭，铁不能炼。初文襄告户部，得200万即可周转，至是用款500万，而铁未出，部中颇有违言，文襄大困。乃于光绪22年，奏请交盛宣怀招商承办，每生铁一吨，纳银一两，以为还本之用。照章程应招商股100万两，督办由商股公举，鄂督奏派。23年，盛宣怀添招股200万两，督办厂事，24年，始从德国矿师言，借德款400万马克，以经营萍乡煤矿，于是燃料有着，规模稍具焉。然文襄原定钢炉，与矿质成分不合，故所出钢轨含磷太多，为京汉铁路所拒。乃于光绪30年，以日本所预付矿石价日金300万元，建筑新厂。光绪33年告成，次年奏准组织汉冶萍公司，完全改归商办，至宣统3年，先后收股约1,000万两，而负债倍之，辛亥革命，全厂停工，盛氏出亡，经费大绌，遂有民国2年日本制铁所1,500万元之借款，预约于40年内供给日本铁矿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其价值以日本制铁所购入价值为准，并不得于国外另借他款。民国4年5月，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中，复有“此后汉冶萍公司之不得收归国有，倘该公司与日本资本家商定合办时，应即照准，又不使该公司借用日本以此之外国资本”等语。盖自有民国2年之合同，汉冶萍公司，不复能自由独立矣。近六、七年来，虽因铁价骤增，年分红利，然汉阳产额，因南北战争而屡减，大冶新厂，因欧洲大战而停顿，公司之前途，正未可遽取乐观也。

中兴公司之历史，与汉冶萍似同而实异，盖亦始于官督商办，继于借外重资，然卒以办事人之忠诚，值时会之顺利，而成今日振兴之局。溯其原起，则亦倡始于李文忠。文忠于光绪6年奏办峄县矿局，派戴华藻以2万金先办土窑，成绩颇著。至21年，因水患淹没工人300余名，为东抚秉李文所封。22年，由直督裕禄直隶矿务督办张翼派张莲芬接办，议添招德股，改名为华德中兴公司。其后德股未集，改用华股，至31年收股80万两，改名为中兴有限公司，呈部注册，34年，自修台枣支路运煤，张莲芬复辞兖洲道员，专任公司总理。弃官营业，毁家纾难，五十年来，一人而已。民国4年大井新成，忽招水祸，张君未几病殁，幸继任者善承其志，又值欧战，煤价骤增，遂获厚利。年来增加产额，添开新井。民矿中成立既以中兴为最早，成绩亦当以中兴为最著也。

欧洲战争，其影响之及于吾国矿业者，至重且大。盖战争期中，矿物金品，价值骤增。北方之业煤者，因得借以立足。中兴之成功，既已如上所言，其他如河南之六河沟，河北之怡立柳江，江苏之贾旺，安徽之烈山，无不因之而获利。六河沟煤矿，且以其余力收买临城矿务局比国之借款。

南方之金属矿，与北方之煤矿同受欧战之影响，故湖南之锑，民国3年不过值200万余元，至五、六年，殆值千万。其他如锡如水银如锌铅，产额既有增加，价值亦皆骤涨。其尤可惊异者，厥为钨矿。钨之发现，始于民国4年，至6、7年，则江西湖南广东所产几达4,000余吨，价值1,000万元。世界产钨之国，除美国外，殆以吾国为最盛。所可惜者，南方金属各矿，开采均用土法，组织初无规模。成则互争，败则瓦解，故欧战既停，销路忽滞，改革无术，失败接踵，与北方之煤矿相较，然后知新旧之不能相容，土法之不易持久也。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一九二〇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

（一）甲午战争以前（1895年以前）商办和官办工厂统计

业别	商办厂数	官办厂数	合计	商办工厂资本数（千元）	官办工厂资本数（千元）	合计	商办工厂工人数	官办工厂工人数	合计
棉纺织工业	6	4	10	1,738	4,200	5,938	10,000	12,200	22,200
缫丝工业	48	—	45	1,659	—	1,659	22,894	—	22,894
毛纺织工业	—	1	1	—	262	262	—	174	174
化学工业	14	2	12	1,600	450	2,050	3,171	400	3,571
食品工业	4	—	3	2,016	—	2,016	328	—	328
机械和五金工业	12	2	13	218	20,400	20,618	457	4,000	4,457
印刷工业	2	—	2	60	—	60	300	—	300
冶炼工业	—	2	2	—	25,000	25,000	—	3,000	3,000
铸铁	—	2	2	—	5,000	5,000	—	647	647
军械工业	—	18	18	—	120,000	120,000	—	27,000	27,000
合计	77	31	108	7,291	175,312	182,603	37,150	47,421	84,571

说明：

（一）这个表格资料来源是根据后述附录"辛亥革命前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工厂统计表"和本书第三种第一节"辛亥革命前官办工厂"汇总而来的。

（二）这里的统计是以采用动力的工厂为对象，至于有些工厂因材料关系分不清是否采用动力（如织布工厂，则以雇佣工人数30人以上者统计在内。此外，仅包括华商经营的工厂，外国在华工厂不在内，矿山也不在内。

（三）商办工厂中有一小部分的资本数和工人数不明；官办工厂中有大部分资本数和工人数不明；这些工厂的资本数和工人数是参照其规模及同类工厂加以估算的。此外，有不少工厂的工人数字都不是刚创办时的工人数，而是后来（1895年以后）所填的数字。资本数则以其初创办时的实收资本为统计原则，至于创立以后的增资或工厂所有权的变迁（如商办改为官办，官办改为商办）则没有加以统计。

（四）由于资料缺乏，特别是资本数和工人数的资料缺乏，因此这个表格的统计是不够确切和完备的，但凡是可能收集到的资料都包括在内并加以校正，估计在工厂数方面遗漏的不多，因此这个表格大体上还可以反映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情况。

（五）本表的业别分类中，棉纺织业包括轧花、棉纺织工厂；化学工业包括火柴、制造西药、造纸；食品工业包括机器碾米和机器榨油；机械工业包括机械制造和修理及造船。冶炼工业包括炼铁制钢；军械工业则包括前清官办军械火药工厂。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913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

业别	厂数	资本（千元）	工人数
纺织工业	231	32,547	157,150
食品工业	105	18,620	13,700
印刷文具工业	25	8,280	8,460
机械和五金工业	101	31,219	18,450
冶炼工业	8	28,100	7,532
化学工业	153	20,127	28,687
公用事业	38	53,700	5,640
军械工业	23	128,000	28,500
铸银钱业	5	10,000	1,447
其它	9	231	1,151
合计	698	330,824	270,717

说 明：

（一）资料来源，除根据前表"甲午战争前商办和官办工厂"外，还根据下列资料逐个工厂统计的：（1）历次"农商统计"；（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浙江、湖南、山东和山西各省；（3）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中国工厂检查年报"第一和第二期；（4）中文"世界年鉴"，第921、940页；（5）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华民国实业名鉴"；（6）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年鉴"第一、二、三各回；（7）施复侯："30年来之中国面粉业"，福新、申新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刊；（8）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工场实地调查"天津、济南、烟台、潍县各编；（9）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10）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史稿"；（11）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12）"江苏政治年鉴"；（13）"湖南年鉴"；（14）日本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满州工场名薄"；（15）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工厂名录"；（16）建设委员会："中国电气事业统计"；（17）全国经济委员会：制纸、火柴、橡胶、毛织、电器用具等调查报告；（18）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广东、天津、无锡、武进等各地经济事情；（19）本书第三种"辛亥革命前官办工业统计表"等及1913年以前之"申报"、"时报"、"中外日报"。

（二）同上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之注（二）至注（四）。

（三）由于资料缺乏，本表格只统计其开业情况，对于开业以后是否停闭则没有加以统计。

（四）业别的分类：纺织工业包括棉织、丝织、毛纺织、印染和轧花工业。食品工业包括面粉、机制碾米、机制糖、酿酒（雇佣工人50以上）、机器榨油、罐头、卷烟；印刷文具业包括印刷文具仪器；化学工业包括水泥、机制砖瓦、陶瓷、火柴、西药、肥皂、化妆品、制革和造纸；机械五金工业包括机器制造修配、五金制造、造船和铁路附设之工厂；公用事业包括电灯、自来水；冶炼工业包括炼铁、制钢、炼铅、锑、锌；其它工业包括锯木和缝纫厂等。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1920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

业别	厂数	资本（千元）	工人数
纺织工业	475	82,750	358,110
食品工业	280	63,246	43,150
印刷文具业	51	10,821	11,825
机械五金工业	252	38,885	25,720
化学工业	383	47,558	61,955
冶炼工业	12	32,150	8,990
公用事业	343	85,377	15,190
军械工业	23	128,000	28,500
铸银钱业	5	10,000	1,447
其它	35	1,833	2,735
合计	1,759	500,620	557,622

说明：

（一）资料来源同上述第二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工厂统计"。

（二）与上述第二表注（二）至注（四）同。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一九三六年以前上海二百三十八家工厂主要创办人出身调查

编者按：下列表格，其资料来源，关于工厂、设立年份和创办人是根据（一）1935年国货事业出版社编："中国国货工厂史略"；（二）农商部"农商统计"和农商部历年工厂登记；（三）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华民国实业名鉴"；（四）本书第一种第一部分"辛亥革命前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工厂一览表"和后述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和经营的各个工厂汇编而成。其主要创办人出身的资料则除根据直接调查材料外，还参考"中国国货工厂史略"，中国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中国国货工厂全貌"，上海机联会出版："工商史料"，上海征信所编："上海工商人名录"，"民国名人图鉴"，"上海百业人才小史"等书编成。

这个统计表所收集的工厂虽然是只有当时上海华商工厂的一小部分，但都是规模较大的工厂，并特地注意到收集华侨、技术人员和工人学徒出身创办的较具规模的工厂。由于当时上海是我国工业的中心，因此，这个表格是有代表性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中国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的性质。

这里所说的创办人出身，是指他还没有创办工厂以前担任的主要经历而言，同时只是统计其初创时的厂名及创办人，至于创立以后的改组更换厂名则没有加以统计。

这个表格所收集的工厂总共238家，其中做官出身或退职官僚创办的工厂计有24家；属于买办和在外商洋行担任过高级职员出身的有40家；属于流氓、牧师、和尚出身的有6家；属于商人或工厂主出身的69家；属于银钱业出身的23家；属于华侨出身的11家；属于工程师、技师、教授商店工厂职员等出身的48家；属于技工、学徒和手工业者出身的17家。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上海制炮局	1861	李鸿章	
江南制造局	1867	曾国藩	
伦章造纸厂	1891	李鸿章	
华新纺织新局	1891	唐松岩（道台）与商人合办	
华盛纱厂	1894	盛宣怀（天津海关道）与聂缉规（江海关道）等合办	
裕源纱厂	1894	朱鸿度（道台）	1894年售与日商内外棉纺织会社
大德榨油厂	1896	盛宣怀派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朱志尧设立	
裕通纱厂	1898	朱幼鸿（朱鸿度之子，浙江候补道）	1917年由刘柏森租办
阜丰面粉厂	1898	孙多森（候补道，后兼任中日实业公司买办）	
上海华商电灯公司	1904	翁子文（上海马路工程总局太守）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日晖织呢厂	1906	郑孝胥等（安徽按察使，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官商合办，1909年停闭，1919年由郭某租办，后又为刘鸿生收买改名中国毛纺织厂
龙章造纸厂	1906	庞元济（四品京堂）	清政府补助六万两
泰来元记机器面粉厂	1907	傅筱庵（中国银行监督，后又做过北洋政府财政部驻沪特派员）、盛竹书、孙衡甫（四明银行经理）等办	
利兴烟草公司	1914	包赉生(江苏省咨议局调查员，上海闸北防疫所长），原为张竹卿所创，1911年为包等接盘朱鸿仪等接办	
启明染织厂	1914	诸文琦（前清惠工部部员，江苏省立工业学校主任教员）	
利用造纸厂	1915	陈蓉轩（江苏省高等检查厅看守所所长）	
大中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19	聂云台(聂缉规之子)	1924年售予永安，改为永安第二厂
华丰纺织公司	1921	聂云台、王正廷（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钱新之(交通银行经理)等办	
中国铁工厂	1921	聂云台、荣宗敬（钱庄主）等办	
双轮牙刷公司	1921	赵铁桥(招商局督办)所创，经理为张群	
麟记电动机制造厂	1926	刘凤麟(国民党警察局教官)	
益中福记电器制造厂	1929	聂云台、黄奕住(南洋华侨、中南银行经理)等办	
上海和泰五金厂	1929	华祥勋(官僚)	
西门子床厂	1931	徐寿觉(官僚)	
同文书局	1882	徐雨之(英商宝顺洋副买办)	
源昌机器五金厂	1883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上海织布局	1890	郑官应(太古洋行买办)、奎寿图(道员)等办	
瑞纶丝厂	1894	吴仲伯(保裕保险公司买办)	
源昌机器碾米厂	1898	祝大椿字兰舫，怡和洋行买办	
华兴机器面粉厂	1900	祝大椿	
景纶纺织厂	1902	徐雨之	
求新机器造船厂	1907	朱志尧	
振华纱厂	1907	怡和洋行大班凯福和吴祥林(怡和买办)合创	
同昌纱厂	1908	朱志尧、沈仲高等办	
公益纱厂	1910	祝大椿	
同昌榨油厂	1910	朱志尧	
精益眼镜公司	1910	张士德（美商美高洋行光学部主任）	
上海砖瓦厂	1912	朱志尧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上海华商水泥公司	1920	刘鸿生（开滦买办）、朱葆三（平和等洋行买办）	
美亚织绸厂	1920	莫觞清（丝厂兼蓝壁乐洋行买办）	
中国唯一毛绒纺织厂	1919	朱葆三（平和洋行买办）、方椒伯（东陆银行经理）等创办）	
紫光电气广告社	1921	周家声（日商中兴洋行买办）	
信谊化学制药厂	1922	谢克明（德商爱理司洋行买办）、鲍国昌（怡和洋行买办）	原为德国人创办，1902年为谢、包等收买
竟成造纸厂	1923	王叔贤（王一亭之子，一亭为所谓"上海闻人"曾任日清汽船公司买办）	
三北机器厂	1923	虞洽卿（华俄道胜银行买办）	
德龙宽紧带织物厂	1923	顾海藩（洋行跑街）	
中华煤球公司	1926	刘鸿生	
江南造纸厂	1926	吴耀廷（正金银行买办）	
勤丰染织厂	1927	顾吉生（隆茂洋行买办）、李学畅（棉布商）	
久丰织绸厂	1927	胡廷光(洋行职员)	
华丰搪瓷厂	1928	刘鸿生、李拔可（日本留学生，上海水泥公司工程师）	
章华毛纺厂	1929	刘鸿生	
华品烟草公司	1929	夏巨川（花旗、大美烟公司买办）	
振兴毛绒纺织厂	1929	顾锡元（洋行职员）	
仁丰染织厂	1930	朱赓陶（天纶洋行布匹部兼会计部主任）	
大中华火柴公司	1930	刘鸿生	
天元味宝厂	1930	杨秉襄（海罗洋行买办）	
玲奋电器机械厂	1931	鲍国梁（盛京洋行买办）	
中汉玻璃厂	1932	郑锺汉（曾在陈英士处任职，永兴、协隆洋行买办）	
上海汉成电器厂	1933	郑锺汉	
天香味宝厂	1933	何维石（百利洋行买办）	原为王眉峰所创，1934年为瞿接办。
天然协记鲜味晶厂	1934	瞿永刚（美最时洋行买办）	
安眠思床垫厂	1936	张孝行（美商席梦思公司营业部主任）	
光中造纸公司	1936	虞洽卿	
中西大药房	1887	黄楚九（流氓骗子）	原为顾松泉所创，1915年为黄楚九收买。
中法大药房	1889	黄楚九	
光华炭素纸厂	1929	林志道（牧师）	
佛慈大药房	1929	太虚和尚及其弟子冯剑光等	原为李书平、余伯陶所创，1929年由太虚接办。
九福制药厂	1931	黄楚九	
正德药房	1934	黄楚九后代和陈星五所办	

厂　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　注
燮昌火柴厂	1890	叶澄衷（学徒出身，后在上海开商店）	
立大面粉厂	1909	顾馨一（永慎和、大正杂粮行股东）、王一亭等办	
上海科学仪器馆	1910	林涤庵（同丰恒记工业原料公司股东）	
申大面粉厂	1910	顾馨一	
瑞和砖瓦公司	1911	杨斯盛（商人及银行股东）、邵尔康、王一亭等办	
大有面粉厂	1912	顾馨一等	
达丰染织厂	1913	王启宇(均泰颜料号股东)	
信昌面粉厂	1914	顾馨一等	
泰康罐头食品公司	1914	乐汝成（食品店主）、庄宝康等办	
生和隆榨油厂	1915	何逢生（商人）	
华丰香皂厂	1915	陈志康（洋货店主）	
鸿裕纱厂	1916	郭子彬（上海早期鸦片商）	1918年售予永安公司改名永安第三厂
大明眼镜公司	1916	庄鸿皋(亨得利钟表公司经理)	
中华第一针织厂	1918	谢子楠（进出口商人）	
振华油漆厂	1918	王云甫（颜料号店主）、乐振葆等	
冠生园食品公司	1918	冼冠生(学徒出身，曾任食品店主）	
屈臣氏汽水公司	1919	郭唯一、翁耀衡(进出口商人)	原为英国人所创后为郭等收买。
华福制帽厂	1919	陈吉卿（洋货店主）	
合兴机器制造厂	1919	顾馨一、钱锦华	
振昌棉织厂	1919	陈顺元（百货店主）	
振丰棉织厂	1919	王莲舫（商人）	
永豫纱厂	1919	许松春（棉花商）、叶鸿英（元大、信康等钱庄股东）	
大丰纺织公司	1920	陆维镛、吴麟书（棉纱商人）	
统益纱厂	1920	吴麟书、劭耀廷、邵声涛（崇安纱号店主）等创办	
益丰搪瓷厂	1920	叶吉甫（万昌成珠宝商人）	
纬通纱厂	1921	陈玉亭(上海早期之鸦片商人)	
振泰纱厂	1921	王启宇、余葆三等	
久记木材公司	1921	张效良（杂粮行股东）、朱吟江（恰和洋行买办）等办	
中华机制纱管厂	1921	郁坤和、许松春(棉花商)等办	
穗丰豆油厂	1921	吴权生（杂粮店主）	
世界书局	1921	沈知方（中华书局经理）、毛纯卿（慎成洋纸店主）等办	
公勤铁工厂	1921	黄耕伯、顾馨一等办	
崇信纱厂	1922	邵声涛（棉纱商人）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华成机制帆布厂	1923	项学惠（蓬帆行店主）	
德和电池火漆厂	1924	周义生（商人）	
中国华成烟草公司	1924	陈楚湘（福和烟公司股东）、戴畊莘等办	
汇明电筒电池制造厂	1925	丁熊照（棉布商）	
中国亚浦耳电器厂	1926	胡西园（商人）	原为德国人所创，后为胡收买。
纬纶毛织厂	1926	黄锦扬（洋货店主）	
上海织造厂	1926	徐立民（嘉兴缫丝厂厂长）	
宝华织绸厂	1926	钱绩熙（纬成绸厂厂长）	
裕村织绸公司	1926	钱绩熙	
中国华东烟草公司	1926	黎学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售店店主）	
冠益制帽厂	1926	张静权（典当商）	
耀华电筒电池厂	1926	张承禧（米粮店主）	
中国振华电气厂	1926	张节阶（粮棉商人）	
华成电器制造厂	1927	石成章（电料店店主）	
公兴祥皮件厂	1928	陈嘉三（杂货店主）	
精大电筒电池厂	1929	贺祥生（米粮店主）	
天益毛织厂	1929	曹世炎（兴祥棉织厂曹巨卿之子）	
中国亚尔登电器制造厂	1929	夏鸿生（皮箱店主）	
傅祥记染织厂	1926	傅凤祥（进出口商人）	
太乙麦精厂	1929	王正余（棉布店店主）	
萃众烟公司	1930	王瑞麟（和兴烟公司经理）	
德余电器制造厂	1930	周义生（商人）	
亚光电木制造公司	1930	张惠康（电气技师，曾任三北机器厂厂长）	
中孚化学制造厂（颜料制造）	1932	丘彭年（汇昶钱庄股东、德昶润颜料店主）、王鹏程（豫康颜料号店主）、王作霖（复昌祥颜料店店主）	
协康橡皮制胎厂	1932	袁炳元（进出口商人）	
大东毛织驼绒厂	1932	丘信益（洋货店店主）	
上海纺织印染公司	1932	章荣初（棉布商人）	
大明火柴公司	1932	邵普修（荧昌火柴厂主邵尔康之子）	
大中华造纸公司	1934	刘行荪（纸商）、戴焕堂（纸商）	
上海经纶慎记毛织厂	1934	李傅才（洋杂货店主）	
协昌棕织地毯厂	1934	项连荪（帆布店主）	
中国毛绒纺织厂	1934	陈志廉（洋货商人）	
华成鑫记电池厂	1935	高东鑫（绸缎商人）	
中国华一工业社（电器）	1935	朱鉴麟（印刷厂股东）	
美锦腊光纸厂	1935	毛勋（纸商）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上海电池制造厂	1936	陈廷璋（电料商人）、吴玉民（钱庄职员）	
裕丰面粉厂	1904	朱斗文（大亚银行常董）	
合记教育用品社	1909	林康侯（前清秀才，新华、中华汇业银行经理）	
南阳烛皂厂	1910	张梅轩（学徒出身，曾任万生银楼经理）	原为五洲药房项绳武所创，后为张接盘。
福新第一面粉厂	1913	荣宗敬（钱庄主）	
申新纺织总公司	1916	荣宗敬（钱庄主）	
元丰恒记面粉厂	1916	荣宗敬、丁梓仁等创办	
维大纺织用品公司	1919	徐静仁、聂云台、穆藕初，李铭等创办	
合兴机器制造厂	1919	叶鸿英（钱庄主）、顾馨一、王宝仑等创办	
福新第八面粉厂	1919	荣宗敬	
宝源造纸厂	1920	刘柏森、陈光甫（上海银行总经理）	
泰山砖瓦厂	1921	钱新之（交通银行经理）、聂云台等办	
胜舶蓄电池厂	1922	魏达刚（银行职员）	
大华造纸厂	1923	叶荫三（叶鸿英之子）	原为祝兰舫所创，后为叶收买。
鼎新染织厂	1923	姚义璋（光中银行、汇大钱庄股东）	
大中华赛璐珞制造厂	1928	朱如堂（银行股东兼买办）、姜俊彦等办	
骏大油墨厂	1928	叶荫三	
中国福新烟公司	1928	丁厚卿（光华银行经理，元丰米店主）	
通明电池制造厂	1929	翁辅卿(钱庄主)	
光华印刷厂	1929	林梦周（银行职员）	
协丰益记纺织公司	1930	俞佐廷（县财政局长、天益钱庄经理、四明银行经理）、金润庠（民丰华丰纸厂经理）	
上海味中厂	1930	叶荫三	
上海灯泡厂	1933	林康侯、孙谷臣（同仁昌鱼行店主）等创办	
裕华化学工业厂（肥皂）	1934	梁嵩龄（上海工商银行襄理）	
上海广生行化妆品公司	1903	林炜南（华侨）	
南洋兄弟烟公司	1905	简照南（南洋华侨）	
上海畜植牛奶公司	1916	马应彪（华侨）	
永安纺织有限公司	1916	郭乐、郭顺兄弟（澳洲华侨）	
中国内衣染织厂	1920	黄鸿钧（美国华侨，曾任慎昌洋行、宝成纱厂工程师）	
中华国民制糖厂	1921	马玉山（英国华侨）、劳敬修（泰和洋行买办）等办	
关勒铭自来水笔厂	1926	关伟林（美国华侨）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大中华橡胶厂	1928	余芝卿（留日华侨）、薛福基（留日学生）等办	
广东兄弟橡胶厂上海分厂	1929	丁凤墀（南洋华侨）	
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	1933	马宝山（马宝山之弟）	
华菲烟公司	1935	林书宴（菲律宾华侨）、李清泉（菲律宾华侨）	
中国化学工业社	1911	方液仙（技术人员）	
中华书局	1913	陆费逵（报馆主笔）、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中国蓄电池制造厂	1914	胡国光（电报局职员）	
开林油漆厂	1915	周元泰（机械化学工程师）	
德大纱厂	1915	穆藕初兄弟（学徒出身，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办过改良棉业试验场）	
家庭工业社	1917	陈蝶仙（报馆主笔）	
厚生纱厂	1918	薛宝润、穆藕初	
华通电业机器厂	1918	姚德甫（上海英工部局电气技师）、王庆余等办	
浦东电灯公司	1919	童世亨（日本留学生），地舆学者，南京电灯厂厂长）	
铸丰搪瓷厂	1919	童世亨	原为美商经营，后为童收买。
中华珐琅厂	1919	方膺（中华职业学校教职员）	
上海炽昌制胶厂	1921	吴蕴初（汉冶萍化验师）	
馥茂化妆品厂	1921	翁荣炳（肥皂厂技师）	
康元制罐厂	1922	项康元（孤儿院教职员，冯玉祥部下做过运输工作）	
民生纺织公司	1922	史量才（申报馆主笔）、徐采丞等办	
天厨味精厂	1923	吴蕴初、张云逸（酱园主）	为张云逸出资经营，吴担任技术工作，张死后归吴独营
王志记袜厂	1924	王志香（袜厂技师）	
绍敦电机制造厂	1924	蔡叔厚（纱厂技师）	
中华铁工厂	1925	张立颜、傅守朴（二人都是中华职业学校教职员）	
中国大东烟草公司	1925	孙立山（南洋烟公司营业处主任）	
永固油漆厂	1926	陈次平、陈广顺、沈慈辉（三人都是金陵大学同学，陈广顺与沈曾留学美国，学技术）	
鸿发仁记毛纺织厂	1926	蔡瑞卿（日晖制呢厂技师）	
新亚化学制药厂	1926	许冠群（会计师）	
新中华实业社（化妆品）	1927	李龙渊（上海工部局化验师）	
中国钮扣厂	1927	郑坤秀（上海电力公司技师）	
于飞电池厂	1928	饶于飞（青浦县监狱工厂电池部技师）	
永丰文记五金电器厂	1928	刘继文（兵工厂技师）	

厂　　　　　　　名	设立年份	主　要　创　办　人	备　　　　注
环球铁工厂	1928	王宛卿(留日学生，上海兵工厂技师)	
新业机器公司	1928	李云泰(浙江大学教授)	
光中染织厂	1929	张迭生(鸿章染织厂工程师)	
普球实业社(灭火机)	1929	吴明之(益利汽水厂技师兼经理)	
华德电泡厂	1929	唐兆熊、李庆祥(美商奇异安迪生电气厂技师)	
中央香皂厂	1929	李北海(中国针织厂职员)翁荣炳(美丰肥皂厂技师)等办	
上海机器厂	1930	颜耀秋(商务印书馆技师)、毛毅可(兵工署职员)等办	
平安实业工厂(灭火机)	1930	张仲杰(震旦机器厂技师)	
国民帆布厂	1930	穆铭三(兵工厂职员)	
中国制钉公司	1931	颜伯威、钱祥标(留美学生，中央大学教授)	
天原电化厂	1931	吴蕴初	
大上海轧发刀剪厂	1932	吴伯生(留日学生，曾在日本工厂任技师)	
合众电器公司	1932	俞庆鹿(交通大学教授、电报局工程师)	
天成玻璃厂	1932	陈永富(学徒出身，曾任滋康玻璃厂技师)	
中一胶带厂	1933	穆铭三	
大鑫钢铁厂	1933	方积蕃、余名钰(留美学生，做过县长，到江西等地开过矿)	
新光内衣织造厂	1933	傅良骏(技工出身，曾任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职员)	
振丰电器制造厂	1933	牟子宽(同茂电料行职员)	
中国农产化学制造厂(酱料)	1933	沈紫岩(大学教授)	
中国铅笔厂	1934	吴羹梅(日本留学生，曾在日本工厂实习)	
无敌香皂厂	1934	翁荣炳(肥皂厂技师)	
商务印书馆	1897	夏粹芳、鲍咸昌(印刷工人出身)	
大隆机器厂	1902	严裕棠(铁匠出身)	
五洲大药房	1907	夏粹芳、项松茂	
梁新记兄弟牙刷公司	1908	梁日新兄弟(牙刷手工业者)	
森林藤柳器厂	1914	吴春泉(义生昌藤器店学徒出身)	
华生电器厂	1916	杨济川(棉布店管帐)、叶友才(洋行管帐)	实际出资人为祝兰舫(电灯厂主，扬子保险公司经理)
新民机器厂	1921	胡厥文(汉阳铁工厂技工)	
第一牌牙刷公司	1925	尹而百(牙刷作坊工人出身)	原名日光牙刷，尹接办后改现名

厂名	设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新中工程公司	1925	文秉渊（慎昌洋行技工）张延祥（久胜洋行技工）魏如（慎昌洋行技工）等办	
金城工艺社（图画颜料）	1926	黄菊森（粮店学徒出身）	
国华化学工业厂（电池）	1929	叶友才、丘馥棠	
正兴电筒电池厂	1928	王洪正（鸿泰机器厂工人出身）	
民生橡皮厂	1931	张佑民（科发药房技师）、唐和衷（进出口洋行练习生）	
中华国瑞瓦斯总行	1931	罗国瑞（技工出身）	
三友制革厂	1933	徐福明，茹德胜、陈如林（三人都是制革厂技工）	
裕康新记铁厂	1934	傅隆才（该厂为其父所创，其父是学徒出身）	
福华玻璃厂	1936	张继芳（中华凤记玻璃厂学徒）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商办工厂资本与封建官僚的各种关系示例

1896——1909年

厂　　名	设立年代	资本（千元）	资本关系
宁波通久源纱厂	1896	420	创办人严信厚曾为李鸿章幕僚，任长芦盐务时积资百万；除本人资本外，还有宁波富绅股份。
杭州通益公纱厂	1897	533	高凤德经理．高为李鸿章所赏识．此厂有李鸿章私股甚多。
无锡业勤纱厂	1897	336	杨宗瀚创办，杨与张之洞、刘坤一关系密切，曾通过刘坤一借领苏省积谷公款十万两。
上海阜丰面粉厂	1898	420	系清政府大学士孙家鼐之家属所创办。孙系投资的企业，尚有启新水泥厂、滦州煤矿及通丰面粉厂等。
上海同昌油厂	1899	130	创办人朱志尧曾为买办，与盛宣怀有关系。此厂系盛宣怀交办，内可能有盛私股。
南通大生纱厂	1899	699	创办人张謇，系翰林院编修，与张之洞、刘坤一关系密切。该厂设备系领用官机。
唐山启新水泥厂	1900	1,000	本年由周学熙招商接办，周曾任清政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与袁世凯关系密切。
汉口既济水电厂	1902	3,000	创办人王予坊，曾为张之洞幕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此厂系在张的"倡导"下创办。
北京纸烟厂	1905	70	创办人周锡璋为工部郎中。工厂地基，由工艺官局拨建。
醴陵瓷业公司	1906	100	候选道熊希龄等创办，每年由度支部补助银一万两。
博山玻璃厂	1907	1,399	创办人顾思远与山东巡抚胡廷干有密切关系，内有官股。
京师自来水公司	1908	3,000	周学熙招商股创办，由农工商部保息，所需一切材料，准予免税。
安阳广益纱厂	1909	699	商人马希援创办，内有孙家鼐家族私股，孙曾官清政府大学士。

资料来源：本书根据本节材料编制。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反映的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依赖

（一）对封建主义的依赖

〔1920年张謇呈天生港设立通燧火柴公司准予备案文〕 南通工业，除纺织、面粉、棉油、制酒、铁工厂外，民国七年，就天生港地方，组设通燧火柴公司，招集资本。……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创办时，呈明商部准许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之案，兹于本月通燧特开股东大会议决，拟请援照大生纺织公司成案，亦以百里之间二十年内为限。……再，本县本年并于该处设立电气及苏达二厂，一俟工程过半，亦拟援案呈请于百里以内，为限制他厂营业，以资保护。（九录，实业录，卷6，页7—8。）

〔1904年江西机器造纸公司集股章程〕 第五条：禀准大宪立案，自开办之日起专利十年内，不许他人在本省地界再设本项机器。所造各粗细纸，暂行豁免厘税，俟试办三年，如果著有成效，然后照章抽收。其厂中应用之机器、药料，诸关造纸所用，凡竹、木、草料、败絮、旧布各项原料，验有本公司护票，各关卡一律放行，永不抽收厘税。（东方，1年6期，实业，页61，1904年6月。）

〔编者按：江西机器造纸公司资本为300,000两，内拨有官股50,000两。〕

（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资产阶级言论中所反映的华商对外商"保护"的要求

一铁路而华人办之不能成，有洋商出面而成矣；一矿务而华人办之不能成，有洋商出面而成矣；一内河行轮者华人办之不能成，有洋商出面而成矣。今日中国路矿公司，非美商即英商，非德商即日商，至于内河行轮从前华官阻之不能行者，今外人皆一一占其利矣。凡此之类，其间非无华商之股分，然不过十之三，而此十之三，不附于洋股，亦必不能成。即全系华商股分，而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若夫洋商出面，则不然，先由领事照会督抚，不成则由钦差照会外交部，不成则由该国外部照会中国政府，不成则遇有外务，夹入条约中为特别之利益，可省一切上下之需索。（华务洋务办，新辑时务汇通，卷78，页10。）

〔福建〕厦门一岛，中国商家挂洋牌者，指不胜屈。兹仅将其有向海关报进出口税者，调查如左，其余小经纪之挂洋牌者，尚不计也。

挂美商者：十家； 挂英商者：五十三家；
挂荷商者：九家； 挂德商者：二家；
挂法商者：二家； 挂日商者：二百三十九家；
挂西班牙商者：二十四家； 挂葡商者：一家。

以上共计三百四十家。而以中国商之牌号向海关报税者，只有寿世堂药房一家，亦可谓硕果仅存矣。（时报，1906年2月28日。）

四川火柴厂联合外厂垄断火柴市场

〔四川〕省内开设有九家火柴厂，其中有六家在重庆。有两家是日本公司，有一家是德国的。所有的火柴都由华洋统销公司经手，它属于贩卖辛笛加的一类，在1905年从劝业道那里取得了25年专卖权。每一个火柴厂的生产一年都限定了一个固定的数目。（报告，1902—1911年，重庆口，页269。）

上海纱厂在华洋一体待遇下要求减免税负

1891年上海只有两个纱厂开工运转，其中一个就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这个工厂是几年以前组织起来的。但是因为他们半官方管理者的政策，一直到1890年才开始纺纱织布。另一个厂是机器纺纱局，是一批中国商人组织起来的，在1891年开工。起始两三年中，这两个工厂是赚钱的，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宣布有25%的红利。这自然就吸引资本投到这个工业发展的部门中来。1893年9月，上海机器织布局遭了火灾，不复存在了。不过因为创办时它的发起人和北京政府有密切关系，取得了10年的纺织专利权，所以这厂烧毁后，由李鸿章、盛宣怀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华盛纺织总局，除了它的既得的专利权还没有同其他物质上的财产一起转给华盛厂外，旧的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通过上述两位大员的手腕，以这种专利权为借口，组成了纺织稽查公所。此后，其他各厂所生产的纱，每包要征收一两银子的捐税，并且或多或少地管制着所有的厂商，例如对于他们的原料与产品的通过海关，和在经营过程中与政府或官吏接洽谈判等。这个公所的洋帮办就是丹科氏，他设计和监督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工厂同华盛厂纺织总局新厂，并且从纺纱业刚在上海产生时就和它发生了联系。和他一起办事的是华总办盛宣怀。

华盛厂在1894年开工了，有750台织机和65,000枚纱锭。同年，裕源纱厂也开工，有25,000枚纱锭。下年，又开设了两个厂，大纯纱厂（这是单纯纺纱的厂）和裕晋纱厂。直到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时，这些工厂还继续付给纺织稽查公所每包一两的捐税。虽然他们付出捐税，他们投资所得的利润仍足以吸引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以直接准许外人在中国开设工厂（马关条约第6条第4款）。从此以后，当外国工厂开工并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货物时，他们不纳税，也不承认纺织稽查公所的权力，认为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的工厂也就不再纳税了。从此，这个公所就干脆取消，变得没有什么作用了。（报告，1892—1901年，上海口，页513—514。）

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受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一)封建主义的压迫

1．阻碍工业产品流通的各种税负

(1)矿税

中国矿产所课之税不一，分列如次：

(一)海关税(复进口税亦隶此类)：抽出口货值百分之五。

(二)常关税：一次缴纳货值之百分之一又二分之一之通行税。

(三)厘金：随卡随货而异其税率，可谓全出于税吏之私意。

(四)矿产税：交纳出井矿税，其数如下：

一、凡煤炭每吨纳银一钱；

二、铁苗每吨纳银一钱；

三、凡此矿专系黄金或白金或银，按照市价，抽取百分之十；

四、凡他项矿质中，含有黄金或白金或银，其成数多少无定，应临时查其所得金、银实数，按照市价，抽取百分之五；

五、凡汞苗与锡苗及铜苗，按其价值，抽取百分之三。

(五)矿区税：所领之矿地，应按年遵照下开各条纳矿界租：……

一、按〔大清矿务章程〕第十一款丙字〔编者按：指锑、钾、铋、镉、铬、钴、金、铱、铁、铅、锰、汞、钼、镍、铢、铂、银、锡、铀、锌、软石油、矿油类、地沥青、柏油、硬煤、烟煤、木煤、硫磺、宝石〕除金、铂、银、宝石外，其余各矿质，按年每一矿界缴租银三两，合每亩银二钱；

二、金、铂、银、宝石各矿，按年每一矿界缴租银四两五钱，合每亩银三钱；

三、〔略〕；

四、此项矿界年租，乃在地面钱粮之外。

(六)地税〔略〕。

(七)杂税：以省税、地方税为多。(中国矿业论，页202——205；大清矿务章程，页19——20。)

〔编者按：大清矿务章程系光绪32年10月批准，次年2月施行。所订矿区税及矿产税，与前数次章程无多改变，但各省并不完全遵行，额外征收者甚多，可参阅其他各条资料。〕

〔大清矿务章程第十一款〕〔丙字类所载各矿〕所得矿利，除开支一切用费外，净存余利，业主应得十成之二五，国家酌提十成之二五，矿商应得十成之五。(大清矿务章程，

页11。）

〔**光绪25年2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再，徐州铜山县境所产煤、铁，光绪八年间招商集资，设局开采，出煤尚旺，迭经前督臣奏请减轻税厘，疏通转运在案。递年以来，承办之员屡经更替，经臣设法招徕，复遴委广东候补知府吴惇荫鸠集商股，前往接办，重经觅得新洞，所出皆系烟煤，颇合轮船、机厂之用。近来上海制造局厂林立，需煤益多，洋商垄断居奇，价值翔贵。徐煤运沪，水陆千里，搬运维艰，除完正、半税项，再纳沿途厘捐，合之运费成本已重，抵沪销售，难敌洋煤。（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30，页32。）

〔**光绪31年商部奏**〕本部于光绪三十年二月奏定矿务章程第三十四条内开：矿产出井，视品类之贵贱，以别税则之重轻；第三十五条内开：矿产出口，关税仍照税关章程征收，纳此税后，其内地厘卡，概不重征等语，原系于国家抽收经费之中，仍寓体恤华商之意。……各省所收厘税，未尽遵照定章，往往于出井、出口两项外，借词加征。即如山东峄县之华德中兴煤矿公司，自光绪二十四年归盐运司张莲芬接办之后，每煤一吨，在山东、淮关两处，统共纳税厘银二钱七分，系在臣部未设以前，遵照路矿总局章程，参以开平煤矿成案办理。核其数目，已较臣部定章每吨溢收银二分，而江省督抚，复据宁、苏、沪各厘局议详，拟征落地厘金每吨一钱。臣部近接山东巡抚咨称：据张莲芬禀，各处厘金分局声称，现奉总局饬收峄煤落地捐项，纷纷哓舌，峄煤销数因之大减。又山西阳曲县之王封山磺矿，本年〔1905年〕七月经臣部批准，由湖南试用道刘笃敬开办，一切按照部章办理，而晋抚以该道原定章程，有出矿之后，每斤完纳厘钱六文之语，不得渎请邀免。当经臣部驳令仍照矿章于完纳出井、出口税后，概不重征，以归划一。而晋抚来咨，仍以晋省无常、洋各关，此项矿斤，并不经由关口，毫无关税可收，自无重迭征收之虑，且磺较煤、铁获利倍饶，矿产免厘，应请俟之商约加税免厘通行以后为词。不知臣部奏定矿章，原有抽纳出井税之条，矿产一经出井，即须纳税，本省〔山西〕不虑无税可收，内地行省，未设常、洋各关者甚多，若皆引此为词，则部章几同虚设。……明知各省库藏支绌，在各疆臣注兹挹彼，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奏定章程，自宜一律遵守。且查长江一带，向销英、日焦煤，山东则多用德煤，洋煤之税既轻，华商之力又薄，相形之下，不足抵制。为丛驱雀，尤可隐忧。相应请旨饬下各省将军、督抚，一体遵照，无论所属矿地禀请开办在臣部定章先后，不得于奏定章程完纳出口税外，别有征收，以恤商艰，而昭定制。（东方，3年4期，财政，页39—41，1906年4月。）

查〔山〕东省稽征煤税，多寡有无，不能一律。如峄县中兴煤矿，系经前北洋大臣裕〔裕禄〕奏明，每煤一吨，征出井税银一钱，另征厘捐银五分。此外各州县土法开采之小矿，出煤一吨，征出井税银一钱，并无厘捐。至坊子、马庄等处，均洋矿，虽出产富饶，然须按照胶澳条约办理，光绪二十九年经外务部咨，免征出井税有案。（财政说明书，山东省，杂税，页5。）

〔**宣统元年3月29日邮传部奏**〕再，开矿成本，以厘税、运价及出井各项费用为大宗，欲图矿产畅销，自应设法减轻各费。铁路减收运价，臣部已于本日议复山西抚臣宝棻、御史徐定超请减运费折内详晰奏陈，至厘税重迭，阻碍运输，实较之运价加增，为害尤甚。此次徐定超原奏，即以煤斤厘税过重为言，内称有出井税、有学堂捐、又有沿途税关，剥削滋多等语。查山西巡抚宝棻奏请免出井、出口煤税一折，钦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皇恩广大，薄海同钦。夫铁路行车有费，修养有费，拔本还息有费，尚不惜捐实议减；而各处税厘重迭，阻碍运输。上年十一月据山西巡抚电称，将外运之出井税并入出境捐，

并收照章出井、出境捐税，每车应抽钱三千六百文，因减收三千文等语，此次奏请免出井口煤税，未知是否指此三千文而言。又，晋煤由晋运津，获鹿县每车收捐银元四元，直、豫货捐，天津关税厘金，每车可收银元九元。又，本年二月，直隶新增琉璃河货捐局，西山硬煤因此停运数日。捐税愈繁，于振兴煤矿之本意愈形凿枘，应请敕下沿路各督、抚，分别切实裁减，以维商务，实与路、矿均有裨益。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华制存考，宣统元年3月29日，页45——46。）

〔**光绪21年10月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查漠厂余利按十成分派，以三成提充军饷。当此库款奇绌，应令设法多提，借济饷需。臣饬周冕劝谕众商，照现请开办三姓金矿章程，将矿利分作十二成，内以五成充饷。该商等具有天良，当无不竭诚以伸报效。（东华续录，光绪，卷130，页8。）

〔**光绪25年2月12日总署奏**〕查漠河矿章，先将局厂各项费用开销，所得余利作为二十成，以六成报充军饷，以四成分给员司花红，以十成派给股商利息。嗣光绪二十二年间，经查办事件大臣延茂改定新章，漠河金厂所得金砂余利，先提六成作为军饷，下余四成作为局用股利；观音山金厂所得金砂，余利先提八成作为军饷，下余二成作为局用，奏明在案。兹据督办漠河等处矿务道员徐杰禀称：“漠河每年用款，现经极力裁汰，实约需银十七、八万两。入款全赖金砂，自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每年得金均不过二万余两，惟二十一年得金五万两零，然亦仅此一年，迨二十二年仍仅二万余两，至二十四年尤为减色，以入款与出款相衡，不敷显然。拟请将新章酌量变通，每年所得余利，除开销一切局用外，结存若干，再按十成计算，观音山仍以八成充饷，漠河仍以六成充饷，下余观厂二成，漠厂四成，作为股商余利，员司花红。似此办法，较之现行新章军饷少得有限，而视旧章仍不啻加倍。且局用、股利、花红均有所出，矿务赖以维持，不至终于堕废”等情前来。查漠河新章，以最旺之年为衡，提饷过多，入不敷出，亏累势所必然。……现今北洋大臣裕禄揆时度势，请予变通，自应请旨准如所拟办理，以保国课而恤商艰。

奉旨：依议。（光绪政要，抄件，实业2。）

〔**光绪22年8月热河都统寿荫奏**〕为查明热河矿务并现办情形：……钦奉谕旨：访查金、银矿地，设法兴办，以供国用等因。钦此。遵查热河矿务，招商采办，始自咸丰三年，当经奏定章程，尽采尽解，并无定额。每得沙炼银一两，以十成计算，以三成为正课，以三分为耗银，以一分为解费，余银归商工本。矿苗丰旺，加增定额；沙线隐闭，奏明封禁。其蒙古地方各矿，得银亦按十成计算，系以二成五分为正课，三分五厘为耗银，一分五厘为解费，一成为蒙旗抽分。如矿系民地，按亩给予地价，蒙古地亩则给抽分。民矿设局招商，由热河道给照详明都统核办；蒙古旗分之矿，由各该旗自行招商，呈明都统给照升课。民矿课银，解交热河道衙门兑收，听候拨用。蒙古矿课，解交都统衙门兑收，就近抵拨兵饷。年终统归都统奏销。其金矿系由商人易换银两，照章纳课，铜、铅各矿，抽收课耗，派员解交户部兑收。余铜、余铅，官为收买，并解部库。此系热河矿务例章，历久遵行在案。先年开采之矿，如承德府属之遍山线、窑沟等处银矿，平泉州属之锡蜡片银矿、银洞子沟铜矿，丰宁县属之牛圈子沟银、铅并出之矿，喀拉沁王旗土槽子、罗圈沟、蒙古银矿，喀拉沁中旗蒙古金矿，均经先后奏明升课。嗣因洞老山空，或商力未逮，陆续奏明封禁。仅有遍山线、土槽子两处升课银矿，前因商力不支，经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员前来接办，照依旧章，按年纳课，曾经奏明立案。此外尚有补用道徐润请开平泉州属之转山子、建昌县属之金厂沟梁，候补道李

宗岱渊开滦平县之宽沟、丰宁县之大营子等处金矿，均因出沙不旺，尚未具报升课，并有翁牛特王旗呈报开采该旗之红花沟、水泉子沟、拐棒沟等处金矿，机器尚未运到，已经奴才札饬催令赶紧兴工开采。奴才于钦奉谕旨后，即分饬所属及蒙古各旗，钦遵办理。并派委热河道湍多布为督办，承德府福谦为帮办，候补知县缪桂荣为总办，令其广为踹勘，无论金、银，凡有可采之区，迅速呈明开采。其奴才衙门经理矿务奏咨事宜，以及稽核矿课，仍照旧章责成理刑司司员认真经理，以昭详慎。兹据热河道湍多布，转据总办委员缪桂荣，以勘得建昌县属各里各并与宁连界双山子，朝阳县属之五家子等处金矿，均可开采，详请核办前来。现当库款支绌，既有可采之区，自应即时兴办，期收实效，而广利源。除现在升课之遍山线、土槽子，暨已经呈明开办各矿，照依旧章另行办理外，所有各里各、双山子、五家子等处金矿，即由该道府责成总办委员缪桂荣，广招商贾，多集资本，刻期兴工，认真采办；奴才仍不时催查，予限一年之内，即行照章奏明升课。至热河地方煤矿，向系奏明办理，由热河道给照，按年纳课。其已经领照纳课之矿，毋庸再行查办，凡有可开之煤矿，一并踹勘试办。除分饬遵办，并催饬所属及各蒙旗上紧查勘，无论何矿，凡有可采之区，迅速招商，呈明采办外，所有现办矿务情形，理合恭折具陈。（谕折汇存，光绪22年8月15日，页14—16。）

〔**光绪24年10月2日热河都统寿荫奏**〕查热河所属各矿，除土槽子、遍山线已经奴才于去岁委员查勘，饬令于每年应交课款等项之外酌加四成，由光绪二十三年正月起，照数征收题报。此外仅有候补道徐润报开之金厂沟梁，热河与直隶合办之双山子二处，现已升课。金厂沟梁前奏明白，自开采起至光绪二十二年底止，除开支各项外，仅结存银八千四百九十三两八钱七分九厘，声明作为旧管，列入下届接算外，其自二十三年正月起饬令照章升课，至是年四月底作一结，除开支各项用费金价外，共计余银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两四钱一分三厘。按照奴才前经奏定新章，每余银若干统按二十四股计算，以十股升课，以十股归股票，余利以四股作为员司花红，计应得正课行平银八千一百三十三两八分八厘七毫五丝，每两折合库平银九钱六分八厘，共合库平银七千八百七十三两八钱二分五厘九毫一丝。遂饬将下结赶紧算清呈报。去后，复于七月初七日据该道徐润等禀称，已将自二十三年五月起至十二月底止下届核算清楚，并前呈旧管统计结存余行平银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三两四钱四分八厘，按照二十四股分摊，以十股正课计算，应解行平银七千二百八十两六钱三厘，每两折合库平银九钱六分八厘，共折合库平银七千四百七两六钱二分三厘七毫四忽。统计先后共收到库平银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两零四钱五分三厘六毫一丝四忽，均已照数呈解奴才衙门查收存库，听候部拨。……

据候补道徐润、候补知县缪桂荣禀称：奉委会办双山子金矿，现已开办年余，即应照章纳课。第该处系属初办，工费较巨，现在竭力筹画，樽节办理。计自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开办起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底止，除开销金价及建置房屋、器具、薪工、利息等项外，通盘核算，计结存余行平银九千八百五十九两一钱六分八厘，照奏定二十四股章程以十股升课计，应收行平银四千一百七两九钱八分七厘，每两按九钱六分四厘折合库平银三千九百六十两九分九厘三毫六丝八忽。该矿系与直隶合办，当准直隶总督臣荣禄咨会，此项课银各一半解归奴才衙门，听候拨用，一半解归天津海防支应局兑收。

又，热河各属煤窑，向章每逢报开一处，历年上交课银五两。热河所属共计煤窑二十余处，每年计征收课银一百一十余两。而各商所得抽分不啻倍蓰，更兼借端影射，官吏剥削，种种弊窦，不胜枚举。于二十三年春间，经奴才奏明派员查办，化私归官，当派委候补知县缪桂荣、试用巡检苏鼎铭，分往查勘，并饬妥为办理。该商等初犹借口违抗，继经该委员等详

加开导，晓以大义，喻以时事，并从优议给商人抽分养赡，始皆悦服。惟各处情形不同，销售亦异，或因路远价廉，或因丰减靡常，当就各处情形，酌定抽分。缘口外煤窑，向系窑户采挖出售，商人坐受其利，应概予革除。第念该商等抽收日久，户口众多，舍此无以为生，当由该商等所得抽分一成之中，酌减四、五分不等，余仍归其养赡。复于售主煤价之外，稍增一成或五、七分不等，将增减之成数，作为官收抽分；并饬将前领帖照缴销，另发新照收执。如此办理，不特商无所苦，课款从此可归实济。现在该局均已乐从，具结遵办。按热河所属煤窑，通盘核计，每年约可缴收抽分银一万二千两，较之从前每窑历年征收课银五两之数，不啻增益百倍。惟每窑于议定抽分之后，必须派设员司人役，每日稽查征收，所有添修房屋，置备器具，一切初办，所费甚巨，因无项可筹，当由所抽分内先行拨用。计自奏明陆续开办起，结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底止，除开支蒙古各旗山分并修建各窑局所房间、器具、员司薪水、夫役工食、查勘路费等项外，计结存库平银六千六百三十八两零五厘四毫三丝五忽四微，拟请作为旧管，以前需用，免其报销。自六月初一日起，以后常年所收抽分，每届年终奏报一次，并造册咨送户部暨统辖矿务总局查核。（奏议辑览初编，卷13，页31—36。）

〔**光绪28年8月3日热河都统色楞额奏**〕为征收热河各属煤窑抽分银两数目：……查热河各属煤窑，于光绪二十三年经前任都统宗室寿荫奏明化私归官，各就地方情形，酌定抽分，派员征收。嗣因委员征收，耗费过重，徒有增课之名，而无裕饷之实，复经奏请，拟照各窑所出煤斤数目核计，约收课银若干，招商包办，分限交纳，毋庸派员征收，以节经费。每届半年一结，由总局派人分往查勘，如出煤丰旺，即于下届酌加课数，倘出煤微细，亦于下届量为核减。……查自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起，至二十八年六月底止，共计征收各属煤窑抽分库平银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六两。（谕折汇存，光绪28年8月3日，页17—18。）

〔**光绪28年8月3日热河都统色楞额奏**〕为征收热河所属金、银各矿课银数目：……查光绪二十二年钦奉谕旨：访查金、银矿地，设法兴办，以供国用等因。钦此。当经前任都统宗室寿荫督饬委员，分往踹勘，招商兴办，照章升课。嗣因课款过重，所出不抵所费，人皆退缩不前，复经奏请，金矿每出金百两，收课金六两；银矿每出银百两，收课银八两；无论所出多寡，均按出数计算。……截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底止，除旧有银矿土槽子、遍山线外，其先后据报升课者，仅有丰宁县属之宽沟、滦平县属之桑园、平泉州属之密云乡金矿，承德府属之庞家沟银矿；其余各矿，或系甫经开采，或因未获正线，均未据报升课，已督饬各矿员司，认真经理，期早升课，以济饷需各在案。兹查截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底止，旧管实存库平银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三两六钱二分三厘一毫二丝。由是年十月起至二十八年六月底止，除土槽子、遍山线所征课银另有报销外，其丰宁县属之宽沟、滦平县属之桑园等处金矿，据报共计出金四百四十七两四钱七分四厘六毫，每百两照章抽课六两，共抽课金二十六两八钱四分八厘四毫七丝六忽，每两照时价三十二、三换不等，共合库平银八百七十二两五钱七分五厘四毫七丝。又，平泉州属密云乡金矿，共计出金一百八十三两七钱七分四厘四毫六丝，每百两照章抽课金六两，共抽课金十一两零二分六厘四毫六丝七忽六微，每两照时价三十二、三换不等，共合库平银三百五十八两三钱六分零一毫九丝七忽。又，承德府属庞家沟银矿，共出银八万七千六百两零二钱五分，每百两照章抽课银八两，共抽库平银六千六百八十八两零二分。以上三处，统共征收库平课银七千九百一十八两九钱五分五厘六毫六丝七忽，内除提收二成局用库平银一千五百八十三两七钱九分一厘一毫三丝三忽四微，计实收正课库平银六千三百三十五两一钱六分四厘五毫三丝三忽六微。内除抵拨热河驻防练饷库平银三千两外，实

存库平银三千三百三十五两一钱六分四厘五毫三丝三忽六微。（谕折汇存，光绪28年8月3日，页21—22。）

〔光绪29年3月28日热河都统锡良奏〕光绪十三年经直隶督臣李鸿章，饬派候补道朱其诏前来接办。……迨朱其诏卸办后，由江苏候补道徐润接办，旋又并归督办路矿大臣张翼经理。……光绪二十三年，前都统寿荫奏请按照现征课银数目，酌加四成，遍山线每年亦便交银一千零一十余两，土槽子交银四百二十余两。奴才到任后，整理各矿务，查悉从前所定每银百两征课银三十五两及三十两，均因课款过重，转滋隐漏之弊，殊属有名无实。随即派员往查，一面咨商督办路矿大臣张翼，旋准复称，拟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为始，应交课银均照热河奏定章程，每银百两征课银八两，由奴才派员驻厂监收，仍照章尽征尽解。自本年正月起至二月底止，两厂共征课银五百二十四两三钱三分零九毫二丝八忽，已据按章解交求治局兑收。计两月所收课银，较之从前通年课数，已将及十成之四，以后果能杜绝隐漏，每年约可增银数千两，所收银两归于征收热河金银各矿课银数目案内，汇同奏报，仍照章提出局用二成，以资办公，并请照章免其报销。其蒙境土槽子银矿，喀拉沁王旗应得山分，历年该厂仅交银一百二十四两零，奴才酌中拟定，饬由该厂每年径交该王旗抽分银二百两，亦较前数加增。（谕折汇存，光绪29年3月28日，页24—25。）

〔宣统元年2月23日热河都统廷杰奏〕奴才于光绪三十一年莅任，即以振兴矿政为要图，兼以整顿税课为急务。当经遴派熟悉矿务之分省试用县丞李宗元为求治局矿务科员，嗣准农工商部奏设矿政调查局，当咨明将该局附设求治局办理，以节经费，即派该员为顾问官，仍由奴才督饬认真经理，竭力整顿。该员膺差后，提倡招徕，不遗余力，厘奸剔弊，任怨任劳，商民信服，报矿日增，因之矿课日有起色。查热河矿课收数，以光绪三十一年为最旺之年，征银二万四千余两；迨至三十二年，即征银三万三千余两，三十三年征银二万八千余两，三十四年共征银六万一千余两。以光绪三十二、三两年比较，最旺之年溢征已将至半倍，迨三十四年递征至一倍以上。热河两府一州，夙称瘠隘之地，该员膺委三年，逐年递增，收数竟至十二万两有奇，官办各矿所收金价一万四千两尚不在内。（华制存考，宣统元年2月23日，页2—3。）

言锡矿，则云南亦最著名，每贩锡一票（二千五百斤），向章于矿户项下随抽课厘等十一两，厘金十六两。至光绪三十年，于原纳课银外，每票加抽银五十两，宣统元年复加抽铁路经费银五十两。锡课之重，亦略见一斑矣。（经济杂志，1年4期，论说，页18，1912年12月。）

清代华商矿冶所赋杂税，可举一例以明之。云南个旧之锡矿，均按纯锡征税，惟间有按苗价僅取百分之二，以供修筑道路费者。纯锡每庄（约一又三分之二吨）应有税单二纸，一名课税，其式如下：

常备军饷，	库平六十九两；
北京学生津贴，	库平一两八钱；
照费，	库平四锹（钱）。

第二纸如左：

厘金，	库平十六两。

地方税：

太平会，	市平一两；

秤费，	市平一两；
岳庙，	库平五两。

末三项本为九种小税，自一九〇五年始并成三税。（中国矿业论，页214。）

（2）其他各种工业税

直隶……唐山洋灰公司所制洋灰，行销各埠，应征税银，前经津海关墨税司酌定按照进口洋灰每桶重三百斤，征收税银一钱五分，以归一律，业经详奉直督批准并分别移行在案。近该公司以所制洋灰前售京张铁路在丰台交货，每两袋合为一桶，价洋四元，内除付火车运脚，实得灰价仅三元五角三分，再除麻袋价五角，仅三元零三分，合关平银不过二两；今定每桶重三百斤，估价三两，核收税银一钱五分，较诸现在售价已觉太重，将来新厂出灰增多，更须减价出售，尤恐本随税加，有碍销路。且外洋进口之灰，其税项系连桶在内，本公司则袋桶均已另行纳税，似应分别核办。特咨请津海关道仍照每桶三百斤估价二两二钱五分，其出口者照新关向章完税银五分，其出境不出口者，照钞关向章完税银二分五厘，以昭公允。当由该道详奉直督批准照办。（各省财政汇志，东方，4年6期，财政，页91，1907年6月。）

甬江（宁波）和丰纱厂，自开办以来，出纱较纯，颇足抵制洋货。惟购运制纱进口，除完缴正税外，又须报纳厘捐，未免本重价昂，有碍销路。日前该总理顾元琛君，因特通禀部省及甬道各宪，请将厘捐概行豁免。现奉喻观察批，谓所请自系实情，惟厘捐非本道主政，能否准免，碍难遽议，既据径禀，应候商部抚宪批示遵行可也。（时报，1907年9月2日。）

无锡祝氏（祝大椿）深有慨乎棉业之不发达，就中、日、印度三处人口总数，与纱布机之多寡制为比较表，以证中国非急增设纱、布机厂不可。其表式如下：

	人口总数	纺纱机	织布机
中国	400,000,000	810,000	3,300
印度	278,000,000	6,250,000	20,000
日本	52,000,000	2,130,000	10,000

祝氏复拟奖励植棉暨纺织之说，特介绍于阅者，以为本论之结束。其说如下：

花纱一案，为出口货之大宗，然欲兴利源，非畅其销路不可；欲畅销路，非剔除苛税不可。约分五说：

一、现中国所收本国花厂出品之税，计纱每担关银七钱，细布每匹八分，斜纹布每匹一钱，应一概豁免。

二、所有中国各厂出品，输往本国内地者，除须领有关口放行之执照一纸外，税厘等费一概免付。

三、所有已纳税之生花，由中国此埠装往彼埠者，于货抵彼埠时，应由关口缴还原税。

四、所有生花，在本国由某埠出口至某埠入口，照现在所收每担一钱七分五厘之进口税，一概豁免。

五、所有由外洋进口之生花，照现在所收每担六钱之税，一概免付。

以上所陈各款，为振兴棉业之要点，倘能实行，则可以畅销中国花厂出品，免为舶来品所阻碍。（时报，1913年2月15日社论。）

〔上海〕丝厂厂主们都苦于内地收购蚕茧方面厘金的勒索，把这些厘金加到子口税和出口税上去，每担达六十余两，或者说差不多占厂丝总值的10%。（报告，1892—1901年，上海口，页512—513。）

〔苏州〕去年苏经丝厂，经祝少尹部郎包办时，曾与各股商订立合同，包定赢亏无悔。乃于上月之下旬，厂中因存茧将空，特派人至上海收买茧子三千担，将次运载来苏，当为牙厘局总办朱廉访所闻，坚欲令厂中每担报捐三两，祝不允，以蚕茧出乡时，均已缴过茧捐，此次无须重出。廉访不允，相持数日，货不能运。而厂中存茧已完，部郎无奈，只得饬各工人一律停工解散，拟欲就此闭歇，所包各股东四年利息，由部郎如数认还。现经省中当道代为说合，不知能否转圜，惟停机现已及半月矣。（中外日报，1899年3月29日。）

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以洋、土货税则不平，致土货销路滞塞，日前特开会议公决，征集各项改良国货之样本，要请工商部准予酌量减免税厘，以留推销国货之余地。当经草拟通告，分散各商帮，兹录通告如下：敬启者，本会调查近年国货改良，足以抵制外货者甚多，如丝光布、电光布、格子胶布、爱国布以及丝光被面、丝呢、丝袜、线哔叽等，皆因税则不平，阻碍销路，甚且以真正国货借洋货派司，希图免税，言之痛心。（时报，1913年11月23日。）

中国已开始制造棉法兰绒与棉毯，惟此种货品与同种日货竞争，今已知其全无获胜的可能。盖一八五八年条约（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土货课从价税5%，而一九〇二年修订之进口税则，使日货负税实不及5%，影响所及，直使国内产业无复生理。（关册，1916年，中英文本，贸易总论，页3。）

〔光绪34年9月22日两江总督端方奏〕兹据安徽颍州裕兴机器榨油公司总理、农工商部议员程恩培禀请援照总理衙门奏案，将该公司机器制造之豆饼、豆油，遵章在出口之镇江关豫完值百抽十之正税、加税，报明石数，请领镇江关护照，雇用民船，由内河装运赴镇江出口，沿途经过内地常关厘卡，恳免予重征等情。核与成案相符，自应照准。惟查前总理衙门原奏，系指在通商口岸设立机厂者而言，且事在光绪二十五年，其时尚未有加税裁厘之说，嗣与英、美、日本等国议订商约，均声明中国裁撤内地厘金，则洋货进口税可加抽至值百抽十二五，以资抵补。此议虽尚未实行，而将来实行此约后，则在中国设厂用机器制造货物之税项，必加至值百抽十五，方与原奏之意相符。……兹经酌量变通，剀切劝谕该公司，于报明出口运销外洋之豆饼、豆油豫领镇江关护照者，统令完值百抽十五之税，拟以一成拨抵皖省淮北两道之厘金，以二成拨抵凤颍常关之正税，以六成拨抵江北漕捐两道之厘金，以六成拨抵淮安关之正税，以二成拨抵宁属七道之厘金，以二成拨抵扬由关之正税，以五成报完镇江关出口之正税，共合为值百抽十五之数。……在该公司完纳正税项，似已过重，值此财政支绌之际，厘金常税，势不得不并顾兼筹。而较诸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亦尚为轻减，故该公司亦甘愿遵从。为该公司完此极重之税，实为向来机器制货公司所未有，该职商深明时局，借以外树风声，为他日杜渐防微之计，其意有足多者。（华制存考，光绪34年9月22日，页2—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汇率的降低，目前的关税负担较轻，因之，一家主要制皂业的代理人（编者按：指外国公司）计议在上海建立分厂的时候指出，目前关税对肥皂征课不到3%，因之对本地产品所征的从价税，不啻牺牲本国工业以保护外国制造的入口货品。（报告，1902—1911年，上海口，页18。）

再，自来火，上海、福州、汉口、重庆等处均已设厂试办，惜其价值不能抵制日本。因日本国家经理商务，体察情形，轻其成本，以固本国之利源，凡民间工艺所需材料，免进口税项，及其成物，既无厘金，又无出口税，运至中国，照洋货进口之例值百抽五，即改运通商别口，亦不重征。如在中国仿制，所须材料，先纳进口税项，即如玻璃粉、包皮纸、药

料、蜡、木片、木梗等物，一经进口，照完进口税项，制成之后，贩运出口，则缴出口税，迨运别口，又复缴进口税，如入内地，则照土产之例，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日本货物，如往内地，照章完纳子口税项，请领入内税单，听凭贩运，毫无阻运；且子口税较轻于厘金。曾询美查洋行，中国仿制有无利益，据称自来火因其税重，不能抵敌日本，刻已停工。（戴乐尔：七续理财节略，中外日报，1900年2月15日。）

（3）重税对市场的限制

窃查本口（杭州）贸易情形，若以本关总册所载之数而论，前数年之贸易，递见起色，惟本年较逊。……然究之商务之盛衰，尚不能竟以此数目为准绳，盖因运河贸易，并非统经本关及嘉兴分关所致。民船来往申、杭，报税报厘，本任商便，况杭嘉沪铁道所运之货物，均入厘金范围，而厘货无册报可稽。……按货物不由铁道径行来往申闸，而装船往来申杭，报由本关，非因关乎由申至杭车运比较船载费重之故，实缘铁路之厘金颇重所致。试观下列火车与轮拖运费，车运较廉于船，可了然明矣。

申杭运货费比较表

货名	斤两	火车运费	轮拖运费
豆	每担	一角三分	一角八分
棉花	每担	二角二分	三角五分
麻皮	每担	二角二分	二角
丝	每担	三角四分	二元
绸缎	每担	三角四分	二元五角
糖	每担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
茶	每吨	三元四角四分	二元五角
烟丝	每担	三角四分	一角五分
烟叶	每担	二角二分	二角五分

（关册，1910年，中文本，杭州口，页85。）

〔江西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傅春官述〕厘税一政，兴于咸丰初年，军事既毕，仍因未革。然各省皆经奏减，惟江西厘卡独多。查厘卡原章，于初卡完三分，次卡完二分，第三卡完三分，第四卡完二分，名为百分之十；其实十分完足，经过下卡，仍须补抽。第一次补抽，按十分加二分，第二次补抽，按十二分又加二分，经若干卡，补若干次。如由赣州府运货至江省，须经十卡，应完二十九分有奇。且货经初卡，其完厘之数，决不肯按货之实数计算，如运货一百担，虽经商人再三恳请，至轻亦须以一百二十担计。……初卡困难如此，至次卡，按初卡所完厘数完纳二分外，尚须查验补抽，如一百担货，初卡以一百二十担起厘，次卡又须补二十、三十担，完纳五分，第三、第四卡皆然。总之，未完足十分，固宜补抽，既完足十分以后，仍须补抽。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光绪二十九年，加税裁厘之议兴，江西百货，逐渐改为统税，较厘金原章虽有加增，惟一卡完足，不再抽收，较之从前稍觉苏息，然全省税口，尚有三十余处，其浮收讹索，亦时有所闻。（江西商务说略，页18。）

桂省自开办统税以来，阖省商民，均受其害。计由（1904年）正月至今，合算各属商埠外省货物运入者，不及去年（1903年）五分之一，由本省运往外省之货，亦短其半；所收税项，大为减色。至各省运往别处货船，皆绕道而行，不肯经由桂境。故各属商号，倒闭极多，因

贩运艰难，收盘歇业者，亦复不少。最甚者，为南宁地面，商业败坏，市面萧条，统税害民，至此已极。（中外日报，1904年8月29日。）

〔**中外日报社论：阅商标注册局章程书后**〕然如洋牌挂牌领照，止出费十两；专牌、华牌呈请挂号，须费十两，而挂牌领照，又须费二十两。同一事也，洋牌则轻而少，华牌则重而多。且华牌之势力，又断不如洋牌。然则谁肯挂华牌者，殆非驱本国之商人，不尽挂洋牌不止，未必其有益于华商也。窃愿当局者一思之矣。（中外日报，1904年3月25日。）

〔**光绪21年12月24日总理衙门奏**〕自立约互市以来，洋商运货，只完正、子两税，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至于洋商仅完正、半两税，便可畅行无阻，利权较华商为优。（奏议辑览初编，卷1，页82—83。）

〔**光绪29年9月1日商部尚书载振等奏**〕查洋商贩运土货，只在海关完纳子口半税，领三联报单，沿途呈验，无论远近，概不重征；而华商运货出口，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所抽纳之款，已较洋商所完子口税为多，迺关吏、卡员照章应纳税厘外，恒多分外之需索。如此畸重畸轻，土货出口，安能望有起色？此不平者一也。运货之宜，务在迅速，往往有一日之差，旦夕之殊，而货价之涨落以倍蓰者。迩来内港行轮运，业经畅行无阻，各处关卡委员，遇挂洋旗之商船，照章速验放行，遇无洋旗之商船，即不免留难需索，甚至今日不验，候至明日，明日不验，候至后日，至于民船、划艇，更复任意欺凌，华商隐受亏损而无如之何。此其不平者二也。（清户部档案抄本，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2．阻碍工业产品流通的运价

〔直隶〕开平矿（务）局开办数十年，生意日渐扩充，实为中国第一。惟闻局中人云，近日掣肘之事甚多。缘唐山至天津之铁路，本系局中所造，后议归商路，又并归官路；至去年（1897年）正月，又归入芦汉铁路；去年七月，又归入津芦铁路。辗转更易，路无常主，于是铁路之大权，尽归于西人金达之手。局中受铁路之亏，不一而足，如：煤块水脚，本照四等货物计算，后改照三等货物，今又不止，每吨竟须水脚一两，一也；矿煤载至上海，每吨价十两有零，在天津售，亦须六两余，惟铁路尚照前数年之价，每吨只二两五钱，二也；煤出矿，即倒入载煤车，推入路中，与各车接连，如此方为便捷，乃煤多而车少，不敷载运，铁路公司不肯添置，遂致煤出矿后，无车可载，倒于平地，顷刻山积，再无车至，便须停工，非特局旷可惜，抑且工饥可虑，三也；又如铁厂（路）等处，每以款绌，动辄积欠五、六万两，不能应付。良有官场见商人偶然得利，但顾筹捐筹饷，并不思保护之方。故办事之难，一至于此。（时务日报，1898年6月3日。）

〔**1909年山西巡抚宝棻奏**〕窃据保晋矿务公司总理三品京堂渠本翘等呈称：矿务发达，必以减轻成本，疏通销路为切要之图。晋矿因各路运费过巨，转输不便，而正太一路为尤甚。现计平定煤产，由矿井运至屯栈，每吨所费不及三元，以每车二十吨计，不过五十元上下。而自平定所属之阳泉，由火车运至石家庄，再运天津，统计运费二百元上下。是运费较煤价竟增至四分之三，每吨核计成本十二元有零，而津地行销之唐山煤，仅售洋九元上下。价值悬殊，何能畅销？此后晋矿出货日多，正赖火车源源输运，若为运路所阻，则矿务必致坐困，又使后之办实业者畏葸不前，其影响将及于全局。且路、矿两事，利病相因，运费昂则销路阻而输出少，矿病而路亦病；运费减则销路畅而用车多，矿利而路亦利。但斤斤于目前之运费，较量多寡，而不为久远之图，似非计之得者。查唐山、临城两矿，铁路运费向按

五成核收，晋省煤矿可否援案，将各路运费一律减为五成，以利转输，而维实业。（申报，1909年4月6日。）

〔**宣统元年4月9日邮传部奏**〕为议复运煤减价办法：……查徐定超原奏内称“河南彰德、直隶磁州一带，产煤极旺，以火车运费极巨，行销不畅。火车每辆运煤二十五吨，由磁州、彰德至汉、至京，运费约在百元左右，以运价之重，致内地矿产，不能畅达。应请核实删减此项运价，仿照临城、唐山煤矿运费均减五成之例”等语。宝棻原奏内称：“晋矿各路，运费过巨，正太为尤甚，平定煤矿由矿井运至屯栈，每吨所费不及三元，自阳泉由火车运至石家庄，再运天津，统计运费需二百元上下，每吨核计成本十二元有零；津地行售之唐山煤，仅售洋九元上下。若因运费过巨，致售价昂贵，与唐山等煤相形见绌，晋矿恐无发达之机。”……光绪三十一年北洋大臣与比公司议定华洋合办临城煤矿合同，烟煤专车运价每吨每英里银元一分，每车公费银元三元，临城售煤与京汉，照原价七五折算给。嗣临城与京汉另订整车运价，在七十五法里以内，计每吨每法里银元一分二厘五；在七十六法里至一百五十法里，则银元九厘；在一百五十一法里至三百法里，则银元七厘五毫；在三百一法里至五百五十法里，则银元六厘；在五百五十一法里至九百法里，则银元五厘；在九百法里以外，则银元四厘五毫。系分远近逐节算价，均每车公费四元，售煤与京汉，亦照原价七五折算给。光绪三十一年京奉局与唐山煤矿订立合同，烟煤运费在五十英里以内，每吨每英里银元一分五厘；在一百五十英里以内，则银元一分二厘；在一百五十英里以外，则银元一分一厘；唐山售煤与京奉，则唐山高块每吨煤价六元，林西高块每吨五元，唐山煤末每吨三元二角五分，林西煤末每吨三元，较之市间唐山煤价高块每吨十一元一角五分，煤末六元九角，约计仅得五折。是减少唐山、临城运价之故，实由煤斤为铁路养命之源，向须与各大矿预行订购，以便按期供给，每年为数至巨。今唐山、临城既减售价，则铁路省费，实属不赀，故允酌减两矿运费，以昭平允。（华制存考，宣统元年4月9日，页39—42。）

〔广西〕富贺煤矿，于光绪三十二年由张鸣岐奏请设立官局开办。……计自光绪三十三年起至宣统三年止，资本完全告罄。仅出大煤九千六百十吨，末煤二万五千余吨，而售出之数，尚不过十分之六。盖自矿至梧六百里，运脚已需四元四角，至香港一千六百里，运费五元八分，故不易销售也。（中国官办矿业史略，页50—51。）

3．阻碍工业产品流通的封建垄断

火柴的输入（重庆），对中国人而言，是禁止的，这是为了本市附近两家火柴厂的缘故；它们在火柴的制造和推销方面，获得了25年的专利权。至于外国入口商，那自然是可以自由贸易的。工厂的全部生产都必须按照固定的价格卖给火柴业公会，公会在工厂和商人之间，是作为一种中间人，它从工厂方面扣下来10％的数目——对公会说来，这是极端有利的一种手续。（报告，1892—1901年，重庆口，页135—136。）

〔**宣统元年9月15日农工商部批宋炜臣禀**〕禀悉。该职商所禀四川重庆公司阻止夔昌公司火柴运川，勒归统销，加抽重费，阻抑益甚各节，业经本部咨行四川总督转饬迅即并案查明办理。仰仍候查复，到日再行核示。此批。（商务官报，宣统元年9月25日，28期，页11。）

〔**宣统元年3月9日农工商部批四川泸州溥利火柴公司刘东宣禀**〕据禀重庆统销公司派销不均，担费太重各节，当经电询四川总督饬查速复，去后，兹准电复内开：统销章程因销数

有限，各厂制造多寡，以开设先后而定，泸厂最后，故数少；提费缴办公益，各厂一律，泸厂数较少，每箱特减四钱二分，以示体恤。华洋并无异言，独泸厂翻控，意在破坏统销，自由滥卖，不畏复（复）撤等语。查此案既准川督饬查明确电复，前因所有该商具控各节，自可毋庸置议。惟统销公司办理情形，既与商情未尽融洽，除业经咨行川督转饬该公司，仍当体查情形，徐图改良，以期公司、各厂两有裨益外，合行批示该商，即便遵照。此批。（商务官报，宣统元年3月25日，10期，页11。）

〔宣统元年3月9日农工商部批四川广安州信诚火柴厂徐子志禀〕前据禀控重庆统销公司违法笼利各节，当经据情咨行四川总督饬查，持平办理，并批候声复核夺在案。兹准复称：饬委查明所控皆属不确。如原词并不按时付价，据查不惟并不欠银，且常有先银后货之事。其所控限制箱数，原案系以开厂之先后，定其多寡。抬价计赢一层，查该厂于所在地每年仅能销三、四百箱，余须运往绥定、三汇、顺庆、遂宁等处销售，程途较为迂远，需于定价之外，多耗运费，而原案运费，均有定数，公司自不能不并入价内收回，并非任意加增。赵资生办事稳练，甚洽人意，毋庸更换。并据称无统销维持其间，滥价争销，小厂终归劣败各等语，咨请销案前来。查此案既准四川总督饬查明确，所请撤销统销公司之处，自应毋庸置议。惟统销公司办理情形，既于商情未尽融洽，除仍咨行川督，转饬该省公司随时体查情形，徐图改良，以期公司与各厂两有裨益外，合仰该商即便遵照安业，静候持平办理可也。此批。（商务官报，宣统元年3月25日，10期，页12。）

重庆玻璃公司发卖各色货物，价值极高，各铺因该公司有垄断之权，势不能不买。现值消场阻滞，折本颇巨，闻众议有禀请撤去公司之说。（中外日报，1901年7月3日。）

〔汉口〕近来洋纱销场日旺。闻有某巨商拟纠集资本，向鄂省纺纱局订定合同，将局中所纺洋纱全数包销，尚未议定。（中外日报，1900年2月19日。）

〔广西〕平乐府富川县属商人宝亨公司等承办之锡矿，暨与西湾煤山相近之各产锡处，一律收回官办，由张抚（张鸣岐）奏明，自宣统元年正月起，均由西湾煤矿官局兼理，大加整顿。兹将详细情形分条录下：一、禁私炉。现定锡砂价值，每百斤银四角四仙，较从前宝亨公司所定之价稍高。惟富川县全境私炉不少，收砂炼锡，利之所在，难免不加价争收，若不从严禁绝，于官局收砂大有妨碍，特由抚院出示禁止。一面严密查访，遇有开设私炉之人，送官讯惩。一、查私锡。私炉既禁，难保无奸猾之徒，潜行收炼，为查禁所难及者，是根株犹未尽绝，惟有于私锡运出时，严行堵截一法。查官局炼成之锡，运至八步埠销售，八步埠商收买之锡，皆运广东销售，贺县税卡，实为稽查扼要之地；惟湖南各公司之锡，亦系取道贺县，运往东省，自不可无区别。由局在湘、粤交界地方，择湘锡运桂必由之地设卡，派司事常驻，精制印花，加盖关防，凡遇湘锡运过烙印，先行逐饼粘贴印花，再于贺县统税卡，派司事一人，专司稽查私锡之事。凡遇查船看货，该司事均须同往，见有公司烙印官局加贴印花之湘锡，准予放行，倘仅有烙印，并无印花，或既无印花又无烙印，均属私锡，全数充公。去路既穷，来源斯绝。已由抚院电咨湘抚，转饬湖南各公司查照。一、杜私贩。近查锡砂走私，已有三路，而以葫芦口一处为要。该处为湘、桂交界地方，湖南有公司四家，兼收买富川锡砂，应勒令迁移，不准设在桂境内再收富川锡砂；一面派勇巡缉，不准砂丁越境私售，有则严拿惩治，以儆其余。（广西开办矿务详情，东方，6年3期，调查1，页44—45，1909年闰2月。）

农工商部湖南矿务议员蒋绅德钧，以近来时有外人来湘包揽销售生锑，因拟随时杜绝，

设立湖南锑业公会，以为维持。前已呈请抚部院，略称：湖南商矿生锑，每年约一万吨，每吨现在时价八十两，每年约需银八十万两，拟请宪台发官本银十万两，三路矿务总公司筹集本银十万两，各属分公司、矿商筹集本银十万两，共银三十万两，设立湖南锑业公会，官商合办。官主保护、惩罚之权，公司任统摄、稽察之责，矿商任办事、买卖之责，官商联为一气，将各路商矿生锑之愿出售者，照时价收买，不愿卖者，抵押售价之半，以资接济。通省生锑统归本会销售，自不致跌价抢卖，必能渐有起色。惟本银三十万两，尚恐不敷周转，查大清银行广告有借款、押款等条，……已由岑中丞檄饬劝业道唐观察，会同蒋绅妥筹办法，并会商大清银行，可否以生锑押款，禀候核夺矣。（申报，1909年12月20日。）

〔**光绪32年11月广西巡抚林绍年奏**〕桂省南太、泗镇一带，山野绵亘，锑产甚多，……既无富商大贾可以独任采运，自非由官提倡收售，不足以兴地利。……臣蒙圣恩敕部议准将应解新案赔款，截留一年暂行缓解，拟即就截留款项内提银十万两，作为办锑专款，附设总局于省垣，派办政事处，并先于南宁府城设立验收锑砂转运分局；仍于梧州、上海各设售锑分局，随时查探情形，禀报总局核办，另择妥员，于凌云、都结、向武等属，自行筹款收买，陆续运赴南宁，视其收价、运费之实数若干，由局核定官价，随时磅收，给发价值，俾资周转。所有南宁收买之官锑，应即按批运梧，由官销售，其余各属，有无锑产，并所产锑砂是否合用，应由总局通饬查明，采送考验，并确查产锑处所，是否官山，抑系民地，禀候核办。如果锑质合宜，再议推广，以为久远之计。惟是广西之锑产较富，沪港之锑价较昂，一经由官收售，则奸商闻风私运，在所不免；若不严杜漏卮，实与官运有碍。伏查光绪二十四年湘省奏请严禁私贩锑砂出境，声明一经查获，给价入官，经部议准照办，原期整饬利权，豫防流弊。桂省开办之始，事同一律，自应奏明，援照查禁出示晓谕，以免纷歧。（东华续录，光绪，卷203，页14。）

〔北京〕有张某者，禀请商部，拟立北京煤务公司，所有煤业，归其包办，但迹近垄断，商部未肯批准。（中外日报，1903年12月7日。）

（二）帝国主义的压迫

1．洋货与外厂制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压力

中国煤、纱市场上中外势力的比例

1903、1908、1913年

项别	煤		棉		纱	
	1913年		1903年		1908年	
	实数（千吨）	百分比	实数（包）*	百分比	实数（包）*	百分比
中国：	5,743	39.41	129,500	11.31	223,500	23.93
1.华籍厂矿的生产量	5,743	39.41	129,500	11.31	223,500	23.93
外国：	8,828	60.59	1,015,400	88.69	710,510	76.07
1.入口量	1,691	11.61	912,400	79.69	607,510	65.04
2.在华厂矿的生产量	7,137	48.98	103,000	9.00	103,000	11.03

资料来源：生产量：煤，历年煤产量统计。

棉纱 1903 年，贾梅生：中国纱厂调查报告，1905 年，北华捷报，
1905 年 5 月 12 日页 277 转载。外厂数字假定与 1908 年相同。
1908 年，东方杂志，1909 年 2 月，纱厂调查表。

入口量：海关十年报告，1922 — 1931 年，页 177，182。

编者注：*每包四百磅。

本时期内（1894 — 1913 年），中国国内棉纱的产销状况，没有完备的统计可查。就海关报告册第二部各关统计数字来观察，可知三都澳以南，海陆边境十七个关口中，除去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四口而外，其余十三个关口都不见有国纱试销的踪迹。就是这四个口岸，每年销量也不过各自数百担至数千担，较之印纱数万至数十万担，实卑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可以说，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南中国五省之广大棉纱市场，简直没有国纱的插足地。再检同一关册，可知当中国第一家纺织厂开始运转后的第一年（1891 年），便有国产纱向东北牛庄试销，其后东北沿海各口也都不断地运进国纱。然而可注意的是，就在同年或稍后，日纱也开始向这些口岸试销，不数年间，东北且成为日纱倾销最力的市场之一，结果国纱在东北四省的每年销量始终不曾超过一万担，而那里每年的全销量却几达二十万担。东北市场也无国产纱的插足余地。

华南、东北两大市场既无国纱插足地，则国纱的销路自然便挤向华中与华北去。这两大市场关系中国纱厂的资本蓄积过程最为密切，今请用统计数字加以说明。华中方面，芜湖以下沿江沿海各口，因接近上海及其他纱厂所在地，恐有陆路运输及其他因素扰乱海关统计数字的真确性，今弃而不用。芜湖以上沿江各口，仅汉口紧接纱厂所在地之武昌，舍而不用，其他各口，都假定其关册统计足以表示洋纱、国纱的运输状况。这样，我们辑录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七口的数字，如下表：

长江中上游七口岸输入洋纱、国纱净量

五年平均

年代	洋纱		国纱		共计（担 = 100%）
	担	%	担	%	
1894—1898	211,935	86.4	33,424	13.6	245,359
1899—1803	486,795	77.4	141,813	22.4	628,608
1904—1908	537,318	83.2	108,459	16.8	645,777
1909—1913	498,415	72.0	194,167	28.0	692,582

资料来源：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II.

华北方面，天津、芝罘、胶州和秦皇岛四口的净进口数，大体可以代表其全部的销量。今辑其数如下：

华北四口岸输入洋纱、国纱净量

五年平均

年代	洋纱		国纱		共计（担=100%）
	担	%	担	%	
1894—1898	315,278	93.7	20,853	6.3	336,531
1899—1803	442,955	97.1	37,866	7.9	480,821
1904—1908	533,529	89.4	63,397	10.6	596,926
1909—1913	581,433	80.1	144,757	19.9	726,190

资料来源：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II.

上列两表并不能代表华中、华北两大市场上机制棉纱全部销售情况，但是对于国产机纱的销场问题，却透露出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首先，1894—1913年这二十年间，外洋棉纱在这两大市场上是占着绝对优势的。国产纱的相对比重，在华中不足30%；在华北，不足20%。这说明洋纱对于国产纱的压力是经常存在的。……

正因为中国国内纱厂须摭拾洋货销余市场以自存，所以中国国内棉纱业的景气变动便失其独立性，此所以1894—99年间日货对华倾销尚在试验时期，中国纱厂尚能维持相当的繁荣。可是1899年后，日货并力锐进时，繁荣亦随之消逝；此所以日俄战后，日货无暇东顾，中国进口棉纱，因以大减时，中国纱厂又得以恢复繁荣，而其后日货重来，繁荣乃再归消逝，这种跛行的演进过程，……实为市场不能自主的结果。（中国棉纺织史稿，页144—147，1955年。）

虽然中国的棉纺织工业现仍处于幼稚阶段，但就其在中国试办的前途看来，几乎是带来了极大可能性的一项工业。中国的第一家纱厂虽然已于1890年开办，而且在现有的32家纱厂中，1897年就已组成了14家并已开工生产，但曾有过几次阻止纺纱工业发展的情况。各纱厂虽有织机约3,738台，但整个制造工业是从事于纺纱的。而在纺纱方面，他们已经有了不断的进展，这是应当承认的。同时，在中国的纱厂，所纺棉纱的收入已经逐渐有所增加。织布的可能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特别是因为中国各地市场对当地土布产量需要甚大，而现在布匹贸易总额却非常微小。

正如印度的进口贸易一样，中国进口贸易中，唯一的最大项目，就是棉制品。棉纱占进口棉制品的最大比例。过去四年输入中国的棉纱价值：1908年为45,000,000两；1909年，61,000,000两；1910年，61,000,000两，1911年，49,700,000两。1911年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以前两年的大量进口，同时也由于本地纱厂所纺的棉纱已开始受到采购者极大的赞许。各种棉制品输入的总值：1908年为80,000,000两；1909年为125,900,000两；1910年为125,300,000两；1911年为140,000,000，——此项总值包括棉纱进口在内。从1908年开始，四年来中国输入品的总值：1908年为409,000,000两；1909年为430,000,000两；1910年为476,000,000两；1911年为482,000,000两。由此很容易看出，棉货输入在输入总值中占有何等的比例。

但是，应当了解，上述的数字如果与在有利的条件下所应该达到的数字相比，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由于运输的困难，币制的纷扰，革命及其他原因，棉业的进展并不是很迅速的。从号称四亿人民主要是穿着棉布衣服而言，中国何以只需要这样少的棉货，是令人颇为惊异的。复次，由于政府的不良，以及某些厘金和官吏的种种需索，内地消费者购买棉货的价格，可能比制造商的成本要高出一倍。中国手工织布所用的棉纱几乎完全为外国输入品和在中国的纱厂的产品。因此棉纱贸易要占贸易总额中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在中国的纱厂，其贸易总额约为日本及印度输入中国的棉纱贸易总额的半数，而按其进展速率看来，在华纱厂无疑地将占有几乎是全中国的棉纱贸易。当然，要达此目的，现有的纱厂还不够，但棉纱业的进展，将导致新纱厂的建立和装置。（捷报，1912 年 12 月 21 日，页 801 — 802。）

从大坂纱厂来的大量棉纱现在仍然在向中国倾销，对于本（上海）市棉纱业是很不幸的事。由于本市纱厂生产的增加，销市疲滞及金融困难（周转不灵），日纱的倾销甚至对日本的纱厂也是不利的。这种情况一部分是由于日本纱厂最近添置机器，产品已大大增加，预料本月的总额将达 145,000 件，而日本每年的消费量，仅略多于 1,000,000 件；同时，除了中国以外，日本没有其他可以出售棉纱的市场。其结果就是把所有的剩余棉纱都运到我们的市场上来了。（捷报，1914 年 3 月 21 日，页 872。）

如果日本棉纺业的进展维持目前的速度，中国纱厂即使为了生存，也必须作非常严重的斗争。如所周知，中国是大坂纱厂剩余产品的倾销市场。因此，很自然地，中国的整个市场已经陷于瓦解。到（1914 年）6 月 30 日以前的前半年，日本棉纱的生产达到 896,180 包，其中出口达 301,088包；去年同期生产为 743,442 包，出口 236,371 包。由于中国是日本的主要市场，（日本）出口的增加率已经大于消费的增加率，人们希望最近采取办法缩短工作时期以减少出口。（捷报，1914 年 7 月 18 日，页 221。）

关于满州棉制品需要迅速增长，据“大坂新闻”报道：满州的外国贸易正在着着进展，特别在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 30,000 匹，粗布 100,000 匹，粗斜纹布 30,000 匹，细斜纹布 20,000 匹，棉纱 50,000 件，棉布（窄面的）200,000 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 80%。由此可见，虽然有英、美出品的竞争，日本棉货贸易，仍在不断地增长。当前日本棉货景气之形成，主要是由于日俄战争后不久，日本纺织界为了在满洲推销棉制品而组织的辛笛加和这个组织的代理人三井物产会社的力量。这个辛笛加已于去年七月解散，现在输往满洲的棉制品操于个别日商之手。大坂日本棉花会社及岩佐、伊藤及铃木商店和大坂与神户的商号都进一步扩充了对满洲的出口生意。“大坂新闻”又说，在这方面，应当注意英、美商人现正通过英美烟公司力图恢复他们在满洲的势力，同时，由于上海棉纺织业日见发展，从上海出口运往满洲的棉制品现正逐渐开始增加。（捷报，1913 年 4 月 26 日，页 267—268。）

洋布、洋纱为洋货入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余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特是洋纱最精，有四十号者，而华棉绒短纱粗，以机器纺之，仅能纺至十六号纱止，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劝学篇，农工商学第九，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页 31。）

汉口燮昌洋火厂，系华商所开，当时曾经鄂督批准，专利十五年。该厂制货颇精，获利甚厚。兹又有日本人开设洋火厂于汉口，经燮昌禀请鄂督移知日领事，饬令停办，日领事不允，相持已久，迄未了结。闻燮昌执理甚坚，决不肯让云。（时报，1906 年 12 月 6 日。）

查去岁（1909年）各公司工场所须条胰，惟华胜公司销售最多，荣华公司次之，其余各家所销者，约在三千余箱之谱。今岁造胰材料价值奇昂，即烧碱一宗，先一年在二十七、八两上下，现时涨至三十八两有奇；牛油行市亦大见起色，所有成本较前尤巨。似此情形，恐难免赔累之虞。兹查日商桑茂洋行制造各种胰皂，均用机器，出货踊而且速，销路亦畅。至装潢（璜）纸盒系用人力机器裱糊，似宜仿效。复由王赞臣提议，现时造胰公司，日益加多，互相竞卖，以致极微之利，亦无所得。查今岁现有两家，新设立者一家，系桂记公司，一家系东升洋烛公司，添造胰皂，闻售价甚廉。其货品优劣与否，尚未调查明确。（己酉大政记，1909年，卷5，纪事2，页4。）

〔广东〕士敏土厂本年三月兴工制土，每日应可出500桶，但是由于烧窑中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而工人又缺乏经验，所以每日所出之土，只在120桶至180桶之间。此项士敏土垒经试验比较，土质甚佳，但是由于附近有强大的、势力雄厚的竞争者（指香港英国青洲水泥公司）以青洲士敏土与之竞争，因此受到阻碍。（关册，1909年，英文本，广州口，页581。）

〔英国〕亚力山大何西爵士称，（在香港），除了炼糖业以外，最重要的工业大概要算水泥了。水泥生产是由青洲水泥公司进行的，它的资本是2,000,000元；现在还在打算加一倍。这家公司还制造耐火砖、耐火粘土、下水管等等。水泥年产量达120,000吨。（捷报，1907年12月20日，页729。）

在本期（1902—1911年）的早年，九江开办了一个火柴厂，但是很快就停闭了。因为，它甚至不能生产四级火柴，并且完全不能与廉价的上等日本火柴竞争。（报告，1902—1911年，九江口，页372。）

〔琼洲〕1908年有一家小的火柴厂开办了，但是存在仅及一年。因为所制造的火柴较次，不能与日本火柴竞争。（报告，1902—1911年，琼州口，页246。）

〔广东三水〕自改岁之初，西南市镇旋又增开织造毛巾工厂二间。但因外洋棉纱价极昂贵，该厂所出之货，究不足与日本运赴中国毛巾销路相敌，盖彼货取值更廉也。（关册，1910年，中文本，三水口，页130。）

哈尔滨和北满其他各地的面粉厂，去年（1908年）由竞购(原料)的结果，不得不以大大高于常年的价格购进小麦。由于原料价格上升，它的后果就是面粉价格的上升。质量比满洲粉要好的美国面粉，利用了这个机会，现在正大量涌入满洲，并逐渐扩充它的市场。据说，很可能有些满洲面粉厂不能和入口的面粉竞争，势必倒闭。（捷报，1909年4月3日，页37。）

〔编者按：这条材料说明美国面粉对整个东三省面粉厂的压力。东三省的面粉市场主要由帝俄和日本在东北的面粉厂所霸占，势力很小的华商面粉厂在这里受到双重的压迫。〕

2．中国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价格上所处的劣势地位上海市场华纱、印纱、日纱价格比较

单位：每包规银两

年　　　代	华纱（14支）①	印纱（16支）	日纱(16支)
1899	68.40	62.65	66.00
1900	72.50	70.50	73.60
1901	78.00	74.00	81.50
1902	83.10	82.65	88.00
1903	90.20	87.00	91.50
1904②	92.40	88.00	94.10

资料来源：根据贾梅生，中国纱厂报告，1905年之记载计算。

编 者 注：① 14支纱制造成本约低于16支2两。

② 为2—7月半年平均价格。

鲜茧之蒸干也，率三而得一。乡民居奇，鲜茧百斤价率四十元，以三乘之得一百二十元，加以柴薪、购运之费十元，捐款、善举等费又十元，是每干茧百斤为洋一百四十余。以之缫丝，率六而得一，以干茧每百斤一百四十乘之，得八百四十元，加缫费约一百三十元，是每丝百斤为九百七十有奇。而外洋丝经之价适中得八百元左右，则厂中出丝百斤常有耗洋一百七十之虑，倘或值贬价，其患更不可思议。所以昨今两岁（1899—1900年）罢业者七、八家，即首创有名之厂，亦皆岌岌可危，而乌在其有利也。（阙名：续论丝厂，皇朝经济文新编，蚕桑，页14。）

〔上海〕由欧洲人监工的丝厂所生产的最好的厂丝，虽然因为比较杂一点因而缫得不够好，但是在质量上还比得上法国和意大利所生产的。作为中国丝厂的首要竞争者的日本丝厂产品，线的引力不一样。价格的变动主要由日本的市场决定，那里，上等丝的生产量是很大的。（报告，1892—1901年，上海口，页512。）

中国的缫丝业者生活在愚人的天堂里面。……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在于设想他们决定丝价，设想丝价以中国蚕茧的成本为转移。实际上丝价是由西方市场——里昂、纽约、伦敦、米兰——决定的。而在决定丝价上，意大利和日本在今天是远超过中国的重要因素。（关册，1904年，英文本，总论，页8。）

上海存丝不多，实因养蚕乡民，私心切（窃）喜，以为丝厂接踵添设，所需蚕茧必多，故为屯积以冀垄断居奇，利市三倍。不意竟失其望。新设丝厂，因美国暂停办丝，各厂并无生意，甚至闭厂停工，则内地蚕户，徒叹茧积如山，觅无售主。而屯丝商人，偏能获利于意外。何则，缘上海洋商总以为蚕茧屯积既多，出丝断不会少，故已函告欧洲商家，业经定购湖丝若干，迨至复函既到，丝价虽未稍减，则明知吃亏，不能不办。此等获利亦算湖丝不幸中之大幸也。（关册，1896年，中文本，总论，页4。）

上海缫丝厂二十年前不及十家，十年前不及二十家，近年来，几及四十家矣。以表面观

之，似日就发达，究其内容，则不然。所赢者寡，所亏者众，失败者尤踵相接。其病何在，不求病根，药剂之力安所施。兹将所闻见者详述之：

一、厂家营运呆滞，不明商情，视普通商业为投机事业也。譬如一厂有丝车三百部，每天须毛茧七担半，月以二十八天计，年以十一个月计，每年约须毛茧二千三百余担，酌中定价，每担平均以规元一百二十两为标准，共合规元二十七万七千余两。如大厂有车六百部者，倍之。凡大资本家，均于新茧上市时办足周年之货（除固定资本外，余向钱庄、银行挪移，货到上海，即以为抵押品）。计其所耗利息、保险、栈租、亏分等，平均计算，每担约须加价规元十两，即成丝一担，须加成本五十余两。丝价涨否，尚无把握，而成本之增，已有成数，故偶遇外洋丝市滞销之年，莫不全军复没。如昔日之旗昌及某某等各大厂，失败之迹，历历在目，其故岂不以此。若夫小资本家，无此魄力，于新茧上市时，所办之货，仅敷三、四个月之用，至多不过半年之货，用罄时逐次向囤户添办，虽稍受亏损，究属有限；大资本家之忽为倾家荡产者，不可同日语矣。（时报，1913年1月11日社论。）

湘省矿山林立，所出生锑，异常充足，去岁（1910年）年终，锑砂云集，各矿商多需银应用，跌价至六十余两，各西商仍抑勒价值，不肯收受。直至今年，忽然大消，英、德各商联袂而来，数月之间，已每吨涨至八十二两有奇，现在尚有望涨之势。此亦矿界之一大转机也。（时报，1911年2月13日。）

〔长沙〕南关外三益锑矿公司，近以锑砂出数日旺，每至价跌之时，洋商辄抑勒价值，因于日前提议自行设厂提炼纯锑，以便装运赴汉（口）销售，借图抵制。刻已就原有之大成公司旧址，设炉开炼，名曰集成炼矿公司，专炼各种生锑，提成纯锑，并兼收各处生锑，代为提炼，以期扩充。现已通告各矿商，定期本月初八日即行开炼矣。（时报，1911年2月13日。）

查（长沙）炼纯锑之厂，向惟华昌炼矿公司一家，独专其利。该厂机力曾经扩充，近来每日可出纯锑十吨左右，更拟将来推广。该机器造自法国，初仅日出锑二吨。乃不意本地有真华商某号，竟将该机器放大，所出纯锑，质地甚高，此亦足可纪录之一事。本省尚拟设炼锑厂二处，现今正在筹画间。以视全省锑矿之富，则此事殊不足为奇。盖湖南锑矿之富，可谓硕大无朋，世界间尚有面积相同之点，而堪与比似（拟）者乎？若果开采而锻炼之，必能大有影响于商市也。至黑、白铅砂，自洋商与水口山矿局订立合同购办以来，即能实行供给。此白铅砂输出之数得有进步者，职是故耳。查此铅矿开办已十有六年，纯系华人主持，其经理为广东人。开采之法，中西兼用，机器完备，近更修筑轻便轨道，自矿窿直达江干，延长有三十里。所出矿砂，即在矿中敲选，分别砂、石。炼成之白铅，大都售于铜元局，每吨价值二百两左右。其衔（含）有黑铅者，则售于礼和洋行，运至武昌工厂提炼。该矿今不出黑铅，前曾设提炼黑铅于本城，数月即停办。按湖南实业杂志内云：该矿自开办至今，出砂价值达五百余万金，获利三百余万。兹将该志所载本年（1912）五、六、七月出砂表，照录于后。

			5月	6月	7月
采出之毛砂(吨)		西法	2,246	2,528	2,210
		土法	1,086	1,494	1,589
		合共	3,332	4,022	3,799
实用毛砂(吨)			3,214	3,427	3,918
选出净砂	黑铅砂	数量(吨)	315	256	284
		价值银(两)	18,900	15,630	17,040
	白铅砂	数量(吨)	877	931	896
		价值银(两)	14,032	14,896	14,336
	合共	数量(吨)	1,192	1,187	1,180
		价值银(两)	32,932	30,526	31,376

除上述诸矿外，省中别无西法开采者，殆资本缺乏，系一最大阻力。洋商承办，固不能容，订借大宗洋款，又恐起国际交涉，然即欲吸收洋款，以图利济宜，莫若现行之法，最为妥善。其法维何，即指定开采某矿，与洋商订立合同，请其垫款若干，俟出矿砂，即行供给，议订价格，可按市情随时涨落，惟须照市价稍低耳。此外尚有锡之一物，将来发达繁昌，亦可预卜。查本年锡块出口，数逾百吨，品质精良，惟矿中资本不充，开采悉用土法。湘省所出锡器，即此锡所造，久远驰名云。（关册，1912年，中文本，长沙口，页56—57。）

大冶铁矿之运出者，……册载之价，较市价只三分之一。前清光绪二十四年鄂督张之洞与日本人立约借款开矿时，约内订定以矿砂偿之。其价极低，每吨作日本银元三元，合关平银二两有零。后复借款，仍照此续订，故其价永如其旧。（关册，1912年，中文本，汉口，页66。）

东报记湖北大冶铁山借日本兴业银行款项之合同，西（1930年）正月二十一日东京来电云：中国办理大冶铁山之事，于本月十五日由日本制铁所长官代理小田切、总领事日本兴业银行代理井上理事及监督，将本合同签押。该合同之大略如左：一、日本兴业银行将日本金币三百万元借与大冶铁山，年利六分，以三十年为期。其借贷之次序，于合同签押之日，先交付百万元，以后三个月，每月交付百万元，以签押后六个月交付清楚。二、将大冶得道湾矿山大冶矿局现有及将来延长之运搬矿石用之铁道、车辆、房屋及机械修理署等，作为本借款之担保。三、大冶矿山当延聘日本工程师一名。四、日本制铁所每年向大冶矿山购入矿石七万吨以上，至十万吨，若在特别之时多需矿石，则可更购入二万吨。其价值：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二十九日照既定之率；以后十年间，则照新订合同价，每一等矿石一吨，值日本金币三元，二等矿石一吨，值日本金币二元二十钱；十年期满，则更定价值，两面商议，不合之时，则可选评价人评定之。五、制铁所以每次应交付之矿石价目，直交付于兴业银行，征该银行之领收单，以送往大冶矿局，即以之为偿还借款之金，照数计算。如此三十年以内，本利均得还清。兴业银行照右所开之合同，于合同签押之日，从他处筹措一百万元交付中国，该行尚拟特发行债券，以应本借款之数。（译自1月23日大坂朝日新闻，中外日报，1903年1月28日。）

（三）民族工业产品市场的限度

1898和1899两年，（在广州）突然涌现的七家修建小火轮的船厂和四家修理锅炉的机器厂，能否继续就业，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对于新的汽船的需要，很快就会达到它的极限。（关册，1899年，英文本，广州口，页557。）

（汉口）各蛋白厂生意尚好，但国内市扬很容易供过于求。由于这种东西不能贮藏过久，所以生产必须能保持在市场保证有利可图的需要范围以内。（关册，1903年，英文本，汉口，页241。）

〔**光绪34年4月17日湖广总督赵尔巽奏**〕长江上下一带纺织公司，以湖北纱厂、通州纱厂为得地利。上海虽有数厂，而原料、工资，运脚三者皆重，故其得利较薄。……所可虑者，商民趋利若鹜，往往见一工厂获利，则相率效之，如上海面粉公司，初本一家，赢利甚厚，迨陆续添至七厂，原料以竞买而昂，出货以过多而贱，近年亏累停工，日有所闻。（戊申大政记，光绪34年4月17日，页3。）

近数年来，各（纱）厂之亏折，多寡不等，而无有能稍赢者。闻华盛、大纯两厂，自创办以来，历年亏折，竟至数万。议者多谓总办厂务者，经理不得其宜，而不知纱厂壅滞，不能畅销，亦有无可如何者也。盖原其所以不能畅销之故，厂丝销之外洋，虽偶形壅滞，而一遇缺乏，则价值飞涨，各厂之货，可一旦销罄；而纱厂则仅销内地，虽为民间日用之需，而销数零琐，无大宗售出之货，故纱厂愈多，则销数愈绌。诚以民间之所用有限，而厂纱之出数日伙也。为今之计，惟有于上海之地，合各纱厂之力，创一织布公（工）厂，将各厂滞积之纱，织成布匹，然后广销各内地、各口岸，则厂纱可以免积滞之虑。（中外日报，1898年10月15日。）

苏纶纱厂，所出棉纱，近日销路颇滞。推原其故，皆因太仓沙溪济太（济泰）纱厂成立后，所出之纱，较苏地为价廉物美；其余通州之大生厂纱，近颇畅销。而向之购纱织布者，皆来自通、太等处，近皆就近购用，致苏纱顿少销路。（时报，1907年11月15日。）

此外，世界上这一个角落的"中国西南"居民，并不是火柴的大消费者：他只是在早晨当他向邻居借不到火的时候，用它来点火，以后一个纸捻子或者炉火就满足了他们的大部分需要。因此，如果有些火柴不是点起来都满意的话，这个在别的地方必不可少的小东西的需要，就更小了。"重庆"这两个"火柴"工厂供给本省"四川"和邻省的需要，每年销货总值超过二十五万两。（报告，1892—1901年，重庆口，页136。）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帝国主义兼并中国纱厂情况

1897——1936

兼并时期	被兼并之纱厂	被兼并时的纱锭数	兼　并　者	兼　　并　　方　　式
纱锭合计		770,664		
1897	上海裕晋	15,000	协隆纱厂	由协隆收买，后者因积欠道胜银行38万两，于1901年被迫拍卖。
1902	上海兴泰	15,000	日本三井物产会社	成立之次年，即为以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为中心之日商买去。
1906	上海大纯	20,392	日本三井物产会社	亦为山本收买，与兴泰合并，改称上海纺织第二厂。
1908	上海九成	9,424	日本棉花会社	原为中日合资，开业不久即被归并，改名日信。
1918	上海裕源	26,936	日本内外棉纺织会社	当时资产总值104万两，以82万两出卖。
1921	上海公益	25,676	英国怡和洋行	先是厂主为利用怡和洋行推广销路，让一部分股份与怡和，成为中英合资，1921年后全归怡和。
1923	郑州豫丰	50,000	美国慎昌洋行	因债务关系，归慎昌经营，名义上为"租办"。
1923	天津宝成	25,000	美国慎昌洋行	成立之次年，因机价未能清偿，归慎昌经理，1931年始收回。
1925	天津裕大	30,000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	接收营业，清偿债务，订期20年。
1925	上海宝成一厂	41,472	日本东亚兴业会社	抵押借款，到期未还，被拍卖。
1925	上海宝成二厂	69,952	日本东亚兴业会社	
1926	上海华丰	25,600	日本日华会社	1924年归日华接管，1926年收买。
1927	上海统益一、二厂	44,544	英国庚兴洋行	委托管理。
1929	汉口第一	88,160	英国安利洋行	由第一债权人沙逊洋行租与安利洋行接办。
1931	上海三新	69,000	英国汇丰银行	收买其地基厂房，作价450万两，后以540万两转售与大来公司。
1932	上海崇信	34,000	英国庚兴洋行	原为中英合资，英股占三分之一，后为庚兴全部兼并。
1936	唐山华新	26,800	日本东洋纺织会社	由东纺投资300万元，名为合办，1936年为日厂接收。
1936	上海振华	13,548	日本内外棉纺织会社	收买纱锭。
1936	上海同昌	11,500	日本内外棉纺织会社	收买纱锭。
1936	天津宝成第三	27,028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及日本大阪伊藤忠商事会社	因厂主无力清偿债务，由债权人拍卖，被东拓及伊藤合组之天津纺绩公司买去。
1936	天津裕元	71,360	日本大仓洋行	因积欠大仓洋行370万元，被拍卖与日本钟纺，改称公大六厂。
1936	天津华新	30,272	日本钟渊纺织会社	原资本2,421,900元，以120万元出卖，改称公大七厂。

资料来源：根据严中平，中国纱厂沿革表，1890—1937，及历届中国纱厂一览表编制。

（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近代工业中雇佣工人人数的总估计(1894年)

业别	工人人数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	34,000人
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工业	9,100——10,810人
清政府经营的炼铁与纺织工业	5,500——6,000人
近代矿业	16,000——20,000人
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	27,250人
共计	91,850——98,060人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一八九四年工人集中情况

（一）近代工业工人地域集中情况

1894年

地　　域	工　人　数	占工人总数之%
上　　海	36,220	47.75—46.40
汉　　口	12,850—13,350	16.94—17.10
广　　州	10,300	13.58—13.20
天　　津	3,080—4,180	4.06— 5.35
福州及其附近	2,970—3,240	3.92— 4.15
九　　江	1,000	1.32— 1.28
南　　京	700—1,000	0.92— 1.28
汕　　头	600	0.79— 0.77
厦　　门	500	0.66— 0.64
其　　它	7,630—7,670	10.06— 9.83
共　　计	75,850—78,060	100

编者注：此表仅包括工厂工人而不包括采矿业工人。

（二）近代工业工人产业别分配情况

1894年

业　　别	工　人　数	占工人总数之%
机器缫丝业	19,600	21.34—19.98
船舶修造业与机器铁工业	10,100	10.00—10.29
军用工业	9,100—10,810	9.91—11.04
轧花业与棉纺织业	9,050—9,550	9.85— 9.75
煤矿开采业	7,900—9,600	8.60— 9.78
制茶业	7,400	8.06— 7.55
金属各矿开采业	6,300—8,200	6.86— 8.36
火柴制造业	3,400	3.70— 3.47
炼铁业	3,000	3.27— 3.06
造纸业与印刷业	2,830	3.08— 2.88
铁矿开采业	1,800—2,200	1.96— 2.24
公用事业	1,400	1.52— 1.44
其它工业	9,970	10.85—10.16
共　　计	91,850—98,060	100

（三）雇佣500工人以上的工厂矿山工人人数

1894年

业别	外国资本经营		清政府经营		民族资本经营		合计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机器缫丝业	5	5,400			9	6,400	14	11,800
军用工业			5	7,830—9,500			5	7,830—9,500
棉纺织业			1	2,500—3,000	2	5,000	3	7,500—8,000
采煤业			3	5,300—7,000	2	1,000	5	6,300—8,000
船舶修造业与机器铁工业	3	7,900					3	7,900
砖茶制造业	4	5,000					4	5,000
金属各矿开采业			1	2,800—3,600			1	2,800—3,600
炼铁业			1	3,000			1	3,000
铁矿开采业			2	1,800—2,200			2	1,800—2,200
造纸业与印刷业	1	600			1	500	2	1,100
火柴制造业					1	800	1	800
公用事业	1	700					1	700
其它工业	1	600					1	600
共计	11	20,200	13	23,230—28,300	15	13,700	39	57,130—62,200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
中国产业工人人数的初步统计

张宗仁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产业工人共约一百九十多万人。分析言之，如下表：

类	别	工人数
工厂工人	中国工厂工人	702,488
	帝国主义在华工厂工人	320,000
矿工		596,990
交通工人	邮政工人	23,154
	电政工人	10,741
	铁路工人	142,991
海员		150,000
总计		1,946,364

工厂工人包括织染、机械、器具、化学、饮食品、印刷、电气及冶金等工厂工人。中国工厂工人人数主要是根据一九一五年北京农商部所编“农商统计表”的记载。据北京农商部统计，一九一五年全国各省工厂和中央官办工厂共有工人六九八、五七一人。是年统计尚缺云南省的工人数。兹以一九一四年农商部统计云南省的工人数三、九一七人补这一缺额，共计七〇二、四八八人。我所以采用北京农商部一九一五年的统计，是因为这一年的统计比较完备；自一九一六年起，由于军阀混战，各省工人人数统计多不全，或全未统计；到了一九二一年，全未统计的竟达二十个省区之多。但必须指出：上述一九一五年的全国工人人数统计，也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因为，一九一五年以后，欧洲帝国主义正忙于相互之间的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也有较大的增加。此种情况拿历年调查统计完备的京兆、江苏及直隶等三省区作一比较就可证明：

地区	1915年		1920年	
	工厂数	工人数	工厂数	工人数
京兆	222	6,483	365	8,921
江苏	1,288	142,678	1,557	192,861
直隶	2,267	43,183	1,231	128,414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一九一五年以后，有的省区工厂数增多，工人人数增加；有的工厂数虽然减少，但原有工厂规模扩大，到一九二〇年工人的总数还是增加了。

帝国主义在华工厂工人数是根据邓中夏同志一九二四年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的估计。邓中夏同志的估计是根据一九一五年北京农商部的调查，并参考了日人善生永助著“最近支那经济”和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调查。但这还是较低的估计，如邓中夏同志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说：一九二五年广州香港大罢工时，由香港回广州的工人共二十五万；同年五卅运动时，上海总工会报告，上海一地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罢工人数共有十三万多人。由此可见，仅香港、上海两地在外国工厂及其他机构中做工的中国工人，至少有四十万人左右。如果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其他各地所设工厂的工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和东北设立的规模较大的工厂的工人统计在内，其数字将更大。

矿工：据一九一五年北京农商部调查，全国矿工共有五一〇、三六九人。是年调查缺云南省矿工人数。兹以一九一四年云南矿工人数八六、六二一人补这一缺额，则一九一五年全国矿工共有五九六、九九〇人。农商部调查的缺点在于将一部分用土法开矿的工人包括在内。不过，中国的近代矿业和近代工厂一样，一九一四年以后也有较大的发展。如一九二六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编“中国矿业纪要”记载，在矿产中占主要地位的煤炭产量，一九一八年用新法开采的共一二、三三九、五〇二吨，而一九二〇年则增至一五、二五九、六一〇吨。毫无疑问，随着近代矿业的发展，近代的矿工人数也会增加。因此，一九一五年农商部的调查虽然将一部分用土法开矿的工人计算在内，还是较接近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矿工的实际人数的。

交通工人包括邮政、电政及铁路工人。据一九三一年交通部“中国邮政统计专刊”记载，一九二一年全国邮政工人共二三、一五四人。一九二一年交通部“统计图表”调查，全国电政工人共一〇、七四一人。一九二一年交通部“国有铁路会计统计总报告”载，全国共有铁路工人八九、〇四三人，而是年尚缺陇海、胶济、中东、南满、滇越、广九等六路及民营各路工人数。兹以一九二四年交通部调查陇海等六路工人共五二、二三四人及一九二一年“统计图表”记载民营各路工人共一、七一四人补其缺额，则如上表所列全国铁路工人共有一四二、九九一人。将上述邮政工人、电政工人和铁路工人都算做交通工人，则一九二一年全国交通工人共有一七六、八八六人。

海员人数，据邓中夏同志一九二四年著“我们的力量”一文说：远洋航行的轮船固然完全为帝国主义者所有，就是沿海及沿河轮船亦百分之九十五、六是帝国主义者所有。我们无从调查。据深悉海员情形的人说，外国轮船航行远洋的，华籍海员，宁波人约四万以上，广东人约六万以上，加上沿海及沿河的海员，总人数当在十五万人。据一九二一年交通部“统计图表”记载，全国轮船总吨数为二七〇、一一〇吨；据一九二八年交通部“统计年报”调查，全国轮船共二九〇、七九一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七年中，轮船数量仅增加了二〇、六八一吨，由此可以推断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三年间的海员人数当不会有大的增加。以邓中夏同志这个估计数字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海员人数，还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产业工人约一百九十多万人。但有两点应当声明：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统计科学很落后，因而上述的统计（有一部分是估计），有一些是不精确的。希望读者继续提供可靠的材料，以便改正。二、通常在统计产业工人人数时，多将都市苦力工人即码头搬运夫、人力车夫、粪夫及清道夫等人数统计在内。我

没有把都市苦力工人统计在内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确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页）可见我国都市苦力工人与现代产业工人还是有区别的。

（原载《党史资料》一九五三年第六期）

一九一二——一九二一年
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刘 明 逵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势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优点之一是“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毛主席这个正确的论断，是建筑在丰富的历史材料基础之上的。现在把1912到1921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某些历史材料提供出来，供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者在正确阐明毛主席这个论断时的参考。

下面就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

首先谈工作时间问题。中国各种厂矿企业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很长。小工厂大都沿用旧习惯，工作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定，可以因工作忙闲而伸缩，忙时增加夜工，闲时或只作半工，也有些工厂随季节变化而将工作时间临时变通。规模较大的厂矿对于工作时间都有具体规定。在1912年以前，各厂的工作时间大多是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这时一般的都不设夜工，只最大规模的工厂间或有夜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1912年以后，大多为十二小时到十四、十五小时，最长的达十七、十八小时；而夜工则日渐普及，都市中较大的工厂，几乎都有夜工。现根据1920年“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专号）及第八卷第一号将各地各业工人劳动时间列表如下：

上海：纺织业十二小时，织布业十三小时半至十五小时，缫丝业十二至十四小时，烟草业十一小时半，造纸业十小时半，印刷业九小时，碾米业十二小时，机器业九小时，电器业十至十二小时，江南造船厂九小时，兵工厂九小时至十小时。

无锡：纺纱厂十一小时半，织布厂十二小时，丝厂十三小时半，面粉厂十一小时，榨油厂十小时。

北京：印刷业十小时，电工十一小时，面粉业十一小时，织布业十一小时，地毯厂十一小时。

天津：造币厂十小时，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十小时。

武昌：织布局日工十一小时、夜工十二小时，纺纱局日工十一小时、夜工十二小时，铜

币局日工十小时、夜工四小时，银币局日工十小时、无夜工，麻布局和纺纱局相同。

上表揭示，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十二小时，多的是十四、十五小时，少的是九、十小时。但是在九、十小时的劳动部门里，资本家往往借口工作忙增加夜工，如上海印刷业、江南造船厂、兵工厂和天津造币厂等，都曾增加到十二、十三小时（“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无锡缫丝工人则由十三小时半增加到十四小时三刻。（“解放画报”第五期，1920年10月。）此外，因工资少，迫使工人自己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也很多。这样，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大部分是在十二小时至十五、六小时。

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工作时间内都还有休息、吃饭的时间、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工厂也多是昼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或只有日班工作十二小时至十五、六小时。但除了少数工厂于正午、半夜换班时间各给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外，“大多数工厂都没有为休息或吃饭而定的任何闲歇时间，人们在饿急时就吃起来，一面照料着机器或是看守着卷丝车的绽子，一面不时地吞上一口。”（“中国的大门”。）

还应指出，中外资本家很少修造工房，工人住屋距离工厂很远，上下班花在路途的时间就得几小时。并且，工人因怕误时迟到而受罚还得早做准备，或早到工厂门口去候班。据一个外人在上海调查：很多“工厂的工人来自郊区，……因为必须两小时才能由家走到工厂，每日清晨四小时即须离家。当一天工作完毕六点钟下班之后，仍须两个多小时走回家去。常是在夜里因月亮光辉使她误会在三点或更早一些就起床。……一个穷苦的灵魂，至终到了工厂的大门才成堆地停在潮湿的地上而等着鸣笛”（“中国的大门”）。这样，在大城市中的工厂工人连从家预备、走路、候班以及工作时间，一共必要十五、六小时，最长的就要达十七、八小时了。

矿工工作时间，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少于工厂工人，而中国则与工厂工人一样的长，甚至超过工厂工人。各地矿业工作时间一般是十小时至十二小时。开滦煤矿与山东淄川煤矿等，名义上是三班轮流，每班八小时，但因工资过低，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开滦矿工常连作两班十六小时，淄川矿工亦常延到十小时。其它各地煤矿多实行两班轮流制，每班十二小时。也有实行隔日轮班制的，每班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如鞍山铁矿）。有一些土矿，因设备简陋，矿坑出入不便，矿工每日竟在坑内工作二十四小时，如直隶石门寨土法矿，山东博山土煤矿、章丘煤矿等都是如此。（长野朗：“支那劳动者与劳动运动”1925年4月出版）更惊人的，如湖南湘潭石膏矿，矿内全用童工，每次童工下窿后，必须在黑暗、阴湿的地洞水窖中经过七日夜，方得出来；湖北应城之石膏矿每次下窖后，必须半个月方得出来。（“中国青年工人概况”1925年10月出版）

各厂矿企业不但每日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全月或全年工作日数也很高。除因受季节影响、气候关系（如汉口纱厂每因夏季炎热暂时停工或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市场变动、劳资纠纷而停工或减产时，平时例假休息时间很少。全年除旧历三节及国庆日、纪念日为例假，星期日停工者不多，大多数是每月分班休息一日或两日。据日人调查各地纺织工厂全年工作日数如下：

地名	全年工作日数	地名	全年工作日数
北京	310	江苏	240—300
天津	266—312	杭州	300
山东	280	浙江	300—304

河　南	240—300	武　昌	270
上　海	300—350		

（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1925年8月出版。）

开滦各矿坑，1918—1919两年，全年工作日数达三五四——三五五日。铁路工人全年工作日数，京汉路为三二五——三三三日，京奉路为二九九——三二八日，沪宁路为三五〇日，正太路为三〇〇日，陇海路为三四〇日，广九路为三五一日。（长野朗："支那劳动者与劳动运动"；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

由于每日工作时间之长，全年工作日数之多，加之劳动条件异常恶劣，就使工人们在身心两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据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天津造币总厂的工人状况"一文中所述：工人"因加工时间过多，劳动过度，类多鸠形鹄面，颜色枯槁，已失人生本来面目，全无人生乐趣"。又1916年6月"妇女时报"第十八号"上海贫女生涯之调查"一文中所记缫丝工人劳动情形："丝厂开工过早，天未破晓，即汽笛鸣鸣，催人上工。缫丝工人路远者，往往三更即起，披星戴月而奔。七时上工，晚六时始散，全日工作时间往往十二小时之多。日未出而作，日既没而息，终日劳动于巨厂之炉火机釜之间，不许其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丝厂女工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因工作时间过长，致工人寿命严重缩短。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唐山劳动状况"一文指出："开滦矿工大都不过五十岁。"又据一位医生的报告：人力车夫"因终日曲背狂奔，肺部过于损伤，平均一人损失寿命十五年。"（1919年3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有些童工或老工人，因工作时间过长而累死的惨痛事件也经常发生。1916年3月30日的上海时报上有这样一条消息："年十四岁女工全瑛，向在戈登路第四纱厂做工。目前进厂作夜工，至次晨放工出厂，在附近木作内略事休息，因工作时间过长，体力不支，忽然倒地身死。"北京"每周评论"（1919年4月22日）"贫民的哭声"栏内写道："我七十一岁的爸爸，那天拉煤回来，不知怎么到家倒在地下，就死了。我的可怜的丈夫，他拉车累的吐血死了。如今我的儿子又在大风雪中拉，可怜我那十二岁的孩子，拉一步喘一口气。"

女工们还要遭受生理上的特殊损害。她们因过度劳动引起的月经不正常是普遍的现象，并且常常流产。她们在怀孕后直到分娩前，从不敢请假休息，因为在休息的时日里，不仅拿不到工资，而且还有失业的危险。女工们往往头天夜间还在做工，第二天早晨就生下了孩子，甚至未走出工厂大门便把孩子生下来的也不少见。（唐海："中国劳动问题"，1926年12月出版。）由于怀孕期间过度疲劳，孩子死产率很大，或不健壮。1916年，北京市生产总数一五、八六〇人，竟死掉了四七七五人，即占生产总数的30%。劳动者所生孩子的死产率就更大，恐怕要占到出生总数的35—40%。（小山清次："支那劳动者研究"1919年12月出版。）

长时间的劳动，使母亲不能抚养孩子。据一个西洋人报告："母亲们把吃奶孩子带到工厂，工作时把他们放在脚下，以后在大纱厂中已经不允许这样作了。"于是，"一些亲属可能是祖母，带着小孩来找母亲喂奶，上下午各一次。做夜工的母亲们常常在离家前挤下足够的奶，留给婴儿吃到他们第二天早晨回家时为止"（"中国的大门"）。可是，有些工厂根本不允许将吃奶的孩子带进厂内，女工们只好把孩子送入育婴堂。如上海仁济堂，送小孩的以女工为最多。婴儿死亡自1919年4月至年底统计如下：

收男孩	19	死男孩	11	领去男孩	8
收女孩	338	死女孩	216	领去女孩	122

（上海"劳动界"第四册，1920年9月5日）

上引的一些材料，是极不完全的，但也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外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而无限制的延长劳动时间，给工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由于无限制的盲目的冲动，由于对于剩余劳动的狼样的贪欲，不仅突破了劳动日的道德的最高限，并且突破了劳动日的纯然生理的最高限。它侵夺了身体得以生长、发育和健全维持的时间。它偷去了消费新鲜空气和阳光所必要的时间。它侵蚀了饮食的时间，只要可能，便把这种时间并入生产过程中，以致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资本论"第一卷。）

中外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大的利润，任何为改善劳动条件的支出都极力减少，厂矿的设备十分恶劣，工人大都在厂房狭小、空气污浊、及毫无安全设备的危险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紧张劳动。因此，工人们的职业病与伤亡事故都特别严重。

矿业可以举开滦煤矿为例。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唐山劳动者状况"一文中写道："矿中的情状非去过的是想象不出的，……我们现自去调查的是第七层和第八层（因矿局不容外人入矿，颇不易调查）。大路阔十一尺，高十尺，途中黑没灯火及种种设备，非常泥泞，路旁有水沟，水深过膝。路中设轨，用骡马运煤。小路阔只七尺，高只四尺半。走的须俯伏行走。顶和两旁用木柱上撑，身首偶触之，煤块纷纷从上下坠。工作的地方非常狭窄，且煤层向上斜坡，矿工赤身涂炭，屈曲如猬，借一点灯光，在内工作。这种状况，看见的都要想这是宗教里的地狱，而非人间。并且还有许多危险的工作。虽然里面有通气的风筒，但是一些流动的空气都没有，空气里夹着煤气、水气、硫磺气和种种重浊的臭气。气温的高至华氏八十三度，气压的大大到水银柱三十二寸十分之七。在第八层一千四百六十六尺下，地面都是水，伸腰须俯在地上。"

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土法采矿很多，这些矿井的工作条件更坏。如河北省房山等处的土矿的劳动条件，1915年3月的"直隶实业杂志"写道："以小资本土法开采者，内部工程极为草草，矿工操作，困苦莫加。头戴一灯，手足并行，颈不得伸，臂不得直，伛偻而行，从事掘采，而水患岩崩，时有生命之险，苦亦甚矣。"又如湖南各地的土法采矿情形，1917年"矿业杂志"（湖南）写道："窿坑随矿脉之方向前进，高度则依矿脉之厚薄而定，其低者仅尺许，坑夫出入大都蛇行，窿坑大小既不一定，且弯曲极多，加之窿内窄小，空气薄至灯火亦不能燃烧。矿工就在这样空气稀有夹杂硫黄、鼻气的暗坑中工作。"1920年云南锡矿工人投稿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7日）控诉他们的劳动条件说："新旧矿洞均高二尺许，直进（即爬行）有两千步，空手出进已够难了，再加负物而出，实不得已为之。洞内人气、汗气、土气、矿气，混和为一，比死尸还臭，洞内所出之气，如云如烟，闻之作呕。水又难贵，工人饮者即不能洗脸、洗脸者即无水饮。矿洞名之曰活地狱，亦无不可。"这种可怕的劳动条件必然引起工人身体的严重损坏与各种疾病。

矿井中的伤亡事故是非常严重的。1917年抚顺煤矿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九二一人。抚顺煤矿是号称"关怀劳动保险"的，且看它历年的灾害情况：

年份	灾害次数	指数	死伤人数	指数
1907	125	100	141	100
1908	203	162.4	209	148.2
1909	356	284.8	443	314.2
1910	581	464.8	600	425.5
1911	1,233	986.4	1,247	884.4
1912	1,861	1,488.8	1,864	1,322.0
1913	2,918	2,334.4	3,148	2,232.6
1914	3,338	2,670.4	3,479	2,467.4
1915	3,440	2,752.0	3,737	2,650.4
1916	3,809	3,047.2	5,279	3,744.0
1917	3,507	2,805.6	3,884	2,754.6
1918	4,130	3,304.0	4,698	3,331.9
1919	4,724	3,779.2	4,799	3,403.5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及虞和寅："矿业报告"第二册。）

此表显示出灾害次数与伤亡人数，历年都显著增加。若以1919年伤亡人数一四七九九人与该矿工人总数四六、三五三人相比，死亡率竟达10%强。

下表是本溪湖煤铁矿的历年灾害情况：

年份	灾害次数	伤亡人数
1918	540	2,128
1919	1,088	2,657
1920	1,434	2,395

（虞和寅："矿业报告"第四册）

开滦煤矿是以"设备完善"著名的，但工人伤亡率也很高。因公司对此向无报告，故难知其精确数目。不过，发生重大灾害，也不能掩人耳目。如1920年10月14日该矿因沼气爆发，致工人死者五、六百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一惨痛事件，曾被全国各地报刊所揭露，并引起社会舆论对该矿的攻击。又据1920年有人调查：该矿"每月因伤死于矿内者平均四人，多的时候十几人、几十人不等（病死者不计）。大半因不通风致闷死和中毒死。伤的人比死的人多两倍。生率无从调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又如山东中兴煤矿，由1912——1924年，伤了二六、〇四四人，死了八五三人。1915年2月1日一次灾害就死了四〇〇余人，伤了二〇〇余人。（"矿业周报"创刊号，1928年4月）土法采矿发生的伤亡事故也很惊人。例如1915年，湖南各矿有工人人数一二、一八四人，伤亡人数达二、二七七人，（死七二六人，伤一、五五一人）伤亡工人占工人总数18.7%。（"农商公报"第19期，1916年2月）

在工厂中，劳动条件和伤亡事故也是同样的恶劣和严重。以上海纺织业为例，据1920年前后调查："上海各纺织工厂，普通均采用女工，男工人数不过女工三分之一，盖纱厂中工作，除清花机、钢丝车、浆纱机、肩粗纱、肩花卷、摇龙头和打包为男工工作外，摇纱间、废纱间，即男女皆有，其它各部分全为女工。本地少年妇女，多在细纱间与经纱间操作，老年妇女多在粗纱间工作，江北妇女，体质较强，多在摇纱间工作。……最初曾有数工厂为女工设座位，嗣又撤去。夏日纱厂中热度高至九十四、五度，纤弱之妇女，终日继续工作，颇

有不能抵抗者。由此中暑女工之出勤者比率，降至3%，可见一般。彼辈大都面黄身瘦，脚部水肿，状态至为可怜。”且“厂中温度，平日亦较他处为高，灰尘与原棉之纤维，亦时飞散空中，有时温度过高，灰尘四处飞扬，殊为不合卫生。多数纱厂不注意厕所之设备，以至臭气扑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及“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童工也是在上述环境中，自始至终立而工作。“执役纺纱土厂，热气熏蒸，纤维障目，于儿童目光身体已属非宜，况于火柴厂、制烟厂、以及种种制革制药等厂，更为臭味浸染，脑力全昏，虽幸长大，殆成废人。调查工厂时，常见多数婴儿随母工作，大者执役杂务，小者匍匐洒扫，甚至数人始能举一畚器，呱呱惨状，至难入目。”（“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在上述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所造成的灾害率和疾病率非常高。据上海杨树浦工业医院于1924年报告，该院自1919年成立以来，经其治疗之八八〇名纺纱工人，所遭受的疾病灾害情况：多数工人所受灾害情况不一，男工之工作种类繁多，自纺工至负物之苦工俱有，故其受伤部位因工作不同，上下四肢皆有。至女工与童工则因工作于机旁，上肢之伤害占最大部分，因受伤而致残废之女工童工，多数为手部之残废。手部对于工人，尤以对于纺织工人，最为有用，而受伤害之机会，亦最多，实为至可惋惜之事。至于灾害之性质，最多的是破裂，复杂折断，普通折断，烫伤等。其中因伤致永久残废者，男工占20%，女工占44%，童工占29%；其中因伤致死亡者，男工占1.7%，童工占3%。此外还有很多女工从事工作于纺织室内，有一尖头机械，常将女工眼珠刺伤，受刺之眼珠因而完全失明或部分失明者，颇不少见。在疾病中，最多的是肺部，占各类工人总数的9%，呼吸病占总数的9%，脚气病占总数的5%，寄生虫病占总数的19%，长期腿疮占总数的5%。这都是纺纱业中最普通的职业病。其中最宜注意者，为女工童工之肺病百分比甚高，童工占22%，女工占14%。该报告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厂内灰尘纤维飞扬，漂白粉之刺激气味，对于肺病及其他呼吸病之高度百分比，确为一个原因。厂中空气，热而且湿，亦为此两疾病盛行之原因，长时间之工作与恶劣之生活状况，亦可目为原因。”（“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缫丝工业：据1920年前后上海缫丝业的调查：“除司账，监工、打杂、出店外，皆为女工。丝车间车声震荡，煮茧盆中，热水沸腾，间内空气，较间外空气加热四十度。因丝车忌风，无论天气冷热，门窗严闭，室内炎热，不令空气流通，苦闷可想。据人报告，暑天晕倒者颇不乏人。彼等体质颇劣，而日间无丝毫快乐与笑声，身心方面，极为可怜。此外尚有打盆小女孩，终日用短毛刷子，播打煮茧盆之水，有时滚水喷于手上，即受烫伤。此项工作为除去茧上之废物，将丝头显出，以便缫丝，童工常因与盆中沸水接触，致粗肿不忍卒睹。”（“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及“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丝头业是和缫丝业相近的一种工业，据1920年上海一个拣丝头的工人自述：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已变成粉碎之蚕肉，四处飞扬，这种东西被人吸到肚里去，日子久了就变成哮喘症。起初是咳嗽喷涕，之后，咳嗽，失眠，……，总之工人们没有一个是健全的。（上海“伙友”第一册，1920年10月）

化学工业：以塘沽久大精盐工厂与永利制碱工厂为例：“（1）全身血液病之感冒：久大工作为筋力劳动，工人用重大气力后，偶受风寒，即致感冒。故肩胛、腰背、足跟等着力处，常因筋肉紧张后，风寒乘虚而入，遂至肿痛。（2）皮肤之炎症：此症除寄生性外，几全为久大制盐工人，感受潮湿，发生炎肿。精盐之水分，与蒸气之潮湿，可认为致病之重要原因，故此项炎症，可认为精盐业之职业病。（3）外科之局部炎症。久大工人受局部之烫火伤者颇为常见，盐锅沸卤，盐坑热烟，及坑间通火条，皆属烫热异常，易伤工人。冬日

精盐场内蒸气弥漫全室，锅工登湿滑锅台，每致失足堕落锅内，烫伤四肢。（4）局部小损伤，次数颇多。”

“永利工人常见之疾病：（1）制碱机器，异常复杂，工人偶一失慎，即易受伤。遇有特别困难，更不免发生灾害。（2）永利所用之水管式锅炉，中国甚为少见，火夫须加意小心，方不致发生危险。（3）制咸所用气，偶有漏泄，即致妨碍工人之呼吸，如塔管破裂，铔气猛然扑出，更能熏人致病，妨害受伤之人呼吸与消化。（4）制碱机器之各种塔管内，气体与化学混合物颇属不少，从事修理之工人，常因之发生伤病。”（“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饮食工业：据1920年调查上海小沙渡大有榨油公司报告人说：该公司“进门未及三步，已觉鼻孔被塞，气闷得死。……其最可惨的，莫若死伤于机轮上，及皮带上的工人，大都非粉身碎骨，即头断臂落。这几年来惨遭这样死伤的，将近二十人了。在盛夏的时候，机器室中发现痧症者，每日必十数起，因而致死的，每年必有好几个。若然机房宽畅，工人必致不为皮带及机轮所触而死伤。若然空气流通，于盛夏时，痧症当然也不为这样的多了。所以这种工人的死伤，罪在厂中的布置不良，理应厂中对于死伤者，负极大的责任。想不到厂中对于死者，绝不体恤，对于中伤而未死而成残废的，反实行辞歇，其残酷有如是之厉害”（上海“伙友”第二册，1920年10月。）

印刷业的劳动状况，1920年2月22日上海“星期评论”（第三十八号）载“报馆的排印工人告读新闻者”一文指出：报馆里“许许多多的人，集在一间很气闷的房子里，油墨的臭气，汗气，再加上铅里面发散出来的毒素，弄得空气的成分，腐坏到了十分。报馆为经济上的关系，又不能够有相当的卫生设备，所以也就只好在恶臭的瓦斯中间过日子。……既得不着太阳光，又呼吸不着良好的空气，又没有相当的定期休息，因此，一个个没有不面色苍白、形容枯槁。”

烟草业：据1917年上海英美香烟厂的工人们自述：他们“整天工作是处于垂头曲背的状态，并且含胶粘贴，引起唇破舌裂，偶然失手制错，立被辱打罚金。又当天阴风雨的日子，不问冬夏，都是四窗紧闭，因此，烟气弥漫全室，脑子都被熏得麻醉，衣服被汗染湿。此等状况，实不异于身囚牢狱。”（1917年7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

火柴工业是对工人身体健康特别有害的劳动部门。1920年有人调查天津丹华火柴厂时谈道：“该厂房屋不大，空气不堪疏通，毒气弥漫全室，容易致病，又未加相当预防之法，殊非卫生之道。”（北京“劝业丛报”第一卷第一期，1920年7月）

其它如北京地毯业，据1920年有人调查：“其工人工作之处，即食宿之处，一入厂内秽气熏蒸，几不可耐，工徒烂眼等弊各厂皆然，光线不足者有之，空气塞闭者有之，工人精神困惫，都到极点。”（北京“劝业丛报”第一卷第三期，1921年1月。）另据北京青年会于1924年调查北京地毯业指出：该业艺徒“患肺病及沙眼者甚多。患者即无治疗机会，而所居之处所，又潮湿不堪，易于传染疾病，以燕京地毯厂为例，受检查之九九九人，其中患沙眼者八九三人，占总数89.3%，营养不足者五十四人，占总数5.4%，肺病三十七人，占总数3.7%，皮肤病七十六人，占总数7.6%，其它病甚多，不一一例举。”（“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资本家为了掩人耳目，有的也增加一点医药设备，但实际上都是形同虚设。例如，上海杨树浦工业医院，算是专为伤病工人诊治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医院，但院内设备简陋，药品缺乏。当

一个纱厂工人因全手绞缠于梳打废棉之机器中，手扎有若干小孔，破裂甚重，院中为经费所限，不能依惯例施用预防药剂，致成肌肉强直症。（“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资本主义各国，对于工人因公伤害死亡，还有赔偿法、保险法的规定，工人及其家属遇有事故发生，可以按规定向资本家要求补偿。中国则没有这些规定，中外资本家往往把负伤残废的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对伤害死亡的工人，有时迫于社会舆论的声势，略给“抚恤”，但少得不及一个牲畜的价值。例如开滦煤矿“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20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60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又如“上海某工厂压死工人，家属向那资本家去诉了苦，勉勉强强地得了八十块大洋钱的抚恤金，还要三日三夜传颂那资本家的大慈大悲。”可是就在这时报上有“一则法公堂判赔击毙疯狗的新闻，叫击疯狗的黄某赔偿那原告法商某损失洋八十元。”因此，人们以“人命不及狗命”一语控告当时的黑暗社会。（上海“劳动界”第十册，1920年10月10日。）

（二）

尽管工作日极长，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而工人的工资却非常低。“华北先锋报”把上海说成是“廉价劳工最好地猎取市场”，反映了中国工人工资的低下程度。

关于这时期全国各地企业的工资情况，缺乏较完整的统计材料。农商部曾作过统计，但其数字并不准确，所以，只根据一些零星材料进行考察。据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及第八卷第一号、“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七号（1921年10月）、“社会科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上面所载材料，将各地各业的工资列表如下：

地区	行业	工资
上海		
	纺织业	男0.22——0.47元
		女0.22——0.31元
		童0.18元
	丝织业	女0.15——0.40元
		童0.15——0.20元
	造纸业	男0.35——0.60元
		女0.14——0.20元
	烟草业	男0.40——0.50元
		女0.20——0.30元
	火柴业	男0.30——0.50元
		女0.20元
	印刷业	月15.00元以下
	机器业	学徒0.10——0.20元
		钢铁匠0.30——0.80——1.00元
	江南造船厂	0.20——0.90——2.60元
无锡		
	丝厂	0.08——0.35元
	纺纱厂	0.10——0.35元

	织布厂	0.08——0.26元
	面粉厂	（月）4——10元
	榨油厂	（月）10——18元
南京		
	机械	（月）9——15元
	印刷	（月）7——15元
	铁矿	（月）8——21元
	煤矿	（月）8——12元
	织布	（月）8——12元
北京		
	印刷业	（月）8——15元
	电工	（月）11——14元
	面粉业	（月）7——12元
	织布业	（月）7元
	地毯工厂	（月）12——15元
武昌		
	织布局	日工0.21元
		夜工0.12元
	纺纱局	日工0.21元
		夜工0.12元
	铜币局	日工0.10元
		夜工0.04元
	银币局	日工0.10元
	麻布局	和纺纱局相同
广州		
	机器工人	（月）20——30元
	电工	（月）8——10元
	火柴业	（月）10元
	织布业	男（月）10元
		女（月）6——9元

矿工、铁路工人和海员的工资材料很少。"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载：唐山京奉路制厂匠目、工匠每日工资〇·三〇——一·八〇元。香港海员每日〇·七——一·二〇元。开滦矿工，井上头等工人〇·二五元，二等工人〇·二二元，三等工人〇·二〇元；井下头等工人〇·三五元，二等工人〇·三〇元，三等工人〇·二五元。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据有人调查：1917年技工每月二二·八七元，普通工每月七·八四元；1918年技工二二·二一元，普通工七·九八元；1919年技工二七·一二元，普通工八·〇九元；1920年技工二七·七九元，普通工七·六四元；1921年技工二七·五六元，普通工七·四六元。

从上述材料看来，铁路工人、海员和市政工人的工资较高，纺织与其他工厂工人次之，矿工的工资最低。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工资都是极低的。除极少一部分技术工人

（如机器制造厂、铁路制造厂、造船厂、机器工匠等）每日工资有超过一元以上者外，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最高的不过五角多，最低的还不及二角，甚至还有的不到一角，一般是二、三角。女工、童工与男工作同样的工作，所得工资比男工却少得多，女工约低于男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童工约低于男工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中国工人的工资如果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相比较，日本比中国高4.1倍，美国比中国高14.8倍。如下表：

工人种类	美　国	日　本	中　国
面包工人	40.00	14.00	3.00
窑业工人	66.00	16.00	4.00
木　　工	56.00	17.50	4.20
瓦　　工	66.00	17.50	3.85
搬运工人	30.00	10.50	2.10
管　　工	54.00	16.10	4.90
印刷工人	48.00	13.60	3.50
平　　均	51.42	15.14	3.68

（西川喜一："中部支那劳动者的现状和全国劳动争议"，1924年出版。）

对这样低的可怜的工资，中外资本家还要用各种罚款以及其他方式进行盘夺。厂主可以自由规定罚例。例如上海德大、厚生两纱厂规定厂间普通罚例计九十二条，同时，各车间还有各车间罚例，计四十二条。这些罚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误时迟到"、"工作马虎"、"损坏物件"、"出言不逊"等等都是罚款的理由，甚至随意大小便，也在罚例。每条罚例少者五分，多者五角，或罚工半日和一工。（"江苏省纺织业状况"，1920年编）。又如上海江南造船厂规定："每次上工自汽笛知照后，如一刻钟内迟到者，罚工半日，工作时有私自出外者，查出罚工三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在这种种罚例之下，有的工人往往作了一天工还不够罚。

其次奖罚制度在厂矿中也极其盛行。例如上海织布业规定一匹工作时间为二十日，于规定期限内完成者，其工资为五千五百文，若逾限一日未织成者罚一百文，二日罚二百文，三、四、五日则罚三、四、五百文，若在十三、四日完成者，额外奖钱八百文，十七、八日织成者，额外奖钱二、三百文。然而，实际上得奖机会最少，而受罚者则是常事。（"妇女时报"第十八号）这是按完工之迟早作奖罚标准的。还有按完工之优劣者，例如抚顺煤矿"以日计资，日给三角，但有尝罚制，对于工作优良者给以红票，可领得工钱三角三分，对工作劣者，给以绿票，可领得工钱二角七分，白票则仍领工钱三角。"（虞和寅："抚顺煤矿报告"。）实际上工人得绿票者最多，也就是说，把规定的名义工资打了一个九折。又如山东中兴煤矿在奖罚制度下，矿工实际所得也总是低于名义工资，如下表：

年份	工资率(月)	实际所得(月)	增与减
1917	7.84元	7.36元	—0.48元
1918	7.98元	7.48元	—0.50元
1919	8.09元	7.59元	—0.50元
1920	7.64元	7.55元	—0.09元
1921	7.46元	7.44元	—0.02元

（"社会科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由此可见，所谓奖罚制度，实际上是资本家向工人罚款的一种变形。

拖欠工资和存工制度也是剥夺工人的一种形式。工厂里面发工资，有的每月一次，有的每月两次。如上海纱厂发工钱叫“关晌”，“关晌”以元为单位，不到一元的零头是不发的，存在厂里，下次再发。这是厂方拖欠工资的一种办法，集掖成裘，厂方便可节省一笔钱。不少厂主尽全部拖欠工资，甚至拖欠几个月的。把应发给工人的工资，拿去生利，或者经营别种生意，或者充实本厂资金。而依靠工资为生活的工人，便只有啼饥号寒了。“存工”制度流行于上海各纱厂，这个制度规定每个工人最初半个月的工资不发，存在厂里抵押，以防备厂里工人跳厂。跳厂的时候存工便予没收。（“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此外，资本家还用种种可耻的手段，对工人进行掠夺。例如缫丝业，丝和湿度很有关系，在湿度高的时候和干燥的时候，丝的重量相差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假使在天气潮湿的时候，从工厂拿了丝出来，后来拿进去的时候，天气却很干燥，丝两就减少了，于是厂主要工人赔偿，工人不知其中的道理，只好认赔。（杨杏佛讲演集。）又如湖南煤矿矿工拖煤出窿，系根据出煤的数量发给工资。矿主往往“把秤杆高悬，煤之数量，由秤手妄报，矿工明知有意克扣，因各矿皆例于此，无可奈何。”这样，工人领取的工资，与应得数相差甚远。（“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对工人进行掠夺的还有工头。中国劳苦群众找个职业是很难的事，工头就乘此要挟工人。工人为饭碗计，不得不抑鼻息于工头。工人为图进厂，须向工头纳一笔贿赂金。进厂后，为保持地位，仍须每月向工头进一笔报劳金，或者逢年过节送礼物。据1920年“上海劳动状况”报告人说：“某工厂工头每当过年过节，所收礼物不下数十百元。以后把送礼物改为送钱，十年工夫，家产竟有十余万。”（“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中国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向中外资本家不断展开了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作了某些让步。据上海工部局报告，1919年同盟罢工有二十起，罢工结果多是增加工资10%至40%，其中也有失败的。（1920年5月1日上海“星期评论”。）可是，资本家每当工资增加后，总是以抬高出品价格来弥补，这样，工人不但所得的名义工资异常微少，而且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实际工资更相对地减少。据上海“总商会月报”载上海重要物价指数加重要工价指数，以1913年为100历年变动如下：

年份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工资	机工	实数	0.65元	0.65	0.65	0.70	0.75	0.80	0.80	0.80	0.80	0.85
		指数	100.0	100.0	100.0	107.0	115.4	123.1	123.1	123.1	123.1	130.8
	木工	实数	0.115	0.142	0.142	0.142	0.142	0.142	0.142	0.142	0.142	0.150
		指数	81.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5.6
	成衣工	实数	0.26元	0.27	0.27	0.27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指数	96.3	100.0	100.0	100.0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物价	煤（每吨）	实数	5.00两	5.00	5.20	5.20	8.00	12.00	14.00	14.50	15.00	16.00
		指数	100.0	100.0	104.0	104.0	160.0	240.0	280.0	290.0	300.0	320.0
	铁（每吨）	实数	30.00	33.25	36.25	36.50	55.00	100.00	160.00	163.00	167.00	160.00
		指数	90.2	100.0	109.0	109.8	164.0	300.7	481.2	490.2	500.2	511.3
	棉（每百斤）	实数	11.40	11.90	9.85	11.35	11.00	17.05	20.55	22.00	25.00	25.00
		指数	95.8	100.0	82.7	95.4	92.4	143.3	172.7	184.9	210.0	210.0
	布（每百尺）	实数	38.50	33.50	35.50	33.50	34.50	44.55	48.15	49.05	52.00	53.00
		指数	114.9	100.0	106.0	100.0	103.0	133.0	143.7	146.4	155.2	158.2
	米（每石）	实数	8.05元	6.90	6.30	7.60	6.85	6.35	7.60	9.55	10.50	11.00
		指数	116.7	100.0	91.3	110.1	99.3	92.0	110.1	138.1	152.2	159.4

（“上海总商会月报”第四卷第四号）

上表揭示，1913年物价和1921年比较，煤增加三点二倍，铁增加五点一倍，棉二点一倍，布和米都增加一倍半强。工价，1913年比1921年，机器工所增加最多，也仅仅增加了30%，成衣工只增加11%，而木工几乎未动。

英文“中国年鉴”引用的“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的资料，也指出了工资的增加“与高涨的物价相比，自然增加很少”。（英文“中国年鉴”——1925年。）下面是“中国海关十年报告”关于上海工价的资料：

	司　机	采绘工	木　工	锯　工	装配工
1911年	12.00元	15.00元	15.00元	12.00元	22.00元
1921年	14.00元	17.00元	16.50元	14.50元	22.00元

至于工厂里面，一般技术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工资增加较多，完全没技术的工人较少。根据所得的报告称，1912年男工每月得工资15元，现在得28元，1912年女工每天赚12——15个铜子，现在赚到15——22个铜子。

上海“劳动界”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初的刊物，上面的资料是最可靠的。关于上海历年物价和工价变动情况该刊刊载如下：

1920年前10年			1920年初		
物	价	工　资	物	价	工　资
米（每石）	4元	最高0.60元	米（每石）	16元	最高0.80元
棉纱（每包）	40元	最低0.10元	棉纱(每包)	240元	最低0.14元
木头	7吊		木头	27吊	

（上海“劳动界”第八册，1920年10月3日）

由上表看出，在1920年初，米比十年前涨了四倍，棉纱涨了五倍，木头（作房子用）涨了三倍。工人工资最高的却只涨了30%有余，最低的只涨了40%。十年前最高的工钱一天好买一斗五升米或八尺布或付十天的房租，在1920年初，则只能买五斤米或一尺八寸布或付三天的房租；最低的十年前好买二升米或一尺三寸布或付两天的房租，现在却只能买九合米或二寸多布或付半天的房租。1920年初物价涨了三、五倍，而工价涨了还不过半倍。

如果把上海“劳动界”和上海“总商会月报”、英文“中国年鉴”上的资料相对照，可以看出三个刊物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大体相同的。

下面是广东省农工厅编制的广九、广三铁路工资指数（包括车务处、机车处、工程处、各种工匠、车夫、站夫、伙夫、闸夫及杂工）与广州批发物价指数（包括谷米类、食品类、衣料类、燃料类、建筑料及金属类及杂项），以1913年为100，历年变动如下：

年份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广九路（工资平均指数）	101.4	101.8	102.0	103.3	104.2	104.8	105.4	113.1
广三路（工资平均指数）	100.3	100.8	100.8	102.2	104.3	105.3	111.6	116.2
广州（物价平均指数）	103.6	111.8	118.7	123.2	129.4	132.9	132.4	140.5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

以上表所列的广九铁路为例，工资指数由1913至1921年只增加到113.1%，而广州的批发物价指数即已增加到140.5%，两者相差竟达27.4%。若与零售物价指数相比，所差必更大。因为批发物价向比零售物价为低，而工人的生活费用则直接为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所决定。

其他如奉天、天津、汉口等重要城市的物价与工资变动情况，英文“中国年鉴”引用的“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的资料有如下表：

奉天物价表（沈阳）		1912年 （以小洋为单位）	1921年 （以小洋为单位）
大稷	一吨	0.84	1.30
小稷	一吨	1.25	2.20
面粉	一斤	0.08	0.15
猪肉	一斤	0.20	0.32
煤	一吨	11.00	28.00
房租	一间房	2.50	6.00
柴火	一担	0.80	1.50

奉天工资表		1912年（以小洋为单位）	1921年（以小洋为单位）
非熟练工	一天	0.30	0.60
石工匠	一天	0.60	1.20

天津物价表		1911年	1921年
米	一斤	4分	10分
稷	一斤	3分	8分
玉米	一斤	2.5分	6分
面粉	一斤	4分	10分
猪肉	一斤	12分	25分
棉布	一尺	3分	12分

天津工资表		1911年	1912年
非熟练工	一天	0.20	0.30
石木匠	一天	0.30	0.50

（英文“中国年鉴”——1925年）

★根据当时工价来看，(分)的单位，可能是（小洋）单位之误。

汉口，报告写道：早在1914年，就注意到生活费颇高，但使物价稳定的太平景象被这次世界大战所破坏，于是造成一种对一切可能购得的日用品的非常需要，而这种需要又使物价达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中外人士所作的调查表明，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物品，如象米、麦、蔬菜、猪肉、鱼等等，平均涨价125％。而煤、面、柴上涨180％，鸡旦200％，鞋、棉布200％，烟草100％，灯用石油150％。中国人剪西式头发，也算不了奢侈，现在就得多花300％，比流动剃发所要的报酬多许多。总之，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1911年，一个工人每月只花二·二元饭费，而现在至低限度得付五·六元的饭钱，即是说他们的伙食费大约增加了150％。

各地物价与工价增加的比例相差悬殊，这表明中国工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的趋势，表明中国工人生活水准急剧下降的趋势。这点“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也承认说：“毫无疑问，全国人中这一穷苦无告的阶层的真正生活水平是被残酷的压低了。”并且也承认这一时期“多数以要求增加工资而开始的罢工风潮都是由此而来的。”（英文“中国年鉴”——1925年。）

货币贬值和币值混乱，也使实际工资发生降落情形，从而给工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例如东三省，市面上同时流通奉票、小洋、大洋、日金、制钱等五种货币，各厂矿所发工人工资也应有尽有。据满铁会社的调查，东三省日本人工厂工资所用货币，计日币者一一五家，用小洋者四十五家，用大洋者五家，用奉票者三十九家，用官吊者三家。（“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各种货币在兑换折算中间，劳动者大受损失。关内各地厂矿工资，兼用银元、铜元、制钱等，而以银元、铜元为最多，其用银元者，亦多将每日之角分折合成铜元发给。有很多工厂根本就是以铜元规定每日或每件工资额。例如火柴工厂的糊盒工人，就是每千个外盒和里盒，分别给以铜元七枚至九枚。山东缫丝工厂工资，机器缫丝每两一百六十枚，手工缫丝每两九十枚，熟练缫丝工人每日可得一千二百枚，拣茧工人每日可得七百至八百枚。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但铜元的价格变动很大，1908年时，每银一元，杭州换九十枚，上海换九十二到九十五枚，胶州换八十枚，安庆、宁波换九十五枚，1909年上海即换到一百二十七枚。1911年上海及苏杭一带换一百三十余枚。（周伯隶："中国货币史纲。"）1913年以后，铜元价格逐年跌落，1920年每一银元上海兑换到一百四十一点三六枚。（唐海："中国劳动问题"。）即使因工人斗争要求，铜元工资额有所调整，也决赶不上其本身价值的贬低，所以既使名义工资不变，甚至还有所增加，而实际工资则已大为降低了。

（三）

除了资本家的剥削以外，中国工人还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首先就是各地厂矿企业中流行的包工制或把头制。大小包工头是资本家的爪牙他们掌握了工人的招雇、解雇和发放工资的大权。通过这些权力，他们对工人不仅进行钱的掠夺，而且进行人身的凌辱。

工厂中的包工制，举纺织业为例：上海无锡等处的纱厂，大都是由包工把头到乡间去招募，一般贫家子女为生计所迫，多受其欺骗，并订定包身契约，包工头预付若干元的包身费，就完全占有这些乡间的妇女和儿童。如上海的包身制，包身制为三年，在这期间，生死疾病，父母不能过问，他们的身体属于包工老板，根本没有"作工"或"不作工"的自由，没有同一般人接触的自由。他们每天吃的是喂猪狗的锅巴。即使生了病，老板也要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迫他们做工。这完全是奴隶生活。（刘立凯等："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包工老板不但剥削女工的利益，甚至蹂躏女工的肉体这种情形在上海是常有的。（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1933年出版。）此外，如上海印刷业中报馆工人也存在包工制的剥削，1920年一个印刷工人投稿说："工人和资本家不能直接交易，包工头从中刮利，因此报馆工人比书局工人（按：指没有包工制度）还要苦得多。"（"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矿山中的包工制，可以举萍矿为例："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具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工头之下作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动力，不可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阶级之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元二角七、八分，而包工头给予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一〇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剥削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年纪念册，1923年出版。）开滦煤矿包工头剥削工人的方法与安源矿一样，"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得半日便输光在赌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借钱给工人赌赙，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海员工人，以香港海员为例，包工头剥削的形式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必须纳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

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到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此外，在各地厂矿企业中还普遍存在着种种暴力压迫和虐待。以萍矿为例：“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井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在工厂中，工头“常手拿白木棒，立于工人身旁，稍有怠息，即挞楚随之，甚至有至死者！”（“保工汇刊”1926年12月）还有“搜身制”。据1920年一个工人的报告：“工人放工的时候，一走到厂门，身上都要搜过，恐防偷了他的东西。来搜查的人，是厂里专门雇来搜查用的。女用女人搜查，男工用警察搜查。搜查的法子，是在门口做起七湾八湾的栏杆来，工人出厂，要一个个从这栏杆里出来；到出口的地方，就须站住听凭搜查，从头摸到脚，袋子里，裤带上，都要摸得清清楚楚，才放你出来，弄得工人面上，个个都似血红一般。”（1920年6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此外，许多厂矿还有禁闭、名誉侮辱等等野蛮制度。至于外资厂矿因有治外法权的保障，对中国工人更是为所欲为，列宁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是靠饥饿纪律来维持的；”“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是靠棍棒纪律来维持的。”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中国工人来说，实在是兼而有之。

（四）

要知道中国工人工资低微到什么程度，还须把工人的收入和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法费用联系起来看。这一时期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只是有些零星的调查。据了解进行这项工作最早的是外人，×××和××××，他们在“1918——1920年北平社会状况的调查”一文中指出：四、五口的人家，所用的伙食费，至少每年需一三二·四元，每人每月合二·二元——二·二七五元，然而北平有80％的工人，每年平均进款只六十六元——九十三元，或每月五·五元——七·七五元。以此进款，供养一家四、五口人，每月每人合银币一·五元——二元的光景。这样的生活，一半是饥饿的生活。因此，中国工人的伙食费用永远占整个支出的最大部分。例如北平二百名工厂工人，平均伙食费为73.6％，衣服费为6.6％，房租费为11.1％，杂费为8.5％。“社会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6月。）又北平七十五名工人，伙食费为87％，衣服费2.5％，房租费8％，杂志费为2.5％（1922年慕卢调查）伙食费用比例越高，表明生活水准越低。

1920年5月1日上海“星期评论”曾根据当地物价推量过当地工人家庭最低的生活费用，有如下表：

（一）夫妻两人是：

米	6元
副食品	3元

（二）夫妻两人和两个儿女是：

米	8元
副食品	5元

房　金	3元		房　金	4元
灯油薪火	1.5元		灯油薪火	3元
衣帽被履	1元		衣帽被履	3元
交通费	1元		教育费	2元
临时费	2元		交通费	2元
			巡捕捐	0.56元
			工会会费	0.20元
			保险费	2元
			临时费	3元
			缺工损失	2元
合　计	17.5元		合　计	34.76元

同上刊物载："上海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至三角，月收不过九十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八十四角。"印刷业工人工资较其他各业工人为高，据"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载："每月大多在十五元以下。"以此收入，和上述生活费用相对照，可以看出上海工人的工资不仅远远不够赡养家属，就是工人自己的生活也不够维持。上海工人工资较其它工业区为高，其生活水准尚且如此，至于全国工人生活水准低下的一般情形是不难推量的。

再以香港海员为例。1920年5月1日香港"晨报""劳动节纪念增刊"载香港海员生活费用如下：

个人每月支出（这是没有携带妻子来港的，拼合五、六个同事租房居住）

白　米	4.05元	每日三餐每餐半磅
小　菜	4.50元	每餐每人五分
茶叶生油磷枝	0.80元	同居均计
房　租	2.00元	同居均计
厨子工资及公共	2.00元	同居均计
灯油种种		
		以上是公共支出
洗　衣	0.30元	
舟车费	1.00元	工厂多在对海及市场外
剪　发	0.40元	每月两次
鞋　袜	1.00元	
纸烟酒各种消耗	3.00元	
衣　服		
养　家		
医　药		
交　际		
统　计	19.05元	

此表只计个人消耗，还有衣服养家医药交际四项，尚未列出数目。

工人一家每月支出表（一妻一子一女连本身四人）

项目	金额	说明
白米	16.20元	每日三餐每人每餐食米半磅
小菜	13.50元	每日三餐每餐一角五分
柴薪	2.50元	
房租	4.50元	每座楼分住两家或三家
洋油	1.00元	
医药费	2.00元	全年均计
教育费	3.00元	全年均计
衣服费	6.00元	全年均计
家具添置	3.00元	全年均计
旅行舟车费	2.00元	全年均计
应酬费	1.50元	全年均计
祭祀费		
特别费		
统计	56.40元①	

①据计算，总数不符，但原件如此。——编者

香港海员工人每月工资，据同上刊物统计，"平均每人每日不满一块银元，每月除星期日不作工外，只得工资二十元左右，虽有小数工值较优者，大体上都不能超出三十元以外的定额。"这说明香港海员工人的工资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至于赡养家属也是谈不上的。

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中国工人是怎样生活下去的？他们住的屋子，穿的衣服和饮食是什么样子？

先看住宅情形，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1926年）"中将上海工人住屋分为五等：

（一）上等住屋，为二层之楼屋。诸屋毗连成行，中隔狭隘之甬道，是为一街。地下装有沟渠以资排泄。甬道中置有油灯或电灯，暗淡而稀疏，夜色中差便行走而已。壁之堆砌用砖，屋顶复以瓦，余悉用木。地面用三和土填平，间或复以木板。每屋之宽广自400至600方尺，容积自4000至5750立方尺，屋后有狭小之结构，以作厨房，但无厕所。

此种房屋之每月租金自六元至九元，故往往有一屋而合住至四家者。每家所占之地位不出二〇〇方尺，甚有小至一〇〇方尺者。一家四五口衣于此、食于此、息于此，无所谓卧室，无所谓厨房，亦无所谓厕所。其嘈杂秽浊之情形，常使居者抑郁愁蹙毫无人生之乐趣。至遇疾病，又无正当调护及防卫方法，而户内外废物堆积，又足为传染病之媒介……。

（二）次等住屋，此为第二等劳动住屋，沪上之工人居于此种房屋者为数尤多。其房屋之构造与第一种相等，惟质料更轻，且系平屋而无楼房耳。然赁居者则于屋顶及地之间，支架铺板为阁楼，以供一家之居屋，而住于平地者则又有二三家焉。此种房屋每座之租金，每月自二元至四元不等。其卫生状况更较第一种为劣，废物尘埃之充斥更为显著。屋顶恒破陋不蔽风雨，地上则泥污而已。且有年久失修，东倒西斜，不幸坍塌，辄致伤人。是等房屋之四围环境又极恶劣，多与坟冢、倾粪处、倒渣滓处相毗连。儿童生长于此种社会者，自幼受环境之摧残，纵即不死，已染恶劣之习惯。……

（三）客栈或寄宿所，此由私人开设，以供独身工人之居住，每一铺位须纳月租自三角

五分至六角。如上述（一）、（二）两种之房屋，约住八人至二十人。除工厂雇工外，如车夫、杠夫、码头工，住于此种寓所者为数颇多。……

（四）工厂所造之住房，此等房屋，系雇主所造，以供工人之居住者，大约以纱厂为最多，所收房租亦较廉。

如内外棉纱厂共建有如上述等一种之住屋一、四〇〇座，每月房租四元。又第二种之平屋五〇〇座，每月房租二元。其建筑较为坚实，光线亦较充足。但据该厂总经理言，其最困难之点，即住户太拥挤。盖每座之房屋平均住三家。屋中床铺重迭，如轮船统仓中之铺位，俗所称为鸽笼是也。

（五）江北苦力及其草棚，……此等贫民，无力就居（一）（二）两种之住屋。于是择乡辟之区，租地结庐，以资生息，即俗称为草棚者也。……草棚之情形，建于泥土之上，屋内外之高下相等，以竿为柱，周编竹为壁，上复以稻稿，构造既陋，故数年之后即破败不蔽风雨。是等草庐大抵不设窗牖，其扉则室内即黑暗不能辨物。所赖以流通空气者则为壁间之罅隙，但在冬季，则冷风砭骨，易受寒疾。通常一庐仅有一室，约长二十尺，宽十尺。有时于室中编竹屏，以资间隔。前部为炉灶及日间休息处，后部为卧室即厕所。建筑草棚，初未相度合宜之地位。其四围环境，无不甚为污秽浊，既然沟渠以泄潴水而废物渣滓又随处堆积，故空气之秽浊不堪名状。而彼等劳动者之妻小，则长年蜇居于此，习闻而熟视之，凡市政所能施给之便利，如灯火，水洪，医药，卫生，以及他种公共事业，无一施行于此。社会中之最无人过问者，殆莫逾于此贫民窟矣。草棚四周，随成皆是泥污，居住者乃以干土填置其上，以供行走。然草棚内之泥地，反较土陵为低，一遇大雨，则污水泛涨，挟泥土污物，侵入棚内，遂置泽国。记者尝于一日雨后，调查其地，见夫妇二人跣足行棚内，水深没胫，其子女则置于桌上椅中，跬步不能移动。污水既侵入，恒非三四日不能尽退也。为患最大者则为火灾。草棚之建筑材料，既多系引火之物，偶一不慎，则一火柴杆之余烬，可以立兆焚如，而使全村荡然以尽。有时火势蔓延甚速，老弱不及走避而致惨遭焚毙者，时有所闻。此种火患，十数年来，几于无季无之。……

上项报告，由于调查者阶级立场的局限，是不能把上海工人居住条件的困苦情形如实反映出来的，就连当时同情劳动人民的陈独秀来说，在这方面也不很熟视。如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劳动界”第四册“闲谈”栏内写的“贫民窟”一文中说：“日本有一位贺川先生，现在来到上海，调查上海的贫民窟，十分恳切详细。我们从前只晓得上海有两处大的贫民窟，一在闸北，一在南门斜桥，现在贺川先生亲自去调查出十好几处，画出一张详细的图。……”这位日本人调查的材料虽还没有发现，但是陈独秀在其“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同上刊物）一文中，把这位日本人调查的结论写了出来：“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底贫民窟他也曾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底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由此可见，中国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是比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苦得多的。

矿工大抵住在矿主建筑的工房里，条件比工厂工人还要坏。例如萍乡煤矿“窿工有食宿处四区，计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须住四十八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每屋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房中床具垒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诚一栖流所之不如！窿外工人亦稍有寄宿房里，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陋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实为世间绝无而仅有者，诸如此类，均非生人所能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年纪念册。）开滦煤矿工人的居住情形，据1920年调查人说：“讲究的猪窝，也比它

好。屋内窄狭污秽，臭气蒸人，也有睡在地上的，也有睡在土坑上的。他们没铺的，也没盖的，枕头是用砖头来代替"。（"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其它各地矿工住的亦大体如此。

工人们穿的吃的和住的一样坏。能够穿上一套比较整齐的粗布衣，并能按季换装，只有收入较多的少数工人才能享受到这点。大多数工人或有家庭负担的工人，穿的往往都是补丁连补丁。最穷苦的工人，多是仅穿一条裤子，半裸地过夏。到了冬季，在很冷的北方，他们才把棉花加进去以过冬。他们做了一套新服装，就要继续穿个五、六年以至十几年，直到蓝色都变成了灰色，仍然不肯放弃。（小山清次："支那劳动者研究"。）工人吃的，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有的工人吃的甚至是"臭烂不堪之物"。（"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然而这还是指着那些有工可作能够勉强糊口的工人来说的，至于无工可作、失业的劳苦大众，则只有"饿肚皮"了。

在上述的生活条件下，中国工人当然不能有健康的体质。由于居住条件的十分恶劣，传染病极易流行。1919年3月23日上海"时报"刊载："上海一次流行病，以苦力工人居多数，黄包车夫病者尤多。据查，各公司于最近三日中，租车数比较平时共减少六百余辆，车夫病者即六百余人。又如丝厂女工，如病旷假者，亦十分之二、三"。

由于工人们吃的食物多是不易消化的腐烂不堪的，不但要产生消化不良病，也容易得传染病，对儿童们损害更大。据1914年一位日本人的调查："中国劳动者是在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上度日的，不可能有充分的费用来养育子女。所以子女之中，因身体虚弱及营养不良而夭折的很多。凡生来身体顽健并能健康地成长到劳动期的是有限的。……或因传染病，又加上过度劳累而死于悲苦之间是很普通的，医药的恩惠终生也是轮不到他们的。"（小山清次："支那劳动者研究"。）

此外，衣服的不合适和褴褛不全，也损害着工人体质的健康。

至于中国工人文化水准，除少数印刷工人有些文化以外，工人中间文盲占绝大多数。据一个日本人就上海某纱厂工人教育程度所作统计如下：

性别	知识程度	百分比
男工	能读自己之姓名者	40%
男工	能写自己之姓名者	20%
男工	目不识丁	60%
女工	能读自己之姓名者	15%
女工	能写自己之姓名者	3%
女工	目不识丁	85%①

（西川喜一："中部支那劳动者的现状和全国劳动争议"）

上海工人文化水准一向高于天津、汉口等地，其知识程度，还这样低，其它各地就可想象而知了。

①百分数相加，都超过一百，但原数如此。——编者

（五）

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中国工人在政治上毫无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是非法的。北京政府于1912年4月所订的"暂行新刑律"第十六章第二百二十四条

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聚众为强暴胁迫或为首者，依第一百六十四条至一百六十七条（按为骚扰罪）之例论断。"1914年3月，袁世凯颁布之"治安警察条例"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等，也把"同盟罢业"认为骚扰"安守秩序"和"善良风俗"列入犯罪项目。同年8月北京政府颁布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宁……决定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又第二十二章内载明，禁止工人在以下情形中举行集会："有领导怠工情形者；有领导罢工情形者；有领导要求增加工资情形者；有破坏社会秩序及公众安宁者；有违反一切良好道德习惯者。"中国军阀政府为了对付工人斗争，还以屠杀手段来补充法律的不足，如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因反对厂方以跌价的纸币发给工资，罢工领袖被黎元洪以"结党暴动，殴辱长官"的罪名处死。同年安源煤矿工人因反对工头的剥削，竟被军队围攻，将罢工领袖杀死。还应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者也给中国人民订出法律，如1914年"租界治安章程"，视罢工为"违章"加予处罚，至于屠杀罢工工人的例子更是不胜列举。

（六）

在上述种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中国工人必然要起来斗争，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顽强的斗争。最初的斗争是自发的，孤立的，斗争的结果往往无所得或所得甚微，而工人多死伤或被拘捕，但斗争并不停止。据初步统计，1870——1911年间，罢工次数约有105次。

1870——1911年罢工次数

年份	罢工次数	年份	罢工次数
1870	1	1899	5
1875	1	1900	2
1876	1	1901	3
1877	1	1902	4
1879	1	1903	5
1880	1	1904	8
1882	1	1905	9
1883	1	1906	11
1884	1	1907	6
1885	2	1908	3
1890	1	1909	9
1891	2	1910	5
1895	2	1911	12
1898	7	总计	105

（根据上海"时报"、"中外日报"、"新闻报"、"汇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大工厂不断地增

长，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是扩大了，而且觉悟方面也提高了，工人们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工人们的团结规模扩大了，斗争意志也增强了。这一时期罢工次数的增长，可以证明这点。

1912——1919年5月罢工次数

年份	罢工次数	年份	罢工次数
1912	14	1916	17
1913	10	1917	21
1914	11	1918	30
1915	8	1919.5	19
总计	130次		

（根据上海“时报”、“申报”、“民国日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汉口“国民新报”、天津“大公报”，及宫胁贤之介“现代支那社会劳动运动研究”。）

毛主席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化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新民主主义论”。）并且迅速地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其斗争不再是自发的、散漫的斗争，而是开始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正如邓中夏同志所说：“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一八九五年——一九一三年主要的罢工情况表

年代	厂矿名称	厂籍	罢工原因	参加人数	经过与结果
1895	南京金陵制造局	中	反对例假工作	不详	被总办加以镇压，为首二人各责军棍一百，并荷头号巨枷。
1895	汉阳铁政局	中	反对管责工人	二百余人	厂方调营勇二百余人，加以镇压。
1898	上海纶华丝厂	中	反对厂主减发工资二成	数百人	不详
1898	上海华盛纱厂	中	反对包工克扣工资	不详	女工一人被包工头打伤，结果不详。
1898	上海协隆纱厂	外	要求提高工资	不详	工资照加。
1898	上海协隆纱厂	外	不详	二人	工人企图放火烧毁厂方棉花。
1898	上海瑞记等纱厂	外	反对计件工资	不详	由瑞记纱厂工人发起，结果不详。
1899	上海宝昌丝厂	外	要求发给工资	百余人	女工八人被捕，后释放并照发工资。
1899	上海怡和纱厂	外	反对减少工资	不详	工资照旧发给。
1899	营口各油厂油坊	中、外	要求增加工资	二千余人	为首十九人被捕，后经调解，增加工资了结。
1899	芜湖晋康煤矿	中	不详	不详	停工甚久。
1899	福州船政局	中	与洋匠冲突	不详	不详。
1900	安徽繁昌煤矿	中	劳资争执	不详	不详。
1901	牛庄榨油厂	中、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不详。
1902	上海耶松船厂	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为首四人被押。
1902	上海耶松船厂	外	反对工资过低	八人	一人被拘二周，并判笞一百。
1903	上海制造局	中	反对增加工时	不详	加给工资后复工。
1903	苏州延昌永丝厂	外	反对扣发工资	不详	厂主无理拒绝要求。
1904	杭州造币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停工一月余始复工。
1904	成都兵工厂	中	反对工头克扣工资	六百人	罢工持续十六天以上。
1904	上海源发丝厂	中	反对扣发工资	不详	工人捣毁工厂财产，为首二人被处罚金。
1904	上海耶松船厂	外	反对工头盘剥	一百二十人	为首工人被拘押，结果不详。
1905	上海新关造册处印刷厂	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不详
1905	上海集成纱厂	中	反对工头压迫	二千余人	工人打毁机器、厂房，为首二人被捕。
1905	上海集成纱厂	中	反对工头盘剥压迫	四千六百人	不详。
1905	上海裕源纱厂	中	不详	不详	为首二人锁系示众。

年代	厂矿名称	厂籍	罢工原因	参加人数	经过与结果
1905	上海英翰印书馆	外	反对厂主干涉工人抵制美货	不详	不详。
1905	上海华新纱厂	中	反对厂方将工厂让与日人	不详	工人击伤承买工厂之中间人，为首五人被拘。
1905	萍乡煤矿	中	反对洋工程师克扣工资	不详	工人打毁洋房，停工三日。
1906	上海煤气公司	外	要求增加工资	64	不详。
1906	上海英美烟公司	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为首二人被捕，参加罢工工人被迫复工。
1906	上海瑞纶丝厂	外	反对克扣工资	一千人	工资照发
1906	安徽丰盈榨油厂	中	开工时厂主与工人发生"龃龉"	不详	停工若干时日。
1907	山东坊子煤矿	外	矿坑爆炸，工人死伤	不详	持续数星期。
1908	铁岭榨油厂	中	不详	三百余人	被地方当局镇压。
1909	上海元丰丝厂	中	要求清偿积欠工资	数十人	不详。
1909	上海长纶丝厂	中	营救被押工人	百余人	被押工人开释。
1909	上海新大丝厂	中	要求清偿积欠工资	百余人	不详。
1909	上海协祥丝厂	中	不详	百余人	不详。
1909	上海勤昌丝厂	中	反对增加工时	百余人	不详。
1909	上海裕慎丝厂	中	要求清偿积欠工资	百余人	工资照发。
1909	上海瑞纶丝厂	外	要求增加工资	百余人	不详。
1909	汉口各染厂	中	不详	数百人	工人打毁机器，被警察局解散。
1910	上海久成丝厂	中	反对开除工人和工头克扣工资	百余人	不详。
1910	上海瑞顺丝厂	中	要求发放工资	数十人	工资照发。
1910	上海恒丰丝厂	中	反对工头压迫	百余人	为首工人被体罚，工人捣毁工厂。
1910	上海裕康丝厂	中	反对厂主殴打工人	百余人	受伤女工被控唆众罢工管押三天。
1910	上海自来水公司	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为首三人被捕，结果不详。
1911	芜湖协和煤矿	中	要求发给工资	百余人	驻军弹压,死矿工三人。
1911	上海晋昌、长锦、伦华、协和等四丝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增加工时	二千余人	一女工被击伤，结果不详。
1911	上海勤昌丝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	一百余人	工资未能增加。
1911	上海某潮丝厂	中	反对扣发工资	六、七十人	不详。
1911	上海协和丝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	三百余人	为首四人被拘，并受体罚。
1911	上海久成丝厂	中	要求缩短工时	不详	不详。

年代	厂 矿 名 称	厂籍	罢 工 原 因	参加人数	经 过 与 结 果
1911	上海又新丝厂	中	要求发给工资	数十人	为首四人被拘，后工资照发。
1911	上海宝和丝厂	中	要求发给工资	百余人	为首五人被拘，结果不详。
1911	上海各船厂	中、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三百人	增加工资13%。
1911	上海法新印字馆	外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为首工人被押三星期。
1911	上海某日本纱厂	外	不详	不详	工人破坏机器，为首二人被拘押。
1912	上海新闸路丝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	数十人	为首三人被捕，拘押三天。
1912	上海协隆丝厂	外	要求发给工资	数十人	为首四人被捕。
1912	上海统源织布厂	中	反对私刑	不详	停工三日以上。
1912	汉阳兵工厂	中	反对工时过长	不详	反动政府用武力镇压。
1913	上海耶松翻砂厂	外	反对包工，要求点工	不详	资方接受点工条件。
1913	上海浦东各胶布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女工数人受伤。
1913	上海瑞熔等厂	中、外	营救被押工人	全体翻砂工人	被押工人开释。
1913	上海龙章造纸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工头压迫	五百余人	三日后复工。
1913	上海福成织布厂	中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多数工人被厂方殴伤，结果不详。
1913	汉阳兵工厂	中	反对厂方以跌价纸币发给工资	不详	罢工领袖被黎元洪处死刑。
1913	南京造币厂	中	因分红不平	不详	不详。

编者注：本表根据时报及本章有关各条资料编制。

（原载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

天津法租界罢工风潮

民　国　日　报

（选自1916年11月份上海民国日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壮大起来，不断地进行自发的斗争。当时的工人斗争，以经济斗争为主，然也有一些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1916年天津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时，法租界工人全体罢工，即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例。法帝国主义本拟完全侵占老西开地方，北京政府也承认了法帝国主义的要求。后天津人民反对，法租界工人罢工，迫使法帝国主义与北京政府将老西开地方划为中法共管。所谓共管，固然还是我国遭受损失，但总是给帝国主义一些打击。）

11月16日

昨得有报告：法界仪品公司、义普铁厂并电灯房等处，华工数百人，因法领侵占老西开案，迄无正当解决，法人似仍无退让之意，昨已一律罢工，齐集商会联合会，筹商对待法人办法。当由国土维持会派员妥为招待。并闻该界华捕，稍有血性者，亦均告退云。

11月17日

据天津日报所载云，老西开事件，因密约之暴露，遂停止进行。于是法国官宪，依然占领，更有继续交涉租界扩张根本问题之势。政府当局者对于当地人士，谨隐蔽其内情，以保一时之镇静。迨至老西开返还说取消，交涉更延长。近日又起风潮，曾于上星期日开公民大会，议决一排法手段。凡从事于法人事业之中国人，实行同盟罢业，即当地法国人所经营之电灯公司、仪品公司、炼砖工场、义善实业铁工厂及华利铁工厂之中国工人，约七百名，俄然抛弃职务，同盟罢工，群移于华街内。因此，上前晚九钟时，法租界内之电灯全部熄灭，忽然化为暗黑世界，各商家一时甚形狼狈，均以洋灯点火。于是受该电灯公司供给电气之各工场，昨日全体休业。仪品其他二公司，亦不得已而至于休业。尚从事于法租界警察厅之中国巡捕，亦有同盟辞职之虞。同盟罢工之工人，由各代表者引率至东南城角之商会联合会场齐集。同夜，当地商务总会派人开晚餐会，以犒彼等。

昨日下午一时，于南开大舞台，特开公民大会。同时，并提议罢工工人之生计维持经费商筹问题。至夜间，决议，邀集京津男女名伶联合演戏，其收入之款，概作前项经费。此次同盟罢工，电灯会社最受影响。夜间电灯无论如何不能熄电，闻自昨早派安南兵从事发电。

11月19日

法租界工人，因法人强占老西开，有违公法，故于十四日已一律罢工。兹将其罢工者略志

如下：仪品砖窖、仪品铁场共百余人，义善实业公司六十余人，法电灯房六十余人，铁工场二百余人，法球房十三人。当晚公民大会，闻悉该工人文明对待，遂派员与公司代表王朗斋，铁厂代表张书馨接洽，馈给工人食物，以示优异云。

十三日午前十一钟，假联合会内开各部分工人全体联合大会，首由公民大会代表边君洁清（即省议会议长）登台演说。谓：今天之会，为法界工人之罢工大会。诸同胞今日既有如此之热心爱国，足见人心不死。既人心不死，国决不至于亡。惟外人讥笑我国之五分钟热度，请诸君必须坚持到底，以免外人之笑我也。其演说之痛切，闻者莫不动容，全体鼓掌不绝。继则卞君月庭演说，尤为痛切，谓鄙人虽有千言，一时甚难说出，务望诸君决以民气对外，万不可稍有无意识之暴动，以免外人有所借口。并望诸君坚持到底，万不可稍有退志。且对于诸君之费用，已筹有的款，决不至为难。即交涉数载，鄙人情愿倾家败产，亦决不辞其责任。（至此鼓掌）现在已派专员招待诸君。并嘱各部工人各举代表，以资将来办事敏捷。至此，即宣布振铃闭会。

现在之租界住户，华人于十四号已纷纷迁徙。并闻该界一大部华人，已举代表三人，赴公民大会声明全体罢市，日内即可发表。

11月21日

十七日天津英文华北日报载云：天津华人反抗法人之举动，其势日益加盛，昨日下午，某法国旅馆之华仆，全体辞职去。该旅馆经理急雇日人以代之。拟仿法国某俱乐部之办法，将来一概不雇华仆云。

天津英国电灯公司所雇之华工，亦得有通告，谓该华工等倘与法人发生关系，必置之死地云。

昨日，租界及城中往来之人，络绎不绝。本报访员，当下午及傍晚之时，皆在城中，见人民入城者甚多，或乘汽车，或乘洋车。今晨法租界所雇之华警，亦有若干辞去；仍留者，亦有。又闻佣于他联盟国人家中之华仆，以在外人家中佣工，即系有袒助法人之思想，亦多相率辞去。本报今日，曾用电话达法领事署及法国市政厅之邮政局，数次皆以不通回答。吾人意料，电话或亦为抵制法人之举，不与传达消息云。

本处某旅馆经理，闻其仆人言，英人或他联盟国人，苟出而为法人助，必以待法人者待之。即工人、仆人均将辞职，报馆之印刷排字工人，或亦至辞去也。

今晨，法国市场，亦有活动之状。某访员告吾人云，市中之食品，以车载去者不少。人民由法界向车站方面徙去者，亦甚多，盖为避扰计云。

顷闻商会已设法为罢工之华人谋生计，使有所事事，不至失业。自前星期以来，因英公使朱尔典调和之计画不成，反抗法人之举动愈盛。惟今次之反抗，为天津租界中向所未有，又与从前抵制美、日之法不同，吾人亟愿两方现时当极力设法调处之云云。

昨日法国大饭店及他法人开设之店所佣之华人数百名，尽行罢工。法工部局之华人巡捕，亦一律不欲到差站岗。闻其中有若干数乃久在法捕房当差者云。法人对于此次有规则之抵抗，已不知所措。现津人正在调查租界内法人所营之商行，想不久所有法国店铺，将无华人之足迹矣。昨，法租界之电灯，于晚间忽然灭熄。如华工不即上工，想电机不能如前之得心应手。且法人于无法之中，暂时用安南兵以代之，然缺多人少，终属无济于事云。

11月23日

法国机关商店所雇华工，几全数辞退。法人或以安南兵代之，或废置无人做工。法界道路，至午间，尚未扫除。水车则用安南兵驾之洒水。界内雇用华警，亦几绝迹，惟被法人强留者，约二十余名而已。访员昨日亲至老西开视查，见近桥处，并无法警亦无华警。法租界内未及经营之旷地甚多，彼竟要求扩张租界，实令人不解其故。此次罢工，中国工人、法国工部局及法国人民俱受损失。法国电影从前极形发达，刻已无华人过问。法界之中华旅馆亦极寂寞。各商店因无买卖，晚间关闭甚早。居法界之人民，惧有变故，多迁避他处。其在法人所有之房屋居住有年者，亦觅屋迁徙。与革命时之情形大相反云。

法国电灯公司因华工辞退，用安南兵代之，受电伤毙命者一人。法人拟向英国电灯公司假用中国工匠四名，卒无效果。有谓法人现由英国电灯公司借通电流。此说，系英人所雇电匠传出，想非虚语。惟不知英公司之华工能长此间接助之否耳。

直隶交涉公署，昨又接到法领函云："敬启者，前曾致贵公署二函在案。现有法商所用之华工人等，因被好事之徒所威迫，已均先后罢工，并无地方官阻止。按照本国驻京公署训令，本领事除向贵特派员声明，本国商民因此次举动所受之各种损失，后必有赔偿之处外，相应函达贵特派员请烦查照为荷。"当日，黄交涉员即行复函，略谓："来函具悉，除接准两函，已经明析答复外，本特派员应再切实声明，请由贵总领事查照前函办理，速将华警以礼貌送回原处地点，即日恢复原状，民气自不难平靖。如不即速见诸实行，无论官府如何开导，恐民气愈觉激昂。此次来函内称赔偿一节，本特派员碍难承认。合再函复贵总领事，请烦查照。"云云。

法界华捕日前罢岗者六十余人，其尚未退出之三十余人，已于昨早由该界华捕长冯占卿及该界华侦探员马鸿藻、段桐坡三人率同全体一律告退。刻该局已无一华人。此外卫生局之夫役六人，均罢工。而一般华妇在法人处佣工者，昨亦一律辞歇。闻有法人要求某氏佣工，愿月增薪金至四十元，而该氏竟未允可，即扬长而去云云。

此次法界罢工，各华工业经组织工团。昨日该团办事处宣布，于是日下午二钟，由各部分代表率领全体，结队出发游行街市，以表爱国热忱。

工团事务所另设注到处，所有先后罢工工人等，一律到处注到，并令按名一律按有箕斗，以资稽查而防奸细混入。

11月28日

津工人强仁慕义。法界工人罢工之后，而在法人家属所雇用之我国佣妇，亦全体告退。虽经法人增加月薪至数十元之多，亦不之顾。所以现在侨津之法人，无不归咎于法领办事之操切。又闻日前法界站岗巡兵罢退之后，法领照会天津巡警厅，略谓，法界既无巡兵，界内之治安，本厅当负完全之责任云云。杨厅长以德答以，该界内巡兵既已一律罢退，如欲维持治安，当由本厅酌派华警若干名前往维持地面。否则，无法维持云云。该领事语塞，无以对。该界商铺生意极为萧条，市上呈一种荒凉之景象。据津人云，此次无论如何，法人如不归还我疆土，津人至死亦不干休。观此，我国有如此之民气，甚为国家之福。现拘留警兵，

于日前业经送还。而日来据外交界消息，此事又望和平解决。记者愿我国人力持到底也。

11月29日

天津法租界，自电灯房华工罢工后，因工作无人，全界电灯均已熄灭。各铺户间有燃煤油灯者，然其光亮较之电灯，相差远甚，街市中但觉黑暗异常，如入鬼市。电车往来，设非车上之灯光线外射，行路者但闻其辘辘之声，而几莫辨其为来为去也。并闻法电灯房因需人孔急，不惜以二百元雇一司机者，惟迄无一人应募。可见津人恨法人之深矣。

各大商铺一因电灯熄灭，二因迫于公论，曾开秘密会议，议决推出代表三人，同赴公民大会声明，即日收拾货物，定期一律闭门休业。

东局子为法国警房收发军饷军装之机关，雇用华人为之司帐及作苦力者甚多，已一律罢工。

总管清道夫及倒污水倒粪之头目，混名歪脖子刘老，系现因老西开交涉免职之外交部秘书刘符诚之封翁。此老素为法人亲信，故法租界之垃圾及人畜粪，均由法领许其专利。其子虽贵，此老仍乐此不疲。去年，刘符诚来津查勘老西开时，一味袒护法人，蒙蔽政府，亦秉承庭训故也。此次罢工风潮既起，津人游说此老。此老指天画地，公然拒绝，并召集清道夫、挑粪夫，声言如有敢罢工者，当即禀明法工部局重罚严办等语。讵意各夫役，早闻他处苦力罢工后，得有好处，且因刘老压制太甚，已不肯上街清扫，齐赴公民大会报告，粪夫亦宣言夜间概不倒粪。因此，法租界居户谋迁更急矣。

法商大来、裕中两饭庄，所雇西崽全数走散，而西人之无家者不能不往吃饭，饭庄无人伺候，法商禀明领事，各派安南兵若干往各洋饭庄充当西崽。该兵等素不习此，闻已与坐客屡起冲突云。

现闻调查罢工者分为十八部，业经公民大会按部注册。第一部东局子夫役，第二部仪品公司，第三部华利公司，第四部溥利车厂，第五部法国球房，第六部义善铁厂，第七部电灯房，第八部中法实业铁厂，第九部义善实业公司，第十部公议局，第十一部大来饭店，第十二部仪品砖窑，第十三部东局子兵营，第十四部法国书信局，第十五部各部杂夫，第十六部各零部花名，第十七部法国巡捕，第十八部华女仆，共人数一千四百余名，薪工一万六千二百余元。

11月30日

现法界各种事业，均已停滞，其大公司大洋行非俟此事得相当解决后，似不能得工人为之服役。其受抵制之影响者，均希望伍廷芳博士于数日内到此，将先就此事之全部协商。吾人信彼必能示法人以适中之道，以保全其颜面；讨论老西开应谁属，及恢复以前情形，以便两方可以有友睦之讨论。至中立国人之感想，极赞成早日讨论，解决此问题。盖因此发生之事，于天津全埠皆有所损害，设仍以此延搁不决，其损害将愈大云云。

工团各部代表，于昨下午五钟，在商会联合会内全团开讨论会议，其所讨论之大旨，系为各部工人现在及将来之办法，至七钟始闭会。

亨达利洋行之华人，昨欲一律罢工，当由行东告由美领事声明于公民大会，该行实系瑞士

商，该行虽设于法租界，确非属于法商。业由公民大会拟函知该行之同人等照旧工作，以敦邦交云。

天津旅京法文报馆作报人孙文俊、韩士林、李凤彩、李恩元、李凤祥、邢同和、姜廷玉、崔铃章、于有恒、胡济元、张致祥、张昭荣、姜廷珍等，一律罢工。昨已函知公民大会，请极力抵制法人，以雪国耻。

（原载《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江南造船所罢工风潮

民　国　日　报

（选自1916年11月份上海民国日报。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不断兴起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6年江南造船所工人自发的罢工，即反封建压迫的斗争之一例。）

11月26日

制造局内之江南造船所，系隶海军部管辖。该船所总办为刘冠南君。所内设有铜铁锅炉各厂，及翻砂、车床、锥床各间，暨木作等工艺均属全备；共有工匠一千余名，专司修造兵舰、商轮。该所因五金材料存储颇多，是以设有巡缉队，计有队士三十余名，中以北方口音为多，借以严防偷窃料物。近因修理飞鹰鱼雷艇而用去钢料百余磅，该队长路发拱谕令各排长队士，凡遇工匠出入，队士须格外查察，以杜失窃料物。昨日午后一时，各厂工匠进所工作之际，因有铜作工匠数人，欲携料前往浦中兵舰修理，当为巡缉队排长李孔林所见，疑为偷窃，遽向该匠等搜查。当由该匠等告以此料系备修理之用，并非私窃。讵该排长不懂南方语言，误会该匠等出言不逊，将该匠掌颊一下。该匠等犹婉词告以偷窃材料，断不在进所工作之时，必于放工时私藏而出，尔等防范，可在放工时查察，方为适当。讵该排长老羞成怒，竟将该铜匠等揪扭痛殴，以至该匠等拒敌。该排长急鸣警笛，召来队士十余人，不问是非，帮同凶殴。旋为各厂众工匠所闻，群起不服，立拉回声，一律罢工，出而殴击。因工匠人数众多，以致队士受伤四五人，而各工匠之头破血流者，亦十余人。当由刘总办与路队长急出解劝，始各分散。并即谕令各匠仍归本厂工作。乃各工匠声言，如不撤去此等队士，誓不愿作该所工程，相约同盟罢工而出。以致昨日下午半日，并未开工。现用刘总办传谕各厂匠目，分头婉劝，照常上工。讵料各匠坚持不允，定欲达到目的而止。

11月27日

江南造船所巡察因搜查料物殴辱工匠，以致全体工匠千余人一律罢工，已志昨报。兹悉该所刘总办，于是日（即二十五号）午后肇祸之后，立即传齐各厂匠目，邀同邝付会办等，公开会议。以此次起衅，皆因排长李孔林对于工匠不分良莠，一概搜查而起。盖检查应择形迹可疑者为之，不得于工作未毕之先，任意在各匠衣袋内摸索，侮辱工匠，未免太甚。决定嗣后将搜查工匠身畔一事，即日取消，以后各匠如需携料往舰中作工，只须持有本厂头目证书，总办条谕，或以免巡警生疑。至现在本所工作，各匠均为人格整饬之辈，决无贪小情事，嗣后各匠凡遇巡警询问，均以本所给发之印照交阅，以免言语不通，致滋误会。其此次办理不善之排长李孔林，应即开差，以示惩戒。其附和殴击工匠之巡警，亦应查明究办云云。全体工匠闻此议决之下，甚为乐从。除立即出示通告外，并饬各厂照常开工，是以该所众工匠已于昨日，仍愿一律工作矣。

（原载《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苏维埃军队击溃了仰仗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反革命暴君高尔察克的军队，胜利进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各族的革命人民会合。当此之际，人民委员会特向中国各族人民发表下列友好宣言：

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经过两年战争和极大努力之后，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此行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侵吞掳掠。关于这一点，每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和每一个西伯利亚工人都已了解。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它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尤以压迫中国人民为甚。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再一次提请中国人民注意我们于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后对中国人民所作的声明。此项声明可能已为卖身投靠的美、欧、日报纸所隐匿不宣。

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它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工农政府接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此项谈判延续至1918年3月。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同俄国工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洲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己有，它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援助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美、欧、日等国匪军为什么侵袭满洲和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再度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明了真相。

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作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华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自己的

---

*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原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是1919年7月25日发出的，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它的译文。原译文不够准确，本文是根据俄文重新翻译的。

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除这些要点以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苏维埃政府深知：协约国和日本这次还会竭力不让中国人民听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呼声；把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必先铲除盘据于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匪军。因此，苏维埃政府目前在向中国人民送达这一消息的同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摆脱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日本。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苏维埃政府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

1919年7月25日

（原载《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二卷，转录自《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次对华宣言

查去年（即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曾向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将前俄皇政府与中国所订协约概行废弃，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所得者，尽行交还中国国民，请中国政府与苏俄进行正式会议，冀得建设关系。

现吾人已悉此项宣言业经中国政府接到，中国国民各阶级各团体皆表示热诚，认中国应立与吾人开始磋商，以谋建设中俄间友谊关系。

中国政府已命张中将斯麟，率领外交代表团来莫斯科，吾人对中国代表团之抵莫斯科，深为欢迎。并希望借与代表直接磋商，得建设中俄共同利益之互相了解。中俄两国为共同之利益，并无若何不能解决之问题存在。吾人对此，至为满意。吾人已悟中俄国民之仇敌，方从事阻碍中俄之接近与建设友谊关系，盖彼知我两大民族友好之互相援助，将使中国强盛，外国不能再若今日之羁束及掠夺中国国民也。

不幸中俄速谋建设友谊关系之前途中，尚有障碍在焉。中国代表团能确信苏俄对于中国之笃诚与友谊态度，但该代表团至今仍未接有适当训令，使其有进行解决两民族正式友谊关系之全权。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因深惜两国接近之延搁，双方政治上及商务上之重要利益不能实现，故极愿赞助及促成两民族之友好，特行声明苏俄必确守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宣言所定之各项原则，且将根据之以缔结中俄友谊条约。

兹为中俄两国幸福计，本外交人员委员会认为应将下列条约之要点，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以引伸前次宣言内之原则。

（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

（2）两共和国政府立行采取种种必须之办法，建设有秩序之贸易及经济关系，随即根据使两缔约国得为最惠国之原则缔结专约。

（3）中国政府表示实践下列各项：A、不予俄国反革命的个人或团体以赞助，不容其在中国境内有所活动；B、当签订此约时，须将留在中国境内之反抗苏俄军队及团体，解除武装，特别拘留，并引渡于苏俄，且将其武装，供给品，财产交付于苏俄政府；C、苏俄政府对于背叛及反抗中国之个人及团体，亦负同等之责任。

（4）凡居住中国之俄国居民皆服从中国境内现行之各种法律及条例，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俄国之中国居民，皆服从苏俄境内现行之各种法律及条例。

（5）中国政府表示实践下列措置：本约签订后，中国政府立行与彼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领事代表者，断绝关系，并驱逐出境；将中国境内属俄国之公使领事房产及

案卷等，移交于苏俄政府。

（6）中国因“拳匪”乱事交付之任何赔偿，若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因前俄领事或任何他人以及俄国各种团体提出之非法要求，由此款项下拨交彼辈，则苏俄政府愿放弃之。

（7）本约签订后，中俄两国应立行互相恢复外交及领事代表。

（8）中俄两国政府，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用，允订专约，将来订此专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得加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将上列协商之各点，作为主要条款，将来可与中国代表本此以友谊之态度进行磋商，如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计，对此有须修改之点，亦可加入改正。

中俄两大民族间之关系，非上列之协约所能尽述，两国代表此后尚须解决商务、国境、铁路、关税及其他等问题，并另订专约。

苏俄方面将多方尽力，以建设两国之亲密友谊，并希望中国政府亦具有同一诚笃迅速之建议，俾能早日进行缔结友好之条约。

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

1920年9月27日，莫斯科

（录自龚稷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料》，1948年10月东北书店出版）

加拉罕对华宣言

苏俄对华政策，原已周知，且非为新近发生之问题。当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吾人即详细表示对华态度，一若表示对亚洲各国政策之原则无殊。1919及1920年，吾人业拟定对华原则，亦即吾人准备对中国及其国民建设友谊关系之原则。该两年所发表之对中国政府及国民宣言，料已遍知，此外无再可述者。余对此只能切实声明两次宣言之原则与精神，依然为俄国对华关系之原则。至于中俄两大民族亲善之利益，更不待余详述。俄国在1919及1920年曾两次正式建议两国亲善，不幸当时皆未得中国答复。但中国国民与政府，现已力谋促进中俄问题之解决及两大民族友谊关系之建设矣。俄国对中国所怀之旨趣甚大，但为免于误会起见，应切实声明，目前新俄对华所怀之旨趣，与俄皇时代之旨趣与要求，绝对不同。

俄皇时代之政策，乃欲收服毗连俄国之中国土地与人民。在其谋达此目的之前，毫无顾忌，且籍军事与经济之力，以实行其政策。此种政策，各帝国主义国与之共同进行，损害中国国民之主权，掠夺中国之财富。

俄国劳农革命推倒俄皇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国主权及完全抛弃侵略所得之土地与财产之基础，建设其对各国之新策，对中国之政策亦然。大中华民族，具有其本民族之文化，及和平勤奋之精神，乃俄罗斯民族在亚洲最善之盟国。中俄亲善，足以保障远东之和平，只须中国国民皆尊重中俄亲善之需要，则决无从而阻碍者。但中俄双方均有多数敌人，对中俄亲善甚为顾忌，且力为阻碍亲善之实现耳。帝国主义国邦，曾欲化俄国为其殖民地，俄国历经艰难困苦之挣扎，现已脱出危机，中国则仍在挣扎之中，在其挣扎之途程上，苏俄实为其唯一之友邦。

各国对中国政策有二：其一唯苏俄采行，其次除苏俄外各国皆采行。此两政策实施之结果，若具体加以说明，可引土耳其问题述之：

外交家在近东咸指土耳其为“近东之病夫”，各帝国主义国邦咸集中其侵略旨趣于土耳其，一若其集中于中国无殊。欧洲各国为易于操纵土耳其起见，均欲土耳其无强健之政府，无有力之军队，经济不能发展，俾土耳其日趋衰弱，且用种种方法，使土耳其不能为其障碍。在彼各国，极欲土耳其病势日甚，直至不能抵抗各国之侵略。根据欧战终了时土耳其国贼签订之绥佛尔斯条约，已使土耳其成一徒拥空名之国邦。但土耳其之优良分子，反对是约，开始与帝国主义奋斗，俄国乃唯一赞助土耳其之国邦。当时俄国虽自身陷于困难之中，仍予土耳其以协助，结果土耳其竟操胜券，与欧洲各国缔结梦想难得之平等条约。欧洲各国前此掠夺土国人之主权，至此均迫于奉还土耳其，此中国国民已知之事实也。

中国之命运，与土耳其有相当之类似。惟中国较诸土耳其略为强大富庶。然各国对中国之侵略，则与对土者无殊也。彼各国咸欲中国四分五裂，内乱频仍，军力衰弱，成一不能抵抗侵凌之“病夫”。

全世界中，唯有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国民，愿中国日趋强盛，能以卫护其利益与主权；唯有俄国愿“病夫”健康恢复，挺然起立而已。

中国国民领袖咸已深悉统一之必要，国中优良分子现方进行此种主张，此乃余所注意且引为满意者。欲实现此种主张，前途殊多艰阻，就中列强之帝国主义政策即其最甚者。

余知种种纷纠，皆为复杂阴谋及直接侵略所演成，其意乃在阻止统一，籍内乱以图彼各国之私利，此乃中国国民最不幸者也。

中国前途虽有种种艰阻，将来终有统一强盛之时。此时俄国国民与苏维埃共和国将视为最可庆之日，吾人之愿望，不独以吾侪革命者数十年来对俄皇政府奋斗原则为基础，且以俄国政治的旨趣为基础。

强大集中足以抵抗外来势力之中国，对于苏俄将为最诚信之友邦。盖中国对俄决无侵略之目的，一若目前俄国毫无侵略中国国民主权与利益之旨趣也。唯有强盛之中国，能秉行光明磊落不因外强之利益或压迫而损失及本国利益之真实的国家政策。俄国所望于中国者，亦即此独立的国家政策。盖在此种状况之下，中国将能以友爱之态度，对待俄罗斯民族也。数年以来，中国政府与中国当局每月有对俄施以非友谊的措置之事实，但吾人在莫斯科均知凡此种种，皆非中国国民之真正民意，而为受压迫与嗾使之结果，有时甚至系列强对俄仇视之直接侵略行动。今日余须声明者，乃外强势力对于俄国，现已减至最低限度，且无论其仍存在，无论苏俄仍受其敌视，中俄间恢复邦交亲善之良知，既如是之强，则他国亦不能从中阻碍矣。

同时余愿指明者，乃俄国对中国之旨趣，既不损及中国国民之利权，则无论如何，俄国决不轻予屏弃。余深信中国国民了解吾人对中国之与中国利权极易平等调和的真实旨趣，且知必须予以承认。余尤深信在此办法之下，中俄间决不至发生若何困难问题。

现余尚未熟识中国国内复杂情形，余决不以为解决中俄问题前途将因复杂情形，发生障碍，在余来京前，在哈尔滨与奉天曾作逗留，每处对余皆有诚挚之欢迎。余曾与负责的中国政治家多人相晤，张作霖氏对余之接待，尤令余特别铭感。满洲方面及中国其他各地，已承认对俄亲善之必能。中国政府与各界，皆热望早日建设对俄关系。余曾与张作霖氏相晤数次，在谈话中曾得良好之印象，虽偶有可疑问之点，经在奉逗留数日，已有相当之消除矣。当余抵京之际，国会代表，政府当局，各界团体，对余之接待，尤以学生对余之欢迎，更使余从速解决中俄关系之希望增强。最近列强因临城事件之通牒，乃其对待中国国民态度之好例。中国对此前所未闻之苛求，无论任何派别，皆一致起而抵抗，余此时深为敬服。余深信健全的国家观念，将永远抵抗扰乱中国种种之诡计，余甚愿中国有一强健之政府，使各国无一敢再以临城通牒中所载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且深信统一之结果，将使中国能有此种强健之政府。

——1923年——

（原载《东方杂志》21卷8号）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附声明书七件）

大中华民国大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愿将彼此平日邦交恢复，协定解决两国间悬案大纲，为此，派定全权代表如左：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顾维钧；

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特派加拉罕。

两全权代表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洽，议定各条如左：

第一条　本协定签字后，两缔约国之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

中国政府，允宜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

第二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列各条之规定，商计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予以施行。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超过自前项会议开始之日起六个月。

第三条　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前条所定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之原则，依照1919与1920两年苏联政府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

第四条　苏联政府根据其政府及1919与1920两年宣言，声明前帝俄政府与第三者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政府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

两缔约国政府，声明无论嗣后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

第五条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之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后，即将苏联军队，由蒙古尽数撤退。

第六条　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第七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第八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将两国边界，江湖及他种流域上之航行问题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则，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规定之。

第九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前条所定会议中，根据下开原则，将中东铁路问题解决。

一、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物：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占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

二、苏联政府允诺将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

三、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解决赎路之款项，及条件，暨移交中东路之手续。

四、苏联政府担任对于中东铁路，在1917年3月9日革命以前，所有股东持债票者，及债权人负一切完全责任。

五、两缔约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六、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条第三项所规定事项，未经解决以前，特行规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办法。

七、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之会议，未将中东铁路各项事宜解决以前，两国政府，根据俄历1896年8月27日，即西历1896年9月8日，所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及暂定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暨中国主权不相抵触者，仍为有效。

第十条　苏联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条约协定章程所得之一切租界、租地、贸易圈及兵营等之特权及特许。

第十一条　苏联政府允予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

第十二条　苏联政府允诺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

第十三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之会议中，订立商约时，将两缔约国关税税则，采取平等相互主义，同时协定。

第十四条　两缔约国允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讨论赔偿损失之要求。

第十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日起，即生效力。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加拉罕

附声明书七件

其一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声明，一俟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字之后，彼此应立将前俄帝国政府与中国所有之一切不动产及动产，在各该国境内者，互相交换，并彼此将此项应行交还产业开列清单送交各该政府办理。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加拉罕

其二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声明了解，关于苏联政府实际上所有之俄国教会房屋及地产，其移转或他项适当之处置，应在大纲协定第二条规定之会议中，按照中国内地置产现行法律及章程商定之。至苏联政府实际上在北京及八大处所有之俄国教会房屋及地产等，一俟苏联政府指定接收之。中国人或中国机关，中国政府，即按照中国内地置产现行法律及章程设法移交之。惟中国政府应先设法保守，并腾出该项房屋与地产。

再此项声明与大纲协定内之声明条款有同等效力。

为此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加拉罕

其　三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共同声明，关于大纲协定第四条双方了解。中国政府对于俄国自帝俄政府以来，凡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其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无论将来或现在，均不承认为有效。

再此项声明与大纲协定内之声明条款，有同等效力。

为此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加拉罕

其　四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共同声明：在大纲协定内第十条所载，苏联政府所抛弃之各种权利与特权双方了解，中国政府不拟以其一部或全部让与任何第三国，或任何外人组织之团体。

再此项声明与大纲协定内之声明条款，有同等效力。

为此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加拉罕

其　五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大纲协定第十一条共同声明，双方了解如左：

一、苏联政府所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先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

二、设立一特别委员会管理，并分配上述款项，该委员会以三人组织之，其二人由中国政府委派，其一人由苏联政府委派，该委员会议决事项以全体一致行之。

三、该款于随时收入时，应即存储于上述特别委员会所指定之银行。

再此项声明与大纲协定内之声明条款，有同等效力。

为此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加拉罕

其　六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同意，按照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二条之规定，在大会内议定适宜条款，以期苏俄人民因该协定第十二条而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后之地位，有所准据。然无论如何，苏联人民，应

完全受中国法律之管辖，合并声明。

为此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加拉罕

其　七

大中华民国政府与大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业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现经同意解释本日所签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第五条所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及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人民平均分配充任之原则如下：

此项原则之适用，不得解作以撤换现任俄籍人员，为实行该原则唯一之意义。

再双方了解所有各项位置，应准两缔约国人民平等充任，不得对于何方人民表示差别待遇，且各项位置，应照谋事者之能力技术，及教育资格补充。

为此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将本声明书英文两分，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订于北京 顾维钧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加拉罕

（选自《中苏关系史料》，新华书店1950年2月发行）

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选)

各 团 体 答 复 文

全 国 报 界 联 合 会

俄国人民及俄国人民的政府公鉴：我们接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下面，以美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中华民国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 国 各 界 联 合 会

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公鉴：顷接俄国劳农政府通牒，不胜欣喜。吾人前此，以中外报章传闻复杂，无从悉俄国之真相。今读俄国通牒，一种正谊人道之主张流露言表。凡世界各国人民中之宝爱正谊人道者，当无不表示赞同。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勇敢代表中国人民，答复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之盛意。

溯自武力主义及资本主义印入于世界各民族之脑筋，遂因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而屡演惨剧：于是强侵弱富欺贫的惯习，充满于社会与国际。俄国人民首先为正谊人道努力。此次通牒声明，将中东铁路矿产森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之特权，皆归还中国；俄商在中国内地所设之一切工厂，与夫俄国之官员牧师或委员等所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并抛却庚子赔款：无非以俄国人民极信仰之自由、平等及互助主义，推行于世界，不独向中国人民表示好感也。从此旧式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世界，则各国人民群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矣。

吾人不能不为俄国人民告者：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皆为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所盘踞；彼辈恃武力与外资而固其位置，实与俄国高尔哲无异。频年以来，北京政府为仰日本之军械金钱之援助，竟与彼国军阀私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吾人甚为痛心。刻下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民，正准备与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奋斗，无论如何牺牲，均所不辞。惟如辈挟有数十万之军队，此类军队未受教育者居十之八九，素为彼辈所蒙蔽；吾人已拟设法唤醒之，俟大多数军队觉悟之后，彼辈之凭借已失，必不能压制中国的人民。是时吾人之进行毫无障碍，不难屏前日俄帝国所任命之公使及领事于中国境外。本会谨依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所组织之劳农政府之通牒，正式声明，收回各项权利，庚子赔款；并恢复吾

俄两国人民之邦交，至遣代表赴俄国军队之前一节，亦所深愿。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励，作正谊人道之前驱。中国人民为世界人类之一部分，自应共负维持正谊人道之责任也。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

全国学生联合会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意，奉复于我们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新创造的共和政府之前：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一日

中华劳动公会

俄国农民、工人、劳农政府、红卫军公鉴：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的欢喜；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

中华劳动公会

学生联合会等十七团体

中华民国国民致诚恳之答复于俄罗斯共和联邦国国民，及苏维埃政府：吾人认苏维埃政府之通牒系根据其立国之根本主义，表示善意，声明无偿退还前俄帝国政府掠夺中国之土地，及一切权利，交还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及前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柯尔恰克，以及其他军人律师资本家所掠夺中国之特权，皆归之于我民国人民；又自愿废止1906年1907年日俄条约，放弃庚子赔偿及领事裁判权，此等空前未有之义举，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为世界永久和平之道。我人表示依我人主义而接受之意。惟我人亦不私其所有，除领土及主权在天国大同世界未完全实现前，不可侵犯外；深愿公其利益于世界。我人愿以诚意与俄国拥护人道及公义之人民通好，以达世界人类互助共存之目的。

上海学生联合会、沪北六路商界联合会、邑庙豫园商业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山东路商界联合会、天潼路商界联合会、东西百老汇路商界联合会、吴松路商界联合会、爱克界三路商界联合会、东北城商业联合会、上海志成团、北城工商联合会、留日学生救国团、西书同业永志会、福建旅沪同

乡会、上海救国恒心团、基督教救国会。

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

俄国人民暨劳农政府钧鉴：自接贵国通牒以来，我中华民国人民如拨云雾而见天日，发生许多感触，及无限之钦佩。盖自欧战告终，正强权摧缩，公理伸张之际，贵国人民奋起刚毅之勇敢，牺牲宝贵之精神，建造共和政府，享受自由幸福，实足为世界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至通牒中声明将中东铁路矿产森林实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以及现在俄国军人资本家攫得之特权，概行归还敝国，并抛弃庚子赔款等情，足见俄国人民努力于正谊人道，共谋人群互助之真诠，并欲铲除国际上之侵略，及种族上之阶级，以冀造成和平博爱之新世界，岂独敝国人民感佩已乎。今敝会敢代表中华民国真正之民意，披肝掬诚，复谢我挚爱之俄民，与劳农政府通牒之感意。并愿此后与贵国人民恢复平等之邦交，实行恳切之亲善，庶几使中俄人民得以同心协力，再接再厉，打破一切侵害民权之障碍；则世界平治。实利赖之。诸维垂照，是为至幸。

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部，咸。

中 华 实 业 协 会

俄罗斯共和联邦国国民暨苏维埃政府红卫军公鉴：吾辈中国劳农学商全体人民，接到贵邦通牒，声明无条件退送俄前帝国政府强力取去中国之土地及各项权利；交还中东铁路及林业矿业等，以及从前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柯尔恰克等，及其他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强夺中国之特权，皆一律返诸我国；又放弃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又声明废止1906年1907年日俄私订条约；此项伟大壮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展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此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欢迎贵邦通牒之伟壮精神，较诸欢迎物质归还之情绪，尤为殷恳倍切者也。吾人深信贵邦通牒所含蓄真精神，苟中俄两国劳农全体人民，能合力不欺，以发扬之，足以维持全球民族间之永久和平；而东亚及世界各民族，欲恃武力欺凌残暴诡秘诸种私图，以为立国根本者，终当受上帝与公道之惩罚，无以自存。故吾人深愿与俄国拥护公道正义及东亚与世界永久和平之人民，正式通好，以达世界大同，民族互助之远大意志。抑我辈尤有慎重声明者，现在我国南北各方，皆属昏瞎武人及腐败官僚之集合体，无论其号召与目标如何动听，要皆残民以逞，私利是图，与全体国民之公意及幸福，绝对不相容。国民对于彼辈间之争端等若械斗，非特不援助任何方面，并且毫不注视其情况；想俄国人民必不为彼辈之一切诡词所淆迷，对我中华民国之真实状况，早有正当明确之见解也。

各 报 的 言 论

天 津 益 世 报

俄劳农政府对于吾国早有善意之表示，惟因消息之妨阻，莫由正式传达，遂有含意未申

之患。今劳农政府之势力，已达于极东。据海参威电传：劳农政府又以代理外务执行委员之署名，对吾国国民及南北当局，发表正式宣言。连日又有北京已接依尔库次克牒文，系由莫斯科发出，及莫斯科政府派员间道至满州里投递国会，声明对吾国民族亲好，愿交还从前所得条约上之利益及特权，此实为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苟非实行其防止人类掠夺人类之根本主义，而出于自动之行为，岂吾国力所能得之哉？

俄帝国早已复灭，而吾国犹承认俄使俄领，天下之至愚无过是者；世岂有代表之国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独立存在之理？俄约之害，与夫庚子赔款之巨，前俄帝国已不能要求吾国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国履行，岂非怪事？古语曰，刻木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国，对吾国尚有余威，是尤甚于刻木为吏矣。在北京当局未经俄劳农政府声明前，或犹可诿为未悟；今劳农政府又明明宣言俄使俄领之权已失坠，无要求履行义务之权利；倘北京当局犹对之履行条约及交付赔款惟谨，苟非童騃万不致此，吾不知北京当局亦能恍然大悟否？

总之无论北京当局之悟否，惟劳农政府之宣言，乃对吾国国民及南北当局而发；南北当局如何答复，姑置不问，记者以为国民对之，必宜有所表示。本报请首先代表国民，对于劳农政府之宣言，表示接受；嗣后两国国民应即通好，愿我全国共鉴斯言！

上 海 时 事 新 报

我们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牒应当做下列的观察：

一、劳农政府本他固有的精神表示他的态度。

二、我们对于他应当感谢他这种精神，而不必斤斤物质上权利。

三、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威尔逊所提倡而未实行的：（一）撤废国际上一切特权。（二）废除秘密外交。（三）不分割土地。（四）不要求赔偿。（注）

上 海 救 国 日 报

正义呀，人道呀，自从欧战告终之后，你的名字把得世人叫绝了。强大的国把你来做交际品，弱小的国望你来做救命佛；但是叫了这么久，也不见着正义在那里，人道在那里。恐怕现在的世界，比欧战前还要黑暗些哪。正义呀，人道呀，人类的生存，和世界的大同，还是要你出来维持维持。从前强权当道的时代，没有人提起甚么正义人道，那些贫乏的国家，和弱小的民族，也没有说话的余地；现在他们所谓大国的，天天拿人道正义做口头禅，我们不免趁这时候催促他成功，使他无法回避；不然他们口内尽管说，做的事还是背道而驰。不信请看那非门问题呵，山东问题呵，土耳其占领问题呵，韩国独立问题呵，人种撤废问题

（注）威氏所以在国际上不能做到这步田地的原故，是因为他在各国的国内不主张废去军阀财阀；我们不当象小孩子得了已失的糖饼，只管嬉笑，而忘了自己也应得立起来，做个有人格的事业，给人家看看。我想我们应得有下列两种表示：

一、用全体人民的名义答复他，表同情于他的世界平和主义，二、驱逐旧俄国驻在我国的官吏，第一、因为旧俄国是代表侵略主义的，和日本一样；第二、因为旧俄国完全消灭，我们和他没有交涉可办了；第三、因为我们保存这些旧俄官吏，乃是表示我们不配讲人道正义，我们甘心做强国的奴隶，所以这一层非常要紧。

呵；各国扩充军队的还是扩充军队，匈奥人饿死的还是听他饿死。不想这个不公道的时候，竟产生一个实行正义人道的娇子来了：世人都称是“过激党”，大家又说他很残忍；照前天的俄国劳农政府致我国的通牒看来，实在有些不然；真是可以令人五体投地，表示无限量的欢迎。我把他介绍在下面，也好替世界口讲正义人道的树个榜样。

他那个通牒格式，简直是向我们国民说话；并且还是对我们国民中的农人工人说话。他全篇的意思，是想东方的各民族，得解脱外族的强权，和外族金钱的压制；并还劝世界各国建立耐久和平。所谓耐久的和平，就是叫各强国放弃侵占他人的土地，和吸收他人的金钱为根本。他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恐怕那些口里讲正义人道的国家害头痛；他们不但不放弃已得的权利，就是那未得的权利，也正经之营之的打算；即令时势逼着他说几句人义道德的话，事实上决不会丝毫放弃的。从前国际上或一国最高主权者有变动的时候，对于其他各国的通牒，何尝不是说些讲信修好，敦睦邦交的话呢；但是意思都于含混的，并且不得自请取消一切权利。劳农政府这封通牒，恐怕是要开世界的先例了。他说劳农政府，情愿废弃1896年的条约，和1901年的北京条约，及自1907年到1916年间，和日本订结的一切协约；简节点说，就是把俄皇政府单独侵夺，或和他国共同侵夺中国人民的所有权，不索丝毫的代价，一概归中国。并且说就是俄商人在中国地面上占有的一切租地，任何俄国官吏及教士，不准干涉中国事件；如他们犯了罪，应照中国法律审判，不能有第二者之法律及权力混入。

唉！如果把他这些话都实行尽致了，世界的大同登时可以实现；人类共同的幸福，一天向上一天；什么保持国际平等，拥护主权独立那些话，简直不成问题了。缩小范围说，我们中国在国际上所受不平允的待遇，一定可以摆脱的。国人呀！中华民国国民的转机，世界真正的和平，就在此一举；不要怀疑他们政府未经人承认，国际的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也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事实俱在，岂能由人信口雌黄的吗？赶快拿出主人翁的资格来表示意见。那尼古拉斯时代的公使领事，当然是要送他出境的。现在合乎公理的外交官，当然是极表欢近的。所有两国间的外交，即时公开谈判。能够逐条的做到了，其他的各友邦，也只好顺应世界的潮流，期合人类共同生活的原则。英日同盟呀，军事协定呀，门户开放呀，势力范围呀，收回治外法权呀，退还庚子赔款呀，这都是迎刃而解的事情，我们又何必枝枝节节的去乱下功夫呢？

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

这一种人种应得的自由，虽则确是人类所应得的，但在这强权横行，公理潜伏的短时期内，“自由”究竟还不能自然的为全人类所得到，所享受；故爱好自由的人——甘心子子孙孙作奴隶，作牛马的是例外，本来不好算得是人——只得用一种“力”去换得那自由来。俄国劳农政府致我们的通牒说得好：“深愿中国人民，因我们的提议，愿做一种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力战！”这几句真是何等恳切！现在大家不是讨论对俄牒的表示么？我以为对俄的表示，单是拍电报、发宣言是没有用的；俄国人不好纸上空谈，他们既然这样真挚的希望我，我们便应该实实在在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真是不负俄人，抑且不负自己哩！所以我对于此次的奋斗，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能付这种希望，那么中国人在世界人类的进化史上自然可占一个位置；否则就没有价值。我的希望是什么样呢？就是：

由智识界而普及于劳动界，由大都会而普及于乡村，不分阶级，不分区域，全国的平民

大家协力互助，把国内一切侵害、剥夺自由的恶魔一齐宣告死刑；然后再把国际间一切秘密性的桎梏，不道德的诡计，完全扫荡一个干净，与世界上宝爱自由、平等、正义、人道的民族携手，重造一个完全自由的平民互助世界。

上海星期评论（一）

（一）

在前几天里面，我们中国人民，从路透电里得来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看见这个报告的人，没有不无限欢喜无限感激。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正记通告。国民呵！把我们中国的历史，回头想想，差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家侵略外国和外国国家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上古和中古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曾经创造了许多侵略的历史；把中国的国威，压在一切弱小民族的上头，在先住民族的坟墓上面，建设起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帝国来。现在蜀滇和两广的山谷里面，还留着许多先住民族的悲惨影子。后来北方民族强盛起来，顺着天时地理的自然关系，来侵略南方温暖肥沃土地，把中华民族农工业文明的成绩，化作牧场；把尽力于农工业文明的中华民族，压服在强弓硬弩的下面，做成游牧酋长的奴隶。五胡的侵略，蒙古的侵略，满州的侵略，这些历史，就是后兴民族用武力侵略中国，推翻中华民族在先住民族坟墓上面所建设的帝国，把中华民族做成垫足石来建设他们的帝国。到了近代，欧洲的强国，挟着由科学恩惠得来的新势力，以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来侵略东方。中国这个最大最富的产业地人民，一面还没有脱离游牧酋长的奴隶，一面又早装进了金子和铁铸成的囚笼。接着东方新强国的日本，学着近代欧洲式的侵略手段，利用他最接近最便利的地位，以铁炮金钱，交互打了进来；中国国民的奴隶境遇，更加痛苦到二十四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

（二）

国民呵！我们只把这些历史，回头一想，真是无限的感伤，无限的兴奋。我们如果是有了"人"的觉悟，就应该要合起几万万的重重奴隶境遇里面的人民，振起一个很大的革命精神，把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所遗传来的你、我、他的罪恶，都洗刷个干干净净。联合世界上一切被掠夺的人，为世界全体人类，建设一个完全人类自由劳作、自由管理、自由享用的互助世界！

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思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在悲哀惨酷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

中国的同胞呵！我们要晓得俄国政府通告的意义，最主要的并不是在归还以前侵略我们

中国的权利那一个事实；还是在最后很恳切的希望我们中国人民的一句话。

“希望中国人民，因为我们的提议，愿意做一种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这是我们中国从一个善良而且强大的民族团体里面听来的最有力的忠告。倘若我们只是恬不知耻的，把人家义务的努力，互助的努力，当作一个慈善家的施与，持一个“敬领谢”的态度，忘记了自己也是人，忘记了自己也有应该为人类努力的义务，便真是世界平和文化的大不幸了！

（三）

现在我要很简单的，把俄国政府这一个通告的内容，略为讲一讲了。他这一个通告的决心，并不是新近的事，也并不是从这一个通告上才发表出来的事。1918年7月10日，第五回全俄苏域会议所议决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宪法”第一节，“阐明劳动者及被掠夺民族权利”一章里面，已经完全正式宣布了。他们在国际问题上所持的主义，第四条第五条上面，说得很明白，现在我把他写在下面：

第四条　在此次罪恶贯盈的战争里面，所以流惨淡的鲜血于世界的缘故，全是因为有“资本的经济主义”及“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因为要表现人种真挚的决心，粉碎这一切罪恶，第三回苏域会议，全然赞同由苏域政府所采用的下列各项方针：

发表秘密条约。

奖励在战场为无意识的战斗之劳动者及农民，彼此交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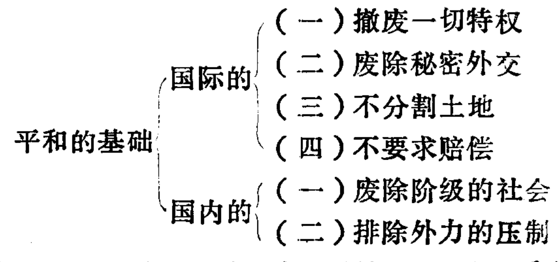
不合并土地，不赔偿金钱，只由革命的手段，在民族自决主义基础上面，获得劳动者之民主的平和。

第五条　和前条的目的一样，第三回苏域会议，对于为图特殊少数国家中掠夺者的安宁，在亚细亚洲，尤以在殖民地及小国内，以数亿劳动阶级为奴隶而不以为耻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国之野蛮政策，根本反对。

我们看到这两条俄国宪法的条文，就可以晓得俄国这次对中国所采的政策，是由他们建国主义的根本信条上面发动出来的，并不是特别的一时的举动，更不是以捭阖纵横为主义的外交手段。看通告上面所说自1917年10月以后他们对世界发表的永久平和方针，也可以明白。

（四）

就他们通告上所述说的意思，我把他写出一个系统来。



上表所列的，是他们对于建设“社会民主的平和”之根本意见。再详细一点讲，就是废除一切国际的社会的资本主义和武力主义，使一切种族、一切民族，都在自由、平等、互助的

原则下面，完成社会的生活。

对于中国特别声明抛弃的，是包含帝政时代以来所掠夺的一切物权、债权、法权，他们不单是自己声明抛弃，并且要全世界的强国一齐抛弃，尤其要日本一齐抛弃；这是他这个通告当中很有力的地方，也是他们在主义上很鲜明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晓得这个目的，不是俄国的努力所达得到的；愿意做自由人不愿意，能够做自由人不能够，都是要中国人自己去努力的！

我叙述这一段话了之后，只有几句话：

中国的国民呵！大家要为世界的人造自由的世界！

世界的被掠夺者呵！大家要一致团结！

世界上强有力的掠夺者呵！你们应该要赶快从弱肉强食的历史罪恶里面觉悟转来，抛弃你们一切掠夺品，回复你们"人类社会的良心"！

上海星期评论（二）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以后，颇引起全国的注意。全国报界联合会已经于四月八日在上海开特别会议，表示："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下面，以美满的友谊，致力于排除国际的压迫，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的意见。基督教救国会，也开会讨论对于这种通告的正当表示，并通告各团体，征求意见。北京二十九校代表也讨论办法二条：（一）请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向劳农政府表示亲善的意思；（二）由北京学界全体具名致电劳农政府，请他从速实行退还各种权利；实行以后，中国国民，当根本承认该政府；（三）请北京政府速从民意决定对俄方针。在俄国劳农政府的军队还没有长驱直入西伯利亚，和该地革命国民携手以前，我国一般人民，听见俄国两字，就联想到"过激"；联想到"过激"，差不多不是惊骇，就是痛恨。除了惊骇痛恨两种以外，还有一种"轻视"的人，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立的地位，实在无足重轻，可以不必管他的。以上三种见解，都是反对的见解，不但无识的人民如此，就是自居智识阶级的人民，也往往不免。但是从此番沪京两方面对于劳农政府通告的意见看来，可见一部分人民，已经由反对而趋于赞同了。这种情形，未始不是人民的进步。不过我以为现在俄国的问题，不是一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俄国劳农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通告，也决不是专为中国的一国问题；所以吾国人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决不能仅仅发几个电报，做几篇宣言，就算了事的。我们接受，赞同他们的通告，究竟为什么缘故？我们接受，赞同他们的通告以后，应该有什么动作？都不可不预先研究的。我以为现在中国人民，应该认定这一件事，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无论那一种人民，都应该各尽自己的能力，大家研究讨论。现在先把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极简略地写出来，和读者商量。

要讨论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问题，要先研究该通告的内容。他的全文，本日的本报中已登载了。我现在为便于讨论起见，再提出通告全文的大纲，写在左边：

通告的大纲，大约可分三项：

一、表示俄国人民和政府的精神，全文所表示俄国人民和政府的精神，约有二种：（一）对于人民，在拯救他脱离资本主义的羁轭；（二）对于各国，要取消密约条约和约，要彼此各还从前时候的赔款和侵地，要不得干涉内政，不得以势力压迫农人工人，以立永久和平的基础。以上两种精神，都是根据俄国宪法而成的；所以此番的通告，实在无非是把他的宪

法，应用在一种特殊事实的说明罢了。

二、表示日本和协约国对于中俄间的强暴行为。

三、表示废除中俄间各种条约密约，兼且放弃俄人在华的各种特权赔款。这种表示，无非为实现第一次俄人民及政府的精神起见，就是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在事实上面。

四、表示对于中国人民的希望，这种希望，可分为三种：

（一）把以前俄帝国政府所任命的驻京公使和领事，逐出境外。

（二）中国人民与俄国农民工人及赤军提携，为自由而力战。

（三）正式恢复邦交，并即派代表到俄国军队。

现在一般人民，对于这种通告，大都是赞同的。但是他们的赞同，还是把以上所举的各项全部赞同呢？还是仅仅赞成一部分呢？我却很觉得很怀疑。据我的意见，我们如果要反对他，那也不必说了；否则有不可不注意的地方。我且把我所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写在下面：

我国一般的人，很富于徼幸心，往往喜欢不劳而获，喜欢吃天鹅肉。我国自从和欧美各国有外交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的，几乎没有一次不丧失权利的；但是国人的希望，总是想倚赖第三者的援助。联俄呢，联德呢，亲美呢，亲日呢，无非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此番俄国劳农政府，把从前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向中国侵略来的种种权利，如数归还中国。这种权利的代价，若从获得的时候看起来，不晓得费了多少的金钱、生命、精神、时间。但是现在俄国人民，不但不要中国人费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不要中国人费外交的口舌力，居然能够把这许多损失的权利，归还中国，天下那里再有比这个再便宜的呢？我恐怕世界的天鹅肉，没有再比这种更好的天鹅肉了。以素来喜欢吃天鹅肉的中国人民，遇着这种事情，那得不非常赞同呢？所以我可以武断几句话，就是：中国人民，恐怕大多数赞成俄国的通告；但是他们的赞同，是仅仅赞成我以上所说通告大纲中归还权利一项，就是赞成可以不劳而获。我的武断，如果不错，我要请抱这种见解的人仔细想一想：俄国劳农政府究竟为什么肯归还中国权利，而丝毫没有条件呢？他们所以能够这样的缘故，无非是要发挥他们宪法的精神。他们宪法的精神，是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是人道正义的精神，就是要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他们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我可以决定他们决不会有归还中国权利这回事。所以他们此次通告我们，决不是要想借归还权利这件事，来见好于我们；他们是要借归还权利这件事，来表现他们宪法的精神，实行他们的宪法的。我以为我们对于归还权利一端，应该赞同，当然可不待说：但是对于他们归还权利所根据的宪法精神，我们应不应该赞同？必须加以研究，决不能置之不理。归还权利，在中国人一方面看起来，是可以得利益的。谋自己的利益，是人类的通性；我们应该赞同于我有利的事，正适合人类的通性。但是我们谋自己的利益，必须谋永久的利益：要谋永久的利益，必须谋人类全体利益。凡是从资本主义武力主义下面所得来的利益，都不是人类全体的利益，都不是永久的利益。永久的利益，必须从人道正义上面，才能产生的。所以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一方面因为俄国归还我国的权利，使我们能够得利益；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这种利益，是从俄国发挥人道正义的宪法中得来的。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我们应该要赞同俄国宪法的精神，不能仅仅赞同归还权利这一端；我们赞同俄国的归还权利，不能仅仅因为自己得利益，应该要晓得我们所赞同的利益，是从人道正义下面得来的利益；所以一面赞同取得利益，一面要赞同人道正义。这一段的意思，总括起来，就是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不能专为自己的利益，这是第一种应该注意的地方。

我国一部分人有一种通性，就是对于无论什么事，差不多只重势力，不重真理。无论那一种主义，那一种事业，当最初提倡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得多数人的同意，所以势力一定是很微薄；在那个时候，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反对的总是很剧烈；等到势力渐渐扩张的时候，从前的反对，往往变为赞成者。但是这种赞成者当中，有许多实在是赞成势力，并不是赞成真理的。这种情形，虽我说是中国一部分人的通病，实在各国的人民，有一部分人也是不能免的。试就俄国的事而论，自从俄国1917年革命以来，联合国对他的态度，变迁很多。有时主张用武力干涉的手段，有时主张用粮食封锁的政策，有时主张媾和；但是这种态度的变迁，往往和劳农政府的势力，有直接关系。劳农政府的势力，在现在的时候，各国共认为不能再以武力屈服了，所以赞同他的声浪，也是一天高一天。但是一种主义，如果主义的本身，的确合于真理，一时虽不能得势力，将来一定是可以得势力的。主义的势力，是可以用人力造成的。我们对于一种主义，当预先认定他的真理，去造成他的势力；不要等到他的势力已经造成之后，才去认定他的真理。俄国劳农政府的势力，将来究竟怎样，必定要看他的主义的本身，究竟合不合真理。如果合于真理，即使联合国集合全国军队，把俄国灭亡；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仍有实现的一日，俄国仍有复兴的一日。所以我们对于俄国的态度，应该怎样？要先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自从劳农军队到海参威以后，一般人民，以为俄国势力，势难敌抗，有是渐变其反对的态度。此次赞成俄国通告的人，也难免没有慑于势力一流人物。我以为势力往往有变迁的；有时忽尔很大，有时忽尔渐微。我们如果以势力为从远，那是时时须受外界的支配，实在是很不自由很痛苦的。譬如从前劳农军队占领海参威的时候，我们要赞同劳农军；现在日本占领海参威炮台的时候，我们又要赞同日本军；这样反复无常，还成什么事呢？世间有不可抵抗的势力，就是人道正义的势力。合于人道正义的主义，即使一时失败，没有不得最后的胜利的。所以我们只要就人道正义的所在，往前做去，不必问现在有势力没有势力。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就现在的通告上面看来，的确是很合于人道正义的；所以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不仅为俄国的势力，是为了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这是第二种应该注意的地方。

人道正义的提倡，是人类共通的责任，决不是专限于那一国国民，那一种民族。俄国归还中国的权利，是为实行他的人道正义的主义起见，并不是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感情。他的通告，是为谋世界全体的幸福，决不是专为一国。我们赞同他的通告，实在用不着对于俄国人民，表特别的诚意。我们如果能为人道正义尽力，那是一定为俄国人民所非常欢喜的。不然，只有空文上的道谢，没有实际上的互助，恐怕是很失俄国此番通告的本意了。现在的时代，是阶级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以为应该合各国劳动阶级的力量，和各国的资本阶级战争，才能打破资本阶级。所以劳动阶级当中，决不当再分什么种界国界。俄国此番的通告，是希望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共同为自由而战，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既然赞同他的通告，应该协同各国的劳动阶级，为自由而奋斗。我们要晓得现在的世界，国和国有很密切的关系；仅靠一国国民的能力，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以为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不仅是为中国一国，兼且是为世界；这是第三种应该注意的地方。

从以上三端看来：我们赞同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意见，大略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的赞同，决不是空文的赞同，还须有实际的行动。自“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国民所时时注意的，无非对日问题。但是对日问题决不是专对日本政府所能完全解决的。从今以后，应该把注意点移在对俄问题上面。对俄问题，决不仅是对一国的问题，是对世界的问题。资本阶级

和劳动阶级，侵略主义和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种种冲突，究竟是怎样解决，都和各国对俄国的态度有关系。我愿全国舆论界、学生界、工业界以及其他国民，大家都起来研究对付，不然开一次会，发一通电，就称了事才好。

（原载《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李 大 钊

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一时泯棼之象，颇足致觇国者之悲观。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缔造之初，流俗惊焉，视此根本之颠复，乃为非常之祸变，抑知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景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或者谓法人当日之奔走呼号，所索者"自由"，俄人今日之涣汗绝叫，所索者"面包"。是法人当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俄人革命之动机视法人为鄙，则俄人革命之结果，必视法人为恶。且在法国当日，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法兰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国无之，故法人虽冒万险以革命，卒能外御强敌内安宗国，确立民主之基业，昌大自由之治化，将来俄人能否恢复秩序，重建组织，如当年法人之所为，殊为一大疑问。不知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人当日，固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其全国之人心；俄国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亚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人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谓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

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言其运命，亦可谓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僿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

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有向上发展之余力。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①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间确实之接触，尚在未来，此种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结果，皆甚明显也。"②林氏之为此言，实在一九〇〇年顷。虽迩来沧桑变易，中国政治组织之变迁，转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渊源，现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总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记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一人之未来，与人间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原载《言治》季刊3册，1918年7月1日出版）

① Paul S. Reinsch.

② 见"World Politics",Chapter III,"The Meeting of Orient and Occident".

庶民的胜利

李　大　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

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界中世纪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原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李　大　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应对。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 Hohenzollern 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国 Bolsheviki 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

heviki 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 Bolshevika的话，和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 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 Czar 的战争，是 Kaiser的战争，是 Kings 的战争，是 Emperors 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 Bolsheviki 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 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 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厉，不可能，反社会的，象 Bolshevism 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

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 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但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持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原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新　纪　元

李　大　钊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象那小儿女们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的生活，就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这样的新纪元，才有祝贺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节生殖，不是酿成疾疫，就是惹起战争。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着人种的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惨、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有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从今以后，因为现代的战争要靠着工业知识，所以那些皇家贵族等等，一旦争斗起来，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从前欺凌他们侮辱他们，现在都来谄媚他们，夺去他们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他们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劳工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

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从前尚有几个皇帝、军阀残存在世界上，偷着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们作鬼的契约，常备兵是他们作鬼的保障。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作于1919年元旦

（原载《每周评论》3号，1919年1月5日出版）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

陈　独　秀

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扎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原载《每周评论》18号，1919年4月20日出版，原署名：只眼。）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九一九年四月
国内政治形势大事记

1912 年

1　　月

1日，孙中山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临时政府通令用阳历，定是日（旧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同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联络大小将校四十余人电请内阁代奏，主张维持君宪，反对共和。又电民，清议和代表，谓若采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2日，袁世凯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己不利，撤与民军议和代表唐绍仪职，袁通电民军，谓唐已去职，嗣后应商事件应直接谈商。民方与袁秘密交换清帝自行退位条件，孙中山许袁继任总统。

3日，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同日，章太炎的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该会不久即与张謇一派之预备立宪公会合组统一党）。

13日，袁世凯与戴澧商谈清帝退位事。

16日，俄国诱使外蒙哲布尊丹巴独立，称"大蒙古国"，俄使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不得干涉外蒙独立，清政府以南方革命正穷于应付，无力交涉，未予答复。

17、18、19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退位事，清室亲贵均反对退位，良弼、铁良等组织宗社党，攻击袁世凯，谋以良弼任清军总司令，与民军作最后决斗。

20日，南京代表伍朝枢以优待清帝条件电交袁世凯。

22日，孙中山以五条件提交袁世凯，并在各报披露，其要点为：清帝退位后，袁表示赞成共和，即由参议院推袁为临时总统。

23日，同盟会移本部于南京，订定章程，发表宣言，改秘密为公开组织，制定总章七章，其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26日，党人彭家珍炸良弼，彭当场死，良弼伤一脚，越二日即死，宗社党人胆落，纷纷逃匿。

27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大小将校四十余人联名声称赞成共和，奏请清帝退位。

28日，南京参政院成立，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

2　　月

4日，段祺瑞等二次电清廷各王公大臣，措辞激烈，有"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各王公剖陈利害"之语。

6日，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及大臣会议，发出赞成共和电，以阻段等率军北进。

7日，南京参议院开会，起草临时约法。

11日，英、德、美、法四国请求日、俄参加银行团，以统一对中国借款。

12日，清帝诏谕退位。

13日，袁世凯电南京政府，表示赞成共和，并谓"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仍居北京，不能南下。

同日，孙中山咨达参议院辞总统职，并请举袁世凯继任。

14日，参议院开会，孙赴会陈述意见，以全体一致选袁为大总统。

同日，南京参议院开会讨论临时政府所在地问题，以八对廿票，可决改设北京。

15日，孙中山以此问题咨交复议，以五对十九票，可决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南京。并遣蔡元培、汪精卫等北上为迎袁专使。

20日，参议院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25日，蔡、汪等到达北京，

26日，蔡、汪等与袁商谈，袁坚持决不南下。

29日，袁世凯嗾使第二镇曹锟所部哗变，焚烧抢掠，商民被害者千余户。三十日，天津、保定驻军亦相继哗变。袁借口北方不靖，不能南下。

3　月

2日，汪精卫等与袁妥协，电参议院，请迁就袁氏。

6日，参议院议决变通办法，电袁氏允其在北京就职。

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总统职。

11日，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五十六条。

25日，袁提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参议院同意，唐于是日赴南京组织内阁。

4　月

1日，孙中山赴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

5日，达赖得英人援助率众进犯西藏、川边，逼打箭炉。

同日，临时政府北迁北京。

28日，广东民军举胡汉民为粤省都督。

6　月

27日，唐绍仪以不堪袁世凯压迫，辞内阁职。

29日，袁命陆征祥组阁，陆以袁意难违，称病不理政事。

7　月

1日，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安徽都督。

12日，袁世凯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

8　月

17日，英驻北京公使向袁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提议中英订立新约，解决藏事。

25日，同盟会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公党为国民党）开成立会于北京，发布政纲五条：一、促进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促进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

9　月

24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内阁成为袁氏御用机关。

12　月

15日，北京参众两院议员初选。

27日，赵秉钧与六国银行团商订借款，赵向参议院报告，参议院以条件过苛，通过否决。

1913年

2　月

4日，北京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得绝对多数，占三九二席，其他党派仅占二二三席。

3　月

3日，英法俄日等国公使通知北京政府，借款须以各国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美国以银行团妨碍单独向中国放款，借口要求中国之财政监督权不当，退出银行团。

20日，袁世凯遣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沪宁车站。

4　月

26日，袁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镑，许外人稽核盐务及借款用途，并规定非与该团商妥，不得发行他项借款。

27日，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通电反对袁氏违法借款，国民党议员均提出弹劾，各省国民党督军纷电响应。

5　月

2 日，美国正式承认北京政府。

29 日，袁世凯收买议员，以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

6　月

9 日，袁世凯免国民党人李烈钧赣督职。

14 日，袁世凯免粤督胡汉民职。

30 日，免皖督柏文蔚职。

7　月

2 日，北京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国民党人占半数以上。

12 日，袁世凯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监视江西。

同日，李烈钧占领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两军战于沙河镇。

15 日，黄兴入南京，强都督程德全独立，组织讨袁军。

17 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入皖组织革命军。

20 日，福建都督孙道仁从师长许崇智请，宣布独立。

22 日，民党陈其美在上海举兵，围攻制造局，为袁军所败。

25 日，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独立。

同日，袁军水路夹击湖口，李烈钧败走。

29 日，南京民军总司令黄兴以战事失利遁走，程德全宣布独立。

8　月

4 日，熊克武据重庆宣布独立，为川军夹击而败。

8 日，民党何海鸣入南京，自为总司令，率部抵抗袁军。

9 日，闽粤以讨袁军失败，逐许崇智离闽，宣布取消独立。

13 日，湖南取消独立。

18 日，袁军攻占南昌，江西为北洋军阀所占。

9　月

1 日，张勋攻入南京，讨袁军失败。

10　月

5 日，袁世凯欲得日本承认北京政府，与日商谈，允承认日本有建筑满蒙之铁道权。

6日，日本正式承认北京政府。

同日，北京召开国会，选举正式总统，袁世凯派便衣军警组公民团，包围国会，压迫议员，袁氏当选。

7 日，英、法、俄、比等国承认北京政府（按：英、俄二国承认北京政府，均附有条件，英以袁承认西藏自治为条件，俄以袁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

14 日，北京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宪草。

25 日，袁氏授意各省都督民政长通电反对宪草，谓宪草为国民党操纵。

11　月

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消国民党员国会议员，国会以不足法定人数，停止开会。

5 日，袁政府与帝俄成立中俄声明文件五款，中国承认外蒙自治权，承认俄国在外蒙有一切权利。

1914 年

1　月

10 日，袁世凯下令停止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国会，另组约法会议。

26 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2　月

18 日，袁世凯御用之约法会议开会，推孙毓筠为议长。

3　月

20 日，袁世凯提出增修约法案交约法会议，公然主张"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公开宣布不实行宪政。

4　月

27 日，中英会议于印度希摩拉，讨论西藏问题，签订中英草约，中国承认西藏有"自治权"，划西藏为内外藏，限制中国在西藏驻兵。

5　月

1 日，袁世凯公布民国新约法，规定总统权力扩张到最大限度，废责任内阁制，采所谓总统制，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废止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又设立参政院，参政员均由总统任命，袁氏遂达其独裁一切的目的。

2 日，袁政府以国内舆论一致反对中英草约，通告英公使“草约虽可承认，界限万难同意”，西藏问题成为悬案。

6　月

28 日，奥国太子被刺于塞尔维亚，奥、塞开战，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7　月

8 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开成立会于筑地精养轩，加入者须立誓约。打指模，奉孙为总理，其党章中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旨宗”，“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8　月

1 日，德俄宣战，三日，法德宣战。四日英德宣战。

6 日，袁政府向全国宣布：“对欧洲战事，严守中立”。

15 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将青岛交日占领，德国未答。二十三日，日德宣战。

19 日，美国照会日本，请“尊重中国领土保全主义”，日复文声称“无侵略土地野心”。

9　月

3 日，中国政府再度宣告对欧战中立，划莱州，龙口及接近胶州之地为日德交战区，并与日约定以潍县车站为界，日军不得越界而西。

同日，日军从龙口登岸，占领城镇，对中国人民奸淫掠杀，无恶不为。

26 日，占领潍县车站。

10　月

6 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胶济铁路全线及铁路附近矿产。

7 日，中国政府对日军占据济南车站提出抗议。

8 日，日方复文，指山东铁道为胶州租借地延长之一部分。

11 日，宋育仁等向总统府上书呈请恢复帝制。

11　月

7 日，北京“复辟”之说大盛，肃政使夏寿康等呈请查禁。

同日，日军占领青岛。

23日，袁世凯下令“严禁紊乱国宪邪说”，又以宋育仁进行复辟运动，由步兵统领逮捕解回原籍。

12　月

29日，袁世凯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并可无限制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姓名先由总统“亲书于嘉禾金简”，临选时取出，交付选举。

1915年

1　月

18日，日公使日置益以廿一条要求面递袁世凯，日方以承认此等要求为赞助袁氏称帝条件。

22日，袁世凯派陆征祥、曹汝霖为全权委员，与日本进行谈判。

3　月

25日，中国商人反对日本在山东暴行，发起抵制日货。袁世凯下令禁止。

5　月

4日，英国要求日本发表中日谈判内容，并询以有无与英日同盟矛盾之处。日方以廿一条中要索较轻之十一条搪塞英政府。

7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

9日，袁世凯致复，除廿一条之第五号容再协商外，其余均行承诺。

11日，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发出同样通牒，谓：“中日两国政府无论有何同意或企图，如有妨害美国在中国条约上之利益，或损害中国政治上领土上之完全，或损害关于门户开放，商工业均等之国际政策者，美政府一律不能承认”。

8　月

10日，袁世凯授意总统府顾问，美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国体变革论一文，主张中国应行君主制。

14日，杨度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

15日，蔡锷在京与进步党人密谋反袁。

23日，该会发出启事，谓从学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国孰为适宜，又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省城商会请派代表来京参加讨论，并寄与古德诺论文。杨度等又在京组织“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皆由该会拟就。

9 月

1 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公民请愿团”呈变更国体书。

15 日，新青年杂志创刊。一卷一号上刊载陈独秀之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高一涵之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文，鼓吹民主政治，提倡人权，反抗君主，反抗特权。

19 日，杨度等组织“请愿联合会”，要求参政院立即议定召集民意机关办法。

20 日，参政院议决请“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解决”。

28 日，参政院议决建议各省选举代表，投票解决国体。

10 月

8 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省开始选举代表。廿八日以后，各地开始国体投票。

11 月

10 日，中华革命党人谋袭占上海，刺杀袁世凯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11 日，英俄法意四国深恐帝制运动引起中国内乱，便于日本独占中国，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改变国体是否可以延期？（按：英俄等国此时最大希望在中国勿发生内乱，帝制能停止固好，不能停止，则务使反对派不能有为，故一面向袁氏提出警告，一面暗中邦助袁氏，妨碍反对者行动。）

20 日，袁世凯御用之各地公民代表国体投票告竣，一九九三票均一致推袁为皇帝。

同 日，英、法、俄三国公使与袁政府谈商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

24 日，日外务大臣石井向英俄法声明，不愿中国参战，并压迫袁政府不许参战。

12 月

5 日，上海中华革命党人袭取肇和兵舰，发炮攻击制造局，袁军大队来攻，党人以力量不支失败。

12 日，袁世凯称帝。

13 日，申令反对帝制者“当执法严征”。

15 日，英法意俄四国公使，以中国反帝制势力在各地潜伏滋长，二次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袁氏谋取得日本援助，密派周自齐赴日（此事为英报公布，日本见袁成功之望甚少，明年一月十日，宣告拒周赴日）。

19 日，蔡锷秘密赴滇。

23 日，以唐继尧名义电袁取消帝制。

25 日，云南宣布独立。

31 日，下令改元为“洪宪元年”，大颁爵赏，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1916 年

1　月

1 日，云南都督府成立，以唐继尧为都督，称其为护国军，分三路向川、湘、桂出发。

6 日，广东中华革命党人攻夺九龙附近之税关，又在惠州各地联络驻军密谋起事。

24 日，护国军到达贵阳。

27 日，贵州宣布独立。

2　月

6 日，入川护国军与曹锟所率袁军战于泸州一带。

15 日，新青年杂志一卷六期出版，易白沙作孔子平议，反对孔教，反对礼法，反对旧伦理。

21 日，长沙中华革命党人进攻将军署，失败。

28 日，袁世凯以各省反对帝制势力扩大，申令提前召开立法院会议，以五月一日为召集期，准备倘战事失利，则由立法院宣告取消帝制。

3　月

7 日，袁世凯以广西陆荣廷不稳，任陈炳焜兼理广西军务，企图以陈制陆。

同日，中华革命党人在广州之增城新会等地，肇庆之开平高明等地联络军队谋起事，均未成。

15 日，陆陈联名宣告广西独立。

22 日，袁世凯下令撤消帝制，仍自称大总统。又任徐世昌为国务卿。

23 日，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明令废止洪宪年号。

24 日，袁以段徐（世昌）黎（元洪）名义致电护国军，请停战议和，护国军复电谓和议须袁去总统职。

30 日，广东潮州、汕头、钦廉驻军，与中华革命党人联络，宣布独立，自称中华革命军，致书广东将军龙济光，限二十四小时内决定大事。

31 日，四川都督陈宧以袁势已去，与蔡锷协商停战。

4　月

4 日，粤省宝璧等三军舰为中华革命党人占领，龙济光以四面受敌，

5 日，龙济光伪称独立，致书广西，请陆荣廷、梁启超来粤共策善后，陆梁派谭学夔为代表。

11日，浙江军队进攻军署，将军朱瑞出走。

12日，龙济光与民军总司令徐勤，广西代表汤觉顿等在海珠开会，以卫兵行刺，谭、汤被击毙。桂方粤及中党人准备倒龙，龙恐不能敌。同日，浙江宣言独立。

15日，独立各省联电答复黎段徐电词，促袁退位。

19日，龙济光至肇庆与陆荣廷谈判，议决龙济光率军北伐。

21日，袁世凯以情势紧迫，申令改行责任内阁制，声称政权集于内阁，企图以此缓和大局。免徐世昌职，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组织内阁。

5　月

1日，西南护国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于肇庆，以岑春煊为司令，发布宣言，否认袁世凯为总统，拥黎元洪继任；在北方国务院未产生前，暂设一军务院。

8日，军务院正式成立于肇庆。

9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与中华革命党人联合，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独立。

29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在护国军压迫下，宣布独立。

6　月

6日，袁世凯忧愤病死。

同日，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告黎元洪遵照民国三年袁氏之新约法，接任总统。

7日，黎元洪就职。这日起，各省取消独立。

8日，国会议员发表宣言，主张恢复国会，反对新约法。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以本身势力仅及西南数省，倘依新约法，势必为北洋军阀操纵，亦主张恢复民元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岑春煊等通电响应议员主张。

10日，唐继尧发出蒸电，主张“国家根本法当以国会解散（按：指民国二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前所公布者为准”，西南声明此电为南军一致主张。

20日，段祺瑞以临时约法所规定之国会，于自身独揽政权大有妨碍，通电反对西南主张。

25日，李鼎新与中华革命党人联合，自称海军总司令，集合各舰于吴淞口，宣言海军独立，加入护国军，“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

27日，冯国璋以淞沪辖地为海军威胁，电促段祺瑞速求根本解决。

29日，段祺瑞以南方势力一时难抗，由黎元洪出名申令遵照临时约法，并令八月一日召集国会。

7　月

10日，日本暗地资助清室宗社党首领肃亲王，在满州招集马贼组织勤王军，并招引蒙匪巴布扎布率军南下。二十四日，蒙匪与奉天军第二十八师在突泉发生战争。二十六日，蒙匪

败退郭家店。

14日，进步党人梁启超急谋依附段祺瑞，运动唐继尧以抚军资格通电撤销军务院（按：南方各首领原意须正式国会召集后始撤销）。

8 月

1日，旧国会开会于北京。

13日，辽源郑家屯日军以奉天军击败蒙匪，借故攻击二十八师团部，并拘捕辽源县长。

9 月

2日，日公使以郑家屯事件，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在中国各地设警，南满增聘日人为警察顾问，并要求中国士官学校聘请日人为教习。

3日，郭家店日军护送蒙匪，指奉军击穿日旗，与朝阳坡防军冲突，奉军自动撤退。

15日，国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关于省制问题发生争论，国民党议员企图确保在西南各省势力，主张宪法规定省制大纲，省长民选，依附段祺瑞之研究系（按：梁启超汤化龙一派进步党人在国会恢复后，首先组织了宪法讨论会、宪法研究会两个团体，后以国民党议员组织宪政商榷会，梁等谋对之抵制，把两个团体结合起来，名宪政研究会，人称研究系）议员反对，主张省长由总统委任。

10 月

18日，法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将天津之老西开让与法国，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否则取自由行动。北京以民气激昂，要求展限二十四小时，以便疏通，法方不允。二十日，法领事馆安南兵拆毁中国警局，占据老西开。二十一日，天津市民四五千人集会，反对法帝国主义非法行动，排斥法货，所有法银行存款实行取现，法政府以民愤难抗，请英公使调停，与北京政府议定老西开由中法共同管理。

30日，北京国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11 月

20日，段祺瑞使黎元洪令免孙洪伊（国民党人）内务部长职。

12 月

8日，国会开会，又讨论省制问题，研究系议员与国民党议员发生斗殴。研究系通电各省督军攻击国民党议员。二十一日，北洋军阀支持一部分议员成立宪政促成会，对抗国民党。二十四日，又有二十二省军政长官发表联电，谓“总统宜信任总理（即段祺瑞），总理秉持大政，国会宜早定宪法，勿干涉行政”。

1917 年

1　月

1日，新青年二卷五期出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言文学革命。

9日，张勋、靳云鹏、徐树铮等在郑州开省区联合会，商议对付国会办法。

20日，德国宣言实行无限制封锁海面潜艇计划。

22日，中日以郑家屯事件交换照会，处罚二十八师，赔款抚恤日人（按：日人原提出之增聘顾问设警等条，主要注意在东蒙设警一事，在交涉未了之时，日人已在四平街郑家屯等地设立警署，日方在说明书中谓中国若不同意，日本亦自由实行，北京政府对此糊涂了之）。

2　月

1日，美国政府宣言对德绝交，并请中国一致行动，英法各国均请中国参加作战。段祺瑞欲借参战之名向外借款，扩大私人武力，积极主张参战。九日北京对德封锁海面提出抗议。

12日，冯国璋通电反对参战。

19日，日本与英法俄商妥，承认日本在山东权利，日允中国参战。

3　月

3日，段祺瑞拟就致日政府电稿，声称中国已决向德绝交，请日方援助，要求黎元洪签印拍发，黎反对参战，拒发此电，段愤而辞职赴天津，经冯国璋调停，黎允不干予对德外交。六日，段祺瑞回京。

8日，孙中山通电北京政府，反对参加欧战。十日，唐继尧亦通电反对参战。

10日，上海总商会，湖北，安徽等省督军，康有为均电北京政府，主张不参战，仍守中立。

26日，梁启超致函国务院，请速向德奥宣战。

4　月

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

5　月

3日，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为段疏通参战案。

7日，国会开会讨论参战案。十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等三千余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声称必俟参战案通过始行解散。国会停止

会议，国务员谷钟秀、伍廷芳，张耀曾、程璧光等相率辞职，内阁仅余段氏一人。

12日，段祺瑞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参战案。

18日，北京英文京报载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勾结之秘密：段由陆宗舆、曹汝霖议借日款一万万元，由日人代行整理兵工厂；并请日军官练兵，日田中参谋来华与此事有关（时田中已在京）。十九日，该报主笔陈友仁为段逮捕。

19日，众议院开会，议决现内阁仅余一人，参战案须待内阁改组后再议。

同日，段祺瑞嗾使督军团借口宪法已通过条文不适国情，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不依。二十一日，督军团相率离京，赴徐州集会。国会议员亦呈请总统罢免段内阁。

22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总理职，以伍廷芳代，段即离京。督军团反对黎元洪，谓免段不合法律。二十九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独立，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吉林、黑省、直隶、福建、山西各省相继独立，倪嗣冲并在蚌埠扣车，运兵赴津，准备与奉鲁豫三省共同进兵北京。

31日，研究系议员相率辞职，国会无法开会。

6 月

2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皖、鲁、奉、豫各派重兵进逼北京。

同日，李经义代表张勋由徐州赴京，说黎元洪，以入京调停自任；黎元洪谋依张勋自保，派李赴徐迎张。

7日，张勋率兵五千由徐州北上。八日，至天津（时段派军阀群集天津，谋组织政府），与段派集议，段系允张进行复辟，怂恿其入京倡乱。张勋电黎元洪调停条件须先解散国会。

12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伍廷芳不肯副署与陈璧光率海军南下。国民党议员出京南下，在沪设通讯处。

14日，张勋赴京，二十八日，康有为秘密至京，规划复辟。

20日，桂督谭浩明，粤督陈炳焜以国会解散，通电自主。

7 月

1日，张勋拥溥仪宣告复辟，改本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爵，各省督军改为巡抚，位置仍旧。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馆，即日发出三电，命各省出师讨贼。二日，黎又电请冯国璋代大总统，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2日，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各省督军通电反对复辟。三日，冯段联电声称讨逆。四日，浙督杨善德，直督曹锟，十六混成旅长冯玉祥等电告出师，奉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五日，段在马厂举行誓师，以曹锟为西路司令，段芝贵为东路司令，两路进兵。十二日，攻下北京。

10日，张勋复辟失败，逃入荷兰使馆，通电全国，有“已获巨罪，人庆大勋”之句，即抵段先允复辟，后张挞伐。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

14日，段祺瑞至京。十七日，发表内阁名单，段派军阀与研究系交通系联合组织内阁。

同日，黎元洪由外国使馆迁回私宅，发表通电，推冯国璋继任总统。

17日，研究系为段祺瑞出策，以宣统复辟，已使民国中断为理由，宣言招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

20日，孙中山反对段祺瑞再造国会，声称拥护民元约法，乘海琛舰赴粤。二十一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宣言“拥护约法，恢复国会”。二十二日，海军全部舰队从吴淞开往广东。国会议员相率赴粤。

30日，冯国璋通电声称请黎复位（按：冯以不愿南京地盘授诸他人，拟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基本势力，以免后来孤立，受段派压迫，蹈黎元洪复辙，故一面表示谦逊，一面暗中与段接洽苏督之后继人选，直到接洽已妥，调赣督李纯督苏，陈光远督赣，王占元督鄂，联成一气，成为直系基本势力，冯始就职）。

8　月

1日，冯国璋到京，宣言就任总统。

6日，段祺瑞谋得湖南，以制服两广，任命傅良佐为湘省督军，又派驻保定之范国璋师赴湘。湘督谭延闿求援于西南，并在湘布置军事。

14日，段祺瑞布告对德宣战。

18日，孙中山召集国会议员在黄浦开谈话会，决定在粤开非常会议。二十五日，非常会议开幕，议决组织政府，三十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又设外交等六部，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行政权由大元帅掌握，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28日，段祺瑞与日本订立第一次善后借款一千万元，以盐务税款全部作为抵押（按：此即有名的“西原借款”之一。段氏从本年八月到明年九月，先后向日方借款达五万万元以上，段以此作为进行内战之资，日方则借此掌握了中国经济的支配权）。

9　月

1日，广东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元帅。十日，孙中山宣言就职，唐、陆企图联冯（国璋）制段，欲承认冯为大总统，故对元帅职不表示接受。

18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过绪与第一师二旅林修桂宣布独立，傅良佐派李石文归师进攻。二十日李部进至衡山，团长宋鹤庚等投归湘军，此军败退。段祺瑞命倪嗣冲赴湘增援，倪派安武军十营入湘。

29日，冯国璋下令组织参议院，筹备修造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又下令通缉孙中山。

同日，段祺瑞与日本成立交通银行借款二千万元，以交行所存中国国库券二千五百万为担保。聘日人为该行顾问。

10　月

7日，广州军政府下令出兵援湘，任程潜为湘南总司令，率部入湘。

10日，倪嗣冲之安武军攻入攸县，计出宝庆与粤桂军联合进攻；十四日，下宝庆；十六

日，复衡山；十七日，攻克衡阳湘潭。

13 日，段祺瑞与日本成立六百五十万元吉长路借款，以该路收入作担保，允日方代营南满路权。

11　月

2 日，日本政府派石井为全权大使，赴美与美国务卿蓝辛谈判关于协同作战各案，函谋美承认日本在华特殊权利，结果共同发表所谓蓝辛石井宣言，“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大肆宣传，谓中国已非独立国，而为日本之保护国。

7 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10 日，北京参议院举行开会典礼，选举段派之政客王揖唐为议长。参议院进行民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的修改。

12 日，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勾结段派，宣言脱离广东政府，孙中山派邹鲁为潮梅总司令讨莫。十六日邹部第一支队金国治在铁桥蓝关大胜，桂系军阀恐金收编莫部，使孙中山武力扩大，二十八日，诱金杀之。

14 日，北方直皖二系军阀暗斗，冯国璋授意在湘作战之北军王汝贤、范国璋（王、范为直系）怠战，王、范通电停战，退往岳州，傅良佐被迫离湘。

15 日，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第一次军械借款一千六百万元；二十日，又订运河借款五百万元；二十二日，又成立水灾借款日金五百万元。

18 日，直系四督：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联名通电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

20 日，段祺瑞以川湘用兵俱失败，直系又施以压迫，遂通电辞职。二十三日，冯国璋令免段职；三十日，以王士珍任国务总理，研究系阁员亦随之去职。

12　月

3 日，皖系督军倪嗣冲，张怀芝等在天津召集各省区代表会议，坚决主张对南方采取武力解决。

6 日，孙中山反对桂系谋杀潮梅总司令邹鲁所部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胡汉民从中调停，陆荣廷允调走陈炳琨，以莫荣新继任粤督，又允以朱庆澜之二十营军队交陈炯明，但以陈率之赴闽为条件，军政府仍无直辖军队。

7 日，冯国璋为对西南表示和平，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二十五日，又正式发布弭战令。

18 日，冯国璋以段祺瑞势力仍大，且段借参战名义与日本相结托，为敷衍段派，任段为参战督办。段祺瑞借此名义向日本大举借款，编练参战军三师十混成旅，聘日人为军事顾问。同日，王士珍任皖系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北京政府重权仍操于段派之手。

1918 年

1　月

3 日，孙中山在粤招募军政府卫队，粤督莫荣新防孙武力扩大，捕卫队数十人，指为土匪杀之，孙中山亲率海军军舰向督军署开炮，莫恐滇粤两军继起，未予还击。

5 日，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印刷局借款二百万元。六日，又成立第二次善后借款二千万元，以盐务税款为担保。又订立无线电借款五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七英镑，以无线电收入为担保，并允日人经营三十年。

14 日，陕西三原陕军营长张义安反对陕督陈树藩，袭击陈部，十六日占领三原，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军政府，自称靖国军，推曹世英、胡景翼为总司令，分兵三路攻西安。二十三日，在西安近郊激战，张义安阵亡，残部退回三原。

26 日，冯国璋以"出巡"名义与皖系各督会商对西南和战问题，二十七、八日，分赴济南、徐州、蚌埠，张怀芝、倪嗣冲、李纯、张敬尧等均主张战争。冯以皖系意见难逆，三十日，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进兵湘鄂。

2　月

17 日，北京政府公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

20 日，广东政学系政客与西南各省实力派联络，组织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谋与军政府对抗孙中山离粤赴沪。

21 日，于右任奉孙中山命入陕，陕靖国军推于为总司令。

26 日，桂系刺杀军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

27 日，段派徐树铮招奉军入关，驻秦皇岛滦州一带，为段派声援，威胁冯国璋。

3　月

7 日，段祺瑞命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以王揖唐为首领，操纵北方国会选举。

11 日，入湘北军下总攻令，湘军不支，退岳州。

19 日，皖系督军联名发电逼迫冯国璋。二十三日，冯下令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22 日，英美等国以俄国革命成功，主张由西伯利亚进攻苏俄。日本恐中国受俄国革命影响及列强在远东势力扩大，向段祺瑞提议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借口防止德奥经俄国侵入远东，以侵略中国，反对苏俄。段祺瑞派章宗祥进行谈判。二十五日与日外务省交换"共同防敌公文"。

27 日，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

4　月

2 日，湖南战争，曹锟吴佩孚占领长沙，十八日又下衡州，吴以湘督一职张敬尧夺去，不愿再战，按兵不动。

30 日，段祺瑞与日本订立有线电讯借款二千万元，允聘日本技师，购买日本材料，借款有优先权。

5　月

4 日，广东政学系与桂系军阀联络，主张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又令援闽粤军急进，以便取得相当根据地。

9 日，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开抵闽粤边境。三十日，粤军邓铿任前敌总指挥，大败闽督李厚基部。

12 日，留日中国学生罢课归国，组织救国团，反对中日"共同防敌"。

16 日，段祺瑞派陆军委员长靳云鹏与日陆军委员斋藤季次郎在北京秘密缔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按：此协定内容当时双方均严守秘密，直至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南北和议时，以南方代表要求，始行公布，其内容共十二条，规定日军在满蒙驻兵，中国参战军队皆由日人训练），各方舆论纷纷反对。二十一日，北京大学，高师，工专等各校学生，全体至总统府，请求废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并要求宣布内容条文。

18 日，广东政学系操纵非常国会，修改军政府组织大纲，废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二十日，选举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择七人为总裁。

30 日，曹锟以部下不愿再战，且于西南战争于己无益，由湘转回天津。

6　月

3 日，段祺瑞企图拉拢吴佩孚，使之仍进攻西南，授吴为孚威将军。十一日，派倪嗣冲至天津劝告曹锟进兵。二十日，任曹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副，曹吴均不为动。

18 日，段祺瑞与日本成立一千万元吉会铁路借款，以该路一切财产作为担保。

20 日，入闽粤军连克上杭，永定。段祺瑞任浙督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率军入闽。二十六日，闽军兵变，浙团长陈肇英与粤军联络，浙军败退。

7　月

1 日，河南王天纵独立失败，随国民党人张钫入陕，与陕西靖国军会合，声势大振。

5 日，陆荣廷，唐绍仪通告成立总裁制之军政府。孙中山离粤赴沪。

8　　月

2 日，段祺瑞与日本订立二千三百六十四万三千七百元二次军械借款，三千万元吉黑金矿森林借款允吉黑金矿森林由中日合办，聘用日人技师。

12 日，北方新国会开幕，完全为段派包办而成，安福系议员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二十日，选举王揖唐为国会议长。

同日，冯国璋以受段系排斥，通电声称任期已满（按：北政府总统一职，系依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黎元洪为代袁世凯，冯国璋又为代黎，袁在民二年十月十日就职，至本年十月十日满期五年），辞总统职。

16 日，美总统以帝国主义战争中，日本对中国侵略猛然加强，极谋抵制，向法英日三国提议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不许一国单独行动。

21 日，南方非常国会推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是日，吴佩孚在湘通电停止内战。三十日，岑复电赞成和平。

30 日，孙中山在沪发出通告海内外同志书，谓“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极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按：孙中山至沪后，曾积极从事国民党党务之整理，九月二十五日，孙在致南洋同志书中亦云：“文返沪以来，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守静默，以避纷扰”。此外则为从事著述，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二书即为此时所写）。

31 日，南方军政府通电反对北方选举，谓：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

同日，入闽粤军占领漳州。

9　　月

1 日，北方国会进行总统选举；四日，选徐世昌为总统。

16 日，岑春煊，伍廷芳电劝徐世昌勿就总统职。

18 日，段祺瑞与日本成立二千万元参战借款，以聘用日人军官作段军教练为条件。二十日，又成立满蒙四路借款，济顺高徐二路借款，各二千万元，以各路一切财产作为担保。

26 日，湘南前线，南北军军官，联名通电，主张恢复和平。

10　　月

9 日，广东军政府否认北方总统，通告摄行大总统职权。

10 日，徐世昌就总统职，以钱能训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

12 日，美总统威尔逊以日本借口中国内战进行独占，发出祝贺徐世昌就总统职电，电中劝徐速谋中国统一。

15 日，新青年五卷五号出版，李大钊同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二文，在一般人喧嚷“庆祝胜利”的时候，大钊同志指出新世界必是“庶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

23 日，钱能训致电岑春煊，请设法进行南北和平。同日，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等联

名通电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各团体彼此呼应，和平声浪遍及全国。

30 日，英法等国以段祺瑞勾结日本，危及各国在华利益，命驻华各使向北京提出严重觉书，谓其缓交庚子赔款，用作党系斗争，所编参战军队，不以之参战，专从事内战。

同日，日本以接济皖系军阀，受列强反对，宣言停止对中国南北各方借款。

11 月

11 日，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束，协约各国胜利。

15 日，徐世昌召集北方各督会议，段祺瑞亦列席，讨论与南政府和平问题，段以日本态度犹豫，亦赞成和议。十六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

23 日，南方军政府下令停战，双方商谈在上海召集和平会议。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开会。二十七日，日本代表要求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

2 月

5 日，段祺瑞为反对南方政府要求解散参战军，命徐树铮与日代表缔结延长中日军事协定协约。

20 日，南北代表在上海开和平会议，对参战军与陕西战争双方争执甚烈。二十六、七两日，南代表迭接靖国军电，谓北军仍进，三原危急；二十八日，南代表提出质问；三十日，宣告和议停止。

3 月

2 日，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四日，宣布成立共产国际。

30 日，徐世昌令派张瑞入陕调停，并宣布陕西停战。长江三督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联名电和议代表，请以陕西停战为和议重开条件。

4 月

4 日，南代表接陕电云已停战，允重开谈判。九日和议续开，南代表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及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恢复旧国会，遭北代表反对。

12 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争持必须继承山东权。日代表在英法美间大肆活动，又以退出和会为要胁，列强接受日方要求。二十三日，威尔逊质问中国代表，一九一八年中国何故“欣然同意”与日订约？和会议决：德在山东一切权利，概让与日本。

日本进攻青岛与提出二十一条

当欧战初起，我国上下人士，昧于世界大势，主张中立者甚多。

当时著者，避党祸于云南，闻俄德既宣战，当即寓书于北京外交部，国务院，及云南唐督军，陈日本必攻青岛，以夺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我国宜制机先，速对德宣战，孤岛远悬，终必制胜，不然，宜兴德公使，速订密约，以交战之形势，将胶州交还中国，以免为日本所制，为当局所不纳。

袁世凯政府，卒于同年八月六日，向关系各国，宣告中国中立。而日本政府则于同年八月十五日，向德国发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实行左记两项之事。

一　德国舰队在日本中国海洋方面者，即时退去。其不能退去者，速即解除武装。

二　德国政府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以还付中国之目的，于一千九百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以前，无偿、无条件交付日本官宪。

以上二项，德国政府，若于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尚无完全承认之答复，则日本应执必要之行动。

德政府接此通牒竟不致复。日本遂于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与德国宣战。原日本对德发最后通牒，事先并不与我国相商，事后始由驻北京日公使日置益通知我国外交部，盖视我国如无主权之地位。其侮辱中国国家已可想见。袁氏接此通知，无可如何。遂要求与日本共同出兵攻青岛，为日本政府所拒绝。盖是时日本大限内阁已决定乘欧战之机向中国为积极之处分，如中国参入协约国之侧，则不能行其对华之策，故绝对不承认中国共同出兵也。

斯时美国政府恐日本假对德宣战之名，侵略中国领土，特致日本左之通告。

美国政府认日本本日英同盟之精神对德宣战。则自必尊重中国领土保全之主义，断非欲对于中国谋领土之扩张无疑也，惟中国国内若有变乱发生，日本欲于胶州湾领域之外。有所行动时，须先与美国商议。

此通告盖含监视日本对中国行动之意味。日本恐美国怀疑，除正式致复外，另由大限致美国各报馆一电文曰，日本用兵青岛，或不免发生种种谣诼，余敢宣言，日本此次行动全凭清洁之良心，合于正义，且与同盟国完全一致断无侵略土地之野心，惟以保护远东之和平者自任耳。至八月二十四日，太限又致纽约独立报一电曰，余以日本总理之资格，前已宣言。兹特对于美国人民及全世界再为声明，日本断无最后之目的，或占领土地，或剥夺中国及他国人民所有之任何利益，敢保证我日本能以信义遵守此主义云云。盖以此等宣言，为欺混美国人计耳。同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于议院说明对德宣战之始末曰，帝国政府，深望欧洲战乱，不波及于远东。奈八月初旬以来，英国政府，本日英同盟关系，要求日本与相当之援助。盖德国舰队常出没东洋海面，英国海上贸易陷于危险。帝国海上商业，亦多受障碍。而日英同盟协约，以确保东亚全局之平和，与确实中国独立，领土保全，与机会均等为事，又保持东亚日英两缔盟国之领土权与其特殊利益为目的者也。今英国以东亚方面之通商贸易，遭重大惊吓，求相当之援助。我帝国政府，自应致其相当之力，以尽同盟之义务，且与日英同盟利害全相反响之德意志，保持山东一角，以为东亚策战之根据地。不但为东亚永远和平之重大

障碍，实与帝国之利益全相背反者也。故政府决意应英国之要求，对德宣战，以确保东洋永远之和平，与同盟国特殊之利益，信为帝国之责务也云云。

按日英同盟，虽确保东亚及印度地方全局之平和。然关于该地方两缔盟国，一方之领土权与其特殊利益受他国攻击，与其侵略行动及至于开战之时，他一方之缔盟国始发生协同战斗之义务，此该协约明白规定者也。今英国对德宣战，并非因德国攻击英属印度香港何处领土之故，亦非因德国侵略英属印度香港何处特殊利益之故。实完全以欧洲问题而开战，则与日英同盟协约，毫不相干，殆如风马牛不相及。日政府滥引日英同盟之关系，乘机夺取山东耳，盖日本对中国之政策，欲比列强独得优越地位以达其臣属中国之目的。欲达此目的，不得不打破列强在中国均势之局。而德国盘据势力于山东，为日本侵略中国之重大障碍。欲乘机夺取之，是日本之夙志也。德国既与欧洲诸国开战。无东顾之暇。故日本乘机向山东出兵也。

日本虽云用兵青岛，其实志在山东全省。当时助攻青岛之英国军队，由胶州之劳山湾上陆，不侵犯租借地以外一步。日本则大不然，其出发海陆军二万余人，不径攻青岛，而由山东北部海滨之龙口上岸。龙口南距青岛一百五十英里，既非德之租借地，亦非租地之警备区域。中国既宣告中立。又日本非对中国宣战，则当然无由龙口上岸之理。然日本欲乘机囊括山东，故先截莱州半岛为交战区域。自九月三日，陆军登陆后，横穿半岛以达胶州。所有沿途中国之城镇与邮电机关，尽行占管，征发物品，役苦人民，视同敌国地境办理。袁氏政府，无可如何，乃不得已于九月三日宣告中立外。划莱州龙口及接近胶州湾附近地方为交战区域，声明此外各处，仍严守中立。同时又与日政府约定交战区域，以胶济铁道之潍县车站以东为界，日军不得越界而西。至九月二十六日，日军四百名突至潍县占据车站。十月三日，复迫中国军队退出铁道附近地方，中国抗议，全然不理。十月六日，日军大队进逼济南占领胶济铁道全线及铁路附近各矿产所有铁路及矿产用事之中国人员，全行驱逐而改用日本人。当时袁政府以该铁路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全系中立地带为辞，向日置益公使提出抗议，日置益旋向袁政府提出左记之声明书。

山东铁道公司，根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国许与德国权利之胶州协约而成立，在德国政府直接管辖之下，为德国国有财产之公司。实际上即作为胶州租借地延长之一部也。据该铁路公司之定款及德国政府附与之特许状观之，足证明该公司完全为德国所有之公司，而以现在该铁路活动之状态言之。亦有不能分割之情势。潍县以西之一部，虽为中立地带，然其状态依然与德国所有无异。日本政府本对德宣战之旨趣，须将德国之根据全然破坏，则占领山东铁路殊属正当。此事与中国政府本无关系，为避误会及地方官宪冲突之故，日本政府特向中国政府声明此旨，并希望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执行此等必要之手段，无所用其疑惑。

此声明书最横暴之点，在以胶济铁路全线，作为胶州湾租借地延长之一部，原中德条约，仅限胶州湾为租借地，而日本占领之后，逞其横暴，直欲将胶州租借地之范围延长至于济南也。十一月七日，德国将领以青岛降服于英日联军之下，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澳之后，即向中国当局声明，青岛海关人员应由日本人充当。先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德青岛设关条约，及一千九百零五年修订之约。青岛海关，虽由德人管理，然海关人员全由中国自派。日本纵妄欲接替德人在山东之权利准之中德原约，亦无用日本人充当海关人员之权，且中国海关组织原有定约，若一从日本之请，则全国海关制度，从此破坏纷乱，自不能承认其要求。然日政府一方向中国政府声明，一方以军力将青岛海关之文件财物尽行押收，将中国人员尽行驱逐。事实上归日本占领办理。

青岛降服之后，袁世凯以为战事既毕，交战两方之军事设备业已解除，遂请日政府将青岛以外，山东内地之日军撤回青岛，并请拆卸龙口至张店之轻便铁道，与附挂于中国电杆之电线，日政府全然不理，袁氏以昔日不得已划定交战区域之理由，今不复存，遂宣告取消九月三日中立之宣言，于一月七日照会英日两公使请其撤兵，日公使于一月九日答复，谓奉本国政府训令此项取消之举，实属独断，没却国际情谊，帝国政府不胜惊愕，并不胜愤懑，决不令山东之帝国军队，受此等取消之拘束云云。同时日本各报纸，并伦敦太晤士报之日本通信，皆诬中国欲与德国同盟，将效土耳其助德国与协约国宣战，以簧惑英法各国之视听。日政府旋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要求，先是青岛降服之后，日本政府即欲取消对德最后通牒中以胶州湾还付中国之宣言。十二月初旬，加藤氏于议会答复议员之质问曰，关于胶州湾前途之问题，目下不能答复，政府对于此事，从未向何外国表示态度。对于宣战之目的，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湾，借以恢复东方之和平，至战后归还一层，当时未曾想及，最后通牒中，亦无明白之宣言云云。盖斯时日本政府已决定乘此时机，对中国为积极之处分，故无忌惮变换胶州湾还付中国之宣言，而乘袁世凯要求撤兵之机，遂提出二十一条耳。

*　　　*　　　*

斯时中日违言，起于山东撤兵问题。则中日交涉，应限于山东问题而止。然日本对华政策，欲比列强独得优越地位，置中国于日本保护之下，而苦不能得此种条约以为根据，值欧战方酣，列强无干涉极东之暇，而协约国以日本助战之故，不愿以中国问题与之为难。又袁氏方潜图帝业，民党方潜图反对，左推右挽，悉在日本操纵之中。且北京部员，有早经日本养成为韩国一进会李容九第二者，力为内应，此日本实行对华政策千载一时之机也。故大隈内阁乘袁氏要求撤兵之隙，旋命驻华公使日置益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破国际惯例，径向中国元首袁世凯提出五号二十一条之要求如左。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及全局之平和，并期将现在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

议定条款如左。

一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协定关于德国在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之处分，概行承认。

二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三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四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　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来往，并经营商工业等项生意。

四　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至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五　中国政府，应允左开各项，先经日本政府同意然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款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六　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先向日本政府商议。

七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划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以现在日本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有密接关系，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二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恐于该公司有影响，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确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

一　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

二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　向来中日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纠葛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如中国政府所须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　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杭州间、南昌潮州间各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　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理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　允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宣教之权。

此五号二十一条，日本政府于民国三年十二月三日，将正文寄交日使日置益氏，令其相机提交中国政府，同时加藤高明致日置益左记训令一通。

兹因处置日德战后之一切事件，并坚固帝国之地位与维持东亚之和平，帝国政府决计陈说中国政府，劝其按照提议中所定前四号之方针与帝国政府订立条约及合同。……夫坚固帝国在东亚之地位。因以保持东亚之利益，而使中国不得不依附上述之提议以行事，皆帝国政府

所信为至要之举，故必竭力谋之，宜用种种方法以求达到此目的。兹特以全权相委，两国开议之时，务希坚持勿懈，至要至要。

至于第五号中提出者，虽不过帝国政府一种愿望，然亦望勉力进行，以此项愿望，终能见诸实行为目的。盖此第五号之提议实系条件非谨一愿望也。

（摘自《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袁世凯称帝和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自欧战起后，大限内阁对中国下四面包围之策。其对于英俄法诸国，则以日本参加协约国之故，务使协约各国对于中国之问题，惟日本之意旨是从，不能撇开日本，单独有所活动。而协约国以欧洲战争，日本有左右轻重之关系，亦不敢违反此旨日本于中国。既得外交上此种特殊势力。则对于中国内部，随机应变，以达其扰乱中国之策。袁氏窃国之志，既被日人看破，遂借二十一条之交涉，竭力引诱，令其入彀。当帝制初步进行，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示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为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云云。然此等表示，并非真赞成袁氏之帝制成功，不过借此以启中国之内乱耳，及中国各省国民代表实行投票。帝制将实际成功之时，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忽约同英俄二国公使，于十月二十八日，同赴外交部。先由小幡口述日本政府之旨曰，中国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之暗潮甚烈，如因此发生事变，非仅中国之不幸，亦关系诸国之忧。愿袁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制之期，暂行延缓，以固东亚之和平。日本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之内政云云。英俄二公使，亦为同意之口述。次日日本外务省将训令小幡公使向中国政府警告之原文，正式发表如左。

> 中国改变国体之计划，近已趋于实现之地位。目下欧战尚无了期，无论世界何国，苟有伤害和平安宁之事变，当竭力遏阻之。中国帝制进行，其国内表面虽似无大反对，以日本政府所得报告，其反对暗潮之烈，实出人意料之外。袁总统若骤立帝制，必变乱陡起，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此等危险状况，深加忧虑。盖中国若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凡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之危害。而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日本政府为保持东方和平起见，乃决定以目下时局大可忧虑之情形，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本以坦白好友之态度，披沥劝告，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全大局，缓行帝制，以防祸乱，而固远东之和平。故帝国政府，已发必要之训令，致中华代理公使。日本政府之为此，实尽其友好邻邦之责任，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夫各国公使向外交部之口头报告：尚非正式交涉之性质，无在本国正式发表之必要。日政府之特为公布者，一则对袁氏表示郑重之态度，打击其帝制进行，一则鼓动中国国民党起抗袁运动耳。十一月一日，袁氏命陆征祥答复三国公使，大致谓此事全系中国内政，既承友谊劝告，亦宜详细答复。中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政府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今大多数国民，群以共和不适宜于中国。国是业已动摇，倘迁延不决，酿成事端，不但本国受害，即友邦侨民，亦未必不蒙损失。政府为此，迭电询各省文武长官，能否确保地方秩序，皆称如从民意解决，均可担任地方治安。故实行改革时，断不至有变故发生。贵国友谊劝告，意在维持东亚之和平，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实有维持和平之力。云云。英俄二公使对此答复，皆无异论。惟日本政府谓此等答复，意旨甚不明了。使小幡公使于十一月四日单独至外交部，请中国政府对于三国警告，更为明白之答复。盖逼袁氏非承认延期不可，而表示干涉之态度

也。越二日再至外交部催促，袁氏不得已于十一月九日，命曹汝霖分往各使馆，声明本年内断不实行帝制。又邀请各公使于十一日会谈外交部，由陆征祥正式致左记之答复。

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赞成帝制，是变更国体，早已决定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所乐闻，然在政府，应行筹备之事甚多，非宽假时日，难臻完美。况党人匿迹治外法权外，欲乘机造乱者，颇不乏人。各友邦之忠告，亦即以此，故延期实行势所不免，惟是意外之乱。若果猝发，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皆有对付之力。

此答复既声明帝制延期，日本亦不再行质问。及十二月十三日，袁氏申令承认为皇帝后，日公使小幡，忽于十五日，率同英俄法意诸公使至外交部，提出第二次五国联合干涉帝制之警告，如左。

曩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声明不急遽从事，且称有力担保国内之治安。劝告诸国据此，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

此警告简单严厉，明白干涉。袁氏接阅之后，万分狼狈。不得已对于本国称皇帝。称洪宪元年，对于各国仍称大总统，称民国五年。袁氏知此种警告，虽由五国联合，实出于日本之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之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便启行（时民国五年一月）。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晚，招请周特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特使定十七日启行，随员皆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日本政府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威望丧尽，无以为计。阅三日、日使复访陆征祥，谓贵国政府，前信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究竟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陆氏无词以对，盖其时四川方面，泸州纳溪叙州各地，皆为护国军占领。而其他各省，皆蠢蠢将动。袁氏知日本对己捣乱，无法转旋，亦自知无平定反对派之力，且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深以为惧，不得已于一月二十一日，命陆征祥向日英俄法意五国公使发帝制实行延期之通告，旋向国内申令取消帝制。

如上所述，袁氏帝制之失败，虽曰由于西南护国军势力宏大之故，然日本政府对于袁氏外交上之打击，其功实不在护国军之下，惟日本对袁捣乱，其目的实在扰乱中国之全局，而乘机以夺中国之权利，并非仅以反对袁氏称帝，即满足也。故日政府第一次对袁氏提出警告之后，即一面派多数军人策士，参加中国民党之抗袁运动。如上海民党夺军舰，山东民军起事，皆有日本人参加其间。一面于满洲召集清室之宗社党，组织讨袁军，亦名勤王军，以图扰乱满蒙，而张日本之权利。先是清室鼎革之后，日本罗致清室宗社党一班首领，住于大连。至此日政府拥肃亲王纠合宗社党，谋于满洲举勤王军，以讨袁世凯。其军费由日本大仓氏出名借贷日金一百万元，以肃亲王之财产作抵，内以三十万元，由肃亲王召集宗社党三千人（马贼占多数）至大连，由日本军官编练成军，余七十万元，由日本陆军大佐土井等率领日本后备军人，另组一军，混入于勤王军之内，备勤王军有实际战斗之能力。犹恐军力单弱，更招致蒙匪南下，供给蒙古巨匪首领名巴布扎布者，以多数武器，嗾使举兵南犯，以与南满之勤王军为援应。然巴布扎布南下之时，忽袁世凯病死，帝制问题消灭。肃亲王之勤王军，出师无名，不得已中止。然日政府不肯因此收手，仍促蒙匪南犯，遂酿成郑家屯事件（详第二十一章）。

四

六八

又袁世凯命周特使启行赴日本之时，正俄国克鲁义大公到东京之日，日俄同盟之事实，即此时在东京之所协定此日政府拒绝袁氏特使之重大原因也，不久日俄协约发表：其第二条文曰："两缔约国之一方，在极东之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侵迫时，两国应协商防护此等权利利益应取之手段。"此条文声明俄日两国互相承认其在中国之领土权，与其特殊利益，而毫无限制。盖明白宣示日俄两国垄断中国之领土及权利也，又同时之日俄密约，更引申前义，规定中国政治上之优越权，惟日俄两国所独占。如有第三国对于日俄两国怀敌意时，日俄共同防御之（详第二十一章）。此等同盟之用意，盖以欧战方殷，各国无东顾之暇，而中国内部之帝制战争，不知糜烂至于何等程度。将由日俄两国处分中国之天地耳。此日本政府利用袁世凯称帝而扰乱中国之全局而图攫取中国无上权利之阴谋之结晶点所在也，幸而袁世凯早死，中国之帝制战争，早告结局。又幸而俄国全为德国所败，日俄同盟，殆成水泡，中国遂赖以无恙。不然，彼时之日祸，其可思议哉，国人多以为日本欲灭袁世凯也，然日本对于中国之目的，岂仅欲灭袁氏一人而已哉。

（摘自《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对德事件与军事会议

政府对德方针，始终不出自定。初以美使敦促而抗议，继以日本及协约国希望而断交，更以日本派人来华，与梁启超、徐世昌秘密接洽，表示亲善之意，而梁、徐主张急进，政府纳徐、梁之议，遂决定于断交后，再进一步。及美国宣战，驻京美使于奉命通知之顷，复就便有所劝告，政府遂忘其宣布断交时，对于国会有所谓条件之说，汲汲不遑。欲国人赞成其宣战政策。盖所谓条件者，至断交后，所得各国答复，英、日于赔款允延二三年，增税则各有难色；俄、法于增税尚可商酌，而赔款不欲多延。自实际观之，此层不可谓非失败也。

国中舆论，以俄、德讲和，呼声渐紧，不欲再陷旋涡，且条件更遭失败，此外交涉，复与人以难信之故；对于政府方针，大都表示反对。政府以箭在弦上，不欲为舆论所困，亟求所以自援之道，乃有召集军事会议之事。

国中反对政府方针，虽有明确之表见者，不外京省军事长官及韬园、丙辰俱乐部等派政客，与全部商民三种。军人一派，如在京之王士珍，在外之张勋、倪嗣冲，各以反对宣战著闻于世。政客、商民反对之声，尤充塞海宇。政府除对政客、商民为相当之疏通外，转借军事会议，号召督军及其代表入都，以收觌面疏通之果，盖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也。

军事会议，各省督军与会者，为直隶曹锟、山东张怀之、山西阎锡山、河南赵倜、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福建李厚基、吉林孟恩远、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省长与会者，为安徽倪嗣冲；各省督军代表与会者，为云南叶荃、赵世铭、贵州王文华、甘肃吴中英、奉天杨宇霆、湖南张翼鹏、新疆钱桐、浙江赵禅、江苏师景云；中央参议人员，则为陆军总次长、海军总次长、参谋总长、而国务总理自为主席。

四月二十五日，军事会议正式开会。次二十六日，即议决一致赞成政府外交方针，并由列席诸人一一签名署诺，交付总理以为证凭。嗣后该督军代表等，迭与驻京外使作创格之周旋，不可谓非各国外界一大新纪元也。

（原载《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出版）

宣战案与政潮

政府召集军事会议，决行对德宣战，本志前期已有记述。各督军以议军事入京，进而结合团体，参预外交，干涉内政，有种种之活动，演种种之怪象，造成中央政海掀然大波。撮举当时情形，诚一段活剧也。

军督团与国务会议 宣战案经军事会议一致赞成，并由列席诸人一一签名署诺后，五月一日，国务院国务会议即议此事。方开始讨论之际，各督军及代表等二十余人，排闼而入。向例阁议，即无旁听席，又无阁员以外之人列席。今兹督军加入，为阁议开一新纪元。阁员碍于情面，惟有与以相当之敷衍。其首先发言者为倪嗣冲，次之则张怀芝，再次则孟恩远、李厚基，各对于宣战意见，述其所怀，如人民之请愿于国会者。当时伍外长主张宣战，而不言加入。程壁光亦如之，张谷等对于根本问题，无所反对，惟睹各方状态，不能不有所怀疑，赖有不速之客从旁怂恿，段总理折衷之，遂决定宣战问题。先行提出于国会。总理以会议结果，入告元首。元首无异词，即予盖印。

督军团与两院议员 宣战案通过阁议后，五月四日各督军假迎宾馆招待两院议员，为宣战案之疏通。议员到者四百余人，主人有湖北王督军、山东张督军、吉林孟督军、福建李督军、直隶曹督军、河南赵督军、山西阎督军、安徽倪省长及代表等。因李厚基善于词令，公推李致招待词，并演说外交问题。略谓：对德问题初起，余个人颇不赞成。犹忆在闽时，初闻政府有对德抗议之事，非常骇怪。匪独予一人如是，即全国之人，初闻此事者，亦莫不骇怪也。何以故？以未明此事之真象故。及到京而后考察内容，始知政府确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出于第三步不可。盖此次对德问题，纯为免害起见，若不以自动的诚意，毅然决定，倘协约方面以强迫的手段，促其加入，试问有何力量，足以对待之乎！主加入说者，或斤斤焉以条件为辞，所见亦左。如甲乙两人相斗，旁观者因抱不平而或帮甲，或帮乙，在甲与乙之受其帮者，感情必厚。如或一面帮斗，一面需索金钱之报酬，虽受其帮，而感情先坏矣。故此次加入协约，必完全出于友谊上之诚意，不可先索报酬。则此刻为协约诸国帮一大忙，异日协约诸国或能为我帮一小忙也。余等个人之赞成此事，纯以国家为前提，不存一毫私意，皇天后土，实鉴临之。诸君爱国之诚，切于余辈，今日幸得晤谭，望详细讨论，归于一致，云云。李君词毕，汤议长济武起作答词。谓：军人与国会接洽，自民国以来，今日为开宗明义第一次，是极可欣喜之事。何以故？以军人已居然认识国会故。在专制时代，凡人只认有我之价值，而不认有与我对面之价值。立宪时代，则反是。今日各督军及各代表，邀请两院同人，是能尊重我之价值，同时又能尊重我之对面之价值。所以同人等于尊重国会本身价值以外，同时亦须尊重各督军及各代表之价值。至外交方针，自宜全国一致。但两院同人，未经讨论，表示意见，余尚不能代表。所可代表者，为感谢各督军及各代表之好意耳。且可逆料将来国会，必有一种正当之主张云。汤君词毕，在坐各议员皆无词，陆续散会。

宣战咨文之提出 阁议结果，将对德宣战案，即日提出国会，已如前述。当日办就咨文，送府盖印。事毕，已七点余钟。送到众议院时，已在深晚十一点钟。咨文寥寥六行，其文如左：

大总统为咨行事：吾国与德绝交以来，德国政府仍侵犯中立权利，损害吾民生

命财产，破坏公法，违背人道。本大总统为促进和平、维持公法、保护吾国人民生命财产起见，认为与德政府有宣战之必要。兹依据约法第三十五条，咨请同意。并据约法第二十一条，要求秘密会议，此咨众议院。

宣战问题之讨议　五月八日，会议院常会开会后，由郭议员同、陈议员家鼎提议，变更议事日程，讨论政府提出之宣战案。表决，多数赞成，遂改为秘密会。先是，议员以开议外交要案，出席者异常踊跃，旁听者亦陆续早到，正门前面，一时以前，即已车马盈门，更有武装巡警数十名，警卫极其森严。其间有人散布"俄德单独媾和之不确、对德宣战浅说"等印刷物，又有分送"国民公报"、"大中报"（载有梁任公外交方针质言）者，门外光景，亦大异平日。议场周围，有武装巡警警备严重。又议场，自四处便门至旁听席，由身配手枪之警吏，严行警戒。议员就席后，即由汤议长宣告开秘密会，请段总理出席说明。当由议长电请段总理。段总理即同全体阁员出席，伍总长亦到。总理登台说明对德第三步之必要，所持理由，大致谓外间对于此事有种种之疑点：第一疑点，即以为政府于日本之外交，或有何种秘密。余（段总理自称）可以保证，并无丝毫之秘密，凡所交涉情形，大抵均已表示，并无保留。第二疑点，以为宣战以后，当施行军法，普通法即失其效力。余敢保证，决无此事，盖此次号称对德宣战，实无战事之可言，决无施行军法之必要。第三疑点，以为宣战以后，恐协约方面要求中国出兵助战。余以为不必有此事发生，纵令有此事发生，决非中国不利益之事。以余个人之意见观之，尚为一种大有利益之事，可惜不能表示于众耳。第四疑点，以为德国若得最后之胜利，当蒙不利益之影响。余以为德国当宣布潜航艇政策之时，已足证明德国在陆地上能力已不充足，不得已而出此破坏公法之下策，且此策并未收到效果。从前协约国只能坚守，德国则纯取攻势；现在情形已变更，德国只能退守，而协约国已取攻势。故恐德国胜利之说，实为过虑云云。说明毕，即有许多议员质问，前所宣言附加条件之利益，究竟靠得住否。段总理言，如我国有加入之决心，无不可以商量等语。答毕，即退席。此时，议场形势，甚为汹汹。因急进派利于从速投票，稳健派则欲延缓时日，以舒其气。然于人声嘈杂之中，劫于反动派汹汹之势，欲觅一出而提议者甚难其人。经某某数君在议场内奔走运动多时，始有人出而提议，先开全院委员会。表决结果，竟得多数。急进派中某君，又主张即日开全院委员会，而反对即日开会者亦有之，相持甚急。后经多人婉告提议者，以现在已届散会时间，劝其取消提议。某君允诺，遂散会。以当日情形观之，赞成、反对之人数，相差不远。当讨论中，两派议员，各打电催人出席。两方皆将兵马调齐，以备作战。急进派利于速，稳健者利于缓。利于急者欲乘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人无犹豫之余地；利于缓者，则恐尚无把握，不如稍为延宕之为佳也。观于变更议事日程之动议，有多数之赞成，似乎反对者占胜利。而提交全院委员会之主张，又能多数通过，似乎稳健者之势力亦不弱。其中若有怀疑者之数票，颇能有左右重轻之势也。同日，参议院开会，有人提议，现在外交紧迫，本院同人，不容不预先讨论，请变更议事日程，开全院委员会讨论宣战案。表决，多数。委员长赵世钰登台主席。最先报号发言者，为吕志伊，反对宣战，演说三十分钟之久，词甚激烈，继之汤漪，大意谓：政府对于外交问题，始终无明了确实之报告，使我同人赞成，反对，皆无所依据。所持以为理由者，不外友邦要求加入，为惟一之方针。诸君试思，外国政府之要求，何能认为我之方针乎。本席之意，应俟宣战案提出，必须全院议员邀同国务员，详细讨论，费数日光阴，得有确当之见地，方能定赞成反对之计。继之者朱念祖，大意谓：国务员议决宣战之日，不应容军人到院参议大政。即此，足见政府对于外交，实如大海茫茫，全无主见，不外借武

人之议论为从违。我同人对于此案，必须详加讨论。继之者丁世峄，议论甚长，专攻驳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之文章。手持国民公报，立演台上，一面看，一面批评。正在兴隆之时，忽席间传言，众院已经投票，于是议员纷纷退席，向众议院探听消息，以致讨论有不能终局之势。于是某君起言，众议院投票将有结果．参议院即可无须表决，多数均以为然，遂散会。

宣战问题之政团态度 宪法研究会，五月二日，开全体大会，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到会者近二百人，汤化龙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后，王敬芳、刘崇佑、林长民、蓝公武等先后发言。大意谓：国家为国际地位及前途利害计，均认对德宣战为必要，而林长民于目今欧战之趋势，及俄德绝无单独媾和之理由，言之尤详。最后主席以赞成对德宣战问题付表决，全体起立赞成，并有赞成宣战之宣言发表于外。益友社、政学会亦同时开全体大会。益友社反对宣战，甚形激烈。其反对之理由，以为政府对德绝交时，对国会宣布种种条件，现均不能履行，外交已完全失败。此种无条件的对德宣战，非反对不可。表决结果，多数同意。遂发通告与各社员，为一致之主张。政学会开会三次，反对、赞成相间发言，争辨甚烈。其一种激急光景，为从来开会所未有。张熔西亦屡有演说，先自欧洲大势说起，论及中国有加入之必要。彼初本怀疑，然以详细研究之结果，卒认宣战为不得已。且民主主义之政党，尤不能反对对军国主义之德国宣战，致失民主主义各协商国之同情。国会同人，多对现内阁不满足，然据彼之意，应同意宣战之后，再提倡改造内阁。勿先否决此案，致陷外交于难境云云。众争辨既久，乃由主席付表决。反对宣战者，以数人之差超过半数。

公民团大闹众议院 五月十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讨论宣战案，忽有公民团包围众议院，民国政界遂更起绝大波澜。用将当时情形，分别述之以餍阅者：

公民团之形形色色 十日晨间，众坊桥(众院门道)一带，集聚多人，声言请愿。其团体分为种种名义：(一)陆海军人请愿团，(二)五族公民请愿团，(三)政学商界请愿团，(四)学军商界请愿团，(五)北京学界请愿团，(六)北京市民请愿团。各团皆揭白布旗，上书某某请愿团字样。军界请愿团，更携十九星之陆军旗。公民团员，皆手执纸糊之五色小旗，胸悬标帜，上书其团名。团员中有干事，及普通团员两种。干事大抵衣服整齐，携带本团传单，逢人辄散。至普通团员，则五光十色，各种人俱有，其中蔽衣短褐，类似下流社会之人者尤多。

议员之被殴 当一两点钟时，各团员分送传单，凡议员入场，均送一纸。有数议员未曾接受，则拦住洋车不肯放行。以致将车挤破，议员遂被殴伤。更有一群人，欲冲入院内，传达处禁止，遂大挥老拳，并痛殴议员。议员之被殴伤者，共十余人，以陈策、吕复、龚政、吴宝慈为最重。

公民代表之要求 传达处见人数众多，不能禁止，允为通报议长请示。汤化龙谓人数如此之多，断不能见，可举代表数人来见。当时即举张尧卿等五人为代表，入谒议长。略云，今日全院委员会，要求公民代表入席旁听。汤议长云，照院法，秘密会不许旁听，不能允许，代表等遂退出。此代表等第一次要求之情形也。

议院之紧急动议 议长见外间其势汹汹，遂发紧急动议，不开秘密会，改全院委员会为大会。一面电请段总理及内务、司法两总长出席受质问。未几，段总理来电，谓外间现在人数众多，须设法解散，再出席。议员因段未到，皆在休息室等候。五时顷，范总长先至，声明即当下令警察解散，并赴议长室用电话促段。至晚七钟，门前拥绕之请愿团及军警均整列为两行，则段总理之汽车至矣。段下车时，请愿团摇旗呐喊，拍掌之声雷动。段微笑急步而入议场，遂开会。议员汪彭年等质问者八九人。据总理所答之言，大抵谓我事前并不知道，

三时得到消息，已饬主管官吏作速解散。质问久之，无甚要领。

代表之最后条件 段总理既到院，命吴炳湘解散。吴亲至院外，与代表等温语接洽，至九点钟复命。谓：公民团要求三条件：（一）限当晚投票通过；（二）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如政府不解散，彼等将折毁议院以平公愤云云。

公民团之解散 当吴总监复命之时，各团员纷扰益甚，有人用砖瓦乱掷。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中野氏，误为飞石所中，面部受伤。段、范闻信，深恐牵入外交，遂命吴总监以电话招马队冲逐请愿之人，原有守卫之军警，亦用枪柄乱击。所谓公民团者，乃哄然而散。

公民团内容之观察 公民请愿团俱有代表统率。昨日先后投刺于议院者：如刘世钧，曾任九江镇守使，癸丑后向袁政府自首，现为陆军部差遣；张尧卿前年与刘艺舟等同时自首者，现为陆军部咨议；白亮为众议院速记，新由院中开除者；赵鹏图为前北京“日日新闻”主笔。此外又有吴光宪、刘坚、周勋锡、史俟民、徐功金诸人。而公民团总代表，则中华大学校长宪政促进会会员之孙熙泽也。其余分子，除二三等首领外，皆由雇募。传闻有由各杠房中召集而来者，而人力车夫亦颇不少。象坊桥空地，为发给小旗处。不知其属于何团公民中，有外衣长衫而里裤破碎不堪者。有某校之茶役，是日长袍马褂，杂于广众中，而自混于政界代表之列。若就各团而论，军界尚整齐。惟北京市民请愿团，衣衫褴褛者十居八九。平时骡马市大街中国银行兑现处，鹄立其门者甚多，是日独少，闻均为请愿团雇用。人类不齐，可以概见。至于给予代价，闻亦有等差，有半元者、有铜元二十枚者、甚有十五枚、七八枚者，不一其数。

闹院风潮与内阁 公民团围绕众院，军界领袖颇有主动嫌疑，农商谷总长、司法张总长即递呈辞职。先是公民代表白亮，被地检厅拘押，十四日下午，有号称公民者二百余人，赴地检厅要求释放白亮。谓，本团系奉某督军命令组织，口气类皆军界中人，可见公民之后，大有人在。于是外交伍总长、海军程总长，均相率辞官。范源濂总长最后亦提出辞呈。财政、交通，因贿案，已早无总长。所谓内阁者，只剩总理一人。如是有倒阁之势。有主张段总理辞职，另行组织内阁者。有主张段总理之下，改组阁员者。各督军为维持段内阁，分途疏通，大宴议员，席间演辞，大致皆谓公民事违法，总理实不知情，要求通过宣战案等语。段总理不以独脚戏为虑，仍以国务院名议，三次咨催众院，请决宣战案。十九日，众议院常会，褚议员辅成临时动议，谓政府关于宣战同意案，迭次咨催，实属不合。查原案经大总统提出，何以三次催文，不以大总统名义，而以国务院名义，是根本上不生效力。且国务院咨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今国务会员只有总理一人，是手续上又不完全。本员动议，应将此案，暂行缓议，俟内阁全体改组后，再行讨论云云。主席以褚议付表决，多数。宣战案遂暂行搁起，专为内阁问题矣。

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 督军等疏通议员，不得要领，恼羞成怒，遂有呈请解散国会之举。由孟恩远领衔，盖将军府印，其呈文闻系某政客主稿，原文甚长。大致以宪法不适国情为言，末后并援引癸丑先例，谓总统领湖北都督时，曾一为之，并非创举，为其得意之笔。呈文上后，总统留中不发，并有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之宣言。二十一日，各督军遂全体出京，麇集徐州矣。

段祺瑞免职 一旬以来，内阁演独脚戏，一切政务停滞进行。国会对于总理，又有不信任之表示。大总统遂于二十三日，免段祺瑞内阁总理及陆军总长本官，以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并以北京为警备区域，以王士珍为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维持京畿治安

云。

免段后之继任内阁问题 段祺瑞免职后，继任内阁，总统初属意徐东海。专使敦请，东海坚不出山。于是改拟王聘卿，王亦决不担任。数日以来，京、津使者络绎于道。征集各方意见，拟以李仲仙为宜，遂于二十日下午，以李经羲总理同意案，提出众议院。二十七日为星期日，国会例应休息，议员等以当此时局，内阁无人，新总理既已提出，亟应为之决定，期政务之迅速进行，故于星期日特行开会，投同意票。计出席人数四百六十三，开票结果，同意票三百八十八，多数通过。二十八日，参院以一百九十六人出席，同意票一百六十六，通过。两院既通过，遂由王士珍、陆建章电致李氏，并由总统派人往迎。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诚李氏今日之盛况也。

(原载《新青年》3卷4号，1917年6月出版)

督军称兵与复辟

近数月来政潮澎湃，事无巨细，无不与督军息息相关。综近事纪之：其发纵为政客，其被害为人民，其杠木梢硬出头者则督军也。其号召之旗帜屡次变换，最初由军事会议，一变而为外交问题，再变而为宪法问题，三变而为内阁问题，四变而为总统问题，五变而为复辟问题，月余之内，变更至六次之多。兹将其最近变象撮述于次：

督军之独立 各督军愤愤出京，集议徐州，本志前期已有纪述。五月二十九日，首由倪嗣冲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奉、直等省，一致效尤。有地方之督军，如张作霖、张怀芝、杨善德、李厚基、阎锡山、毕桂芳、赵倜、曹锟、陈树藩等，相继响应，卢永祥据有淞沪，亦起而效之。有军队之师长，如李长泰、吴光新、张敬尧等，亦如应声之虫，通电纷驰，摇旗呐喊，细绎其通电原文，大致皆维持北洋系团体为重等语，事实不善，措辞颇难。惟倪嗣冲长电一通，言之成理，亦若果系为宪法国会，不涉己身问题者，为此番通电之杰作。至通电而外，出兵问题，并无若何事实，大抵取威吓降服主义而已。

督军独立后之内哄 督军团八面威风，挥戈北上，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讵黑龙江毕督竟为师长许兰洲所逐，仓皇出走；许则自为督军。山西之阎锡山，被逼于河东军人景蔚文；讨阎旗帜，至今招展。其山西省长孙发绪，福建省长胡瑞霖则又各被其督军逐走以去。纲维一弛，威信全隳矣。

各督军之总参谋处 各督军脱离中央，以天津为策源地，似组织临时政府，推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总理。徐州张勋不甚赞成，于是设立总参谋处，为临时政府之预备。雷震春为总参谋，徐世昌为大元帅，六月三日通电成立。惟内部分子复杂，有共和派、有帝制派、有官僚派，而一派之中，又分直隶系、安徽系、交通系，各拥一党魁，以争临时总统之位置。北洋派之首领，以王、段、冯为三杰，而天津方面，因冯态度圆滑，排斥极力。各派人士，除段派及进步党外，大都主张复辟。六日，该处议会，共和派与帝制派争论激烈，继以用武，雷震春头破血流。一般老头儿革命人物，无拳无勇，遂不敢再赴总参谋处。外交团方面，不但不承认该处，且时以辛丑条约关系，提起责言。外逼内讧，该处无法维持，成立一星期，仅热闹二日，过此，则门前冷落车马稀，凡等于无形消灭矣。

独立时之大总统 督军干宪，相率称兵，近畿则独立，沿江则中立，以隔断西南之应援。李仲轩通过国会，因督军势盛，推托不来。王聘卿、伍博士均雍容坐镇，不闻有何指挥，有何策画。大总统进退维谷，夏寿康等从而恐吓之，李经羲半推半就，必引元首于违法而后已。头脑简单之总统，至此，殆无自主之能力。盖北洋直系本可拥黎，而直系中之河间，又复别有主张，是以皖系横行，直系坐视，大总统除以个人名义通电劝告外，无一毫办法。其府中秘书，如黎澍、金永炎等，又为督军团指斥之佥壬，引嫌以去，而大总统益孤立矣。

督军独立与外交团 此次中国政变，各国政府皆异常注意，以事关中国内政，无干涉之必要，故大都皆采旁观态度。惟美国政府以中、美为东西二大共和国，休戚相关，素敦友谊，近见中国政府因对德宣战问题，与美国表同情，致酿成内政之骚动，极为遗憾，曾训令驻京美

使芮恩施氏面谒元首，陈述友谊的忠告，深望中国内乱早日敉平，速组织强有力之政府，以保全国际地位云云。并由美使芮氏将该政府之训令，正式于六月六日送达外交当局。其他各国，皆视各督之独立，为谋叛之乱军。外人报纸呼倪、张等皆曰，叛督。惟日本则对于叛督以叛乱目之，而对于美之对我警告，颇不满意。观东报之论调及政府之态度，大有不肯干休之势。朝野皆曰，日本在中国政治上占特殊地位，美国单独警告，干涉中国内政，是蔑视之也。故必对美交涉，务令美国了解日本在华之地位云云。呜呼！独立国家之内政，容人置喙耶！独立国家之政治上，亦容他国占有特殊地位耶！国人宜志之。

督军独立与民党 北洋系督军称兵北犯，背叛中央，民党之政客军人，皆义愤干云，亟思讨逆。孙文、唐绍仪、李烈钧等先后赴粤，联络川、湘、滇、黔、桂、粤六省，共起义师。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等，亦在沪宣言，斥责叛督，拥护共和。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等，尤摩拳擦掌，大有剑及履及之势。

督军独立与张勋 各督军会议徐州，相率独立，而张勋初阳为反对，嗣以倪嗣冲之长跪哀求，始允出面相助。当其时，对于两方不即不离，似居间作调人者，殆欲以温和手段，达其率兵入京之计也。大总统仁柔长厚，对于张勋电询免段事，以极温和之语电复之。电云："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投艰遗大，独立不挠，元洪两历共和，皆同患难。继任之始，即重以国事相烦，屡次乞休，未敢曲允。原欲为阽危之国，留此老成，遂使以劳苦之身，困于久役。平居思念，每用歉然。乃者国交既绝，政变迭生，阁员既相率辞官，国会复要求改组，浸致总理孤立，庶政废弛，委曲调停，苦无良策，设坐视纠纷，必将决裂，既无使国会解散之方，益至陷总理困难之境，误国负友，咎在藐躬。再四思维，无宁元洪辜旧日之交情，尚为芝泉保将来之威信。区区苦衷，亦不求芝泉之见谅也。各督军省长等，职在封疆，谊关休戚，国所与立，民具尔瞻，况与芝泉交谊肫挚，尤胜元洪，为谋必忠，爱人以德，不为芝泉绵不尽之思，而为芝泉聚无名之讼；设使枝节横生，秩序中乱，内召邦人之阋，外启邻国之侵，谁复于芝泉有恕词乎。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仍望恺切劝导，咸体斯意。民国一体，情如家人，"云云。张得电后，亦无声响。旋由李仲轩转达总统，谓此次事变，张可出任调停，但须明发命令，召其北来等语。大总统以李系新任总理，所陈策画，自可照行，遂以病急乱投医之手段，明发命令，并特派专车迎迓来京，共商国是。于是辫兵辫帅，遂摇摆入都矣

督军独立与副总统 冯河间本北洋派之直系，与段系微有区别，加以副总统头衔，与单纯督军不同，故此次各督军独立，冯河间守中立态度。天津总参谋处之皖系，极力排挤之，冯愤而辞副总统，并通电各督，劝令和缓。但细绎其电，仅有劝解之意，无理法之可言。即于各督，亦无丝毫贬词，于中央亦无不慊之语

督军独立与国会 督军独立所发表之电文，虽亦有北洋系，北洋团体等名目，而揭橥号召，则皆以国会不良为词。故国会与独立督军，实有不两立之势。国会中分子，有主张总辞职者，有主张自请解散者，有主张任凭武力解散，不可自行放弃责任者，议论纷纭，卒以任凭武力解散，不自放弃责任者占多数。研究、讨论两派，无可如何，遂施其拆台子伎俩，自行拆卸。凡研究、讨论两系人物，相约辞职，汤化龙为拆台计，并议长亦牺牲之。汤之辞职书一面到院，主席以变更议事日程，讨论此案付表决，起立多数，续以准辞付表决，通过。当日，即选出吴景濂为议长，吴议长亦于当日就职，可谓迅速之极。而研究派议员，一面辞职，一面赴天津画策。适张勋拥兵入京，行抵津门，以限期解散国会为最要条件，限至六月十二日晚止。据夏寿康传述，如十二日不下解散国会命令，十三日晨，各督军即当自由行动。总

统软化，俯首听从，惟伍代总理坚不副署。命令拟就，送至李经议副署，李不可；转而请段祺瑞、范源濂，均被拒绝。时期已迫，无已，乃以阁员外之江朝宗当之。中华民国之国会，遂于六年六月十二日再夭一次。兹将关于解散国会之命令电文，并志于次，俾知当时之无可如何，婉转马前之情状也。

六月十二日大总统令云："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销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大总统电云："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议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鲜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元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论，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骤然引退，立起兵端，匪独国体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始于干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忍痛，内疚神明。所有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勿食言。黎元洪文。"

江朝宗声明副署命令电："万急。冯副总统、督军、省长、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各报馆鉴：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改选国会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江朝宗叩文。"

督军独立与李内阁 此番各督军之独立，表面为国会，骨子里无非为内阁问题。国会明令解散之后，千呼万唤不出来之李九，即附张大辫子之骥尾入都，实行组阁。各督军之意向，以李非北洋系统，群起反对，有主张拥徐者，有主张拥段者，有主张拥王者，最离奇者，则如张怀芝之主张田〔文烈〕内阁，而交通系则有主张梁〔士诒〕内阁者。李老九初以为得大辫子为护符，即可压服各督军，威吓各政党，实行辫子军之副官内阁，不料弄巧成拙，四面受敌。北京晨钟报载，张勋致倪嗣冲函谓，仲轩此次来京，非我请来，他自要来，我并不一定要仲轩组阁云云。是张之扶持，甚不可靠。幸王聘卿始终相助，力任疏通，始于六月二十四日登台就职。至其阁员之分配，初拟仿熊希龄办法，延揽耆硕时贤，组织第一流内阁，张啬夫、赵次珊等皆预选。迭电征召，皆不允来，甚有将原电璧回者。无已，以第二流人物当之。配置尚未妥当，角色尚未来齐，而大辫子于三十日夜，扳转面孔，悍然复辟。李九无奈，卷起行李，仍回天津。数年来之总理瘾，获过七日，亦不幸中之幸也。

督军独立与复辟 各督军独立之时，天津总参谋处本为复辟之预备。但复辟派别各各不同，有虚君共和说，有徐东海摄政说，有袁克定说，因种种原因，暂以中止。迨张勋以北洋派老大哥资格，武装入都，名为主持内阁，办理善后。至二十七日，康有为北来。三十日夜，张即召集遗老及军警要人开秘密会议，决定举行复辟，即同入清宫，接洽一切。一面推江朝宗、刘廷琛、王士珍、陈宝琛叩公府门；总统接见，江等即出代黎写具之还政文书，逼令盖印；总统力拒之，然亦无法制止。七月一日清晨，清帝溥仪以上谕宣布，改正朔为宣统九年，一切用人行政等制度，一从宣统初年名称，授张勋为内阁议政大臣，其余附和诸人，各授职有差。段祺瑞一闻此信，连夜派靳云鹏运动山东军官反对复辟，一面派人向倪嗣冲接洽，次日，即亲至马厂。李长泰与段即系同学，感情甚好，见面之下，情不能却。惟张怀芝不赞成，乃运动张怀芝之弟，由弟疏通其兄。而倪处回信，要求只讨张勋一人，不能牵涉他人；段允其要求，始能在马厂号召。去年热心称臣之段芝贵，亦挺枪出马，恢复共和，可谓滑稽之极。此次复辟，前后十日，即消灭无余，惟清帝溥仪，依然高拱深宫；但张勋逃入荷兰使馆，牺牲一安徽督军已耳。

复辟后之中央政府 张勋复辟，黎总统避入日本使署，不能执行职务，由冯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就职于南京。段祺瑞亦乘时出为总理，设国务院办事处于天津，研究、交通两系出为阁员。伍外交总长、程海军总长，因首都陷入贼巢，携印来沪，段氏忌之，亟予一律免官。盖程不附段，伍曾副署免段者也。

复辟之大总统印 大总统被逼出府，所有总统印信，交由侍从武官丁槐将军保管。京津多故，丁将军即携印来沪，寓客利西饭店，冯、段索印之使，络绎于途。丁以此项印信，系黎亲交，必须黎有亲笔书函，嘱交某处，即交某处。段意必交至国务院而后快，着人持黎总统寒电送交国务院云云。丁调查电局，无此寒电，不敢遽交，又以冯代总统，现在南京，何以不可径交南京代总统，须绕越送交国务院，益滋疑惑。段以与丁交涉不得要领，即控由公解，于七月二十日午后，由厅出单，将丁将军并印信一并提至公厅，转解护军使署，径行解京。

（原载《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出版）

护法之役

邹 鲁

一 总理南下护法

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总理率海军南下护法，因国会为张勋迫黎元洪而解散也。

自洪宪告终，黎元洪复任总统，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谷钟秀为农商总长，程壁光为海军总长，陆军总长则段自兼。是次阁员，各党均有，因洪宪之役，各党一致声讨，当然生此结果。时段系怀专断，以唐绍仪当系国民党党员，又为北方官僚前辈，乃嗾人反对。唐至天津，乃不愿就职，折返上海。外交总长几经曲折，始由伍廷芳继。嗣段因事与黎元洪忤，府院又发生意见。内务部孙洪伊复与段不睦，段祺瑞之信用，因之失堕。时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系段亲信，段之主张及一切行为，多出其手。徐因欲固段内阁，阴结各省督军。张勋利其机，乃在徐州迭开会议，谋为不轨。虽众议院邹鲁提案查办，莫如之何。会参战问题发生，段欲对外见好列强，对内练兵自固，惟恐不能通过国会，乃于四月十五日，假军事会议之名，遍召附己督军来京，实则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并声言须俟国会完全通过对德参与宣战案，始离京。时人谓之"督军团"。及众议院提出对德宣战案之日，段系先买乞丐流氓无数，名为"公民团"，包围众议院，指挥者均高级军官，身佩国务院徽章。及议员陆续到院，"公民团"在院外殴伤议员至二十余名之多以示威，警察不敢制止。议员大愤，开议先电段出席质问。段至，群质问"公民团"何来？殴打议员何意？高级军官指挥何事？段词穷。众怒，声势汹汹，段由台后而去。中外皆非难内阁。阁员谷钟秀即日辞职，其余张耀曾，程壁光、陈锦涛、范源濂等各阁员，均先后因此事辞职。督军团因羞成怒，乃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声言誓死不下解散国会令，并以内阁只存段氏一人，于五月二十二日，乃免段氏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兼代国务总理，以张士钰代陆军总长，以王士珍为京津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副之。段悻悻通电否认，谓："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等语。各督军承此意旨，纷回各省。六月二十九日，安徽省长倪嗣冲据安徽宣告独立，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师长张敬尧、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师长范国璋、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湖北督军王占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先后响应。倪嗣冲复命其侄倪毓芬为北伐司令，率兵直迫丰台，曹锟等亦各以兵来合，设总参谋处于天津，以指挥各军，并拟组临时政府。惟程壁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海军抵沪，备国家缓急。黎时欲借张勋抗段，电召率兵进京。张勋正如所计，即以解散国会为条件，黎竟允许，伍廷芳卒坚持不肯副署。六月十二日，黎乃以

步军统领江朝宗副署，下解散国会之令。总理乃以护法号召全国，西南各省，毅然响应。七月一日，张勋、康有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自马厂率师平之。依然自任内阁总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但仍然蔑法自行。总理以段之平定复辟也，电其拥护约法，诛锄叛逆。其文如左：（略）

段得电不省悟。总理以段之始终毁法也。于七月十七日，亲率海军南下护法。粤省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迎之黄埔江岸，在黄埔公园开欢迎会。总理乃演说护法之旨如左：

兄弟前十余年，以共和政体号召同胞，多所未喻。为时弥久，始为世界新思潮所鼓荡，国人皆晓然于共和之真谛。于是东方之大共和国，竟以告成。其中得督军、省长之力，厥功甚巨。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绩似殊无足观。而所以影响于世界为力之伟且大，真令人不可思议。世界中有最腐败之国家，最强大之国家，最不易受外潮激动之国家，其执政诸人威力之猛，积数百年如一日，试思如是国家，即小小改革，已较他人为难，而况议及政体。今竟一旦忽然突然将牢不可破之专制国，而成立一新共和国，与中国作佳邻焉，此俄罗斯之政变，为世界一大事件，人人所知也。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俄罗斯之顽固腐败，欧洲文化不能改易之。国人志士，掷无数头颅，而不能改易，以中国确立共和故，而举数十朝之帝政，仅三数日之变动，推翻无阻力焉，中国为之也。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能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在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鄙人密察大势，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无所贯彻其救国救民之宗旨。迭次与程总长磋商，得海军全数效忠共和。惟是，海军必有根据地，上海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浙江、福建亦然，只有以广东为海军策应，然后一切大计划，可以发展。鄙人今日所望于诸公者，即日联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即在粤招集国会，然后请黎大总统来粤执行职务。鄙人前商程总长，已派出舰二艘，在北京护送黎大总统来南方就职。日本公使以京、津一带，多为叛军布满，恐黎大总统一出使馆门，外来之暴力，难免有些危险，徐图设万全之法，乃奉送黎大总统出京。现两舰仍在秦皇岛候，大约吾人在广东组织妥善后，黎大总统即能来矣。此固国家兴废关头。共和存亡机轴。望诸公同心合力做去，即日发电，招齐舰队及议员等来粤，组织政府。共和国家之总枢，全在国会，国会所在之地，即为国家政府所在之地云云。

十九日，总理电请国会议员择地开会文云：（略）

二　国会举行非常会议

自总理率海军南下，伍廷芳、章炳麟、唐绍仪先后来粤。自总理电请国会择地开会后，议员至粤者复日多。总理于八月十八日宴议员于黄埔公园，凡一百三十余人。金谓段据北京政府，力向护法各省用兵，对外复发布对德宣战，我人内为护法各省之团结，外为各国外交，非组织政府不可。人数虽尚未足法定人数，惟值非常事变，可先开非常会议，组织政府，以资应付。国会议员乃于十九日发出通电如左：

民国不幸，祸患频仍，倪逆称兵，国会被毁；张贼复辟，国体动摇。造乱之徒，

乘机窃政，托名讨贼，推翻约法，擅立政府，易置总统，执法以绳，厥罪为均。又复迭逞狡谋，围湘窥蜀，输兵南下，其势骎骎，凭借北洋，压制全国，充类至尽，吾民宁有噍类之存！所幸诸公独持正义，兴师讨贼，信誓在人，救我黔黎，定兹国难，公等之责，吾民之望也。同人等昔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唯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荷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用，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区区之意，如斯而已。夙谂公等护法心殷，尚望时赐明教，用匡不逮。果利于国，同人等靡不乐从之也。谨此奉闻。

三　组织军政府

二十五日，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讨论组织政府事。三十日，将军政府组织大纲逐条通过。其条文如下：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第二条　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均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条　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

第四条　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第五条　大元帅有事故不能视事时，由首选出之元帅代行其职权。

第六条　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元帅得兼任其他职务。

第七条　军政府设立各部如左：

（一）外交部，

（二）内政部，

（三）财政部，

（四）陆军部，

（五）海军部，

（六）交通部。

第八条　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

前项选举，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但遇总长缺位，未经选举以前，大元帅得为署理之任命。

第九条　各总长辅助大元帅执行职务。

第十条　元帅府及各部之组织，以条例定之。

第十一条　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者任之。

凡有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关系者，依前项之规定。

第十二条　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止。

第十三条　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九月一日，非常国会开会，依大纲选举海陆军大元帅。议员出席者九十一人，用无记名

投票，结果，总理得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次日，再投票选举元帅，结果，陆荣廷得七十六票，唐继尧得九十三票，当选为元帅。非常国会于是致大元帅书曰：

民国不造，倪、张倡逆，国会解散，大法扫地，以启清廷复辟之变。段祺瑞与张勋，同恶相倾，迭为起灭，废清斯复，而大总统亦被废斥，国法圮绝，民无所依。景濂等以为救拯焚溺，不可格以恒轨，用是依准法国前例，开非常会议于广州。佥谓大盗移国，非武力不能制治，西南各省与海军第一舰队，兵力雄厚，士心效顺，而部曲散漫，未有统帅，殊不足以取齐一之效。即于六年八月三十日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九月一日，投票选举，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造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除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总理接书，即致誓词于非常国会。词曰：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叛换，频烦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日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义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所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惟国会诸君实匡救之。

九月十日，总理就大元帅职。先是总理及国会议员均电请黎元洪南下。黎恇怯不敢来。至是，国会议员乃依军政府大纲，选出大元帅。总理于是日由黄埔乘军舰抵广州市，至非常国会，行就职礼，并发宣言如左：（略）是日国会并选举各部总长，由大元帅特任之。军政府遂以成立。以黄埔公园为军政府。国会所举定者六部，计：

财政　唐绍仪，
外交　伍廷芳，
内务　孙洪伊，
陆军　张开儒，
海军　程璧光，
交通　胡汉民。

十八日，军府以对德宣战案，咨询国会。国会议决答复。军政府因于二十六日，发出对德宣战之布告如左：（略）

当复辟事平，冯国璋、段祺瑞先后入京。西南陆荣廷等，本因要求不遂而抗段，非真为护法也。此时乃承认冯为大总统，不承认段为国务总理，冀冯为转圜之余地。冯为直隶人，段为安徽人同入政府，各欲扩张势力。段乘对德宣战，兵力财力操纵在手，对护法各省，主张兵力解决。及傅良佐在湖南为湘、粤、桂联军所逐，湖北黎天才等又据荆州、襄阳以独立，段更欲逞兵力。冯扼之，阴使直系武人主张言和。于是北军二十八师师长王汝贤，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等，纷请停战。段乃辞职。冯国璋以王士珍为继，乃唱和议。十一月十九日，总理乃通电全国，谓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无磋商余地。其文如左：（略）

无何，督军团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直隶曹锟及奉天、黑龙江、陕西、山西、福建、浙江各督军代表，复在天津开议，主张向护法各省作战。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冯国璋下令促

战。李纯同时宣布任调人之责。

总理以电复李纯。电文如下：

顷奉三十一日电，语长心重，读之慨然。此次战衅重开，罪在北京当局无悔祸之诚，故和平之声甫唱，旋即躬为戎首。西南为自卫计，不得不为相当之应付，致垂成之局复败，言之可为痛心。文与西南将帅切望和平之心，始终如一，所主张者，只废除一切不法命令，回复约法效力与国会，以求永久之保障。国会既能完全行使职权，一切纠纷，不难依法解决。事至简易，何惮不为。若为之而有所要求，不肯罢兵者，此则逆吏叛卒，名既不正，人人得而讨之者也。执事忧国恤民，力任和平之责，文所钦佩。幸始终主持，敷布仁风，克销兵气，则国民拜赐无穷矣。专此布复，不尽悃忱。

自冯之促战令下，并派曹锟、吴佩孚、张敬尧南下，进攻荆州、襄阳、岳阳等处，总理乃通告全国曰：

近日迭接长沙谭联军总司令来电，岳州程总司令江电，称敌军分遣悍将，进攻岳阳，相迫日亟，忍无可忍等语，读之慨然。此次各省义军兴师护法，目的为拥护国法，恢复约法效力。职在卫国，势非得已。故自南京李督军等一再倡议和之议，即约各方按兵相待，至于再三。以为国法倘能有效，则一切问题，皆可待之法律解决，更无多求。无如非法政府始终弁髦大法，毫无悔祸之诚，现且公然宣布伪国会组织法，及伪参众两院选举法，重袭袁氏造法故智，积极违法。颠复国宪，厥有常刑，凡我国民，人人得而致讨。乃逆军犹敢逞其暴力，迭行南犯，虽涂炭生灵牺牲国家而不惜。今复启衅岳州，重兵相陵，和平已属绝望，衅非我启，罪有所归。我义军将士，实迫处此，不能不谋正当之对待。尚望本厥初志，一致进讨，务完成护法之天职，非至约法有效，国会恢复，则文更万无卸责之余地。必义军能贯彻护法之志，民国始有克臻奠定之望，公理所在，即民意所向，师直为壮，气自百倍。幸共抒伟略，协谋进行，克成国家之大业。民国前途，实式赖之。

及曹部吴佩孚攻破荆、襄及湖南衡山等处，乃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副之。段之主战说胜利，一面利用参战督办名义，迭向日本借得款项，复由徐树铮联合奉军入关，以为声援。冯惧，乃于三月二十三日，复段国务总理之职，总理是时通告各友邦，其书如左：

中华民国为通告事：民国不幸，叛督称兵，陈师近畿，胁迫元首，于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遂以非法命令解散国会；继以复辟之变，黎大总统出走；而中华民国根据法律由国会组织之政府，忽然中断。各省兴师讨逆，兵未及发，而段祺瑞乘机窃踞北京，自称总理。黎大总统尚在北京，并未向国会辞职，亦非不能视事，乃不迎复位，而擅召冯国璋于南京，使以副总统而代理大总统。国之重器，私相授受，又不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而任意指派数千人，附会职权终止之临时参议院〔参照临时约法第二十九条〕。坏法乱纪，予智自雄，泯泯棼棼，莫知底止：洵为袁世凯称帝以后，以武力乱国，实行武人专制第二之奇变矣。

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中华民国元年临时约法〔以后简称约法〕为民国最高之法律，在宪法未施行以前，其效力与宪法等〔参照约法第五十四条〕。凡为民国之人，皆当遵守无敢或违者也。按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职

权，国会亦无可解散之规定。绳诸命令抵触法律，则命令无效之通例，六年六月十二非法命令，与约法抵触，当然无效。国会虽被阻遏，不能在北京继续开会，然国会之本体依然存在，此民国全国人民所承认为应恢复国会原状之理由也。

本届国会，厥为民国第一次国会，中经袁世凯、段祺瑞两次以武力阻遏开会，不能行使职权，议员任期实未中止，此又国会继续开会，仍应召集旧议员集会之理由也。

国人痛大法之陵替，惧民国之沦亡，一致要求取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俾国会继续开会，而国之大事，一依法律解决。乃北京非法政府置若罔闻，而非法之代理总统，非法之国务员，叛乱之督军团，以及非法之参预国政之私人，公然以北洋派号召，视民国为私有，思以武力征服全国。非法缔结借外债及军火之契约〔参照约法之第十九条四款第三十五项〕，以逞其残杀国人之毒焰，乃对川、湘首先用兵。粤、桂、滇、黔不得已而起护法之军，宣布自立，海军舰队亦宣言以恢复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之事为救国之要图。国无政治之中心，护法讨逆之功，莫由建树，于是国会应广东省议会之要求，遂开非常会议于广州。于民国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国会非常会议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爰为自主各省组织一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之军政府〔参照本纲第一条〕。自时厥后，自主各省，莫不宣言护法。川、湘逆军，次第荡平，其他各省，亦闻风倾向。凡我国内及国外之人，乃莫不晓然护法战争之大义，而本军政府之职志，遂以大白。

北京非法政府，曾不悔祸，虽长、岳之战，北方慕义军人，不甘为私人效命，相率退却，又重以长江之督军之联名，要求暂免段祺瑞之职。而段祺瑞方且利用特殊参战之督办名义，阳托对外参战，实行对内用兵，不惜欺蒙协约各国，而自亏人格。乃冯国璋者，又思自树势力，一面以停战议和，缓义军之进攻武汉，一面命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南下，积极备战，仇视义军，行同鬼蜮(参照冯国璋青电)。此和议之所不终，而复出于战也。

推冯、段各具私心，遂生内讧，段派督军会议再现，而张作霖、徐树铮领兵入关，自由行动。段派叛督之横暴，虽段莫能制。长此不改，民国将成为无法纪、无政府、无人道之国。一任不法之武人，割据称雄，分崩离析，其将何以为国。今段祺瑞复任非法总理，退怂长、岳，纵兵烧杀焚掳，绝无和议之可言。此则本军政府因护法而救国救民，不得已而用兵之苦衷，当为环球所共谅者也。

国家不可一日无政府，国会非常会议鉴于现以暴力强据北京者，为非法政府，是以有军政府之组织。故军政府于约法未恢复前，实为行中华民国行政权之唯一政府（参照军政府组织大纲第三条）。易言之，即为约法上行使统治权执存亡绝续之机关（参照同大纲第十二条）。现在本军政府行使昔时北京政府之职权，与昔时北京政府无异，并非新发生之别一建设。诚恐友邦各国，尚未了解。自应即日通告各友邦、各邻国，并郑重声明本军政府切实履行中华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国会解散前，中华民国与各国所缔结之国际及其他一切条约，并承认各有约国人在中华民国内享有条约所及，依国法并成例准许之一切权利。惟北京非法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之一切契约借款及其他责任，本军政府概不承认。谨布于各国友邦驻华公使，请烦转达于贵国政府。尚望维持正义，承认本军政府，共敦睦谊，永固邦交，实所厚幸。谨此通告。

总理早知冯、段之不悔祸，故令陈炯明率粤军援闽。而此援闽粤军之由来，则总理六年率海军南下，广东省长朱庆澜以亲军二十营委陈为司令，俾便编练，改为护法北伐之师。及朱去粤，令改为海军陆战队，使隶属海军。乃桂系粤督陈炳焜以力阻而不与。粤人大愤。无何，段嗾莫擎宇叛变潮、梅，进军东江，总理任邹鲁为潮、梅军总司令以讨之。邹部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迭胜之于铁桥、蓝关。莫擎宇之精锐尽失。桂将沈鸿英以潮、梅指日可定，乃诱杀金，并夺其师。粤人更愤。胡汉民屡与陆荣廷言，须将朱所拨二十营仍归陈，惩沈还金枪械，以平粤人之气。程璧光往平塘晤陆，尤力言二十营仍非归陈统率不可。卒之，陈炳焜因各方不平，去粤，陆使莫荣新继任粤督，此二十营始得归陈。总理即命陈率以援闽，名曰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以邓鉴、许崇智等助之。是时党员多集中粤军，故革命精神至充满，径向闽南直进，不久而得漳州，闽南悉入护法范围，卒以饷械为桂系牵制，不能再向前发展。

段复职，原拟向南奋力作战，乃令吴佩孚进攻。吴以段为皖系，乃通款西南，按兵衡山不动。值援闽、援湘各军正进行中，讵于二月二十六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突在海珠对岸，为人所狙击。此案发生，系关系广东省长及军政府问题。广东护法之初，其省长原为朱庆澜。桂系欲于兵权之外，更揽政权也，乃借口朱为北方官僚，不可在护法旗帜下任省长；并由陆荣廷等强要胡汉民出任省长；胡虽力却，朱闻此讯乃去。桂系遂自任李耀汉为省长，俾便指挥如意。又可以粤人为省长，塞人口。但李出身绿林，粤人多不满。桂系乃又以省长及督军强要程，程亦力拒，故程虽始终拥护军政府，犹能相安。忽北方所派晤陆荣廷之王芝祥，由南宁返北复命，道经梧时，电告莫荣新、李烈钧，谓陆意拟以程任督军。龙济光由琼崖出寇南路，拟以莫率兵讨之。粤省议会及粤籍军官闻之，纷纷通电请即实现。桂系大骇，程仍力辞。桂转以省长多方劝说，似甚诚意。程意似转，而二十六日，程由海珠乘艇过海对岸码头，遂为人出枪突击立毙，海军改由林葆怿任总长，拥护军政府之人，为弱一个。不久，而改组军政府之事发生。

总理之南下护法，及组织军政府，其力量之最著者为海军与国会。总理复争得盐款及关余，为海军国会经费，于粤收支有益无损。故桂系虽非诚意护法及服从军政府，亦可借海军国会以壮声威，而饰外观。至朱庆澜交陈炯明所统之二十营，则必夺之而后安。及莫擎宇叛变，总理命邹鲁组织潮梅军，莫擎宇将平，桂将沈鸿英即诱杀潮梅军司令金国治而消灭其军，盖不欲军政府有直属陆军也。至万不得已，始给二十营与陈炯明，使出以援闽，而对于军政府之卫队排连长，及新募卫士数十人，则加以土匪之名，拘捕枪毙。军政府派人往保，亦不允。时已为莫荣新督粤时矣。总理愤其悍横，乃于七年一月三日，令同安、豫章两军舰驶至中流砥柱炮台，亲督开炮轰击督军署以示惩。终夜炮声不绝。莫知理屈，并知海军、滇军、粤军皆不直所为，遂不敢还炮。自粤军开往攻闽，势力虽日发展，而在粤可靠者只有海军及滇军，四川熊克武、石青阳、杨庶堪、湖南林修梅等，势力远莫能及。张义安、胡景翼、于右任在陕西三原举义者，声势虽大，联络更难。故海军总长程光璧被刺后，桂系利用政学会播弄国会，以改组军政府矣。

四　军政府改组

国会南来，本总理之提倡及号召，故欲从速制成宪法，以固国基。但自非常国会召开宪法会议，而宪法第二读会将告竣时，桂系与政学系惧宪法成立，与北方调和无望也，乃使

其所属及接近之议员，阴阻宪法之完成。陆荣廷与唐继尧于军政府成立之初，即不就元帅职，对段祺瑞虽反对，对冯国璋仍奉为大总统，屡欲牺牲护法以议和，碍于军政府护法主张之力；另欲组织各省联合会以抗军政府，又苦毫无根据。至是乃由政学会联结吴景濂，拟以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将元帅制改为总裁制。总理乃于七年五月四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职，并通电如下：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变，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使冯、段两氏果有悔祸之心，虽争个人权利，苟能撤销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使国会继续开会，则与一言兴邦何异，夫谁得而议其后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国，遂致衅起川、湘，而全国之统一以破。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以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泯泯棼棼，莫知底止。文不忍坐视正义之弗伸，爰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设护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决议。由是发生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于中华民国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虽自知不能胜此重任，然国家多难，匹夫有责，文忝在首造民国之列，不能视大法之沦亡而不救。是用不避险艰，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使吾国及友邦之人咸晓然于军政府之职志；至于成败利钝，难以逆睹，凡以存民国人民之正气于天壤间而已。自是以后，粤、桂、黔、湘、川又莫不一致宣言护法，始以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为共同之目的，于地方之争，一变而为国会之争。军政府虽无尺地之凭借，而此志已范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来附义者，尚复在所多有，均在酝酿发难之中，不得不谓为护法之已告一成功矣。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焉口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然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所以隐辱负重，以迄于今者，良以任责无人，非得已也。凡文之所以谋各省尊重非常会议为护法之中心者，无所不至。今自岳、长屡败以来，各省始悟，分则俱伤，合则攸美，然后知有组织统一机关之必要，且知有以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图之，犹为未晚。然文之力固已尽于是矣。计自提取盐税存款以充国会正式会议经费，预定六月十二日为开会之期。文之效忠于国会义务，本已将尽。乃者非常会议议决改组军政府，以应各省之要求，今而后，庶可资群策群力，以昭护法之大业，而告厥成功，岂非民国之幸。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既已如是，庶乎廑告无罪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心，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之职。谨略述颠末，向非常会议辞大元帅之职。幸惟公鉴。

军政府改设总裁制，非常国会举出总理及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怿、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成立于七月五日，总理知其改组之旨，系全为议和非为护法也，不自参加，并不发表意见。唐绍仪亦在上海。军政府改组已定，又发生广东省长问题。盖是时广东省长已由桂系易李耀汉而任翟汪。翟为李部，亦出身绿林者，今桂系因政学系有消灭宪法会议及改组军政府功，欲以省长报之，乃又拟易翟。粤人对于翟固甚反

对，但对于政学系亦不赞成，乃连开公民大会，拥护伍廷芳为省长。翟亦誓死不交印与桂系。桂系一面贿翟将印交出，一面用武力拘殴公民团代表，而以省长交广肇罗道尹张锦芳代，未几，卒属诸政学系之杨永泰。而德高望重之伍廷芳以其属于本党，终为桂系所排。

（选自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1947年上海增订版）

蓝辛石井协定

王芸生

（选自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世界大战期间，日、美帝国主义乘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机会，在中国扩大其侵略势力。它们为了争夺我国，冲突得很厉害；中国军阀混战，亦即帝国主义争夺我国的冲突的一种表现，其中主要是由日、美帝国主义支持着进行的，北洋军阀的主要派系是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和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的靠山主要是英、美帝国主义，皖系的靠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日、美帝国主义为了共同宰割中国，奴役中国人民，曾谋取妥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蓝辛石井协定即谋取妥协的明文。但日、美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又把这一协定废除了。从这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日、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狰狞面貌与它们相互间的冲突。）

第一节　石井之东渡

日本既以与英、法、俄、意四国之谅解，预占将来媾和会议中之脚步。以处分山东及南洋群岛等问题；旋美国与中国先后对德宣战，外交形势显然已有相当变化；日本为使其远东地位不感动摇，势有更取得美国谅解之必要。日本政府一九一七年秋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东渡，与美国政府交换关于中国问题之意见。石井于九月初抵华盛顿，首与美总统威尔逊晤谈。威尔逊表示，美国所望者在对中国诚实施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而事实上列强在中国各地各自划分所谓势力范围，为此主义（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威胁，殊为遗憾。石井当谓，势力范围实德、俄两国在山东及满洲所首先主张，虽对海约翰氏提倡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表示赞成，而其真面目不啻门户闭锁机会不均等，此最矛盾者。日本则根据对俄战争之结果，取得在满洲之地位，然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仍恪守勿违云。石井以此一段谈话而开美、日交涉之端绪。

此时石井之个人意见，颇以势力范围之保存为时代错误之现象，徒惹国际争议，不如早日废止之为愈。彼以为日本距离中国最近，日本货物以一二昼夜之时间即可运达中国市场；反之，欧美各国产物，须一二个月始达，日本自然竞胜而占第一位。故拟因威尔逊之意，撤废势力范围，于此点先使美方满足，然后于他点使美国同意日本之主张。石井曾以此意电东京请训。日外相本野付诸外交调查会讨论，议论纷纷，大致均不赞成撤废势力范围。在此时期，石井已与美国国务卿蓝辛（Robcrt Lansing）开始讨论中国问题。

蓝辛、石井初次会商时，石井首谓今当向共同之敌从事共同战争之际，最宜相互注意敌人之离间，若移民问题及中国问题，均足为离间日、美之题材。蓝辛谓，余意亦然。余耳中常有此类之宣传，谓现当欧洲各国赌存亡之际，日本在东洋舞其胜手，在中国筑不拔之优越地位，如此对于中国之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将成有名无实云云。当此时机，美、

日两国政府若以协定共同宣言，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足以预防敌方之恶宣传。石井谓，此案不足为现状之对策，日、美两国已有罗脱高平协定（一九〇八年）揭示中国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且英、日同盟曾表此意，日法、日俄两协定亦均论及。今以同一事项，再行宣言，殊无意义，且将招致日本国民之误解。余以为日、美共同宣言，其意义应与上述事项异趣，而加入新事项。依日本之见地，日本之于中国，尤其接壤地域，较之他国据有优越利益，犹美国之于墨西哥及中美诸国然，此本天赋地势之实在状态。彼之门罗主义如为他国所承认，若上述之实在状态，不亦应为他国所承认乎。日本在中国之特殊利益，日、英盟约首予承认，日法、日俄等协定继之。若就贵案，再言中国之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同时再将上述之中、日关系声明，发表一宣言，则第一断绝尊见所及之宣传祸根，第二预防日本国论之误解，并收阐明远东实在事态之效果。石井以此一席话说明其根本任务。蓝辛以此谈话性质重大，遂约互相考虑，不日再会而别。

石井既以单刀直入之势，论及此段交涉之核心，在美国方面颇引起相当之踌躇。石井遂于此时赴纽约游历，借各界欢迎之机会，盛事宣传日本之对华政策，一面揄扬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一面以婉曲之词旨，宣传亚细亚门罗主义。彼在纽约逗留一星期，及再返华盛顿，威尔逊之态度显然好转，蓝辛亦与之再开交涉，进行实际之研究。关于石井提出之所谓“卓越利益”字样，石井主张用 Paramount interest 两字以描出日本之对华利益。谓此字句始自美国前国务卿西瓦德（William Henry Seward），并曾以此字句形容美国对墨西哥之利益。蓝辛对此字句，坚不承诺。日方又提出“特殊利益及势力”（Special interest and influence）字样，以代替“卓越利益”。经多方折冲，结局省去“及势力”，写成“特殊利益”。蓝辛所以于此文句再三致意者，以第二次英、日盟约第三条即有“Japan having paramount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interest in Korea”字句，其后朝鲜卒为日本并吞。因有此嫌，故断然反对。此层争执，既经妥协，则蓝辛石井协定成矣。（参阅外交余录，页一三六至一四六）

第二节　蓝辛石井换文

十一月二日，蓝辛石井协定以换文方式成立。蓝辛照会石井曰：

兹谨奉书阁下。敬陈者：贵我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均感有利害之诸问题，本官近与阁下曾经会谈，意见既经一致，且均明白了解，故兹得有通报阁下之光荣。阁下及本官均以欲一扫近来往往流布有害之风说起见，当将两国政府关于中国之所怀抱之所希望及其意向，再行公然宣言，方为得策。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中国之领土主权，当然完全存在。合众国政府以日本国其于地理的位置之结果，有如右之特殊利益。日本并无不利他国之通商与偏颇之待遇，及蔑视条约上中国从来许与他国商业上权利之意。盖日本国政府累次之保障全然可以信赖也。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声明，毫无侵害中国之独立及侵害保全领土之目的。且声明两国政府常于中国维持所谓开放门户又对商工业机会均等之主义。又凡特殊之权利，又特关侵害中国之独立及领土之保全，或有防碍列国臣民或人民商业上及工业上完全享有均等之机会者，两国政府不问何国政府，有是，

均得反对，互相声明。本官以贵我两方意见既已一致，明白了解，故对前记各项，希望阁下之确认。兹特谨向阁下表其敬意。敬具。

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华盛顿国务院罗波德·蓝辛。

〔外交部公表文〕

同日，石井照复蓝辛曰：

兹谨奉复阁下。敬陈者：关于中华民国，贵我两国政府共感有利害之诸问题。阁下近与本使会谈，意见既经一致，且均明白了解，本日承以华翰通报，拜悉一是。兹遵本国政府之训令，奉复阁下。左记一切，均得了解确认，此诚本使之欣幸。阁下及本官均以欲一扫近来往往流布有害之风说起见，当将两国政府关于中国之所怀抱之所希望及其意向，再行公然宣言，方为得策。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中国之领土主权，当然完全存在。合众国政府以日本国其于地理的位置之结果，有如右之特殊利益。日本并无不利他国之通商与偏颇之待遇，及蔑视条约上中国从来许与他国商业上权利之意。盖日本国政府累次之保障，全然可以信赖也。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声明，毫无侵害中国之独立及侵害保全领土之目的。且声明两国政府常于中国维持所谓开放门户，又对商工业机会均等之主义。又凡特殊之权利，又特关侵害中国之独立及领土之保全，或有防碍列国臣民或人民商业上及工业上完全享有均等之机会者，两国政府不问何国政府，有是，均得反对，互相声明。本使兹向阁下谨表敬意。敬具。

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在华盛顿，日本帝国大使馆，特派特命全权大使子爵石井菊次郎。〔同上〕

蓝辛石井协定之成立，为日本外交之一胜利，盖不啻为美国承认日本对华特殊地位之文证。此项换文，显与门户开放主义相矛盾，至华盛顿会议时宣告废弃，而日本在精神上固犹坚持其对华特殊地位之存在也。

第三节　日美解释之不同

日、美两方，对蓝辛石井协定之解释，显有不同。日本将“特殊利益”四字解作“特殊地位”，美国则认为只限于经济及商业方面，不涉及政治方面。此两种不同之见解，可于日、美两国驻北京公使致中国政府之照会见之。日本公使林权助先于十一月六日照会中国外交部。其略曰：

美国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之特别地位，因中、日二国土地接近之故，尤以彼领土毗连之部分为特甚。惟中国之领土完全与政治独立，仍不损伤。美国政府深信日本屡次之保证，对于他国在华商业不加歧待。美、日二国重复声明，恪遵门户开放主义，反对任何国政府取得影响中国独立之特别权利云云。〔同上〕

此照会之外，并附有蓝辛石井换文之全文。八日，美国公使芮恩施亦将蓝石换文录送外交部，并附一照会。其略曰：

日本使团之莅美，发生讨论美、日两国在远东利益之机会。日本代表公然宣言，日本之政策，非是一种侵略政策，并言日本并无于商业上或间接利用其地理位

置所造成之特别关系。然则为德人所散布之外交疑云，业经扫除。美、日两国政府重复声明，彼此恪遵门户开放政策，重复拘束两国政府维持机会均等主义。任何国之臣民公民，于在华之商工业一律完全享受之。日本在中国之商工企业，曾因彼两国地理关系之故，显然对于他国臣民公民之同一企业占有某种利便；今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乘此良好机会，交换彼此对华关系意见。此项了解，业经正式交换公文声明，兹特将该项公文录送左右。在此等公文中之陈述，无须加以解释。其中不但重行声明门户开放政策，并且采用不干涉中国主权及领土完全之主义。此种主义，普通适用之，乃为永久国际和平所必要，诚如威尔逊总统所曾明白宣言者也。〔同上〕

此两照会最足见两国解释之不同。此后日、美两国迭作各种之宣传与辨解，其大旨均不外乎此。

第四节　中国之声明

九日，外交部照会美日两国公使，声明中国之立场，不受他国 交换文书之影响。其略曰：

近今日、美两国政府，为息止谣传起见，将对于中国之意旨在美京互换照会，并由驻北京日本公使将前项照会原文通告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为免除误会起见，自应及早声明，以表示中国政府之意旨如下：

中国政府对于各友邦，皆取公平平等之主义，故于各友邦基于条约所得之利益，无不一律尊重。即因领土接壤发生国家间特殊关系，亦专以中国条约所已规定者为限。并再声明，嗣后中国政府仍保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同上〕

中 日 军 事 协 定

（选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存北洋军阀档案。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各帝国主义企图联合向苏联进攻，日、美帝国主义都出兵侵犯西伯利亚。日本帝国主义更企图乘机侵占我国东北地域的全部领土和蒙古；一九一八年，即以中、日"共同防敌"为名，与北京政府（当时主要是日本走狗段祺瑞当权）订立中日军事协定，借此以攫取我国的领土与主权。关于中日军事协定的文件，有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明书、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及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明等多种，兹选录其主要者两件。）

一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基于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之结果，依据两国政府交换之文件，经两国军事当局互派委员，协定事项如下：

第一条 中、日两国陆军，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

第二条 关于协同军事行动，彼此两国所处之地位与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条 中、日两国当局，届基于本协定开始行动之时，对于各自本国军队及官民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当命令或训告，使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以期达成共同防敌之目的。

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日本军队须尊重中国主权及地方习惯，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第四条 为共同防敌，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俟战争终了时，即由中国境内一律撤退。

第五条 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

第六条 作战区域及作战上之任务，适应于共同防敌之目的，由两国军事当局，量各自本国之兵力，另协定之。

第七条 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为图协同动作之便利起见，应行左记事项：

一 关于直接作战上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

二 为图谋军事运动及运输补充敏活确实起见，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

三 关于作战上必要之建设，例如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应如何设备，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之。俟战事终了，凡临时之建设工程，均撤废之。

四 关于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两国应互相供给，其数量以不害各自本国所需要之范围为限。

五　在作战区域之内，关于军事卫生事项，应互相辅助，使无遗憾。

六　关于直接作战上之军事技术人员，如有互相辅助之必要时，经一方面之请求，应由他方辅助之，以供任使。

七　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关于谍报机关之通信联络，彼此互相辅助，图其便利。

八　协定共同之军事暗号。

本条件所列各项其须预先计划及应预先施行者，在作战未实行之前，另协定之。

第八条　为军事输送使用东清铁路之时，关于该铁路之指挥、保护、管理等，应尊重原来之条约；其输送方法，临时协定之。

第九条　本协定实行上所要详细事项，由中、日两国军事当局指定各当事者协定之。

第十条　本协定及附属本协定之详细事项，中、日两国均不公布，按照军事之秘密事项办理。

第十一条　本协定由中、日两国陆军代表者签名盖印，经各自本国政府之承认时，发生效力；其作战行动，俟适当之时机，经两国最高统率部商定开始之。

本协定及基于本协定所发生之各种细则，俟中、日两国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即失其效力。

第十二条　本协定以汉文及日本文各缮二份，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保有一份为证据。

中华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
大正七年五月十六日　于北京

中华民国陆军军事协商委员　委员长果威将军靳云鹏印　委员陆军中将童焕文印　委员陆军中将曲同丰印　委员陆军少将田书年印　委员陆军少将刘嗣荣印　委员陆军少将江寿祺印　委员陆军少将丁锦印　委员督办参战处参议刘崇杰印　委员陆军少将张济元印　委员陆军步兵上校陈鸿逵印　委员陆军步兵上校秦华印

日本帝国陆军军事协约委员　委员长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印　委员陆军少将宇垣一成印　委员陆军步兵中佐本庄繁印　委员陆军炮兵少佐川崎吉五郎印　委员陆军步兵大尉山田健三印

二　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

基于中、日军事协定第九条，中、日两国军事当局指定之各当事者，关于该协定第六条、第七条，现协定左列事项：

第一条　中、日两国各派遣其军之一部，对于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各取军事行动；其任务在救援捷克斯拉夫克军并排除德、奥两国及为之援助之势力。

期指挥之统一及协同圆满起见，行动于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官指挥之下。

为与自满州里方面行动于后贝加尔方面之军队互相策应起见，中国军队之一部，应于库伦至贝加尔湖方面行动。如中国于该方面希望日本军派遣兵力之一部，日本亦可派往，令属中国军司令官指挥之下。

此外中部蒙古以西之边境，应由中国自行巩固防备。

第二条　关于兵器及军需品之供给，虽紧急不得已之物品，可由前方司令官互相协定，

然其他之物品及原料之供给，则应由东京及北京最高补给机关互相交涉行之。

第三条　关于卫生业务，中国如有所希望，日本军应于力所能及之范围内，提供便利；将来情况进展，则关于病院及休养所之施设等，日本军亦须受中国之助力。

第四条　须由南满铁路输送之中国军队及其军需品，应由中国自行运至大连、营口或奉天，自此以后至长春之输送，由日本军担任之。

自库伦方面向贝加尔湖方面行动之中国军队，若希望日本军参加一部时，则该日本军队及其军需品，至大沽、秦皇岛或奉天，由日本军自行输送；自此以后之输送，由中国军担任之。

关于东清铁路之输送，应以东清铁路之当局当实施之任，而为与该当局交涉，并使中、日及捷克斯拉夫克各军输送之调度有方起见，中、日应设协同机关；但此项机关，将来联合国军队倘行动于此方面之时，该联军所要之人员，亦可参加。

第五条　关于联络职员之派遣，除交涉已定或正在交涉之外，前方司令部或将来更有必须互遣职员情事，应由东京与北京最高补给机关办理。如或另有情事，应再随时协议。

第六条　兵器及其他军需材料并原料之供给及两国运输军队，各应担任之输送等费用，均须给价，应随时或军事终了后核算给之。

第七条　本协定以汉文及日本文各缮二分，彼此对照签名盖印，各保有一分为证据。

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六日

大正七年九月六日

由经济上解释
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李　大　钊

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

人类生活的开幕，实以欧罗细亚为演奏的舞台。欧罗细亚就是欧亚两大陆的总称。在欧罗细亚的中央有一凸地，叫作Tableland。此地的山脉不是南北纵延的，乃是东西横亘的。因为有东西横亘的山脉，南北交通遂以阻隔，人类祖先的分布移动，遂分为南道和北道两条进路，人类的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露麻、印度、阿富汗尼士坦、俾而齐士坦、波斯、土耳其、埃及等，是南道文明的要路；蒙古、满州、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迭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地利亚、巴尔干半岛等，是北道文明的要路。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前者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

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在古代原人社会，经济上男女分业互助的要求，恐怕比性欲要求强些；所以家族团体所含经济的结合之性质，恐怕比血统的结合之性质多些。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

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沈沈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影响不少。

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沈静的大门。一六三五年顷，已竟有荷兰的商人到了日本，以后 Perry Harris 与 Lord Elgin 诸人相继东来，以其商业上的使命开拓东洋的门径，而日本，而中国，东洋农业本位的各国，都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日本国小地薄，人口又多，担不住这种压迫，首先起了变动，促成明治维新，采用了西洋的物质文明，产业上起了革命——如今还正在革命中——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不但可以自保，近来且有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势力了。日本的农业经济组织既经有了变动，欧洲的文明、思想又随着他的经济势力以俱来，思想界也就起了绝大的变动。近来 Democracy 的声音震荡全国，日本人夸为“国粹”之万世一系的皇统，也有动摇的势子，从前由中国传入的孔子伦理现在全失了效力了。

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的基础较深，虽然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经济上的变动却不能骤然表见出来。但中国人于有意无意间也似乎了解这工商经济的势力加于中国人生活上的压迫实在是厉害，所以极端仇视他们，排斥他们，不但排斥他们的人，并且排斥他们的器物。但看东西交通的初期，中国只是拒绝和他们通商，说他们科学上的发明是“奇技淫巧”，痛恨他们造的铁轨，把他投弃海中。义和团虽发于仇教的心理，而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

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然兴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但日本以新兴的工业国，骤起而与西洋各国为敌，终是不可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经济上发生的现象，就是过庶人口不能自由移动，海外华侨到处受人排斥虐待，国内居民的生活本据渐为外人所侵入——台湾、满蒙、山东、福建等尤甚——关税权为条约所束缚，适成一种“反保护制”。

外来的货物和出口的原料，课税极轻，而内地的货物反不能自由移动，这里一厘，那里一卡，几乎步步都是关税。于是国内产出的原料品以极低的税输出国外，而在国外制成的精制品以极低的税输入国内。国内的工业都是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那能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工业竞争呢？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在一国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社会的无产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的生产机关。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欧战期内，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只得转回故土。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寻不着工作的现象。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

中国的农业经济，即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一切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

第一、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为经济上受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力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 Democracy 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

第二、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关系问题、短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承继遗产权利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从前大家族制下断断不许发生、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的问题。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现在因为经济上的压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竟不能维持。而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他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已的负担，听他们去自己活动，自立生活了。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他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至于妇女，因为近代工业进步的结果，添出了很多宜于妇女的工作，也是助他们解放运动的一个原因。

欧洲中世也曾经过大家族制度的阶级，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受了痛切的打击；又加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工商勃兴，分业及交通机关发达的结果，大家族制度遂立就瓦解。新起的小家族制度，其中只包含一夫一妻及未成年的子女，如今因为产业进步、妇女劳动、儿童公育种种关系，崩解的气运将来也必然不远了。

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的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

总结以上的论点：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原载《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日出版）

青　　春

李　大　钊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人事万端，那堪回首，或则幽闺善怨，或则骚客工愁。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饯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而夙兴夜寐，不遑启处，亦当于千忙万迫之中，偷隙一盼，霁颜相向，领彼恋子之殷情，赠子之韶华，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其得永享青春之幸福与否，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如其有尽，纵有彭、聃之寿，甚且与宇宙齐，亦奚能许我以常享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无尽之宇宙竞进，又何不能之有？而宇宙之果否为无尽，当问宇宙之有无初终。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庄周有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云："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有耶，何以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而菌蛄独不知也？其果为无耶，又何以菌蛄虽不知，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以吾人之知，小于宇宙自然之知，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氏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遍，又复

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造物与吾皆无尽藏也。”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遽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今太阳本热常耗，以慧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冈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故大宇积热力，每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天地且有时而毁，况其间所包蕴之万物乎？漫云天地，究何所指，殊嫌茫漠，征实言之，有若地球。地球之有生命，已为地质学家所明证，惟今日之地球，为儿童地球乎？青年地球乎？丁壮地球乎？抑白首地球乎？此实未答之问也。苟犹在儿童或青年之期，前途自足乐观，游优乐土，来日方长，人生趣味益以浓厚，神志益以飞舞；即在丁壮之年，亦属元神盛涌，血气畅发之期，奋志前行，亦当勿懈；独至地球之寿，已臻白发之颓龄，则栖息其上之吾人，夜夜仰见死气沉沉之月球，徒借曜灵之末光，以示伤心之颜色于人寰，若以警告地球之终有死期也者，言念及此，能勿愀然。虽然，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虽明知未来一刹那之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毁，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未来一刹那之我，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丧哉！

复次，生于地球上之人类，其犹在青春乎，抑已臻白首乎？将来衰亡之顷，究与地球同时自然死灭乎，抑因地球温度激变，突与动植物共死灭乎？其或先兹事变，如个人若民族之死灭乎？斯亦难决之题也。生物学者之言曰：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自妇人畏葸，抱子而奔，始学立行，胸部暴露，必须被物以求遮卫，而人类遂有衣裳；又以播迁转徙，所携食物，易于腐败，而人类遂有火食。有衣裳而人类失其毛发矣，有火食而人类失其胃肠矣。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遐，浸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关枪四十二珊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有分工合作之都市生活，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

其新病。凡此种种，人类所以日响灭种之途者，若决江河，奔流莫遏，长此不已，劫焉可逃？此辈学者所由大声疾呼，布兹骇世听闻之噩耗，而冀以谋挽救之方也。宗教信士则从而反之，谓宇宙一切皆为神造，维护之任神自当之，吾人智能薄弱，惟托庇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如生物家言，是为蔑夷神之功德，影响所及，将驱人类入于悲观之途，圣智且尚无灵，人工又胡能阏，惟有瞑心自放，居于下流，荒亡日久，将为人心世道之忧矣。末俗浇漓，未始非为此说者阶之厉也。吾人宜坚信上帝有全知全能，虔心奉祷，罪患如山，亦能免矣。由前之说，固易流于悲观，而其足以警觉世人，俾知谋矫正背乎自然之生活，此其所长也。由后之说，虽足以坚人信仰之力，俾其灵魂得优游于永生之天国，而其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乃其所短也。吾人于此，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斯则人类之寿，虽在耄耋之年，而吾人苟奋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返于无尽青春之域，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𣡽然其不可纪矣。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只今屈指，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和兰，若比利时，若丹马，若瑞典，若那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其校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响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夫人寿之永，不过百年，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也。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未有不变色裂眦，怒其侮我之甚也。虽然，勿怒也。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巴尔干诸邦，则各谋离土自立，而为民族之运动，兵连祸结，干戈频兴，卒以酿今兹世界之大变焉。遥望喜马拉亚山之

巅，优见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引而弥长，是亦欲回其民族之青春也。吾华自辛亥首义，癸丑之役继之，喘息未安，风尘澒洞，又复倾动九服，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建国伊始，肇锡嘉名，实维中华。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图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各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中以后之历史，则以是为古代史之职，而别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更生回春为其中心之的也。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缯之历史也。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斯有后之开敷以续今之废落，即废落，即开敷，即开敷，即废落，终竟如是废落，终竟如是开敷。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宜有即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抑吾闻之化学家焉，土质虽腴，肥料虽多，耕种数载，地力必耗，砂土硬化，无能免也，将欲柔融之，俾再反于丰穰，惟有一种草木为能致之，为其能由空中吸收窒素肥料，注入土中而沃润之也。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胡以至今徒有万木秋声、萧萧落叶之悲，昔时繁华之盛，荒凉废落至于此极也！毋亦无此种草木为之文柔和润之耳。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顾人之生也，苟不能窥见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则自呱呱堕地，迄于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迅于电波石火，不可淹留，浮生若梦，直菌鹤马蜩之过乎前耳。是以川上尼父，有逝者如斯之嗟；湘水灵均，兴春秋代序之感。其他风骚雅士，或秉烛夜游；勤事劳人，或重惜分寸。而一代帝王，一时豪富，当其垂暮之年，绝诀之际，贪恋幸福，不忍离舍，每为咨嗟太息，尽其权力黄金之用，无能永一瞬之天年，而重留遗憾于长生之无术焉。秦政并吞八荒，统制四海，固一世之雄也，晚年畏死，遍遣羽客，搜觅神仙，求不老之药，卒未能获，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汉武穷兵，蛮荒慑伏，汉代之英主也，暮年永叹，空有“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之慨。最近美国富豪某，以毕生之奋斗，博得$式之王冠，衰病相催，濒于老死，则抚枕而叹曰：“苟能延一月之命，报以千万金弗惜也。”然是又安可得哉？夫人之生也有限，其欲也无穷，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坐令似水年华，滔滔东去，红颜难再，白发空悲，其殆人之无奈天何者欤！涉念及此，灰肠断气，厌世之思，油然而生。贤者仁智俱穷，

不肖者流连忘返，而人生之蕲向荒矣，是又岂青年之所宜出哉？人生兹世，更无一刹那不在青春，为其居无尽青春之一部，为无尽青春之过程也。顾青年之人，或不得常享青春之乐者，以其有黄金权力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为青春之累耳。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岂惟无处购买，邓氏铜山，郭家金穴，愈有以障翳青春之路俾无由达于其境也。罗马亚布达尔曼帝，位在皇极，富有四海，不可谓不尊矣，临终语其近侍，谓四十年间，真感愉快者，仅有三日。权力之不足福人，以视黄金，又无差等。而以四十年之青春，娱心不过三日，悼心悔憾，宁有穷耶？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以吾人之生，洵如卡莱尔所云，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昔者圣叹作诗，有"何处谁人玉笛声"之句。释弓年小，窃以玉字为未安，而质之圣叹。圣叹则曰："彼若说'我所吹本是铁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何得更吹铁笛？'天生我才，岂为汝铁笛作奴儿婢子来耶？"夫铁字与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处。圣叹顾与之争一字之短长而不惮烦者，亦欲与之争我之现在耳。诗人拜轮，放浪不羁，时人诋之，谓于来世必当酷受地狱之苦。拜轮答曰："基督教徒自苦于现世，而欲祈福于来世。非基督教徒，则于现世旷逸自遣，来世之苦，非所辞也。"二者相校，但有先后之别，安有分量之差。拜轮此言，固甚矫激，且寓风刺之旨。以余观之，现世有现世之乐，来世有来世之乐。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人生求乐，何所不可，亦何必妄分先后，区异今来也？耶曼孙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烦忧既解，恐怖奚为？耶比古达士曰："贫不足恐，流窜不足恐，囹圄不足恐，最可恐者，恐怖其物也。"美之政雄罗斯福氏，解放之后，游猎荒山，奋其铁腕，以与虎豹熊罴相搏战。一日猎白熊，险遭吞噬，自传其事，谓为不以恐怖误其稍纵即逝之机之效，始获免焉。于以知恐怖为物，决不能拯人于危。苟其明日将有大祸临于吾躬，无论如何恐怖，明日之祸万不能因是而减其豪末。而今日之我，则因是而大损其气力，俾不足以御明日之祸而与之抗也。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一之力焉。今人之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膻，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耶经有云："富人之欲入天国，犹之骆驼欲潜身于针孔。"此以喻重荷之与青春不并存也。总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罣，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蕲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

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评骘锡札曰："彼由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并泡沫而干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自我之青春，何能以外界之变动而改易，历史上残骸枯骨之灰，又何能塞蔽青年之聪明也哉？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乃示以去累除忧之道，有曰，"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舟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

（原载《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出版）

新 的！旧 的！

李 大 钊

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都着有全体的颜色。

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

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类此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该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

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簿，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了。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二十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迭迭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迭迭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文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道，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象那样拥挤了。即于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象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

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象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原载《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出版）

新旧思潮之激战

李　大　钊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我们且看今日的日本，新的方面，有"黎明会"一班人士种种的结合，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他们天天宣传，天天游说，这儿一个演说会，那儿一个讨论会，这里立一个杂志，那里创一所日刊。公共结合以外，他们还有自己本着他专究的学理、择选的问题，今天一个小册子，明天一个小册子，散布传播，飞如蝴蝶。他们虽然定了一个公同进行的方向，都向着黎明的曙光去走。可是各人取那条路，还是各人的自由，不必从同,且不能从同,不可从同。那反对一方面，也是堂堂鼓、正正旗来相对应。"桐花会"、"黑龙会"这一班人的思想虽旧,他们也知道走正路,也知道本着自己所信的道理、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正当势力,和新的对抗。就是那个"浪人会"的行动，在日本社会已为舆论所不直，他们对于新派的激战,也不过开一个演说会,请反对党的魁领莅会辩论而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沈沈。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靡有情采，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的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那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

肥料；那些暗沈沈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原载《每周评论》12号，1919年3月9日出版，原署名：守常）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惟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

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

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 S. 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原载《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 独 秀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后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不谓辛亥以还，且于国人流血而得之共和，痛加诅咒。"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天下之敬爱先生者，无不为先生惜之！

中国帝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弃也者。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识者皆目笑存之，本无辨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

惟是康先生虽自夸"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然实不通外国文，于外国之论理学、宗教史、近代文明史、政治史，所得甚少，欲与之析理辨难，知无济也。

曷以明其然哉？原书云："今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认与生番野人等乎？"按台湾生番及内地苗民，迷信其宗教，视文明人尤笃。则人皆有教，生番野人无教之大前提已误。不拜教主，且仅指不拜孔子，竟谓为无教之人乎？则不拜教主即为无教之小前提又误。大小前提皆误，则中国人无教与生番野人等之断案，诉诸论理学，谓为不误可乎？是盖与孟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之说，同一谬见。故知其不通论理学也。

欧美宗教，由"加特力教"（Catholicism）一变而为"耶稣新教"（Protestantism），再变而为"唯一神教"（Unitarianism），教律宗风，以次替废。"唯一神教"，但奉真神，不信三位一体之说，斥教主灵迹为惑世之诬言，谓教会之仪式为可废，此稍治宗教史者所知也。德之倭根，法之柏格森，皆当今大哲，且信仰宗教者也；（倭根对于一切宗教皆信仰，非只基督教已也。）其主张悉类"唯一神教派"，而主教之膜拜，教会之仪式，尤所蔑视。审是，西洋教宗，且已由隆而之杀。吾华宗教，本不隆重，况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乃强欲平地生波，惑民诬孔，诚吴稚晖先生所谓"凿孔栽须"者矣！

君权与教权，以连带之关系，同时削夺，为西洋近代文明史上大书特书之事。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

其反抗最烈，影响最大者，莫如英国之“清教徒”，以不服国教专制之故，不惜移住美洲，叛母国而独立。康先生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故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然此种理论，必为康先生所不乐闻，即闻之而不平心研究，则终亦不甚了了。吾今所欲言者，乃就原书中，指陈其不合事实、缺少常识、自相矛盾之言，以告天下，以质之康先生。

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而原书一则曰“当道措施，殊有令国人骇愕者”；再则曰“国务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骇怪笑骂！”吾知夫骇愕笑骂者，康先生外甯有几人？乌可代表国人，厚诬天下？此不合事实者一也。

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非宗教”之声，已耸动法兰西全国，即尊教信神之“唯一神教派”，亦于旧时教义教仪，多所唾弃。而原书云：“数千年来，无论何人何位，无有敢议废拜教主之礼，黜教主之祀者。”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此不合事实者二也。

吾国四万万人，佛教信者最众。其具完全宗教仪式者，耶回二教，遍布国中，数亦匪鲜。而原书云：“四万万人民犹在也，而先自弃其教，是谓无教”；又云：“今以教主孔子之神圣，必黜绝而力攻之，是导其民于无教也。”以不尊孔即为无教，此不合事实者三也。

原书命意设词，胥乏常识，其中最甚者，莫若袭用古人极无常识之套语：曰，以“春秋”折狱；曰，以“三百篇”作谏书；曰，以“易”通阴阳；曰，以“中庸”传心；曰，以“孝经”却贼；曰，以“大学”治鬼；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吾且欲为补一言，曰，以“禹贡”治水，谅为先生所首肯！

夫“春秋”之所口诛笔伐者，乱臣贼子也；今有狱于此，首举叛旗，倾覆清室者，即原书所称“缁衣好贤，宵旰忧劳”之今大总统，不知先生将何以折之？（辛亥义师起，康先生与其徒徐勤书，称之曰贼曰叛，当不许以种族之故，废孔教之君臣大义也。）所谓以“大学”治鬼者，未审与说部“绿野仙踪”所载齐贡生之伎俩如何？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等语，是否在此半部中也？

呜呼！先生休矣！先生硁硁以为议院、国务院无擅议废拜废祀之权，一面又乞灵议院，以“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要求政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以上皆原书语）夫无权废之，何以有权兴之？

然此犹矛盾之小者也。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

吾最后尚有一言以正告康先生曰：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古人远矣！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法国社会学者孔特，谓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若康先生者，吾国之耆

宿，社会之中枢也，但务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至大且捷，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

（原载《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日出版）

文 学 革 命 论

陈 独 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钞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

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苦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岐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原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出版）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 独 秀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原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

---

* 原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编辑者。

《新青年》宣言*

陈独秀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

---

* 这篇文章，原名《本志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发表时没有署名。——编辑者。

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原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

我之节烈观

鲁　迅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

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要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象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

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象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

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痛苦。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鲁迅全集》卷1）

随 感 录 四 则

鲁 迅

三 十 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据我所晓得的，是Koch博士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Koch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
>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
>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

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

传”。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

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宁偏重道德”（宁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

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

“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
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遁斋闲览”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

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

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Koch博士发见了虎列拉菌时，Pfeffer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决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原载《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15日出版）

三 十 五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原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三 十 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

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 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

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原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五　十　七　现在的屠杀者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原载《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出版）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　迅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

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

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死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吗？”

欧　“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

欧　“正为那个。”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稚，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

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谿”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侘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点。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谿，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谿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鲁迅全集》卷1）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於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辨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於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於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敻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已。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於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

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於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於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列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

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於“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　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

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於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於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鸠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钼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沈，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於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於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裹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於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於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

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於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於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语俗”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於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沮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o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於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沮。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於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於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独秀识

（原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出版）

答　王　敬　轩

刘　半　农●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而后快！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复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闻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话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则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的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术代宗教”的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五四时期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他代表“新青年”编辑部所写的“答王敬轩”一文。1920年他往法国巴黎研究语音学。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此后专门从事于考古和方言调查。

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哼哼！恐怕你这位“道人”也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以为“我这篇经天讳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定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却也读过不少，象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说他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 ”）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对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

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再辩。至于樊、易二人，笔墨究竟是否“烂污”，且请先生看着：

“……你为我喝采时，震得人耳聋；你为我站班时，羞得人脸红。不枉你风月情浓，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场‘蝴蝶梦’；……这‘小上坟’的祭品须丰，那‘大劈棺’的斧头休纵，今日个唱一出‘游宫射雕’，明日里还接演‘游龙戏凤’，你不妨‘三调碧游宫’我还要‘双戏桃山洞’。我便是‘缝褡膊’的小娘，你便是‘卖胭脂’的朝奉。……”（见樊增祥所著“琴楼梦”小说）。“……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喝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见易顺鼎“咏鲜灵芝”诗。）

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

法，是在通与不通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破除迷信"项下，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与记者。先生竟把他并作一谈，足见昏瞶！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两句，先生看了，必说"做还做得不错，可惜太荒谬"——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其中有一位，自言能口译狄更士小说者，中国只有他一人，这大约是害了神经病中的"夸大狂"了！）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待将来记者等有了空，另外做出一篇"林译小说正误记"来，"以为知者道"；那时先生如已翻然变计，学习了些外国文，重新取来研究研究，"方知余言之不谬"。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象"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若……

"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考，林先生于"诗"、"戏"两项尚未辨明，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许多，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

"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象先生这种横路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从前有一部小说，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简称曰英；法兰西简称曰法的办法，单记了一个古字。后来翻遍了衙门里所有的通商书、约章书，竟翻不出一个古国来。先生与这位老夫子，可称无独有偶！然而这是无关弘旨的，不过因为记者写到此处，手已写酸，乐得"吹毛求疵"，与先生开开玩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无益，这一回得了这一点知识，将来便不至于再闹第二次笑话了。（又日本之梅谦次郎。是姓梅，名谦次郎。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则此四字之称谓，亦似稍欠斟酌。）先生这一段话，可分作两层解释：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既未自称其译笔之"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功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全无意识的么？"

承先生不弃，拟将胡适之先生"朋友"一诗，代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一定投过门生帖子来。无如"双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气极活泼的原诗，改成了"双蝶凌霄，底事……"的"乌龟大翻身"模样，也未必是"青出于蓝"罢！又胡先生之"他"均以"他"字上一字押韵，沈尹默先生之"月夜"均以"着"字上一字押韵，先生误以为以"他"、"着"押韵，不知是粗心浮气，没有看出来呢？还是从前没有见识过这种诗体呢？"二者必居其一"，还请先生自己回答。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旧文学，难道平时读书竟没有留意及此么？且就"老爷"二字本身而论，"元史"上有过"我董老爷也"一句话，宋徐梦莘所做的"三朝北盟会编"也有"鱼磨山寨军乱，杀其统领官马老爷"两句话。这一部正史，一部在历史上极有价值的私家著作，尚把"老爷"二字用入，半农岂有不能用入诗中之理？半农要说句俏皮话：先生说半农是"前无古人"，半农要说先生是"前不见古人"。所谓"不见古人"者，未见古人之书也！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哼！这一节要用严厉面目教训你了！你也配说“研究‘小学’”，“颜之厚矣”，不怕记者等笑歪嘴巴么？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儿”，是个象形字，“说文”说他是“象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他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解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五千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署”字篆文作“㬎”是个形声字，“说文”说他“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如“渚”、“楮”、“煮”、“豬”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𦣻”，从“𦣹”、“㫃”声；“𦣹”同“自”，“㫃”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作“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功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尽”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是道耳！　）

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他们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辨。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说几种给先生听听。“文选”上有四句话说：“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可谓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上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好结果。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

‘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又“贵耳集”上说“余干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锤之铢。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道：“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又当代名士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的“张沧海先生”——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烛序”，有两联道：“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敬轩先生，你既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几千百遍，如有不明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单就文笔上说，毛病已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他的诗，正如约翰生博士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见本志三卷五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文中），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然象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决不能“登大雅之堂”。若说他别有用意，更不成话。我们做文人的，既要拿了笔做文章，就该有三分胆量，无论何事，敢说便说，不敢说便罢！要是心中存了个要如何如何说法的念头，笔头上是半吞半吐，请问文人的价值何在？不同那既要偷汉，又要请圣旨、竖牌坊的烂污寡妇一样么？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殷盘，则虽非“孺子可教”，也还值得一辨。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许多气力与你驳，只须请章实斋先生来教训教训你。他“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一篇里说：

“……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

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

先生！这段议论，你如果不肯领教，我便介绍一部妙书给你看看。那书唤作“别下斋丛书”。我记得他中间某书（书名已忘了）里有一封信，开场是：

“某白：复何言哉！当今之世，知文者莫如足下，能文者莫如我，复何言哉！……”

这等妙文，想来是最合先生胃口的，先生快去买他一部，朝夕讽诵罢！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

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或谈话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与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人既不能把Logic攫为已有，说他是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亦决不能把他硬当做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屦”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把他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且“罔两”有三义：第一义是“庄子”上的“罔两问景”，言“影外微阴”也；第二义是“楚辞”上的“神罔两而无主”，言“神无依据”也；第三义是“鲁语”上的“木石之怪，曰夔，罔两”，与“魍魉”同。若先生当真要附会，似乎第二义最近一点，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逻”字决不能赅括演译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又“Bank”译为“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谓之业”来解释这“板”字，是无论那一种商店都可称“板克”，不必专指“银行”。若有一位棺材店的老板说：“小号的圆心血‘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小号要改称‘板克’。”先生也赞成么？又严先生的“板克”似乎写作“版克”的，先生想必分外满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营业上操胜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喜欢的么？

先生对于此等问题，似乎可以“免开尊口”，庶不致“贻讥通人”。现在说了“此等笑话”，“自暴其俭学”，未免太不上算！

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

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他是世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缪锦绣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然而已比先生高明万倍！）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先生即此等人之标本也！）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将来尚拟做他一篇论文，大大的抨击一下，现在且不多说。

原信“自海禁大开”以下一段，文调甚好，若用在乡试场中，大可中得“副榜”！记者对于此段，惟有于浩叹之后，付之一笑！因为现在正有一班人，与先生大表同情，以为外国人在科学上所得到的种种发明，种种结果，无论有怎样的真凭实据，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外国人说人吃了有毒霉菌要害病，他们偏说蚶子虾米还吃不死人，何况微菌；外国人说鼠疫要严密防御，医治极难，他们偏说这不打紧，用黄泥泡汤，一吃就好！甚至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拜跪。为了讲求卫生，竟有那种谬人，打破了运动强身的精理，把道家“采补”书中所用的“丹田”、“泥丸宫”种种屁话，著书行世，到处演说。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定有主张定叶德辉所刊“双棋景阁丛书”为卫生教科书的时髦教育家！哈哈！中国人在阎王簿上早就注定了千磨万劫的野蛮命，外国的科学家还居然同他以人类之礼相见，还居然遵守着“科学是世界公器”的一二句话，时时刻刻把新知识和研究的心得交付给他，这正如康有为所说：“享爰居以钟鼓，被猿猱以冠裳”了！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辩。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

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品，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向专门制造这等对句的名厂里，借来奉敬，想亦先生之所乐闻也！）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䝱”字，孔融，曹丕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白。

记者半农，一九一八年二月一十九日。

（原载《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15日出版）

〔附〕王敬轩君来信*

“新青年”诸君子大签：某在辛丑、壬寅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归国以后，见士气嚣张，人心浮动，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鄙人观此，乃知提倡新学，流弊甚多，遂噤不敢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蠹焉心伤。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奈无鲁阳挥戈之能，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日者过友人案头，见有贵报，颜曰“新青年”，以为或有扶持大教，昌明圣道之论，能拯青年于陷溺，回狂澜于既倒乎。因亟假读，则与鄙见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发指，且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又观贵报对于西教，从不排斥，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法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是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古人，则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震川）、方（望溪）；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

* 王敬轩，实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挑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即这篇“王敬轩君来信”），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由刘半农复信，加以痛斥。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为“双簧信”，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文学争论中的著名事件。

(跰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竟曰烂污笔墨,曰斯文奴隶,曰丧却人格,半钱不值。呜呼!如贵报者,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今亦无暇一一辨驳,第略论其一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声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屦,其书本不足道。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又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迻译,致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其中有数首,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或尚可成句,如两个黄蝴蝶改为双蝶,飞上天改为凌霄,不知为什么改为底事,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韵,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韵,以及刘君之"相隔一层纸",竟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赧,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张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足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某遇儒也,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字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又如暑字,中从土,上从日,谓日晒地上也;下又徒日,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则署气大盛也;中以丿贯其上下二日,以见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画,多或四五十画,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其对偶之工,尤为巧不可阶。故楹联之文,亦为文学中之一体。西字长短无定,其楹联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学者,未尝称道及此。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而尤偏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

崇拜，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惟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词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贻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释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无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夐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有"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外，别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既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贵报诸子所乐闻，鄙人此书，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谓危，不敢不掬诚相告，知我罪我，听诸国人之公论而已。呜呼！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辛有之叹，不图于吾生亲见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尽，顺颂
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王敬轩躬

（原载《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15日出版）

五四运动的经过

蔡晓舟、杨景工同编

《近代史资料》编者按：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关于五四运动有系统的记载的材料还不算多，这里所选的即是五四运动当年7月蔡晓舟、杨景工合编的"五四"一书的一部分。该书叙述五四运动的经过比较详细。原书用白报纸25开本铅印，共分六章：第一章五四运动之前因，第二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第三章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第四章舆论，第五章文电录要，第六章附录。现在选录的为前三章。

第一章　五四运动之前因

第一节　外交失败之原委

（1）德国强租青岛之原因　甲午（1894）战争之结果，日本夺我辽东半岛，意欲占领；李鸿章出纵横之术，运动俄、德、法三国出而干涉，日不得已始以原地归还。自是厥后，列强既悉我国积弱之底蕴，复惧日本势力之张大，因协以谋我，渐成均势之局。法占广州湾，俄占旅顺口，英占威海卫，意占三门湾，皆名租借，继续订约。德则以山东曹州府谋杀教师一案为借口，开来军舰多艘，占据我胶州湾，于是胶州湾口外半岛南岸之青岛遂由德人营为军港，辟为商埠，筑铁路以达济南，亦有条约，名租借焉。

（2）德国租借青岛条约之要点　第一章关于军事之布置，其要点：（一）德国军队可在青岛周围100里路以内自由行动；（二）割让胶州湾两岸听德国自由建筑堡塞，储藏军需，修造军舰。第二章关于路矿事宜，铁路是二线：（一）起胶州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直穿济南，可达鲁省边境；（二）由胶州向左经沂州府过莱芜县达济南，凡两路附近30里内之矿山，如第一路线潍县博山各处，第二路线胶州府莱芜县等处之矿山，悉听德人自由开采。第三章关于借款之优先权：凡在山东省内举办生利事业需借外债时，德人有投资之优先权。此约成于前清光绪24年2月14日（1898年3月6日），中国方面由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和二人署名。

（3）日本攻取青岛之心理　欧战期内日本因英日同盟关系，早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嗣乘欧战剧烈德人无暇东顾之际，遂攻取青岛。其心理约有三层：第一层占据中国之要害，拔除德人在远东之势力；第二层报复德人干涉辽东半岛之旧仇；第三层结英人之欢心。此民国三年事也。谚所谓"趁火打劫"，此之谓欤。

（4）日本以武力迫胁之21条　民国4年5月7日，日本送最后通牒于我外交部，谓：须完全承认其21条之要求。其要求中关于山东问题甚多，略举如下：（一）中国承认日本同德国政府协定山东省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之处分；（二）中国政府须声明山东省内沿海之土地岛屿

不得自由借给他国或让给他国;(三)欧战终了后，胶州湾租借地完全听日人处置，惟此条下并附四个条件:(甲)以胶州湾全部开放商港;(乙)在日本政府指定地方设立日本专管租界;(丙)如各国需要公共租界时，可另行设立;(丁)另外关于德人之房屋财产及其他条件手续各项当未实行交还之先，应由中日两国共同商议办理。是时袁世凯当国，方谋压抑民气，以逞其帝制自为之野心，遂隐忍承认此项条件，于民国4年5月25日盖印，即此次巴黎和会日本死争山东问题之根据也。

(5)日本以金钱骗诱之铁路合同 此合同名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济顺铁路是自山东济南至直隶顺德，高徐铁路是自山东高密至江苏徐州，借款为日金2000万元，利息每年每圆8厘。日本方面代表是日本兴业银行，将来属于铁路上之财产与收入，非经该银行承认不得作担保品或提给他人。此预备合同限定四个月内立正式合同，惟此合同与前21条要求大有分别，盖前出日本动议，此出中国动议，前是威迫，此是利诱，前是受人胁制，此是自己情愿。当时中国何以甘受利诱情愿立此合同？因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急欲征服南方护法军，需款孔急，故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会联络团体至总统府谒见冯氏，请拒绝此项合同，勿予盖印。惟冯氏既顾念段氏军费拮据，复渺视学生人微言轻，仅仅空口声明不卖国而已。竟于民国7年9月28日使驻日公使章宗祥代表政府订立此项合同，俾此次和会中我国专使多所束缚，不得争回国权，当事者不能辞其责矣。

(6)断送胶济铁路之文书 此交换之公文名义上是撤废山东民政署，实际上是夺我胶济铁路，其文略谓：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沿路巡警由中国政府组织，但经费由胶济铁路供给，巡警队本部与枢要驿站与巡警养成所皆须聘日本人，至于民政署虽有撤废空名，何时撤废并未提及。总之，此文不过为日人承继德人权利加一重保证而已。

(7)日本在巴黎和会席上争持之情形 日本既有意承继德人种种权利之野心，故对于攻夺青岛前后除对中国结以上种种条约合同外，对于英法又结伦敦密约以为保障。今兹和会席上英法皆受此密约之拘束，不便发言。……日本争持青岛之理由，乃谓和会所以维持神圣不可侵犯之条约，则所有中日约章及伦敦密约皆应发生效力，不得废止。故根据以上种种条约要求青岛问题由中日自行解决。其要求之用意约有三层：(一)不在和会公开，可以施行阴谋迫胁之手段；(二)由日本私自归还，在外交上可开日本处理中国土地主权之先例，以为其做宗主国之尝试；(三)至归还之日，可以强迫交换利权。

(8)最近欧会决定之办法 前次和会讨论青岛问题曾有暂交五国公管之说。日本主张由日本交还，中国主张德国青岛条约作废，直接恢复其所有权，故皆否认其说。惟日本乘意国因乞开交涉以退出和会要胁之际，对于青岛问题亦持强硬态度，谓：不容其主张，彼亦退出和会云。加以伦敦密约以缄英法之口。故青岛问题遂有不得不容日本主张之势。

据以上八项外交情形观之，则我国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凡具水平线以上知识之国民应得以下四种之觉悟：(一)觉现在世界尚非实行公理之时期；(二)觉日人还未脱德国派侵略主义欺凌之患，不可不设法抵制；(三)觉外交失败，无往非恶劣政府自种恶因；(四)觉实行国民之外交与平民主义之外交是刻不容缓之事。

第二节　卖国贼之发现及人心之愤激

(1)巴黎和会初开之情形 当巴黎和会开幕之始，美总统威尔逊氏宣布和议宗旨，首

谓国际间不得有何等秘密之约。我国专使王正廷、顾维钧二氏根据此说历陈日本种种阴谋，并要求废除中日间种种密约暨伦敦密约之关于此项交涉，其言娓娓能动各国之听。日本政府遂训令驻华公使小幡氏要求我政府诰诫我专使不得为此等之言论。我国舆论大哗，谓："日本此等要求实属无理，我国专使万不容受其干涉自缄口舌。"然我政府虽无诰诫明文，竟下命令任陆征祥为委员长，以夺顾王二使提案之权，其中是否有日人与奸细作用羼杂其间，使人不能无疑。

（2）王专使来电 三四月间上海报界接王正廷专使自巴黎来电云："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21款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贬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此电文既披露于各报，于是群情忿怒如触汤火，谓："果有是人者，真秦桧再生于今日，李完用复乎中土矣！"

（3）梁启超之受嫌疑 时人既读此电以为此卖国贼必指在巴黎之华人掣专使之肘者，始疑叶玉虎氏，然叶滞在美洲尚未抵欧，于是群疑梁启超氏。比时上海商团曾致电政府云："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以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辩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征。"

（4）为梁氏辩诬者 当时各报既载上项之电，于是为梁氏辩诬者颇有人，如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皆有通电，而以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氏之通电为最有力，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52〔据'时报'为53〕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尔，特为申说，务乞照登。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歌。"

（5）卖国之真相渐披露 未几，梁氏自巴黎致国民外交协会电亦云："……惟知已提出者，似仅山东问题，当局与各国要人曾否接洽，探察各方面情形，不无疑虑。此间议论21条共知为被逼，而高徐、顺济路约，形式上乃我自动，不啻甘认日本袭德国权利为正当。而去年9月德国垂败，我国因区区2000万加绳自缚，外人腾诮几难置辩，现最要先废此约，务请力争之。"然则梁氏亦主张废路约争主权之一人，其非利于外交失败以便私图者已无可疑。然则王专使电中所谓"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贬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究竟是谁耶？于是十目十手不得不集注于此等秘约有关系之人。吾前曾言军阀中人急欲征服官贼（做官人目护法军为贼），需款孔极，故不惜订此饮鸩止渴之路约，而为此等路约之掮客，则大名鼎鼎亲日派之大金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人。然则欲维持此等戕国条约以便其私图者，非此一种人更有谁耶！据曹汝霖等之声明，谓若辈所借之日款，实属涓滴归公，并无回扣。惟据熟悉其中底蕴者言，谓其虽无回扣，乃其汇费贴水之舞弊，

中饱之丰更有甚于回扣者，于是卖国之真相渐披露矣！

（6）**中美通信社之报告** 4月中旬，据北京报载中美通信社消息云："顾维钧、王正廷两专使在欧洲和平会议中提出山东问题，而日使小幡要求中国政府禁止专使之发言，此一事也当犹在吾人之脑中，而不料今竟有极确实之卖国黑幕发现于北京也。本年3月1日大坂'每日新闻'即谓：北京政府深不赞成顾王二使之行动，时时给以训电，禁止其反对日本，吾人见之甚以为奇，以为中国即有亲日派亦断不至如彼所言之情形，然心亦不能无疑焉。乃最近所得最确实之消息，则三月以内外部即致陆征祥一电，令其转告各专使对于青岛问题，切勿要求日本直接交还及其他相关之中日交涉不必有所提议，尤不可对于日本专使稍有忿争之态度。此电之内容以中国政府对于此等事万分秘密，吾人不能知其详，但在3月25日前后，外交部确有此电致巴黎则万分可信，然后知日本人消息甚灵，必有袒日派先向之吐露也。尤可疑之点为与此事直接之关系者，中国政府曾下命令任陆征祥为委员长，而其所界之权则欧洲和平会议之提案，即其他专使所认为必要者非得委员长之许可不能提出，而自陆氏任委员长以后，竟无经陆征祥许可而能提出之案。陆氏之为人既小心而且软弱，1915年之中日密约21条即其所亲手签字者。此次赴欧经过日本与日外相内田氏，中国驻使章宗祥会晤，谈及中日关系，其言亦甚不妥当。五大强国提议青岛问题之日，各国专使及中国专使均出席，惟陆征祥未往，而王正廷、顾维钧两使竟与日使牧野为樽俎之折冲，顾王二使年少胆大，故敢于如此，然一自陆征祥为委员长，而顾王两使即有意见亦不能表示，可见中国政府之压抑，而小幡氏外交之成功矣。4月6日路透电所载中国专使要求取消1915年之中日密约。然此乃巴黎法文报纸所载，为日使牧野发表意见之后中国专使所以答之者，并非正式之发表，尤非提出于和平会议之案，西人殆无不知之。且仍是顾王二使之文章，而与委员长无涉。然以北京政府对于专使为此压抑，不知山东权利，中国人尚有法以争回否也？"

（7）**山东国民请愿大会攻击卖国贼** 国民既悉卖国之底蕴，故对于卖国之徒皆异常怀恨，而山东以切肤所关，故毒之尤甚。兹录其致陆、顾、王三专使之电文如下："巴黎和议陆、顾、王三专使鉴：青岛及山东路矿，日人实无承继之权，所有理由已有各界人民先后电达，无烦转述。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20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十余万，佥谓此说若行，是陷山东于没世不复之惨。若辈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病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急何能择，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公等受全国之委托，负人民之重望，务请俯准舆情，勿惑奸计，据理力争，必达目的，恢复我国主权，维持东亚和平，胥在此举，东省人民，实深祝祷。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张英麟等103700人同叩。"

（8）**留日学生惩章宗祥** 驻日公使章宗祥当4月中旬请假归国，日本政界要人暨他国驻日使馆中人多莅站欢送，忽来中华男女学生数百人，章氏夫妇方讶如此好感得未曾有，乃学生至，则诘其订约卖国之罪，而赠以卖国贼旗帜多面，虽经外人解劝未至用武，而章已饱受虚惊矣。

第三节 五四前之集会

（1）**5月初间北京各界之情形** 自4月中旬有济南国民与东京学界之两举动，其悲愤之精神早藉"以太"而传遍于北京之社会。于是京、沪、鲁间皆有人络绎往来，商议此事之对

付方法，大抵共同之目的不外外争青岛、内惩国贼而已。故其时北京之市民、政界、商人、学生以及少数军人皆有种种秘密之结合以策进行，惟是人人心中之理想，皆在5月7日国耻纪念开一空前之国民大会以示威。

（2）**北大五三夜之法科集会**　北京各界情形既如上述，惟是风声日紧，而日本机关报之论调亦日益激昂，各校学生情不可遏，屡举代表秘密会议，佥谓7日虽迩，已莫能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3日（星期六）午后1时发出通告，召集本校学生于晚7时在法科大礼堂开会，共议进行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盖是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于是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而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少顷，咸以事非急举不可，遂议定知会各校学生于翌日（即4日）齐集天安门为示威之运动。

第二章　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

第一节　五四当日之情形

（1）**午前之筹备**　是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法政专门、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代表假法政专门开会商议如何演说、如何散布传单、如何经过各使馆表示请求之意，如何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住宅数其卖国之罪。商议既定，于是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准备白旗子，其旗子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无一定之式，有画青岛之地图者，有写“取消21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种种字样者；尤令人注意者为一挽联，其文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其旁署之款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闻系高等师范某君所撰云。

（2）**天安门之齐集**　各校既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到者以鼓掌，而后到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3）**官厅之阻止无效**　当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时，即有教育部派员驰至向众拦阻，并叩询聚会之本意。学生团当付以传单一纸，指而告之曰：“区区苦衷，尽在于此，一览便知，无待赘述”。该部员接阅一过，乃曰：“事先未通知公使馆，恐不能在使馆界内通行，劝诸君暂先归校，举出代表以便进行”。学生团当以言辞拒绝，既而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亦先后至，均有照例之劝慰阻止之辞，然亦不过官样文章耳，安足动此如火如荼之学子听哉！

（4）**散布传单**　事先学生曾准备传单万余份，至此则逢人便给，其文略云：现在日本

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出行，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5）**使馆界之学生** 当时学生团一面散布传单，一面向东交民巷各使馆处径发，而使馆界之巡捕谓须得大总统之同意始准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以电话与公府往返磋商至二小时之久，不得要领，于是此一德一心3000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不得已乃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谒美公使，适美公使未在，馆员某君接见谓：今日星期，恐他公使亦难晤面，诸君爱国热忱当尽情转陈于美公使，此意即能转达外交团云，遂将代表所递陈词收下。……然而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于是万丈怒火皆射注于卖国贼曹汝霖等之身。

（6）**赵家楼之武剧** 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曹所住之赵家楼在石大人胡同内某小胡同，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有二里之遥，群众入彼口时即放声呐喊杀卖国贼曹汝霖，声震天地，居民皆立门首以观。及抵曹氏宅附近，见有某姓小洋房，误以为曹宅，群以白旗掷其屋上，既而警吏某亟白其冤谓：离此不远有宽敞之大绿门乃真曹氏之宅也。于是群目注视所谓曹氏宅者，门前有军警数名荷枪而立，户牖俱闭，当时群情愤激之际，将其门旁之窗打破，于是有某校某君拔蝥弧以先登，一跃而入，去键开关，群遂蜂拥而进。其门外军警见来者既如是奋勇，又系学生，又不知有几千万，又未见长官明令如何办理，于是皆束手不理。曹汝霖以造孽卖国之钱购来种种穷奢极侈之器皿，莫不归于毁坏，其有不能毁坏者则沉于园内池水中。旋见一老人，知其为曹汝霖之父，有某君向前大声骂其教子不善至于卖国，然以其年老可怜亦未加以捶打，而其妇女小孩子皆命警察扶去，并未受丝毫之惊。闻又有一室，见一中年妇人倚门而立，坚谓其中为妇女寝所，不便使男子闯入。众以搜索曹汝霖对。彼妇人谓曹氏晨出未归，支吾半晌始令进，俾曹氏得乘间避去，而天真烂漫之学生竟被瞒过，岂殆曹氏之寿合未终欤。同时有众一队于客厅突见章氏、丁氏及日人中江氏，队中有识章宗祥者，遂大声呼曰："此章宗祥卖国贼也！"一语甫出，众人拳足交加。丁氏逸出呼警察援救，警察以未奉长官令对。而日人中江氏则出死力以护章氏，并愿以身代章氏受死，然众惟捽之去而莫加以一指。正纷拿间忽宅中火起，众始夺门而出，日人中江氏乘间呼警察数人，由后门搬出章氏入附近之杂货店，且自立其旁以身作障。群众复尾入店中，将日人拉至旁边，章氏又复重遭一顿毒打。中江氏满身皆黄白鸡蛋汁，盖群众取之于店中以掷章氏而误及其身也。

（7）**章宗祥之胆大受祸** 曹章二氏当正午12时本应徐东海之招在府宴会，旋闻学生游街示威并声称惩戒国贼云云，拟即归省视。有劝其缓归以避万一之虞者，曹因念其细小心切，卒于3时顷偕章宗祥同归赵家楼私宅，并嘱吴炳湘派警察二百名至其家保护。曹章既返赵家楼，须臾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亲日派之健将）与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氏亦赶至，谓：学生已往使馆方面，似无来本宅之意，且庭外已有警察，即使来时亦能充分保护，勒令解散。此曹氏等之自己确信者也。于是啜茗而谈（事后有谓陆宗舆亦在座，因无人认识而幸免者，当

误疑丁为陆者也）。及4时半顷，忽闻呼声震天，自远而近，有排山倒海之势，曹始恐慌，饬令向外窗户一律关闭。俄而群众确认其为曹宅，乃抛砖掷石于其院中，又俄而学生拥入其家，于是曹汝霖急匿入其妇人房中，而章宗祥以外客不便入其内宅，遂以胆大而受祸。北京"益世报"载曹氏与其妾苏佩秋覆于澡盆内，未知确否，果尔亦佳话也。

（8）曹宅起火之缘因不明 曹宅既遭焚，起火之因，共有四说：（一）谓群众觅曹氏不得，故毁其宅以泄忿；（二）谓曹氏眷属纵火，冀惊散众人以免曹氏于难者；（三）谓群众毁曹家俱，误损电灯，流电起火者；（四）谓曹宅仆人乘乱窃物，放火灭迹者。以上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

第二节　学生之被捕与释放

（1）学生之被捕情形 当火初燃，警厅吴总监、步军统领李长泰已携大队军警赶至。众见曹宅已焚，而章氏已伤，愤火已泻去大半，且有人谓曹章已远扬，又见日已云暮，势难久留。适逢有军警放空枪示威之举，众遂无心与之为难，于是纷纷归去。当时学生所欠之手续即未整队耳，故落后之32人被军警捕去。此32人计北大20名、高师8名、法政专门2名、中国大学2名。当晚北大曾开大会：（一）检查被捕人名；（二）设法挽救被捕同学；（三）如蔡校长辞职则全体自行解散。当时有激烈分子倡议至警厅要人，嗣以蔡校长到会，竭力拦阻，并云释放被捕同学彼可担负完全责任，不过学生一方面绝不能再有激烈之举贻政府以口实，于是大会遂散。

（2）在拘学生之状况 五四之夕被捕学生初分在两处：步军统领署12人，警厅20人，旋统归并警厅。32人共居一小屋，谈话不能自由，便溺皆受侦察。翌日警厅总监知事体重大与寻常罪犯不同，乃亲往慰劳，始移住较宽大之室，解除谈话之禁，并赠报纸多份以备消遣，伙食准厅中科员例，每人每餐约费洋一毛有零，聚食之时共分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同学有往慰问者，并可托寄信外出。

（3）政府集议处置 4日晚各国务员在钱宅开紧急会议。5日又开会议讨论对于各学校之办法。一部分官僚主张将所有参与此事之学校全行解散，又有主张只将各学校校长免职者，更有主张借此兴大狱者，议论纷纭，终莫能决。总统方面则将有命令严行取缔学生，即日发表。教育部傅总长因职务上关系，遂于5日上午提出辞呈，并由部派员分赴各学校宣慰，复下部令一道至各学校，嘱各学生勿再有举动，否则开除。交通部方面则接曹总长自六国饭店打来电话，令各电报局禁止学生发电，而不知学生通电早已由外国电局拍出矣。5日早6时步军李统领、警厅吴总监入府报告情形，先列席公府会议，旋于8时又开军警联合会讨论戒备方法云。

（4）5日之同盟罢课 各专门以上学校之学生，5日之晨即相约罢课，并宣布理由云："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5）全体学界之大会议 当日午后3时，在北大法科开各校全体联合大会讨论进行方法。到会者3000余人，其会场情形如次：（一）主席段锡朋报告是日午前9时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决：各校代表呈请各校长请大总统释放被捕同学，再由各校联合上书大总统惩办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且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又各校公推代表进谒教育总长，陈述游街情形及理由并本日罢课理由；再宣言中外，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行动；电请上海和平会议主持公理；电请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死力抗争，万勿签字。（二）国会代表符定一演说，略谓：社会对于此次学界举动深表同情，即鄙人亦甚赞同，以后进行，愿效犬马之劳云云。（三）方豪报告：承委到教育部请愿，惟因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尚未终了，故未到该部。（四）刘兆琛报告：晨间谒见吴总监，告以此次举动之理由，并垂询被拘同学之状况。据云：十分优待，且有报纸可看，当宣布被拘者传出之信，内容略谓“弟等在此颇蒙吴总监优待，请诸位同学努力进行”云云。（五）罗家伦报告接洽商界情形，大致谓商界对于此举深表同情，并明日开紧急大会商议对待方法。又报告接洽报界情形，谓报界希望各界一齐努力，并希望学界组织总机关，电报不能外发，报界可以为力。总机关内部须有一新闻团传布新闻于各界，且可派代表到上海接洽各界。（六）清华代表演说谓：昨日事出仓卒，清华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但今已全校议决与各校取一致行动，自今日起一律罢课，并派五人来京调查事实，再筹对付方法云云。（七）警官学校代表演说极为激昂，又出血书“杀卖国贼”四字遍示同人。（八）朝阳大学代表提议抵制日货。（九）主席演说对于青岛问题不可放松，被拘同学若不能放回自有各界作后援，最后手段联络各校学生到地方厅自首，决不能使少数同学负全体之责，且请诸同学每日到校看通告。（十）各同学演说。（十一）自由捐款异常踊跃，当场立集数千元。（十二）北大同学某君报告有郭钦光（北大学生）连日忧劳过度，今日呕血数升而亡。

（6）校长团积极负责　5日清晨，教育部有严重命令分布各校，请各校长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因之午后3时，各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议决：此事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应先推举代表往警察厅要求释放学生，如警厅不允，则往教育部，教部不允，则往总统府，总之不释放此少数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云。当时盛传章宗祥因伤已死于日华同仁医院，北大蔡校长对人云，甚希望此消息不确，交涉较易办也。是日到会者有专门以上14校校长，当推蔡元培（北大）、陈宝泉（高等师范）、金邦正（农业专门）、洪熔（工业专门）、汤尔和（医学专门）、姚憾（中国大学）、刘某（法政专门）等为代表往警厅。吴总监比即接见，据云：此次捕人系出院令，若欲释放仍须院令。诸代表不得已，复往教育部。部中告以总长已辞职未到部。又不得已而赴府院，总统总理皆辞不见。

（7）各界之营救被捕同学与新国会之质问　自五四军警拘捕学生30余人，上海、天津各地或以团体名义、或以个人名义电请政府要求释放学生日凡数十起。在京之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三君具呈警厅云：“窃本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致酿事变，当时喧扰场中学生被捕者30余人。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而此30余人者，未必即为肇事之人，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须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国民，幸甚！谨呈警察厅。具呈人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而山东省议会两议长同山东外交协进会二代表闻询后星夜赶至北京，与参众两院山东议员于5日下午1时在山东水灾账济会开会，议四项办法：（一）参众两院议员中派二人同山东省议会两议长谒见总统，求速释被捕学生；（二）到警厅与步军统领衙门安慰被捕学生；（三）参众两院提案对于21条、顺济铁路合同誓不承认，请各公使转各国政府；（四）弹劾内阁为山东问题失败。当时新国会方面除山东议员奔走呼号外，尚有

张濂、叶云表等共署名提出质问书云："为质问事：查5月4日因外交失败致起风潮，政府应如何措施以弭祸乱，谨据院法提出质问如左：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历任外交要职，与日人诡密交际，久为国人所共见，卖国之嫌，腾布中外，怒积怨丛，由来已久，近以青岛问题将归失败，人心忧国，追源祸始，而曹、陆、章等遂为众矢之的，当此众怒难犯之际，政府应如何究查其奸，惩治其罚，以释群怨而弭隐患，此应质问者一。本月4日之举动实一般学生迫于爱国热诚而发，其殴打伤人亦属公愤所激，绝非因私恨而起，与寻常骚动不同。且集合学生3000余人之多，若必将逮捕少数学生，按寻常违法治罪，则恐惹起绝大风潮而后患将不堪设想，且被逮之学生，未必即伤人之犯，揆诸情理，亦殊不平，政府应如何权宜方法，原情宽宥以息乱端，此应质问者二。以上两端所关重要，当此时局纠纷群情惶惑之际，为息事宁人计，必有适当措置，然后可以弭患于无形。究竟如何办理，谨依法提出质问。请于三日内答复为盼。"此外又有所谓已未俱乐部者，亦商量提出弹劾总统案（因总统有严办学生之说），其意略谓：总统为国民公仆，若玩视民意而袒护卖国贼，便是总统叛国云云。又京师总商会曾开紧急会议一次，出席者共205人，由主席副会长金世藻君暨会董诸君相继演说外交事件及学生事件，最后一致表决援助学生，致电各机关陈说一切，并联络全国商会一致进行。

（8）释放之始末 32学生在拘之两日，人心之愤激，既如上述，而五七又为国耻纪念之期，于是有维持治安之责者，深虑危险。由吴总监一方向总统及权要诸人陈说利害，疏通一是，更由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虞维铎氏向学界方面奔走接洽。故6日晚公府居仁堂开临时会，本有请总统下令将学生移交法庭后再行保释之决议，而蔡校长等又赴警厅候讯，适逢吴总监、王京兆尹、傅总长散会来厅与诸校长会议。吴初主张即照国务会议议决从缓释放，而蔡校长等仍恳即行保释，双方磋商既久，最后吴提出二种要求：（一）明日不许学生赴国民大会；（二）明日各校须全体上课。如上二者校长能担保办到，则学生即可释放。当时蔡校长等承认以身家作保，于是议决次日早由虞处长先到各校劝学生上课后再赴厅保释。翌晨（7日）虞处长至北京大学时，学生已经蔡校长劝说上课矣。虞更演说略谓：此次学生行动可谓真正民意之表示，并宣布此次复陆使电文之大意，学生闻之均表满意，满口承认上课，并允约各校一律上课。但预先声明：如至晚不见被捕同学释放，仍须罢课以为要求。幸上课才一小时，而为国入狱之32人已用汽车送归各校矣。

第三节　蔡校长之被迫出京与学界风潮之扩大

（1）曹章党之怀恨北大 五四之事纯出于个人良心主张，安容所谓自动与被动？而曹章之党则谓此事为北大学生所主持，北大学生系受蔡孑民之嗾使，又有谓学生受政客林长民、汪大燮之运动者，于是北京学生15000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于蔡校长之一身。于是纷纷谣言谓曹章等行将复仇，一方面以300万金购人刺蔡，一方面派人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又谓某上将在某府会议提议，以往年对待陆建章之手段以待蔡，嗣以某当道未许，遂未果行。而报纸纷纷登载钱总理对傅教长甚有责言，并谓："您说蔡鹤卿地位不能动摇，如蔡鹤卿死了，又该怎么办呢？"当时又有所谓桐城派文豪林某者，因讲学事对于北大教职员曾蓄无限恶感，乃欲乘隙而入动摇北大现状。故当时盛传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业得当局同意，而查办教育当事、告诫学生两令已署名盖章送印铸局，于是蔡校长竟成

众矢之的矣。

（2）**蔡校长留笺出京**　自五四风潮发生以后，蔡校长虽有辞职之具文，绝无出走之表示，即临行之前夜一句钟，仍在大学照常办公。次早有人报告蔡已走出，当时群众皆不甚信，遂以电话询其家人，始知果已远扬。北京“益世报”登载谓：蔡之走系受其门生某君之劝告，并谓系某君亲身送彼出京，其盘费皆系某为筹措云。蔡走后曾有启事一则致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云：“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越二日（即11日），北大学生又接其途中来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下款谨书姓名三字，并未注明发信处，盖已由津而宁而申而杭矣。

（3）**各方面挽蔡情切**　9日上午蔡校长之留笺，已由北大油印传遍学界，学界乃大忙。当由同事各校召集代表会议，讨论结果约分两派：一主张全体立即罢课，要求政府挽蔡回校；一主张暂由北大全体学生多方挽蔡，如无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罢课以为后援，其理由盖谓蔡之去，形式上仍出自动，不能遽认为政府之有意去蔡。卒之后说占多数，决暂上课俟政府处置失当时再行罢课。故当日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教育部云：“呈为迫切陈情挽留校长事：窃此次学生行动纯出至诚，乃本校校长过自引咎，呈请辞职，并已离校赴津。生等闻知，不胜惶恐，谨于本日决议全体停课待罪，无论何种谴责甘受无辞。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不胜屏营待命之至，此呈教育总长均鉴。北京大学学生全体上。”北大学生既上此呈，并举代表面谒教总傅商酌三种办法：（一）请总统特下命令挽留；（二）派司长赴津劝驾；（三）由学生方面通电上海陈述一切。其前两项归傅总长担任办理，后一项学生之电文两通云：“上海唐少川先生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一致挽留。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叩。”“上海‘时报’转各报、各省教育会、各团体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离京，群情惶惑，恐酿大变，务乞各界垂察。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叩。”10日，教育部发下239号批令云：“据呈阅悉，此次蔡校长辞职出京，本部已去电并派员挽留，该生等务当照常上课，此批。”且由部派专员到校宣慰，略谓：教育总次长已谒见总理，总理表示竭力挽留蔡校长之意，请同学安心上课云云。然同时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为挽留校长事谒傅总长。傅对各代表宣明自己诚恳挽留蔡校长之态度，各代表复问总统总理之意如何？傅默然有间谓：总统总理之意见余未深知，无从代为宣布云。各代表退后，教职员会中遂有“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之决议，同时北京社会除教职员学生外，尚有其他一二团体共举代表13人赴津劝挽，如不在津拟追踪至沪，并有必达到目的而后已之宣言。至12日府院方面仍无表示，于是同事各学校开学生代表与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于北京大学理科第一教室。当由学生总代表

段锡朋报告午后一时学生联合会业经议决之案，大致谓：蔡校长出京之初，该会即议决三步办法：第一步要求政府诚意挽留，第二步即各校全体罢课以待罪，第三步即各校自行解散以与蔡共去。今由代表等一再讨论，认为第一步已至绝望期，候明日即可实行第二步罢课办法。旋由某校校长姚某出而演说谓：学生三步办法彼亦极端赞成，惟罢课一层尚须审慎时机，不可草率出之云。终由北大教员康宝忠提议，请于翌日上午推举代表往府院为最后之询问，如无满意答复再罢课，拟请学生诸君暂为等待半日。众赞成，并由在座各校学生代表担任疏通。13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举代表9人晋谒总统总理，请表示对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辞职之真意，学生联合会亦有呈文请其转递，于是各代表先往国务院。总理因其时正与外人有所拟商，由郭秘书长代见，据称：蔡校长辞职，总统决计挽留，指令刻已拟就送印，即可于公报发表云云。代表等以总统态度既已明了，毋庸再赴公府，遂即联袂返校，据情通告学生。

（4）政府之明令挽留 14日晚挽留蔡校长命令与挽留曹汝霖、陆宗舆命令始一并发表。其挽蔡命令词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求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著毋庸议，此令。"而同时并为五四学生事，下令京内外各长官，严禁学生纠众滋事，其第一令有云"……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其第二令复云"……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总期成德达材……"。盖政府一方挽留蔡校长，一方又挽留曹陆，一方又认学生之事为作奸犯科，于八面求圆之中而寓以袒护国贼之意，政府挽留蔡之诚意果安在哉？

（5）各校长之相率辞职及傅总长之毅然逸去 自9日国立大学蔡校长辞职离京后，其他各专门学校如工、法、医及高师各校长皆相率辞职去校，于是学校方面属望教育总长挽留各校长之心愈切，而政府方面责备教育总长放纵学生之罪愈苛，于是傅氏乃不可一朝居矣。十四五等日，北京各报喧传教育总长傅增湘失踪，或云实在西山某寺中，或云14日确有人见其自汤山回宅亲笔署名于批留蔡校长之指令者，惟据其家中人言，四五日不见，正在寻找。夫以堂堂总长行踪诡秘若此，盖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焉。15之夕遂有教育总长傅增湘呈请辞职，傅增湘准免本职之令，而以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

（6）某派欲垄断教育大权 是时适值上海和会破裂，南北和议代表全体提出辞呈之际，某派于16日在太平湖大开会议，其结果得三大决议：(一)关〔于〕欧〔洲〕和会之件，除山东问题一致反对四国决议之结果外，余诸种问题均听政府意思之处置；（二）关于国内和会之件，首由王某报告南北代表总辞职之原因，并将院致朱总代表准其辞职之咸电宣读一过，以示和会之破裂，众皆鼓掌称快，庆其主战主义之大胜利；（三）教育总长问题，有人报告由该党首领与政府交涉之结果，已提出该派重要人物田应璜，众皆欣然喜其势力从此复伸于教育界，当时并有人大呼云：自有会议以来无如今日之痛快者。田应璜长教育既决定，复决以黄云鹏或吴文瀚为次长，于是教育部之各司长及其所辖之各校校长皆有所拟议。且有北大教员胡钧者，湖北某县人，新国会开幕之始即卖身于某派，当五四事件发生后，乃首趋曹章之前慰问，并痛訾学生之无礼。北大学生闻之，为绘极秽亵之讽刺画张贴各宿舍中，见者莫不指其善话之长舌以为笑，至是某派直欲以此人继蔡任接办北大。

（7）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当政府拘捕专门以上学生，逼走大学校长之际，在京中学学生当仁不让毅然加入专门以上学生之团体，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俨然

一宪政国家之模型，且其评议会秩序之整饬决事之迅速，较象坊桥畔历届之国会有加万万焉。而女师范、协和女学等校皆常举代表莅会旁听，且有发言权，为该会运筹决策。其会纲如下：（一）本会定名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二）本会以尽学生之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三）本会由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组织之；（四）本会设评议会，由与会各学校每校举代表二人组织之；（五）参与本会之各学校，每校组织一学生干事会，其组织细则由各校自定之；（六）本会评议会有议决本会纲第二条所规定以内应行事项之职权；（七）参与本会之各校学生有循行本会评议会所议决应行事项之义务；（八）本会评议会议决事项：（甲）关于全体者，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乙）关于各校者由各校代表转达各该校学生干事会执行之；（九）本会评议会公举正副评议长各一人，正评议长综理本会一切事务，副评议长襄助之；（十）本会评议会之集会分：（甲）常会每星期一次于星期举行之，其集会之时间与地点临时酌定；（乙）特别会无定期，于必要时由评议长召集之；（十一）本会经费由与会各校学生分筹之；（十二）本会至适当时得由与会各校学生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解散之；（十三）本会纲有未尽妥善之处得由各校代表之提议经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修改之；（十四）本会纲经本会评议会议决后发生效力。

（8）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盟全体罢课 罢课问题事极重大，故联合会对于此事表决极为审慎，曾提出三次：第一第二皆以时机未至未能通过，最后以政府将任田应璜长教育，各校校长皆将更动，于是为维持教育根本计，遂由联合会议决，于20日凡与联合会之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其罢课宣言书云："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钧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夫青岛问题学生等争集之焦点，今议已决矣，事濒败矣，卒未见政府有决心不签字之表示，而又破裂南北和议以资敌，学生等之失望一也；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人皆曰可杀，乃政府不惟置舆论之掊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之，表彰其功德以与教育总长傅公之免职相况，外间复盛传教育全局举将翻动之说，国是前途何堪设想，学生等之失望二也；5月14日两令：一则以军威警备学生，防公众集合，一则禁学生干政，凡公忠爱国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见，留日学生以国事被拘，政府则置诸不理，学生等之失望三也；学生等之为学，恃有此方寸之地耳，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乱矣。谨于5月19日一律罢课，至三失望之回复为止。至罢课期内仍本我寒电宣言之大纲，始终无悖，一则组成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以备我国家不时之需；再则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使国人皆知以国家为重；三则由各校自组十人团维持秩序以纾我国家内顾之忧；四则以暇时潜心经济，俾勿负我国家树人之意。学生等深受教育，修养有素，凡所作为皆循我智仁勇之国风，决不致逸轨道而遗我国史之羞也。学生等一任良能，行我良知，知我罪我今非所计，惟付诸百世后之公评而已。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巧叩。"同时并上大总统一书，则本宣言理由而分为六不解，即以六不解而为六项之要求，其大致云："……谨于5月19日起暂行停课，借图挽救，伏望我大总统本全国人之公意，对于青岛问题出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1）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2）力挽傅蔡诸公回职，打消以田应璜长教育之议以维教育；（3）撤废警备学生明令，以重人权；（4）向日政府严重抗议，释被拘学生，重惩日警，以重国权；（5）恢复南北和议，速谋国内统一，以期一致；（6）……"。

（9）**罢课后之种种进行** 罢课后之进行可分数项：（一）讲演团。（二）国货维持会。（三）发行日刊。（四）护鲁义勇队及十人团讲演，分七人为一组，其组数之多寡，视各校之人数为正比例。国货维持会分调查、文书、推行三组，推行组专以贩卖国货为事。日刊原议发行“五七”、“五四”两种，旋因绌于经费暂出“五七”一种，而“五七”出版未3日亦被政府封禁，移至天津出版。以上四者以演讲团、国货推行组进行最发达。自5月19日以后北京全城各街、各胡同、各游戏场无不见有演讲员及贩卖国货者之踪迹。而护鲁义勇队以清华学校创办为最佳，该校高等中学全体皆加入，除请该校军操团团长会同军操教员订定操演枪法战术外，并聘有陆军官授军事学。编者当时曾因事往该校，见其中人多荷枪佩刀，而同学相见莫不行军礼，且校内张用布棚多幕，森严威武，俨若战地，令人想见古代斯巴达之国风。

（10）**政府之压制种种** 学生当罢课宣言及上总统书之初，国务总理钱能训氏对于教职员联合会代表曾作口头答复，略谓：（一）对青岛交涉，政府签字与否当察看情势如何；（二）曹章诸人卖国，苟有凭据，不妨起诉，若任口而谈，政府将如何办理；（三）田应璜长教育之说，现已撤消，部事暂由袁次长代理，蔡校长当极力挽留；（四）14日命令非专为学生而言；（五）留日学生之事，政府现已提案与日本交涉；（六）沪和会之维持，政府更急于诸君，幸现已有转圜之机。钱氏之口头答复虽如此，然仍本14日总统之两令，严厉干涉学生之讲演与集会。25日北大法科开商学恳亲会，横被军警蹂躏。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此等消息政府闻之，愈起恐慌，乃急觅毫无恻隐心之王怀庆代李长泰为步军统领。其意以为王氏本有屠夫之先声，学生或有所惮而不敢再动也。且封闭“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学生为保释被拘者往警厅，则并保人而拘之。此24日事也。同时并封闭北京“益世报”，并派兵监视在京有力之各报馆，凡新闻非经政府许可登载者不得登载。前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虞维铎者，曾出为学生调和，至是亦迫令辞职出京。2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长，令其会同教职员督率学生限3日内一律上课，于是街衢中步马军队往来如织，凡讲演团所至处必夺其旗帜、碎其传单、驱遣其众而后已。其有校址在郊外如清华等者，则闭城以拒之。于是学生乃变其手段，假贩卖国货之名，行个人讲演之实。不用旗帜，惟携一囊，中实盥栉用具及书报之属贸易于人丛中，凡有购其物者，交谈而后即告以学生罢课贩卖国货之宗旨，或于卖货传单中连类而及其欲吐之言。以为无论若何横暴之政府，断无禁人自由营业之理。惟于部令上课一层则均置诸不理，且于上课限满之日（即28日），在高师风雨操场召集临时代表会，共同决议：凡罢课各校同学自29日起均将行李书籍等物收束齐整，专俟政府下解散令即行全体出校另谋救国。6月1日大总统郑重其词而下两令，略云“……曹汝霖迭任交、外、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覆按……”，“……前者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游行，酿成纵火伤人之举，……诸生朸业有年，不乏洞明律学之士，诚为权衡事理，内返良知，其将何以自解？在京者责成教育部，在外者责成省长暨教育厅，督饬各校职

员约束诸生即日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于是警备司令段芝贵暨步军统领王怀庆等变本加厉，直视学生为土匪，虽贩卖国货者亦必逮捕7人以示威。清华高等生有名徐曰哲者，即于是时忧愤过度，呕血数升而死。

第四节　六三、六四政府之大拘捕

（1）六三当日之情形　自五四至六三恰整一月，此一月经过之情形既如上述。东儒有言“欲为蒲柳斯蒲柳矣，欲为松柏斯松柏矣”。颟顸当轴蹂躏学生人格至于此极，是正我新华中坚之青年主人为蒲柳为松柏之试金石矣。在6月1日两令未颁以前，为学生束装待解散之期；自6月1日两令既颁以后，则为学生准备牺牲自由及身体以争人格之期。乃镇定从容于此最短时间秘密决定：于3日上午10时每校派数百人同时出发恢复讲演，预料政府必逮捕拘禁，翌日则加倍出发，又翌日又加倍出发至25000人尽被拘禁而后已，若有鞭笞杀戮则情甘共受。当时诸生群相谓曰：古称田横500人同死，为吾民族侠烈史著一异彩，今吾侪其四五十倍之矣。3日10时20余校每校数百之讲演员皆卷旗置怀中，陆续散行至其预定地点齐集，忽出其讲演员之徽章，树其讲演团之旗帜，大言炎炎而谈爱国。时则街衢间本有灰衣军人（王怀庆兵）往来逡巡，于是将执旗者、讲演者，两人挟一人捉往警察署，余则碎其佩章，推之使去，至晚已共得178人，旋送往北大法科拘禁，于是化学校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矣。校之内外均下军幕，驻扎军警，近校一带道路禁止行人来往。此178人收禁之初，年龄、籍贯、亲族等等皆勒令填报，一若即刻处死刑者，而此被捕之人自早入狱至晚皆未得杯水入口，有送衣服行李者皆被阻绝，中有中学年幼生仅十二三龄者，至夜深饥寒而泣，而军警长官在旁监视，亦若毫无动于心者。时有北大法科讲师吴学宽暨学生曲维藩等均在校，猝未及避，嗣自内出因与禁卒言语冲突，皆受批颊之辱。

（2）六四之再接再励与女学生之继起　六三之夕学生再接再励之决心已为政府所闻，而政府亦即多为准备。于六四之晨即饬军警分据北大文理两科以为第二、第三拘禁所之用，且于附近胡同多支用帐棚以示永久围困之意。是日各校学生仍依六二夜之议案进行，讲演员较六三人约加一倍，各向预定地点出发，军警拘禁情形一如昨日。惟彼此均有准备，手续较为简单，且不经警署直送大学拘禁。是日被拘人数将近八百，合前后所拘约千人。法科不能容，乃分禁理科。然同出讲演而未被拘者则力请入禁，不似昨日之和平也。因此在法科门前学生与禁卒冲突，致高等法文专修馆学生方敦元及工专学生陈峥宇、聂肇灵三人俱受重伤。是日在京基督教徒相约宣言，自当日起暂停传教之讲演，而为援助学生之讲演。北京女学生自五四而后屡欲加入男生团体，然皆惟其领袖校高等女师范之马首是瞻，而高师又受该校长一人掣肘，遂不果行。盖该校长方还新受政府五等嘉禾章之宠命，极欲结欢权贵以自固，是以方事之初，即一再要胁学生家长，谓该校如有罢课行为，即请该家长等各自领回学生，该校校址应完璧归还政府，绝不为学生运动场所云云。而我国北京女生家长又类多顽固之徒，是以该生等忍而又忍，忍至6月4日已无可忍，乃有结队游行之举。是日午后3时，共15校，约600人，齐集天安门整队赴府，举出代表5人求谒徐总统。徐派秘书2人接见，代表等当述全体学生请愿之意，大致一谓请释被拘之男生，二谓以后请勿干涉学生之讲演。并交请愿书一件托两秘书转呈。秘书答谓：来意定为转达，一星期内总统自有正当答复。代表等又反复陈述，词意

极为恳挚，秘书等颇为所动，至4时许始全体退出，复分头讲演以示继续男生之意，军警仅予干涉，未遽逮捕，亦可谓特别优待者矣。4日讲演员被拘之数既数倍于3日，于是在外学生迭请职教员间接向军警交涉送衣送食，谓：犯法者如有死罪可以杀、可以绞、可以枪毙，但未闻有冻死饿死之刑罚。禁卒不得已，仅许由校供稀粥、由外送行李，然体弱者多已受病。

（3）六五之急转直下　六五之晨，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发出宣言："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均鉴：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其后事理纠纷，三失望踵至，不得已而致于罢课，寒巧二电之宣言言之详矣。皓日以后，政府极端威压，干涉交通，摧残舆论，学生等遂坐困于北京。然以三失望未复，绝不以时迁而气馁。先日两令：其一以劝学诱学生，以法纪威学生，是固因学生之所求而未得者也，勿庸深议；其一涉于外交，直不啻为国仇示私恩，为国贼作辩护，直欲以一纸空文掩尽天下耳目，而谓外交繁重，责在当局，则直灭弃民主国之精神，直欲任少数官吏包办卖国，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之挟持于内，概可知矣。夫国贼不除，则外交之挽救无望，国权不复，则世界之永久和平难期。学生等之于国贼，人皆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后快者，非仅为国家计，亦正为正义人道计也。为国家及正义人道计者宁避难？肴日以来，恢复露天讲演，被捕者一百七八十人，军警横加虐待，肴电已陈其概。豪日被捕者700余人，今日明日有加无已，是即明知其难而故蹈之也。学生等方当求学，惟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用布区区，伏维亮鉴。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叩，歌。"是时政府已得上海全体罢市之噩耗，始稍惶惧，急召集阁议，决定解放学生，禁止拘捕。而学生方面则出发讲演员数千人，大致皆数十人一组，携囊负橐，预备被拘，且亦不暇讲演，惟沿途奔走疾呼至于力竭声嘶不已（皆以白旗为号，旗一扬则全队大呼）。至诚所感，道路为哀，此往彼来，再接再厉，怒潮汹涌不可收拾，人心皇皇如受焚溺。军警至是虽无阁议禁捕，实际已无法拘捕，拘捕亦无处收容，惟有束手放任而已。学生余怒未息，更集2000余人奔赴北河沿大学学生拘留所，令军警一同拘捕，争持不能决。而在内被禁各生情形益愤，纷纷执旗登法科大楼，向临外楼窗扬旗怒号，军警亦无法遏止。此时适有急撤军警包围之令，军警遂抱头鼠窜而去，帐棚亦撤。惟被禁各生则相约勿出，且自组警备队以任门禁而维现状，并反拘警察7人，留军警帐棚二具以为纪念。又举代表若干人往警察厅喧閙，索此千人之伙食，卧具。警厅大窘，然不敢不应。犹忆自政府下令剥夺人民自由集会权以来，虽学生联合会仅仅代表数十人，皆被迫而移诸外人所办之汇文大学秘密开会，至是则集千人于一室，横议天下事，亦无人过问矣。又是日清华学校出发讲演学生最多，乃甫至西直门，军警已急令闭城，同时安定、德胜诸门皆闭，军警皆登埤守御如临大敌。及学生改道乘火车至前门车站，亦被军警强力阻回。清华忠勇学生十二三龄之幼稚者实居多数，又赤手无寸铁，莫能相抗，遂不得入城，计是日西直等门共闭6小时之久。又军警既撤，有劳动社会如某路车中之茶房等，皆以团体名义馈赠馒首数千或面包若干磅以表感激学生为国宣劳之意。此六五一日政府急转直下之大概情形也。

（4）解禁后之学生与曹陆章之免职　政府虽解禁，而学生仍不肯出禁以与政府为难。在外学生仍继续讲演痛骂国贼。各地军警虽多，皆不过侧目丧气，不胜揶揄之苦而已。是时政府忽免代理部务教育次长袁希涛职而易以傅岳棻氏。傅氏宣言此次出台专作调人，今后学生事概由教育部直接交涉，军警不得过问，惟同时令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教学两界颇疑政府无诚意留蔡，大示反对，6日教育部派代表陆参议等4人往劝在禁诸生回校，不得要领而

归。7日，大总统特派参议曾彝进偕教育部专门、普通两司长前往道歉，略谓政府对于诸君此次爱国举动处置失宜无可讳言，今日特派余等代表政府对诸君道歉，愿诸君回校休养。又谓诸君此次被拘，在此时间犹能严守秩序，有美完之组织，足征诸君学有根基，斯实教育之效果，余等办教育者观此亦足自豪。不过尚有一言为诸君进者，夫政府之不良，由于无良好之社会，今诸君反对不良之政府，而不思改造社会亦非计之得也。曾等去后学生开临时联合会讨论办法，佥谓政府对待学生毫无诚意，或以武力迫胁，或以客气笼络，均非学生所愿。如彼欲示诚意，当自惩办国贼始，彼一日不惩办国贼，我辈一日不出拘留所（指法科）。8日，复有人提议谓，与其在此死守，何如共至公府效申包胥7日之哭，不杀国贼，誓不返校之为愈。众赞成，于是乃由各校派代表10人至法科欢迎回校。8日晚，各校开会议决，自10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学校（女校亦加入）同往公府门前哭，请并各带行李以资露宿。10日晨，各生行李均准备停当，即待出发，而公府秘书忽来电话谓：学生所要求之目的已达，可勿至公府以免徒劳往返，并谓稍待数小时即送命令单来看。盖自5日上海罢市以来各地商人纷纷响应，10日已延至天津，而北京仍岌岌不可终日。且工人继起罢工，长江上下游轮船皆停。当时各地罢市皆以要求惩办国贼、保护学生为词，故10日上午政府迫于大势，始有准曹汝霖解职之令。而同时北京中国银行适接上海来电谓：如果曹、章、陆同时罢免，则上海商界可以疏通开市，否则危险万状。因此银行当局将此电转呈政府并历陈金融危险状况，谓与其后悔噬脐，何如当机立断。政府不得已，又于下午复以准辞职式，免陆宗舆、章宗祥职。卖国党犹猇猇然詈徐世昌卖友。延至13日，复迫于天津第二次之罢市（详见后章），始有保护学生之明令。

第五节　全国学生团体之新计划

（1）**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　五四运动之结果，既博得国中多数学生响应（事详后章），于是全国学界不可无一联合之组织，而组织之地点惟以上海为最宜。6月初间京、津、宁、杭各校代表先后莅沪，皆借用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右埭校舍为寄宿所，并在该校学生组织之戊午学会内暂设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9日由该筹备会电各地学生联合会云："各地学生联合会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我学界揭橥之唯一宗旨。奔走呼号义不反顾。兹敝会正在筹备中，此后进行程序尤以各地学生联合会为起点，而各校干事会又各地联合会之相辅机关亟应积极筹备。维规划远大，务祈荟萃纯洁之精神，共谋有秩序之行动，勿因暑假稍形涣散，乖离团体。但有少数同学因假思归，亦可不受拘束。但蕲本其宗旨，日以推行讲演，启瀹平民，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强聒于故乡父老之侧，锲而不舍，努力孟晋，虽使散居僻壤，亦足为各地联合会及各校干事会之声援也。管蠡之见，特以电陈，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12日，该筹备会复致全国一电云："各省省议会、各农、商、工会，教育会，各报馆均鉴：比以外交失败，祸变荐臻，凡属有生之伦莫不切齿痛恨于卖国贼，愤欲手刃其头，漆为饮器，寝皮食肉犹嫌宽纵，而政府优庇曲护，始则褒辞挽留，继则宠令慰勉，忍令枭獍当道，逆势熏赫，至使莽莽神州，无公理、无法律而独有卖国贼，士类寒心，弦歌辍响，停工罢市，于焉激成，全国陷于生机奄奄者数日矣。至昨晚，始有准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本职之消息，不知者或谓民气可畏，政府已稍挫锋芒，实则如曹、陆、章实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树铮实为元恶，倘不除恶务尽，虽有华盛顿莫与维新，陈东等之伏阙上书庸有济耶？同人等力竭声嘶，无复凭借，宁汉学生横被军警凌虐，忍病扶伤，哭声震地，惟愿国贼

早日剪除，此身生死罔所计较。务望国内明达本我智仁勇之国风共起讨贼，或诉诸法律以绳其奸，或形诸舆论以遏其焰，积极进行，再接再励，庶几国运方有休明之一日也。迫切陈词，伏维亮察。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叩，侵。”

（2）**全国学生联合会之成立** 6月16日，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假坐大东旅社开成立会，到者北京代表段锡朋、唐炳源、陆梅僧、许德珩、杨健、陆宗锷、黄炳蔚、罗国烺、张伯谦、罗发祖、黄日葵，南京代表曹公瑾、郎良、吴邦杰，天津代表张扬先，杭州代表连瑞琦、黄维时，上海代表陈纶会、何葆仁，留日代表凌炳、王之桢、刘振群，南通代表潘涧夫、罗元恺，武汉代表蒋元龙，潘澄卿，山东代表崔书馨、卓景泰，吉林代表吴仁华，安徽代表杨志先、常禹元，嘉兴代表葛敬庚、吴乃燮，宁波代表张其昀、丁福成，崇明代表施英、王欧，松江代表陈熹、王同福，保定代表吴震寰，苏州代表周承澍、尤敦信，九江代表邓毅生，扬州代表孔庆洙，河南代表李仁荣、李九朝，浙江代表魏篪君等三十余人（其余各处代表已在途中），及中西男女来宾黄任之、沈信卿、朱少屏、蒋梦麟、曹慕管、朱叔源、汤节之、邹静斋、李登辉、谢碧田、朱伯为、徐春荣、谢复初、周锡三君等，舒蕙贞、朱震寰女士等200余人。午后3时摇铃开会，由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君主席，宣读秩序单次，唱歌，全体起立，向国旗行三鞠躬礼。次主席致开会辞，略谓：我国废科举，兴教育，20余年于兹，学制频易，略备规模，年来各省教育当局开教育联合会于上海，审察世界大势以定方针，教育前途颇有发皇之象。惟教育之目的在使学生自发挥其本能以谋人类幸福，而缘历史沿革，宋大学生陈东等亦能自动谋国家之福利。矧复欧战结果，暴德败衅，世界新潮澎澎东来，上下杌陧，无不瞋目惊愕谓：非以纯洁高尚之学生，起而提携国人，因应世界之潮流，则国将萎茶颓朽自归弱败。我学生界不敢告劳，因而组织学生联合会，不越一月，各地纷纷成立。兹本会成立于沪上，而各地代表又纷纷莅止，合全国之青年学子欢聚一堂，共谋读书报国之道，事体重大，匪异人任，尚望莅会诸公有以指导之。次教育界黄任之演说，略谓：立会必须慎始，俾他日易于发展。此次风潮由于国会及各地方团体之不能尽职，学生起而代之，殊为可悲。鄙人固尝尽其能力以图挽救，然亦限于发电，甚歉，颇望各界为学生轻其负担。至将来之进行，对外必先对内，外部巩固须内部有完密之组织，全国联合会须求名副其实，会内职员宜相亲相爱不生猜疑，则大效可期云云。次东吴大学法科教员西人蓝金君演说，略谓：贵会对于国事为消极的抵抗，甚佩！鄙人深信在沪之西人，无不与贵会表同情。贵国时局危急，其境遇与敝国百年前相同，按南京约法人民得请愿制定法，故学生应赴北京请大总统召集合法制宪国会，使全国人民知人民之权利，知政府当由人民组织，根本解决须有合法政府云云。次蒋梦麟博士演说，略谓：吾尝探究此次运动之原因：（一）普通世界之民主主义，（二）南北政府为人民所不信任，（三）北京大学之新思潮自青岛问题发生，学生始知旧式领袖无一可恃，于是自身起而为之，此为最近之原因。今学生既负责任，应即有一团体。至进行上：（一）多发行印刷物，（二）声明服从学校规则云云。次惠中学校教员西人柯福特君演说，对于学生会有二种之注意：（一）学生联合会并非政党，（二）学生尚在求学时代。次商界卢炜昌君演说：此次事不应独令学生负责，应由各界分任。次沈球鼎君演说，略谓：学生代表其救国之热度胜于国会议员多矣，望勉负责任，不顾身家，善为组织，此会与教育会、商会、国民大会等共尽天职，中国可以不亡云云。次工界吴琢之君（求新厂）演说：学、工、商本并行，但工界程度低，未受教育，致有以下之现象：（一）嫉妒心，（二）保守性，（三）少团结力。希望学界知识普及工界，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家云云。次仲中君（铜铁公会)演说，略谓：

工无教育，制物不精，以致推行无望，故提倡强迫教育实为要举。此次工界除罢工而外，不知尚有更要于此者云云。次报界邵仲辉君演说，略谓：北京大学去年宣言“求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求学”，已由言论成为事实，推之工商亦可引用。此次“五四”、“六三”运动已将学生不得干预政治之说打破，末谓工商两界宜自行组会与学界一致进行云云。次上海学生会会长何葆仁演说组织本会之经过。次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演说望学生去虚荣心，保持坚忍心。次由主席致答辞，遂唱歌，茶点，摄影而散。17日开会通过章程。18日开会选举职员。

第三章　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

第一节　京外学界之响应

（1）**风潮初起时之响应**　自五四北京32学生被捕后，津沪各地函电交驰，请政府速释学生并反对解散大学。如天津男女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共10人电政府略云：“……此间各校学生闻逮捕多人，情殊惶切，因尊重校誉仍勉抑感情……祈将该生等早日释放，并力争青岛交涉以安学界而顺人心……。”上海南洋公学等20余校电政府略云：“……乃闻警厅拘捕学生30余人欲加死刑……则吾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想政府亦不能尽戮全国学子也……”。芜湖男女学界致电政府请释学生，留日学生救国团致北京学生电略云：“……望益奋勉，敢为后援……”山西大学来电愿取一致行动。而保定学界亦有救国大会之计划，被压于督军之威而不果行。

（2）**蔡校长被迫出京后之响应**　蔡校长出京后，北京学界风潮益烈，而各省附和者亦日益众，兹且将各地情形简单次第述之如下：（一）5月11日天津学界联合会成立，宣布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当集捐款六七百元，除发通电费外，余作该会资本金。次日女学界复为为国牺牲之郭钦光开追悼大会，到会者1500人，追悼毕，提议组织爱国团，以抵制日货维持国货为宗旨。后复开中等以上男女学界全体大会追悼郭君，且执白旗游街以表开会宗旨，不外继郭君而起之意。（二）上海于11日学生联合会报告成立云：“各省教育会转各学校鉴：本会今日成立，期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请即日响应，复电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华民国上海学生联合会。”15日又宣言云：“……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思想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今与政府约，请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出最后之手段对付……”（三）武昌15校2000余人，每校各举代表二人于11日开会，惟被督军压制，不能畅所欲为，仅捐款拍电而已。（四）南京学界致电北京云：“大学干事会鉴：同人对于贵会爱国热诚，深表同情，自当协力进行，同申正谊，南京学界全体，寒。”（五）安徽、山东学界亦有电到京与南京，词意略等。（六）保定学界关于挽回外交、提倡国货等事亦与北京有同样之鼓吹。（七）福建学界电沪各报主张争外交，惩国贼。（八）浙江省12日举行学生游街大会，与会者共16校，计5000人，所有之旗帜传单等事与五四之北京仿佛，且学生讲演亦甚盛。（九）江西省城学生与浙江省城学生亦有同样之举动，人数亦略相等，惟江西有小学生，未能如浙江游行30里之远耳。（十）常州女子师范实行组织讲演团，并以各种广告旗帜为附佐品，以为北京学生之声援。（十一）烟台学生于5月

17日开游街大会，到者28校，游行街市秩序极严，且决定力争青岛、抵制日货、联络各界诸办法。（十二）登州第八中学闻五四运动以后即联络东省中学师范各校暂作北京学界后援，且于城乡各处设立讲演团。

（3）京学界罢课后之响应 北京各校同盟罢课系19日事，京外学生响应之次第如下：（一）23日起，天津中等以上公私立15校万余学生一律罢课，宣言失望，要求政府，其词意与京校学生略同，且即日派过半数同学出外游行，讲演。至六三后，所有北京男生被围、女生请愿等事，天津皆有同样之现状。（二）24日，济南罢课抵制日货甚力，盖该处学生受切肤之痛自较他省人尤为情切也。（三）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25校约2万人一律罢课，是日全体学生假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宣誓典礼，先后齐集会场，各以校旗标明行列，分队排列，全场几无隙地，场中竖立木杆为悬国旗之用，旁搭一台乃讲演之所。由会长何葆仁君登台布告行宣誓典礼之意旨及其必要，即由贫儿院军乐队奏军乐，童子军升国旗，旗上乐止，脱帽向国旗三鞠躬，乃宣誓曰："民国8年5月26日，上海男女各校学生万余人谨在中华民国国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谨誓。"誓毕，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联合会万岁！"呼毕复游行各路一遍。观者不下30万人，莫不为兴感焉。（四）同日南京夫子庙官牌楼前有学生讲演团提倡国货，举动和平，惟语极沉痛，忽蜂拥来全班警察，令行解散，坚以奉长官命令为词。学生诘之曰：君等长官皆中国人，岂不许学生救国而甘为人奴隶牛马耶？时听者击掌声雷动，警察语塞，老羞成怒，致将旁听之甲乙某痛击数掌拘往区署，学生随往保释。警厅传知各商民将悬挂欢迎学生爱国旗悉行撤去，并下令禁止演说及散布传单等事。于是群情愈愤，乃于27日师范学校及其他学校一律停课。（五）上海华侨学生会接南洋华侨学生电云："上海华侨学生会鉴：誓杀曹章及其余国贼，取消密约，提倡国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南洋雪兰莪24校华校学生，沁。"（六）保定本继天津而起，于28日即罢课，惟在军警监视交通梗塞之地，其宣言书至6月2日始传出。（七）广州5000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并提议办义勇队、学生工厂等事，又电挽蔡校长期其办学十年。（八）31日河南中等以上各校一律罢课，但论者多归功于女师范生。盖赵督军事前防范甚严，除军警监视外，并贿属汴垣各报勿为鼓吹。20日师范生任女士致函男校责以大义，并赠以红裙一幅以辱之。而阎女士复断指书"坚持到底"四字，当时鲜血淋漓，后复伤风以致全手肿起，医者谓病甚危险，诸生良心赖以激起，而罢课之议始决。（九）福州学生25日开游街大会，当时该学生等尚未知北京学生罢课也。（十）杭州中学以上学生29日起一律罢课。（十一）安庆自京潮发生而后，倪督禁学生演说甚力，所有沿途粘贴传单悉予撕毁，遂致群情愤激而无所泄。延至二十六、七等日，乃有全体罢课之密议，事为吕省长所闻，急令警察厅立发布告，略云："……如有纠众滋事紊乱秩序之行动，依法逮惩……遇有学生发布传单违法纪而不服取缔者，一经查出，即行依法严办，决不姑宽。"不料告示甫出，则传单密布，且益加多。29日，即有数学生不肯上课，复公推代表12人拟质问官厅撕毁传单理由。当经当事校长查明代表学生姓名，一律开除，以致众心愈忿。30日，所有省垣中等以上各校一律罢课并结队游街发贴传单，有"你们撕，我们贴，见人心，终如铁"等语。岗警干涉被学生殴击者颇不乏人，教育厅即飞电督军，比得复电限三日内各校学生一律解散，勒令回籍。迨六三京潮再起时，皖垣中等以上学生已被驱殆尽矣。（十二）湖北武汉学生联合会于31日开大会议决即日罢课，1日晨分组出发沿街演说，忽有军警多人蜂拥而至，大呼捉拿，高等师范学生陈开泰为军警拘捕，刺穿两腿，伤及腹部，血流为〔如〕注，登时倒地，

医药罔效，经日而死。其余被捕者甚多，文华大学二人亦受伤。王督军并声言捉到即枪毙，拚替一个督军一定要办到格杀勿论地步。盖当武汉学生演讲之日，正王氏受日本天皇赠勋之时，督军署中方悬灯结彩，大开庆贺，宜其不愿受学生累，失日人欢。然学生方面则不屈不挠，谓剩一人存一息皆誓不甘为奴之奴，则其5月中下两旬吞声饮泣之状已可想见。而国中学生与武汉学生同一境遇，如奉天吉林等地忍辱含垢而未能一吐者尚不知几也。

第二节　工商各界之响应

（1）5月间各界之情形　五四运动实为人人良心上主张所欲为而不敢为，故五四运动除一二曹章私党外，未有不表示赞同者。即以五四当日而论，学生自天安门出发往曹宅，市民加入者颇不乏人。而次日新国会山东议员即提案请政府查办曹、陆、章。京师总商会开紧急大会，全体议决通知全国商会抵制日货以为学生后盾，且致函各机关为被拘学生请命。北京商会暨全国商会联合会双方名义行之。同时市面所流行之日本钞票概予璧还。上海和会总代表唐朱亦先后有电到京，请释被拘学生。兹将工商各界响应北京学潮之情形次第述之如下：（一）山东各界62团体联合大会35000人通电中外为北京后援。（二）上海各界多停业一日开国民大会于公共体操场，到者20000余人，人手一白旗，鹄立烈日之下，议决三事：(1)惩办国贼，（2）致电欧和会争青岛，（3）请政府速释被拘学生。又商帮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提倡国货，二不装某国轮船，三不用某国钞票。（三）旅京山东劳动者于5月11日上午开恳亲会于彰仪门外之旷野，据其与会会员之姚爵舟君报告云：山东劳动社会皆立志宁为中国鬼，不为日本人。其上总统书有“……民虽愚劣，以生命作为后盾……”等语。（四）上海和平联合会致电北京学界“……四万万人皆愿为诸君后盾……”。（五）上海著名各大报特专登广告声明自5月14日起不收日商广告并日本船期、汇市、商情等。并大书曰：愿同胞牺牲私利一致用国货。（六）宁波扛帮船夫既得到北京学界义举消息后，即同盟不搬日货。某日公司由上海运煤一船往宁波销售，因无人挑运，原船装回原地，自是该公司是条商航断绝矣。（七）京北南口一带工人，相约誓不为日人作工，不购日货。商界中如和合公司有百余元之日货付之一炬。旅馆之日本器具全皆焚毁。其他商人亦立誓永不贩卖仇货。(八)5月寒日山东省议会致大总统电云：“……此次北京学生之义举，实护〔获〕全国人民之同心……乃5日、9日命令，有谓学生干涉政治，扰及公安，应送法庭依法办理等语。查曹章辈为我大总统任用之人，罪而不诛，激成众怒，犹不迅置刑辟以谢国人，反借法律为词摧残士类，在持身为怙过，在谋政为养奸……舆情即不足恤，青史讵能宽假，辱国丧名，窃为我大总统不取也……”（九）天津商界驻日本大坂买办来电，大略谓：现在订日货拟全数退还，不日即将全体返国。天津各商店得电后非常喜悦，并声言诸买办此举甚是，虽因此有多大损失亦所不计云云。（十）5月筱日烟台国民外交后援会电云：“外交失败，举国同愤，烟台93000人誓死不能承认，请一致力争。”（十一）国会议员王觐彤、李安明、恩克阿穆尔、纳谟图、王乃昌等佳日通电全国，请一致响应北京学生以救中国而诛卖国贼。（十二）长辛店铁路工人多自行组织十人团，储金救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之商人皆一致排斥日货，并与西南联络筹议救急方法。

（2）6月间各地之罢市罢工　罢市罢工之事与五四运动有绝大关系，学生所以能得最后之胜利，曹章等之所以能免职，其原因皆在于此。其所以激成罢市罢工之事，盖为六三政府拘

捕学生。兹将各地罢市罢工之情形述之如下：（一）6月4日上海既得北京大拘捕学生之消息，人心大愤，自5日起一律罢市。当日门上所贴条告及所悬旗帜大致谓为营救学生而罢市，6日以后则复添“不除国贼不开门”等之字样。其告布外人则云：“敬启者：民国不幸，学生罢课，今商界又罢市矣！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诚，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二）6日沪江浦东、江湾、闵行等镇罢市，而求新厂、浦东各厂，华商电车公司等亦同盟罢工。（三）6日松江、宁波、厦门罢市。（四）6日南京罢市，有学生组织之童子军在街面维持秩序。7日警察厅长王桂林谬谓该军侵其权限，要求学生联合会下令撤回。讵童子军甫撤，警察即强迫各商店开市。各商民大惊，以为商家闭市出于爱国热诚，自愿牺牲一切，且系自由权限，外人不能干涉，力拒不允。学生联合会当开紧急会议，恐商界受其压力激成变故，遂组织学生维持秩序队，便衣出发，由各校分组分段担任勤务，沿街鹄立。警厅见状，即加派双岗武装戒备，快枪刺刀如临大敌，便衣逻卒往来如梭。至12时许城内坊口大街、三牌街及下关商埠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拘去学生多人。商民闻之益愤，誓不开市。王警厅长及各区署长亲往各处劝喻商民开门营业，亦无效。南京总商会于下午复开紧急会，各业董绅学报各界到会者约300人。甫将开会，当有男女学生百余人携带血衣一件拥至商会，泣求万勿受警察压迫开市，学生虽捕完、杀完在所不恤。闻者泣下。比推出金陵大学李庆麟、第一女子师范钟锦田、金陵神学女学生李怀思、高等师范吴厥熙、第一工业吉斌俊五人参预会议，报告午间各校学生被警察击伤：下关24名，身受重伤者6名，已抬入医院；城内19名，内有14岁幼童一人，被宪兵司令部宪兵捕去吊于树上，用鞭痛打。此血衣由下关送来者，尚不知何校学生，何姓何名（按系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受刺刀伤，比即送往鼓楼医院，几死复苏），请众验看。当场学生皆放声大哭，谓苏会长曰：请勿作学生看待，即当作会长子侄看待，于心忍乎不忍？旋由下关商会代表某君，当场为学生证明警察殴伤甚众：下关商界全体大动公愤，已联名公请军民两长将此惨无人道之警察署长王固磐撤换。随将传单取出，请众观览：“启者：本埠警署制止学界游行，纯以武力，甚至拔刀伤人，群情非常愤慨，以致激成罢市风潮，凡我同人目睹情形无不伤心落泪。现已公同发起并分举热心时事人起草联名具呈军民两长，撤换警署长以维现状，赞成诸君请各签名加戳一致进行可也。此布。下关商会全体公启。”比由各业与学生代表订定交换条件三种：（1）劝学生自明日（8日）起三日内勿上街游行；（2）省城及下关各商店在上海开市以前决不开市；（3）由会长请见军民两长保释学生，其非法逮捕由学生与警厅以法律解决。（五）7日镇江罢市。（六）8日苏州、常州、无锡、扬州皆罢市。（七）9日杭州罢市，多书“良心救国”四字于门，并全体宣布不除国贼不开门。（八）9日上海浦东陆家嘴各工厂及江南全体罢工。（九）9日招商局江新、江轮及甬班之新宁、绍新、北京等轮船水手罢工以致停驶。（十）10日长江轮船，沪宁、沪甬两路因受罢工影响均停营业。上海人力车夫马夫一律罢工。电话局华人罢工。电报局司机生因关系重大未便罢工，亦于是日予北京政府以最后警告。洋行华伙会议罢工事，有谓此恐伤及外人感情，有损邦交，遂忍痛为之。（十一）芜湖8日罢市，9、10等日商会长暨警厅长出而干涉，旋开旋罢。（十二）安庆8、9、10等日切实闭门停交易者惟中华书局一家，且书一联榜其门曰：“若罪陈东，国亡无日！”“不除庆父，鲁难何平？”（十三）江苏无锡罢市后复开公民大会，议决停纳租税。（十四）10日汉口、济南、天津罢市，北京政府已准曹、陆、章辞职为转圜矣。12日武昌、九江犹继续罢市。

第三节　京外学界与其他各界联合之响应

（1）**上海**　6月6日（罢市第二日）下午2时，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假座总商会开联合大会，先由南洋公学等校童子军到会分班站立，各界次第到会，计1473人。秩序整齐得未曾有，公推商会会董谢蘅窗为临时主席，叶楚伧、张东荪为书记，朱少屏、沈卓吾、朱叔源、陈良玉为纠察。谢就席后请商业公团联合会长邹静斋君代表宣布开会宗旨，邹君略云：此次全体罢市因北京学生为军警拘捕而吾商会前日亦受同样之待遇，同人等为力争自由、惩办国贼而辍业。昨日曾电致北京，迄无答复，吾人不得不再求进一步之办法。望到会诸君详细讨论。绍兴同乡会代表曹慕管云：昨日提议惩办国贼为一致之主张，现须以单轨行动达其目的。自商人罢市，现已两日，而官吏全无觉悟，此在专制时代犹所仅见。鄙意发表宣言，申明再无办法，全体商人不纳租税。众大鼓掌。曹君演说毕，主席报告省长派实业厅长张轶欧来沪与各界接洽，并云省垣军民两长愿协力要求免曹、陆、章三人之职，现沈知事来约与张熟商办法。曹慕管云：厅长不来会直接就商，即可见其绝无诚意。朱赓石君云：实业厅长之来，乃官场圆滑手段。遂将此议打消。邹静斋君主张以曹君停止纳税之说付表决，全体赞成。南洋公学教员俞希稷主张求援国民。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君劝告商人下牺牲决心，皆声情哀激。时有南京路某商店代表到会报告工部局干涉罢市事，当即推定代表汤节之、蒋梦麟、俞希稷、虞洽卿、邹静斋五君往英美领事公馆疏通。继由蒋梦麟宣读推定临时干事之名单（报界另函日报公会推举，暂未推定）为谢蘅窗、卢炜昌、徐乾霖、汤节之、冯少山、徐春荣、赵晋卿、蒋梦麟、黄任之、曹慕管、朱叔源、何葆仁、狄侃、恽震、朱承洵、舒志侠、陈良玉、陆维镛、邹静斋、虞洽卿、田时霖、穆藕初、聂云台、张乐君、苏筠尚。临时干事推定后，朱承洵提议既有干事，应有办事地点，总商会既赞成于先，当能成全于后，可商请借余屋一间为办事地点。众赞成。继复将拟就之对内对外宣言及致北京与各省两电当众宣布，经众通过。后有朱伯为、谢碧田、舒蕙贞等演说，至3时闭会。其致各省电云："北京教育会、各报馆，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各公团，各报馆鉴：北京政府庇护卖国诸贼，主签亡国条约。北京学生为国请命，突被滥捕，毒刑至400余人之多，高压毒手，显非空言所能挽回。此间工商界全体于本日起一律罢市与学界一致进行，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乞与应援，涕泣布闻。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叩。"其余一电两宣言书与此意义略等，惟宣言中声明此举纯系对内，对外仍守相当之友谊而已，兹不备录。迨罢免曹、陆、章命令到沪，11日（罢市后整一周）晚商学工报联合会复假座青年会开会，到者数百人，由汤节之君为主席，宣告曹、陆、章免职命令，已由英法领事证明确实，议决各商店于明日（12日）下午2时一律开市，并通过。嗣学界某君提出之段祺瑞、徐树铮不准上台案，格于有势力之某方面，通不过（此所以激起平民商会也）。后忽商界群谓非学生出而游行，决不开市。12日学界果游行，于是上海工商界复业，他处工商界亦闻风复业矣。

（2）**天津**　天津自受五、六两月京学潮之震撼，本有绅、商、教、学四界联合会之组织以谋一致进行，迨10日津埠全体罢市，所要求政府者二事：一请惩办卖国贼，一请下明令保护学生，并有不达目的誓不复业之宣言。讵夜半省长曹锐与政府代表国务院参议曾彝进相约到商会出示曹、章、陆免职令三道，曹省长复垂涕劝导，商会遂允许开市，并立发通告。11日晨除一二稍有国家观念者仍闭门辍业外，余皆纷纷开市营业。当时联合会之学生本拟全体赴

商会质问，何以目的未达，遽食前言而开市。后恐布人不知底蕴反滋误会，乃推举代表5人连同正会长谌志笃、副会长马骏共7人赴商会开四界联合会讨论办法。列会者有商会会长叶兰舫、副会长卞月庭、省会议长边洁卿以及其他绅商界耶苏教徒等共数十人。时在上午9点40分尚未正式开会，学生副会长马骏先对众发言曰：学生罢课、商家罢市皆非个人私事，不过为青岛问题，而青岛问题即为全国存亡问题，譬如有人扼我之吭将加之以白刃，倘能大声呼救，尚有转危为安之一线希望，否则待死须臾耳。今者南方罢市，距政府较远，尚未发生何种效果，而北京又处政府压制之下，亦未能有何种举动，独我津埠本属北京咽喉，此次一经罢市，适足促政府之猛醒。乃日昨代表来津并未通知学界，又未经公民大多数认可，竟冒然发出布告一律开市，岂不有违众意？况罢市所要求之二条，迄今一条尚未办到，鄙人因有所感触，叹我四界之人即无恒心又无毅力，今特分晰为诸君言之。以我学界而言，罢课而后终日游戏未尝乏人，所恃者惟我诸同志而已；其次为耶教徒，今虽联络一气协力进行，然在学生未发动以前，何以寂无声息？至云商界，尤无坚持到底之表示，既不能牺牲少数金钱以谋永久幸福，又缺少爱国思想共图国是；最后提及绅界，曩为对于某项交涉以及21条密约，未尝不竭力争持，须知前项交涉，为天津一部分问题，今之青岛为全国问题，何以因前此少受挫折，今则袖手旁观耶？以上四界所以令予不佩服者即在各无牺牲力，兼之前者有人讥讽鄙人既无财产又无田地，焉能与各大绅商相比拟？然予之所愿牺牲者为何物？热血耳！无价值之生命耳！今试以予之小牺牲换诸君之大牺牲，请死于诸君之前。言至此，即以中国瓷质之盛香烟灰罐用力照自己太阳穴猛击，继复以同样之罐连击，两罐俱碎，血流如注，复起而腕柱欲触，幸商会文牍长夏芹西君坐在近席赶前抱著，未果死。旋经众人拥进某寝室，已昏迷如睡，历一小时许始苏。众忙乱久，复振铃开会，当推边洁卿为临时主席，讨论最后办法。大众受此刺激，顿下决心，当场表决，如政府对前要求之二件至本晚（11日）12点以前若不以明令发表，自明日起仍继续罢市，全场通过签字。各绅商莫不交口称赞马君。最后叶兰舫当众宣誓曰："以上议决目的若未能达到时，倘不罢市，我不是姓叶的所生，我也不进商会的门啦！"直至下午1时许始闭会，12日商会复通告罢市，其词云："为布告事，案查蒸日国务院代表曾参议星夜来津宣慰商民，先由省长于夜二句钟莅会对于临时聚集之少数商民剀切劝慰，彼此相对，痛哭流涕。曾参议莅会宣布中央准曹、陆、章辞职情形，一时各商民感于情态，允认暂行开市。本会据此业经公布在案，讵今农商学集聚万余人，声言中央未能依法从严惩办卖国贼曹、陆、章，仅以免职卸责及无明令保护学生，似此不足达到罢市目的国亡无日，商业何言？如政府于本夜（11夜）12钟对于以上两件无切实明令到津，宣布惟有罢市作积极进行等语。本会依从众意，当即晋见省长并急电中央，于此相当时间须如愿达到商学各界所请之条件。不期政府形同木偶，漠然无闻，现已经过所限时间。合亟通告望各商号于12日仍继续罢市作积极进行。切切此布。"13日下午5时半，绅、商、学、教四界联合会仍在天津总会内开会，公推彭一山为临时主席，讨论之结果谓，如政府有保护学生之明令即可转圜，至惩办卖国贼一层倘做不到，即认为不满意之开市而已。正研究间，国务院电到会，当由文牍长夏芹西宣读云："保定曹经略使，盛京张巡阅使，蚌埠倪巡阅使，（除云南、贵阳、成都、广州、南宁）各省督军省长，张家口、承德、归化都统、龙华、宁夏护军使，库伦都护使鉴：奉谕此次各校学生激于爱国热忱，不得已而有罢课请愿之举，固为国人所共谅，现已由政府开诚披示，务在曲谅舆情力维大局，自兹以后，各学生应各安心向学，恪守学规，但使行动不越范围，国家注重教育自当加意维护以副兴学育才之意，等因特达，院文印。"学生代表谌志笃云：此种

命令固认可，惟对于命令中所云“自兹以后，各学生应各安心向学、恪守学规，但使行动不越范围”等语，现时否认。如果将来各省上课，天津当然上课。主席云：此种文字关系无甚妨碍，学生代表韩君云：此系全津父老为学生所办的条件，所谓范围必须有一定界线。叶春农云：如学生无杀人放火行为，即是不犯法不出乎范围，现在不干涉者足见是在范围之内。韩君又云如罢课演说等事有加以干涉者，四界须承认维护共力进行，众赞成。主席以此次之命令认为达到目的付表决，但附以条件云：倘学生行动政府非法干涉，四界可以共同力争，众通过。陈牧师云：必须与省长声明同负责任。主席云：愿与叶卞两会长同见省长要求，众赞成。马千里云：对于他省学生，本会应一例辅助。陈牧师云：若有非法干涉，本会应负电争之责任。主席云：远道传闻或恐失实。韩君云：现在可以打电。主席表示赞成。主席又云：如果政府对于学生有非法举动，各界当为学生之后援，众赞成。卞白眉云：如果政府有非法干涉学生时，不但为后援之助，仍可演成罢市、不纳捐税等事。主席云：此时暂勿一定，并提议明日（14日）开市案，众通过。马千里云：对于复业之公布内不得认为完全达到目的，必附带将来严办卖国贼之条件，众赞成。翌日遂照议案进行公布开市，公共布文有“……罢市目的已达，当然开市继续营业，惟对于所欠缺之惩办卖国贼案，以待将来为法律上之解决”等语。

（3）**福建湖南** 长江流域罢工罢市风潮本未波及福建，惟6月中旬福州学生提倡抵制日货甚力，有调查商家存货之举。其商务总会长黄秉荣生成凉血，富而不仁，不惟不欲牺牲存货，且欲弄其“人弃我取”奸商之惯技，广收日货屯集家中，以为国人五分钟热潮一过，必能收什倍之利。不意学生切实调查，明白宣布，务使此等奸商为社会所不容。黄氏老羞成怒，竟于14日晚请调查国货之学生多人至其家检阅货品，诱至内室，忽将门户闭锁，痛加殴打，死伤者五六人，余仅以越墙逃逸而免。黄氏并一面陈报闽督李厚基指学生为土匪，谓至其家抢劫。李复袒黄，核示通衢认此案为盗案。于是群情愤极，立即闭门停市。李厚基又效北京故事，大调军队围捕学生数千人，市民益怒，将呈决裂之状，相持数日。卒交黄氏于法庭收监待罪，众怒始平，方开市营业。又当学潮正盛时，湖南省城曾有一度商学联合会共数千人游街示威。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

邓 中 夏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赞助五四运动的爱国罢工。什么叫五四运动呢？当一九一九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开大战后的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处分战败国的德国的会议，亦即重分世界市场的分赃会议，在这会议上中国山东问题也是被处分的一个。先是欧战以前，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以协约国资格，乘机攻陷青岛，强迫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当时中国既对德宣战，则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自应完全归还中国。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巴黎和会，却硬把山东处分给日本。此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震惊，群情愤激，于是首先在北京发生空前未有的群众大示威运动。发动此次运动的是北京学生，时为五月四日，是谓五四运动。当日群众示威，愤怒之下，放火烧毁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又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当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会条件”，并“罢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官职”。政府当然不允，学生再接再厉，六月三日，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余人。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北京学生声援。

此次参加罢工的：纺织厂方面，有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及叉袋角日本纱厂数家。金属业方面，有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厂，札新机器厂等。运输方面，有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口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电车，英美公司电车，全埠汽车夫，全埠马车夫，华洋德律风公司（属英国）接线人员，中国电报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有亚细亚美孚煤油栈，叉袋角大有榨油厂，荣昌火柴第一、二两厂，华昌梗片厂，华章造纸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英美烟公司烟厂，查礼饭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户及西人饭店之执业者。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参差不齐，有从六月五日罢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罢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

其他各地工人参加此次运动不详，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的意义。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

这里还要附带说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

当然，还另有一种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或者可说是急进民主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孤立，须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

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原载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五四期间上海海员工人的罢工

朱 宝 庭

当时我在上海太古公司海船上做水手，同时在上海水手钧安公所（水手自己的组织）当董事。我们听到："拒绝和约签字"，"争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震天撼地的吼声时，我们抑止不住的爱国热情也在心头澎湃起来了。我就和几位海员工友谈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我们有起而声援的必要。于是我们印发传单，并到各公所（当时除钧安外还有炎盈社、善政公所、联益社等）去宣传，结果我们几个公社取得很好联系，决定罢工响应。

记得那天下着很大的雨，码头上除忙碌着的起卸工人以及坐客外没有吵杂闲人。北京号及宁绍号两船已坐满了四千多客人。正当他们归心似箭的时候，我们秘密宣告罢工，此两船为首当其冲者，自此从海上泊来之船只，无不立时罢工。第一天即罢下了五只船。罢工当中有不少买办阶级捣乱分子从中阻碍破坏，但我们始终不曾被威胁利诱。有一次，一位二买办因捣乱罢工被工友提来打屁股，结果他放鞭炮挂红（即给船上结挂红彩）才算了结。英领事不敢与我们正面交涉，迫上海总商会令我们开工。总商会会长亲到钧安公所见我，他叫我通知海员工人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的组织）开会。到会工友千余人，都被巡捕、暗探、包打听包围监视着。总商会副会长方椒柏向我们讲："……如再不开工，你们就不能吃饭……"，他正要继续说下去，猛不防他身后一位体大力壮的工友，把住他的衣领，唰的一声撕破了他的绸衫。群众都鼓掌称快，并喊着："打！打！"结果这位方先生默然而退。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先开铺（各商店复市的意见），后开工！"由于我们的坚持，这次会我们完全获得了胜利。罢工四日后，英领事来见我，他问："你们为什么要罢工呢？"

"买不到米，买不到菜，所以罢工。"

"我在中国十多年，知道你们中国人的罢市是前门关，后门开，你们不可以从后门买东西吗？"他充分带着讥讽、轻视中国人的口气。

"我们没有见到有开后门的商店，并且我们买东西一定要从前门买的。"我以强硬的话回答他。

"现在你们该开工了，北京已经来电说卖国贼曹、陆、章被惩办，并拒绝和约签字了。"

我们不敢相信，他说他以领事印来保证。我们赶快到各处去探听确息，才信为真实，于是决定明天开工。头天晚上，太古公司方面问我可否先开大通与温州两船，我想明天既开市、开工，就先开两船也没多大关系。于是我答应了。工友们听到了这消息，十数人气愤愤的包围了我，质问我为什么答应开船，我将理由说与他们，好容易才散了。这一夜，我惶惑不安，但怕万一明日不开市，我该如何补偿这个大罪过。第二天我一早起床跑到市上去看，六点、七点、八点都过去了，还不见一家商店开门，我流着满身汗水，作最后的等待。九点钟到了，法租界一家卖彩票的，门豁然开了。我松了一口气，很快的回去，已经有许多的雄纠纠的工友在等候我了。

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达数十只，工人有五

千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过程中，虽组织较差，然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从此在帝国主义直接间接压迫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日益走向团结坚强有组织的大道，勇往直前的开赴大革命的前线，直到今天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工人阶级始终都以勇敢坚定的英姿出现。

（原载《中国青年》1卷2期，原题《感想与回忆》，1939年5月1日出版）

五四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张　浩

一　五四普及到偏僻的乡间

我记得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底的时候，我正在汗流浃背的浆纱，乐浦笑嘻嘻告诉我说："你拿什么东西谢我？"接着说："我到回龙山去买东西记起了你托我的话，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是否有湘浦的回信，果然不错，有一封从北京来的单挂号，我拿着就一口气的跑回来了。快看！不，快念给我们大家听！"我当时不自觉的很快地用抹衣①把手拭干，又用袖子把眼上的汗擦了一擦，拿着信便带看带念："八哥：前回告诉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事情，把我们大家气死了，末后大家商量，气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大家干！我们今天都到了天安门去开示威大会，又蜂拥到赵家楼去打卖国贼：曹汝霖的房子被我们烧了，章宗祥被我们打了，我今天才看着我们群众的力量！……我再告诉你，我们有很多的同学被捕去了，我也只差一点就被捕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我们要干到底，亡国奴不是人当的！八哥！你记得韩国亡国惨痛故事么？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你们在乡下也干起来吧！……"我一口气的念下去，有时高兴的笑着，有时咬着牙齿发气，最后鼓起劲来似乎也要决定干的样子。当时湾下的人听说北京"本儿"回了信，又看见乐浦气得哭了，以及我念信时的那副神气，于是越集越多，要我再念一遍，我于是又带念带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又气！又恨！又喜！又怕！气的是洋鬼子不讲道理，恨的是卖国贼不争气，喜的是那些学生子不错，怕的是做亡国奴！大家听了之后，有一部分人确实想干，但因为不知道怎样干，干来干去，干不出一个头绪来，反碰了许多的钉子。不过在碰钉子的过程中却把我们三人结得更紧了一些，其他的人仍然是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打牌的打牌，玩的仍然是玩，结果只落得"两个湾里三个好人"的一句评语！

二　乡下来了一群特别的人

快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回龙山看见一个学生子背着一个大包袱（有人说是一袋面，有人说是他自已的行李），大踏步的旁若无人的直向前走去。大家都看着称奇！后面正有许多大人小孩跟着他跑，想看一看他的面孔。我问旁边的人：他是谁？才知道他就是刘吉山，是有名富户戴家冲刘家的少爷，在武昌某中学念书，因放年假回家。他家原很有钱，为什么刘少爷要自已背东西？我不明白！大家都不明白！有人很关心的说：恐怕是疯了！

过了几天湘浦也回到家乡来了，我们会着了，高兴得要死！我告诉他：我们在乡下碰了许多钉子，始终干不起来，说时很觉惭愧。他一面安慰我，一面详说，他们做了许多轰轰烈

① 俗语，围裙式的工衣。

烈的事，结了很多的朋友，北京也有，武汉也有，湖南也有，并说他们在武昌横街开了一个利群书社；他最高兴的，是一个姓恽的朋友，他说他当教员同我们当学生的结朋友，他家里穷得要命，他自已赚的钱只留下一小部分给家里吃饭，其余的都拿来帮助穷学生念书；他的主张怎样好，办法怎样多，并说到他们想在我们乡下办一个小学校等等。这一段话把我听出了神：如今世界竟有这样的好人？可惜我不能早会着他，不能够得着读书的机会，真是没有“运气”。自此以后，我总是想着那个姓恽的！

湘浦回来以后，有许多念书人找着我结朋友，我总有点莫名其妙！湘浦到他的念书的朋友家里去，经常总是要我同他一道儿去。有时候我也同去。有时候到太有钱的人家，我总是不敢去，甚至到了门口我还是不敢进去，到了那些人家以后，我总是忐忑不安！湘浦经常向我解释说：“你不要说你做工是下等人，不配同我们在一道儿！其实我们这些人靠着父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下等人呢！你们做工，从小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正是上等人呢！俄国的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么？”我想想也不错，后来大家都同我很要好，我也慢慢的习惯了。有一次我会着刘家大少爷，我问：“你为什么要自已背行李回来？”他说：“你还不知道么？劳工神圣！要是在去年，我们都不会同你们做朋友呢！”

一九二〇年春，学校办起来了，获得了我们户长大伯的帮助，我也算是发起人之一，地址设在白洋山八斗湾的一个家庙里，起名“浚新小学”。教员起初是一个姓胡的，后来这位教员被杨家岭刘家用钱抢过去了，于是又从武昌请来了一个不要钱的唐际盛，是姓恽的和湘浦他们的朋友。我初次问他：“唐先生是那里人？”他说：“岩下！”他象一个基督教徒一样，同什么人都要好，特别是对老年人小孩子合得来，大家很相信他，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好象是忘记了唐先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似的……。

三　到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中去

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二〇年的夏天）育黎、育蓉来说：“八哥！学校来了客人，叫你去！”我问：“是那里来的？姓什么？”他们说：“汉口来的，姓恽。”我就赶忙的一口气跑了去，到了学校，看见一个人穿旧兰布长褂，很细长的袖子，一个和尚头，人同脸都是瘦长瘦长的，戴一架眼镜，如果把这架眼镜去掉，或者是换一架旧式的玳瑁镜，则活象一个“游学先生”①。我看见他站着又说又笑的，时常把手抹汗，我有点“那个”，好象不象我所想象的那个姓恽的一样。还有两个坐在旁边听着，笑着。湘浦笑着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常想会着的那位姓恽的先生，他的名字叫做代英！”他立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人朋友么？好极了！好极了！”接着刘光国、卢春山等二三十个人都来了。我们生活在一块儿，总是热烘烘的被他吸引着，就连他在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说着笑着！虽然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因为内中大部分是很穷苦的学生，但我们都觉得有无穷尽的光明的前途！我们有时候高兴起来，想吃东西，于是大家约着打“拼伙”②到几里路外去买花生吃，他们说这是对穷光蛋最好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又补人！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开了好几天的会。他们说的话，对我非常生疏，现在很难记忆，我只

① 这时我对代英同志的观察自然很浅薄，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内心极冷静的人。

② 俗语：凑份儿的意思。

知道当时成立了一个共存社。会后有到武汉的，到四川的，到安徽的，都分散了！他们主张我到上海去做工。我过去以为做工是不得已的，从那时起，我就以做工为光荣了，也不怕“乡下人上街”的闹笑话，决然的到上海日商××染织工厂去做工。当我从上海回到武汉以后，湘浦从远东大会回来，主张取消共存社，自愿的分别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情形顿然大变了：唐际盛在粤汉路的徐家棚，项德隆（项英）在江岸，许白昊在汉阳钢铁厂，我则从利群毛巾厂到武汉模范大工厂，湘浦同施洋办“真报”，求实办“日日新报”，张心余办“湖广新闻”。实际工作的推动，报纸的鼓吹，武汉的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罢工斗争，不断的发生，轰轰烈烈，盛极一时，二七则成为这一高潮的顶点。我总记得，党派我到黄石港石窑去做代表，是代英去预支他的薪水凑成的路费①。我也不能忘记：我当“交通”去汉阳探听钢铁厂罢工消息，提出一个“打倒工贼韩老三”的口号，挽救了罢工，使之转败为胜。直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当“活交通”的味道！五四促进了二七，二七又推动了大革命！

（原载《中国青年》1卷2期，原题
《感想与回忆》，1939年5月1日出版）

〔附〕有关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斗争的若干资料

（一）从抵制日货开始（六三以前）

5月7日：

恒丰纱厂：上海杨树浦恒丰纱厂，特于五月七日大书白纸墨字二大张，贴于厂之大门。左曰：“国耻纪念日”。右曰：“禁止日本人进厂。”又于八日晚八时，开一全体大会，研究抵制办法。并宣布自今以后，永与日本人断绝工商关系。前与日商某某等洋行所订之一切交易合同，概行废止。旋即议定办法数条：（一）推举黄首民君为代表，与外界联络一致进行；纱厂方面，亦由黄君代表，与华商纱厂联合会磋商办法，积极进行。（二）组织干事会，监督厂员及工人之购办日用器皿，凡为前所买就者，由干事检查识别，如系日货，予以标记，并将物主的姓名及件数，一一登记簿中，以免以后误购，及借辞推诿免罪。散会后，闻该厂之学生及职员中之热度高者，立即返至室，将所有之日货，全行毁弃，叮当之声，同时并作云。（130）

5月9日

三友实业社：上海行翔港三友实业社全体工人，于国耻纪念日停工一天，开会讨论。痛外

① 这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从此对于我们党的经费主要是依靠党员的党费这个事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交失败，国贼专横。议决自五月九日起，每晚工余之暇，即集会一次，并捐血汗工资作电费之用。一面电请政府坚持，饬欧使力争；并电英、美、法、意四国代表请主公道，维持东亚和平外。又议决即日起，厂中置一警梆，每晨击五十九响，大呼曰："汝忘五月九日之耻乎？"应之曰："不敢忘！"又议决每人捐工资百分之五，积成巨款，铸作金牌，以为工人精进之奖励。并实行抵制日货，作根本之计划。（129）

5月22日

山东人民集会：山东人民自闻日本国在世界和平会议所提出关于山东权利之要求非常激昂。五月二十二日遂在济南门外大校场开会，商议对付办法，顷刻集众十有余万。经各团体代表相继演说。最后有一年仅十余岁之泥瓦匠跃登演台，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大意陈述劳动阶级，受日人侮辱情形；并谓青岛未亡，已受此种痛苦，倘确定为日本所有，痛苦必甚，且必不止劳动者受此侮辱云云。台下听者发指眦裂，号哭之声，远闻数里。幸是日地方长官劝诱有方，秩序未紊。（134）

5月25日

南京下关码头工人拒卸日货：宁省人民抵制日货之风潮愈推愈广，现已遍及于四乡。而下关商埠之苦力贫民，转运公司之夫役，凡属日货概不起卸。（808）

5月27日

上海码头工拒运日轮所载货物：近日各轮埠码头小工异常热心，对于外洋来沪各日轮咸皆袖手旁观，拒不运卸货物，以致轮埠公司深以为难，虽经奖励小工头，设法起卸，然亦不生效力。

6月2日

厦门码头工人拒为日船卸货：厦门扛夫不肯为日船卸货。故由香港装往厦门之货物托日船运去者大为减少。（828）

（二）大罢工的爆发与蔓延（六三以后）

6月5日

日本第三、四、五纱厂罢工：五日下午，杨树浦等处日本纱厂三家，工人二万全行罢工。总理卖办等竭力劝解，均置不顾。且闻二三日内，本埠尚有数千工人亦将罢工。（460）

日华纱厂罢工：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男女工人共有三千余人，所饮茶水，向由该厂供给。近因谣传日人有暗杀投毒药事，以故相戒不饮厂内茶水，以防中毒。虽日夜照常工作，而人心颇为浮动。讵前晚九时许，有女工二人出外泡茶，被日人拦阻，不许出外，并饬令巡厂将厂门锁闭，通令该女工取饮厂内自备之茶。人心愈益恐慌，均无心工作，欲图出厂。一时人声嘈杂，秩序大乱。该厂大班深恐人众滋事，立将电灯关闭。人声愈加鼎沸，纷纷拥至楼下，觅路出走。其时门外已聚集男工数百人，将门推倒，各女工始得走出。事后三区曾署长得信，督同全体之巡警，前往弹压，尚无事故发生。作为星期日，工人例须休业，并无动静。闻该工人等业已决定，自星期一起，一律罢工，以为商学后盾。（465）

6月6日

英商祥生铁厂：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共有工匠四百余人，自六月上午七日起，一律同盟罢工，以为商学后盾。并要求该厂大班电达我国政府，释回被拘学生惩办曹陆诸人。而

该处英美香烟厂内，有数十个男女工，亦于昨日午后，在厂门前聚议，拟同盟罢工。专区驻厂史巡官得悉，报告三区曾警正，督同长警，前往弹压，劝令照常上工，仍未解决。其他如日商华章造纸厂，日商纱厂等各工人，亦多在酝酿之中。

法新租界卢家湾电车公司：法新租界卢家湾电车公司内，全体卖票员及司机人，议定于明晨起，一律全行停驶。后由该公司大班某君得悉，向众婉言劝阻，多数人听从，即行上车执业。内有少数人劝阻无效，大班亦不相强。故昨日电车由徐家汇卢家湾至十六浦照常通车，惟十六浦小东门至西门斜桥，及斜桥至沪宁车站两路，停止行驶。（461）

英美电车公司：英美电车公司司机人，传闻华界电车公司卖票、司机人各人皆已全体罢工，故托故告假者亦有数人，是以开驶各路之车辆，较常减少。（461）

浦东工人游行：有工人一队，沿华界民国路游行。先行者执有一旗，上书"吾工界同人，愿与商学一致行动"字样。闻即系浦东工人云。（461）

工界青年励志会：因工界业已罢工，与学商界一致行动，故于昨日派四团宣传团，赴闸北各乡宣讲。并特备汽车两辆，四周围以白布，上书"国民爱国，切勿暴动"等字样。于午前午后，游行各租界。道旁观者为之动容，诚工界之创举。现正筹备种种进行之策云。（461）

求新机器厂：司事工人，与商学界一致行动，全体罢市。前日午后，诸同人游行街市，表示热忱。目见街上悬挂白旗横额，风雨飘摇，易于损坏，未能垂之久远。特捐助巨资，在机厂门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及丈，上题四大字曰："毋忘国耻。"每字三尺，其顶置五色旗五，随风机书有"唤醒国民"小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诚警醒世人堪垂久远之大纪念也。（459）

法租界电车公司所用华人：如开车、售票、查票等，提议罢工，被该公司管理西人得悉，于前日（五号）夜间各电车进厂后，将各开车、售票、查票人等一律留厂供宿，不肯放归，迨至昨日（六号）黎明开厂驶车时，各开车人等一拥散去，以致原有之一百余人，仅留十五人为之服务，虽经西人竭力劝留，无奈随劝随散，终不肯留。故昨日法租界电车西门一带均无电车行动。（831）

工党宣言云：吾国民受强权之压制，今日已达极点。外人夺我土地，政府卖我人民，倒行逆流公理何存。学界罢课，损失青年光阴，政府不之惜也。商人罢市，损失千万金钱，政府也不之惜也。吾民诚将坐以待毙矣。虽然，世界公理，终能战胜强权。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吾辈主张工人自动，各行工人组织各种小工团，然后再合成大工团。第一步，举行工人游行示威运动。第二步，举行工人大罢工。第三步，牺牲吾辈数十万工人的赤血，与野蛮的强权战。中华工党文牍干事胡春仙、李德明、水木业工人代表王兴发、成福宏，机器业工人代表毛成章，香烟业工人代表朱阿福，纺织业工人代表曹万盛，钢业工人代表李明泉，轮船码头工人代表徐祥发、程金生，漆业工人代表黄洪兴，水业工人代表陆兴发，成衣业工人代表李永生，面粉业工人代表王全福，人力车工人代表张金生、陈大兴，钉书业工人代表荐齐民，丝厂女工代表孙金宝、张氏，花厂女工代表黄阿妹，烟厂女工代表余王氏。割指血宣言。（459）

求新厂工匠同人函云：敬启者，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故自今日始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并捐资建造国耻纪念牌楼一座，惟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中国幸甚，同胞幸甚。（460）

锐利机器厂工人函云："今日阅报载北京学生被政府用压迫、拘拿千余人，上海全埠商界

已罢市。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于良心上放不下，略有觉悟，故于六月六日起，锐利机器厂全体罢工，至学生释放日为止。以尽国民之职。”（458）

铁厂工人：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工人四百余人，同盟罢工。船坞铜匠铁匠各部分工人，总计二千余人。前日星期六发给工资，本定星期日应有数部分工人照常上工，以应需要。乃昨日各工人相约全体罢工，以作商界后盾。街市游人极多，颇守文明，并无事故发生。（465）

威海卫工人抵日：此间工人因抵制日货之故，不为日船搬运盐包。（834）

6月7日

浦江水手集会：停泊本埠浦江各轮船舵工、水手、火夫等，于前日纷纷集议，佥以商界已继各界罢市，工人独非国民乎，何忍坐视。倘学商界之表示，不能挽政府之意，只得继起要求，以为后盾。（460）

航轮业水手：航轮业水手同人亦发通告云：启者：外交失败，青岛问题，学界热忱爱国，反累自身被拘。幸国不亡，民心未死，坚持抵制日货，以致全埠闭业罢市，今已数日。然政府与官厅尚未解决。吾业同人，不忍坐视，刻以邀集议定，同人亦爱国有志，自愿全体齐心即行罢工。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事关全国命脉，望同胞速起救国。（460）

别发印书房：全体工人函云：敬启者：敝同人为政府之不良，压制学界，同人同自愿于七号九时全体罢工，一致要求，以尽国民之义务。（460）

吴淞张华滨因沪杭甬铁路总机务处工匠，已于星期六日午前十一时起，一律罢工。当时执事洋员等，虽一再劝谕工作，奈工匠坚心国事卒不充从。须视沪上商号全体开市随而工作。（463）

6月8日

中华工会干部人员：自沪上罢市起，日由工会各会员手执白旗巡查街市，维持秩序，异常认真。会中纯由工业学生及富有经验者主持会务，并议决各码头上不起日货，坚持抵制到底，其爱国热忱人咸称羡。

浦江一带大小码头船只：不下二千余艘，平日专靠南北市商铺行号运输货物，罢市以来，商界各项货物停止进行，以致各船户大受影响。城厢一带各袜厂，皆以女工生计有关，暂维现状。杨树浦上海纱厂，八日有驳船装载烟煤回船，码头各小工均不肯代卸，故停泊码头。又虹口各码头，日本邮船码头，已无华工踪迹。日清、三菱等码头栈房，亦已较平时减少过半。（702）

江南造船所工人罢工之后，刘所长以本坞承造美国军舰、工程重要、断难停工，九号之特谕令工头将各工匠再三劝导，始允定于十二日晨起，一律上工。（702）

南北市清洁夫役：亦以士商工各界齐心一致，罢市罢工，拟定自八日起罢止倾倒。俟商界开市，再行工作。（701）

上海印刷工界联合会：八日午后新钟二时半，假法租界打铁浜同义义务学校开筹备会，印刷工界到者三百余人。推徐小舟为临时主席，报告宗旨。会员冯恒、周政元、姜启棠、郁少卿、陈孟莲等，来宾同义学校校长教务主人并学生等相继演说。当场决定于四天内投函，公举五彩墨色绘石五彩石印及铅印全部各代表。以便择日讨论种种进行。该会发起纯为组织有系统的联络机关，实行提倡国货。对于目下时局上之发展，务求与各界取同一态度，坚持到底。福州路棋盘街口巨兴印书局。自罢市后，即停止营业，再不印刷物件。后悉学生联合会恐法

租界各处在留法人之误会，印刷传单，以解群疑。遂承其请，不及三小时，即行印就，其印刷及纸张费，一概不受。并谓学界热心爱国，钦佩莫名。一再勖勉，工界而能如此，信足钦佩也矣。（701）

邮局信差：本埠中华邮政信差，激于义愤，拟与商学两界取一致行动。事为管理华人某君所闻，以该信差等出此义愤，固属国民应尽之天职。惟邮差一职，与他业不同，一经停止，全国消息不通，万难罢工。且我京津沪宁之各学生所发电报，已不能自由达到，现在与南方及内地所通消息，全恃邮政，今诸君一旦罢工，除某国邮政外，势无可通之消息。万望留此交通，俾与各学生等传递消息，务为三思云云。该信差等闻语，以某君之所论极是，遂将罢工之举取消，改由同人量力出资，购买纸张，刊发传单，稍尽国民义务云。（464）

6月9日

自来水厂工人：近日商学界一致行动之后，工界同人，亦极激昂。各工等亦互相约定即日罢工。而自来水厂、电灯厂、小菜场诸小工，皆已有成议加入。学生会以自来水、小菜场及汽车，关系全埠中外人士安全及食品。若一旦全体停止，非但将肇绝大危险，并引起外人对于此次举动之恶感，并于除国贼之目的，亦必大受影响。因立即派人至杨树浦自来水厂，与厂工人接洽，力劝其不得罢工，否则救国适以害国。各工人闻之，无不感悟，立即签字，允照常上工。其余街道之小菜场，亦分头派人劝导，请求依旧营业。并决定每小菜场派学生数人维持，以防流氓滋扰，大致皆可有结果云。（464）

香烟厂工人：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新老两厂，男女工人数达五千余名。自商家罢市，即跃跃欲动。前日星期六放工时，该厂大班，亲出劝导。谓日人欺侮中国，吾人亦深为不平，惟限于条约，致英美政府爱莫能助。尔等仍照常工作，免遭损失等语。各工人亦推代表答谢，谓可怜学生被虐，可恨政府助桀痛心国难，实无心工作。决定星期一罢工，以表天良。昨该厂犹谕令工头四出劝导，不识能挽回否。（465）

航轮水手：本埠大小各轮船公司，凡走长江班及杭嘉沪各轮船，昨日因办事人员，激于爱国热忱，全体休业，是以各轮船昨日各得停驶。

浦东各轮船水手，昨日均按公所开会，议办同业一律离船。致定班出口之轮船，如新宁、绍新、北京、大通、江新、新铭轮船，均不果驶行。（466）

英美香烟厂：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全体男女工已一律罢工。惟因卷烟间已配就之烟，必须收拾，故由大班谕令女工头，商请各该部分女工，格外通融，入厂工作，俾免损坏。

祥生铁厂：浦东陆家嘴英商祥生铁厂全体工人，继续罢工。乃该厂工作极为重要，有罗维芹洋行订造之轮船两艘，适值工竣，近日为试车之期。该厂西人令工头再三挽劝，各工人坚执如初。（466）

钢铁机器匠：阴历五月十一日，钢铁机器匠公所开会，公推张毓钟君主席。由主席托王晓蒙君代表，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因众工人为政府不办国贼，拘押学生，群情愤激，齐来本公所，主张开会讨论办法。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当此商界学界奋力救国，工界岂可落国人之后。应如何进行，祈到会诸君决定。仲学准登台宣告，今日工人开会，无非救国，鄙人均须从良心上做去。次仲学倍、仲美、李兆熊、丁文等相继演说，词意痛切，鼓掌之声不绝于耳。当即全体决定办法如下：（一）工界为商学界后盾。（二）静候三日。（三）如三日后政府不办国贼，工界设法对付。（四）保持秩序，决勿暴动。至三时散会。（463）

造船所工人：日辉桥与发荣机器造船所内中股份以日本人占多数。该所工人，近日因鉴

于学商两界先后罢工罢市，不无动心。爰于前日共决全体罢工，以表一致爱国。并谓自后，誓不为某国人去工作云。（467）

上海劳动界：如车夫也、挑子也 各厂苦工也，无不热心爱国甘愿牺牲一切，以作学商各界之后盾。如黄包车之不载日人，肩驳之不运日货，苦工之不受日雇。率本天良，不为利诱，不为威迫。而南京芜湖各地，亦有同样之举。（133）

浦东洋泾港口：某国煤栈所储煤炭，向由杨树浦某电气公司大批购用。近日该公司工人，要求经理，改用他国之货，否则将全体罢工，宁牺牲职业。该公司不得已，遂即向该栈实行拒绝。（460）

6月10日

沪宁、杭甬、淞沪等铁路：沪宁、杭甬、淞沪等铁路机务等工人，激于义愤，曾议决于九日一律罢工，与商学两界取一致行动。嗣被车务总管得悉，劝令仍照常工作。机务处工人因碍于情面，不得已于九日仍行开班。但于十日早晨七点三十五分沪杭甬路头班车，七时五十五分沪宁路头班车开驶后，其第二班车则全行停驶。开驶与否，须视沪宁行动为标准。兹将车务总管布告文，及任局长通告文录下：（一）"启者：自本月十日始，两方来往列车行驶与否，难以保定，此布。车务总管奉命启。"（二）"为通告事，昨日据洋总管面称本路车务处工人，与本埠学界极表同情，亦欲停止工作等语。我国工人热心爱国，本局长闻之极为嘉许。唯爱国必有其道，若不得其法，恐反有受其害者。本路自沪至杭数百余里，其间旅客来往，货物转运，均持铁路为枢纽。若一旦停止行驶，则此数百里之间，一切停顿。非唯人民大受损失，恐信悉停滞，谣言蜂起，或生他种意外之事，必有多数人民，受其害者。其结果恐与尔等工人爱国之心相反。万一因火车停开而酿意外，不独关系国家，即在尔等工人身家性命，亦必同受损失。若国人群相诘难，尔等工人何能任此重咎。本局长为爱护国家，爱护尔等工人，不得不将停车之利害先告知与尔等。且以真真之诚意，劝谕尔工人等，务必安心照常工作，乃是真真爱国。人心既定，内力充实，方可再想自强之道。本局长与尔工人等，同为中国之民，且同在路局任事，是以不惮谆谆告诫。极愿尔等工人听信本局长之言，细细想想，再定主意。是所厚望，特此通告。"（463）

两路火车工人罢工：十日已由路局劝令开工，得工人允许，而上午列车开驶后，至下午各工人仍复相率罢工，故上开各车，于下午后仍停驶。沪杭宁火车职员夫役，十日起全体罢工后下午七时路局长委司员少仓到站，召集全路员役，在站旁空地上露天演说，劝众照常服务，以免发生意外危险。当时众人并无何等表示。四等车因关于邮务及贫民工界人等往来所必需，勉开一次。余如头二三等各车，仍不开行。各车守司机人等全体罢工后，交通断绝。江苏督军闻报，当即急电任局长，谕令迅速令工人恢复通车。任局长接电后，即会同洋总管克万、车务总管韦燕等，传谕各工人等，在北站二层楼办公处多方劝谕，舌敝唇焦，并允各工人等加薪三月，始允开车。即于十一晨沪宁、杭甬两路头班快车开驶后往来列车直至十二日始照常通行。（704）

浦江两岸各码头轮船，一经进口停泊，即与已经罢工之人表示一致行动。故十号以来，轮船有进无出。定班出口之各轮船，以长此延搁损失殊巨，十一日午后，由买办人等四出劝导。该船员水手等均声明斥退国贼命令，须指明"永不起用"字样，或有确实之保证，方肯登船供职云。浦东杨家渡宝隆码头所泊之福建凡轮船，本系闽商与日人合股组织，自发生抵制风潮，该公司即声明将日人股分退出，船名改为福建号。本定十日出口，因水手司机等同

盟罢工，以致不能开行。九日南车站上午七时四十五分时，由沪开杭快车，仍照常售票载客开行，只抵嘉兴。乃与杭站开沪之头班快车互相掉换。乘客赴杭者即由杭车载杭。来沪者则由沪车驶沪。而南站驶杭之二班慢车，于上午九时十分时开行，站长尚未得悉司机者罢工照常售票行使。据至新龙华站时，守候北站赴杭慢车，岂知候久不到，旋以电话询问北站，始悉司机人议决罢工。南站所开慢车，仍将搭客货物一并载回。当由站长立即将所收车资如数退还。沪杭交通亦已断绝。是日沪宁火车，只开上午七时五十五分特别快车日班，自均实行停驶。十日八时以后铁路交通断绝。沪宁、杭甬两路局铁门关闭，各执员办事人等，竟无到站。任局长传谕总刘巡官加派路警多名，在站守卫。沪杭甬转运工会，闻悉沪杭火车司机罢工停驶，恐同业各转运公司，仍有揽运货物情事，当将火车停驶情形飞函通告各转运公司。沪宁杭甬路机师车头工匠等，十日只开七时五十五分头班车一次，其他各车概未行驶。是日午后，宁车抵埠时，即据车务洋总管邀各工头于即晚八时开特别会议，次日开全部车问题。惟各车头工人均已四散，故此会未收圆满效果云。（704）

工界通函：昨（十）日工界同人发通函云："敬启者：前日商界报各界开会，发表对内对外宣言，皆以诛讨卖国贼为人民一致之主张，当即致电北京，限于阴（七）日答复，而北京竟置之不理，并闻电饬卢永祥拿办倡手罢市之人，以此袒护国贼，决心与我国民宣战，工界同胞怨愤万状，因与商学各界取一致行动，为诸公后盾。乃近闻北京派来奸细运动开市，假令成为事实，置我工界绝大牺牲于不顾，工界同人现已公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励，继续罢工。应请商会诸公从速开会，对于卖国政府当负具体办法。如照六日议决事件不纳租税与北京断绝关系，则当共商维持之法。"（846）

大司务：大马路外滩及虹口两处之西礼查饭店所用之西崽大司务（俗称烧饭）等名目，系华人为多数。十日由该业总管事华人自行邀约同业集议，自即日起一律停止，与商学界取一致行动。嗣后被各店总管西人所知，竭力向各西崽劝导，一时未得允从解决。（846）

翻砂厂工人游行：江苏实业厅长张轶欧，因上海罢市风潮，奉齐省长命莅沪。……于午后二时半，邀集南北商会董事……开紧急会议。……开会后，首由张厅长起言："本厅长此次奉委来沪，因齐省长轸念上海为通商区埠，工商荟萃，一旦罢市，百货阻滞，使工商界顿时失业，其损失固不待言。且恐不肖之匪徒，乘间肇事，妨碍治安。故派鄙人来沪，面商诸君转劝各业，迅预开市，照常贸易。此事所关甚大，能早一日开市，即少一日损失，且少一日危险。诸君为商界领袖，众所宗仰，务望善体省长意旨。"……正议间，署前人声嘈杂，有高昌庙左近某翻砂厂罢工之工人，一百数十人，结队游行，经过署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396）

十日午后三时许，航业水手均安公所，以及炎盈社伙夫联合会两团体数十人，手持黄旗，上书"同胞救国"四字，至新北京、新宁绍等各轮埠，要求同业上岸，与各界取一致行动。故开往宁波、新北京、新宁绍，以及开往长江之大通、大贞、江新、华利等轮，均不能开驶。宝华公司开往长江之宝华，人货已齐，业已结开，开行至吴淞口得信转轮回沪罢工。交通阻断，谁之咎欤。又新北京轮，当伙夫上岸时，旅客已渐渐到船。大古洋大班该轮买办粜君，恐妇孺等往返之劳。转商各伙夫等，欲再驶一班，讵意志坚决，定须即班实行。故已上船之旅客，只得纷纷上岸。该买办恐远客下船后无处留宿，特准留船寄宿，并嘱茶房，仍一律优待云。（703）

马车夫：英美法租界各马车行所佣之马夫，于九日晚集约各行马夫头目，议论决定十日

起，全体停工。十日马路上之马车，只有自备，经过甚稀。（846）

6月11月

各工界开全体大会：十一日下午，各工界在东京路徐家村某庵开全体大会，到者约一万数千余人，公推中华工业协会理事吴灿煌为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程景岳为临时速记，继推谢中狱讨论进行办法。略述学商两界救亡之情形，及罢工后目标、性质、时间、程度。并言我各工界同胞，今日开全体大会，所以表示全体一致救国之决心。并举欧美各国罢工各种进行之办法。现在我们工界，非与资本家抵抗。因为工界为劳动之神圣，万不可自弃自价值。若不惜偌大牺牲，为商学界后盾。因提出对内对外各条件：对内：（一）设共同总机关，成立中华工界全体大会。（二）大家严守秩序。（三）罢工后生计维持办法：（甲）各行工界存款酌量提出救济。（乙）与商会商团商量将现在买日本货的罚款，提来维持工界生计。（四）举十二代表与各界接洽。（五）通电全国工界取一致行动。内部组织完固，庶可对外云。次吴灿煌、黄鼎祺、张汉农、李凤池等相继演说，辞意略同。为吴君说辞异常悲愤，闻者多为泣下。最后由黄君提议推举代表，于是全体议出代表十二人，即李凤池、吴灿煌、谢中狱、李明山、刘春山、黄鼎琦、田维胜、丘少堂、任寿山、王春荣、汪朗云等。是日会场秩序极严肃，颇现一种哀愤之概云。（601）

开驶汽车同业十日之夕决议，无论中外行主车主，一概罢工。各汽车公司曾一再劝慰无效，故十一日路上呜呜之声甚稀。（703）

上海工人坚持罢工：浦东沿浦一带罢工之工厂，如祥生铁厂、英美香烟厂、日华纱厂、荣昌火柴厂、火油栈房，和丰铁厂等，十一日仍未开工。厂中有劝令上工者，则表示须待总统令实行惩办国贼，并斥退蹂躏学生之军警长官，方肯入厂工作。（850）

6月12日

工界大会代表之会议：午后二时，工界全体大会代表李凤池等十二人，及临时加入各工代表共三十余人，假中华工业协会会议。协会代表顾健武提出四条件：（一）各工厂工人，准何日上工。（二）工人上工后，具何种态度。（三）未上工的工人，如何维持。（四）组织团体进行方法。当由谢申狱发言，谓工界同人，追随学商两界一致救国，以伸讨国贼，废除中日密约为目的，以罢工表示决心。曹陆章三人非卖国主脑，虽免职尚未惩办。而卖国罪魁□□□、□□□①。依然如故。况密约未废，目的未达。工界本应积极进行。现商学两界，既已开课上市，工界不能独异，而讨贼救国之责任，仍当遵照前次大会，积极进行。(一)请□□②即日退位。（二）组织特别法庭，惩办曹陆章三人卖国之罪。（三）抄没曹陆章三人家产，争还胶徐济顺铁道借款。（四）如无圆满之答复，即取以下六项之主张：（一）成立工界大会，暂设事务所于华庆里，并速设分会于各省。（二）通告中外，不承认卖国政府，并发起各界爱国储金。（三）无论南北军队出而讨贼，工界主张将此款作为军饷，并愿义务当兵作工。（四）主张往中交两行实行兑现，以制卖国政府死命。（五）不纳租税。（六）提倡国货，至不愿意上仇人的工厂工人，皆应设法维持。维持方法约有两种：（甲）积极的，所有仇人几处纱厂，多有一半是本国商人的资本，请本国各大实业家收回或由本国各大工厂分别加添工人销纳。（乙）应商量商会维持。众无异议，后谓救国目的，一日未达，此

① 疑为“徐世昌、段祺瑞”六字。

② 疑为“徐段”二字。（477）

志不渝。散会已达六时云。（477）

九江工人罢工：九江各趸船工人以及苦力等均罢工。是日适“江华”下水，趸船货色，均不搬运，即来往客人之行李，亦不准搬。商会副长辜竹平被工人殴打。十六日早学生亦分段站岗仍在各处演说，并有若立书院女学生，胸挂白布一方，上书“挽回利权”等字，在各处演讲亡国后之惨状。知事，警厅长到商会开会，被人喝打后，又由河街向向门口威迫各家开市，亦被众人喝打。幸来学生数人将知事、厅长竭力保护。又有儒励书院全体女学生亦手执各种旗游行街市、唱赞美歌，高呼“民国万岁”！“商界万岁”！“工界万岁”！又有几家热心店家摆设茶点，荷兰水等，大书“请学生用点茶”。是日罢工之人，均齐集租界内，不准人搬动货物，又欲殴打东洋人。因为学生在租界妥为照料，不致发生意外；华英巡捕，亦无可如何。是日六点钟，学生又设置小木箱，计二十余支，分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于沿街每一木箱派两小学生看守，曰：“请诸君捐钱接济工人”。顷刻之间，捐有钱四百余千。国民爱国于此可占一斑。至十点钟，学生俱散。十七日早，各家陆续开市。学生亦上街，仍是到处演讲。并将昨日所捐之钱，分给工人。不意各工人不要，并云：“我等爱国，虽饿肚不开工；他们商家今日开市太无道理，我们上街去打！”于是俱向街上来。各商家见势不佳，又相率上板。是日“宁绍”下水，有美国人往卢山避暑，有行李二十余件，均无人敢搬。美国人出洋二元，请他们搬。工人曰：“我们并不是说先生钱少了不搬，是因为日本人欺我中国太甚，是以我们罢工。”后美国人无法，只得自己动手搬运。又有一划子，载一东洋人，被工人看见，将划子拖上坡来，挂在树边，用粉笔写在板上：“此船不爱国”。（851）

唐山：十一夜起，唐山商民全体罢市。十二日，矿务局工人全体罢工，十二日上午，在火车站前开公民大会。（851）

6月14日

上海兴发荣机厂工人拒绝复工：沪南日晖桥兴发荣机器造船厂，系属中日合资会社，工厂大权，均操自日人，各工人咸有去志，此次罢工后，相约不愿再行入厂工作。（853）

济南开工人大会：十四日商埠工人假普利门外青年会开大会，到者千余人，经各领袖轮流演说，痛陈利害。最后全体议决三项：一、凡与某国作工者，当完全罢工。二、不充某国人仆役。三、不买某国货品。经大众一致赞成。（853）

（三）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及资产阶级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恐惧、破坏和镇压

大陆报：上海或将发生总罢业之举，所有工商各业完全停滞不动，此为最后之计划，使北京政府知非罢斥亲日派之官僚不可。上海如果发生总罢业，各商行店及工厂将无不受其影响。非但日本商家为然，即其他外国商家也将被其影响。如此则外人将起而反对。惟总罢业之消息，此时尚无从探悉。据各方面所闻，自九号早晨起，各船厂、纱厂、商店以及其他商业上之活动均将无人工作。有从他方面所闻，总罢业或于明日下午开始。（344）

敬告工人：工界与商界一致行动，救国情殷，自为可佩。惟职在供给日用为生活所必需者，亦不可不加分别。盖全埠停滞，秩序必乱，引起外人干涉，反与事实无裨。此则爱国工

人所宜三思者矣。（公振）（328）

罢工问题之商榷：上海民国日报6月9日社论：罢课罢市以来，罢工潮流也渐渐跟上来了。我以为这罢工一事，要仔细研究一下，不可随便行动。在下有几条意见，写了出来，请诸位批评批评。

一、工人的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要是资本家能送饭给他吃，或者赊饭给他吃，原可以罢工的，要是工人能用别种方法找饭吃，或是没饭挺饿在家里，做个爱国牺牲的大纪念，这也可以罢工的。要是空空洞洞，并没有什么预备，这便应有一番重要研究了。

二、既是中国人，便应该当仁不让，与学生商人一致进行。但是我有一句话，譬如国民的一致御侮，有投身枪队、炮队、飞艇队、潜艇队，直接与敌人鏖战的，也有投身辎重队、运输队及红十字会，尽给养与救济义务的，也非常的敬重。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总不是一种人做得成功的。善用兵的将官，他对于后方勤务的布置比前线计划还要注意。现在商学两界已全数做了前线动员，担任后方勤务的便的工人，便是供给一般人民日用必需的工人。所以我希望这种工人，切实加倍担任这件事，不应该罢工的。具体的说明，如象水的、火的、米粮的、交通的、传布公众消息的，关于租界上种种公务的，都是不可轻易罢工的。

一、替我们的反对方面做工的、激于爱国热诚，可以罢工，使那反对方面受一个重大的打击。又如制造军火的，也可以罢工的，因军火是残害我同胞的毒物，所以不应该制造的。

一、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功效，非但不应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加的工，可即请罢工的人来做）。因为能多出许多国货，即可以抵制许多日货。倘使这种工厂的工人也随便罢工，岂非和抵制日货的主张，自相矛盾吗？

一、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碍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

一、如有万不得已而罢工的，他们的生活应该由资本家维持。资本家更应该积极的振兴工业，容纳空闲的工人，这是两得其利的事情，并且是治本的计划。

以上写的，还没有尽我的意见，诸位对于这个问题，总须慎重考虑才是呢？（无谢）（329）

敬告爱国工人：这两天罢工的风说，一天盛似一天。工界的人，如此爱国，自足令人钦仰。不过照各方面观察起来，罢工一层，恐怕很多流弊。第一，工人中贫苦的居多，都持工资为生活一旦罢工，生计上恐怕难以维持。第二，工界人数过多，罢工以后，平添上这许多闲散的人，未免于地方秩序，大有可虑。第三，现在抵制日货，正宜精研制造，多出国货，以应社会上所需求；倘若大家罢起工后，机器也停了，货物也不能造了，岂非自绝希望。至于火车、轮船等交通机关，电灯、自来水等，重要供给，倘然也一律罢工，却变成了交通断绝，生活不灵，一定要人心恐慌，酿成事故；恐怕于爱国主义，无益有损。总之，我们此刻反对他人，须要拣那足以抵制他人的地方，着力做去。倘若他人未必受损，自己倒反吃苦，这是断断犯不着的。我很钦佩诸公爱国的热心，略有所见，不能不竭诚供献，诸公以为如何。（即）(333)

劝印刷诸君勿罢工：自商务印书馆印刷部同人提议罢工以后，凡以印刷为业之工人，咸有风从之概。但是印刷是个发表言论的利器，这次全国一致的罢市罢课，印刷实占有很大的力量，所以社会上对于印刷工人有一种无形的信仰。我们对于印刷工人，更是一时一刻千万不可少的。印刷诸君为了爱国，自行罢工，是他受良心上的驱使，我们也应当拍手赞成的。但

是印刷停工，我们的主张，无处表白出来，于救国的地方，实有绝大的阻碍，这不是倒反误了自己的事，想也不是印刷工人爱国的本意。所以我劝印刷诸君千万勿要罢工。我们声讨恶官吏的喉舌，借助你们之处，正多着哩。（钟期投稿）（514）

这一次工商学界的爱国运动，用尽种种方法。那方法都是很令人钦佩的。象那许多工人，抱着满腔爱国热心，却能在罢课罢市的潮流中能将对内对外界限，分别清楚；能将有关公共生活的工作，竭力维持，这是很可以佩服的一件事。工人不要忘了，你那罢工的成绩，你那有秩序与有意识的罢工成绩，异曲同工，已经卓然可观了。

昨午后有形似工界中人十余名，至沪西静安寺赫德路英美电车公司车栈附近，有要求电车开车、卖票人等罢市，以表爱国之心。事为该处捕房所闻，立饬中西探前往劝散惟将为首之某甲带入捕房，候今晨解送公堂请示。（466）

闻江南船坞全体工人，于昨与商学各界取一致中动，实行罢工。事为卢护军使闻悉，立即电话知照海军司令公署，迅行与该工人筹商开工办法，以维治安云。（466）

大陆报社论：西人对于此次中国一致之举动，极为注意，深恐其操行过度，一旦轶出范围，不易收拾。读昨日路透京电，则盛传段祺瑞又欲出山，以先任总理再升至总统为目的云。吾西人得此消息，当熟思之。如果确实段真再任总理，多不啻掷一火柴于一大桶汽油中，不亦危乎。是故西人在中国者，际此时期，当竭力阻止此项变局，华人今日正在愤怒时，再激触之，势必酿成全体之对抗。商人学生决不肯忍受之。此次风潮。无一处不恨段氏。两年来中央之败政，为之阶厉者，即段氏。因段一人，实为曹陆小徐及一盘盗贼督军之代表。中国今日之悲象，实若辈造成之。段之在京中，不啻为日本之驻京代表。今段又将出山耶，是与方醒悟之中国一抗也。吾西人对待此次风潮，第一次不可使之变成乱局，惟段果出山，却足以酿成大局。西人在华，苟有势力者，当竭力阻止段之再出山，中国一日不得安，外人也必受影响，中国从此将无希望。吾人为中国计，为西人利益计，更为治安计，决不可使段再出山。再于对待罢市罢工之风潮，应当先阻止总罢工，切不可于未暴动前，遂调兵力以弹压之也。（344—345）

英文沪报：一般学生之意见，以为目下罢工之事，已非彼等所能维持，其于新加入之分子，殊无把握，故拟暂停鼓吹云。又有多数人之意见，以为局势之急紧，已达极点，北京不能继续抵抗国民所加于军阀派之压力。此次学生运动，虽发端乎上海，然已蔓延及全国。夫以最高之热度表示于内地，实较在上海继续表示尤为重要。上海商界已罢市五日，小商店渐感苦痛，故明日（十日）或竟开市。惟罢工问题发生，而全局复纠纷矣。对付工人罢工之困难，即为无人确知其所由起。各业代表虽亦有与商学两界接洽者，然其他则均出于自动。此学生之除去徽章，所以为危险，盖与桀骜不驯分子，将无分别也。至于日人之酝酿乱子，达何程度，刻尚未能尽知。然闻其派人四出，故意滋生事端，借便干涉。已有数人被获，盖日人之政策，在激动罢工与骚乱，以示学生之不可靠，继乃挑拨华人，谓英美之可恶与日本等，以激成排外风潮。日人于中国事件，每施用此种诡计。商人方力图一俟发见，即行消灭之。惟一旦工界大罢工，则在学生方面，以为此事已非彼等之力所及，故非请协助维持秩序，则一、二日内，将停止活动云。（351）

江苏淞沪警察局布告：照得本地是通商口岸，工厂向来很多的，乃听说今天各工厂有照旧开工的，也有听信他人鼓动关门歇工的。殊不知道你们这些工厂，都是资本很大的，血本有关，一天不开工，，不知要受多少损失。至于你们这些作工的，更是一天不能停止工作。你们这些作工的，那一个没有父母妻子，一家老小都靠在你们身上，要你们勤勤苦苦的，赚点

血汗钱回来买柴买米，给一家老小吃，买衣服，给一家老小穿。如若停止工作，一家老小不免要受饿受冻了。本厅长向来对于你们工人，一视同仁。不忍看着你们受人之愚，自寻苦恼。所以详详细细的晓谕你们。你们务必听信本厅长的言语，开工厂的照常开门做生意，工作的照常上工。如有土棍流氓阻止你们的营业，你们尽管报告就近巡警，一定要拘案重办的。你们工人如不听信劝导，不照常工作，在外滋生事端，一样也是要究办的。再说同盟罢工，是大犯法律的。你们这些工人都是安分良民，对于法律自然知道遵守，不用本厅长细说了。切切勿违，特此布告。

自五四运动以来，始而学界罢课，继而商界罢市，今则工界亦有继起罢工之势。影响所及，交通机关，且将陷入停顿状态。各地秩序，几有岌岌不能保持之惧。向使学潮酝酿之始，北京当局能以诚意消融，又使爆发以后，即知悔祸收拾，亦何至由学而商，由商而工，酿成今日之现象。至今觉悟：亟顺民意所向已嫌其晚，奈何尚迷不悟耶。

断绝交通，陆路之火车停矣，水路之轮船停矣，远路之电报停矣，近路之电话停矣，此次已完全入于断绝交通之一竟矣。交通既断绝，则报告传达消息之新闻纸，亦将束手无策。形势如此，又将奈何。明达之士，其何以解决之哉。（笑）（535）

群之动力：自欧战告终后，民族活动之力大显，冲激震荡，遍及全球。即夙称宁静无扰之我国，亦因外侮内患所刺激，亦不得不显其活动之态度。今日各地，由罢学而罢市而罢工，引一发而动全体，亦即由斯动力传导所致。但此动力之所发，关系于前途之安危也至巨。盖因今日之民气，万不能不动，而万不可妄动。不动不足以示意，妄动也足以偾事。我国今日之危象，譬诸漏舟之历险滩，其所处之地位，则急流旋涡也；其所邻之环象，则危石暗礁也；我国民则同舟之人也。今日者，苟非同舟一致，固决不能历虞。以故动力之变幻莫测，安危之机缄甚微，于今日动力行止之时，尤不可以不慎。爱国者，当不可不共勉焉。

兵工厂谢总办以闻沪上商界罢市后，各工厂工人亦将步武，故于前日特邀各厂工人会议维持办法。略闻谢君意，该厂与其他工厂性质不同，且系属于军事机关，工人等应审慎行事，不可有意外举动。故议后遂令各厂工人于星期日饬全体工人一律工作，以防被人煽动。

工头集会：本埠杨树浦怡和纱厂工头陈财照等，及他厂工头等十余人，以国事阽危，凡我工人，极应振兴工艺、提倡国货，以图挽救。无如我工界程度参差不一，事非集会提倡，不足以竟全功。当由工头欧阳纯波、肖海珊、尤永泉等，愿为发起。此时赞成各工人，计有二百余人。于是由发起人陈财照等，假杨树浦新康里七十一号开全体成立会。议定会名，为工界志成会。宗旨振兴工艺，提倡国货的范围。并讲定简章，以资遵守。议毕，宣告散会。（467）

浙江旅沪学会致各实业厂主函云："启者，本市商界罢市以来，近两日间，工界闻风继起，已不下十余厂。其余各厂跃跃欲试，人心一动，不可复止。在工界热心国事，固属可敬。所虑者，知识短浅，血气用事；加以游荡好闲之徒，混杂其间，难保不酿成巨祸。敝会同人经过西门一带，见法界驶入华界，当路拦住喧哗。聚而观者数百人。如此现象，诚为可虑。敝会愚见，拟请贵厂主对罢工工人，善言相劝，其留厂者，任其自由；其请假者设法取缔。责成各工头带领各工人，编队分道巡查。所有工资有厂主照给。既可以保护本厂，又可以安靖地方，实于自由之中，稍寓限制之意。是否可行。请鸿才酌办是荷。"（459）

上海钢铁机器公所致沪军使道尹交涉员南北两商会函云："启者：敝公所为钢铁机器匠所集合，人数达万余人之多。昨日因工人要求开会，群情愤激，主张罢工。众心坚决不可遏止。当即设法开导，议决静候三日，如无结果，再图进行。查铁器厂等，在本埠关系最巨，

一经罢工，不可收拾。兹将利害条陈如下：（一）机匠在自来水公司执业者，设或停止，全埠中西人士，均受饥渴，人心难免恐慌。（二）机匠在火车、汽车执业者，设或停止，交通立即断绝，人心恐慌。（三）机匠在自来火、电灯公司执业者，设或停止，则全埠成黑暗世界，歹人必起抢劫。以上三端，有一于此，皆足引起交涉。敝公所因众心汹汹势不可遏，一面劝导静候三日，如三日后仍未蒙政府明令，则该工匠等势必约由罢工，敝公所实难负劝止之责。为此具函奉达，务迄转达政府，速下明令，以顺舆情而全大局，实为至幸。”（466）

我之忠告政府，罢课之潮流，自北京而上海。罢市之潮流，又由上海而各内地，今更引起罢工问题，范围益扩大，时期益悠久，损失益加重，人心益愤怒。复有利用机会，暗施策略，利灾乐祸之徒，颠倒播弄其间，而于是溃决不可收拾矣。今政府之意则曰：此端一开，后将为所挟制，此后政府之尊严，将归何地。抑知政府之尊严，何人授之乎，即人民授之也。必使果为共和国家者，则为人民挟制之事正多。我今且勿言共和而言专制。专制须用压力者也，试问政府自忖果有此能力以压平其风潮否。既无此能力，而又不早日转圜，，即为政府计，亦自困之道也。衮衮诸公，岂无一念及此者耶。（笑）（327）

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政府皆不理。是其蔑弃舆论，显然可见。虽然学生、商人、工人之外，岂别无人。罢课、罢市、罢工之外，岂别无办法。风潮之扩大，已迫眉睫。呜呼！必至众叛亲离，而后始谓之有体面乎。

齐省长谕王桂林知照捐务处智缓换照：下关各转运公司及津浦沪宁两路小工，有罢工消息。李督齐省长昨日令警察厅设法消弭。王桂林昨谕下关署长王固磐各区巡官，密查预防。省城人力车有五千余乘，早晚班计有万余人之多。明日（十日）为换领捐照日期。传闻有于换照之日同时罢工之说。齐省长谕王桂林知照捐务处暂缓换照。（842）

上海护军使卢永祥道尹致电北京呈文：万急，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紧绝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邀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市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明奉命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集，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即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299）

上海罢市已五日，响应之地，日有所闻；而答复消息迄不至。于是劳动界复以罢工闻矣。

工人程度较低、品类较杂、经济较困难，欲维持秩序之安宁，断不能如罢市时之易。设迟之又久，答复消息仍不至，则欧洲过去之面包问题，势将发现于我国，而骚乱莫可幸免。果至此时，悔之晚矣。

今闻沪宁杭路役，已有罢工之动议。设谕四十八小时无答复，则陆路交通断矣。万一风潮鼓荡，航业中人复有继其后者，则水路交通断矣。瞻望前途危险万状。甚愿当局速下一决心，而予各界以满意之答复也。（东吴）（329）

穆藕初演说：略谓此次商界罢市，全出自动。查上海人民号称百万，而劳动人民居百分之十二，纱厂工人占最多数。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湘玥以工界罢工，最为危险。遂邀各纱厂开紧急会议，竭力遏止，现尚相安。若罢市风潮再不解决，恐难维持。（449）

嘉谷堂米业商会电：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学生爱国被捕，沪商激于义愤，全埠罢市。闻工界亦将罢工，全国鼎沸，国将不国。务恳释学生以顺舆情，惩国蠹以平众怒。国家幸甚。（594）

天津酝酿大罢工，罢市之日午后商会致电政府曰："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佳日（九日）院电惩免曹、陆、章及保护学生，已有表示，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全津商民以生命牺牲，不期竟置青电罢市之举如无物，因循政策，中央信仰奚存？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津埠商民处此水深火热，已有不可终日之势，请钧座推之人道，俯顺舆情，急以明令并惩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北望都门，万恳即日电复。天津总商会蒸。"（844）

关于造成租界内目前的不靖情况的次要原因，及现在就作出任何肯定的说法还为时过早。警务处情报室在过去十二个月，记载着许多关于积极参予罢工的劳工及技工阶层中发生的类同事件。

虽然这些骚乱的原因，可以说部分是由于物价上涨所引起。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的观察一下事态的发生，就会清楚看到工人中的某些政治宣传是一个有力因素。

从警务处经常收到的报告上来看，似乎国民党的不满分子是有责任的。在今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案子，却揭发了一个在中国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在工人中间，还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运动。但已发现早在学生中传播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各个学校中还指定了经销布尔什维克书刊的代理人。（782）

（原载科学出版社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
材料中括号内的阿拉伯字是指在原书中的页数）

关 于 五 四 运 动*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孙 中 山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

* 本文节录自孙中山先生《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六三运动在上海

杨　尘　因

上海罢市风潮，兴自六月五日，而人民愤慨之动机，早准备于五月七日，其间酝酿匝月。各界人士之苦心呼号，已精疲力瘁。按本书止记罢市后七日之民潮，原可不必追述前事；但记事求实，必溯原因，方可见此次民潮之本末，然余亦不忍淹没各界人士鼓吹民潮之苦心，略而不记也。初北京大学风潮发现后四日，上海世界和平共进会，浙江、山东、陕西、甘肃、四川同乡会，策进永久和平会，四川、湖南、安徽各协会，江苏教育会，华侨联合会等等因山东问题异常愤激，拟于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开国民大会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其筹备事务所设法界霞飞路仁和里留日学生救国团。斯时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及商业公团、对日后援会等，亦通电全国，挽救青岛之国土（电略）。此上海民潮发动之起点也。而继起者如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南洋路矿学校、省立第一商校、同德医学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寰球学生会、澄衷中学、浦东中学、岭南中学、南洋中学、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学、爱国女学、民生女学、青年会、东吴大学、东吴第二中学、英华书馆、神州女学、广东学校、启秀女学、尚公学校、承天学校等亦奋袂进行。由渐而各学校、各商团、各平民结合之会社，纷纷加入，如风驰云涌，不可以数计矣。是日各界莅会者逾二万人。沿途白帜纷飞如雪片，秩序严肃，洵开空前莫大之壮观也。该会场门头，高竖白布横额，大书"国民大会"四字，佐以国旗二方，入门两侧各植木竿二，上悬白布长寻丈，其一书开会秩序：（一）推定主席。（二）报告开会宗旨及经过情形。（三）宣布办法。（其办法亦分三端：甲、致电巴黎和会及我专使，力争青岛及取消密约，不得则退出和会；乙、要求惩办卖国贼；丙、要求释放北京被拘学生。）（四）演说。（五）游行。其一书游行秩序：第一大队：各大中学校学生；第二大队：各小学校学生；第三大队：各平民结合之团体。其游行之路程，自法华民国路，转黄浦滩，直达德国总会也。午后一时开会，推定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主席，次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报告开会宗旨，又次如叶刚久、汪宪章、朱隐清、光明甫相继演说者，二十七人，其激昂悲怆之声浪中，太都是请诛国贼，挽救国土之语意，余因敬服其为天经地纬之呼声，然限于篇幅，亦不遑遍述也。最后宣布办法四条：（一）电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二）电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铲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国受其祸，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三）电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请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及营救被捕学生；（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接次鼓掌如雷动，几有不可少息之势；遂分队各持白帜出发。伟哉！以二万余众结合之大会，列队于途，秩序不少紊乱，男女老幼，各自眉目之间，俱流露悲怆激昂之色，手持白帜一柄，词句各书不同，如"挽回国权"、"国民自决"、"讨卖国贼"、"誓死力争"、"时日曷丧"、"国人皆曰可杀"、"小饿鬼想吃天鹅肉"、"还我青岛"、

"还我山河"、"扶持公理"、"抵抗强权"、"共讨国贼"、"不甘心死"等等，不下千百种类；然余管见以为"挽回国权"、"国民自决"、"扶持公理"、"抵抗强权"等字样，为至当也。当其出发之初，原拟会众游行至大东门散队，另推代表赴和会请求，嗣因众心激昂，不可遏止，于是结队同行；迨至民国路与法租界接壤，凡通路等处，均由法捕把守，并安南巡队往来，然未加以干涉；复至法界外滩，则为中西巡捕劝阻；主席交涉无效，无已，乃由原路前进，至大东门散队。客有因之愤慨者。余曰，斯正可证明吾人民此次之发动，乃有秩序之发动，守法律之发动也。按租界章程，凡列队逾若干人以上者，必先通知捕房，给与牌照，然后捕房通知沿途巡捕，加意保护，苟无此项手续，照例不许通行，今国民大会人众数万，事先伧促未能办妥交涉，临时当然见阻，我人民今能守其章程，不以一时愤气与争，足见此次人民之发动，非若昔日北京之公民大会违法而暴举也。最后学生高时夏者，剀切痛诉其苦衷，加以澄衷中校学生抵死不肯解散，英捕亦为所动，遂通融办理，将多数慰劝之返，少数慰劝不得者，各将所执之小白帜收卷，徒手散行；时英界之华捕，亦多纷纷道歉曰："我亦国民一分子，惟今日身负责任，不能与若同行"云云，凡游行者，不少加怒色，且以礼貌对之也。此时寒暑表之热点，已达〔华氏〕九十二度，入夏之后，热度最高之第一日。其散行入英租界者，约四百余人；同处于黄浦滩头，热日炎蒸之下，平息不紊；间有日人过往，若辈视若不见，并不以血气用事，加以侮辱。民气诚渐入文明之轨道矣。谒见南北总代表者，当时推举光明甫、郑浩然、黄界民三君，嗣又推举朱赓石、王宏实、沈卓吾、陈家鼐四君，一再要求，始获唐朱两代表允代要求负政治上责任者之去位，明知向若辈圆头滑脑之和事老人要求事件，必不能达充分目的，但手续上亦不得不进行一次，可见少沿些须官吏气味者，概不足恃，而所可恃者，惟平民耳。一时各业商人，大为感动，输金助费，如二洋泾桥长发栈主人陈复初，络绎不绝。而国耻纪念，休业一日，各书业商会、书业商团同志会、洋布业等，云卷而起，最得一时之济者，如同济、宝隆等医学医院，结合二十余人，联络各校童子军，共组临时红十字会，当场诊救平民所知名者约一百二十余人，其不知名者，尚莫能定数。当晚国民大会复开紧急会议于事务所，筹划进行诸办法。而民气沸腾，从此蒸蒸日上矣。

国民大会成立之后四日（五月十一日），上海男女各学校，结合四十余校之多，为救国计，组织学生联合会。其进行主义，与国民大会大致相同；所少异者，准备全体罢课，分道露天演说也。尤妙者，当此风狂浪涌之时，忽现燕语莺啼之会，勾栏中如妙莲校书忠告曹陆章引咎辞职后，继起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歌宴"等字样；余睹之，不禁肃然起敬。嗟夫！妓女于酣歌曼舞之余，犹知爱国，吾不知当今之纱帽式外交圣手，胡甘心冒大不韪哉。或曰，今日之官吏，本可与娼妓同等。余以为若妙莲辈此次举动，而官吏直娼妓之不如也。闻是夕东亚酒楼之广厅中，有南北和议代表某某，广宴宾客，当灯红酒绿之余，飞笺招妓娱乐，忽为被招之妓从笺后答之曰："国事多难，无心应召"，竟不赴局。未知若辈代表大人，读此八字复书，可少动于中否。"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客又询余曰，若子所述，则今日吾国之人民，已无不肖分子？余曰，吾国平民之人格，本居一般人类之最高级，其所间有不肖者，亦是平日沾染官吏气味，因而中变，名曰平民，实则早陷入官吏之漩涡中矣。如最近民潮怒发之中，发现一种异怪之通电，即朱葆三沈联芳主持总商会时，以上海总商会名义，表示之佳（九日）电，其文云："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钧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宗祥不胜其任。（曹陆如何耶？）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

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一箭射出九万里之外。）云尔曹不即退出，当以兵车相见，如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清国。（妙哉'清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此是代清廷作辩护士。）今欧战既停，章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本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绝妙好文，不甚明白。）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不知闻何者所云。）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接得真妙！）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津，复潜住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牵及家务事矣。）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所见太小。）值兹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虽对于外交无别种举动，然非先生所云之意也。）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遴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恐无其人。）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乘飞艇去何如？）坚持'欧战平定交还清国'一语（妙哉'清国'！）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迟了！）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外人早明白矣。）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何不云清国耶？）际此人心浮动，（谁心浮动耶？）伏乞将办理情形，晓谕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谁鼓噪耶？）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印，佳。"余初睹此文，即惊为异，故以游戏之笔加评之，复睹其文意，若似别有作用者，上海商界人士，不乏通才，何至措辞若是荒谬，况朱葆三沈联芳二君，平日办事极精至细，亦不能不加检查，而代其负责也。余疑未决，而商人沈卓吾赵锡恩等相继攻击，接次商界五十六公团起而反对，后经联合通信社，探得佳电之真相，关系出于上海某国商会会长之意，由吾国商会会长朱某之子（刻任某国某银行买办），亲任转达之劳，辗转磋商，为日已久，参与其事者，闻有八人，其电文系自某国文字翻译者，只删去"亲善"等语，由朱授意沈联芳拍发之，不意因一"清国"字样，为人揭破其奸，于是商界大动公愤，群起攻之。朱沈亦知众矢难止，遂自请取销佳日之电。商民仍攻之不已，朱沈遂相率去职。由是总商会，则陷于无政府地位。而商界之民气，因之益形澎涨。苟朱沈在位，必不任商民开会自由，商民之愤慨，必不敢若是猛进也。朱沈究据何种心理，若是荒谬，即是朝夕与官吏相近，沾染官吏之气习，利令智昏故耳。虽然若非佳电之激动公愤，而此次商民罢市，亦未必骤然而兴也。继学生联合会而起者救国十人团，为人民结合之团体中最占势力者也；其次临时发现者，如中华工界联合会、共同救国会、中医学校励志会、女子救国团、东吴中学演讲部、华侨联合会、国货维持会、少年团、中华书局宣讲队、公义储金团、中华青年励志团、中华工商研究会、中华女子救国会等等，笔不胜述。直至五月二十六日，而上海六十一学校，一律罢课矣。其罢课之后，各校游行演说，日见十数起，自追悼郭钦光之后，民潮之怒奋益甚。余因不在七日民潮之内，故不详述也。

六月五日（阴历五月八日），晨八时，余友冯念诒自电局归，告我各界已罢市，一时市中人声鼎沸，势若不可遏止者。余遂整衣往英大马路，所经过道途，如大通路、新闸路、派克路等僻静之市，而商店已双扉紧闭，高树白旗。男女老幼之商民，游行街市中，忽聚忽散，莫不各作悲愤之形状。"救国！救国！"之声浪，彼呼此应，虽有三五鹰瞵虎视之巡捕老爷，亦呆立一旁如木鸡，不能阻止其行动。包过英大马路，以至法大马路，瞥眼一过，肃然起敬见道旁各家商店，舍高悬白旗而外，门侧多贴"切勿暴动""文明抵制"字样，道中游人如蚁，皆不纷乱。而各校大中小学生，咸持白旗一方，沿途演说。尤足动人者，如童子军，各束装荷棒，维持秩

序。以年不满十二三龄之幼童，尚知爱国，且表示神圣不可侵犯之形状，愈足愧煞一般如狼如虎之军人矣。按罢市之因，余曾略述于前，而比日之导火线，乃上海护军使卢永祥警察厅长徐国梁知事沈宝昌也。当王怀庆大捕北京学生之风传播南来，上海学生联合会，即以公义要求商民罢市，比时商界人民，聚于南市县商会，特开紧要会议，即由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及北京学生代表等，莅会报告经过之情形。不意突奉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公函，谓奉卢护军使训令，停止会议，并劝令各校学生勿得入会要求等语。兹录其公函于下，俾阅者读之，即可见彼官吏之声势赫赫矣。其文云："敬启者：现奉淞沪护军使训令，以'凡有集会结社情事，务须先期报告，非得官厅许可，不准擅自举行。以保治安，而杜滋扰'等因，业经剀切布告在案，闻日昨，贵会以学生要求开会，除少数学生代表在场外，并有一般流氓随声附和，意杂言庞，秩序紊乱，殊属不成事体。查贵会常会，当然不在禁止之列，惟闻此次开会，涉及政治问题，本厅有保卫地方之责，诚恐有不逞之徒，混迹其间，借端滋扰，不得不预为防禁。除布告通知暨派警弹压外，为此函达贵会查照，即行停止开会。以符功令，而杜滋扰"云。接次即派该厅总务科长赵殿英、警察长顾玉琛洪桂荣、保安队队长马毓林、游巡第一队队长王德鸿、第二队队长刘德魁，各带队士数排，勒令解散。各校学生愤不可遏，遂召集各校学生，于南市一带露天宣讲，大都根据天津急电，请人民急起援助。一切行动，极守秩序。不料徐厅长，又遣其游巡保安等队，干涉驱散。其时各宣讲者，婉言与商，且向之哀告曰："事本爱国，然属个人，尔等固是身负责任者，而同属国民，亦当有所愤慨，何忍相阻为？"一再恳之，彼警士终不听辨，仍是不分皂白，大施其虎威，欲与步军统领王怀庆比赛，猛进冲散，不特各宣讲者大受其辱，即一般听讲者亦多遭其蹂躏，此上海警士与学生之第一次奋斗也。于是学商两界大愤，各于四日一律签字闭市。五日黎明，各学生结队，先自南市十六铺各水果行前，跪求闭市，凡少不表同情者，学生跪求不起，一时感动商民，遂全体罢市。由南市而城内，均罢市在六时之前。七时过民国路而达法大马路、而公共租界、而美租界、而闸北、日甫晌午，偌大辉煌灿烂之黄浦滩，一瞬而白旗纷飞如雪片，家家皆关门闭户矣。华商营业最巨者，如英界南京路之新世界游戏场、永安先施两公司、棋盘街之商务印书馆、福州路之中华书局、法界之大世界游戏场、城内之劝业场，以及天蟾、丹桂、大舞台、新舞台、亦舞台、共和舞台等平日在商界占绝大势力，若市面发现特样事，各商多目若等进退为进退也。是日若等同时停业，故街市鼓吹停业者，异常愤慨。时有城内之某鞋店，苦辛经营数月，方冀该日正式开张，悬灯结彩，灼然一新，且雇有清音一班，准备行"对我生财"之礼，贸然值此潮流中，彼居停主人慨然自认一切损失，即随众实行"关门大吉"之礼矣。其他营业至细者，如洋货摊、杂货摊、水果摊，以及各路、各界、各弄堂之叫卖小热昏者，亦销声匿迹。其营业至猥如娼妓，迎春坊、小花园一带之长三者，概行除牌停业。乌师帮复组九成同义会，结队遍发传单，通告维持公理。次如棋盘街之么二，初尚不表同情，欲攫一时鱼目混珠之利，嗣为大势所挟，亦惟掩旗息鼓。更次如英法两界野妓，小东门、盆汤弄之烂污美人，鸭绿江路之盐水妹，纷起救国，凡平日来往街市，声声"来哩"者，咸作爱国之呼号，而高坐门前，唱送郎想郎之十杯酒五更里者，同唱爱国歌曲。而一般"小瘪三"亦同集于水门厅前，作露天演说矣。罢市既定，首由各省商民同乡会，开紧急会议，与学界取同一行动，次由学生联合会，愿协助工部局保持和平秩序，函致工部局，其原文云："工部局会董披尔史君阁下：现在学生罢课之后，继以商界罢市，地方情形甚为严重，本会深愿与工部局协力办理一切。盖此次学生罢课，乃对于敝国政府行为愤激之表示，其目的在造成一种舆论，以为

收回青岛确实之保障，吾辈断无侵犯外人之意。但恐某国人或借此在租界上鼓起暴动，吾人今已竭力警戒学生及平民，保持平和及秩序，甚盼能有助于贵局也。上海学生联合会谨启。”接次由青年会同组汽车队，车上高树“切勿暴动”之旗帜，沿途警告。而各学生同组纠察队，分道劝守秩序。再次如省立第二师范全体童子军，维持南市秩序。复旦大学及寰球学生会之童子军，维持各租界秩序。一时商业虽停止交易，而街市之秩序，仍安谧如恒也。午后有平民沈信卿、黄任之、朱叔源、朱少君四君，同谒卢护军使（永祥），要求速发陈述民意电，卢竟拒绝以“未便”二字，复令步兵第三十八团马团长，调第二营全营分往老西门沿民国路，经拱辰门老北门等处。又由第三营全营，分往十六铺及中华路之大东门小东门并民国路之新北门等处。又饬京畿宪兵一连吴连长，督饬徐张二排排长率领宪兵三十名，佩械乘骑分途监察。又令步兵三十七团陈团长，督饬所部三营巡逻闸北。复饬军署之兵士，包围日晖桥南洋中学，监视一般学生之行动自由。同时徐国梁大发虎威，即派保安马巡队，分往小东门、小北门、闸北等处，解散各方之演说团。不果，徐遂御驾亲征，初乘汽车至小东门一带，大骂马巡队不力曰：“若辈一群小学生，尚不能武力压迫乎，脱遇盗贼将奈何！”遂怒责其巡警以示威，最后亲自捕去十四岁与十六岁之小学生二名，交一区二分所解厅管押。闸北四区二分所，亦逮捕十五六岁小学生三人。徐厅长欣然而喜曰：“若辈第二次义和团，不以威力胁之，乌可排纷解难耶！”复谕各局区长，凡所有未曾补足之空名巡警，二日内全体补足，各处添派双岗，又请派兵士三连，改换警服，一连驻第一区，一连驻民国路，一连驻闸北，加派侦探队调查罢市商家，筹备压制方法。比时为各校学生知悉，遂团结五百余众，同往一区二分所请求释放被押之学生，岂知益增彼怒，干涉益严，即向某巡长手中取得指挥刀一柄，不分皂白，向众乱砍，立派保安队五十名，佐以攻击，其狐假虎威之巡士，因而逮捕益甚。闻此日被捕之学生，有澄衷中学六人、华童公学四人、南洋公学五人、承天英华学校四人、南洋中学八人（均受重伤）、省立第一商业学校二十二人、东吴等二中学七人、大同学院五十人、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四人、复旦大学六人、浦东中学六人、民立中学一人（失踪一人）、青年会中学八人、民生女学一人。复于南市禁卖报纸，其被逮者尚不知数。未几，沈宝昌又将刻板文章威胁民潮矣。其布告云：“为布告事：近日上海学生，借口外交问题，纷纷罢课，迭经剀切劝告，近复借端聚众，分赴各街市煽令各商店一律罢市，以致流氓匪类，乘间抢毁，实属逾越常轨，扰乱治安。现奉护军使卢饬派得力军队，分投巡防弹压，严密查拿为首滋事之人究办，一面会同警察实力保护。为此剀切布告商民人等一体知悉：须知尔等经营商业，一日停顿，即受一日之损失，应即迅速开门，照常贸易，毋得听信谣言，自相纷扰，致受亏累。如再有人敢来滋闹，立即鸣警拘究解散，以维秩序，而安人心，是所至要。毋违，切切！”布告发表而后，徐国梁复带同卫队，第一区警署署长赵墨林，并罗扬二巡官，分道迫令开市。无如商民一致坚持，咸以伙友均散，无人负责之语辞之。而徐等竟以枪柄乱击店门。商民无已，随即下其门板，待其过后，又双闭矣。徐等竟无如何。惟怏怏逡巡一周而去。时公共公廨之正会审官关炯之，以和平之手腕，亲自出马，劝告商民开市。而商民一律抱定旋开旋闭之政策，对之敷衍。关某见各人义愤异常激昂，知不可劝，遂中道而返。是日银行钱庄虽未停业，然已在准备时间。当晚万国驻沪商团，一体戎装出发，分防要道。救火会西员，亦各戒备。而街市游人之秩序不紊。斯夕诚非若辈之功效，乃学生团白旗之魔力也。余直至夜十二时始返寓，街市中依然镇静，各维持秩序之童子军，皆灼灼有神。噫，谁谓中国之民气不足恃哉！

六日，晴。上海各界之民潮益涨。当第一日初行罢市也，犹有少数之烟纸店，从门板横

头开一方尺小窗，间或售卖纸烟洋火，以及兑换银洋等事，次日则无论大小商店，皆闭门不纳矣。尤特色者，各商店门首舍张贴“切勿暴动”四字，更将其意译成英文，遍贴街市，盖对于外人表示我人民此次罢市之举，决非暴动行为者也。更加以“不除国贼不开门”“不除国贼不开市”等字样，大街小巷，几至无家门首不张贴者。有时英捕路见此类张贴随手扯去，庸知彼甫扯去，而接次张贴者益盛，且于此类纸贴之下以粉笔书曰：“你扯我贴，你扯一张，我贴十纸”云云，英捕既见此等办法，亦不胜其烦，惟见之俯首不顾而已。是日下午二时，则有商工学报联合大会发现，特于上海总商会开会，各界次第到会者，计一千四百七十三人。当时经各校童子军维持秩序，严肃整齐，得未曾有。既因此次风潮，恐有少数人民，不明个中之真象，而误会肇衅者，遂宣言人民之主义，并相约共守之也。其文云：“中国乃国民之公产，政府为人民之公仆，为仆者卖主以自肥，主人不加责斥，而请其稍加哀怜，勿为过甚，吾商学工报各界盖已羞称之矣。吾商学工报各界，以久乱思治为怀，又念管吁政权者，或非尽无良心，苟有同舟之谊，亦足成斡旋之功。故数年以来，对于丧权辱国诸约，一出以谏诤呼吁之辞，而政府绝未尝一允吾求也。自山东问题之恶耗至，全国郁怒，益痛心疾首，知卖国贼而不诛，决不能免于灭亡。对外挽回之策，尤非先清境内不可。于是北京学生倡之，各省学生继之，奔走呼号，仍惟北京政府之是求，冀以万一之悟，乃不特不纳吾救亡之忠告，且滥拘无辜，加以酷刑。陷于兵警中者至四百余人。谁非国人，谁无忠义，忍令人民法内之自由先失，国家继是以灭亡耶？此吾商工学报诸界，所至痛极奋而出此辍业之最后策也。今商已罢市，工已辍作，与学生一致进行，存亡危急之顷，实赖兄弟同声之应。（一）国贼一日不诛，辍业行为一日不停止；（二）纯粹为对内的行为，对外概守相当的敬礼与友谊；（三）尊重市场秩序，力护法律内之自由；（四）辍业不效则更求多数之应援，待公道之裁判。上述四事，为吾人公意切实之声明，生死磨折，所不敢渝。愿吾患难相共之君子，鉴察而扶助之也。”又对于外邦之宣言一通，其文云：“吾人以北京政府，历年以来，所为违反国民公意、损失民国主权之行为，其结果将阻滞中国人民之进步，障碍远东之永久和平。故屡以文电哀吁，求其反省，取消丧失主权之不正当条约，惩办应负责任之外交及军事当局，而政府怙恶不悛，于中国今日危险最甚之时期，违反民主国常规，威压国民，夺其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拘禁杀戮爱国之青年，庇护应负卖国责任之官吏，上海中国商民全体，认此为政府故意与国民宣战，非可以口舌喻，已于昨日起一律罢市，以示国民反对政府卖国行为之决心。若政府尚不悔悟，容纳国民要求，当更进行于此，取有力合理的行动。此乃中国人民最和平最正当之爱国的表示，决不损及在中国外人一丝一粟。本会谨代表上海商民公意，以此次罢市真意所在，通告各友邦国民，深望各友邦国民，对于吾人困苦之境遇，及不得已之苦衷，加以谅解。尤冀为扶持正义，与吾人以精神的援助。此布。”其次而致北京以及各省通电，不遑备述，因大意相等埒也。比时各界同乡会，深恐人杂肇衅，除分发传单，以及各学生，或手执白旗，或臂缠白布表示“切勿暴动”四字外，复遍刊头等广告，哀恳“切勿暴动”云云。其秩序尤齐整者，如商务中华两书局，永安先施两公司，上下职员伙计，按日仍各执其事，不令闲游街市中，所停业者，仅不作门市之营业而已。于是各业局面少大者，多仿行之。而街头之闲人游玩者，较之第一日少减。各学校亦多仿行，由学生联合会通告各校学生，各回本校。是日各界维持秩序之童子军，亦均撤去，仅余少数之学生，游行演说耳。而民潮之势力扩张，比较昨日迥异，远境如汉口、南京、杭州、苏州、松江、宁波等处，亦有相继罢市之耗，近境如浦东、江湾、闵行各乡镇已实行停业。而本埠人民，其在商学两界之外，工业亦将继起。

其他伶界如冯子和、张月亭等，女伶如小金铃、小桂红、小月红等，妓界如笑意、妙莲等，均奋袂组织救国十人团，虽未必有实力相助，亦足见民气之澎涨已达沸点矣。未几，商会复布维持贫民日食之通告，凡关于一切饮食之饭店面馆，乃劳动者日食之机关，概可自由营业，而大都本诸良心上之感触，开市者綦鲜。各小菜场，除青菜豆腐之外，鸡鸭牛羊诸品，皆无从购办也。午后二时，江苏实业厅长张轶欧，奉齐省长命莅沪，邀集南北商会董事苏筠尚、虞洽卿、谢蘅窗、劳敬修、姚紫若，更有本埠银行团之代表，如"中国"宋汉章、"兴业"盛竹书、"中孚"陈光孚、"盐业"倪远甫，暨总商会会董王鞠如、盛筱珊等，磋商开市事件，直达钟鸣五点散会，而终未获得结果也。沈宝昌见张轶欧奉命莅沪，与各商人委婉筹议，于是以平日之怒目金刚，顿变做笑脸弥勒，亦与各商敷衍。卢护军使，本不知所谓维持者，围困学校如故，禁止游说如故，其所最热闹而与人民仇仇者，惟徐厅长也。徐于昨日大摆虎威之后，触动众怒，如邑庙中小本经营者，多忿恨之。当日多于其杂货摊上，密插"徐国梁专制人民"字样，突为徐国梁所见，遂大捕一切负贩者，当即捕去三人，激动公愤，群起与争，一时砖石瓦块，漫天飞舞，竟将彼一区二分所之玻璃窗槅击打粉碎。徐见势不敌，遂将所拘者释放，其乱即靖。而徐怀此一腔奇愤，无可发泄，遂痛责逮捕未释之学生曰："若非尔等捣乱，何至使我丢人！"持其无情之棒，捶无算。捶竟，复将各学生两手反绑，视若巨盗。时有某科长从旁劝之，徐怒赠其仙人掌曰："尔不受其唾骂，尔自做好人，尔独不知若辈胡闹我不堪耶！"后卢永祥令其释放学生，徐遂无已，令其亲信者从旁同演一出下台戏，做好做歹，始解棘围。是日，最足使外交团惊恐者，各银行钱庄，已停止划条、税饷单、本票等事，营业前途顿增危险，故邀集会议于南京路议事厅，电请驻京公使团，与政府正式交涉，一面严加防范。恐街市中突生意外之变也。实则今夕各界之现象，较之昨夕尤安谧也。

七日，晴。卢永祥对于城内一带罢市风潮，特下秘密戒严令。工界，自商务印书馆印刷部同盟罢工后，而继起者纷纷蜂起，如华界之电车已一律停驶，法界亦减少半数，仅公共租界开驶如恒，而掌机者亦多垂气作不欢状。闻华界电车最初之罢工，原未有一定坚决之主张，不过于执事之时，多于眉目之间，各表示一种懊恼之态。嗣经若干学生要求停驶，间有横卧轨道中，以生命与抗者，一时人心大感动，遂同盟罢工。法界所以不能完全罢工者，多因外交上恐别生误会故耳。然公共租界之电车司机人，亦多数请假也。斯时各方工界罢工之风将发轫，则惹起一般外交团注意，公共租界尤为吃紧，遂一再宣布通告，干涉游行演说之学生，并散布传单之公民。接次派出若干轻骑巡队，驾平日接电车路线之汽车，沿途收拾各店家所悬之旗帜。迨至四马路丹桂第一台门首，突有三五学生，登车与争，西巡出枪恐吓，学生不少退而游人益聚益盛，西巡睹其志不可折，遂以好言慰之，终不能遵其制。一时人民鼎沸，几欲与抗。后经各校学生婉劝，始行分散。然以余管见判之，彼外交团所以若是干涉者，诚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也。原因最重者，吾人民平日对于国家思想薄弱，昔对之若秦人视越人肥瘠，膜不相关者多，即有一两次呼声，亦多陷于泡影，而增彼五分钟之诮。故此次非反对吾等之举动，乃惧吾等蹈复辙耳。且于罢市之第三日，确有许多某国之浪人，易装沿街寻衅者，鱼目混珠，恐惹出意外之外交危险，不得不加以预防也。实则外邦此次对吾人民之舆论，罕弗加充满之美誉。如英文沪报云："此次学生罢课商界罢市，为中国人民自然之民主的表示。其领导之者，非官吏、非曾受外国训练之政客，乃中国学生也。"夫为此次行动之领袖者，乃一班青年学生，外人于此，或未能完全表示同情，然若中国人民，则虽最守旧商人，亦皆以学生为英雄，彼等已于无可希望之形势中，起而实行"国方流血，求学何为"之呼声，已一

变而为“国贼未除，赚钱何为，工作何为”矣。彼等之背后，现有银行家、商人、实业家、教育家，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悉为之后盾，全国今日已关节灵通矣。“大陆报”亦云：“吾人尝痛诋华人屈服于卖国腐败官僚权力之下，不知振作，而彼等一旦用唯一之方法，以反抗此等官僚，吾人不可以诋之也。吾人须知罢市或停止营业，到底为最和平之反抗方法。他国人民之反抗法，犹有剧烈远过于此者。去年日本人民之闹米风潮，其行动如何，其他各国发生公共风潮时，其人民之举动如何，皆吾人所知也。而华人此次之行为，则迄今甚和平，倘中外领袖人物，能处置得当，必能继续保此和平态度。彼华人领袖，固已竭力从事于维持治安，以保此合法之示威运动，吾外人应协助之、拥护之也。”中法新汇报一则曰：“不宜加压力于此群众之运动”，再则曰：“始终保全有秩序之行为。”且曰：“吾人可信中国今日之时局，当收结果”于此足征外人对于此次风潮，已公认为正当行动。世界无敌之利器，惟公理也。彼时国民大会，既得公廨干涉悬挂旗帜之消息，急举代表晤美国领事萨门司，萨云：“此事须与总巡捕房接洽。”遂介绍工部局总巡麦君。适麦君他往，即与其参谋阿姆司德朗君谈话，详细述明此次之原因，并担负一切维持秩序，阿君亦表同情。复谒法领事，而法领事亦无异说。于是凡租界之警士，一律解除武装，不再干涉行动，学生联合会亦加队巡防。而是日发现一种特别之异彩，为前二日所罕见者，凡爱国之学士，皆头戴白布之软胎帽，形势如清华大学之球帽，闻皆出诸一般女学生手制，盖爱国之标式也。大街小巷，凡目光之所触者，芸芸不知其数。接次各租界之商店，亦起而联络，共组商业一德会，准备晚间出发，分段保守秩序。接次，各商店分段组织休息所，各派招待，以及茶点，盖为商学游行之士而设者。一时白盔白帜，布满街市，而往来之游人秩序，尤觉严肃。余睹此状，顿有所感。嗟夫，彼代表民意之白帜尊严，加于克虏伯大炮不啻数千万倍，今而后吾知彼神圣不可侵犯之军人，在今日公理奋斗时代，直是一废物也。下午，工界罢工之说益盛。初由求新机器厂司事工人，全体罢工游行街市中，表示其热忱。并拟捐纳巨资于该厂街口，建造一铁木牌楼，高约六丈，宽约五丈，牌楼上书“毋忘国耻”、“唤醒国民”等字样。每字拟做三尺平方之巨，作永久之纪念物也。由此各厂得此消息，未有不乐助者。当此民潮鼎沸之中，彼恃武力为护符者，又受一绝大之打击，卢护军使之军署中，突然接得一种印刷品，其间乃劝告军警，万勿专事服从长官命令，忘却国民义务，须与学生取一致态度云云。卢永祥骤得此耗，遂知武力不足以专制矣，即易其平日大将威严之态度，一面特别戒严，一面亲至南商会，召集绅商学界，特开紧急会议。一时莅会者，如省教育会沈信卿等，县教育会贾季英等，公款公产经理处丁赓尧等，商界虞洽卿等，各公团代表邹静斋等，共七十余人，官场如卢徐沈三人以外，尚有护军使署参谋长马懋勋、副官长孙梓琴、沪南工巡捐局长姚石荪、沪北工巡捐局长曹履冰、交涉公署代表陈震东、警察第一署长赵墨林，官吏则高坐堂中，兵警则包围阶下。一时弓上弦、刀出鞘，凛凛森严，如金沙滩之两国聚会者。首先沈蕴石（宝昌）宣布其官衷苦吏，无非自白之意，次由卢子嘉（永祥）演说曰：“鄙人亦国民一分子，爱国之诚，不让诸君，第官守所系，有维持治安之责，今日特请诸君相助，劝导商家速即开市，学生即日上课，至于要求罢免曹陆章，诸君如果先行开市，政府必能办到，即本使亦可担保”云云。时如官吏派之商董虞洽卿等，将欲行其照例之拍手礼，讵知徐辅洲（国梁）狂詈学生混账，牵及商人。一旁怒恼沈信卿挺身抗议曰：“徐厅长顷有谩骂之言，鄙人窃所不解。鄙人亦曾作官，稍知官场体制。今日有军使在前，厅长就敢大肆咆哮，自已不守秩序，何能责人维持秩序？此次学生罢课，其动机实为厅长之殴辱学生。商人罢市，其动机亦为厅长殴打小东门小贩。厅长当自

责，何能责人？昨日厅长又发虎威，逮捕学生毒打。谁无子女，乃忍出此。嗣后尚望厅长稍改任意打人之习惯，以重人命”云云。徐闻之红涨两颊，起立强辩曰：“沈先生之言，略有误会，鄙人素性粗卤，昨日确曾打一流氓，惟此人为理发匠，并非学生，亦非商人。君若不信，可令警察质证”云。实则徐前日所殴，确为学生，乃第一商业学校学生阮勤，若非军署某副官从旁解劝，徐将以手枪毙之矣。众见互辩不能下台，遂以他言乱之，始行散会。迨诸官吏去后，复于天后宫桥总商会，开各界联合会，到会者计二千余人。最后之结果，仍公决先惩办曹陆章，而后开市上课。卢永祥亦无如何，惟向中央呼吁，中央已派杨晟南来调和办理。是日，镇江、扬州已相继罢市。未知此次圆滑神手之扬晟，南来调解，恐其三寸不烂之舌，翻得未必是朵朵莲花也。

八日，晴。余素懒，平日有宰予之癖，日必睡至亭午。惟近数日间，脑中为新空气所播动，几至不克安枕。清晨七时已离榻，甫盥沐毕，忽闻街头朗朗作卖报声，余急止之，购买一分，以佐我晨餐。甫展览，即睹中法新汇报之社论，题为“罢业风潮前途”，环诵数周，不啻于炎日之下，畅饮一盏冻忌淋，其一股清凉之气，自踵直达泥丸宫，几不自知若何舒适，不忍弃掷。爰录之，亦足见公论之一班也。其文云：“为反对亲日党，罢学罢市之风潮，以迅速之势发展。从此数日以后，全中国将一致。北京之商界，虽在军警监视之下，不免亦将加入。自有中国以来，未曾见人民之如是愤怒政府。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五年，人民怨恨满清及袁世凯，曾达极点，然未罢业也。以是证之，现今之政府，更恶于往昔矣。北京及武昌军阀，待遇学生如盗贼，有一千一百五十人被捕，内有百余人，被枪柄及刺刀等击伤，并且命令军警，凡有学生反抗军警，及人民中之摇动学生者，可格杀之。此种暴行，无论何国皆无，只有高丽学生，曾受日本军警如是待遇。中国人自问应否反对北京，如高丽人之反对日本政府耶？中国人民对于现今之统治者已绝望，欲求政府觉悟，譬之命日不光、指地不转，岂可能耶？中国人民所要求者，乃新政府出现，对内能保护人民，对外能光荣的代表于各国民之前。欧美各国，当认现在之北京政府，如同一九零零年之满清。现在段党不得人民之承认，而自僭为中国之主体，既扰乱极东之平和，又与日本勾结，筹备未来之世界战争，各国如不忍见乱象，及此次罢业之经久，以致中外人加受痛苦，当帮助中国人民排除卖国的亲日党之在北京，及在他方者也。”吾人读之，应感其记者之直言，始终不渝，方不负其期望之意也。午后，复往成都路访友，突闻城内南市断绝交通，各学校校长下紧急通告，令学生避居租界，谓今日学校将由军警包围，且派军队二千人，勒令商界开市云。余闻此说大异，回想卢永祥昨日开会之演说辞，彼决不敢若是大胆，或者官吏之变态万端，令人不可测度欤？抑杨晟南来，大施其调和手段欤？卒莫能得其真象。后探之，乃知是道路之谣，或者卢永祥有此意也。既得此种谣传之后，突又得一种至可惊骇之消息，一般知识薄弱之游民，相传日本人于自来水管中暗放毒药，或于露天茶缸，及菜场之小菜担中，暗置毒药，且有谓于我国自制之人丹，彼间或掉换毒丸，纷纷众口，言之颇真，一时妇女闻之，咸大恐怖。然余对于此等问题，不愿承认其真有事实也。须知此次之根本问题，我人仇敌，乃一般不肖之官吏，风潮发动，完全对内的非对外的，前三日已经各界一再申明，余亦曾述于前文。日人之气量，固较他邦人士狭小，然此等无标准之事，彼辈必不愿为。同时闻城内之白帜，间有被其买动苦力，私行窃取者。又闻彼等三五成群，故意向黄包车夫寻衅。如此等事，余则深信其必有。何故，因窃取白布旗帜者，因其帜上字样与彼有关，彼既没有大家气量，又不能张明禁止，遂硁硁然欲窃取罄尽为快。至于与车夫寻衅事，乃彼伙之浪人，而不明白今日世界之真象，头脑中惟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天皇，于是牺牲性命，寻我国知识薄弱之人民奋斗，借开外交之端。

所以易装而寻衅者，恃醉而逞凶者，皆必有之事。因其目的在未来之外交，以及中央政府耳。若谓彼等对于我国人民，其早坚持跋扈之见，鄙视之若陈死人，脱非不操此政策，必不专恃武力，一味与我中央政府交涉矣。况人民之公意，乃广义的，并无一定之目的。芸芸众生，彼不胜其陷害。加以上海一隅，乃诸外邦通商之域，一切公共之食物，且有外交团严重监视之者，彼必不敢冒大不韪，干犯众怒。余此论非谓彼有保守公益之道德，盖谓彼决不作此茫无涯涘之蠢事也。或有三五浪人，故作惊人之状，盖其意欲扰乱秩序，借第三者之力以干涉耳。吾人若信为真，正实中其诡谋之策，余深愿人民加以镇静为当也。是日，湖北王占元，继北京王怀庆之后，大捕学生。其布告中并有格杀勿论之语。于是上海之民潮益涨，人民罢市益盛，而官吏之戒备益严。如南市、城内、闸北，平民往来，几不能自由进退，而街市停业之风加厉，各钱庄已实行停解庄票，即小洋之兑换，亦实行停止，并拟抵制交通纸币，其谓曹汝霖之关系也。虽现状若是，而秩序井然。接踵者如铜铁机器工匠、印刷工匠、各轮船执事者以及清洁夫役，相率罢工，游行街市，而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邮差、贩卖小菜者等等，亦将准备。嗣经各界出而婉劝，谓诸业皆日用之必需品，不可片刻间断者，遂作缓图。而沪宁、沪杭两线之火车，已切实准备停驶矣。而各界游行队之秩序，则异常齐整。其组织招待休息所益伙，如新世界、升平楼、青莲阁、群芳、冠芳、五芳斋、明明眼镜公司、汇通电灯公司发起之后，相继者，不下数十处，其地方辽阔或人数众多之处，则用木箱满载茶点、汽水、水果各物，二三学生押令扛夫，肩荷而行，随地应接。尤妙者，各学生押令各食物行至民国路南市法华交界等处，见各兵士荷枪守备，遂特制头号馒头数百枚，以飨各兵士曰："诸君如此热忱，帮同救国，无以为敬，特备粒点飨之也。"若辈兵士，颊顿飞红，坚不肯受。或曰，何不直行享受，一塞饥肠？余曰，惟其颊上飞红，始不敢直行享受。更有一说，闻日前童子军过民国路，曾向若辈行礼，若辈竟不答复，惟其不知此等之敬爱，故不敢直受今日之馒头。且不知以诸学生之志为志，余以为损失一餐口福，犹其小焉者也。

九日，晴。午后大雨如注，晚霁，气候殊恶，寒暖不适度也。而商学两界之保安游行队，依旧往来于炎日骤雨之下，不少休憩。间有躯格恭弱者，为气候所侵，顿染痧疫者綦伙。斯时，吴淞镇已相继罢市，而吴淞之同济医工学校，特派四十余人，普散药品，及临时诊治时疫。同时又派二十余人赴江湾，四十余人至沪各租界，普渡慈航。一时受其惠者，诚匪鲜也。一时城内之商人，以及各校女学生，因各租界休息所发现，而各书商则共组书业同人恭送凉茶团，特制一面大白旗导于前，舁担者多十余龄童子，虽满面汗流，而笑容可掬。更有一般女学生约数十人，各持白沙枇杷一巨篓，云集城内之街市中，以飨商学保安者。午后虽大雨倾盆，亦不少退。噫，其心之热，其志之坚，概可见矣。同日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亦大捕学生，燕有王怀庆，鄂有王占元，今更加以南京之王桂林，洵可称王氏三虎。噫，何王氏之不辛哉！宁波已实行抗税，而一时上海之民潮，又因之益涨。学界如各校教员拟继学生而起，女子亦组织社会服务社，各洋行办事诸华人，大多休业，航业水工已实行罢工，汽车司机工人亦各袖手。午后三时，国民大会干事部，复开谈话会于卡尔登，莅会者约三百余人，朱赓石等议决不纳赋税，以及停止各商认税而散。而各领事团，因罢课罢市之后，政府并无若何之表示，深恐工界继起，秩序不能安全，故急电英国某兵舰司令，开驶来沪，协同维持市面，接次干涉学生联合会及各界商学之保安队与分散传单、露天演说者。一时各租界之景色顿变，人心惶惶，而秩序犹不及前两日严肃也。余又闻昨夜十一时间，有某国人，乔扮吾国学生，手持利刀，希图扰乱秩序，行经密勒路南金里弄内，为三六四号之居人王阿田识破，

彼则恼羞成怒，纠同类六七人，持刀行凶，伤王眼角及股际，王大呼救，由中西各捕，将王送至同仁医院，并获行凶者三人及凶器，解送该国之领事公署讯办矣。同时亦有袖藏铁钻之某国人，于虹口三角场捣乱，亦经中西巡捕所获，若辈之伎俩。亦太可怜。然余终以为是一般浪人之举动，而各租界所以二次戒备，未始非若辈妄动之因。故余对于外交团之戒备，否认与吾人民生恶感也。余更述护军使之态度，因昨夜又接国务院之如有紊乱秩序者，应依军法惩办之电，复率参谋长马懋勋、副官长孙梓琴、副官李翰卿、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知事沈宝昌等，亲赴城厢内外各街道劝导开市。且分六路进行：一，大东门，马参谋长懋勋徐厅长国梁任之；一，海神庙至沪军营马路，沈知事宝昌及警厅司法科长刘春圃任之；一，民国路，孙副官长梓琴任之；一，小东门至西门，军署副官李翰卿警厅总务科长赵殿英任之；一，十六铺，第十师李参谋长警厅督察长张竹生任之；一，高昌庙，军署何参谋任之。并由第十师各团抽派陆军十连，计六百人，又警厅骑巡队二队、保队安一队、游巡队一队，连同各区警察，计三百人，清晨五时出发，分途进行。直至中午十二时返署，终不如劝，于是外交神手杨晟出马矣。杨晟复与商界之声望最高者密议，又欲仗其统制之魔力，以解此围。而不知商界现状，身望愈高者，其信用愈薄。公理所在，非少数人可以挟之也。未几，总商会突发一劝众开市之通告，其文之妙，可与佳日之电文相颉颃也。其文云："本埠各商店，因请求政府释放被拘学生，罢黜曹陆章诸人，一体罢市。今学生已释放，教育部齐电，各生均回本校，渐复原状。至曹陆章诸人罢免，已蒙护军使及护沪海道尹，担任负责，急电政府照办。本日午前会议公决，学生已经释放，免职一事，由护军使及护沪海道尹担任负责，必达要求目的。若金融停滞，工界休业，长此以往，危险不可思议。商会有维持之责，不得不通告劝导各商界及工界，于本月旧历十三日先行开市，照常工作。特此布告。"各商界视之，咸嗤以鼻，而停业仍如故也。

十日，晴。天津济南已相继罢市，而国民大会会议，亦实行抗税矣。斯时商学人士，对于中央政府要求之意见，各不相同，有主张对于欧战和会中，不达外交上圆满之目的不许签字者，有主张要求南北统一者，有主张追还二十一条及各路之路权青岛土地权者，更有主张趁此潮流倒徐倒段，驱逐安福鱼行之臭鱼，重组新政府者，纷纷不一。然最多数要求之目的，即在释放学生，罢黜曹陆章三人者。斯非若辈不能猛进，不可窃笑其热度不满五分钟。盖因彼学生之寸金光阴，各商界之小本营业，实难再牵延。若并此两条不能达其目的，惟破釜沉舟，挺而走险。若少有转圜之路，彼等亦愿顺势收篷，为来日留有余地步。斯乃不得已之苦衷，余亦深悉其艰难也。今北京各校学生，确已次第释放，而所争者仅一罢黜曹陆章之命令耳。实则比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皆陆续进呈辞职书，徐大总统之准其辞职令亦颁发，所以迟迟未能达沪，乃水陆电线无端皆毁，中途停滞之也。及该电到沪，而上海各报业已发行，无已遂遍发传单，布告各界人士，苦于人民对今日官吏之信用太薄弱，一任其雪片飞来，终目之曰拆白，轮航依旧断绝，火车依旧停驶。于是张轶欧又来沪劝导，杨小川又欲施其勒令手段矣。而各租界之巡捕房，又将有强迫开市之说。于是商界人士纷集会议，如南京路各大商家，约一百五十余户，午后聚于贵州路报本堂，计议坚持办法。最后遂议定以"召盘"、"清理账目"、"闭歇"等方法抵制之。会散而后，则各家门板之上，平日张贴之"不除国贼不开门""不除国贼不开市"等字样，一变而皆贴红纸小签条，"召盘""清理账目""闭歇"等等矣。当其会议之后焉，间有少数店主，归店佯促其伙友开张，伙友坚持不可。其店主佯曰，然则各人之薪俸伙食奈何，众愿于停业期内，扣除薪俸偿还伙食，于

是店主佳其志不可夺，一笑而明言之。由是各商停业之心益坚定。按上海罢市，于今已过六日，若从外部观之，舍少数一二某国之浪人，与车夫小贩过往之平民寻衅外，其他皆安静如恒日；若于内部论之，则是日异常危险。因各租界之工作人等，概行停业，仅有公共租界之电车开驶，以及日日觅食之黄包车夫往还街市中，然大都垂头丧气，若似不耐烦者。而各机关因之停滞，周转不灵。尤险者德律风工人于今晨全体罢工，市面消息，顿为所阻。无已惟以西洋妇女十数人，暂行相助接线，苦其太无经验，以致一塌糊涂。一时各行政机关，异常忧虑。最后仍由商学各界婉劝之，该工人始恢复原状，用时如恒日也。当晚有数小学校之学生，未谙工部局干涉游行之布告，仍如前日执旗游行。迨至黄浦滩，为巡捕所阻，并强收其旗帜。其时学生之年长者，并不与抗；而年幼者，间与之争。彼巡捕乱击，各学生遂退走四散。后聚一部分者，转入江西路，又与巡队相遇，时各学生索其旗帜，与诸巡队和平交涉，一时观者如堵，而诸学生悄然行于街右。观者排于街左，秩序并不少乱。未几，突有特别西捕一排，自福州路横冲而来，误会有何等暴动，遂以手杖枪柄大打其出手，一时大乱，而学生队又遭冲散，且有一二人少受微伤者。消息忽传至四川路桥，及武昌路转角等处，立聚多人，惊询其状，而冲散之学生，途过其地者，犹竭力劝其散走，维持秩序如恒。彼时为西捕所见，莫不肃然起敬也。时有"字林西报"，载西人自署"容忍"者投函云："吾人接近上海华人之爱国运动者，忆及英伦当欧战开始之时，亦有若干之事情与感情，十分相似。故吾外人应设身处地，为华人一想，即能以较公平及较容忍之态度对待之也。当英国开始封锁德国时，各中立国恒起而抗议，谓有碍彼等之海权及合法贸易，英人则以坚决而委婉之口吻答之曰，英国为生死关头，迫于时势，不得不出此举。彼时全国英人对于各中立国之抗议，视为不了解吾等之不得已，十分不平，吾等当时在国内者，今犹忆之。然此种情形移至东方，吾人转处于遭受不便者之地位，则态度即陡变，何也？爱国华人，目今之运动，无非欲驱逐政府中之不良者。夫人民起而抗专制，殆为吾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最宝贵之主义，而今日吾人显然因在租界中稍受不便，即不许此主义行诸中国，抑又何耶？夫使吾人当自己紧急之时，不克顾及中立国之不便，且以彼等之抗议，而生怨憾，则对于华人之同一境地，何以不能了解之乎？彼华人即怨憾吾人，又何足怪乎？即使吾人不能完全赞同华人所用之方法，然华人此次之事，本全为对其国内之武力主义而奋斗，与外人无涉，吾人岂不可谅之者？吾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素以爱公平正义见称，吾甚望此种精神多所表见，勿因偶乏牛肉果腹，即蔑视一种高尚之奋斗也。"余诵斯文始知世界尚有直言者足征公理二字乃万世不泯之器也。

十一日，晴。各报传来，而额头特刊数行大字，则准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之令发表矣。于是农商部之电，江苏督军省长之电，护军使、淞沪警厅、淞沪道尹、上海县等之布告，以及上海总商会、县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教育会之通告，次第颁布，大致劝导开市开课等语。而国民大会以及全国、上海两学生联合会暨各种民组之团体，接次开会，研究进一步之要求。嗣因顾全商家数日之损失，不得不权作一段落告终也。因而各省大埠，及各乡村镇，均于是日开市。轮航火车各工厂工人，亦恢复原状。各租界之工商亦相率营业。惟各学校之学生，因迫于暑假，多未开课。至今国民大会，全国、上海两学生联合会暨各民组团体，概未解散也。午后商工学界，复齐集公共体育场，结队游行城内及南市。每莅一商店，彼店伙大燃爆竹欢迎，然后开市，洵亘古未见之盛举。其恶作剧者，午后四时，公共租界之郑家木桥，因游民与西捕互相误会，大起冲突，一时各商大惊，群复停业，又陷于黯无天日之象，直至次日始全体开市，斯乃风声鹤唳后之余波，非关于正文，余记亦从略也，总

之，此次民潮七日之中，完全是商工农学之人士，以公理与强权奋斗之举，未掺杂纤毫南北政争之臭味。对于日本人，刻刻加以严重保护，未兴起无意识之外交。而一切行动，且守人格上正当之秩序，如花花世界之黄浦滩，平日盗火时见，而此七日之中，不见一次火警，各租界之间，诚有夜不闭户，路不失遗之象。斯为余记此七日民潮，至圆满之美感也。然美中亦有不足者，如少数之奸商，趁此潮流，暗获投机之利。或以国货抬价，或为反对者之济，或以贱价收我人反对之货品，种种违背公约，余不忍详于正文。虽属少数，而其所得不偿所失，究非我高尚人民之所宜也。又如一般热心者，禁止各菜市诸货品贩卖，不听则以火油灌之，或殴击之，对于反对者之货物，必加以“乌龟”“王八”字样，高悬街市中，虽属热心，不可菲薄于彼，但对于社会道德，似少欠缺。要知此次民潮，乃吾人万世不泯之荣点，不可作此等小量事，而使平日之小量者反讥我也。尤足骇人听闻者，有谓某公会于此潮流中，密获贿金三十万，斡旋上海舆论，遂至罢市第六日，各报馆工人，有相率罢工之说。斯说焉，余良不忍言，且深愿此说不确。果然，则吾堂堂皇皇代表舆论之大主笔先生，无怪老学究骂之为高等流氓矣。余更有所不取者，市间之传单，或店家门头之白纸贴，间有措辞费解，或误书白字者，为一般主持舆论者编入笑林趣史中，以博阅者一粲。要知此次民潮，若何重大，凡有世界眼光者，应以端庄严肃之笔志之，方见吾国民气之正大。且此次之所以发动者，乃公理为强权压迫，几至不堪，不得已而出此举，吾人哭之号之尚不暇，何暇以游戏笔墨取乐哉。再如传单白纸贴，乃一时代表民意之品也，非太和殿角之卷本，其辞虽不高，其字虽误写，而其意其志则良佳，吾恐摇笔成文者，此时尚昧心取笑，其人格未必高于彼也。或谓此次民潮，嗟吾学子荒废若许宝贵之光阴，商业牺牲数千万金钱之损失，仅换得“准其辞职”四字，殊太不值。余曰否，诚如君言，损失固巨，而彼官吏终是俯首于我，强权终为公理所败也。此次乃我人民下第一次警告书，官吏对于此后之行政，似可少有觉悟。即不然吾人民乘此休憩时间，培植我民德，振兴我民业，事事认定公理不差，彼未来之曹汝霖辈，虽发现十百千万，又何患去之不易哉。故余对于此次呼救亡者，极端反对，而吾人民能争公理，即可不亡。吾人民能知公理，乃保全生命之利器，即可不亡。吾人民能牺牲“光阴”“金钱”“生命”，以公理与强权奋斗，尤不至亡。法之阿萨斯、罗连，丧失四十年，波兰瓜分，一百二十余年，犹太之不成国，一千余年，今竟因公理而恢复之，足见公理不泯，吾人终不亡耳。诸君乎，来日大难，欲缔造庄严灿烂之神州大陆，端在诸君掉头一顾也。

（原载《民潮七日记》，1919年6月上海公民社出版，现题目为编者所加）

〔附〕有关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若干资料

欧美学生之主张：五月四日午后四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开紧急会议，由总统府顾问吴赉熙少将为主席。吴君当提出三条由大众议决施行：（一）致电巴黎和会四大国代表，要求对于中国问题秉公办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二）致电巴黎中国委员，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于和会。（三）五月七日午后三时，留学生皆当聚集于本会，以中国全体留学生之名义，齐赴英美两使馆要求转达其本国人民，对于中国在和会上清维持公道，并予以公正之

待遇。会中费君又发起致电上海和会，请以国家为重，从速会议，以奠大局。亦经多数议决。

欧美留学生递英美公使书提出意见三条：（一）现时日本独任委托之职务，应改由五国共设委员会管理之。①（二）战时日人所要求之条约应完全取消。（三）五国委员会在管理期内，于最后议决时，应指定一条，即将德国前有之山东权利及日本在山东所有增加权利交还中国。（97——98）

北京商会之主张：自外交失败，学潮奋兴，商界亦继起实力赞助。五日，商会关于学生被捕，即开紧急会议。六日午后一时，又开会讨论，会员出席者二百〇五人，副会长金世藻主席，大致决定：（一）不购日货。（二）急救学生。（三）以本会及全国商会名义，电欧会力争。嗣学生释放以后，外交险恶日迫，政府无正当表示，商会又开全体大会，到会者五十余行。由会长安迪生主席，报告外交失败之原因，并实力挽救之办法。主张：（一）应即请各行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运日货，私运者议罚。果一年不卖其货，不买其粮，则彼将不支。（二）不用日本银行钞票。（三）不阅日报，不登日报广告。又山东代表报告该省受日人之扰害，及近日外交情形。当经公决抵制日货之办法两种：（一）调查。凡日货之名称牌号样式，一经调查清晰，以后不再贩卖。（二）陈列。凡日货可聚集一处陈列，使人一望便知，不再购买。更于提倡国货，请政府减轻税率。主席主张今日即为国货维持会第一次成立会，此会即设于本会之内。各商董均为国货维持会会员。一面函索上海维持会章程，一面以本会名义通电各省各商一致进行云。兹录该会函电二则如下：总商会、和平联合会、各报馆转各团体公鉴：山东问题，异常危急，闻将直交日本。请飞电巴黎和会力争，及电我各专使，万勿署名。并招各界开会，商量救亡办法，为外交上声援。北京总商会江，"又致各省商会函：敬启者：山东青岛问题，情形异常险恶，设有蹉跎，我华必至不国。近日学生界及商民各界，极端激愤，京师各界，已上书政府，请极力交涉，坚持不能稍让，以保我命脉，报界宣布，谅无不知。请即协力同心，急起一致进行。同居危舟，幸协谋救拯，以期共济，而拯已溺。谅我同志，共此心也，专此飞布，只请公安。"（107——108）

商民之爱国：自总商会议决抵制日货之后，商界实力进行。各店运日货者，一律停止。而东洋店铺，早已无人过问。且效学界所为，关于东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毁者，已不一而足。连日东洋货价忽跌落，而吾商人不为利诱，抵制如故。各界持票往日本正金银行兑现者，拥挤异常；且各店实行拒收。又闻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销数顿减。又连日商界之传单如雪，兹录其要者，亦可见我商民之毅力矣。"日本既占据我满州，今又强欲夺我山东，如此看来，日本真不是我中国的友邦了。我中国人民无论士农工商，应从民国八年五月七日起，齐心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银行钞票。若各人有日本钞票，应去兑现。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哼！要真能够这么做去，日本人未必不怕也！"（108）

天津商界，自外交失败，学生被拘之事发生，十分激昂。商界大开会议，讨论抵制日货，挽救学生方法。而各商家以不用日货，不载日船，不用日钞，三条抵制，进行甚力，暂与日人断绝工商关系。连日华商与日人之有往来者，俱皆交涉清结。而日本租界各商店，异常冷静。华界各洋货店，历年风行之仁丹、金刚牙粉、大学眼药等，今已无人过问。又正金银行之钞票，连日兑现风潮甚烈，市面拒绝，不值一钱。闻各商号已电致驻日大阪买办，停止办

注①美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中首提出共管青岛，为侵略我国的阴谋。当时引起我国人民反对。此意见书又要求共管，是美国卖办为其主子效劳，不能代表欧美留学生。（97—98）

货。兹得该处买办回电，大略谓现在所购日货，拟全数退还，卖主如不允退，即将全体返国云。各商界得电，非常欢喜。谓诸买办此举甚是，即有多大损失，亦所不计云。（108——109）

各商店之爱国热：自总商会提议抵制日货之后，各商店积极进行。连日东洋各庄，概行停运。小至理发店之东洋剪，小洋货店之东洋肥皂、玩具，市上一概绝迹。而正金、汇业等钞票，商家俱不收用。且长江日清公司之轮船，已无货客搭载。脚夫不担日货，转运亦拒绝驳载。惟见白旗飞扬，传单若雪。我金陵商人之爱国，亦可见一斑矣。（110）

抵制日货之意见书：南京西药业公所，曾开会讨论抵制日货，致书南京总商会：（一）已存之货听其自由，不在形式，贵精神坚决，持久以达目的。（一）从议决之日起，一律停止日货，违者认为公敌。（二）凡国货有相当之代表者，必须售卖，以资提倡。（一）凡关于生活及教育品，为国货所无者，依便利办理。（一）如一切嗜好玩具化妆之物，纵为国货所无者，亦宜屏绝。（一）日本之原料，经我国制成者，即认为国货；我之原料为日本制成者，即认为日本货。”（109——110）

上海总商会之黑幕：上海总商会对于青岛问题之失败，北京学生之被捕，久无表示，颇兹物议。佳日（五月九日）始有电致北京政府，而其措词之荒谬，实属可疑。兹照录如下：“北京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钧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即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清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人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京，复潜往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兹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遴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启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清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怠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佳电发表之后，舆论大哗。探此电系出某国商会会长之意。因朱葆三之子，任某国某洋行买办。发此电之先，辗转磋商，为日已久，参与其事者共有八人。且原电由日文译出，一则日清国再则日与日直接交涉，其措词之荒谬，显系日人之授意。故各界群向商业公团询问，物议纷腾。沈联芳避往浙省朱亦提出辞职，一面运动卢永祥、沈宝昌等劝其仍旧就职，而北京农商部亦电卢代为运动。昨该会接部电云：“迭准卢护军使来电，以该会长等尚未到会，请主持挽留等因。该会长任职有年，深资得力，尚希顾全大局，从速到会，维持会务，勿以流言遽萌退志；是为至要。农商部感。”又闻朱葆三指挥总商会董事会，举临时代表顾馨一、苏筠尚、张乐君、王一亭、闻兰亭等同赴其寓所，劝其速行到会。朱初尚假意推却，代表亦明知其故，再三恳请；其结果朱云：“果必由鄙人主持亦须暂缓。须待沈副长回沪后，方有头绪。至于就职之办法，亦宜妥为斟酌。以免反对者之攻击”云。上海总商会大都为一般充当外人买办者之势力，本其依附草木之惯性，故惟官僚之意是从。非痛加改革，诚足为我商界一大耻辱也。（110——111）

救国宣讲团开会：商界少年救国宣讲团，假寰球学生会开成立大会，到者约六七百人，

首由主席刘樵仙君报告开会宗旨及组织经过情形。并谓："坐挨伦胥，商人岂能幸免。且全国学生均愿牺牲生命抛弃学业，以挽此一发千钧之危局。吾等除宣讲外，倘政府不能觉悟，亦必唤起全国商界，与学生取一致行动，誓死力争。"李齐民、沈卓吾两君演说，均勖商界勿让学界专美于前。沈君又希望该团诸君出外宣讲，不仅注意争回青岛，尤须注意取消中日一切密约，所见尤大。次奚萼农君演讲，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同时急进。次吴铁诚君演说，谓："现在应急想一种手段，将官僚军人奸党尽行扫除，此为根本救国之方法，尚有一事须急研究者，即辨别日货，因日本商人为世界各国最无道德无信用者，凡欧美所发明之货品，彼皆能刻意仿造，鱼目混珠，务望诸君将其各种异点，详细考查，随时胪列说明。否则徒有抵制之名，而无抵制之实。"末由永安公司经理刘君生初演说商界少年之救国责任。至钟鸣十二下，始宣告散会。闻该团尚拟分头联络外埠商界同志，一律进行。（111）

糖业致广帮函："敬启者：甜蔗制糖，本国货佳品，亦植物中一大宗利源，产地以闽广川三省最盛。川运维艰，销行各省者，厥惟闽广。所以经营于此者，亦唯贵帮两省人为多，良以产区近而营运便也。通商以后，各国制糖，日新月盛，我国则师古不变，不尚竞争。外人制糖用机器，我则仍施以人工，外人制法精而耗货少，我则出品次而成本昂。彼此相形，营业日绌。以致种制步减，出货愈少，洋糖愈盛。坐使我国向来所有大宗之利源，尽为洋糖搀夺而靡遗。可胜浩叹！夫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急起直追，责在业中。矧逢国人知识开通提倡国货之良好时机，凡在业中，亟宜为悟醒，勉其难。若能就地经营，组织糖厂，改良出品，必能挽回利权。惜敝同业隔于异地，有志难遂，贵省本产糖之区，关系利害，尤为密切。如能亟图创办，敝同业亦得附骥尾，广为推销，俾国货不致终于淘汰，杜塞漏卮，实根本抵制之法也。素仰贵帮热忱实业，爰贡一得之见，尚祈赐教是幸。"（113）

爱华制药社公函：华商爱华制药会社致各报馆转全国药房暨同胞函云："此次外交失败，全国悲愤。然国民苟能一致对外，各循其职业地位，为相当之行动，则不难雪耻以图强。鄙人厕身药房，敢劝同业，此后切弗再销某国之丸散膏丹。盖比年以来，某国药品，屡屡涨价，同业经售，实无利益可图。若再恋恋不舍，是甘作牛马，为某国之奴隶矣。且自某国药品充斥于市，而同业之名誉营业，一落千丈。今欲振作令名，推广本牌药品，尤非抵制某国药品不为功。况某国野心勃勃，害人利己，是其特长。故其所制各药，久服均有成瘾之虞，如某丹及某胃药，每年能销数百万元之巨款者，皆用此种诡计也。呜呼！彼为私利起见，固不惜毒害邻邦。惟我同业，应亟反省，抵制此项危险之药品，改售纯正之国货。庶可挽回权利，保障生命。此举实为同业应尽之天职，亦即应有之行动。愿爱国同志，急实行之。本社自本年国耻纪念后，各埠同业如委办东洋各种丸散膏丹，概不代办，以示决心。幸垂察焉。上海南市华商爱华制药会社杨瑞葆痛告。"（113、114）

北货业之通告：点春堂沙轮车运北货业通告云："通告者：此次青岛问题，外交失败，国家存亡，千钧一发。沪上各团商业，靡不具发热忱，群谋抵制日货，以为挽救之策。查我北货范围本无日货，惟对于航运之抵制，亟宜有所表示，聊尽国民天职。爰特会议自旧历五月初一日起，凡外埠各处，无论何种货品由日船运装来申者，一律不得提售，并不准借口下船扦样；如申地运往外埠货件，亦不得交日船装运，以示拒绝。事关爱国，极为重要。尚冀协力同心，坚持到底。设有阳奉阴违，察出应照本同业第九条罚规办理。希同业各行一体注意。凡我同人个人，对于日货，虽一文钱至贱之日本货品，各宜奋发精神，誓不买用。莫逞一时之意气，有失人格体面，毋抱五分之烈忱，徒被外人讥笑。齐心一致，慎始厥终，爱国

救亡，端赖于此。此布。”（114）

上海商业公团之呼吁：“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七日上海等以六十一学校学生一万二千余人，同时罢课游行街市。闻江浙内地各校，已相继而起。风潮激荡，群情汹惧，万难遏抑。自外交失败，内和停止，东南气象愁惨日甚一日。似此情形，势必激成界罢市，全国立见糜烂。商民等一再呼吁。前奉院电，仍无切实办法。政府果有保国诚意，应俯从商学界之公意，所有屡次请求各端，万望立即施行，速令总分代表回沪，重开和议。庶几国家命脉尚有一线生机。临电涕泣，不知所云。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六十一公团同叩。”（114——115）

报关公所：本埠南北市报关公所，自实行抵制日货以来，已积极进行，惟查得有少数客帮定办之货预先嘱装，有不能不受理之苦衷。爰邀全体同业在蓬莱路公所集议，到者五十六家。当经讨论之下，经众公决，于五月初三日为截止装运之期。兹将议决条件及派定调查员十家录下：（一）议决不装日船、日货，不收日币，须达到收回青岛，及各种秘密条约取消目的，后再与联络。（二）凡日船运载之货，无论进出口各货，一律拒绝止报；倘有客帮预办定之货，在五月初四日前已报明商帮协会备查者，应凭该会附条加盖图章，知会我同业，报装者应一律管理。（三）五月初四日后，如有不肖奸商，暗中仍装日货日船者。察出时，罚银五百两，内提四成充报告人之奖金，五成充国民大会经费，一成充登报等费用。如罚定后，不愿遵缴者，除取消奸商报关牌号外，一面请由国民大会公决执行。（四）同业中如有代理日商轮船，以及挂用日商旗帜者，应由公所通知该经理家，撤消代理。如不纳忠告，故意违犯公决者，罚银一千两。倘不服议罚，由公所登报宣布为国民公敌外，一面亦请由国民大众公决执行。（五）各同业如有借用公司报单，影戤代客报装日货日船者，凭调查员查询明确证实后，按照第三条处置。（六）调查如有徇情午弊，知情不报，察出即为国民众矢之的，并永远逐出同业营业职役以示惩戒。宣告毕，由主任徐菊如及全体签字，散会已六时矣。（117）

汉口总商会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外交协会、上海南北代表、和平联合会、广东军政府钧鉴：前因青岛问题，后电请外交协会转请饬使力争。迄今旬余，风传愈恶。报载三国会议，关于中国胶州及山东问题办法，于法律公道及中国人之安宁，均成失望。虽代表正式抗议，既仍未听纳。并列国签字日期，恐依然未远。当此人心激烈奋不能忍之时，佥谓中国对于列强、输送华工，不能谓不尽力；供给原料，不能谓不有功。乃于和平会议之场，竟无平等待遇之事。则此后受人鱼肉，更何待言。兼之山东为畿辅之屏藩，与徐淮相衔接，关系大局，一动百摇。人人自危，莫知所措。酿成意外之变，亦未可知。窃谓此时对于前项问题，别无斟酌。能抗议修正，固计之善者也。次则惟有退出会外，不预签约之场，列强彼时，或鉴吾国之心坚，为事后之理处，犹云幸矣。否则同一生不如死之心，与其奴隶而苟存，不如横决之同尽。吾固失矣，人亦未为得也。又况列强之在中国，以订约论，已将及百年；以通商论，更不止一埠。不惟缔交有素，并复休戚相关，出而维持，亦势所必至乎。若谓仍可签字，惟提出山东一部声明另商。又谓设不签字，恐其他同等利益，作为无效。不知其时，尚难改正，更无再张公道之时，要地既已诿人，何贵他种轻微之利。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不得谓不肯签约之徒为自误也。自念杂居阛阓，民隐易娴。既有所知，不敢不告。所愿钧座从此本大局相关之谊，申一致对外之心，内讧全消，斯危侮可御，转祸为福，或尚有其时耶。急不择言，伏乞垂鉴。汉口总商会全体同叩。”（121——122）

安徽总商会近因抵制日货问题发生，特发传单，通知各号，以便实行。其传单云：“为通知事，近阅各报内载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全国人心异常愤激；京津沪汉各埠有发起抵制

日货，以为外交后盾者，皖学生全体已有表示。我商界同人，亦属国民分子，热忱爱国，谅表同情，夫不购日货，本属人民自由之权。况我国物品丰富，制造精良，多在日货之上，自应提倡维持国货，以免利权外溢。凡我商界，尤须注意此点，俾明竞争。除通函各县商会外，合特通知各商号一体遵照。嗣后务须提倡国货，以挽利权。一面互相坚持勿购日货，以为无形之抵制。似此文明办理，于国于商两有裨益。本会实有厚望焉。特此通知。"二十日，特开董事会，讨论抵制日货办法：（一）广东海味业、布业、糖业、药业诸号现存日货若干，已订而未运者若干，请说明底蕴。（二）抵制日货，须先提倡国货，应从调查入手。（三）恢复国货维持会，并议决先宜断绝来源，以端午日为截止，以后查有来货，一律充公；现存之货，资本充裕者，可收存不售；至零数小店，尚另筹办法；总宜坚持，以免五分钟热度之讥。（122——123）

南昌总商会通告："通启者：国际之交涉，全恃有国内之民气以为后盾。而民气之盛衰，又恒视国民爱国心之结果与否为转移。近阅报载巴黎会议，我国青岛交还问题，力争无效。倘竟失败，何以图存。凡属国民，同声愤懑。惟我商民，市廛逐利，既无政柄，又乏兵权。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筹思至再，在商言商，除劝告同人提倡国货，表示爱国之决心；抵制日货，牺牲贩运之权利而外；实觉别无良策，泄此奇忿，救此垂亡。为此通告各业同胞，互相注意，凡有与日人通商或贩卖日货者，务宜从此实行停止。展放眼光，蠲弃微利，自爱即所以爱国，爱国即所以救亡。祸急燃眉，言不尽意，商界诸君，谅皆洞悉。慎勿贪图小利，仅顾目前；犹复为虎作伥，引狼入室；弃祖宗而为奴隶，借寇兵而资盗粮也。切切此布。南昌总商会启。"（125）

北京商会请罢曹陆等呈文：

具呈京师总商会为市面惶恐，岌岌可危，恳迅予设法以息风潮，以安人心而全大局事：窃自外交不振，学界愤疆土之沦丧，呼号奔走，殊有涛兴云拥，不可遏抑之势。影响所及，商界亦相顾心惊，群起怨责。虽外交困难，非浅见者所能知，而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被此激刺，亦暗有浮动情形。总商会连日竭立维持，喻以首善之区，断不可有此种行为，幸商界尚能勉就矩范。伏思此次风潮，推其原故，由因得果，胥缘外交不洽民意而起。查前曹总长等曾上请求罢斥之书，在政府以当轴名位攸关，不能轻转移于悠悠之口。然就全局以观，殷鉴不远前清以三百年之帝制，因民怨沸腾，遂决然宣布共和，日本伊藤博文有巨大之功绩，以舆情否认，亦竟下野归田，凡此无他，以求安定民心而已。曹总长等既自行求退，政府应即俯准所请。则全国人心，既可立即安谧；京师各方面，可以各就秩序；即在曹总长等一方面，亦可居明哲自保之令名。一举而三善俱备，止风息潮，计似无逾于此。本总会目击市面现象，实切隐忧，中心危之，难安缄默。仅此不揣愚昧，披沥上陈，恳乞鉴察采择，迅予办理。实不胜悚惶待命之至，伏冀大总统鉴核施行。谨呈大总统。八年六月七日。（298——299）

邹静斋演说：商业公团代表邹静斋君起言："卢军使与沈道尹已有诚挚之宣言。我等商界首当体谅官厅之为难，不为已甚，择其切实易行者，请军使主持。最好请军使先发电北京，用商学各界口气，面求军使转达，如此可泯要挟之嫌。一面由军使切实布告各商，俾各代表转劝各商开市。空口劝告，恐无效力。至于抵制日货，字面不妥，有关条约，吾人此后当依从军使之谕，改用提倡国货等字样。"

虞治卿演说："军使道伊既有负责担保之宣言，吾商人极应体念官厅诚意，切劝各店铺

即日开市营业。惟须请沈道伊将今日会议情形及军使面谕，分函南北两商会，会同省县两教育会，通告各界，劝导开市。学生方面，则由教育界劝告上课。”（447——448）

表决办法：卢军使起言：“诸君所讨论急要办法，不外两种：（一）先免曹章陆，后开市上课。（二）先开市上课，后发电北京。请众解决，以便进行。”沈道尹言：“鄙意一方请各位先劝告开市上课，一方由军使拍电，同时并进为最妥。”商界某君言：“上海为中国商务中枢，全埠罢市，不啻全国罢市。应请先电政府，准免曹章陆，然后一律开市上课。如此则不但上海一埠可以解决，即北京之事，亦可从而解决。”沈信卿、贾季英君称劝学生上课，恐难收效。虞洽卿君、苏筠尚君等起言，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烂。遂全体表决，采用第二项办法，由沈道尹致函两商会及两教育会，将会议情形通告各商家。北京〔市〕由沈道尹偕虞洽卿亲至各商铺劝导开市，南市则由徐厅长偕苏顾两君劝各店照常营业，静候政府回音。钟鸣十二时，即宣告散会。（449——450）

商会劝告各商店开市

上海总商会昨特通告本埠各业商号①，文云：“本埠各商店因求政府释放被拘学生，罢黜（谁对你说罢黜）曹陆章诸人，一致罢市。今学生已释放（拘捕不是说谎）。教育部齐电各生均回学校（学生会并无电来），渐复原状（是尚未全复原状可知）。至曹章陆诸人(贼)罢免（商界是要求惩办），已蒙护军使及护沪海道尹担任负责（道尹可以担任惩办总长、公使也奇极），急电政府照办（政府一定听他吗？）。本日午前会议公决（何处会议、何处公决），学生已经释放，免职（谁说免职）一事由护军使负责（护军使及护沪道尹担负责任），必达要求目的（四日之内为何不说）。若金融停滞，工界休业（政府造成，他会负责），长此以往，危险不可思议（人人知道，还要你说）。商会有维持之责（从前你在那里，罢市时你在那里，今日谁要你维持），不得不通告劝导（谁听你媚外洋奴劝导）。各商店及工界，于本月旧历十三日，先行开市，照常工作(卖国贼还没有惩办，我若开市，岂非白罢了五天)，特此布告，务请注意。”（453—454）

商界决心

昨日为商界罢市之第二日，各商家门前咸贴有“不除国贼不开门”之字条。下午一时许，捕房得有北京释放学生之信，于是劝各家将字条揭去，照常营业。各家不肯，于是西捕自行动手，强将字条撕去。于是激起店家决心，随撕随贴，其措词不一，有书“爱国自由，不受干涉”八字，有书“你会撕我会贴”六字者，有书“我心已决，越扯越贴”八字者，有书“你撕我贴，越扯越多”八字者，有书“你愿做亡国奴否”七字者，而“不惩国贼不开门”之字条，则较前更大。即前此门前无字条者，今亦补贴之，于此可见商界之决心。西人无法，只可置之。又闻四马路一带，有商团出令各商家撤去所悬白布之旗，棋盘街口之五洲大药房、中英大药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店家，首当其冲。各家均不为撤，商团至则撤去，商团去则又悬，终亦无可如何而去。（485）

奸商牟利不爱国

注① 此通告系6月9日所发，据“民国日报”6月10日十一版“总商会通告突然出现”条云：“昨日夜有署名上海总商会之通告，沿途分发各商店。而宁波、广东、山东三邦商店各有会议，且将其通告注解，亦在途分送。兹并录下。”文中（　　）括号中的注解，系“民国日报补入”……又文中所谓旧历十三日，即6月10日。（453—454）

青岛事起，全国激昂，凡有血性者，莫不奔走呼号曰，抵制日货。乃有居住苏州娄门内水河香桥之黄××者，于前数日间，私卖娄门外徐震隆米行之菜子二千余担与某国人。当时市价每担六圆左右，因恐某国人接续购办，于三日中即涨至六圆八角。成交时非常秘密，故外间知之者殊鲜。噫！黄某甘心做他人奴隶，竟然不避舆论。而该米行徒知牟利，不知爱国，岂别有肺肠耶。寄语该商，可以悟矣。（知我，502）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电美总统、英法首相国会，请主张公义。

巴黎美国大总统、英国法国首相、英法美国会诸君钧鉴：自山东问题及种种密约问题发生，激起全国抵制日货，京外各省学生亦因之罢课，远东和平，前途甚为危险，请求我亲爱友邦，主张人道公义，勿使日本肆其野心，即中国得保其命脉。青年学子全体愤激，誓愿牺牲，谅为友邦之所敬悯。排除日货于该国亦大不利。我等商人无可告诉，乞于和会提出主张、大局幸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叩。（586）

商业公团邹静斋演说略谓："今日何以罢市，为苦政府压迫也。今日之举，非以对外，实以对内。对内云者，痛心疾首于不良政府。政府亦国民一分子，何以甘倒行逆施，以有卖国贼为之依。商界对于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学界诸君独敢言人之所未能言者。我商界等又安可不速从良心上弹力进行。今日汤节之、虞洽卿君，见各商界齐心罢市，恐万一不慎，或于地方治安有关，特一面先与捕房接洽一切，文明举动，概允不加干涉。一面复请万国商团童子军，出而维持秩序。只望同胞能守秩序、绝无暴动，自然不怕非法干涉"。（695）

（原载科学出版社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括号内的阿拉伯字为原书中的页数）

〔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饬京师警察总监镇压北京各校学生文

（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

大总统令：

本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一案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著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此令。

国务总理
　　　　钱能训
内务总长

（转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辑15册）

〔附〕 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饬北京军警等机关各省督军省长镇压学生运动令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大总统令：

前因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滋事酿成纵火伤人重案，当经令饬京师警察厅总监随时力图防弭，以保公安，近日外交经过事实，政府自必开诚宣示，俾释群疑，惟是谣诼滋多，人心浮动，影响所及，易滋构煽，京师为根本重地，各友邦使节所在，尤应切实防卫，以期弭患销萌，著由京畿警备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军警督察长京兆尹等一体认真防护共维持，遇有纠众滋事不服从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其余关于保卫治安事宜，均责成该总司令等悉心调度，妥慎办理，至各省区地方治安该省督军省长都统责无旁贷，并著切实筹维，勿涉疏弛，是为至要。

此　　令

国务总理
内务总长　　钱　能　训

陆军总长　　靳　云　鹏

（转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辑15册）

〔附〕内务部镇压北京等地反日运动有关电文

（一九一五年五月）

致京警厅训令稿（5月23日）

为令行事，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冒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禁，分别依法办理。

此　　令

〔附〕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表示对待学生运动主张通电

（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

国务总理朱总代表段督办陆军部外交部、教育部、农工商部，各总长、各部院、各学校、总商会、王步军统领、吴警察总监、曹经略使、李督军、王督军、陈督军、张巡阅使、卢护军使，总商会、兵工厂、和平会、唐总代表及南北各代表，军政府岑总裁及各总裁，督军省长、各都统、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总司令、各省官校、商会，省议会，教育会，各报馆均鉴：本日呈上大总统一电文曰：北京大总统钧鉴，治密窃师长等近日迭据沪电，内开有北京学生因开会演讲被捕者数百余人，沪商全体罢市，并沿江各埠亦有继续罢市罢工之举动等语，不胜骇然，窃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廿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操之过急，对于直言之学子未免轻重颠倒措施，殊非我大总统维持时局之本心也，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征诸历史不寒而栗，即为辛亥争路风潮，尤可为最近之殷鉴，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贾，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纵使语言过激，亦须遵照我大总统剀切晓谕四字，竭力维持，为必以直言者为有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揆之古人谏鼓之设，谤格之立，刍善之询，乡校之义，不无刺责。且日俄战后，日人疑敌，村氏外交失败亦曾有围焚屋宇之举动。日政府乃特开国民大会，宣示交涉之理由，由群情帖然，并未闻有激烈逮捕情事。我国此次交涉，未既无不可告人之隐，既宜仿照日本办法，宣示全国，以释群学生又何苦。越职干政自取咎戾，如必为民气可抑，众口可缄，窃恐众怒难犯，未欲难戒，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师长等素性戆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仰恳我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而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以平民气，以救危亡时机，危迫一发千钧。临电不胜悚惶，待命之至。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直隶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肖耀南，率第一路全体官兵叩佳等语，谨此奉闻，敬乞卓力维持以息风潮，而安人心，是所企祷。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直隶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肖耀南率第一路全体官兵同叩青。

（北京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

〔附〕 有关五四运动中帝国主义阴谋破坏活动的若干资料

报知新闻：三月二十日，东京"报知新闻"云："中国排日运动之所由起者，因于欧洲和会，中国主张青岛直接归还之说失败，日本继承德人权利之故耳。今其排日气焰，虽犹蔓延各地，然中国即脱离和会，亦不足转英法诸联合国之态度。故其结果，唯有服从诸国判断而已。以此中国人民亦渐觉悟，知亲善某国之非，而渐次接近吾邦。况吾（日人）之于中国，即于青岛问题，亦屡次宣言归还。虽煽动排日者，以日本不能归还青岛为辞。然十七日内田外相复有归还青岛之声明，吾知必能取信于华人也。故排日运动由表面观之，似难一时终熄，然其势渐弱，或者于吾（日人）对华贸易，无甚关系"云云。（173——174）

× × ×

内田外相之谈话。

日本报纸，有一部分对于友邦在中国、西伯利亚或朝鲜之行动，时有不根据确实之事实，且不考虑其结果之重大，足以影响及于日本所处之地位，而妄加非难者。而在中国之西报记者中，亦往往有误会，或曲解日本之真意，频传播有害之报告者。甚至大放荒唐无稽之流言，以诬日本。谓日本在此次战役中，企图与德国缔结秘密同盟。但日本国民，断不应效此等西报记者之辈有此等类似之言动，以诱致国际间之不信用及恶感情。如民本正当之权利或利益，而为他国所藐视。果系发现于事实，则对于有关系之列国指摘事实之真相，以求反省。实为拥护其利权之唯一有效之手段。目下虽无如此可忧虑之事发见于任何方面，万一事竟至此，则日本政府当直取必要之手段，而毫无所踌躇。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中国官民中往往对于日本之真意，深抱猜疑之念，近更误信谣言，谓日本改变交还胶州湾租界地于中国之既定方针之说。余于此情形，甚觉意外，且甚为遗憾。余今特确认牧野男爵为说明关于山东问题之地位起见，于五月四日，在巴黎发表于报纸之声明，既日本对于曩所公约者，当谨严确守之。山东半岛将连同其完全之主权，一并交还中国。前为增进中日两国相互之利益起见，而缔结之一切协定，当诚实遵行之。中国参战之结果，不但得联合国之承认，许其偿付庚子赔款，增涨关税率五分，更将依巴黎媾和条约由德国收获极其有利之条件。日本关于此等事项，业已欣然为中国效劳，维持中国正当之希望。日本政府尚欲按照余前在帝国议会所声明者，以公正共助之精神为基础，竭力推行，确立日本对华关系之方针。（175）

日人之横暴

旅京日人：自北京五四运动后，争回青岛，抵制日货，几有全国一致之概。日使对于抵制日货，特向北政府警告，日报亦极力诋斥。不意竟有驻京日军一排，持枪游街示威，及至公府，横行而过；守门陆军向之行礼，该日军傲然不顾。按公府东西两门揭有"车马行人，不准经过"之牌示。日军违法举动，实属侵犯我国主权。且日人之扶桑馆，每日以汽车数辆游街。及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车上钳置红旗，上书"扶桑馆"三字，表示系日人汽车。车内日本妇女，故意发毁侮学生之言语，意在挑动公愤，故作违法举动，致起交涉。幸

北京学界，知其阴谋，均置之不顾云。（179）

山东日人：山东日本领事，因学生演说及抵制日货，致函督军省长，有“如不取缔，即自由行动”等语。兹据某方面消息，连日以来，沿胶济路线，自日本运到兵队极伙，较平常约增三倍，尤以分驻济南者居大多数。以为示威运动。最可异者，近日附近胶济路线之村镇，常有大股杆匪出没，大肆抢架。省议员朱某（昌邑）故里，亦被不服杆匪约数百人伙劫焚掠一空，并枪毙村民六人。嗣经密探侦悉，该股纯系关外胡匪，均乘日本邮船，从大连湾来者。又各界发往巴黎致我国专使之电，均为日本由海底电线扣留，无一能达巴黎和会云。又闻日领事函鲁张督，请禁抵制日货。否将加派青济军队，前来镇压。现济南西关外，日有日兵在彼大操，实行示威。与在朝鲜之行动，如出一辙云。

青岛日人：据济南特电云，二十八日，美国传教士及华人从教者，在青岛为日本宪兵传审。盖依据刑法，谓其不到堂也。济南访员二十九日，闻日本某侦探员云，日本宪兵已令美国传教士在青岛创办之学堂封闭，而传教士等一律出境，其理由未详。本社顷以此信质问日本使馆。据云，青岛华人王某，为某教会学堂总理，因其散布传单，反对日人，故为宪兵传去也。长老会所办于青岛之学校，其校长一人，教员二人，美教士二人，均为日人拘去审讯。旋封闭该校，并处罚其校长即时离去青岛；三年之后方准回至该地云。又云，日本驻青岛官长现已予备着手划界，据自劳山起至斯范(译音)止，该界线内，所有产业，概归该国人管理。其界线之范围，较从前德据胶州时为尤大。盖前不过海岸一部，及青岛海沿至铁路车站一带而已。可见青岛名归中国，实则全隶日人。且如核桃然，前此德人仅食核桃内之仁，今日人则并其壳而掠有之矣。（179——180）

大陆报社论，题为中国学生罢课曰：人或有不提倡罢课者，人或有主张严守法纪维持秩序者，但对于中国学生罢课一举，则不能不表示欢迎。非为其罢课也，但为其罢课所持之誓约耳。莘莘学子，耗费其求学之宝贵光阴，诚属憾事。而中外教员不克照常授课，校舍仪具，暂置不用，当然亦属可惜。但在此罢课中，苟有新中国之胚贻，而为中国新青年刷新中国之起点，则区区代价，亦甚值得矣。以今日中国而言，茫茫四顾，无一线之希望，其能令人属望以拯救此大民族者，殆鲜其人。觇时者极目远东，欲觅一挽回神州以免陆沉之气象，杳不可得。今之学生举动，殆为挽回劫运之气象欤，前途若何，全视学生此举如何趋向而定，设令学生仅消磨其精力于无益的呼号，与仇怒的吁诉之中，或团体不坚，中有因自利而辍止者，则今日此举，终必失败。但若指导得宜，组织有法，趋向有方，而善用其精力于建设的团结的之途，换言之，即为中国真正凝结之起点，则凡中外人士所能及者当必行之，而为学生此举之后援。以全世界之天职与习惯而言，中国学生，应为担负刷新中国之责任之人；以各国往事而言，学生应为反抗奸佞横暴者之人。他国学生既皆如是，中国学生岂独不然。中国除学生外，能为此者殆无他人。中国苟无此种学生，则世界将无中国矣。然此岂仅为今日学生之责，凡曾为学生者，皆当分负其责，而从英美留学回国之学生，尤当从事于斯。指示学生，不离正规；监视学生，不行足以破坏罢课宗旨之举动；此皆昔日学生之责也。昔日学生尤当引为己责，不独向学生解释所以罢课之目的，与夫达此目的之方法；且须以唯此是赖，可争回中国独立之原则，永远铭刻于学生心中。至于昔日学生之具有形式的职务，则在罗致全国学生，咸作与此一致之行动，而组织全国学生机关。苟无机关，则此行动未能有成。然后使此机关团结进行，不存党见，支配学生，使其了解负责任的国民之天职而履行之，并贡献其团体，以救出国家于腐败分子之手。夫此种腐败分子，固将陷于奴隶之境也。留学生尝有愤言曰，吾辈无用武之地，有才而不见用，若今日者，是诚留学生锥处囊中之日矣。学生此次之

行动，乃中国之最后希望。吾人于此有不能已于言者，排斥日货，尚非极关重要之办法。山东问题，犹非主要之事件。而排外感情或仇日运动，容可碍及救国宗旨之成功。须知中国最大之仇敌，即在中国本身。而中国之救主，亦必为中国本身。外国纵怀好意，却不能越俎代谋，故中国必自为之。若中国不能自去其最大之仇敌，不能自去其腐败奸邪之官僚，只知私利，不顾大局之在野莠民，与夫各界不负责任之分子，则中国将无可为。病之者为中国，而医之者亦必为中国，中国其勉之哉。（233——234）

英文沪报：略谓学生宜极慎重其行动，始终勿失其纯粹爱国的抗议之性质，不可涉及政治社会或经济的问题，不可加入政党，亦不可参预经济的行动。近日凡罢课或抗议之举动，辄被斥为过激主义。要知学生此举，恰与过激主义相反，盖此为爱国主义也。英美兵士殇身法境以争者，非为黩武主义不容存在，民治主义不容磨灭，与弱小国家不容欺凌之原则乎。今学生行动，亦无非为此种原则之表示耳。凡在华欧美明达之士，莫不同情。但若学生容许敌人将其爱国行动，移为社会上、或经济上改革之作用，则将失外人之同感，而使守旧华人相率不敢近矣。所可异者，此次学生行动中，欧美留学生绝无何等扶助之表示，岂中国前途之希望，独在国内肄业之学生乎。约翰与青年会学校，已与南洋、复旦等相合，而美国之哈佛与耶鲁学生，英国之剑桥与阿斯福学生今安在耶。（234——235）

大陆报之奇论：大陆报社论云：我人于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之遭遇，若不仅求其表面，及其目前之现象，而为进一步之观察，则必断定泰西列强于历年以来，馈赠中国之最大礼物，殆未有过于此次山东归日之决定者也。盖中国虽去一山东，而其所得利益，则无可限量。盖列强于山东问题之决定其所成之事有二：一为中国人民之觉悟，二为转移世界目光于远东问题。而远东问题，因亟需世界各国之注意者也。两年以来，中国之政府不仅陷其国于震撼不定之局，且从而掠夺之，更不惜以之售诸他国。故两年以来，日本赖中国官场之助，遂能紧握中国之大部分。然其进行颇缓，并不急激，为逐渐侵略之计。故华人仍漠然无动。迨日本得山东，华人始被警醒。两星期内之爱国热潮，与可惊之成绩，即其结果也。然则山东问题之决定，转为中国之福，其所成就，殆无与比也。盖中国人民，被其刺激，已自知地位之危险，而决意避免之。是则一山东之代价，盖亦微耳。（307）

罢市中之西报议论：大陆报社论云：今日为人人保持冷静头脑之时，华人然，外人亦然。租界人心激昂，已达极度。其结果将缓和抑将破裂，全视处置之当否为定。华人如有暴动，固足以促成一种危局。若外人判断失当，亦足以召乱。吾人只须记得人民心理学之若干公例而善处置，则暴动可以不作，或至少可以和平过去。此等心理学之公例，无论何种人民皆适用之。对付人民群众之唯一武器，厥为忍耐与见机。须知人民群众之危险，乃只在遭受挑动之时，乃只在因被反对而致团结之时。彼之行动，必须成一集合体而始有效。而其能成一集合体，必由武力以激成之，对付人民群众，只有一法，即听之而不干涉。待其有自动的暴举，乃干涉之不再宽容。然人民自行暴动者，殆十无一二。彼等在道中徘徊既久，饥疲交作，自必渐渐散去，此乃人类简单之心理也。吾人尽力警备，自属必要。但不可警备过分，以促成爆裂。若警戒太密，足以烈焰飞腾之导线也。吾人尤当深察上海罢市之原因，华人之目的究为何事。吾外人对于华人之责备，有时后先矛盾。华人作某事则责之，不作某事又责之。吾人尝痛诋华人屈服于卖国腐败官僚权力之下，不知振作。而彼等一旦用惟一之方法，以反抗此等官僚，则吾人又诋之。吾人须知罢市或停止营业，到底为最和平之反抗方法。他国人民之反抗法，尽有剧烈远过于此者。去年日本人民之闹米风潮，其行动如何；其他各国发生公

共风潮时，其人民之举动如何；皆吾人所知也。而华人此次之行动，则迄今甚和平。倘中外领袖人物能处置得当，必能继续保此和平态度。彼华人领袖，固已竭力从事于维持治安，以保此合法之示威运动。吾外人应协助之，拥护之。不宜将吾人自卫之方法，用诸不当之地，以引起人民群众之愤怒。至其愤怒之当否，乃别一问题也。（342——343）

上海大陆报社论云：中国各处学生，因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不能收回青岛，故有示威举动。吾人闻之，始知中国人心未死，遇国家危急时，尚一露其爱国热忱。惟望青年志士，勿过急烈，能以全体精神，发表爱国之愿为贵。北京政府久为少数亲日派所盘据，人民忍无可忍，今已崛起，全国一致。溯自一千九百十五年举行救国储蓄金后，今惟第二次之全体一例也。苟能培养如此民气，则青岛虽失，不患不能收回。惟有进一层之说法，青岛问题在中国今日地位，尚不视为最大之事。中国故当收回之，日本有约在先，固当归还中国，实无疑义。但吾人所深恨者，近二年来北京官僚之出卖中国所有宝贵于日本者，不知几许，独长城未出卖耳。今对于和会情况，官僚亦作假惺惺以示人，实可笑矣。再巴黎和会中之中国代表，已有被嫌疑者。且有一华人，专在巴黎破坏中国局面。今官僚之对青岛，半亦表示反对，无乃学袁世凯故智。盖袁乘二十一条要求，使全国人心皆注于此，而彼乘机组织其帝制计划。苟果然者，北京之官僚派，显然人民专注于青岛事，而亦可乘机实行他种大阴谋也。外人对于学生之爱国举动，足见华人真心所在，皆欢迎之。但望勿攻击巴黎和会。勿攻击日人，而当专攻击中国之真仇敌，即预备欺骗中国之国贼是也。如此举能做到，则功劳甚大。中国学生当专心为之，务将凡为卖国或贪赃之官僚全数驱逐，永不复存，然后青岛可复，山东可保，凡西人所占分寸之中国地土皆可收回。故时至今日，学生不必专注意于青岛，盖有一千九百十五年之变局，可为前鉴。且今日所争者，主要不在青岛。即使全山东省收回，决不减中国之祸。退一步言之，即使割山东与日本，亦不必增中国之祸。实以祸之所在，乃日本利用中国卖国贼，而出资购卖中国权利，日本更望中国之逐渐退步也。是故，收回青岛，为时尚长。国际同盟之成立，即为整理此等不平事，惟中国之现今一班执政者，应急驱逐之。时不可失，幸各学生留意焉。（552——553）

大陆报对开市开工之评论：中国学界与优秀分子，共目为卖国奸人曹章陆三人，业经北京政府准辞，各使馆电报，亦证实斯事；上海罢市者，即此已得圆满之要求，故此时开店开工，恢复原状，势不容缓。若犹罢业无所事事，殊无利益可图。且学界要求之各事均已成功其胜利可云完全，且极不测。故学生此次举动，实可谓开一新纪元，中国已有一班新人物发生。凡破坏国家者，以后当不能无所顾忌。且赖此新人物，可以建立强固政府于将来，此固一月以前外人所不及料，而亦动人最甚之事也。惟学生不当以胜利之故，而自喜逾分，罢业一事，固已获胜，然此后即无关重要。若获以重大属之，后将失败。盖就此结束，已足表示国人之力量，若犹继续不已，将无结果可言，而国人忍耐之力，亦将因是而穷。盖谋生之事，不可久停。若至商人因而离心，则大事去矣。观诸往事，固已无不如此。而况暴乱分子，或将从而生心乎，外国人士对于中国学生以及人民，无不因此次举动而表欢祝之意。今惟望国人能利用其胜利而更坚其团结之力耳。故曰，开市开工不可缓也。（349）

警务处的调查报告：（1919．5．8）

在5月6日收到国民大会筹备会寄来一信，称他们的游行队伍，将要通过近南京路的外滩。警务处已明确地通知这次运动发起人说，这游行不准在租界内进行。

唐绍仪先生对这件事的态度是难以解释的。我的意见应该坚决通知他和那些与他接近的

人，在租界内不允许进行政治性阴谋，可能导致危害社会治安或引起凶杀毁坏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游行队伍所带的旗子标语，以及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上的演说，都是非常带有煽动性的。唐绍仪先生邀请那些游行的负责人，实际上等于他对那些宣传的公开的同情。

（715）

约翰逊的通知

虹口主管督察长、汇山主管督察长：

我收到日本领事之通知云，他们接到消息说，他们所雇之码头及货栈苦力将要进行罢工，这将在六月五日开始。请尽量掌握你警区苦力之领班并告诉他们下列二点：①不让他们的工人受到威胁；②有足够的警力来保护那些愿意工作的人。

警务处副总巡　A·汉尔登·约翰逊

1919．6．3．

（717）

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

我亲爱的爱美拉特爵士：

6月6日中午十二时半警务处为了调查学联主席何葆仁之详情，拜访了静安寺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他们看见后者与学联秘书周先生及一个沪报记者索柯罗斯基商谈，该人系最近警务报告中的主角，被怀疑有布尔什维克活动。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之大厅旁墙上，贴着一分由红笔圈着，关于解决近东问题的土耳其被分割的新闻报纸上文章。这篇文章贴在如此显眼的路上，是作警告中国人的，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外国人可以分割土耳其，如何不可同样来瓜分中国呢？

市立屠宰场屠夫和福利公司之侍者昨晨参加罢工，至今仍然罢工。罢工领导者似乎采取一些措施，使这些人罢工，并希望外国人受到缺少食物面包和肉类时，会迫使他们的领事提出要求来使中国政府同意屠夫的要求。福利公司之烘面包工人，由于罢工领导者未注意到而未参加罢工。杀猪业同业公会之代表今晨去市场，通知商人今日停止供应猪肉。法商电车公司东车库，前昨晨有千余人集会，预备威胁驾驶员及卖票员参加罢工。法界警务处驱散了群众，经过了个把钟点，电车便恢复行驶了。昨日有一个顽固的谣言云，有些法商电车公司之职工原应下午工作的但未复工，经过法警务处调查后未证实，6月6日下午二时十分河南北路总商会内有三百商人、学生、新闻记者会面，决定组织一下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商帮协会之会址在河南路364号，并在幕后支持新的组织，但未得总商会之支持。在昨日成立大会上决定发出传单说明罢工的目的，和发出传单争取外人之同情。6月6日租界中几家商家之门板上贴着一些向外人致意的传单。在6月6日下午一时，逮捕两个街头演讲者后，暴徒竟以打碎玻璃窗及游行示威。今日上午，教育及商界在南市商会举行会议，预期卢护军使及其他官吏将莅会，会上将公开宣告要求释放北京学生，并讨论了用何种方法来使百姓开市。

上海之前议员将在6月7日下午三时在恺自尔路282号举行会议，商量了对付广东省陆荣廷将军，已用公函去向总统提出，承认他是中国的总领事应采取之措施。今日租界及法界及中国地界之商家仍如昨日一样关门，商店所悬之旗帜之数目，特别是不满的性质的旗帜数

已减少，但是许多种传单贴在门上及排门板上。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
1919. 6. 7.
（723——724）

给巡官的备忘录。

今天的特别布置：

1、昨天晚上发布的工部局布告的条款，将在中央老闸虹口警区付诸实施。

2、虹口区巡官将根据总的指示，作出自己的布置，与万国商团美国连队的指挥官商议，并和其他各区配合。

3、万国商团在下午三时出动和前两天晚上一样，特别巡捕于下午六时在老闸与虹口进行巡逻，阴捕骑巡队及步兵中亦采取和前两天晚上同样措施，如果是需要，一小队海军可作后备的。

4、将在下午五时开始行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求，如果需要则可强迫执行工部局布告中第一及第二条规定。

5、一般的要有八人配置七个岗位（四人巡官和四个特别巡捕或万国商团），分派在中央警区和老闸警区，此外必须有坚强的巡哨，在该二个警区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行巡逻。在每队将随行二辆人力车供装载从学生处取得的物件。

有卡车可供放置人力车上所装载的物品，就可能由警察负责搬走物件，向万国商团可提供需要的防备力量。

学生所戴的白帽子不要从他们头上拿掉，现在只要拘留那些在散发传单的学生。

6、非实在需要不要使用武力，仅是为了保护生命或财产时才使用武器，决不得无故朝天开枪示威。

7、告诉童子军，他们是不需要的，并劝告其回家。

学生的标语旗帜或其他宣传品被消除后，要叫他们离开租界。

8、在值勤以前，所有的表一律与老闸值班室的钟对准。

9、总巡在下午五时至半夜，可电到369号联系。

警务处总巡　海尔登·约翰逊
1919. 6. 9. 下午二时
（726——727）

内外棉纱厂致上海工部局①

先生：

我们对戈登路捕房全体人员平息昨夜我厂发生的骚动，表示感谢。并且感谢该捕房之不断警戒着，我区呈现着一片太平，不象其他地区那样的骚动频有。

在昨夜九时以前，我们所有的工厂都很太平。但以后，就突然发生三工人不听话的事件，并发生了暴行，几处男工部分跑出车间到材料库去。我们立即报告戈登路捕房前来协助，并平息了这场骚乱。若非贵捕房之官吏的及时措施，则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暴徒已被赶入院子里，我们的生命及财产得以不受侵害，这使我们要深深地感谢。但目前的形势，还不能说已

经太平无事了。因而我们请求贵捕房仍然保持警备，直到租界恢复正常情况为止。

内外棉株式会社　经理川村

（727——728）

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

亲爱的杰弥逊：

指导抵制日货运动及支持目前的罢工的团体，他们现在青年会举行数次会议。

一份名为“民强”新的双周刊创刊于6月25日。这份报纸是由哈同花园内的仓圣中学的学生所出版，它的任务是支持抵制日货运动并反对某些中央政府的议员。

今日有一份名叫“上海晨报”的报纸创刊了，报馆址为新桥街138号。

6月25日，闸北受雇于运米的独轮车苦力为了增加工资事罢工。有些雇主同意增加百分之十。而苦力们在下午经过了更进一步的商谈后复工。共有100人参加罢工。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

1919．6．26．

（761）

约翰逊致上海英总领事

我亲爱的杰弥逊：

下面是昨天侦探长在龙华与参谋长会谈之记录材料：

最近淞沪护军使得到消息，其大意为在广东、安徽及直隶省，天津、北京等市没收了发自本埠的布尔什维克书籍。

从警务处总巡办公室检查官所检查之通讯中得知，有一个曾要求大量寄送该类书籍的人，承认那些具有上述性质的书籍是不同时期内寄给居住在英法及美国的中国人。

从南京、江苏、河南及四川等省之城镇里发出许多的信件，要求寄给他们小册子，显然这些发信人是首先听到这些作品的，亦被没收。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现因在上海被控告发行布尔什维克书籍而遭监禁，预料可从他的口供中可以获得那些协助他的人的情况。……

警务处副总巡　A　汉尔登·约翰逊

1919．7．16．

（772——773）

麦高云致上海英总领事

我亲爱的杰弥逊：

7月24日，上海学联在大东饭店请将赴北京的全国学联主席段锡朋先生参加会餐，与餐者六十五人，其中包括全国各地支会之代表，不用怀疑会餐会有什么幕后阴谋，既没有演讲，又不讨论政治，下午二时五十分散会。……

警务处总巡　麦高云

1919．7．25．

（775）

抵制日货运动及本地不靖情况

……关于造成租界内目前的不靖情况的次要原因，及现在就作出任何肯定的说法还为时过早。警务处情报室在过去十二个月，记载着许多关于积极参与罢工的劳工及技工阶层中发生的类同事件。

虽然，这次骚乱的原因，可以说部分是由于物价上涨所引起。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的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就会清楚看到工人中的某些政治宣传是一个有力因素。

从警务处经常收到的报告上来看，似乎国民党的不满分子是有责任的。在今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案子，却揭发了一个在中国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在工人中间，还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运动。但已发现是在学生中传播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各个学校中还指定了经销布尔什维克书刊的代理人。

5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于福州路119号的大东书局，及广东路84号的东方书局中所没收一些书及其他文件，就证明了这些事实。

在这些书中，有的仅是拥护社会主义，还有的书中则宣传无政府主义及赞成颠复一切政府与法律。店主被处以罚金，一个在上海当批发商的广东人被判6个月徒刑。

在被没收的书上的广告中，得知被指定经销这些书籍的学校，远自北京大学——这是最近发生的骚动的发源地——及至汕头附近陆英书院。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足以断定这些宣传活动是有任何政治党派在幕后主使，但是一上批发签署的经销人一分口供上，他说他的负责人是一个著名南方政党所雇用的。

在没收的书籍中，有一本名叫“人民的钟声”是最有煽动性的书。而北京和天津的学联在6月8日出版的报纸上采用这名称，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最近从这个港口送到各处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书刊，已在天津、北京和湖北、安徽及广东等地被查获。

从查获的通讯中，证实了在过去六个月的不同时期中，还曾寄给住英国、美国及法国的中国人，收件人都有回信，大部分还要求继续定阅。当局还截获一些从南京及从江苏、河南及四川等省的城镇发出来的信，要求寄给小册子及文件。显然，发信人还是初次听到有这些作品。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现因被控与上海发行布尔什维克书刊案有关而被捕，预料从他的审问中，能透露许多协助他的同志的情况。

必须指出上述情况，可能与中国总的政治形势有关，但无从断定上海最近的骚乱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联系。在此国家内，布尔什维克用别的名义，一般都和其他的相类同的党派的名义下活动，几年来已早有所闻。但是目前就断定它和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运动是有联系，那还嫌太早了。关于某些著名的政客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亦被当局所了解，并对其进行严密而谨慎的监视。……。（782——783）

（原载科学出版社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
括号内的阿拉伯字为原书中的页数）

《新 青 年》介 绍[①]

"新青年"与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它由一九一五年开始出版，中间几经变动，直到一九二六年最后停刊，前后共存在了十年以上。它跨过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末尾，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准备期。它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及其变为思想运动的主流的过程。对于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准备时期的中国报刊史，"新青年"是一个最重要的刊物。

"新青年"的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深入，中国的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燃起的短期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有岌岌不可保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怀疑；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新青年"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代表着这个趋向出现的。

"新青年"从一开始便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发表在一卷一号上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实际上都包括在这里了。这是"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新青年"没有针对当时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即击退袁世凯的帝制阴谋问题从事直接的鼓动，而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因为"新青年"认为反对封建帝制主张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而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这种观点说明他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但是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袁的口号，它所进行的思想宣传却是与反帝制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袁世凯进行帝制阴谋时，"新青年"就着力宣传了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建立"唯民主义"的国家。袁世凯可耻地死去之后，"新青年"对继起的帝制复辟阴谋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政治，并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反对封建束缚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念。这个斗争的具体功绩不在于实际政治上的影响，而在于它展开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广泛的思想斗争，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第一个大高潮，正是这样形成的。

---

① 本文原题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曾刊载于"新闻战线"一九五八年第一、二期，是李龙牧同志所写的。

② 见"青年杂志"一卷一号通信栏，答王庸工书。

政治上的反对君主制度与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是相并而起的。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①。一九一六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密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但是它也有正确的一方面。戊戌变法时未尝不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但那宣传是在与封建思想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的。辛亥革命时也曾提出过民权(民主)主义的口号，但在当时，民主主义是和民族主义相并提出的，而且实际上无宁更侧重于后者，至于对民主主义则不过是看到了议会政治之类的形式，在对封建思想的态度上依然是以妥协为主。封建主义思想一直未受到多少严重的破坏，这确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便举起了思想革命的大旗；从戊戌变法时代的"托古改制"到"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反映了我国民主力量的逐渐成长和民主主义要求的日趋成熟，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在"新青年"上作过最大努力的作者之一是陈独秀③。他在驳康有为等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说明了三点：第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第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他的最重要的论点又是集中在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两立这一点上，而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痛切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些反对封建礼教、宣扬民主思想的宣传，说明当时的陈独秀在反封建斗争中是坚决而彻底的。以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最后发展到背叛党背叛革命，成了历史的罪人；不过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却作为思想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将之一而起了显著的作用。

---

① 参看"青年杂志"一卷五号，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② 见"新青年"二卷二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三号"宪法与孔教"，四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五号"再论孔教问题"，四卷三号"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六号"尊孔与复辟"诸文。

③ 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的简略情形如下：陈独秀青年时是反满革命派，曾在芜湖编辑白话报纸，一九〇三年在上海担任革命报纸"国民日报"主笔。辛亥革命之后，一九一二年在安徽师范学堂担任校长（一说教务长），时安徽都督是柏文蔚，他与柏文蔚有一定的关系，柏是同盟会中人，但陈独秀是否正式加入过同盟会尚无确证。有人说他当时是安徽教育司长（相当于教育厅长），也无确证。一九一三年反袁之役失败之后，陈独秀走东京，一九一四年曾佐章士钊办甲寅月刊。不久回上海，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

鲁迅稍后才参加“新青年”的工作，但他一出现便成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和影响最广的思想家，在这个斗争中起了极为显著的作用。鲁迅在五四时代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①，他的杂感、小说和论文，给“新青年”的反封建斗争带来了更大的深度。他从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出发，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发出了解放的呼声。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是“新青年”上第一篇白话的创作小说。它以特有的深刻性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性质，发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的卓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随感录，不只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而且用旧的必将为新的所代替，新的必将比旧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而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的发展观点鼓舞着觉醒中的人民。正是在这时，他写下了那代表着他的大仁大勇的宣言的名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文、杂感和小说，在青年中引起了极热烈的反应，是我国革命思想史上光焰万丈的丰碑。

正如瞿秋白同志论鲁迅的思想时所说，这时，“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而且，在这时的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思想也占着主导地位，贯穿于“新青年”前期的多数主要作者的文章中。但鲁迅的进化论是有显著的特点的。当时进化论思想的流行形式是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常利用“生存竞争”的公式来作为激励青年争取“优胜”、避免“劣败”的理论根据，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个限度内，这种思想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但陈独秀也就是由此导出了他的极端轻视人民群众作用的反动观点的。等而下之的更有胡适及另一些人，借进化论之名宣传各种形式的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学，如詹姆士、杜威等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等，这些思想都在“新青年”上有所反映，象实用主义思想在一定时期中并是大量存在的。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却与这些不同。他研究过生物学，真懂得进化论的实质，因而他相信新的比老的好，新的一定胜利，由此得出结论说：“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他用进化论思想猛烈地抨击国粹主义，揭露吃人的礼教。他也由进化论思想达到了一种辩证观点，认为事物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而这也正是达尔文思想的可宝贵的核心。恩格斯在给拉甫洛夫的信中说：“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发展的理论**，至于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竞争、自然淘汰），我认为只是被发现的事实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全的表现。”（着重点是原有的）鲁迅正是抓住了这个“发展的理论”，而阐发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科学的核心的。

“新青年”上的另一个发表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的论文的作者是吴虞。他指出礼教是中国家族制度的产物，而家族制度则又是专制主义的根据。他根据历史事实把封建礼教和封建法权联系起来，暴露了所谓“礼”早已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此外，他也从经学的角度大胆地直接进攻被视为“圣人”、被定于一尊的孔子及其学说。所有这些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作者并因而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斗争，其目的在于奠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之一。那另一个中心口号便是科学。这二者合起来便是激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

---

① “新青年”上发表的鲁迅的文章分别收在“呐喊”、“热风”及“坟”中，另一小部分收在“集外集”中。

"德赛二先生"。

"科学"这个口号也是从"新青年"一开始出版便提出了的，但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步展开之后，随着论战上的需要才获得广泛的意义。这时，一方面反动统治阶级力图利用迷信心理来巩固半封建的统治（定孔教为"国教"的要求也是这个企图的一种反映），乃至利用迷信心理来阻碍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改革①；另一方面，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上的助手也用各种鬼神迷信的胡说来向新思想新文化反攻，扶乩降坛，流行一时，借鬼神的口来反对新文化，甚至公然宣传"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鬼神迷信的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当面敌人。于是，"新青年"负起了反迷信斗争的任务，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驳斥所谓"灵学"，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的文章。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就是自然科学。神权是封建思想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迷信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是紧相结合的。五四时代的"赛先生"，其意义主要地并不在于它提倡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在于帮助了民主主义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

科学这个口号既然是指的一个反迷信的斗争，是一次无神论的宣传，它也便自然是一个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所谓无形无质的鬼神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保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在这个限度内，我们可以说这时的"新青年"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讲坛。但是当时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受着很大的历史限制的。唯一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还没有传到中国来，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各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却正大量流入。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虽然基本上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在各种流派之前也是目迷五色，无所适从，而企图兼收并蓄。在这次无神论的宣传中，有的人是用唯心主义的心理学为武器来反对所谓"灵学"的②，更多的人则在反对鬼神迷信时固然比较稳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一遇到稍微复杂一些的问题便常不能不求救于唯心主义哲学。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在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才逐渐传入中国的。

"新青年"的另一个功绩是它展开了"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新青年"自一开始出版便曾介绍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的作品，但那还是以文言译外文，不出林纾的窠臼。从一九一七年起，"新青年"正式张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的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文学革命包括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问题。关于文学的内容问题，也就是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在文学问题上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刍议"的胡适实际上没有起多少作用，只说到了"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之类的空话。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把革新文学和革新政治联系了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的观点显著地超出于胡适之上。他揭橥了他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反对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也就是反对用文学作为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工具。这就说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其初期实际上也是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但是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还是消极的，他反

---

① 小而至于北京开一个城门，即现在的和平门，也被借口为妨碍了"总统府"的"风水"而长期受阻。

② 见"新青年"四卷五号，陈大齐："辟灵学"。

对用文学来宣传封建主义思想，反对“代圣贤立言”固然是对的，但是他又由此而发展到忽视文学的革命的改造的意义，主张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归根结蒂还是错误地解决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以创作的实际成果打破了这种资产阶级文学观的限制性的。一九一八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开始便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使文学直接服务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表现了“文学革命”的真正成就。鲁迅当时没有着力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但只有他的创作成果才真正代表着“文学革命”运动的传统，这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很久以前就有了，清末时更曾出版过一批白话文报纸，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语文合一一类的口号。但是认真提倡白话文，使其成为一种运动，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却是在“五四”时代。“新青年”便是这个运动的首倡者。它发表了一些论文加以提倡，并发表了一些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后并逐渐变成了完全白话文的刊物。这时，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我们的民族共同语的长期形成过程开始加强，“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又是与整个民主主义的改革呼声同时发出的，因而开展也极为迅速。白话文的出版物和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日趋增多，标点符号的采用也由“新青年”的提倡而逐渐开始和完备起来。这些改革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乃至国民教育的推广都起过良好的作用。

“新青年”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的这些大战役，到了一九一八年底，和当时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将在下一节中说明）一起，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应。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的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新思想的群起而攻之的非难，对这个时期中“新青年”的宣传作了一个实际上的总结。“答辩书”中说：“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表现了反封建礼教的无畏的决心：“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猛烈的坚决的反封建主义宣传，确已开始打破封建思想的樊笼，起了启蒙运动的作用，使广大的青年和妇女，开始摆脱封建制度的约束，唤醒了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努力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出路。前期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这个时期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创者，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旗手，它的功绩是永远留在中国报刊史的篇页上的。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曾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面前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间，“新青年”月刊虽然曾勇猛地进行了若干反封建主义的战斗，但是它同时也带有若干严重的根本性的缺点：首先是它除了一般的民主政治的口号之外，对于如何具体实现民主政治却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多数人倡言不

问政治，个别的人如陈独秀，虽然愿意讨论政治问题，却又曾经提出过极端错误的所谓由北洋军阀、进步党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之类的主张；这种主张当然完全不能动摇北洋军阀的统治，甚至反而起了为虎张目的作用①。这正是看不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物质力量、提不出实现民主的具体办法的结果。如果不能克服这种缺点，要想使初步展开了的思想斗争向更高的要求发展，指出真能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同时，当时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武器，包括从十八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直到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思想，各种流派纷至沓来，后者并以最现代最进步自居，流毒很广。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曾指出的，这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还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流行着严重的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时，全盘西化式的论调在“新青年”上占相当显著的地位。当时流行的思想如此，而人们对于这些思想的态度又如此，因而，前期“新青年”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获得很大胜利的同时，也是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的。“新青年”编辑部中以胡适为首的右派以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与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联盟的有力支柱，便是这个危机的历史证据。

然而，世界终于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中国工人阶级终于已成长起来了。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它逐渐取得完全新的面貌；“新青年”也是反映了这个过程，并随之而起着质的变化的。从这时起，中国革命逐渐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新青年”月刊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这个伟大的变革的先驱便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新青年”出版之初，李大钊同志还在日本，但已开始为“新青年”写稿，积极参加了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他在一九一六年写的论文“青春”便是“新青年”上最初也是最有力的鼓舞青年反对封建主义的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实质上指出了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他写道：“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败者，又宁容讳？”但他以为问题“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而这种“回春”的办法就是“革命”。当然，他当时所能看到的还只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他指出了当时的土耳其的“青年之政治运动”，他看到了“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引而弥长”，他也说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认为正是这些才能“回其民族之青春”。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要求他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表现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篇文章的卓越的特点还在于它充沛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热情和贯穿着虽然还不完备、但已经颇为鲜明的辩证观点。李大钊同志这个时期的思想中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表现他已达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是使他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时，他由日本回国，成了“新青年”的积极撰稿者和编辑委员之一。

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展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

---

① 参看“新青年”三卷一号“对德外交”、三卷四号“时局杂感”、五卷一号“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人民最初曾不得不经过帝国主义通讯社的歪曲诬蔑的报道逐渐认识十月革命的真象。最早从这些报道中去探求十月革命的真象的便是李大钊同志，他根据极不完全的记载一下子便触及了十月革命的本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中，北京举行庆祝欧战胜利的群众纪念会，他在天安门会场上以"庶民的胜利"为题发表演说，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月出版的"新青年"月刊五卷五号上发表了这篇演说词和他的更详尽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它们的发表也象征着"新青年"终将开始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李大钊同志的这两篇文章都是为了回答欧战胜利究竟是什么人的胜利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有重要意义。自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极力诬蔑布尔什维主义，称之为"过激主义"，重复着十九世纪欧洲反动派的"共产公妻"之类的谰言，以阻碍它对中国的影响。欧战胜利之后，借参战之名行内战之实的北洋军阀又大肆铺张庆祝胜利，以便增加自已的资本，而这在当时是多少起了一些迷惑作用的。因此，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便是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便揭穿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阴谋诡计。李大钊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两个后果，一个是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①的失败，民主主义的胜利"；另一个是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他指出，协约帝国主义虽然在形式上是胜利了，但"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第二十世纪新潮的胜利"。他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道："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旨的"②。他看到了当时弥漫欧洲的革命高潮，指出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而他满怀信心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俄国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同志用他的论文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颂歌，预言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正在这个时期，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消息传来中国。"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民原已曾受过不少教训，现在又受到更加深刻的一次教训，开始彻底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真面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正在高涨，中国人民"眼见得……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一切充分证实了李大钊同志的论断。于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开始形成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由此开始了。李大钊同志的卓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和布

① 指"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

② 马客士即马克思。这虽不过是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源流，但在当时却非常必要。当时即使是进步思想界中人，对十月革命也所知有限。例如蔡元培当时被视为新派大老。但就在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欧战与哲学"一文，竟说列宁宗奉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这大约是一种由日本传来的耳食之言），而"新青年"也未加指出，可见一般。

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给当时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的观点已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色彩，有些人已开始学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种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月刊的主要读者青年学生中更是日渐增多。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便曾努力推动进步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现在便更进而经过“新青年”来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六卷一号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李大钊同志便把他所主编的六卷五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号，以便引起对这种学说的注意。他自己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方面的基本观点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是一篇虽然还远不算精确和完备，但确实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论著，文中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主要著作的若干主要片断，这种工作是当时非常需要的。①

这样，就开始了“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的过程，随之也便开始了具体体现着“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新青年”编辑部逐渐分裂的过程。如所周知，“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运动中的右翼的代表人物是臭名昭著的胡适。他从在美国留学时开始给“新青年”写文章，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成了“新青年”的经常写作者和编委之一。由于他发表过“文学改良刍议”等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改良主义的要求，并由此展开，而引起了“文学革命”运动，因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切活动，从文学改良开始，正如他自己所说，其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宣传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②。如果说在开始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还没有开始，胡适在宣扬帝国主义理论上还是在间接进行，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已经开始之后，他也便正面打出实用主义的旗帜来和马克思主义者争夺群众了。就在李大钊同志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胡适便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不朽”（一九一九年二月，六卷二号）和“实验主义”（同年四月，六卷四号），前者主要宣传他的政治上的（形式上是人生观上的）“淑世主义”③，后者宣传他的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它向迅速觉醒起来并正在努力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办法的人民宣扬，世界是一分一毫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的，所需要的也只是各个个人的一分一毫一点一滴的改良，而否认有根本解决的可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革命的知识分子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更加高涨，胡适的反动面貌也就公开出来了。这时，在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大型的“新青年”暂

① 这一期刊物的若干主要文章是不好的。例如第一篇论文“马克思学说”，作者顾兆熊，即后来成了国民党改组派重要人物的顾孟余，这篇文章是显然同情伯恩斯坦主义的。第二篇论文“马克思主义批评”。作者凌霜，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后变成了国民党CC派的小头目之一，即参加过所谓十教授宣言的黄文山。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他是根据伯恩斯坦和克鲁泡特金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此外，还有一些曲解附会之说。因此，对于这整个专号过分强调未必是恰当的。

② 参看“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一〇〇页。

③ 淑世主义是改良主义思想中最露骨的反动的一种。它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社会学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把社会看成人们的个人意识的产物，根本否认或回避阶级之存在。鼓吹社会的改善只有依靠社会成员的个人改善的方法来逐渐达到的胡说，而实际上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的结论。淑世主义这个名词是由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约翰·艾略特和英国实证主义者约翰·萨尔运用到著作中来的。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曾大肆鼓吹这种主义，胡适的“淑世主义”便是从他那里贩运来的。

时不能出版，"每周评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型的刊物。一九一九年六月，"每周评论"的编者被捕，胡适攫得了主编地位之后，就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这个进攻受到了李大钊同志的还击，从此，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的发展倾向逐渐明显化了，它的分裂过程也便逐渐开始了。这个分裂向"新青年"月刊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究竟将站在那一方面呢？

最初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本志宣言"。宣言在发表时没有个人的署名，实际的执笔者是陈独秀。宣言首先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里的军国主义是指的帝国主义，金力主义是指的资本主义，可见，宣言大体上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观念还比较模糊，因而表述也很不确切。宣言也强调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宣称要继续打破成见，抛弃旧观点，树立新观念，继承了"新青年"过去的传统。宣言中也表示了对政治的态度："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宣称"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作标准，不拿有无财产作标准"，这样就否定了过去的企图完全不谈政治的限制。这个态度表明"新青年"这时在政治方面基本上还是坚持民主主义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倾向。"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等语，明白地肯定了五四群众示威运动的斗争经验。最后，宣言也声明，"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和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反迷信的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明白地肯定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主张的反映①。总起来说，"新青年"七卷一号的宣言是一个反映了很大的过渡性的文件，它一方面大体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趋向，保留着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传统，接受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对许多问题又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没有完全克服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因而也便不能识破实用主义的危害性，与胡适一派维持着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而又没有加以严正的批判。这个文件说明了"新青年"由一个民主主义的刊物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的过渡状态。

但是，尽管这个宣言宣称代表"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并且是以后加入的社员也要共同负责的，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个折中的产物，而要把本质上互相对立的观点长期捏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分裂实际上从这时起便逐渐明显起来了。和这个宣言的发表同时，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企图用他的观点来规定新文化运动的范围，那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进一步发展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的反动说教，具体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一部分右派正堕落到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方面去。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说"十部'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继续宣传他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改良主义观点。另一些人的情形正好相反，李大钊同志在七卷二号上发表了他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原因。他特别着重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了"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

---

① 陈独秀在很长时期内荒唐地以为实用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并存的，甚至长期企图劝说胡适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当时"新青年"社中其他的人也并不能充分了解实用主义的危害性。

阶级”的现象，再一次作了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尝试。这两篇文章标志了显然相对立的两种趋向：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适继续着他的反动路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则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具体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新青年”编辑部中明显地发展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中间不能不酝酿着新的变化。

这时，正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迅速深入发展的时候。五四运动虽然是由青年学生开始发起的，但其根本特点却在于那时出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在于工人阶级以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的第一次政治罢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身份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到了一九二〇年，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示威、罢工、罢市）结束了，但运动实际上并没有结束，却由这里开始了一个新的深入：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当时用的名义是“俱乐部”），办工人学校，实际从事工人运动。中国的工人运动开始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劳动运动”的呼声弥漫全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深入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这种发展在“新青年”上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新青年”七卷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篇幅比平时各期扩大一倍以上，这个专号显著地标志着“新青年”更明显地向社会主义刊物方向发展的开始，在“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同时并存的两种倾向的竞争中，社会主义方面一定胜利已由这一期奠定下基础。

“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上主的要内容之一，是李大钊同志所写的“五一运动史”。这篇文章介绍了五一劳动节产生的经过和各国工人阶级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历史。作者并没有详细论述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而只是表示了恳切的愿望。但由于这时中国工人运动已在开始有组织的发展，正渴求了解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形，了解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因而这篇文章在当时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曾为许多刊物所全文转载。这一期“新青年”还全文译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表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人人都有工作权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各方面的利益的保障和照顾。这一期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它的最大特点，是它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情况，仅这一部分便占全部篇幅的一半，超过平时的一期。这些材料中包括上海、天津、无锡、唐山等工业城市的产业工人情况的报告，也包括各省区、各城市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运输工人等的情况的报告，有的并附有相当的统计材料。这些报告一般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但是，其中包括许多有益的材料，足以促使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这种相当规模的调查研究本身，也就说明了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绩。这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若干工人的题辞。最后，在这一期中还作为附录发表了苏俄政府给中国人民和政府的通告以及中国各群众团体和各报社对这个通告的反映。这是一批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苏俄政府在通告中再一次表示了苏俄决定放弃帝俄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及与中国订立的密约，建议恢复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个通告在人民面前广泛传播，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封锁，使人民看到了苏维埃国家对中国的真正态度。当时的各进步团体和有进步倾向的报纸刊物纷纷致电苏俄政府或发表文章，表示“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要求和苏维埃俄国建立邦交，表现了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由于苏俄政府的通告用事实揭穿了反动统治者们把布尔什维克诬蔑成为“过激派”的谰言，也

便大大便利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这时，在北京上海等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新青年”也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一九二〇年七月，“新青年”出版八卷一号，在编辑部主要人员的文章中对政治的态度比七卷一号“本志宣言”又前进了一步，基本上已不再从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而肯定地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者的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在此以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无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措施都还知道得很少。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苏俄的实际状况成了当时的迫切要求。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建立“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当时搜集得到的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成为刊物的主要一栏。在这个时期中，“新青年”发表了列宁某些著作的译文①和关于列宁的介绍和印象记，有关苏俄政府措施的材料，工会运动情况的报道，婚姻法、妇女儿童的状况的介绍，文化教育政策及发展情况的说明，电气化计划的介绍，高尔基的若干文章，外国人在苏俄参观的印象等。九卷二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苏俄政府及其领袖列宁，包括长达六页的列宁小传及主要著作目录。这些材料是正热烈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希望追随俄国人的先进榜样的人所急切需要的，经常发表这些材料便使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资产阶级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极力企图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这些人中有很多原来是参加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共同战线的，而一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他们的主要斗争锋芒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来了。他们不只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一派，而且还有一批改装过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伪社会主义者是从政治上与研究系②有密切关系的几种报刊上展开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攻势的，其中主要是“时事新报”③和“解放与改造”④半月刊。他们首先由张东荪出面宣传一种论调，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发展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困”。这就是说，他们认为发展资本主义

① 如八卷三号刊载了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的一部分，标题为“民族自决”。第四号上刊载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经济和政治”，标题为“过渡时代的经济”。

② 研究系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一个政派，其前身是袁世凯执政时的进步党。成员主要是清末的立宪派分子，一贯执行改良主义政策，实际上起了维护北洋军阀统治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以后，这一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假借社会主义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以后便发展成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即“民社党”。

③ “时事新报”于一九一一年由一九〇七年创刊的“时事报”和一九〇八年创刊的“舆论日报”改组合并而成。五四运动时出副刊名“学灯”，与先后同时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晨报“副镌”，京报“副刊”同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但这四种副刊的态度和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却是很一样的，每一个副刊也不是从头至尾态度一致的。这四种报纸中，“晨报”和“时事新报”都与研究系有密切关系。

④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主要负责人是张东荪。自称“新学会”出版，出版宣言便标出了改良主义的口号。出版一年之后改名为“改造”，由梁启超写发刊词，把改良主义的方针更具体化了，文见“饮冰室文集”第十二集。

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他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溃疡已为众所不齿、社会主义思想已成为进步思想的主流时，公然主张资本主义是不会得人同情的，因而他们诡辩地说：他们原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中国的情形是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不可得"，因此，"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则始有抵抗能力。他日尽归类于劳动资本之两阶级而有阶级战争，则进一步矣。"他们说，如果社会不发展到这一步，"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之耳而动其心"。于是，他们提出了要社会主义者让开，让资本家来"发展实业"的反动的说教。这种反动论调之所以在这时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由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暇东顾，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几年中曾有过一个相当的兴旺气象。这在我国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复杂的变化。它们一方面因力量的增长而能在一定的时候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另一方面，却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种幻想：他们并不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妨碍中国的经济独立，但还是希望民族资本主义能在夹缝中成长起来。张东荪等的论调便反映着后一种倾向。他们承认"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但又不相信中国有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则于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国资本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尔"，反映了我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侥幸心理。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我国五四运动中六三工人运动的突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害怕会走上俄国的道路，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张东荪等也充分反映了这种情绪。他一面断言"劳农主义"①决不能在中国实现，一面本能地感觉到工农群众中正在成熟起来的革命要求，诬蔑地说："所可虑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彼时所呈现状必有非吾人所能料者"。总之，这一类论调反映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无力而又跃跃欲试的从夹缝中求发展的幻想，又反映着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仇恨和恐惧，是他们为抵抗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提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他们一手拉着美国实用主义的积极贩运者胡适②，一手拉着当时正在中国讲学的英国唯心主义者罗素③，构成了一个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线。到了一九二一年二月，"解放与改造"改组成"改造"半月刊，在改组后的第六期中，为了回答对他们的反动思想的批判，甚至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研究系的头子梁启超自己写了"复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④支持与阐发了张东荪的反动思想，而尤其着重于提出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纲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反社会主义的攻势和实用主义的攻势一样，是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出的，而且是发自似乎"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口中，具有一定的蛊惑力。因此，要想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克服这种反动逆流是当时的迫切任务。

---

① 指布尔什维主义。

② 张东荪当时在哲学上是与实用主义不同但同属主观唯心主义一类的柏格森主义者，但在政治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张东荪说："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与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调桴鼓相应，如出一辙。

③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反对战争，因而一度被看成社会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同时去苏俄访问，但一离开苏俄便肆意发表反苏言论。他来中国"讲学"正在访问苏联之后，是帝国主义思想家们阻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张东荪等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其基本论点正是从罗素在中国所宣传的一套中抄来的。

④ 见"饮冰室文集"第十三册。

“新青年”便在这个反动思想的逆流面前树起了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旗，由八卷四号起，连续刊载了许多论文，驳斥梁启超、张东荪等的反动理论，展开了五四运动后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大论战：“社会主义讨论”。当时站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伪社会主义者的人，主要从下列三点驳斥了这些人的反动观点：第一，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血腥的剥削性质：“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困”。他们举出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的贫困和我国“被剥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的事实为根据，证明了张东荪等伪社会主义者所谓发展资本主义便能使中国人过着人的生活的论调的伪善性。第二，他们正确地指出，中国既然已沦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侵略之下，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希望致国家于富强和保障祖国的独立是不可能的。他们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处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种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资本国作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的。梁任公认为此是唯一可行之道，反而不免是空想吧！”第三，他们指出，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不过是要“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况而不思反抗”，梁启超等人所伪善地宣扬的“矫正资本家”的幻想①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工具，因为“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的豢养的，社会改造论者的空言是无补的”。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需要走俄国的道路，他们当时称之为“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这样，当时站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参加了这个论战的人便在若干基本论点上正确地驳斥了伪社会主义者的欺骗，保卫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旗，克服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这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参加这个论战的人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远不充分，并且在有些方面的了解上又是极为片面和颇多误会的。同时他们直觉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又完全没有去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由于这些原因，在他们驳斥梁启超、张东荪等的反动主张的论点中也包括着一些重大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最主要的表现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只有远不完全的了解，因而对中国社会还不能有科学的认识，从而对于中国的革命性质也便作出了不正确的论断。他们不了解当时我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和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因而简单地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任务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自然是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刚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者还极为幼稚的时代的特征。②

张东荪等在这个论战中是把自己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标榜自己主张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鼓吹正是当时帝国主义思想家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法之一，先后同时来中国“讲学”的帝国主义学者杜威和罗素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宣扬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学说所保存的封建性成分最便于他们用于达到保持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利于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实际目的，而张东荪也就成了这种宣传的应声虫。只是在开始时，在他看来，据说这种主义“吾辈子孙是否能见之尚属

① 梁启超主张“奖诱警告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之利益，以缓合劳资两级之距离”，他说这是对资本家的“矫正态度”。他企图用来实现这种矫正的手段是“政府之立法”和“社会之监督”。

② 这是就这个论战中的总的情形来说的。当时站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参加这个论战的人主要是李达同志以及陈独秀、李汉俊、李季、周佛海等人。陈独秀等人后来变成了可耻的叛徒，乃至托派、汉奸，就论战中他们各个人的具体论点说，还有一些极端荒谬的怪论，与他们以后的叛变有一定的关系，详细评介非本文篇幅所允许，也不是十分必要的，故略。

问题”，因而只好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已。到了他的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面目被“新青年”所揭露，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已证明完全不得人心之后，他便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进一步推到前列来了。一九二一年以后，张东荪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以“社会主义研究”为题的专栏，便是用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办法，集中力量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时事新报”成了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报纸。这个反动的活动受到了“新青年”、“先驱”半月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严厉抨击。“新青年”在驳斥这种主义时指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存心要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资本主义的懦人”。这个论战还没有深刻地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及其社会根源，但是起了划清界线的作用。在此以前，许多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无知地把各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看成朋友，甚至看成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派别①，经过这个论战他们认识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在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划清了界线，从而阻止了这种反动思想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中，另一种曾相当广泛地传播并起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远在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克鲁泡特金派无政府主义思想借以“互助主义”来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之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我国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及其知识分子，这种表面上反对资本主义似乎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并且以所谓“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永恒”原则相标榜的主张，极合乎他们的倾向于极端个人主义的习性。这种思想的传播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一九二〇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在北京和上海都曾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混进团来，因而也便不能不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内部产生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新青年”上也有若干反映。八卷一号“新青年”改组成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时发表的“论政治”一文中，便阐述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指出“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若劳动阶级自己宣布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一九二一年九月以后出版的“新青年”九卷四号上又发表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论战的六封往来长函，组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讨论”的专辑。这个讨论在有些论点上也接触到“无政府党是资产阶级的好朋友”的实质，但是，大部分言论变成了关于是否可以根本废除法律的形式上的繁琐议论，混杂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青年”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进行得不彻底的，当时领导“新青年”编辑部的陈独秀把这个斗争单纯看成是社会主义内部的斗争，而没有始终一贯地揭露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一九二一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出版的机关刊物“民声”，已公开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专门骂列宁”，而陈独秀在“无政府主义讨论”中却还在不着边际地与他们进行繁琐的空谈，这是不能充分反映当时党的组织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际状况的。

“新青年”在“五四”运动后所进行的三个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其情形就是如此。

---

① 例如新青年九卷二号上发表的李达所写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便认为“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包括“正统派社会主义”（指考茨基派），“修正派社会主义”（指伯恩斯坦派），工团主义，“组合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

就这样，“新青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经过“五四”运动而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刊物。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还很幼稚，对俄国革命的知识还很少，对中国社会的实际也缺乏了解，这个刊物还有许多缺点。它的若干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中掺杂着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曾错误地把某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成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派别；它与新文化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大为疏远了，但是还没有对他们加以批判，表示决裂，依然在形式上维持着统一战线，继续发表胡适等的文章。尤其是在罗素到中国来讲学的前后，“新青年”曾用两期的主要篇幅来介绍他的生平，著作目录及作品选译。其中包括他在苏联参观之后所发表的反苏言论，为错误而有害的观点扩大了影响①。但是总的看来，“新青年”是当时最有力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缺点是次要的，是时代限制的结果。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这两年中，宣传社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起纷纷传来，玉石未辩，真伪不分，而在开始时，许多人也正是目迷五色未遑细加分辩的。就在这时，“新青年”逐渐明显地变成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刊物，并且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环境中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进行了必要的斗争，打退了改良主义的胡说，坚持了革命的立场。也正因此，“新青年”当时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把他们团结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旗帜下，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中，“新青年”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青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时，“新青年”已迁到广州，正出版到九卷三号。党成立之后，“新青年”继续出版，一九二一年底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顿，到一九二二年七月出版九卷六号。结束第九卷后休刊。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改组成季刊，仍在广州出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②。由于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计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第一期，十二月出版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第三期，十二月出版第四期。自此以后，原准备改成月刊，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定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第一号，六月出版第二号，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第三号，五月出版第四号，七月出版第五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到这一期为止。

“新青年”改组成季刊的时候，党的优秀的领导者之一卓越的政论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同志刚刚由苏联回国，他立即成为“新青年”的主编和最主要的作者之一，为初期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发刊词“新青年的新宣言”，便明白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理论性刊物的性质。“新宣言”中肯定过去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曾“成为革

---

① 在宣传罗素的思想方面，最积极的作者和译者是张申府。当时名张崧年、张赤，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社员和经常写作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他曾一度混进党内。抗日战争中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公开宣布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进行了叛卖性的活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中有关于出版物的决议案，称“新青年”为“中央理论机关报”。这个决议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做出的。

命思想的代表”；同时又指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因此，“‘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它宣布“‘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这个“新宣言”中所提出的若干原则相当显著地说明了改组之后的“新青年”的特点。

如前所述，改组以前的“新青年”，虽然早在一九二〇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但多少仍保持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逐渐地、以后并越来越显著地占据主要地位，但终于没有成为唯一的内容，直到党初成立后出版的三期，也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某些较微弱的痕迹①。但自改成季刊以后，它已成了纯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目的的刊物了。特别显著的表现是它大量介绍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而这在过去的“新青年”上是没有去着力进行的。从季刊到不定期刊一共只有九期刊物中，发表的列宁同志的著作计有：“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即“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二次大会上的演说）、“中国战争”、“革命后的中国”（即“更新的中国”）、“亚洲的醒悟”、“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专政问题之历史观”（即“论专政问题的历史”）、“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的不定期刊第一号是纪念列宁同志的专号，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的宣言。斯大林同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刚刚出版，便大部分在“新青年”上译载了②。此外，还发表了他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关苏联政治经济概况部分，和“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等文。另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大量地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季刊的第一期便是共产国际专号，除了译载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的文件和发表报道大会情况的文章之外，还发表了瞿秋白同志所写的介绍共产国际的党纲和策略、介绍由第一国际到共产国际的简要发展史的几篇长文。此后各期也常刊载关于共产国际的报道和文件，以及介绍各国工人运动情形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文章占刊物的主要地位。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的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当时刚刚公布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即一九二四年苏联宪法全文）的译文。

“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上的中心问题是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的理论上的论证。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与国民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接着便开始进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广泛展开工人和农民的国民革命运动，直至准备北伐战争等巨大的革命工作。“新青年”季刊正好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月出版第一期，一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才最后停刊。在此期间，它肩负着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及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的一系列策略问题的重任，在宣传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青年”季刊的第二期正好出版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一期中瞿秋白同志的

---

① 人民出版社影印本第九卷说明中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亦曾一度以该刊为机关刊物”。影印本季刊是另有说明的，此处所说当系指第九卷四——六号。这个时期中“新青年”还发表了胡适等的诗文。

② 原书的民族问题一章发表译文，标题为“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瞿秋白同志译述了原书第一、二、三、四、八各章的大部分，发表时总名“列宁主义概论”。

论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根据列宁同志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阐述的原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他一方面斥责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伪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方面也反驳了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就是单纯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的空想，肯定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革命①。他写道：“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主主义的改革……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如前所述，在准备建党的时期和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不少人由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缺少科学的认识，也曾简单地认为中国革命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同志明白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性质，便不只驳斥了党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也有助于澄清当时党内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残余，是有重大意义的。瞿秋白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根据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所论证了的原理，从理论上指出了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进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此后，“新青年”在宣传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曾有过较为显著的缺点，表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季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专门论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文章。彭述之的一篇空口说无产阶级领导权，却又把民族资产阶级说成似乎是毫不足道，据说“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的事”，把当时革命的广州国民党政府，说成“不过是几个新军阀、新官僚面子上拥戴孙中山的一个政府罢了”，他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在“左”的形式之下，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陈独秀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因为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投降主义倾向而受到大会的批判，但他一九二四年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的文章中并没有认真纠正这个错误，他虽然形式上说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督战者”（？），实际上却根本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隐匿起来，置而不论。这两篇文章虽然不能说明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的全部思想，但也是多少体现了他们殊途同归地一起滚入机会主义的泥坑的一部分原因的。

随着革命运动在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领导之下的迅速发展，到了一九二六年，革命的北伐战争已经在积极准备和着手进行，于是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便进一步提到党的面前来了。北伐开始前出版的“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三、四各期上，瞿秋白同志在研究“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扩大武装势力、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的要求。他并写了专门论文“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问题”，指出需要“实行总解决的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从事于革命作战”。这时盘据在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对武装斗争问题有错误的观点，而瞿秋白同志的观点则是与陈独秀等对北伐持消极态度，不提革命战争的口号，不强调武装工农，而企图以争取军阀部队为中心的观点②相对立的。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同志较早的文章中虽只提出“组织农民、指导减租减税互助合作的运动”，以后也补充了向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目标”的要求。

“新青年”季刊的另一个功绩是开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

---

① 这里所驳斥的是出现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今日”月刊上的一种论调。这个月刊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与党成立之前北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并无关系。

② 见不定期刊第五期中陈独秀所著“世界革命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宣传。一九二三年，在资产阶级思想界中展开了一场所谓"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个论战是在一方面实际上以胡适为首、形式上以丁文江为首的一派与另一方面以张君劢为首的一派两种主观唯心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张君劢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他公开宣传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不可能对人生观作科学的解释；而胡适、丁文江等则在反对玄学、维护科学的名义之下宣扬了腐朽的实际上为帝国主义买办势力服务的实用主义思想。这个论战原只是两派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内哄，但论战的实际意义却又不只于此。因为在这个论战中，胡适和丁文江窃据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科学"，这一派的胜利便会加强他们以新文化运动的正统自居来散布实用主义毒素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过问的。因此，"新青年"、主要是瞿秋白同志便终于干涉了这一场论战，展开了反对实用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他批评所谓"科学派并没有战胜"，认为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他所指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以及第三期上发表的"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一文中，他曾宣告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并试图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争论中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懂得为什么胡适丁文江等不相信、不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武器，因为他不懂得胡适一派所鼓吹和信奉的实用主义正是最反动而又最具欺骗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相敌对的；不仅如此，他自己还深受着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也并没有能对争论中的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有不少论点实际上还是唯心主义的。陈独秀的文章一般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号与论战中的两派对立起来，这是好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力量完全揭穿实用主义的蛊惑宣传，因此他不可能对论战作出完全正确的批判。

对这个论战给了正确的批判的是瞿秋白同志。他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哲学论文"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针对张君劢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指出社会现象同样有客观的规律，并根据"自由与必然"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的原理解释了自由意志的问题。他指出："社会现象确有因果规律可寻，唯知此因果规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规律之'自由'"，彻底打破了张君劢的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观。但是他在这个论战中的主要功绩与其说是对张君劢的批判，不如说是他彻底揭露了实用主义的伪科学的唯心主义的本质。张君劢公开宣扬唯心主义固然是极端反动的，但胡适、丁文江等假拥护科学之名，掩盖着那主观唯心主义的实际面目来宣传实用主义却更毒辣，在当时具有更大的蛊惑作用。彻底粉碎这种蛊惑宣传就意味着打破胡适等窃据五四时代"科学"的大旗的阴谋，继承和发展五四运动的革命的传统。因此，"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瞿秋白同志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深刻地指出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本质，便是要"工人阶级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使工人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而"不至于'妄想'"。他指出实验主义是"改良派"。他引用实验主义者的教主詹姆士的理论并加以深刻的批判，主要是真理论上的批判，指出："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也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这样，他就揭开了实用主义者胡适、丁文江之流拥护科学的骗人的外衣，他写道："实用主义带着科学方法来到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此，他并进而反驳了一种认为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很相近的误解和混淆，他从理论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与实用主义的"有益

观点的本质不同，也指出了在实际应用上马克思主义指向革命，而实用主义则指向妥协。这篇文章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彻底揭露了实用主义反动思想的第一篇文献。

这两期“新青年”上还发表了若干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是与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问题有关的。

总之，“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出版于党的幼年时代的中期。这时革命运动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有很大的发展和胜利。这个时期中的“新青年”发扬了“五四”前后的战斗传统，并变成了纯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变成了党的最早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之一。它宣传了党在革命迅速开展时期中的路线和策略，贯彻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大力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对反动的实用主义思想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有很大的成绩。只是，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因而“新青年”在宣传中也就不免还杂揉着若干不明确的乃至错误的观点，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新青年”与报刊工作

“新青年”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出版，到一九二六年止，前后共存在了十年以上，是我国现代革命报刊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的十年是有历史意义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革命完成了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过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掀起规模巨大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十年是思想斗争极为繁复而且剧烈的时期，而最后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和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的基本完成为其特征。“新青年”是这十年中思想运动的主要中心。它保存了丰富的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材料，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初期的理论活动的重要根据。从以上各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青年”的发展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由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的旗手，它所全力进行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部分扫清道路的作用，因此，它可以说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先驱。第二个阶段，大约由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它由一个民主主义的刊物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其后期，并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而曾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各流派作过理论上的斗争，对于思想上准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它曾改组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和从理论上论证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策略路线上有过一定的成就。由于它出版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准备时期和党的幼年时期，它的前期包括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它的后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也有过一些错误和混乱的地方，但这些缺点是不能掩盖它的基本功绩的。

“新青年”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这种重要地位，就是它在报刊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的最好说明。它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报刊工作的基本原理，证明报刊是掌握在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手中的有力的武器，证明代表着进步和革命力量的报刊能起何等伟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和组织作用，证明报刊是一种政治组织的中心。同时，它的历史也证明报刊只

有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为革命斗争服务，才能发挥它的历史作用。脱离实际，妄想超然于革命斗争之外的任何打算，都是报刊工作的死路，而且常是反革命势力用以破坏革命报刊的反动口号。这一切除已为上述关于“新青年”思想内容的分析所充分证明之外，还可以从“新青年”编辑部组织的演变上找到另一方面的说明。

“新青年”第一卷的名称是“青年杂志”，这时虽然也提出了有关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但是还没有起多大的影响。这时刊物的编者是陈独秀，主要撰稿者还有高一涵、刘叔雅等人。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长北京大学，约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刊物的编辑部迁到北京，逐渐和在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开始，刊物才开始获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群众的欢迎①。从一九一八年一月第四卷开始，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具有了同人杂志的形式。这时的经常写作者已陆续增加了李大钊、吴虞、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等人，鲁迅也从第四卷起开始写稿，一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战线已经形成起来了。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起，“新青年”社成立了编辑委员会，这一卷中宣布按第一期至六期为序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分期主编。但实际上这种轮流值编的办法在此以前便已开始实行，编委会的形式也并不固定，尤其并不限于上述六个人，例如鲁迅便也是编委会的参加者之一②。总之，在这个时期中，“新青年”不只在内容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且其成员包括当时的左、右、中三方面的知识分子，在组织上也是具体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的。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逐渐开始；到了八卷一期“新青年”改成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种分裂便明显了。当时“新青年”刊载启事道：“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物”。这个“新青年社”设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机关，它不只出版“新青年”月刊，还编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丛书，出版“劳动界”、“伙友”等通俗的工人刊物，并成为与工人群众相联系的机关。这时参加编辑部活动的已增加了陈望道等人，经常写作者增加了李达等人。这些人虽然以后各有不同的变化，但在当时都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陈望道并实际担任着编辑的职务。这时，上海的“新青年社”与在北京的“新青年”社员虽然还经由陈独秀保持联系，但和他们中的一部分却已经越来越貌合神离了。在“新青年”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宣传后，遭到胡适的坚决反对，他曾在北京的新青年社员中积极活动，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③，主张把它“迁回北京出版”，“注意学术思想……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实际上是要使“新青年”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变成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这个活动的目的没有达到④。“新青年”出版到八卷六号时，所发排的稿件全部被帝国主义的捕房没收，不能不改在广州出版。到了第九卷，“新青年”所体现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加深，刊物的统一战线

---

① 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篇注释：据邹孟邻君述，“青年杂志”出版后，“销路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至民国六年销数渐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

② 鲁迅曾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新青年”编辑部开会时的情形，例如“守常文集序”。“新青年社”重要问题的决定，鲁迅也是参与其事的。

③ “苏俄”周刊，是一种当时在纽约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上译载它的材料较多。

④ 经过情形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篇”：“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面貌也便逐渐消失，虽然有时也还发表胡适的文章，但那已只是不关紧要的诗文了。到了一九二三年"新青年"季刊以新的姿态出版时，便完全与旧"新青年"编辑部中的右翼割断了联系。总之，"新青年"在组织上的变化也是充分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分裂的全过程的。"新青年"编辑部之由无形的思想文化运动的中心变成有形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机关，也具体证明了革命报刊的组织作用。这些历史经验鲜明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报刊的原理，对教育新时代的报刊工作者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新青年"又是报刊工作中的勇敢的革新者。前已指出，"新青年"在改用白话文和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上的首创作用，这是报刊史上的一项极重要的革新。"新青年"编辑委员会的集议制度及其所表现的民主精神也是以前的重要报刊所没有的。此外它还在若干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经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尖锐的战斗性、不调合的论战精神，这种精神明显地表现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中。这反映了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一方面。当时"新青年"的一些主要作者们善于抓住敌对的思想文化的反动性的主要表现进行坚持不渝的反复揭露和抨击，把敌人的最丑恶的一面公诸人民群众面前，这样，虽然他们在某些次要问题上甚且存在着错误的见解，但终于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五四时代是一个著名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新青年"的经验证明：百家争鸣决不是放松思想斗争，而正是预计到要加强思想斗争；"百家争鸣"不是放松编辑部对思想斗争的领导，而正是相反，应该反对那种"是非不分、真理隐晦"的态度。这种经验对今天的报刊工作者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其次，"新青年"也注意与读者和作者的联系。从第一卷第一号开始，便特设"通讯"一栏，刊载编者与读者和作者的往来函件。这一栏在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曾是"新青年"上的最生动最丰富的部分之一。发表在这一栏中的一些信件，反映了当时进步青年要求变革的心愿，进一步阐发了"新青年"所宣扬的若干观点，和若干读者展开了同志式的讨论，也对敌对思想的体现者加以无情的驳斥。由这种通信中引出了重要的新的论题，也吸引了新的经常的作者。"新青年"在一定时期中的极为注意与群众的联系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加以珍重的。

（原载《五四期刊介绍》第一集）

《每 周 评 论》介 绍

“新青年”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前高高举起反封建思想斗争的帅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它始终是标榜“不谈政治”而以理论斗争为主的大型月刊，没有也不便于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在五四革命风暴酝酿成熟的时期，“新青年”的形式和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于北京的“每周评论”成功地担当了这一任务，和“新青年”互相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继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投靠日美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七年宣布对德作战；十月革命以后，又和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参加了帝国主义干涉苏俄的战争。段派军阀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积极编练军队，扩张势力，进行内战，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军阀的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武力专政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的最后一点廉耻也丢尽了，人民对于他们的愤恨达到极点，日本帝国主义也成了中国人民切齿痛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由几年来的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及世界革命高潮的初步影响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开始表现为政治行动。一九一八年五月，北京的大专学生为了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形成五四运动的先声。到了一九一八年冬，欧战结束，协约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亲英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公理战胜强权”的宣传掩盖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美化了英美帝国主义；威尔逊的伪善的“十四条”，特别是其中的“民族自决”一项也一时欺骗过广大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但这些虚伪的宣传在另一方面的确也进一步激发了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的信心和决心。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展开的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注进了新的思想因素和准备了最坚决的领导骨干。中国的新的民主民族革命高潮已日益迫切了。

“每周评论”就是在这一高潮的前夕诞生的。它的发起者和编者是著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只眼）和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常、明明），他们两人在反对封建军阀，要求民主和民族独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每周评论”的经常撰稿人有胡适、周作人（仲密）、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张申府（张赤、赤）等，他们都执笔写过一些社论，这种情况说明了“每周评论”的统一战线性质。在二十五期以前，“每周评论”反映了负实际编辑责任的陈独秀和其他撰稿人的不彻底性和某些模糊观点，但在主要方面，它一直坚持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后期也一般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了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报道了俄、德、匈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从各方面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在运动过程中，它忠实地报道了群众斗争的进展，初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总结教训，对运动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二十五期以后，胡适利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避难离京的机会夺取了编辑的地位，改变了刊物的方向，开始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时的刊物已失去革命报刊的性质，但是反映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初期的情况，仍不失为重要

的资料。

为了能及时评论国际国内政治和便于流传，“每周评论”采取了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有时增刊“特别附录”一张；分栏为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来论，新刊批评，选论，名著等，轮流刊出；其中“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等栏，在二十五期以前几乎每期不断；通过这几栏，“每周评论”密切地跟随着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展，用进步的观点加以报道和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随感录”中有不少是尖锐抨击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短小精悍之作，这就使“每周评论”带上了同时出版的任何资产阶级报刊所没有的革命战斗性，也为刊期较长、以发表长篇论文为主的“新青年”所不及。“每周评论”这一特出的优点后来被广泛采用，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的刊物，如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浙江新潮”和“钱江评论”以及其他许多周刊、旬刊或半月刊，都模仿了它的版式，大体采用了类似的分栏。“每周评论”在三十七期（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行将出版时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影印本收有未印成的第三十七期的第一版）。

在二十五期以前，“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人是陈独秀。他在五四运动以前，一直是法国式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对于十月革命还抱着观望和怀疑的态度，他深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表现，并且在由他执笔的“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规定为刊物的宗旨。他在这篇文章中解释“公理”和“强权”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说：“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反对强权，对外就是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对内就是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他就是根据这个信念来评判政治舞台上的一切人物和事件，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的，而他的这一信念基本上也是“每周评论”前期的言论的主导思想。李大钊同志这时的思想和陈独秀已有本质的区别，他基本上肯定中国应当走俄国的道路，对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已有初步的认识并且作了揭露，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言论比陈独秀彻底，而且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总的说来，对这个刊物的性质并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他撰稿人的言论一般也是站在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其中高一涵态度较温和，喜欢从资产阶级的法学观点提问题，王光祈的思想则有着鲜明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空想色彩，胡适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以文学作译为主，一般不涉及政治问题，也不占主要地位。

“每周评论”出版时，北京的北洋军阀“中央政府”一面迫于人民的压力和军阀阵营内部的矛盾，宣布和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实际为桂系军阀操纵）举行和谈，一面加紧编练“国防军”，继续扩展武力。在国际上，协约帝国主义正打着威尔逊的“十四条”的旗帜，玩弄着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的把戏。中国人民的这两个大敌企图通过这两个“和会”掩饰自己的分赃行为，进一步欺骗人民，缓和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他们也的确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幻想，特别是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在中国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只有彻底揭穿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才能激励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促成群众性的革命行动高潮。“每周评论”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幻想的破灭过程，同时也向人民进行了宣传，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的作用。

“每周评论”对于南北和议一贯表示不信任，在第一篇报道中就指出北方的代表“不过

是听受国务院指挥的委员罢了。托政府委员去议论国家根本问题，是这回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①，同时也揭露双方所以要和谈是因为“一方觉着打不下去了，对内对外，都没有了办法，却故意说海话，要和平统一啦，心里的鬼胎是七上八下。那一方也是困难的了不得了，明知道这海话是没有底，因为和平是两个好字，不赞成又不行，于是将计就计，也拿着鬼胎来迎”②，因此双方都是没有诚意的。“每周评论”还从民主观点出发，否认和谈的决议有任何法律效力，主张必须经“国民大会通过，才能有效”③。经过这样的批评，对于和谈自然不应再有任何幻想了，然而“每周评论”的言论中却又透露出多少还希望它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意见，例如陈独秀就表示对和谈还有“尊重”和“希望”，他写了长篇连载的社论“我的国内和平意见”，就“废督”、“裁兵”、“国防军”、“国会”、“宪法”等问题提出详细的意见，从而多少鼓励了人们对和会的幻想，冲淡了刊物上的揭露。但是，到了后来，刊物还是坚决地宣称和会所议的事，“不外乎权利两个大字罢了……横竖是没有代老百姓说话的”④。从此以后，刊物就把和谈抛在脑后，不再报道它的消息，而集中精力注意山东问题了。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猛烈地鞭斥了代表封建势力统治中国的军阀。陈独秀认为，欧洲大战后中国人民对内应有的最重要的觉悟就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指出军人是中国的第一大害，扩军备战是中国民穷财尽的根本原因，“武断政治”是“人民自由发展的障碍，终久要惹起社会的不平”⑤。对于以“参战军督办”段祺瑞为首的当政的皖系军阀，“每周评论”尤其深恶痛绝，用种种方法揭露他们以“国防军”名义扩充“家防军”的阴谋，揭露他们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用的钱、武器和重要的参谋训练人员都是来自日本的，所谓“国防军”实质上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余毒”，是“中日两国军阀的结托”，是日本参陆两部的“出张所”（即派出所），“倘若不取消，在内政上在外交上都是破坏和平的危险物”⑥。“每周评论”虽然如此尖锐地抨击了军阀，却没有指出用什么样的政权来代替它，只是不断重复“裁兵”的口号，要求彻底裁兵，“最好将现在所有的兵分年裁尽，一个也不留，把这养兵的银钱用来兴教育办实业”⑦，似乎裁兵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内乱，即使有外患也不必怕，因为实业和教育发达了，国家就有了真正的实力，有了胜利的根本，“要多少兵就有多少兵，并且是最能战斗的兵”⑧。这些主张虽然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和发展经济文化的进步要求，但既没有具体办法来保证实现，就只是软弱的呼声，不但不能为反对军阀的宣传增添多少力量，在面临斗争的时候，反而有分散人民注意力的危险。到了三月间，“每周评论”也就不再放这样的空炮了。在攻击军阀的同时，“每周评论”也连带触及官僚与政客，把他们与军人同列为“三害”，认为如不除去这三害，中国政治永不能有清宁的日子。这样，“每周评论”就和封建统治势力全面宣了战。

---

①“和平会议的代表”，第一号。

②“南京通讯”，第四号。

③“和平会议的仲裁机关”，第三号。

④“上海和议的情形”，第十八号。

⑤“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第二号。

⑥“我的国内和平意见”（四），第十号。

⑦“国防军问题”，第三号。

⑧“去兵后之内乱外患问题”，第三号。

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革命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先导，而政治斗争激烈时，也必然反过来加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配合着封建势力对人民和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压迫，反动的文人开始对新文化展开猛烈的反攻。一九一九年三月，桐城派的遗老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恶毒地诬蔑新文化宣传是“禽兽自语，于人胡涉”，并且假托一个卫道的“伟丈夫”荆生表示了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宣传的企图。“每周评论”为了发动群众起来反击，特地在第十二期上转载了这篇毒草，在按语中指出它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并且连续发表了文章痛加驳斥。这时，北京政府一方面通过反动报纸散布北京大学驱逐进步教授的谣言，一面想利用御用议员在国会中提出所谓“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议案，直接对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施加压力，林纾更乘机猖狂起来，公开表示要“拚我残年，极力卫道”。这一新旧思想的交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北京和上海的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一般都根据保证思想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立论，反对这种压制进步思想的暴行，并且指出这和政治上的进一步反动之间的关系。“每周评论”曾在十七、十九两期各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一张，集中登载了各报的言论来表示反抗。从这些言论的质和量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到了这时已经带有广泛的群众性，并且愈来愈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

“每周评论”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宣传时，经常触及反抗手段的问题。在这方面，刊物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不但反对官僚政客盗窃民意，狼狈为奸，也反对所谓社会名流包办代替。例如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反对由官方指定官僚政客，利用名流组成徒有其名的“国民大会”来“代表民众去解决政治问题”，提倡“叫民众去亲自解决政治问题”①，主张“国民大会必须经过合法的手续方能成立，断不许所谓名流私人集会可以冒充的”②；谈到除三害时，陈独秀主张“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谈到国防军问题时，警告中、日两国军阀“看看世界大势，不要太高兴。若是定要两国的国民起来根本解决，闹到俄、德两国的现状，没有你们什么好处”。李大钊同志也强调人民是“政主”，为“平民独裁政治”辩护，并且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中严词正告“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要他们站出来在公众面前辩论，因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李大钊同志援引俄国革命的例子警告那些妄想阻挡历史发展的人说：“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这些青年牺牲的血，却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那里去了。”③所有这些言论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但这种革命性的鼓动，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显然起了很重要的发动群众的作用。

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和反帝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只有当看清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卖国贼”以后，才能激起对他们的最大的忿怒，反封建战线才能取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在彻底揭露一切帝国主义的面目，懂

①“真真费解的‘国民大会’”，第六号。

②“国民大会”，第五号。

③“新旧思想之激战”，“每周评论”十二号转载“晨报”。

得在反对国内封建势力的同时必须打退国外的敌人时，中国人民的斗争才能达到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程度。正因为在五四运动的酝酿过程中，中国人民的先进阶层经历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变化，才使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但是，如果说，要进步的知识分子抛弃对军阀的幻想，几乎是轻而易举的话，那末，对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的破灭过程就要困难、复杂和曲折得多。这充分说明，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如此之深。"每周评论"相当完满地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这一矛盾复杂的思想变化的过程，提供了研究五四运动的性质的重要线索。

由于"每周评论"的撰稿人绝大多数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有清楚的了解，往往是根据表面的、一时的现象或诺言来下判断。因此，在他们眼中，张牙舞爪的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早就毫无疑问地列为"强权"，老奸巨猾的英美帝国主义，特别是一向以比较隐蔽的方式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却成了"公理"的化身，似乎大半个世纪以来英美海盗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只消几句漂亮的演词就可以轻轻抹掉了。"每周评论"早期的言论就陷在这样的矛盾里：一方面痛斥支持军阀的日本，另一方面又表示欢迎外国出钱帮助中国裁兵；一方面指摘中国的政治是两团——督军团与外交团——政治，"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似乎已看出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后台老板，另一方面又不止一次地说出象"（中国的）恶疮不经洋先生们下刀子，终究是割不动的"①，"国事被武人败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既不能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②这类的"引狼入室"的话。这当然决不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看法，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但是，如果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还严重地沈醉在这种幻想里面的话，他们就将把它传染给人民，从而束缚住人民的手脚，更谈不到对人民进行反帝的鼓动了。在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毕竟以很快的速度走完了这一段艰难的路，在五四运动的前夕达到了初步认识帝国主义面目的程度，为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

陈独秀由于错认协约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因此对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威尔逊几乎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发刊词"中就把他捧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后来又在"大事述评"中不断报道他的活动，一再援引他的演说，誉为"光明正大"、"高尚的议论"，"精湛之语"，"他的目的是在将来世界的和平同幸福，不在一国的目前利益"等等。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每周评论"在初期为世界和中国描绘了一幅战争和侵略永远绝迹的美丽远景，例如说："这次协约大胜，大家都知道是公理战胜强权。将来的世界上，弱国小国可以出头了。已亡的波兰可以恢复了。巴尔干小民族可以自主了。况且美国要组织一个世界大联盟，不准强大的国欺侮弱小的国。中国以后若不象义和拳那样胡闹，便没有什么外患了"③；又说："大同盟果然成立，那秘密条约，不正当的借款，过分的军队，强国的跋扈，都不能够存在的。列强果能赞成这个大同盟，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④。可以说，陈独秀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民族平等的幻想在这时达到了最高峰。陈独秀主张东洋各国联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如能通

①"南京通讯"，第五号。

②"希望各国干涉"，十四号。

③"去兵后之内乱外患问题"，第三号。

④"平和会议及国际大同盟"，第五号。

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①。"每周评论"对巴黎和会寄与很大的奢望，要求和会能通过取消中国过去被迫与外国订立的丧权辱国的密约，承认中国收回青岛。但是，和会的议事程序规定只有美、英、法、意、日五国有讨论全世界各大问题的资格，而在战争中损失很大的比利时和人口众多的中国等都被排斥于外，"每周评论"虽然起初还不在意，还用带有民族自卑感的口吻说："要知道现在所谓大国不在人多地大，却在他政治组织的能力和他所贡献于世界的成绩。试问我们中国有什么呢？"②但终究起了怀疑，发出"公理何在"、"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③这样的叹息；同时指出"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④。但假面总是要揭开的，在五四运动前的最后一期的"每周评论"上，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反映中国人民对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的愤怒，但几个月来的分赃活动已足够使陈独秀得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结论了。他说："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把和会直截了当地称为分赃会议，表示"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⑤。虽然这时主要的攻击对象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直接为它效忠的走狗曹、章、陆（"每周评论"第二十期的随感录集中攻击了这三个人），但对外与对内的幻想的双重破灭，已引导到同一的"必须由人民直接起来解决"的结论，人民群众的愤怒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了。

俄国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连锁反应的影响，是促成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觉醒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人民逐步唾弃帝国主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日益靠拢苏俄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过程。早在"每周评论"的第三期上，就发表了由李大钊同志执笔的、题为"新纪元"（未署名）的社论，热烈地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宣布"现在的时代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诺阿以来最大的洪水……洗出一个新纪元来"，在这个新纪元里，"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他高兴地指出，黑暗的中国也分得了这个世界革命和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的一线曙光，"好比沈沈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乘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李大钊的思想水平远远超过负主要编辑责任的陈独秀和其他的撰稿人，因此"每周评论"对于俄德革命的反应，除了李大钊的文章外，最初并没有能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狭隘观点。"国外大事述评"甚至追随帝国主义的诬蔑性宣传，称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并发表了一些糊涂观点，如希望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的反革命势力"捐除意见"，一同拥戴高尔察克政府⑥；

①"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第二号。

②"平和会议之消息一束"，第六号。

③"公理战胜强权"，第八号。

④"揭开假面"，第八号。

⑤"两个和会都无用"，二十号。

⑥"俄罗斯之混沌状态"，第三号。

说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今日已经没有根据了"所以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中的势力也逐渐减少，"过激一派想不能得到胜利了"①等等。此外还从超阶级的人道和平观点出发，反对革命与反革命的任何一方"残杀"另一方，认为"过激派错处是在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希望"反对过激派的千万不要用中等社会压制平民残杀平民才是"②。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随着帝国主义面目的揭露，也逐渐改变。到了报道匈牙利革命时，就很强调"协约国有并吞他们土地，破坏他们独立的意思，匈牙利为保全自己起见，所以就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联盟，来抵制协约国"③；称赞"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国内秩序一点也没有变乱。因为这回革命，由于国民同情，不是用武力战胜的。新政府成立后的各种消息，很有可以叫人注意的"④。这时陈独秀也转变成俄国式革命的拥护者，宣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⑤。陈独秀的立场的转变是有典型意义的，这说明一部分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在五四前夕已开始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从而决定了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和反封建的性质。

由于篇幅和主编的思想的限制，"每周评论"没有认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在"名著"栏里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一节和倍倍尔的"傅利叶"一书中说明"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的一部分，同时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在这一方面，值得提到的是王光祈的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色彩的作品。他在"国际社会之改造"（第一号的社论）中主张"打破国界人种的现状，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由各地方的工人，不分国籍，不分体力和脑力劳动，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组成地方自治团体，再联合成为一个与威尔逊所提倡的国际联盟根本不同的"国际社会"，就可以消灭国际间的猜疑与野心，推翻社会上不平等的制度。他表示根本不信任巴黎和会，因为"每次国际战争，都是几个野心政府惹出来的，在野心政府的背后，就是那些政治家，资本家，军阀贵族在那里怂恿"，依靠这样的政府来开和平会议，内容恐怕是"研究杀人应从那里开刀，灭国应从那里入手了"。这些说法虽然不能真正给人民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在揭露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却是颇为有力的。王光祈在这篇社论的最后又说："（人民）如还要想谋世界永久的和平，人类切实的幸福，就应该动起手来，胆子不要太小了！须知道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是我们大多数平民可以自己改造的，并不是天生就的，亦不是贵族给我们的，千万莫要信那贵族所造的命运谣言"。这固然也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话，但在那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下，这些话的客观效果是值得重视的。此外，"每周评论"的"国内劳动生活状况"一栏，也说明"劳工神圣"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其中曾发表过李大钊同志介绍唐山煤矿工人情况的短文，但总的说来，由于还处在六三运动以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工人的生活和力量缺乏具体的了解，这些介绍还是浮浅的，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与战斗性。

---

①"德国内政之纷扰"，第二号。

②"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第四号。

③"匈牙利的情形"，第十六号。

④"匈牙利新政府的消息"，第十七号。

⑤"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十八号。

如果说由于社会性质不同和地域的远隔，欧洲的革命运动一般只能鼓舞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还不能使他们产生很具体的感受，那末，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二连三发生的殖民地附属国独立运动，对于中国人民就更为亲切了。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影响是促成五四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每周评论”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第七期用头条新闻报道了“爱尔兰之独立”，称道爱尔兰人“自己解决了”六十七年以来英国政治上最困难的“爱尔兰问题”。此后又报道了埃及和菲律宾的独立运动，而对于朝鲜人民的“三一起义”，更是大书特书。因为地属近邻，历史和文化上关系密切，又同受日本人的压迫，朝鲜人民的革命运动对于中国人民的震动最大，在报刊上的反应也最强烈。“每周评论”第十三期用大半版篇幅报道了三一起义，并且标上“民族自决的思潮也流到远东来了”这样的副标题。第十四期更用整整一版报道了革命的经过，副标题是“生气和杀气相冲，公理和强权苦战，且看最后那一天，到底是谁胜谁败？”。在报道中充分反映了朝鲜人民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对于中国人民显然起很大的激励作用。陈独秀特地写了“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的社论，他说：“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有了朝鲜民族活动的光荣，更见得我们中国民族萎靡的耻辱。……我们比起朝鲜人来，真是惭愧无地！”陈独秀对于朝鲜起义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夸大了朝鲜人民“赤手空拳”的情况，以致把革命歪曲成不要武力的无抵抗主义行动了；他对中国人民力量和觉悟的估计显然也带着洋知识分子轻视本国人民的臭味。但是，从他这番话里可以看出朝鲜三一起义对于中国人影响之深。三一起义恰恰爆发在五四运动前两个月，自然也给五四运动狠狠地添了一把劲。

总之，通过对于“每周评论”前二十期内容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教育了自己，逐步达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立场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他们怎样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影响与教育了中国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每周评论”的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前史的缩影。

当军阀政府准备接受巴黎和会分赃计划，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消息传来时，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燃起了第一把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火焰。“每周评论”的内容也就完全集中到这样一个重大政治斗争上来。从二十一期起，一连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来详细报道和评论这一伟大群众运动的进展。首先它报道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实况和反动军阀政府对示威群众的镇压，报道了五月七日以后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及运动从学生范围扩展到广大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这些报道里可以看出“每周评论”编者和作者们在经历这一场伟大斗争中的思想变化。五四爱国运动深刻地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正确地得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结论，构成了他们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因素，这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正在逐渐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影响着正在开展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的镇压，而且必然也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反动阶级的破坏。首先它就受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的反对。上海总商会无耻地致电北洋军阀政府，把五四运动说成是群众反对章宗祥一个人，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①，主张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②。这种叛卖性的言论马上得到日本

①“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二十二号。

②同上。

帝国主义的欢心，日本帝国主义的“顺天时报”立刻在舆论上向中国人民展开进攻，诬蔑群众运动是“胁迫治安”，赞扬向日本帝国主义谄媚的上海总商会，认为他们是持“镇静公正之态度，达观大局之见识，自有与一般嚣嚣者不同者焉”①，赞扬他们的主张是“何其处心平静，而谋策宏远耶”②，“每周评论”将上海总商会电文，和日本“顺天时报”对他们的赞许一并摘要刊登，并且进一步揭露所谓中日直接交涉的内容和实质：“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贿赂对待中国政府，借口交还名义上的青岛，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国权利以外的济顺高徐铁路和许多矿山的权利。”③上海总商会这种毫无民族气节的行为还受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各上海商民团体的一致谴责，“每周评论”支持他们的爱国主张，登载他们的抗议信，并且发表一个上海商人主张参加爱国运动致总商会的信。信中充分流露出当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及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爱国人士的立场：“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在欧参预和议之成败，……亦即关系我商业前途之存亡。失此不争，转瞬为高丽之续。我商人生计行见剥夺以尽。”④他对总商会在群众运动面前“徘徊瞻顾”、“恐开罪于强邻”和“总商会重要分子，多欲顾全与日本人之私交”⑤很感不满，他提出“宜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挽回主权隐保商业之策。……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⑥“每周评论”用具体材料孤立了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正义立场，无疑对当时爱国运动添加了一份力量。

封建地主阶级也是抵抗五四运动的逆流之一，以林纾为首的封建余孽装出一付道貌岸然样子，和北洋军阀政府一起诬蔑五四运动是“破坏伦理主张”⑦。“每周评论”讥刺他们说：“当这举国悲愤的时候，独有一班尊崇孔教提倡伦纪笃守礼法的人，眼见他们的圣地要被日本人占去，他们还在那里大骂爱国的学生，替日本人出气哩！”⑧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则公然露出了反对五四运动的狰狞面目，他企图以维获法律为借口，加罪于学生。他的“论学生事件”⑨论文就是针对爱国学生开火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为曹、章辩护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⑩他反过来却要学生去向统治者领罪：“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这种论调除了暴露他自己的凶恶面目外，更加激起群众的义愤，“每周评论”特辟专页登载了许多驳斥他的文章。他们理直气壮地阐述学生的正义行动“居心光明磊落，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⑪认为爱国学生有“攘臂一呼，从者千万，啮血誓辞，悲歌慷慨人心不死，凛凛然有头可断志不可夺之勇气”⑫，指出学生运动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

①“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二十二号。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二十二号。
⑦同上。
⑧“外交失败声中的怪现象”，二十三号。
⑨同上。
⑩“每周评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
⑪同上。
⑫同上。

“公众的示威运动，在现今的文明国，是国家法律上应有的权利，并且还是历史上流血争来的权利。……不能拿扰乱治安目无法纪这些罪名加到国民示威运动的头上来。”①军阀政府、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疯狂的联合进攻，并没有吓退英勇的中国人民，这种言正词严的驳论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沉重打击。

协约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彻底暴露出他们的侵略嘴脸之后，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这就大大加速了人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觉悟的成长。他们对于巴黎和会已经完全失望："欧洲此次和会，高唱民族自决主义，……今乃以关系世界和平的青岛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以外，……此次和会价值，实等于零。”②“每周评论”从事实的教训中彻底揭穿了协约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特别对于揭露威尔逊的伪善面目有着很大意义，李大钊同志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质问说：“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象这样的和平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威尔逊标榜的所谓“民族自决”、“十四点”在这个时候才彻底露出了它的真相。这篇文章还指出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终于得出了“强盗主义大行的时候，公理仍然战不过强权”的结论③，指出了只有彻底反击帝国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李大钊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政府……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现在感到的已经不是什么“民族自决问题”，而是“世界改造”问题了，实际上提出了改造世界的国际口号。这种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呼声对于那些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的人们具有莫大作用。

当人们剥开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之后，中国军阀出卖祖国的罪恶行为自然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了。“每周评论”严词斥责军阀“引虎入室”、“有意卖国”的行为⑤，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真正的敌人并不仅仅是曹汝霖、章宗祥等少数人，而是整个反动军阀统治。他们尖锐地责问：“试问拿军事协定和济顺高徐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也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吗？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二千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此外还有许多铁路、矿山、电话、森林，都用贱价卖给日本，到底是何人主持？是何人经手？……甘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日本换军械军费来杀戮本国人，这是什么罪恶？造成这罪恶的到底是什么人？”⑥

如果说在六三运动以前，否定整个军阀统治还不是运动发展到深入阶段的表现，那么对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否定就是运动发展到高峰的表现了。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少数人执掌

①“每周评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

②“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二十一号。

③“青岛问题在欧会中经过的情形”，二十二号。

④“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二十二号。

⑤“青岛交涉失败史”，二十一期。

⑥“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二十一号。

的："现代号称平民政治的国家，没有不是采用代议政治的，代议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三个党魁的政治。各国的政客，一方面是独占政权的贵族，一方面又是拿人家血汗作乐的资本家。"①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假实质："若是国民诉之政治，政治是秘密而不公开的。若是国民诉之法律，法律是只论形式没有灵气的。政治法律都穷了，国民的武器便是示威运动。"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夺取政权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有着领导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认定"公理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②，根本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③，认识到要以革命的方法、全民团结的精神去达到这一目的。当时的具有初步社会主义倾向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就是这一认识的集中代表，他还吸取了俄、德等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向人们发出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榜样的呼召："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④这是他们从实际斗争中得出的唯一教训。

总之，这五期"每周评论"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六三运动以后的情况就被胡适接编了，但是他们终于站在运动前面，热烈地歌颂了这一运动，在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走俄国革命道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六三"运动以后，正当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被捕，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胡适攫取了编辑地位，从此，改变了报纸方向，更换了报纸版式。从二十六期起，取消了反映当时政治斗争的战斗文章和尖锐评论，抽掉了"国内大事述评"和"国际大事述评"两栏，发表过片段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的名著一栏除了刊载罗素的译文外再也没有新的内容了，再也看不到满腔热情歌颂革命的诗篇了。其中虽然有不少文章也提到自由、科学、思想等风行一时的名词，但是它已经失去了结合当前实际斗争的战斗意义，成了资产阶级学者笔下的玩物，虽然也有不少介绍俄国新宪法、土地法、婚姻制度的文章，起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宣传作用，但总的说来还只是资产阶级学者形式主义的纯学术的介绍，和以前歌颂苏联的文章大大不同了。刊物变质的最显著的标志是，用二十六、二十七两期的全部篇幅刊载"杜威演讲录"，大力宣扬了反动的实用主义。

胡适原来是标榜不谈政治的，但这个时候却露出了他的张牙舞爪的本相，他的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向马克思主义者放出的冷枪。这篇文章竭力诬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⑤。

---

①"每周评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

②"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二十三号。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十一号。

他提倡“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而反对“根本解决”①。一句话，他企图转移政治斗争目标，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叫大家去信奉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坚决反对，李大钊同志的有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就是在这时发表的，这是五四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初步交锋，标志了五四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开始。李大钊同志针对了胡适的淑世主义作了驳斥，他首先联系实际斗争来阐明“主义”的意义，然后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指出只研究具体问题必然导致：“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也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李大钊还驳斥了胡适反对解决根本问题的观点：“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坚定地相信俄国革命就是根本解决的榜样：“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复，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②由于当时理论水平的限制，这篇文章还不可能更深刻地揭露胡适的改良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性，但是它毕竟给予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以迎头痛击，坚定了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信心，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具有光辉的巨大意义。

“每周评论”自胡适接编后，虽然在政治上起了根本变化，但是军阀政府并没有马上觉察到这一变化，当刊物三十七期正在付印时，就被军阀政府封闭了。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①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十一号。

②“再论问题与主义”，三十五号。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 大 钊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拚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

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析，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

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永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像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

rry、Mignet 及 Guizot 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 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联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

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分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见。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阻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

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复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

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已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义大利共和国中，特如 Venice 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 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像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

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 Wilhelm Roux 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 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

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 Rignano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像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贡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

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反，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治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

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联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八）

我于上篇，既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 Sismondi，Saint-Simon，Proudhon，Rodbertus 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民都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 Ricardo 也曾有过类

似的观念，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像 Ricardo 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的确是唯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七

（九）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略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生产物品时支出的费用都出自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下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理：

1. 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而成，
2. 可变资本生出余值（m），
3. 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frac{m}{v}$）叫作余值率，用m′代他，
4. 因而得$\frac{m}{v}=m'$的公式，
5. 又生$m=m'v$的公式，
6. 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

内五

7. 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 （$\frac{m}{C}$）为利润率，用P'代他，

8. 从而得 $P'=\frac{m}{C}=\frac{m}{c+v}$的公式，

9. 若把m换成$m'v$又得$P'=m'\frac{v}{c}=m'\frac{v}{c+v}$的新公式，

10. 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p':m'=v:c$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P'）常比余值率（m'）小，因为可变资本（v）常比全资本（C）小（$C=c+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下：

1. 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 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 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下表：

C（全资本）		c（不变）		v（可变）	m′ 余值率	m 余 值	P′ 利润率
100	=	80	+	20	100%	20	20%
100	=	70	+	30	100%	30	30%
100	=	60	+	40	100%	40	40%
100	=	85	+	15	100%	15	15%
100	=	95	+	5	100%	5	5%

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 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 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因而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下表说明这个道理：

	资本结合比例	余值	已经消费的资本	商品的		商品卖价	利润率	价值与卖价的差
				价值	费用价格			
Ⅰ	80c+20v	20	50	90	70	92	22%	+2
Ⅱ	70c+30v	30	51	111	81	103	22%	−8
Ⅲ	60c+40v	40	51	131	91	113	22%	−18
Ⅳ	85c+15v	15	40	70	55	77	22%	+7
Ⅴ	95c+5v	5	10	20	15	37	22%	+17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Ⅰ例　不变资本80　可变资本20　合计100

Ⅱ例　不变资本70　可变资本30　合计100

Ⅲ例　不变资本60　可变资本40　合计100

Ⅳ例　不变资本85　可变资本15　合计100

Ⅴ例　不变资本95　可变资本 5　合计100

二、余值率（$\frac{m}{v}$即m′）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100%，

三、那么

Ⅰ例，对于可变资本20其100%的余值为20，

Ⅱ例，对于可变资本30其100%的余值为30，

Ⅲ例，对于可变资本40其100%的余值为40，

Ⅳ例，对于可变资本15其100%的余值为15，

Ⅴ例，对于可变资本 5其100%的余值为 5，

四、费用价格，即生产费，应该与恰足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Ⅰ例为50，Ⅱ例为51，Ⅲ例为51，Ⅳ例为40，Ⅴ例为10，

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应如下表：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Ⅰ	20	+	50	=	70
Ⅱ	30	+	51	=	81
Ⅲ	40	+	51	=	91
Ⅳ	15	+	40	=	55
Ⅴ	5	+	10	=	15

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Ⅰ 70+20=90 Ⅱ 81+30=111 Ⅲ 91+40=131 Ⅳ 55+15=70 Ⅴ 15+5=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下表：

Ⅰ	Ⅱ	Ⅲ	Ⅳ	Ⅴ
90	111	131	70	20

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列以下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资本总额　100＋100＋100＋100＋100＝500

不变资本总额　80＋70＋60＋85＋95＝390

可变资本总额　20＋30＋40＋15＋5＝110

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frac{390}{500}=78\% \qquad \frac{110}{500}=22\%$$

而余值总额为　20＋30＋40＋15＋5＝110

$$\frac{110}{500}=22\%$$

十、这22％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78c＋22V＝100，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Ⅰ 70＋22＝92　Ⅱ 81＋22＝103　Ⅲ 91＋22＝113　Ⅳ 55＋22＝77　Ⅴ 15＋22＝37

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下：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

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

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

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

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

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2－8－18＋7＋17＝0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十）

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

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程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程不同。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程各异。可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的。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2.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1.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十一）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 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Trusts与Cartels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Trusts与Cartels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

已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原载《新青年》6卷5、6号，1919年5月、11月出版）

谈　　政　　治

陈　独　秀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

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 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 's Politicsand Crowd Morality, P. 72所引。） Christensen 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挥指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战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 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tion, P. 45. 46. 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政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

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已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

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已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

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

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制裁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咀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咀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放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不大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

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 I5.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咀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的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的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 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

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掠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

（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原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

《湘江评论》介绍

“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主办的著名周刊。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共出版五期，还有“临时增刊”第一号（七月二十一日出版）八开一张。第五期没有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军阀政府全部没收了。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时，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以很大的精力来主编“湘江评论”。在“湘江评论”的“本报启事”里对创刊宗旨有着简略的说明：“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实际上刊物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一范围，起着指导和推动革命运动的作用。

“湘江评论”的每一篇文章都象一把钢刀似地刺进敌人的胸膛，它对一切统治者和反革命派在思想上宣判了死刑，它对一切守旧派敲起了丧钟。这些重要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毛泽东同志的手笔。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文章里宣传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深刻地论述了人民革命的战略观点，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同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

刊物在形式上和“每周评论”一样，四开一张，分四版，分栏也大体仿“每周评论”，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湘江评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文风新颖、笔调尖锐、通俗易懂，这是同时的其他刊物所远为不及的；它的反抗精神、斗争精神也是很突出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论文，对国际、国内大事有着明确而锐利见解的述评，短小精悍的思想杂评等。

毛泽东同志经常考虑如何吸取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的经验，来推动中国革命，他一向很关心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有深入的研究。“湘江评论”各期的“西方大事述评”和大部分“世界杂评”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在这里他以很大篇幅介绍并赞扬英、美、法、德、意各国的罢工运动，揭露了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斥责“满嘴平等正义”的克里孟梭（当时法国首相），路易乔治（当时英国首相），威尔逊（当时美国总统）不过是“一类的强盗”。他说：“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①毛泽东同志深信社会主义必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任何国家最好的出路就是社会主义。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在详细阐述和约签订的经过之后，指出德国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俄、奥、捷联合成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②；又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③。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的成功。他非常蔑视当时还有着强大的外貌的帝国主义，讽刺自以

① 第三号。

② 第二号。

③ 第二号。

为获胜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道："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按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①他风趣地意味深长地向世界统治者宣布："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②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革命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在"湘江评论"中他第一次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根本缺点作了独到的解剖："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播旗映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③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④，才使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十月革命推动了欧、亚两洲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⑤在中国，则"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⑥。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他在创刊宣言上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止"⑦，中国人民也应当觉醒起来，刻不容缓地担当起革命斗争的重任。

由于毛泽东同志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和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高度信任，更加增强了他进行革命斗争的非凡勇气。毛泽东同志这时的言论已经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的磅礴气概，他大声疾呼，号召群众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起来打倒人们心目中的"强权"、"命运"等偶象，扫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旧思想、旧习惯。他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⑧，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受压迫的结果。他鼓舞大家冲破黑暗、寻找光明的勇气，他说只要是真理，我们就应该以"日光之普天照耀，探海灯之向外扫射"⑨的精神去追求它。他要人们不要崇拜偶象，不要怕任何强权，不要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他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⑩；他指出："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⑪对资本主义腐朽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获得胜利的坚强信念正是毛泽东同志共产主义风格的最集中表现，这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在后来漫长的反

---

① 第二号。

② 创刊号。

③ 第四号。

④ 第四号。

⑤ 第四号。

⑥ 第四号。

⑦ 创刊号。

⑧ 创刊号。

⑨ 临时增刊第一号。

⑩ 创刊号。

⑪ 临时增刊第一号。

动统治黑夜里始终高高举起革命红旗领导人民胜利进军的伟大动力。这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革命气魄是值得一切革命者学习的，他在四十年前的这一教诲任何时候对我们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毛泽东同志认为有了正确方向，有了勇气还不够，必须要讲究正确的方法，才能使革命很快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清晰地指出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而到了近代，由于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压迫，使人民的痛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人民大联合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也是"通常用这种方法"去求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毛泽东同志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多数，他对于貌似强大的敌人向来是藐视的，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纵然可以借武力、金钱、知识等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人民团结起来，"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按照各个不同的阶级分别组织起来，以工人、农民的联合为基础。他说："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工人也要同样结成联合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首先组织各种产业和行业的工会，然后在这一基础上成立全国工人统一组织。妇女、教员、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也同样要组织起来。

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有着最充分的认识，因而他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结尾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对于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因素，毛泽东同志总是抱着赞助的态度去发扬它们的，当时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健学会之成立"等文章就是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放过任何灌输新思想，宣传革命机会的明证。对于任何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新的东西，他总是热情地歌颂，认为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应当"拍掌欢迎"①。

"放言"和"杂评"也是"湘江评论"中引人注目的栏目，虽然三言两语，但很切中要害，常常是针对了人们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宣传的，譬如"放言"曾驳斥反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诬蔑，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第二号的"放言"里写道："先生们得到了此项消息（即张敬尧反动政府散布的："湖南了不得了，过激党来了"），一时便手忙脚乱，好象有大祸临头的样子"，但是，"请问什么叫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么？"②第三号更为"过激党"声辩，指出被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拿出良心来和国家争回权利，从强权者索回自由的志士。湖南倘然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的。"③"放言"将"布尔什维克"通俗地

① 临时增刊第一号。
② 第三号。
③ 第三号。

解释为："这不过是要强制做工"；"不愿做事的，就让他没有饭吃，就让他饿死。"①有的文章则无情地谴责了腐朽的旧思想，讽刺那些守旧派说："一些老头子，看见了我们，总说我们是'过于新'世界上那里有'过于新'的事。说'过于新'，就是他们'过于旧'的反证。"②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但它对湖南革命运动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的，这一影响同时还波及到全国特别是华南各地。当"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同志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还专门为此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③北京"晨报"也予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④。毛泽东同志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对各方面起着深远的影响，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每周评论"认为："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⑤成都出版的"星期日"也曾登载过"民众大联合"全文，一九二〇年上海刊物上也介绍过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湘江评论"是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在湖南各地以至武汉、广东等地都有无数爱好"湘江评论"的读者。"湘江评论"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后来重新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从第二期起即改印为五千份。

"湘江评论"的巨大成功当然会引起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它被诬蔑为"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也是不足为怪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想扼杀这个代表广大人民说话的喉舌，终于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当"湘江评论"第五期正在付印时，就被张敬尧反动政府查封了。

（原载《五四期刊介绍》第一集）

---

① 第二号。

② 第二号。

③ 第三十六期。

④ "晨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⑤ "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

湘江评论创刊号（选）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创　　刊　　宣　　言

泽　　东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何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种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

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管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都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有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唉！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西方大事述评

各国的罢工风潮

泽东

法英美三国的官阀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此回各国的罢工风潮，英国因为在大战初了时候（去年十二月），英伦和苏格兰各埠交通机关，燃料业，矿山业，造船业等已演了一次大罢工。故此次罢工，未发生于英伦本土。法国罢工情形，初颇严重。终亦以小惠收场，没闹出什么好结果。广义派人有乘机在巴黎实行政治运动之说，亦未见诸事实，美国一部分电报电话人员的罢工，乃在附和议院多数派，反对加入国际联盟。与英法罢工，异其目的。意大利之罢工，乃社会党嫉恶其政府所为的一种运动。德国自去冬少数社会党大失败，各处大罢工亦随之而没得好结果。多数社会党掌握政权以来，早已噤若寒蝉，不敢出声。此次为和约签字问题，有激起罢工的形势。但施特满内阁倒了，继任巴安内阁，仍是前内阁的同调，抵御外侮不足，防备家贼有余的武力，紧握在手，谁敢予侮。广义一派的猛断政略，暂时决没有发动的机会。罢工不能成为事实，亦无足怪。匈牙利所受罢工影响不大，其原因则全在缺粮没饭吃。今将一月以来各国罢工情形，分述于下。

法国 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四日，蔓延更广，推算当有五十万人罢工。五日，洗衣工人罢工。自后罢工的人数更多。地底铁道，电车，街车的工人决议继续罢工。地底铁道工人要求工值每月至少四百五十佛朗（以每佛朗当四角合我一百八十元），满五十岁须给养老金，服役十五年后亦须给养老金若干。七日，巴黎罢工现象有转机，五金业与机器业，工人与雇主，已商妥数事。十一日，五金业及地底铁道工人上工。当道已取必要方法，对付铁道罢工。煤矿工人有全体罢工形势。十二日，国会通过矿工每日工作八时议案，但矿工会议，仍不满意，决定从十六日全体罢工。水夫联合会，也决计于十六日罢工。工人联合会，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朗。）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朽腐。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这样的政府，可要快快废止他的消耗，欺骗，和垄断。十四日，风潮渐平。极端派有乘机推翻克勒满沙强权政府的运动，路工联合会拒绝之。但矿工因解释政府每日工作八小时议案，未能满意，定十六日全体罢工。恐怕路矿运输联合会工人，也会罢工，表示同情。克勒满沙老头子急了，和运输公司及运输工人代表会商，恳请彼等在国家危急时候，发出些爱国热忱。工人吃了他的浓米汤，已老老实实决议上工了。

英国 伦敦五月三十日电，全国警察拟于三日罢工的气象，正在酝酿中，政府已允增给薪资，优加待遇，但不承认警察联合会及收用已革除的警察。英国的属地澳洲，坎拿大，苏彝士，皆有罢工风潮。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六月五日，苏彝士运河工人罢工，局势狠恶。六月九日澳洲航务罢工，势头狠烈，各项工业，都受窒碍。十×日，风潮仍严重，他业工人，因此赋闲的逐日增多。

美国 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预定十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十二日，各电报公司报告，电报司员罢工没成。

意国 六月十三日，意大利斯贝齐亚地方，因粮食昂贵，发生暴动，捣毁商店。十四日，热那亚工界示威，被捕者数百人。银行商店闭门，电车不走。杜林工人此日多停工，纪念德国斯巴达团领袖卢生保氏。米兰工人罢工，抗议热那亚与斯贝齐亚当道的行动。

德国 六月十三日，大柏林公民会议开秘密会，议决罢工。各职业及军界中人，均赞助停止各项实业工作的计划。有人料此举将促成国内战争。中等社会将得政权。

匈国 五月三十一日，匈京饥饿的工人，发生暴动。红旗军奉共产政府命令到各工厂制乱。匈京几无粮食。

东 方 大 事 述 评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

泽　　东

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新世界被捕。被捕的原因，据警厅方面的布告，系因这日晚上，有人在新世界散布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密探拘去。到警厅诘问，方知是陈氏。今录中美通信社所述什么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如下——

一、取消欧战期内一切中日秘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职务，并即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及警备总司令。

四、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组织。

五、促进南北和议。

六、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

以上六条，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上文是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我们看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处。政府将陈氏捉了，各报所载，很受虐待。北京学生全体有一个公函呈到警厅。请求释放。下面是公函的原文——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特举出二要点如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逮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想之步。

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

北京学生又有致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一电——

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忽于真日被捕，住宅亦被抄查。群情无任惶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

上海工业协会也有请求释放陈氏的电。有“以北京学潮，迁怒陈氏一人，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的话。政府尚未昏瞶到全不知外间大势，可料不久就会放出。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章行严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转达警厅，立予释放。大意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主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纲，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被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想著书立说，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遽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纲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

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说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鲁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民，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世　界　杂　评

强叫化　前月的初间，日本米价顶贵时候，每石超四十元，日当局有狼狈之状。报纸证言，粮食的危机已迫。可怜的日本！你肠将饿断，还要向施主逞强。天下那有强叫化能得多施的理。

泽　东

研究过激党 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则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过激党布遍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泽　东

实行封锁 前月巴黎高等经济会议议决，实行封锁匈牙利，说要直到匈政府宣言愿遵从民意时为止。这要分两层观察：一，协约国看错了匈政府与匈国民志愿不合。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 愿 不 合 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断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二，实行封锁，适是帮助过激主义的传播。吾恐怕协约国也会要卷入这个漩涡。果然，则这实行封锁，真是“功莫大焉”了。

泽　东

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 德国复文和会，要求德国陆军减少之后，协约国也须同减。这话谁人敢说错了？协约国满咀的平等正义，我们且看协约国以后的军备如何？就可求个证明。

泽　东

阿富汗执戈而起 一个很小的阿富汗，同一个很大的海上王英国开战，其中必有重大原因。但据英国一方面的电传，是靠不住的。土耳其要被一些虎狼分吞了。印度舍死助英，赚得一个红巾照烂给人出血的议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没得允许。印民的政治运动，是要平兵力平压。阿富汗是个回教国，兔死狐悲，那得不执戈而起？

泽　东

来因共和国是丑国 协约国要化来因流域为自己挡敌的长城，必先使之脱离德国的关系，别成一国。听说已在威萨登设立临时政府，一位道登博士做总统。这位道登博士不知果然高兴到什么样？金人立了刘豫，契丹立了石敬塘，我们中国也曾有几个这样的国呢。

泽　东

好个民族自决 波兰捷克复国，都所以制德国的死命，协约国尽力援助之，称之为“民族自决”。亚拉伯有分裂土耳其的好处，故许他半自立。犹太欲在巴力斯坦复国。因为于协约国没大关系，故不能成功。西伯利亚政府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绩，故加以正式承认。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议承认。朝鲜呼号独立，死了多少人民，乱了多少地方，和会只是不理，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真是不要脸！

泽　东

可怜的威尔逊 威尔逊在巴黎，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周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的强盗．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见的种种会议．有一天的路透电说，“威尔逊总统卒已赞成克勒满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的意见”。我看了“卒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泽　东

炸弹暴举 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贴说，“阶级战争”业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迁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

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泽　　东

不许实业专制　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剌斯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泽　　东

割地赔偿不两全　德国答复协约国，说，如失去西里细亚及萨尔煤矿，则无力履行赔偿。我料协约国听了一定很烦恼。何以故？地可割，赔偿也可得，最为两全。据德国的说，两样便成了反比例，如之何不烦恼？虽然，奉劝协约国的衮衮诸公，天下那有两全的好事！

泽　　东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　奥总代表任纳博士答复和会，说“奥国今已坐食其较前大减之资本，若再加以摧残，必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蠢哉任纳博士！你还不知道协约国一年以来之真目的，系专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吗？

泽　　东

彭斯坦　德博士彭斯坦演说曰“媾和条件，乃野蛮战争的结果。德国最宜负责。和约条件十九为必要的”。我们固然反对协约国的强迫和约，但博士这话，系专对野蛮战争而发，听了倒很爽快。

泽　　东

各国没有明伦堂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动了肝火。打电给岑、伍，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泽　　东

什么是民国所宜？康先生又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泽　　东

大略不是人　邓镕在新国会云：“尊孔不必设专官，节省经费”。张元奇云：“内务部祀礼，由茶房录事办理，次长司长不理，要设专官。”内务部的茶房录事，大略不是人。要说是人，怎样连祀孔都不行呢？我想孔老爹的官气到了这么久的年载，量也减少了一点。

泽　　东

走孔昆仑山到欧洲　张元奇又说：“什么讲求哲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尊孔逆挽潮流。”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

泽　　东

湘　江　杂　评

好计划　一个学校的同学对我说，我们学校里办事人和教习，怕我们学到了他们还未学到的新学说，将图书室闭了。外面送来的杂志新闻纸和书籍，凡是稍新一点的，都没得见。我听了为之点首叹服。他们的计划真妙！岂仅某学校？通湖南的学校，千篇一律都是联了盟似的。

泽　东

摇身一变　一些官僚式教育家，为世界的大潮卷急了，不提防就会将他们的饭盌冲破。摇身一变，把前日的烂调官腔，轻轻收拾。一些真有所感而改变的，很可佩服。一些则是假变，容易露出他们的马脚。这类人我很为他羞！很为他危！

泽　东

我们饿极了　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

泽　东

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　一个女学校里的办事人，把学生看做文契似的收藏起来，怕他们出外见识了什么邪祥。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此次惊天动地的学生潮，北京的女学生聚诉新华门。贫儿院的小女孩子，愿到监狱替男学生抵罪。这个女学校的学生，独深闭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象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

泽　东

哈哈！　青岛问题发生，湖南学生大激动，新剧演说，一时风行。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一位老先生，因为他的儿子化装演剧，气得了不得。走到学校问先生，开口便说，"我的命运如何这么乖？养大的儿子竟做出那么下流事！"我听了这话，忍不住扑的一声，哈哈！

泽　东

女子革命军　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什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黥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泽　东

湘江评论第二号（选）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西方大事述评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

泽　东

签约之前　败而不屈的德意志的代表蓝超等于（五月初旬）到巴黎，（五月七日）在凡尔赛宫举行很庄严的和约交付礼。德代表的态度很倨傲，克勒满沙站起声述其开会词。德总代表蓝超，则坐诵其如下之演说词——

德国军事破裂，德国失败的程度已自明白。但这回欧战负责的不仅德国，全欧都与有罪。因五十年以来，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实贻毒于国际局势，德国战中的罪行，固不可讳，战事的时候，人民的天良，为感情所蔽，故有罪行。然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德国没与战事的人，多死于封锁的影响，协约国亦冷淡视之。威总统十四条大纲，为全世界所赞助，协约国业已声明依照此项大纲而立和约，那么，德国当不至于全没救护。国际同盟，各国都应加入，不能将德国丢在外边。德国愿以好意的精神，研究和约……

和约为灰黄色布面一大册，和会的秘书长杜斯玛捧了交到蓝超手中。蓝超回到寓舍，晚餐的时候默无一言。晚餐毕，即使人翻译和约，于晨间三点译成，送到蓝超寝室。蓝超看到天明方毕。另外录出几份，派专差送到柏林。八日德内阁会议许久，内阁总理施特满，向考虑和约委员会演说——

和约条件，简直是宣告德国死刑。政府必以政治的沉静态度，讨论这可厌而狂妄的公文……随将和约条件，电告各联邦政府，请他们表示意见。因为感受很深的痛苦，特命公众停止行乐一星期。仅许剧院演唱和这日痛苦极度相同的悲剧。股票交易所，因感受痛苦的印象，停闭三日。各界人士听得和约会要签字，皆为作怒，群相讨论拒绝签字的后患，甚至没有一人想到或可受纳此项条件的。柏林各报一致评诋。有的说："和约的苛刻，远过最消极的预料，这系狂暴无智识的制品，若不能修改，只有用'否'字答他。"有的说："我们如签定这约，实是屈于武力。我们的心中，应坚决拒绝"。惟独立社会党的机关报，则主张签约说："从经验看来，拒绝徒增后患。"

这时候最可注意的，是德国政党的态度。多数社会党的政府派，是不主张签字的。民治党和中央党也是这样。只有独立社会党不然。（十二日）独立社会党通过决议案，主张接受和约，并说"德现政府恢复黩武主义的行为，使别人坚其对德的疑惧。德国会屈于强迫签字，没有办法。俄德和约，及德罗和约，均没多久的寿命就取消了。凡尔赛和约，也未尝不可以革命的

发展取消他”。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和约，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不提和议。明目张胆的对抗协约国，协约国至今未如之何。倘使去冬德国广义派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成了功，则东联俄而南结奥，更联合匈牙利和捷克，广播其世界革命主义，或竟使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协约国政府还食得下咽吗？独立社会党和广义派社会党，本是一党而分为二，他的议论如此，本不足怪，用革命的发展取消和约，这话正不要轻看呢。同日德国会讨论媾和条件。施特满演说——

今日为德国人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除谋使国家生存，无旁的责任！德国不图进行其国家主义的梦想。并没争荣夺权的问题，于今人人的喉咙中间都觉有手塞住他的呼吸！人类的尊严，现付于诸君的手里以保持他！

（十四日）蓝超致克勒满沙一个牒文，内容的大要如下：

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款，是使德国失去甚关重要的生产土地，谷和薯芋的收成，将减百分之二十一，煤减三分之一，铁减四分之三，锌减五分之三，德国既因失去殖民地和商船，使经济成了麻木不仁。今又不能得充分的原料，势将被毁到极大的程度。同时输入的粮食必将大减。依赖航务和商业为生的数百万人，德政府不能将工事和粮食供给他们，在势不得不到国外求生，而重要的国家多禁止德国移民入境。故签定和约，不啻向数百万德人宣告死刑。

蓝超于上述的牒文之外，更以牒文两通致克勒满沙，第一通的大要说：“协约国占德土地，和威总统宣布的主义不合”。第二通的乃关于赔偿条款提出抗议。谓“德国愿赔偿，但不是因为负了战争责任的原故”。我们看德国的抗议，大要注重（一）不独负战争责任。（二）不愿失去原料所从出的土地。其他各项，虽有抗议，但不是最重要的处所。

（十三日）晚上，柏林有大举示威，多数社会党于示威时起坛演说谓，“和约条件，较罗马施于加萨臣的尤为刻毒而可羞。”群众游行各街，止于协约委员团所住的亚特伦旅馆前面。有人向众演说，其势汹汹。欲攻旅馆。为警察所阻。到内阁总理屋前，施特满氏临窗演说。又有人民一大队，于薄暮时候，唱歌到亚特伦旅馆大呼“推翻强暴的和局。与克勒满沙偕亡，与英伦偕亡”。众又到施特满处请他演说，施氏讲到威尔逊总统十四大纲时，众忽大呼“与威尔逊偕亡”。这日柏林和乡间独立社会党开会，有四十处。

（十九日）柏林某报载有社会党领袖彭斯坦博士的演说，谓：“非常苛刻的和约条件，非完全出于激怒与仇念。实德国政策既不能见信于人，则当然受此待遇。一切破坏，咎在德国。德国之履行各项要求，不过补偿他们前所夺于人的而已。我很不以一般人士所发激烈的演说为然。告诉他们，不可再具1914年8月4日的气焰。”这于德国热烈的反对声中，算是一瓢凉水。

（二十日）蓝超致书和会，要求改正审查及讨论和约的期限。

（二十二日）克勒满沙复书，允许展长期限至5月29日为止。

（二十三日）晚德全权大使启程往斯巴，将和来自柏林的阁员数人会晤，决定一切。

（二十四日）斯希特芒、欧士白格，从柏林乘车到斯巴，蓝超及委员十六人也到，即开一极长的会议，斯希特芒主席，通过德国的反提案。会毕政府委员回柏林，蓝超等回凡尔塞。

（五月二十七）德国有答案交付和会。答案的第一部分，要点如下——

1、德国承认减少军队到十万人。

2、交出巨大的军舰，而保留商船。

3、反对关于东边土地的决定。要求于东普鲁士民中，举行庶民大会。

4、承认丹齐为自由口岸。

5、要求协约国在签字四个月后，撤退军队。

6、要求加入国际同盟。

7、坚欲取得代管殖民地的权利。

8、赔偿总数，不得过十万兆马克。

9、拒绝引渡凯撒，及其他人物。

10、德国须有重行经商海外的权利。

德国答案的第二部分，亦有如下的要点：

1、在过渡时代，须维持大军，以保治安。

2、须许德人开公民大会，讨论土地割让问题；并许奥人以加入德国的便利。

3、拒绝割让西利细亚上部。

4、不承认俄国有索取赔偿的权利。

5、无赔偿意、门、罗、波兰等国的义务。

右之德国答案，四大国代表为长久的讨论后，提出答复文，将德国所约议的，逐件驳复。全文很长。不外说德国战争责任万难推诿。德国必须尽其能力赔偿损失。必须交出戎首，和战时行暴的人，用法惩治，必须于数年内受特别的约束。凡协约国所持以构成和约的根本主义，万难更易。惟对于德国的实际建议，可以让步云云。

(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又因德代表的请求，屡次展缓签约日期，最后允展至六月二十八日为止。六月前半月的光阴，全为着往复反议事占去。

至（六月十八日）德代表团，乃由法京回德，一致告诫德内阁，拒绝签约。德内阁乃准备在韦玛召集国会，取决此重大问题。此时协约方面，早作军事预备。一俟德国有不签字的表示，即行进军。德国已处于不能不签字的情势了。

（六月二十二日）协约国对德的"最后复文"于这日送达德代表，限德国以五日承受和约。"最后复文"内，述可以让步的条件如下——

1、西里西亚上部，施行民众投票。

2、西普鲁士边界，重行划定。

3、德军暂增至二十万人。

4、德国宣布愿于一个月内将被控破坏战时法律的人的名单开出。

5、修正关于财政问题的细则。

6、以德国履行义务为条件，保证德国为将来国际同盟的一员。

施特满内阁知和约不能再有挽回，遂决计引退。

（二十二日）德新内阁组织成立，国务总理巴安氏，外交穆勒氏，财政欧士白格氏，内务达维特氏，陆军拿斯可氏，殖民贝尔氏，邮电格莱斯勃资氏，劳动森士南氏，工程斯利奇氏，公众经济惠塞尔氏，国库夏勒氏，粮食斯密氏。巴安氏及诸阁员，多属多数社会党，本系前内阁的同调，在这回外交紧急声中，出当此签定和约的难局。新内阁既成，已可决其是预备签约的了。施特满退职，施特满内阁所委任的媾和代表，当然随着退职，于是德国议和代表团易人。新代表团即以新内阁中的外交总长穆勒、邮电总长格莱斯勃资等组织而成。

此时国会业已在韦玛召集，巴安氏即赴国会，作很沉痛的演说。极言加入新政府的痛苦，恳请国会确立主张。否则战事将复发作。巴安氏曰，"我特于自由的日尔曼最后一次，起抗此强

暴破坏的和约！起抗此自决权利的假面具！起抗此奴隶德人的手段！起抗此妨害世界和平的新器！”国会乃于“反对”、“赞成”的喧哗声中，通过签约动议。

签约的动议通过，二十三日巴安再赴国会，申述无条件签约的必要，其演词谓：“战败的国家，身魂受世界的凌辱！吾人姑且签定和约。吾人一息尚存，终望损害吾人荣誉的人，有一人身受报应！”这时候右党提出抗议，乃付表决，结果证实准许签约。议长弗里巴赍氏起立发短简的演说：“以不幸的祖国，委托于慈悲的上帝！”且谓“各党领袖，允宜告军界，全国希望海陆军树克己牺牲的模范，辅助劳工，重造祖国！”关系全世界安危的德国签字，在一场非常惨痛的演说声中，完全决定。德意志人的大纪念，有史以来，当没有过于这日了！

签字案既经国会通过，德新代表团乃到巴黎致“允可签约的牒文”于和会。牒文的大要说：

“日耳曼民国政府，知协约国决计以武力强迫日耳曼承受和约，此项条件，虽没有重大的意味，然实志在剥夺日耳曼人民的荣誉，日耳曼政府虽屈服于优势的武力。但关于从古未闻离背公道的和约条件，仍不放弃其意见！今将宣布愿受纳协和国所施的条件。”

右文既布，各国的欢忭自不可言。至二十八日，而最后展缓的满期已到。于是凡尔塞宫中，乃有亘古未闻的大签约一举。

签约之际 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五分，凡尔塞宫中开会，在镜宫中设高坛，甚为庄严。协约国全权代表首先会集，次为德国全权代表，只到外交总长穆勒，和交通总长斐尔，其余均不愿到。克勒满沙主席，首发短简宣言，谓“协约国和共同作战国政府，均赞成媾和条件，今加签字，表示彼等忠诚依守庄严的了解”。继乃请日耳曼民国代表首先签字。德代表所坐的席次，忽发大声“德意志！德意志！”克勒满沙于是乃改称“德意志”。德代表即起立在约上签名，斐尔氏首先签之，时为午时三时十二分，园中喷泉四射，炮声大作，当德代表回到坐处的时候，全场皆露喜容。次为美国签字，次为英国签字，次为法国签字，次为意国签字，次为日本签字，最后签约的为捷克斯拉夫民国。三时三十五分签字完毕，克勒满沙氏宣布散会。

签约之后 当德国国会允许签约的消息传布，德国全国即有爱国的示威运动。群众列队唱战歌、国歌，欢呼致敬于年老的统兵员。各报对于裁判德皇问题，表示极大的忿怒。有一报恳请一九一四年的陆军军官，表示如德皇受裁判，也愿受协约国的裁判。并请组织团体或须入荷兰，保护德皇。各地暴动罢工情事，接续而起。及（二十八日）和约签字的消息传到柏林。柏林某报即载出一文，谓“德人终必报一九一九年的耻辱！”为政府禁止发行。（二十九日）各报皆有“黑线”表示哀痛。各报皆载有极悲观的评论。柏林及各地铁路工人及电车工人罢工，柏林城里的运输机关全停。亨堡等处出了乱子。全国的罢工，有扩张形势。

评论 我叙签约，我单叙德国的签约，我叙德国签约，单注重其国民精神上所感痛苦的一点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回和约，除却国际同盟，全是对付德国的。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刚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做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我们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黩武，滥用强权，一面仍不免要向他

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德国的民族，他们败了就止了。象这样的屈辱条件，他们也忍苦承受。他们第一次翻转面目，已从帝国变成了民国。他们第二次翻转，或竟将民国都不要了，这话我殊敢下一个粗疏的断定。我们且看挡在西方的英法，不是他们的仇敌吗？英法是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好友，不就是屏障东方和南方的俄奥匈捷和波兰吗？他们不向俄奥匈捷等国连络，还向何处？他们要同俄奥匈捷连络，必要改从和俄奥匈捷相同的制度。俄奥的社会革命成了功，不用说，匈捷也有此趋势，前日电传说捷克已经成了劳兵民国了。德国广义派斯巴达团，去年冬天的猛断举动，和成功仅仅相差一间。爱倍尔政府成立，多数社会党握权，所持以制服广义派的，全是几个兵，几杆枪。和约成功，兵是会要解散了，枪是会要缴出了。那时候政府还持着甚么？德国工商业的大毁败，要重造起来，不得不仰赖出力的劳动者。以后政府所应做的大事，就是向劳动者多多的磕头。而广义派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劳动者，故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捷联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

然则这回的和约，“其能五稔”，尚靠不定，如有真以“德俄和约”，“德罗和约”的例来推测，恐怕就是早晚的问题。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

世界杂评

高兴和沉痛　克勒满沙在办公室接得德国接受和约的电话，高兴了不得，站起身来，和在办公室的阁员及同僚握手，说，“诸君！我之静候这一分钟，已四十九年了！”这话何等高兴。虽然，不第高兴，又含有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威廉第一和俾士马克，高踞凡尔塞，接受法国屈服牒文的时候，何等高兴，结果遂酿成此次的战争。虽然威廉第一，俾士马克，不第高兴，又含有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拿破仑蹂躏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称藩纳聘，拿破仑何等高兴，结果遂酿成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的战争。虽然，拿破仑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德奥为巨擘的神圣同盟军，深恶法国的民权自由，几度蹂法境，围巴黎，结果遂崛起拿破仑，而有蹂躏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

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泽　东

卡尔和溥仪　奥前皇卡尔避居瑞士，某报通信记者求见，见其侍臣，侍臣说，“皇帝的退位，本非得已，故愿望恢复帝制，惟目下暂时隐居，不问政治。”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西洋人做事，喜欢彻底，历史上处死国王的事实颇多。英人之处死沙尔一世（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法人之处死路易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俄人之处死尼古拉斯第二（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都以为不这样不足以绝祸根。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利拿，今威廉第二亦拟请他做拿破仑的后身，将受协约国的裁判，总算很便宜的。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泽　东

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选）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湘 江 大 事 述 评

健 学 会 之 成 立 及 进 行

泽　　东

健学会以前的湖南思想界　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丛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冲云彻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思想变了。那时候的思想是怎样的一种思想？那时候思想界的中心，是在怎样的一点？此问不可不先答于下——

（一）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么“讲求西学”，什么“虚心考察”，都不外“学他到手还以奉敬”的办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

（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三）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

（四）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

上面所举，全中国都有此情形，湖南在此情形的中间，占一位置。所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底的变化。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

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

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颇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韵尚未尽歇。不过书院为学校占去，学生为科学吸去，他们便也淹没在社会的底面了。推原新学之所以没有风气，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确立，则有以下的数个原因：（一）没有性质纯粹的学会，（二）没有大学，（三）在西洋留学的很少，有亦为着吃饭问题和虚荣心理，竟趋于"学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续研究其专门之学。在东洋留学的，被黄兴吸去做政治运动，（四）政治纷乱，没有研究的宁日。这是湖南新学界中心思想不能确立的原故。即是没有学风原故。辛亥以来，滥竽教育的，大都市侩一流。呈其一知半解的见解，造成非驴非马的局势。中心思想，新学风气，更是不可能谈及了。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浸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健学会之成立 六月五日，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君邀集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朱钊帆、汤松、蔡湘、钟国陶、杨树达、李雪杭、向绍轩、彭国钧、方克刚、欧阳鼎、何炳麟、李景侨、赵翌等，发起健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今录某报所载陈润霖君报告组织学会的意旨于下——

兄弟前次到京，偶有感触，深抱乐观。缘四年前，北京大学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目的。非独大学为然，即大学以外之学生，亦莫不皆然。前次居京，所见迥然不同。大学学生思潮大变，皆知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其思潮已多表露于各种杂志日刊中。因之京师各校学生，亦顿改旧观，发生此次救国大运动。其致此之故，则因蔡孑民先生自为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或误认学生救国运动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实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即如日本政府，从来对于提倡社会党人，苛待残杀，不遗余力，而近日竟许社会党人活动。如吉野博士等，则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以和缓过激主义，顺应世界之趋势，从容将日本政体改变为美国式虚君制。于此可知世界思潮政变之速，势力之大矣。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终难久事过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

这日开会听说尚有朱剑帆君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向绍轩君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说。在湖南思想界，不可不谓为空前的创闻。今录出该会所发表的会则如下——

（一）本会由同志组合，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

（二）本会定名为健学会。

（三）会所暂定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四）入会者须确有研究学术之志愿，经本会会友一人以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

（五）关于输入新思潮之方法——

（1）凡最近出版之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以供会员阅览。会员所藏书报，得借给本

会会员阅览。其有愿捐入本会者，本会尤为欢迎。

（2）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

（3）介绍名人谈话。

（六）关于研究之方法——

（1）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

（2）重要之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

（3）会员有愿习外国语者，由本会会友传授。

（七）关于传播之方法——

（1）讲演，分定期、临时二种。定期讲演，每周日曜日午前八时至十时，由会友轮流担任讲员及演题，均于前周日曜日决定，讲友须预备讲稿，交由本会汇刊。临时讲演，凡有重要演题，或由会友，或请名人讲演。另觅地点，择期举行。

（2）出版。

（八）本会设会计，管理图书各一人。其他会务由会友共同负责。每次开会，推会友一人临时主席。

（九）会友应守之公约如左——

（1）确守时间。

（2）富于研究的精神。

（3）学问上之互助。

（4）自由讨论学术。

（5）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

（十）会员年纳二元以上之会金，有能特别筹助经费者，本会极为欢迎。

（十一）本会遇有重要事项，必须讨论时，得于定期讲演后，临时通告全体，举行会议。

会则中的（五）、（六）、（七）、（九），极为重要，（九）之富于研究的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立意很好。尚望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继之以“批评”的精神。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愿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九）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健学会之进行　健学会进行事项，会则所定大要系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现在注重于研究一面，闻已派人到京沪各处，采买书籍新闻纸和杂志。在省城设一英语学习班，使会员学习英语，为直接研究西方学术的预备，有年在四五十的会员，都喜欢学习。又设一演讲会，

由会员轮流发表意见，实行知识的交换。官气十足的先生们，忽然屈尊降贵虚心研究起来。虽然旁人尚有不满意的处所，以为官气还有十分五六，演讲亦多采用命令式和训话式。更有谓他们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象这样的求全责备，我以为可以不必。在这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囚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在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看他们四次讲演的问题，如"国人误谬的生死观""怎样做人""教育和白话文""采用杜威教育主义"，都可谓能得其要。倘能尽脱习气采用公开讲演，尽人都可去听，则传播之快，得益大之，当有不可计量的了。

法国通信

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形

五月七日，由伦敦寄上一书，想已接到。弟在英勾留五日，即过海来法。五月十日抵巴黎，晤肖君子升，刘君庆勋（二君都住在李石曾家）。十二日赴蒙达尔尼（Montargis），入该地的一个小学校，前天已开始上课矣。我此次旅欧，计坐船一星期，自上海到巴黎，共五十日。沿途虽说好看，而以路途如是之遥，也不免稍觉疲倦。幸未得病，尚可喜也。法国找工作一事，李石曾先生报告，各工厂因战争时候改为军工厂，现欲恢复战前原状，很不容易。到各工厂交涉，皆因手续尚未弄清，或有原料尚未到者，然法人颇欢迎华人来法，有几个工厂约李先生于三个月后开工时，即聘用华人，希望稍为等等。所以李先生要我们暂为学些法语。我等九十一人，有十六人进了木兰的公学。五十一人进了此间学校。亦有二十多人没有带一个钱的，只暂为找些下等劳苦工作。俟三月后，寻找工厂。总之勤工俭学一事，无论何人何地，都可做得，无非是要吃些辛苦罢了。汪精卫君由美来法，于五月十二日，在华法教育会报告中国人在美国工读会的情形甚详。是日李先生演说，则谓此地人士之以工求学者很多。可见此事在欧美本极普通的一桩事。兄弟想做，就在湖南做起也可行得，并非定要留美留法，才算是勤工俭学哩。但做此事，我亦有数事相告：（一）要不浪费。我以前喜欢用钱，现在怕起来了，用一文钱，也须得特别想想。我以为要不浪费，就是不做半文钱的应酬，不买半文钱的零碎食物。要买的只是日用品和衣服。（二）生活要简单。我在伦敦时，住在旅馆里，每日至少要用半磅，大家都很惊奇。只因英政府故意留难，要什么护照，不然，就是十倍伦敦的好看，也不敢久看。后到巴黎，我住在李先生家，每日吃几块面包，几十个生的就可以生活一日。现在学校，早晨只有面包一小块，和咖啡一杯。中晚饭稍稍好点，也有一定限量，三餐合起，尚不及中国一餐的多。却也可过得日子。并且西人身体，反较强壮，吃多有何益咧。诸兄对于上列两条如能行得，就可将剩下的钱读书，不做工也可以。我今再述我们学校的情形。我校共分九班，九年毕业。毕业后可入大学本科。高年级有胡子，初年级是顶细的孩子。我们则另开法文专班。原有之班，亦可随意上课。每月学膳洗衣剃头被服等，一切只百二十佛朗，便宜算是到了极点。此校与中国人感情很好，与李先生更好。中国留法学生，十九都是预先在此校学习法文，现亦有中国学生三人。其教授异常得法，一点

钟可当中国一礼拜。以上是我校的大略情形。刘君庆勋至此间，做工三年，已剩下几千佛朗，法文法语，都弄好了。如此看来，勤工俭学并不单是理想很难的事，是实际上极寻常极容易的事。我们学师范的人，多是没钱的，只好勤工俭学呀！诸兄毕业了，去当教员，就是做工。做工剩下的钱，就可以再读书，诸兄如以为然，请试试如何。诸兄寄我的信，我极欢迎，当一概回复。寄我的相片及他纪念物，更是感激不置。写信只求灵通消息，不必咬文嚼字，耽搁日子，有话拿笔就写，诸兄承认这个条件么？……来信由肖子升君转，或华法教育会都可。肖子升君的住址如下——

Mr. S.T.Shiao 1s bis Bolevard Bourdon Nevilly Seine, France

易利宾
一九一九，五月十七日
由法国蒙达尔尼

对于救国运动的公言

北京七校长呈政府文云 惟学生在外犯法，与在校内犯规，情形不同。其惩处，当有分别。学生违反学校规程，自应由学校惩处，若违反国家法律，尽可依法惩办。学生与学校截然二事。学生犯法，不能罪及学校。况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今以军警包围学校，似非正当办法。

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云 我们犯的究竟是什么罪？我们平日在学校里，教师总叫我们爱国。今天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来做一点爱国的事情，未必这便是我们的罪？……若是这狠的警察，这狠的保安队，能够替我们向日本争青岛，他便打死我们，亦所甘心。只是他们除了对于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诬以扰乱秩序，将我们痛打以外，看了外国人，哼亦不敢哼一句……好在中国既有这样能干的警察同保安队，本用不着什么学生。我们现在同警察们磕一百个头，难道你们这些大爷的鸿慈，放我们一条生路，让我们改过自新，好与你们同去做了日本的奴隶。什么叫做杜杰所领的保安队，实在会用他的刺刀同枪背，撞着没有不吐血断骨的。这真了不起；日本人看了，当然要钦佩非常。有日本人钦佩，这也算是伟人了！少陪了！请你们与我们转达官厅，若是不改变办法，索兴请他贴过告示，写明“禁止爱国，违者重惩。”免得一般象我们的糊涂虫，当真爱起国来，又要累官厅生气。

（待续）

湘江评论第三号（选）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世　界　杂　评

畏德如虎的法兰西　法国于德国畏惧他如虎狼。德国这么大败，法国尚畏惧的很。割萨尔煤矿。划来因左岸独立。毁希里哥伦炮台。助波兰独立以蹙其东陲。助捷克独立以阻其南出。日耳曼奥地利欲并归德国，则不惜破坏民族自决主义，多方以妨之。殖民地，陆海天空军备，则多方以削之。商船亦须交出大部，以阻其海外贸易之恢复。这样也算够了，还不止此。又向英美两国请求保证。前日电传，威尔逊允于离法以前，签定一约。保证将来法国如受攻击，美国当起而援助。劳合乔治亦以美国名义，签定一同一性质的条约。此意何等深刻！何等惨谈！借非法国有不可告人的大缺点，何至有这样的畏惧。法兰西民族素负豪气，何至竟象妇人孺子斤斤乞人保护。我觉得这不是法兰西的好现象。

泽　东

和约的内容　斯末资将军说："我之签定和约，非因和约乃满意的文件。为结束战争起见，不得不签定他。"又说："新生活，人类大主义的胜利，人民趋向于新国际制度和优善世界，所抱如此期望的践行，象这样的约言，均没有载上和约。于今只有国民心腔里所发义侠和人道的新真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困难而止的问题"。又说："我很以和会里取消黩武主义，仅限于敌国为恨"。斯末资是英国一个武人，是手签和约的一个人，他于签约后所发议论是这样，我们就可想见那和约的内容。

泽　东

日德密约　巴黎的路透电说："近今外间又有日德密约的谣传。"密约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妄人想发现于今后的国际间么？日德密约更是什么东西？日俄密约，为列宁政府宣布了，不但没成反丢了脸一大块。日英法密约成了，我们的山东就要危险。什么日德密约，前年也谣传了多次。据说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德国允许日本自由处置荷兰的殖民地，瓜哇、苏门答腊在内，为英政府听见，告诉了荷兰，阴谋方止。我们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德国的爱倍尔政府不革命，奸夫和淫妇，还未拆开，危险正多呢。

泽　东

政治家　斯末资云："惟人民的新真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因难而止的问题。"人民的真意，和政治家的见解，何以这么不相同？政治家何以这么畏难？人民何以这么不畏难？

这里面果有一层解说么？我自来疑惑所谓“政治家”，怕莫不是一种好东西？我于今真得了证据。巴黎和约签定后，路易乔治回到英国，在下院演说道：“我们英国得到许多成功。是我们伟大国民团结兴奋的效力。我们于今欢欣鼓舞，但不要存着祸患业已过去的妄念。已使我们获胜的精神，仍要保持，以应付将来事件。我们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相争”。这就是政治家的大本领。这就是政治家的大魔力。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相争，就是说道，你们人民不要拿着生活痛苦，国民真意，种种无聊问题，和我们政府为难。那些问题都小，都不关痛痒。将来寻着事端，我们还要和别国打仗。爱国、兴奋、团结、对外，是最重要没有的。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

泽　东

湘　江　杂　评

不信科学便死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泽　东

死鼠　鼠是瘟疫发生的一个原因，长沙城里到处看见死鼠。张眼望警察，警察却站在死鼠的旁边。早几年的长沙城，却没看见这个样子。警察先生们！还是请你们注点意。

泽　东

湘江评论第四号（选）

（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湘 江 大 事 述 评

本 会 总 记

本会经过情形，亟待纪载。而记者耳目有限，所知不多，这篇所载，容有不实不尽的地方。尚望熟悉情形者，多惠材料，于所载出者，则赐以纠弹。本会幸甚。

记者识。

本会成立以前的湖南学生界 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竟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陈宝箴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学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伙烧了。于是而时务学堂倒了。

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在此时间，各种官立学堂象求忠中学，优级师范，高等学堂等，已开设了许多。私立的象周南、楚怡，及各县驻省学堂，更设立不少。官立学校，不消说是官气十足。什么“监督”，“监学”，头上红顶花翎，身上马蹄补服，脚下寸底官靴，遇着“初一”“十五”，便率领学生（长衣马挂）用三跪九叩首礼先拜“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次拜“至圣先师”。学校的中堂，照例高悬一块大牌，上面写着“一曰尚忠二曰尚实三曰尊孔……”的“圣谕”，金碧辉煌，真好看得了不得！每天吃饭，学生须穿长衣，若在六月里火热的天气，参观他们吃饭，又真是好看的了不得。学生毕了业，“报子”便向这学堂的“庶务先生”，或是“门公老爷”关说，用簿抄出一大批毕业生的姓名，住址，急忙制就许多的“报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陆军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抚部院某，会同湖南提学使司某，湖南官立某学堂监督某，考得某府少老爷某，超等第一名，捷报高升”字样。兴头十足，跑下乡间，打躬作揖的挂在一位毕业生家里的正堂壁上。这位毕业生一家子喜气洋洋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看看红底、白边、花纹、金字，真是欢喜的了不得。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若家里没 轿，便要新制），红顶帽、马蹄衣（多半新制），轿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

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

于腐气熏蒸的学生界中仍要寻出他们的朝气勇气活泼气，则除着一班官僚教习和官僚办事人之外，有多少学生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密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这两样东西，本是禁物，却不胫而走的从日本到了湖南。同时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禹之谟，还在长沙暗地里从事种种运动，直到甲辰狱兴，萍醴失败，马福益在浏阳门外枭了首，打扮洋人乘着小轿的黄兴，才从小西门出城逃去。然而湖南士气，却愈压愈振，在这时候，禹之谟乃独为湖南学生界的首领，于是乎发生了下面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陈天华，姚宏业者，一个是安化学生，一个是益阳学生，同在日本，于归途的中间，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湖南学生得报，灵柩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麻木不仁的湖南巡抚喻廉三及提学使某，正想借着革命党和学生的血将他们的顶子染得更红，固执不准。这边要求无效，便采用“自动主义”，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一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那敢张声，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乎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但官府既怀恨在心，过了些时，便借着问题将禹之谟杀了！接着便又将陈姚掘了。

湖南学生界，于“义葬陈姚”而后，可纪的事，就算宣统二年五月，省城各学校全体学生的运动大会——

原来学生之开运动会，我们也见惯了，有什么可纪的处所？可是在宣统二年的运动会，却有不同。即这一次的运动会，实含有“示威”的意思，和“革命”的色彩。当时官厅也很害怕，提学使吴某尤怕的很。倡议的人，借着国势危亡外侮紧急的话头，多方鼓吹，才得实行。运动的场所，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军操演的一块大坪。全体学生，严队发动。乘着晓风吹凉，朝阳吐丽，做出了多少运动。最足令人留着印象的，就是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悲壮声音。这曲忘为谁某所作，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学们犹念着不辍。我今将他记在下面——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所谓“军国精神”是这时候教育的主旨，亦即学生所抱以求学的主旨。这种主旨，一面为着对外，一面则为着推倒满清。果尔，武汉一呼，湖湘首应，南彼海桥，北暨幽燕，不出四月时间，响应遍于十七行省，独夫摧翻，民国建立，教育之功，学生之力，不能不谓为诸种原因中的一个原因也。

于此且一述宣统三年五月至八月末革命前湖南学生界的运动，即铁路国有问题的反抗运动——

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昏愦的清廷，信着盛宣怀的计划，不识时宜，将全国主要铁路，收归国有。（记者按，铁路应归国有，清廷此举，乃发非其时）川粤汉铁路在内。四川首起争之，形势殊急。继起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儒无知的湖南巡抚扬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记者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面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的主张革命，

还记得演说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衣卸着一丢，说，“快习兵操，预备打仗。”一天晚上，忽然听得一片唤声，多人从被里出来，才知道这夜我们学校和旁的学校的代表，在某处秘密会议，被军警捉将官里去了。多人说，一定会要枪毙。我们的校长，慌慌张张伸出一丈二尺长的舌子连连说：“了不得”，即时邀同别校的校长向官里讨保。等到天亮，方保了出来；我们才欢天喜地的又进被窝睡觉。这一次的乱子，闹的真大。一直到八月十九，湖北独立，九月初一，湖南响应，才撇开衬笔，归到正题，于是乎我们湖南发现了学生军。

我今进纪湖南的学生军。

（未完）

特　　载

本　会　呈　省　长　文

七月三十日

呈为恳请惩办地痞，恢复报馆事。此次青岛问题发出，全国学生以及各公共团体，不惜牺牲一切，大声疾呼，唤醒国民，共救危亡。我湖南学生一致进行，本爱国之愚忱，闻救亡之微旨，数月于兹，成效渐著。方异积极进行，并望南北速和，一致对外，不料帝制余孽，安福旧党，只图私人权利，不惜谋施，巧言簧鼓，蒙蔽钧座，致去冬部令停办之非法选举，死灰复燃，竟有初选复选之事。敝会以和议尚未续开，湘省更未统一，即以新旧国会去留而论，尚须付之议案，当局颇费磋商，和议因之久顿。乃于此风雨飘摇之时，忽产生非法选举岂独于和议前途有碍，良亦盛德之累也。学生等久为钧座忧之。方拟发表意见，陈明左右，适地痞辜天保，黄中，李藩西等，有伪造民意假教育会开伪公民大会之事。敝会以彼辈居心叵测，事关重大，略派代表赴会。维时军警林立，内外包围，首由辜黄登台，痛诋湘人之反对非法选举，敝会会长彭蔽及代表丘维扬，代表全体学生，发挥真正民意。即被辜黄等嗾使兵丁逮捕，声言枪毙。经莅会弹压之张团长解说，始免于难。钧座对于此次学生等之举动，本极赞成，多方维持，敝会实深感激。而地痞辜天保、黄中、李藩西等，甘为祸首，目无湘人，蒙蔽钧座，侮辱学生。此敝会所以略陈情由，恳请从严惩办地痞，以儆效尤者也。又敝会犹有不解钧座之意者，大公报为我湖南真正民意之言论机关，久为省内外人士之所称许。乃竟以登载各公团联合会反对非法选举之宣言书，立予封禁，拘逮编辑，迄今日久，尚未开释。学生等以为非出自钧座之意，不日即告结局，故久未呈述意见。无论该报宣言书有各公团负责，而全省人民反对选举，异口同声。惟钧座因势利导，宣之使达，则湘人戴德于无既；不然共和国体，言论自由，况封禁夙负声望之报，外间不察，适以广播政府禁锢言论自由之名，防口甚于防川，扬汤何能止沸。钧座明见万里，乃竟不以为然耶。今幸钧座采舆情，缓办选举，而大公报编辑，独未蒙开释，致该报久事停顿，群情徨恐，莫知所措，此敝会所以呈请钧座俯顺舆情，开释编辑，恢复报馆者也。久仰钧座恶恶如寇，从善若流，所请恢复报馆惩办地痞之处，一片血忱，万望察照，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湖南督军兼省长张。

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

（一）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阶

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拿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已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二）

以小联合为基础

毛泽东

上一回的本报，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

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图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唉！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娱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经堕在苦海，我们要讲求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扈——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便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

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说了！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合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象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

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三）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毛　泽　东

上两回的本报，已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

么力？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朘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问我直答之曰"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咨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象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旅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寰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银行公会，米业公会……)，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各种俱乐部……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很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增加了觉悟，

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商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

上海的五十三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碎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原载《湘江评论》2号、3号、4号，1919年出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介绍

“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发起，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的。这是五四时期最早和起作用最大的社团之一，是一个战斗性的革命组织，它在五四运动和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实际上起了领导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作用，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先锋。

“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因而学会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研究新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经常集会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一九一九年有一部分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后，就用互相通信的办法彼此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为了交流情况，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特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初会员之间有关改造中国和世界，会员的思想、出路，新民学会的方针等重要通信，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上了醒目的标题和按语。“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及部分会外“爱看者”。

第一集共十三封信，其中毛泽东同志的信有三封。第二集共三十封，其中毛泽东同志的信有七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颇广，包括国际国内大事，人生观、宇宙观的讨论，哲学思潮直到新民学会会务，勤工俭学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七封信，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记载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早期革命思想和活动，反映了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它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最初阶段，因此它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前史和伟大革命领袖们的传记的最好材料，是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文献。

“新民学会”和五四时期一般社团的区别是，从它成立的时候起，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要把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团体，以便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同志等在组织上、理论上以及思想教育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他们非常重视吸收学会会员的工作，严格地规定了加入“新民学会”的具体条件，为此，毛泽东同志曾在上海半淞园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加入学会条件、入会手续及学会活动方法等。规定入会会员必须和“宗旨相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评议部通过”①。蔡和森同志后来在法国也屡次来信表示吸收会员要“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得任其自然发展”②。这一思想得到全体会员的拥护，他们说：“若不是这样办法，就会弄得乱七八糟，……不算什么学会了。”③毛泽东

① 第二集。
② 第一集。
③ 第二集。

同志还经常考虑使“新民学会”树立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他说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集合，要变为主义的集合才好，”又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①当会员思想上发生分歧时，毛泽东同志总是领导大家进行争辩，展开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经常亲自主持这样的会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②，保证政治、思想上的一致，使学会在组织上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

毛泽东同志很善于运用组织力量去进行工作，他的这种非凡的组织才能经常得到会员的好评。他指出学会的活动应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会员要“受一种合宜的分配”，“人才要讲究经济”③。他说：“我们同志，应该敢于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④毛泽东同志不仅对会员的力量有充分估计，而且也深信广大群众的无穷力量，他经常告诉会员：“改造中国与世界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⑤，“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⑥，正因为如此，他鼓励会员要“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⑦。

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并不为此而满足，毛泽东同志认为“革命必须作长期预备，周密的计划”⑧，因此他们非常注意理论建设工作，主张“去求世界的学问”⑨，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⑩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⑪，他主张派人去俄国和欧洲了解革命运动的情况，吸收新的思想学说，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当毛泽东同志听到有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时，他和蔡和森同志，杨昌济先生在会员和湖南进步青年中间竭力宣传和组织这件事。在他们积极活动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新民学会许多会员陆续到了法国，他们和一般留学生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出洋”的目的是探讨新思想和追求真理，以便结合中国特点，吸取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寻找中国革命的规律。蔡和森同志指出留学决不是“随俗的迷梦”。毛泽东同志也强调首先应该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⑫。研究这些问题必须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他说必须“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⑬。他早就指出不要迷信外国，他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⑭蔡和森同志等对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见解很表赞同，并且认为毛泽东同志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极为重要”。

送走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之后，毛泽东同志将新民学会工作作了大体安排，指出会员活

---

① 第一集。
② 第一集。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第三集。
⑥ 第一集。
⑦ 第二集。
⑧ 第一集。
⑨ 同上。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同上。
⑬ 同上。
⑭ 同上。

动“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造成有根抵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新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活动及社会事业。”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以蔡和森同志为首的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各国革命运动。譬如蔡和森同志在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百余种马列主义小册子。向警予同志后来给毛泽东同志及彭璜同志的信中曾谈到她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的思想变化说：“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要予之所欲。”②除了个人学习外，还提倡共学，经常聚会讨论各种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团结和组织所有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作斗争，蔡和森和向警予同志在蒙达尼发起组织“工学世界社”，他们经常和毛泽东同志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蔡和森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明确地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他说：“现在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③。对于工团主义，他说：“工团主义充其量不过是运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国的‘国’里去，不但于工人无关，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④。毛泽东同志回信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⑤

与此同时，湖南会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多半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和湖南驱张运动、自治运动。

他们主张提倡文化运动应从根本上下功夫，不要效行“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应作“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⑥，并且认为应当从小学教育和劳动教育入手。

“新民学会”对妇女解放运动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组织了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直到向警予和蔡畅同志去法国后，毛泽东同志还写信给向警予同志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⑦蔡和森同志屡次提到应“设法大辟女子外出之路”⑧。许多会员都很关心培养女干部的工作，认为“女同志之优良者尤为可靠，极应注意”⑨。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看到了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引起人民很大不满之后，便妥善地将湖南人民五四爱国运动的锋芒逐渐引向驱张运动。驱张运动后，人们有着急于摆脱

① 第二集。
② 第二集。
③ 第三集。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第二集。
⑧ 第三集。
⑨ 同上。

北洋军阀统治的迫切要求，很多人要求“湖南自治”，毛泽东同志和彭璜同志正确地对待了人民的正义要求，毫不犹豫地起来领导了自治运动。有些会员起初看不到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意义，他们认为“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情”①。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正确地指出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又说：“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②毛泽东同志告诉会员说，在这个运动中“千万不要忘记根本的共同的理想计划，不要沾染旧社会的习气”③。

为了推动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去北京，使他有机会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且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进一步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器。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中说道：“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④他认为学会必须重新研究一些问题，他说：“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⑤毛泽东同志更加深切地感到先进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必要。这个时期，他和会员的通信中经常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他从北京回长沙后，立即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马克思研究会，并且为创办自修大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不仅看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同时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不仅重视在理论上培养干部，而且还努力从事建党的准备工作。但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的坚决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并不是风平浪静地一下子就为会员接受的，这个问题在法国会员中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辩，从此出现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两种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以蔡和森同志为首的大多数会员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⑥，唯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认为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⑦，这就是“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⑧以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却竭力想走改良主义道路，在这次争论中萧子升充分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他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是

① 第一集。
② 第二集。
③ 同上。
④ 第一集。
⑤ 同上。
⑥ 第三集。
⑦ 同上。
⑧ 同上。

"较和而缓，虽缓而和。"①当时也有个别的人附和他的主张，一度对走俄国的道路发生犹豫，怀疑是否"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

持有这二种不同意见的人都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请毛泽东同志发表意见。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给全体在法会员复了一封信，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对蔡和森同志的"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②，反对萧子升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举罗素当时在长沙的演说为例，他认为罗素那种"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觉，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他说："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况且"现在世界的教育，又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他说："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因此毛泽东同志作出结论说，共产党人如果不取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靠"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③。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这是必然的规律，指出"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正好比要物不向下倾一样，必须要用更大的力去抵抗它。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④。

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正确地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革命是客观的趋势"，无产阶级对革命的要求是"不能消灭"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⑤因此他们更进一步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楷模等作深湛的探讨。对于改造世界，他们主张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当时称万国一致色彩或国际色彩）。

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毛泽东同志也在长沙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这时蔡和森同志在法国阅读和翻译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同年九月十六日，他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就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叙述了共产国际成立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批判了考茨基和伯伦斯丁（按即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错误，也谈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建党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最后他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步骤，他认为首先要组织宣传团体，出版党的刊物，调查国内外各种情况，最主要的是"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然后明目张胆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〇年年底收到此信后立即给蔡和森同志回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⑦他说关于党，现在已进行组织，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刊物等。

---

① 第三集。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新民学会”成员大多数是第一师范的优秀学生和长沙学校的一些进步教员。会员中的革命派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后来许多人都成为党的骨干，革命的优秀人材，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榜样。毛泽东同志则是其中最优秀、最典型的代表，他的战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同志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们和当时五四时期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同之处是，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忘我和无私的精神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在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中不难看出这种雄伟的气魄。他们说一个革命者应该“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①，在生活上“不妨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②，为了“全体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③。他们对人民充满了无限的爱，对敌人则有着刻骨的恨，蔡和森同志曾说：“对人民，则无善不可为，对敌人，则无恶不可作。”④他们终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忠实地执行了自己的誓言的。但是也有些会员为了满足自己渺小的个人利益，只图个人发展，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终于离开了革命。更有少数会员后来索性投靠了国民党，或成为反革命分子，背叛了革命事业。如果说在“新民学会”成立初期，会员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还不明显；那么湖南驱张运动前后，这种分歧就开始明朗化了。这也是五四时期不同知识分子分化的必然结果。

对“新民学会”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毛泽东同志始终领导大家向他们进行严肃的不调和斗争，最后学会宣布开除他们出会。在“通信集”第三册开首就刊登学会的“紧要启事”：“本会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唯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务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⑤直到一九二〇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新民学会才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正式宣告结束。

（原载《五四期刊介绍》第一集）

---

① 第一集。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第三集。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一集(选)

新 民 学 会 致 各 会 友

各会友均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员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二种，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商榷讨论的场所。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信稿，不论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和誊正稿寄来本会，以便采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信集。不登之稿可退还。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退还。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启

发 刊 的 意 思 及 条 例

第一集所收多前一二年旧信，然于学会颇关重要，因多属于团体事业之进行与发展的。留法运动一事此集只能载蔡君给各会友的信，各会友给蔡君的信，其重要者尚望诸君附来选印。通信集之发刊，所（可）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发刊不定期，大约每两月可有一本。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固宜取绝对公开态度，但不宜标榜，故通信集以会友人得一本为主，此外多印了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看者取去。因学会极穷，不论会友非会友，都要纳一点印刷费。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就好极了。

蔡 林 彬 给 肖 旭 东

讨论会友进取及同志互相协助的问题

子昇兄：

弟今天会见石曾先生，除以前所闻皆得证实外，又知借款机关亦已组织，我省为熊秉三章秋桐二氏担此义务，筹有的款，以辅助绝无自借能力之士。此好消息出于意外，孑民先生

亦云然，尤足信实。今特将简章及说明书寄上，请细与章，赞，芝，鼎，四兄详细讨论。暲兄已否到省。南洋消息如何？如不可靠，则来此亦为上策。芝圃本有做工意，弟为彼设想，于此亦实相宜。鼎丞则往日之希望反多，弟尝思为在那方进行，似不必为此。然若以其尚无何等把握，不如此方现在之有形可捉，则投此亦未始不佳。赞兄往南洋本最好，然似乎筹川资，等消息，难得充分把握，此间现有陆军大学招学消息，（尚在调查中）未始不可作一箭双雕之想。总之如四兄皆有意于此，当速寄文凭相片来京，然后等弟之信，再定，直往保定之期，方为稳妥耳。三十夜之信，想已接阅，与润兄详议答复矣。二兄行期，似可从速。罗君到省未（否）。大学报名，在本月廿五截止，请电话通知其尊人，速定行止。盖罗君于此必须另辟住处，则后来者愈有地步也。李耀先行未？如未，亦可联络，一可使彼不走歧路，二可在此处多一殖民地，以便援引后来者，交利之计也。

弟颇恨行色仓忙，殿后种种任务，未与兄一一陈之。日来愈益有感于吾国社会之晦盲否塞，为正人君子心量不大，孜孜然聚其聪明才力于为己，而不肯旁通一点之所致（此其说甚长待面陈）。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心智旁通，则仁不可胜用，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味。民包物与，立人达人，尽性赞育，胥在于是。会友叶君，竟尔死去，每一念之，辄愧悔其未尝一为之谋。现学友中之失所者实繁有徒，不可不略尽心力，为之筹画，殿后办此者，惟有兄与润之。弟前与兄言旧友黄受松，此君识力陷于悲观，意志困于境遇，理解一切而气弱不振，常有途穷之叹，久为忧之。兄如慨然举之以进，一面拔一人才，一面得一人才，实为双美，请更商之邹张，嘱二君觅其通信处，早通一信，以免祛其穷愁潦倒之忧。不然，忧能伤人，彼方久攖恶疾，倘有意外，弟更何以为情？其余如贺梯亦弟所信实，一士虽微，百年赖之，祈与王先生言焉。此外如新识中之有可谋者，亦祈兄一一加意而后行，书籍要多带，弟太带少，此地无处有借，准备工夫竟不能做。二三人另合一担，虽费八元，亦为值得。弟寓中之书，请兄检阅一次，如其可带，请拣选带来。兄岳山之游，或可俟诸他日，能于短期间同润之一往章甫处最好，一可促进其行动，二可为往西往南往东者略筹川资。保定亦须百元，如赞周鼎丞筹此，皆为难也。润兄重要笔记亦带来为好。润兄归家一行否？如皆会行动，会事如何善后？二兄当为熟筹。陈君书农来省否？周君世钊有信否？鼎兄如不走动，则如何设法之处，须过月写信。润兄及鼎芝诸兄见易先生时，请代致意。此时不遑作书也。昇兄字贴可带来。顺问
教安。润兄处未另肃。

彬　肃

七年七月，在北京。

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暲肖子昇毛泽东

京保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

赞暲诸兄转昇润二兄：

弟间接闻听欲往保定预备之人，颇繁有徒；此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容收，成一大组织，然后始符初心，始无遗恨。二十五名之额，本为侨工局一面所限定。至同乡（熊等）之辅助，尚属另一一时不定之生机。弟前财团之条呈，即于二十五名之外，隐示可来额外之多数，此等弟筹之熟，思之深，而且身经其间已久，极悉此事之性质，原属不拘一定。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有把握，全在自己创造。弟所怕者，是小结果之可靠与把握，全不虑其不好下台也。弟于侨局一方得有把握之后，即思所以推广调剂之方，只虑来者未必果多，遂于前书不敢明言，现在多少与否，弟究不得而知，只以既有此层意思，便当奉呈来前，以备采择。至其方法之可言者，约有三端：（一）侨局借得二十五分款，就可额外容纳得几个至十个；因我们有最简单之生活，得节省借款几分之几也。（二）熊章此时行止虽不定，然正大有无把握中之大把握在；因有一年预备期间，足容吾辈运动游说，以造出几个可靠也。（三）就是组织财团。如有三十人来，就要夹三分之一之有钱者及有借贷力者。如有四十人来，就要夹十几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如有六十人来，就要夹二三十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一）之可能，已不待言。（二）之可能，弟甚信之，只要我们在实际上造出一个形势，迫向人家身上走，使其不得不负维持之责，使其不得不乐于负维持之责，然后为得耳。（三）之可能，亦非梦话；往南洋者果能出其往南洋之川资于此（如暲兄及罗学瓒等兄），在雅礼者果能出其在雅礼一年之费用于此（雅礼有几个要来），往上海者果能出其往上海之费用于此（如李耀先君等久闻彼往法川资已筹足五六百元。弟早有牵入之意，虽不深知，然非不可与言者，请勿全忘。），则不但一方可纾借款无着之忧，一方尤可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款。至竟有几个意外的富家公子及借贷力大者参加走来，或能在何处以团体名义借款，则来八十人，虽六七个是穷措大不妨也。换言之，弟以（三）为达到（二）之手段，为造成一大形势之手段；是以（三）之性质为“当有可无”的，大形势之起首，则不得不有。（二）既达到，则可以无，有又不必皆有，无又不必皆无，此其为说，须兄等推想，然后一句可以说明。盖二处之辅助，皆是借款，苟能勉强自备，何必多此“借”“还”之手续。然不过属于个人言，若属团体言，则是混合分配，只要有借，总是一共同借为好。财团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本金并不要如何雄厚，又并不要如何可靠，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总之，此事全在人做，初无可靠与着落之可言，必欲穷其可靠与着落，则莫如吾辈之自身。至弟之僻性，尤不喜小结果之着落与过早之可靠，此则于实行上或云难，然自弟视之究甚易，今使弟再大放其浮词，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在正面言，形势愈大，愉好着手，退一步言，湖南学子，竟大多数患了一个勇猛轻率的神经病，此病甚于此回之水灾，而辰济之效亦大于水灾之辰济；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

不乐于维持；亦要如此始可以责人维持，始好责人维持也，然弟亦非专门拘于如此浮泛之想，苟在现在能干造出几个大着落，亦断不肯放松而不为，因此本为我素愿也。自侨局之小着落成后，弟即探问熊氏之行止，行止无定处，不好投书。前闻其返湘，现闻其在津，若其来京，则拟往会。盖熊氏有为本县筹一百万元善后款之说，弟想从此中抽借几千，当亦为彼所乐许。且彼欲广设平民工厂及银行等，尤非预储人才不行。弟前旬写信于石曾先生，谓兄等于二星期内可到，请伊早向侨局接洽。彼即与蔡先生商量，蔡即有信致杨先生，谓熊章行止不定，向侨局借款，李意想请杨先生作保证人，且谓李不日会至杨寓商量。现在尚未见李来，大约李之如此促进一步者，因二星期内可到之信也；今仍未来商量者，因兄等犹未到也。李意必以人与凭到，始好直截了当，一画做好；弟前此之所以促昇兄早来者，全为此也。究竟杨师个人，尚是难得保证，弟与师议请师联络熊，一面同作保证，一面向他借款，师已谓然。弟欲其早写一信与熊，师则谓须李来京商量及兄等到此，究是实情。昇兄如果持重难发，请诸兄向学校催出文凭，即日邮来，以便在此进行。人稍迟究无不可。昇兄在省时，请将此事始末，与陈夙芳君一言，强伊写一封信与熊秉三氏。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无论陈为何如人，彼既尸教育会长之职，此事即为当为应为之事。至其信中之理由，由彼写之，或不免照例敷衍，此则须昇润二兄讨论商量，自己起草，交彼照制盖印。其他言词，或可不周到，理由则万宜充足，或专交一理由草与他，他之情必相安也。至此回大组织若能成立，弟思以后将成一继续援引之团体，或应时势之要求，竟在长沙组织高初二等预备校：此亦须与陈等言之，以促其注意。总之弟对于此等人，只要强迫他此后不至漠视青年之需要，即为得了，其人之可与言否，不必论也。

润兄七月廿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为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此时之所急者，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四出觅供给之货物；是以弟于留京往法而外，又有组织一些人去吉黑新疆之想（此等处确可发财）。到了明年，往法者果已成为事实，则后年之往边地者，可得开办费之援助，诚能如此做去，则财之解决，谅非绝不可早，绝不可能。至南洋广东而犹有生机，则愈为多得几着，此则通同所患，仍是人数不供支配耳。至于求财，其方亦自多端，（一）遇，（二）访，（三）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至于平常观察，弟颇厌旷日持久，为不经济，吾辈总可发明一短期有效的方法，多与言谈，多与尝试，亟与从事，虽不中，必不远也。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今日欲访求已经成德之好人，诚是凤毛麟角，湖南而外，外省尤其难得。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自信小当小效，大当大效，惜无人达我之意而推荐之耳。尝思所以补救，故公然不逊，以与子昇之学生接近。至对于会友之分途四出，或觅间散事情，或情愿经商，意颇忧之，久思所以补救之方；故前有耸恿昇兄荐教员之言，而意中尤望鼎兄略为牺牲，以屈就不经济而

实经济之事；又想昇兄写一信与何先生，以坚其志，不必欲往东洋。然此皆支节也。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其方若曰：如得鼎兄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前于楚怡诸生，欲其通信，即是此意。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弟又有决意留京四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之宣言；故其置重长沙之处，亦复大略与兄相同。前与昇兄书，谓恨行时不及将种种善后方法与商，即指此等。此等不只一方，不只几人，不只一事，弟皆欲溶成一片，以为必如此始能宏济宏成，作始时即宜运思及之。弟现对于自身及同辈中，又有几句直觉的缪语：即“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象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耸恿而力赞之。弟觉立己立人，划分先后之阶段者，谬也！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存在之地哉！曰鸿炉大治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弟感此极深，知此极切，其言万端，猝莫能尽，且亦吾兄所洞悉矣。弟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鼎兄本有教育研究所之议，弟思此亦是善后之一种必要，会友中诚能有几个当教员，或于他校联络得几个教员，则尽可一二星期联合讨论一次，以创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统教育，此亦莫大之事业，会中所应做者也。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弟对于章甫兄之往东，又生异议，除“无必要”之说外，尚有二事：（一）自费七八九年，其田价六七百元尚是不敷。（二）回国后果能做何等活动，以现势揆之，殊无多说，此二理由虽不充足，然如加以家庭之万难远离，弟以为不如仍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即为个人树其风声，此迂缓而未必有失者也。至长京之五六留者，三四年后之学问问题，弟亦略为计及，以为只要法之财团，边之财团以及其他财团，能如愿而偿，则我五六人者，可于彼时交换往返接触考察一次，然后回国，大开其世界自由研究社，此幻想或亦有万分之一可恃，惟在努力做去耳。不然，我二三人之留京，为财乎？我不敢承认；为学乎？我亦不敢承认；为基础乎？则我略为承认之。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体，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罗学瓒君来片，谓现在不能得家中同意以索预备之资；至川资二百，则明年尚可设法；此则舍来而外，全无问题之可言。罗君又言有黄守垣君欲来，此亦无所不可。又问高小毕业者可入初级预备班否？此正可，惟须自费，想此信到时，罗君或已在省，故未另复。蕴真兄信，甚有来意，极其欢迎。周明谛君来书，虽有意，而无凭，甚为恨事。此外有杨师之堂侄

杨楚君欲来，师欲其带足几百元来，不必靠到此借；因如此则到法即有钱回家也。又雅里之杨焱君欲来，伊往下学宫街十一号醉香书屋，请诸兄一往联络为要。刘国司确在家中，请告以预备费有地方借，彼必然来也。彭璜亦请带一笔为幸。写至此，师写就与熊氏信来阅，略谓侨工局允各借二百元，请同为保证，又恐来者逾限，祈另组一款，以辅助之云云。此书即可发。并且另向熊之亲信人加番力，事当无甚难也。昇曈赞诸兄平素所用之火食饮料器具，请一皆带来。弟寓有饭合两个，请择带一个；因弟即就图书事，亦须自办火食也。保定亦定须此等。其他书件有用者皆可带，不要怕火车上只能带五十斤，两手提得起者，彼不干涉也。又纵无一二人早来，亦须速将文凭寄来，以免贻误事机。从经济上打算，又不必一齐来京亦可。图书事虽微薄已甚，然颇以为宜，仍然舍不得造友之一方面也，请将此意告知家母为盼。其他种种，皆祈诸兄善为料理。感冒中，言无伦次。

彬。

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

蔡林彬给毛泽东

大规模的自由研究

润之兄：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核，去我情瞀，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二皆不适，亦既耿耿于心。只以事不称意，遂思超脱原计，另辟一路；实则又入网罗，此运思不缜密之过也。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故前有虑其太早之说，又有往法做三五年工即行回国开馆延朋之想，由今思之，此亦似太早计。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讬邦"为得耳。且同侪既有一队往法，则凡所以调剂利用之者，正大有方法可想，是以前之异议，又已神而化之矣。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然有时为达此穷极目的计，不必要中亦有必要在；是以本来厌恶学校也，而竟又欲入学校；本来痛恨万恶也，而竟公然主张主人君子要为恶。然此实一时之直觉，未经师友之讨论，是以前书略吐之，明知此等为兄脑中所含弘，特欲借此得丰富之反响耳。兄之行止，幸已确定，无犹夷，前书斟酌之说，实无所用

其斟酌也！熊希龄氏若抵湘，请兄为往法事往会之，问其答应筹款若何，其详在致昇兄书中，请查阅。谨此顺问行期。

蔡林彬。
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给陶毅

联　　军
同志的分配
自修大学
女子留俄勤工俭学

斯咏先生：

（上略）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个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象“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侯，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迭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甚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

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椿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象你曾说过杨润余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

毛 泽 东 给 周 世 钊

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
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
自　修　大　学

惇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

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拟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拟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芹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觉很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弟泽东。
一九二〇，三，一四。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罗学瓒给泽东

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科学的根柢很好
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
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

润之兄鉴：

久未得你的信，不知你的母亲大人已完全好了没有？不知你的行止，现已决定了没有？昨由子昇寄来湘江评论第一期，弟阅后，各同学亦都看见，前闻罗君增益说很有价值，并销行甚多，不知现在还在办理，抑亦停止？现国内发行此种周刊，日益加多，如每周评论之外，尚有星期评论及四川学生周刊等。闻星期评论很有价值，未知兄等已看了没有？弟闻曾琦君说：日本近来于社会新学说，有许多分科研究社，并共出有杂志至四五十种之多，兄亦可以请周君名第及傅君昌钰等介绍几种，或请人翻译，或自己研究，亦必多所取益。盖中国之新潮，完全自日本输入，尚不过得日本十分之一二耳。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昨有一同学向我说，中国百年之内无大学问家出。我问其故。他说：中国之人用功于文字学太多，以研究科学之时光，多消磨于研究文学，故无学问家之根柢。譬如柏格孙为大哲学家，彼并非专于哲学已也，他又精于数学，有数学博士之资格。又长于物理文学，及他诸科学，亦都可与各科博士相比伦。根柢甚好，故能成其为大哲学家。中国学者谁有此种根柢？又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以为求至国人之不如我，即已足，（有此思想，恐怕还少。）谁有志愿想伸足世界学者之林。而求有大影响于世界如杜威柏格孙其人乎？求与人比并尚不得，况超出于他人者乎？

我闻听了这些话很以他为然。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何如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共同组织一个研究学问的团体，对于学问上为一个长期不断的进行，并一方面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又一面办教育，且学后作工，所谓工读并进。润之兄啊！我以为此种事情，总要做到才好。因为此是一种求学有益于社会及个人的最经济的方法。前子昇说，符业的合社制度，大概是如此的。

我近来颇有努力振作之气，一因出国后想将家庭社会国家之系累，一刀斩断，用专力于做人求学，不如此恐怕自己对自己不住。二因同学中映我以许多好模范，相形见绌，常思振励。故我在此地不啻有一些人在我两旁时相告曰：你年纪大了，不可不努力啊！润之兄啊！这个念头要维持到底，要实行到底，才可望稍有点成就。还很希望诸兄帮我的忙，或示我以好途捷，或指引我的迷惑，这是很感激的。

前子暲致子昇信内，多有不满意于团体的话。这是子暲看错了，也是子暲费力费多了发出来的感想。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各人有各人的想见，不能说一两个人或一两宗事不满意，就说不要团体，这事也还望你积极的进行。现在周惇元陈启民诸兄还在长沙么？我以为惇元兄文学既深造，若是出外求学，自必有大造于学问界，且惇元兄还无室家之累，何故不外出读书咧？（我看现在有些人在国中闹得声名很大，其实没有好多学问，象惇元兄一样的很为难得。）我想他既不想造一个办事人，岂有不能造一个学问家的道理？启民兄的教员生活，不知已常试过没有？我久想写信把他们，问一问消息，或报告一点事情，每次总以信多稍待自宽，实在对不住，语你帮我致意他们罢了。

又有一事，请你费心，就是我在此地已经两月多了，还没有写一封信报告湘潭学友会，也是疏忽的原故，请你将则次寄回的沿途闻见杂记，或关于述事的信件，交黄君纲钦或蒋君竹如转与会内诸君一看，他们说要做会内的报告，也听便。我前次写回的信，都是寄把你，因为即是请你转达两个会内的原故。近来好吗？

罗学瓒。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给罗学瓒

荣熙兄：

兄此信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的。我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办法，暂时也不必说，只是你的话我一定要行就是。你奋勉的志气很可敬。你现处环境很好，可以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听说你已离学校在工厂做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脱尔斯太所谓“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

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启民在太安里周南女校。惇元在理问街通俗报。湘潭教育腐败已极，旅省诸人组织"湘潭教育促进会"从事促进、尚无大效。一师湘潭学友会亦将有所兴作，兄信尚未转去，稍迟当转去。兄沿途寄稿均登湖南日报，无转阅必要了。此信曾经复了一次，今再附识近来感想于此。

弟泽东。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二集(选)

序

这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第二集”，采集会员通信计二十八封重要者如下：向警予讨论女子发展的计划一封；讨论女子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及女同志联络问题一封；欧阳泽讨论新民学会共同的精神一封；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一封；肖子暲报告男女会友在法生活状况一封；易礼容主张吾人进行要有准备一封；罗璈阶希望学会反抗靡俗估量最高价值一封；毛泽东讨论湖南自治并主张学会同人应为主义的结合一封；张国基讨论会务进行一封；报告湘人在南洋情形一封；毛泽东讨论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希望会友多往南洋为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一封；张国基述南洋的奇闻一封；罗学瓒希望会友注意锻炼身体祛除四种迷惑解决家庭问题一封；毛泽东主张组织拒婚同盟一封。以上各信，或于身心之修养有益，或于学术之讨论问题之研究有益，或于会务之进行有益，并且都是很能引起会员团体生活的兴味的。其余的信，或商量进止，或讨论事宜，或报告个人状况，具载于此，以见一斑。

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三十号　编者。

毛 泽 东 给 向 警 予

湖 南 问 题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阴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阴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

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问好。

弟泽东。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向警予给陶毅

女子发展的计划

毅姐：

我前天写把你的信，不久会要收到了。今夜因同和森谈话，对于你忽发生两种最大的希望：

第一，希望你加入要求北京大学公开的团体。

第二，希望你促起我省高小毕业生或师范生中学生，从事要求北大特设男女同学的中学班。

毅姐呀！自今年以来，我国少数人的思潮，为之大变，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仔细研究，全然是学识能力的关系。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归根结底的希望，仍离不脱教育。而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惟一妙法。这中间的缘故，你最明白的，不待我说。此次居然有卅余位女同志旅居天津，要求北大公开为男女同学的实际运动，真是破天荒的事了！当这荜路兰缕以启山林的时代，非尽是那艰苦卓绝精粹人才愈多，则成绩愈好。毅姐呀！你既因老伯母的关系，不能出国求学，何不趁这机会，跳将出来，为远大的计划呢？你出到北大求学，好处多得很；可以深造自己的学识能力，固不待言。毅姐呀！我们常常不有一种根本改造的思想吗？北京大学正是我国里改造思想的中枢。改造思想的中枢里有了你，也算是增加了一个健全分子，改造力当然增大，这是第一椿好处。但是我国内女子，大多数懵懵懂懂，不知道什么，大学中间有一部分的健全分子，做全国的指导，言论实际，双方并进，自然可以感化国内的女同志。这是第二椿好处。我们学识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最要的是散播种子，凡重要的机关地点，我们同志应该到处分布；北京方面，我已是鞭长莫及了，所以很希望你去，以促起我们女子的觉悟；以你的热忱，那件事做不好！这是第三椿好处。有这种种的好处，所以我很希望你去，程度咧？只要是师范或中学毕业，都可以暂时进他们的高等补修班，努力准备，明年可以考达本科。经济咧？万一困难，可以结合团体组织一个工读社；或请成美学会借助，都行的，国内国外勤工俭学，概是一样，只看自己的奋斗力何如。我望你接我的信的时候，早定主意，从速加入要求北大公开的运动。这事各方面都有动机，一定可望成功的。

第二个希望，比第一个希望更大。因为第一个希望，是加入的，而此为创造的，所以较难，且较大一点。我认此为求男女教育平等之最要点。胡适之先生论大学开女禁的一篇文

章内面说："就是大学公开，也没有女子可以进去（本科），实在程度太低了。甚么缘故呢？假使中学男女能够同校，还有这种毛病吗？所以要要求大学男女同学，便当要求中学男女同校"。这种道理，我们已经廿四分相信了。只可惜公私立学校，没有这种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毅然实行。所以我极希望大学里设这样一个男女共学的中学班，做全国中学的模范，从事实际的文化运动，打破家庭社会的陈腐观念，是最精彩最光明最有希望的。所以我很想你做一个原始发动的人，促起高小毕业或现中学师范一二年级的学生大家结成一个团体（男女共三四十人），到北京教育部和大学校去要求这事。只要人做，一定有效，何以故呢？

（一）男女共学案，正在山西教育联合会请通过。

（二）北京大学本有添设中学的计划。

（三）北大校长职教员都富于新思想，只有帮助，没有阻难的。

（四）大学已允公开。

（五）湖南教育受张氏摧残无读书地。

以上五种理由，极光明正大，为真正可靠可信的事实。只要我湘有男女学生去，结果不徒自己得好读书地点，真是把女界造光明路，替人类修万福桥。但他们可怜，从没受过精神的教育，奋斗的精神，也是极缺乏的；要他们有动机，定要存得力的从旁启发。我的溆浦学生，很想他们自己发挥真力量到北京去运动。余如稻田的预科生，师范本科二年生，周南中学一二年生，都可以把这件事去鼓动他们，使他们自己结了一个团体去北京要求。至男生一方面，和森先生说陈启民何叔衡两先生都可以从事鼓吹。肖子昇先生所教的楚怡高小学生，是极有担负极有训练的，这次很可以同去发动中学男女共学的要求。大约有三十人便已够了，愈多愈好。我以为这是一件顶要办的事情，又有这种最好的机会，尤其不可以不办。就是学生稍微有点牺牲，但是在长沙又有甚么书读！就有书读，这种敷敷衍衍的，又有甚么益处！并且我们天天提倡人类要共同生活，女子要解放，到底从那里做起？到底要做不要做，做的时候，上紧点好些，还是随便点好些？毅姐呀！我很希望你努力鼓吹一般女子的自动力；就是魏劳周三君，也要写信要他们上北京，千万不可深闭个拒，浪掷光阴。如要履行游美的志愿，今年里也可先往大学去预备预备。毅姐呀！任如何忙，要写信把他们，劝他们出来，同这般要求大学特设男女共学的中学生一同前去，这到是最有希望，最有兴致，最可纪念的事。毅姐！你有这种决心吗？我本打算自己回湖南的，实在是时间促了（二十五日放洋），不能分身；你可以把这件事同启民叔衡先生等商量商量。毅姐！我希望你照我的意思猛力的进行！我今夜写这信，睡得极晏，也是因这事有大关系。我溆浦女校高小科，我欲建议收男学生，大约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对于你的两种希望，如能成功。以后继起的自然而然的快，并且容易得多了。至于路费一节，我的意思，可借则借，否则鬻衣物亦可不恤。只要到了北京，穷困的时候，想方做工来度日，不达到要求的目的不止，一定可望成功的。我们生长这个时候，假如毫没牺牲，毫不能奋斗，简直不能立足了！我溆浦在省求学的诸生，看他们对这事有无魄力，象劲秋他们更处绝地，更要自己上前去作。夜深了！手倦了！即问
近好！

叔衡启民楚生诸先生前均此致意。

警予上言。十二月二十日。

欧阳泽给毛泽东彭璜等

学会共同的精神四项

会员加入不分省界

润之殷柏转在沪各同志：

由香港寄上一片，谅收到。

我们十二日由香港开，十六日到西贡，停两日开，经两日到新加坡，停一日。到华侨中学，与徐开舆张国基姜心培诸君，相晤甚欢。和张君谈话独多，关于本会在沪所议定的和所要进行的稍为报告他一下，并希望他在此地为本会物色些人物。

讲到新民学会，我有一个意见要提出来，这个也许曾在会章上说过的，或是在半淞园讨论过的，今都不问，把他写在下面吧。

（一）共同的精神。这是本会会员所应该注意的，共同的精神是什么？

1.对于本会要尽心尽力的栽培他，灌溉他，爱惜他，务使他充量的发展。却不要一心一意的专事服从他，倚靠他，更不要挟甚么野心来利用他，把他当个偶象或傀儡玩。

2.本会对于个人，和个人对于本会，须都要负完全的责任；本会的失败，即是个人的失败；个人的失败，也就是本会的失败。

3.会员对于会员，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为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

4.会员对于会员，须要有理性的爱，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感情的爱是暂时的，部分的。理性的爱，方是普遍的，永久的，方能维持一个团体，不至于忽尔涣散。

以上几点，因途中困顿，未暇把他详细说明出来，想也可以不必详说就可明白了。

（二）会员的加入，今所特地提出来讲的，是暂时加入会员应不应该分省界？这问题，当我和光楚泽东在北京时，曾作非正式的讨论，不过那时候以为非正式，便涵糊过了。到上海，在半淞园那次，也忘记了提出来。我今觉得这点也有讨论的价值，便提出来和各同志商量商量。

毛君曾说，暂时不必加入外省的会员，他的理由大概是：外省的会员，恐怕对于本会底内容和精神，不能明晰的彻底的了解，因此对于本会没有许多益处。这话是错了。为什么呢？无论本省或外省的人，至于与本会生了关系，甚而至于要加入本会，必定是本会会员和他有长期间的周旋，对于他有精密的考察，实在见得他对于本会已经了解，并有很诚恳的表示，而后有加入为会员底结果。况经在半淞园会议底结果，关于加入会员底手续是：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已经是很严格的了。如果这人对于本会素不了解，已是根本的不成为会员，便不必虑及有益无益了。（下略）。

欧阳泽。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孟加拉海舟中。

毛 泽 东 给 欧 阳 泽

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

玉生兄：

共同的精神四项，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是因为新民学会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淞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你的信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都转给他们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向多忙，未能作答，幸谅！你现状谅好，我忘记你在芬丹白露，抑在蒙达尔尼？来信幸告。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言不尽意。

弟泽东。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旅中。

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

主张做事要有准备

泽东：
殷柏：

今天在报上看见你们答曾毅的信，很满意。但刚同恽代英君谈，他批评湖南人的缺点，我也觉得很对，特就感想所及，写给你们这封信。几早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说“实行政治运动，还要靠热心的政治家……，”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我看了之后，就同廖焕星君说，这是他们受了刺激，转柁〔舵〕了，觉得要预备充分的能力，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日所提出的“主张”，似乎又较前坚强，有跃跃欲动之势。我是一个懦弱的学生，不但不能直接运动，并且说都不晓得说；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次的主张，若是不能实现，则并非理想之罪，只怪得先无充分预备。甚么是我之所谓充分预备呢？曰，你们的“同志”太少，湖南的少年界，绅士界，都很少有能力的人；有亦未必尽与

你们连络，你们的意见书上所说的一些事，你们到底叫谁去做？我恐怕不是时髦人物学了你们的去讨饭碗，就是给人家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你们若是自己起来做，则谁可助力？建设的条件这么多，湖南有七十五县，一时如何布置得来叫唤得醒？若说这番鼓吹，自有相当的效力，我也承认，不过较先有预备，取"分工作用"，能实行贯彻你们的主张，那好处就更多了。

我们到底要如何预备起来的问题，我晓得我现在所写的，一定是你们时常所想的，不过还未进行就是了，或者，已经进行了，我不晓得。我觉得你们急急要回到湖南去，采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假〔锻〕炼一班好同志。（中略）我是一个没有十分觉悟的人，上面的话，不过就我的直觉，推论几句，你们若以为不中肯，请将你们的计划，尽情告我，使我放心。若以为尚有可采之处，则请再进一步讨论如何实行。（下略）

易礼容。六月三十晚二点四十二分在武昌。

毛泽东对易礼容这封信的评论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姊及周惇元兄函中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几次。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肖子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相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　东。

毛 泽 东 给 肖 子 暲

子暲兄：

你沿途给我的信和照片，都收到，很感你的厚意。我竟没有一个信报你，很对你不住！‘半淞园会议’的结果，既由他和赞周等带到了欧洲，“蒙达尔尼会议”的情形，又由你和子昇递回了亚洲，子昇并且自己回国，不日就可见面了，真足乐呵！你现在谅好，谅还在学校。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学会出版物分“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为二，通信集本年至少可出三集，请设法收集在法诸友间新旧信稿邮递“长沙文化书社”交弟，作第四集第伍集材料，至感。（请告诸友以后通信均书长沙文化书社）

弟泽东

罗 璈 阶 给 毛 泽 东

湖　南　问　题

对于学会的希望

及　时　求　学

润之兄：

你六月三十的信，展转交付，今日才到我手里，我读过之后，非常喜慰。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希望你今后的生活，更趋高尚，日进无止。

自从你赴沪后，我因不知你住所，又是彼此忙着，所以少通信。但我们意气相期，理性上的交谊不浅，这些小处，何必介意！我所以觉得你的话，还嫌琐碎，润之！几经锻炼的老伴侣，现在还这般客气，岂不是太斯文了么？

你的意思，注意一省的事业，想将湖南办好，我也很赞成。零碎解决，本来是很切实的入手处，于此我只祝你成功，并不用再申私见。

学会会务发达，我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至于现在一班所谓学会性质，无非预谋干禄，把持一界饭碗，滔滔皆是，尤其盼望大家力避其染，自家估量一个最高的价格。“会务报告”内容如何？我当然可以贡献点意思，但是请你将要目告我，不然，我胸无题目，殊觉茫然。湘江出版请寄下一阅。所说湖南青年界研究兴味不大浓厚，你还是先觉的人，责任自然很重。再

出版的要求，更不可少了。

你下学期担任课么？最好多挪出些自修时间。耀灵急节，岁月易逝，无法可以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你的英文近想大有进取，关于肄业的近况及预计程序，也可以告我一些么？至于我自己，本想在此二年（已过），便图出国。不过现在形势又不同了，出国的事，还须延展。我校虽不是十分好读书的处所，北京却是个顶好读书的地方，我不是身体的无用，想也有些境界了。自去年来，我读书又颇有点头绪，厌世观念，自谓绝少，不过有些旧识，近来都远去了，生活不免有些不快，但这也是偶然的感觉，不算甚么。我们达教胡同的团体，因人数中减，已告解散，现在我搬在马神庙西斋（第一寄宿舍）居住，以后将继续住下，以后的生活，自期更当秩序些，安慰些，有甚么话时，再向你说。我省教育界情形，想有大改造，大建设。但是关于学款，可有了把握没有？关于人才，新到了些好名角没有？你们最好将教育状况，通信京报，俾我们大家明了。

章龙上。九·七·二五。

毛泽东给罗璈阶

湖南问题
主义的结合
学生自决

章龙兄：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没有一句复答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途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

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湘江"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很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泽东。九年十一月二五日。

李思安给毛泽东

润之先生：

十二号平安抵沪，预备二十二日动身，没有英法船，只好乘日本船，且价较廉，因我在长沙和你商量借款的地方，都失望了。所以肖君想搭三等船，不过四十元。但是我用费实无从减省，昨日又向谭常恺君商量，在合作银行借了三十元，今日去取。肖君若要时，还是分一点把他，不然，我也不敢动用这多，恐欠多了账，难于偿还。

近阅报载南洋来函，说英政府要取缔华侨学校。唉！这个信一来，于我们的行，不免有点馁气咧。不过还是决意前进，无丝毫退缩意，请放心，以后望你常常指教。使我在那黑暗中得线光明。

湘江评论出版吗？前日和毛飞君谈话许久，望你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子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下略）

思安上。九年八月十九日。

毛泽东复钦文（李思安）

钦文姊：

你这信我八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厚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国基给毛泽东

会务讨论

润之老兄：

我好久要写信给你。因不知道你的住所，所以拿起笔来，就把他搁置了。前日子暲，玉生，绍休，诸兄往法，在此过身，我通会了，谈了很长的话。后来问及你的现状，才知到了上海，万里外得到故人消息，心中格外欢喜。趁著暇时，就把我此次南来的琐事，和环境的感触，写在下面，作一个报告。（中略）

我对于学会，稍有一点意见，不妨把他写来，和你商酌。

一，会务的进行。我们这个会，既是叫做学会，那么，是专门为我们研究学问，和交换知识的一个新村，现在会友有在欧洲的，有在日本的，有在南洋的，分散到这样远，怎样能够研究学问交换知识呢？我的意思，要发行一种书报，替我们做个意见的传达员。但是这种书报，不是为社会公开的，是专为我们研究学术的。要把他做非卖品，不要在社会上出头风。

二，会友的增加。会友是应该要增加的，但是要十分郑重、不可随便忽略。我的意思，增加会友，纵少要有四人以上的介绍，并且要得委员长和评议部的同意。就是学问性情，亦须有一个月以上的考察。若不是这样办法，就会弄得乱七八糟，牛溲马勃，都可收罗，不算什么学会了。

三，会友的界限。我们这个学会。虽是取绝对解放，和男女公开主义，但是女友还是很少，并且仍旧有几分客气，这是一个缺点，我的意思，要有真正的解放，打破一切界限，无

论男，女，老，幼，本省，外省，大学生，小学生，只要他的脑经受了这汪洋澎湃的新潮洗过。和宗旨相合，都是可以邀为会友的。

四，会内的设置。应当找个一定的会所，多买书报杂志，以便会友的就阅，或借阅，保管的责任，暂请委员长或干事担负。

五，经费的救济，我们既是要办书报，又要设置会所，需经费亦定不少，会内既没有基本金，纯靠入会金和常年金来办，断不会够。所以我意，要于常年捐外，开一次特别捐，作为开办费，就是出版的书报，各人都要拿钱来买，你看可行不可行呢？？

六，印刷会员录，须将现有的会员姓名，别甫，籍贯，住所，通问处，印成小册，以便常通声气。今夜时候已晚，我的话也说完了。我们到梦乡里再会罢。就此祝你的脑健。

弟张国基。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十二时在星加坡。

毛 泽 东 给 张 国 基

会　务　问　题

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

南洋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

颐生兄：

两信先后奉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项，弟大体均赞成。第一项发行会报，现已决发刊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忆夏间在上海与焜甫，赞周，子暲，荫柏，望成，韫厂，敦祥，冀儒，玉生，等在半淞园会商，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连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年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

多人往南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泽东。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罗学瓒给毛泽东

身体的大问题

四　种　迷

工学励进会与通信社

婚姻问题

润之兄：

我于七月到蒙达尔。至十一日才回"克鲁作"工厂。我们这次会议，至七日之久，会员到的也有十三个之多，要算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个盛会。关于会议的事，子昇必有详细报告，我不必重说。那几日关于讨重人生问题，最难解决，关于家庭问题，最为麻烦，似乎是两件重要的事了。但我私心觉得人生问题和家庭问题，固然要求解决；但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没有讨论，就是各人的身体问题。我们此次会议也有十三人，除女会员有两个较好的身体以外，其余说要算我和芝圃的身体较好。但我的身体，确实是不好，譬如我自到法后即肚泄，间几日即发，到于今还没有好，又有痔病，间时漏血。芝圃亦说近来身体亦不舒畅。余如子昇兄弟之软弱，蔡李之宿疾，赞周，焜圃，玉生，警予诸人，都不甚强健，且多有肺痨或有呕血者，想这真是我们可虑的事。近见李和笙之身体颜面，比前日见瘦削，已劝其出工厂，留巴黎休养，此真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问题也。你前说国内各熟人，死得可惜，要我们珍重，很是不错的。中国读书人，一味注意读书，每每以身徇学，这种毛病，真可叹息，（也可说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

又我近与各处友人交接，常觉得中国人求学的头脑，太不明瞭。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就说法国人爱和平不振，作为不正当。又如见中国的小事小物或有一点比外国略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又譬如勤工俭学同志，自已想做的工不能找得，遂说勤工俭学不行。这可叫做"感情迷"。第二宗错误，就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挪一部分推断全体。譬如见一个法国人龌龊，就一口说定法国人不爱清洁。会一个怠惰的法国人，就说法国人都懒惰。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是危险。我看连托尔斯太之反对工业，无政府党之倡废金钱废商贾说，都是这种观察之误。这可叫做"部分迷"。第三宗错误，就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譬如勤工俭学的人，当一时法华教育会找不到工，遂说勤工俭学做不到并不能发展。又如见工人罢工，一时混乱，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这正如康有为

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行共和之证一样。象这类的观察，可叫做“一时迷”，第四宗错误，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譬如在国内听了法国人好酒好淫，到了法国，也不去考察是不是好酒好淫，偶然见了有吃酒的有淫的，就信而不疑了。并且有些不必见有吃酒好淫的，也信口说法国人好酒好淫。又如主张礼教好的，见法国人活泼，好自由，遂说法国人不如中国人的文明。又如从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强，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于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其实西人的道德，比中国人强多了。）象这类的考察，可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第四种迷感，无论何人，总有舍不掉的。连我自己，也免不掉的。这真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总而言之，中国人大多数还是没有科学的头脑。我从前不信学哲学要从数学入手，到于今才懂到这句话是不错的。才知道论理学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道理。象这种头脑的人，我敢说一句，还不配乎求学，就是还没有求学的资格。这是我一人近来交接朋友所感想的，你以为何如呢？

我们在法组织一工学励进会，先本定有章程，现在人数日多，章程不够用，拟到年底去修改，故现在不能作具体的报告。大概来法的同学，有略有志气和见解的，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坠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组织以新民学会的人为多。

昨在蒙达尔所议之事，有组织通信社一项，即由会内推一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或寄稿一篇，材料由各人自择，大概不外（一）工厂情形；（二）工人生活；（三）华工情况；（四）勤工俭学情况；（五）法国社会各种状况；（六）旅法感想。以外还有译书报所载的，渐次谋扩张，待各人法语通了，那时取材容易，不患不能发展了。现在法信稿，由我征集，我拟一概寄至长沙，由你处置，或投长沙报，或投上海报，或附登会务报告，都可以，不过要寄一份或两份报来。又会员如欲零寄一份回家或朋友者，（登他自己的稿子的报，）亦请照办。（大概不多。）此事并不烦难，并且在此地各社员，因欲尽调查留心的责任，也可得考察求学的利益。拟自八月起，每月分三期寄来，拟用留法工学励进通信社名义，并请你们派人选择，或校正，因我在此太无时日，不能做这种事的原故。

又你前回写信给子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预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好多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你可努力做去。

又说你的婚姻的事，也是很正当。我近见法国家庭之和乐，与组织之良善。（比较中国的）常常骂中国家庭万恶。要改革社会，非先改革家庭不可，欲改革家庭，非先改革婚姻制不可。近又见留法各同学，常觉自己的家庭不好，大有悔婚出妻之意，我想勤工俭学诸人，将来必不免许多纠葛发生。我本是薄于情感不知顾忌的人，近来为家庭的原故，每日也要萦环我脑中几次，恨不得抽刀斩乱丝，一声解决，可惜人道主义为祟，使我不能决心耳。前日在蒙达尔会议，一言及家庭，即有无限的悲感，家庭！家庭！真是杀尽中国的牢狱！我等不能不设法赶急求解决者也，你现算无家庭之累，你婚事万分慎重。我将来也想到俄国去游一游，我们就相期在俄国会面好了。

我在“克鲁作”工厂，情形甚好，心志亦大快活，要算从前没有度过这种快乐日子了。（工作亦略纯熟，法语亦颇有进步，工资也加到十五六佛郎一天了，除衣食用费外，每月可余二百佛郎）。近子昇因湘款事(即章行严汇来之一万元），颇受湘同学诽谤，谓章汇来二万元，

子昇私吞了一半。（其实止一万元，因在法久已喧传为二万元），种种诽谤，到处喧传，我虽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瞭，亦可为叹。

现在法国各报上喧传皖系与直系发生冲突，在北京一带交战，不知情形究竟如何也？湘省自张吴退去后，局势有无变更？以后用何方法整理，祈有暇时，详为说及。此请

近安。

罗学赞。九年七月十四日。

在省垣各同志，如周东园，陈启民，何叔衡，蒋竹如诸兄，请代为致意。

毛 泽 东 给 罗 学 瓒

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论 理 上 的 错 误

拒 婚 同 盟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详情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最不合

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象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写出。此祝进步。

弟泽东。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选)

新民学会紧要启事

本会同人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二日

蔡 林 彬 给 毛 泽 东

研 究 社 会 主 义

希望实现小学计划，劳动教育，

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合居等。

我们须于文化运动更进一步

润之兄：

我到法约近五月，时常想写信与你，又时常按住。我和母亲及警予咸熙等以二月二日安抵巴黎，母亲心力颇强，故船中困疲皆已矜持过去。我初到时，因旧病复发，甚为瘘弱，旋偕母亲及警予咸熙等来蒙达尼地方，分入男女中学校，补习法文。母亲与咸熙等同起居，同上课。我则决定恢复体操游息，略如麓山故事。每日生活，全在公园空旷中，不上课，不看书，惟饱吃面包。而如此一月余，体气大健。日看法文报一节，因校中功课浅，及求知欲切，决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情形如此，故一切无所活动。所以常想写信与你，又常常按住。

我现在还是聋哑兼全，（因不注意语言，又没有直接和法人接近。）不过不尽为瞎眼耳。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颇思纵合写来，以作我与你通信资料，（因此外仿佛无甚可告）这也是我写信与你迟迟复迟迟的原因。近正汇译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产，工团，各党消息寄你，起自社会民主党之分裂，以迄此届选举终结，故须等至六月中旬始能告竣。（德国此次选举期为六月六日）而你四月一号与四号的信，均由子昇转

来了，因此赶紧先行写了此信。

我在法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格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纵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格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一年中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一年后兼习说话听讲。现一切住校费用，皆由华法会借出，（勤工学生皆同）或者还可续借数月，至没有借的时候，才去做工。警予等皆同。如有他法可想，成权其轻重，把工按住，若能，则当然经济得多。以现在俭学费用之廉，实足以加增俭学之动机。警予已决计俭学数年，将语言习好，情形习熟，设法大辟女子外出之路。勤工俭学生近千人，好分子占最少数，暂不多加组织，〔现只有工学励进会（为李和生罗学瓒等所组）潜在进行，〕新民分会亦暂按住，俟机会成熟，将来自有办法。

兄留湘两年，极为重要。我意章甫于兄在湘之时，亦不必外出，可在长沙极力教小学。两年之中，会友能办到百人教书，最好没有。启民，惇元，宜久在湘，主持教育，不动。兄如不办报，于自修外，宜紧张教书。少年互助团大好，两年中能鼓舞其增至千人以上，更好。诸兄在湘，宜于此团体大加提挈，启发。叔衡似永不可离湘。去俄不如留湘之重要。如何？（就他一人及会务言）犹望能将小学计划实现。此事比之出报更重要。学会办文化运动本为应有之事，我们既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则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比之出报，出杂志，更重要。现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在四川本地无根据）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我以为好，但是我们的须更进一步。湘事定后兄首先聚精会神，将小学实现为要。有暇则从事湘江评论亦好。不过两年中总不宜因出版而碍会务进行。（指被封而妨学会等）

我以为我们于文化运动，大可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此时我以为新民学会宜办三种邮花，以扩其用：一种贴于男女各师范学校，其法在办好会中学术演讲会及以个人与师范生之优秀者往返。一种：贴于各县各乡的小学校，其法以上之联络师范生为根据，俟他们返乡办学校，即可实行。或择现任各处之小学教员通信及介绍书报启发之。一种：贴于现行之各出版物上。此三种邮花，皆可济会中经营之穷。（因会没有钱）而其作用与自办差等。兄以为如何？

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要算各处都已迸发了。新民学会所宜注意的，目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但是如何办呢？一，我以为你的小学计划成，同时应筹划劳动教育。二，应鼓吹各种合作运动。（消费组合贷借组合要紧）三，应出一些小册子（仿新生活）。四，好小学能设法多收农家子弟更好。五，聚会友中之兄弟讨论，如鼎丞之兄，你之老弟，我之兄，警予之兄，（经商能手，现在乡经商，且极可与谈）叔衡，瑾玎，亲属，教新会友之亲属，都可以约聚，启发一下。我对于会中意见，大略如此。

咸熙答应入会。溆浦女校教员任培道女士，今年夏秋间来法，警予甚称其为人，（问陶女士知道）我们想介绍入会，此人道经长沙，请邀聚讨论女子事宜。又溆浦女校长吴家英女士，（溆浦女校教员大概皆好，问陶便知）亦很好，如来省，可与谈。溆浦女校为警予及伊等极力经营之学校，我意学会当郑重贴几分邮花于其上，请酌之。此校太僻处，当设法传递新出版物。又溆浦女生，（问陶便知）在省垣女师范者很有几人，此皆百经训练，有如子昇之学生，其中有警予侄女，极好，极好，请邀同陶斯咏极力加以提携，将来必有可观。

我写至此处，发了狂热，希望陶女士和启民久顿周南，惇元久顿修业，叔衡久顿楚怡，

兄与章甫于两年中将小学校办好，然后赴俄，则根深蒂固矣。

新民学会尽其可能扩大，同时尽其可能严格，这是我的总意思。

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现未印出）。家母甚好，惟间有旧病复发，惟不如在国内之甚，他诚挚的希望你，致意你。警予忙课，未另写信，也致意你。国内新出版物，请设法多寄（过日议）。现在我们定了的为时事新报，解放改造，建设，新潮，新青年等，中华馆新出版之世界两种图，有钱请买寄，时事旬刊还出否？

刘清扬女士弟曾介绍入会，此人现往南洋，不知兄有机会见之否？此人很可以，弟又曾与兄言王启润女士，在京见之否？新会友之性格，请随时介绍一二。邹蕴真兄如何？宜使其来长沙，或在乡办学校。杨师遗眷，弟主张来法，兄以为如何？忙问。

安好。

弟彬。一九二〇年五月廿八号。

与弟信，皆由子昇转。

此信请转启民，惇元，叔衡，殷柏，诸会友未另，乞恕。

蔡 林 彬 给 毛 泽 东

社会主义论讨
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润之兄：

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昇报告。我到法后，卤奔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

1.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

2.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万国同盟绝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疟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客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现在红军已打倒波兰而压入波斯，这种情形你必熟悉，而中国摇身一变的政客和武人（如陈炯明）正在准备做列宁，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千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什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

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慕韩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须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量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他：

（一）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

（一）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数目必多。

（二）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国内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惇元，殷柏，诸友均此。

彬。一九二〇，八，一三。

肖旭东给毛泽东

子昇这信，报告赴法会友在蒙达尔尼开会情形，并发表对于同志进行及会务发展的意见，颇关重要，是会友人人应该注意的。 编者。

润之兄：

多久想写信与你，因想写一极详之信，而又屡不得充分之时间，至今始行动笔，还不能十分详细，以后还是短写密写为好。

这信所要写的，大概分下列几条：

（一）复你来信。

（二）报告在法会友情形——即在法会务大概。

（三）述我个人对于会务意见。

（四）略述个人近况及将来求学计划。

现在分为四段写来。

（一）复你来信。

你四月一夜及四月四日北京来信均到。又平民社稿，及湖南建设宣言等印刷物均到，非常之好，非常之可喜。

不结婚，主张恋爱自由，最为正当。但我对于恋爱也有点意见，以后有机会再说。

“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这两句话，极得我心，我对于你也早有意不扯你来法了。你读书的新研究方法，暇时请告我。“结伴游俄”最赞成。顿湘两年，必要。看势说话，或多顿住一下，亦无不可。我们的事，不在目前，据我看，也不在十年之内。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但对于俄文要赶早预备才好，因小孩子工夫，越做得迟，就越费力。湖南事必在一两月间可定，你归湘想亦在两月以外。归湘后大约有几事是要你做的：

（一）你自己读书（与好友同行）。（二）整理会务。（确定规模，立稳基础。）（三）仍一面教学生——不必限定教小学生。（四）仍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立于舆论的地位为宜。

“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此语极当。我甚希望叔翁迟点出外游历，暂顿湘教学，联络教育界中之同志，并执行会务。因为我们三五十年内都是要外出奔走求学储能，无人来经理此事，只望叔翁尽分工之责，收互助之益。如能即时外出，最好随兄游俄，不必来法。法国方面，同志已多，再来一些，也不过添增壅肿，太不经济。我意陈章甫兄也不要打留法主意了，同你游俄去也好。

“各方面——即如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这话说得非常痛快，非常动人。但我想这是“他们”活动的背影的流弊。据我看，我们这几个老朋老友，的确深沉些，恳挚些。但不免缺少“活力”，有点腐儒气，陋儒气。我常与此间同志说，我们要救我们性质的弱点，要注意“动”，只是要“动而不浮”。“动而不浮”四字的

精神，五六年来，兄即有之。我自到法后，亦颇用力，所以我现在也豁达些了，大方些了，不如前此之小气之狭隘。

向女士真好！已与深谈数次。薛君现颇有韬光养晦意，已谈而不深。“学会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极好。法国方国，已有最真挚亲切的联络，见后会务段。

（二）法国会友概况。

先述第一次会议如下：

（1）发起　昇，熙，到法既久，十二月和笙芝圃到，四人即日有谈论。今年一月蔡向诸友到，是时会谈亦议。迄六月十五暲，焜，赞，玉，诸君大批全到，昇，熙，笙，森，芝，等又各分处，急想见面畅谈，遂约定大会一次。

（2）地址　在“蒙达尼”，因此地蔡氏三人，向警予，熊氏姊妹，赞周（新到，分配在此，）有七人在此，以不动为便。故开会之日，和笙自法国西北工厂到昇寓（巴黎），芝圃自极北工厂到昇寓，昇，笙，芝，三人同去芳丹白露学校邀焜，暲，玉，于是六人同车到蒙，荣熙独自法国南境工厂到蒙。

（3）会期　到蒙略有先后，从全数到蒙起为七月五日，至七月十日散会。

（4）谈话　第一日　七月六日　个人感想。（最近新知）

第二日　七月七日　会务进行。

第三日　七月八日　会务进行（上午）。求学方法（下午）。

第四日　七月九日　求学方法（上午）。个性批评（下午）。

第五日　七月十日　个性批评并对于未到会之会员之个性介绍。是日合案午餐，连会外朋友共二十余人，饭后游公园照相。

个人感想

各人所述甚为繁杂，记其大者如次：

1.焜甫君提出“说宇宙观与人生观”。

焜甫君自述人生观必产生于宇宙观，孔墨老佛之人生观不同，乃以其宇宙观不同之故，阐发甚多。昇谓：既曰人生观，便不是人死观，人生是不可免的现象。我近来并觉得“人生便是一件美术品”，非常有味。我们都不是情愿去死的，即令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宇宙观，然不可一日不生活，不负责任。和森谓人生观不必产生于宇宙观，即现在可置宇宙问题于不顾，先行解决人生问题。赞周谓吾人之人生观，必发生于宇宙观之先。以外各人多所辩论无极大的结果。昇在此时述一段意见如下：

我们有一弱点，即不喜充分的说话，即无共学的精神，以后总须做到“矜平躁释尽情尽性的讨论”希望国内同志，于此亦能注意。

会务进行。

（一）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故于中国与世界之改造方法，极力讨论。先说主张：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赞周谓现在中国组

织共产党较难。外和笙，子暲，诸人亦多讨论。

（二）会务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如有同志活动之必要时，可新组一会，以新民会员全数加入亦可。不可以学会为牺牲，一时东扯西拉，凑集一些目的不相同之人。

（三）会章修改，本为必要，但此系具文，可从缓计议。

（四）出印刷物，尽力所及，切实作出报告亦可。若月出一册，现在力量——人才，经济，——或者不够。

（五）在法同志，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尽可立即直阅法文书报，一面练习文字，一面获取新知。

和森到法，即卤莽看报，现有进步。昇于巴黎各党派书局，已知大概，搜得各党派书报小册等可数百种。暂时同志可分作三部分同居，(一)蒙达尼，三蔡，一向，二熊，共五人。(二)哥伦布(昇寓所在地)，赞，焜，暲，玉，即日搬来。和笙欲出厂养病，亦即日搬来。房屋概由昇先行佃定。(三)芝，熙，暂时仍各居工厂作工。(一二三)拟合住一处，长久作工。

至合居后，分工所阅之书报略于左：

和森　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以及其他有关系之小册。

赞周，和笙，分担合社（协社）主义，和笙看合社原理论已久，如不病，即可直译。现又新定合社大会所出版之"合社事业进行"一种周刊，赞周于此事，甚有趣味，即看此报。以外从"合社书局"搜得关于合社之小册约百种，大足参考之用。

子暲，看日报，担任新闻，及他种小册。

玉山，看第二第三万国社会党出版物，并留心其事。

焜甫，看社会伦理，社会哲学。

向熊二女士看妇女声，女权报，及他项小册。

（说明）以上诸人除和森外，余均以三分之二之时间直看书报，仍以三分之一研究法文为基础的研究。子暲练习语言较易，诸女同志法文进步极快。和笙法文根底较深。

合居后每日定时学术谈话一次。

（外贺果颜昌颐等同志，亦有共学性质，分任看书，将来自可合并。

求学方法

大体方法，略见上段。其他细则，他日有暇再述。

个性批评与介绍

（和森）坚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暲）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

总结，我们个性都有极弱处，也都有极强处，充分发展各人的极强处，就是补救弱处的一方法。

以外如润芝，叔衡，书农，敦元，章甫，殷柏，李思安，瑾玎，诸君个性，亦由相知者提出向新会员介绍。

此最要，最有味。但以上所述不能完全。所评，亦未必尽当。

会谈时亦有非会友而到会共谈者。

此次本为熟友集会，非正式会友开会，故尚有会友未邀入。

随此信付回小照片多张（蒙城会谈后所摄），请照样张填好姓名，分赠在湘会友。又一大张，请存会中。

（三）我个人对于会务之意见（先作一简表再说明之）

- 学会我见
  - 根本计划
    - 1.从事实上确定会务进行方针。
    - 2.准备人才
      - 通洋文者千人，至少五百。
      - 任学校教师者。至少千人。小学尤要。与作农工者，注意分布。
      - 作工厂之工，至少千人，
      - 商界若干人。
    - 3.准备经济
      - 此事较难，至少欲筹储十万元为印刷费，编译费，及文字鼓吹时之邮费。又小学校一所——即会址——基金。
    - （2、3两项）民国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
  - 长沙方面
    - 4.综挈会务大纲——在湘稳立基础。
    - 5.筹办小学，开办时可由在湘同志义务担任。
    - 6.代为推广少年互助学会及某某会等，此系预备会员。
    - 7.联络教育界，会友仍继续教书。
    - 8.试办合家，（理由与办法候告。）
    - 9.物色基本会员，老人物亦甚要紧。
  - 上海方面
    - 10.帮助现在沪预备留法女子之进行。
    - 11.注意西南大学。
    - 12.此处学界或新闻界必有同志。
  - 海外部
    - 13.日本部——请傅，周，注意同志。
    - 14.德国部——促章龙设法留德，先行力攻德文，并留心德事，看德报，至少一分。
    - 15.英美部——促启民君前往留学，何如？
    - 16.法国部——细目甚多，注意里昂大学推广工学世界社。
    - 17.俄国部——毛，何，预备前去，章甫能去亦好。
    - 18.南洋部——宜去重要之人。

1.以前学会状态，不过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虽有远大计划，然不甚明了，以后须定具体的计划。所谓具体的计划者，概别之有二：（一）力学。（二）力行。力行之事，最宜注意者两义：（一）改造世界与改造中国是一件事，宜同时并进。（二）因此改造中国，不可忘却世界，要戴改造世界的银镜去改造中国。立学之必要：（一）我们常识尚不充足。（二）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三）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

2.我们学会现在的优点：（一）切实，亲挚，无浮夸气。（二）多小学教师，与教育界有很

深的渊源。（三）多女同志，且极优良，（此为他会所不及。）以上三者宜极力发展，（女同志之优良者尤为可靠，极宜注意。）

3.我们学会现在的弱点：（一）幼稚，会之组织与会员之力量均如此。（二）会员性质诚挚谨严之分量较多，发皇活跃（不是浮动）之分量较少。

以上二者，宜极力猛省，觉悟，进步。

培养少数条件极适者为学问大家，亦极重要，其故：（一）中国现在无一可数的学问家；（二）我们年龄太大，境遇太苦，虽不自馁，然毕竟难有多量贡献于学术界；（三）一个忠实有用的大学者，其有利于社会远非多数寡学者之堆积量所及。至于适当之条件：（一）年龄，（二）志远，（三）资颖，（四）家富。

（四）述我个人求学计划

详述请待他日，略言之如左：

我到法后境遇最苦，最不快活。说到读书，正式上课读法文，没有达到二十小时，现在稍为懂得几句法语，看得几句书报，都是东抢西扒得来的。

我从前有为大学问家的意思，近来过细计算，（一）年龄太大；（二）境遇太苦；（三）根底太浅；有此三因，恐是梦想。然此是自觉，不是自馁。但我虽不做大学问家，却愿做个大常识家。等到成了大常识家，或还有做学问家的机会，不能呆定。并且我近来颇有具体做事的热愿，我最主张与世界各地同志联络进行，互助互益，——如今之万国某某党——我便喜欢去做此事。依我现在的情形，若再专读两年法文，一年英文，（法文可通法，意，比，瑞，西，诸国，英文可通英，美，日，德，诸国。）三年之间，并研究社会学，三年之后，即可实行。（但无此机会）至于我所喜欢的学问，如淑种学，人学，社会心理会，社会娱乐学，等都极愿意，仍以教育事业为中枢。现在既无三年机会，便延长时间至于六年十年再说，这是无可如何的。但我不是为我要求学的，一时做不到，我也不十分着急，不至于想起就要自杀，归根一句话，只好说是"以久制胜。"（这是达化斋的法门）。

话说完了，问你人健。

弟旭东书于巴黎西郊。

此信自七月中旬写起，至八月初才完。

叔衡，瑾玎，启民，敬园，章甫，殷柏，及在湘诸好友均此。

李维汉给毛泽东

不赞成俄式革命

润之兄：

别后未写信与你，然从诸友处多见你问我的话，感激。我来法抱有宏愿，但身体颇有病，不能如意进行。然我自信力和意志极强，（绝不厌世，绝不自馁，请告诸友放心）若身体好，自是一个能工愿读者。现在在法同人状况，昇信已详，不赘。工学世界社，（由工学励

进会改名）定有人告你详情。你的行止，我很赞成。我现对于同学极主张各自充量发展个性，所以我自己的人格固要紧，同时尤尊重人家的人格。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团体的组织，我觉得要建筑于多方面的同情，换言之，就是要先都有了某种要求：然后借组织的力量去产生之。若是专靠组组去鼓荡出共同的要求，还嫌勉强，怕不彻底。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多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到法后虽在病中，觉悟不少。但嫌无根据，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此间多人同住，每日有定时谈话，很有生气。"工学世界社"法国通信已成，你闻之必喜，但我决不做论文，事实文做一点，身体稍愈，能长期担任译稿，这是纯出于我的介绍的诚意。他都不敢自信。多友在长沙方面担任教育，此事我极赞同，请诸兄努力为之。但启民兄我极愿他出来，或西南大学，或往英美，都好。学会中诸女友，都比我们强，我喜极。会友都注重潜在的猛进，我尤喜极。话完了，祝你好，并请你把此信于方便时转诸友一阅，对不起，没有另写信。

维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并请代问陈启民一句，我曾写过两信给他，收到没有？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

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赞成马克斯式的革命。

学会的态度：（一）潜在，（二）不依赖旧势力。

会员的态度：（一）互助互勉，（二）诚恳，（三）光明，（四）向上。

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

学会的四种运动。

联络同志之重要。

和森兄子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

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商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斯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昇相同，李说："社

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而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影，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到，”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遇到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

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松园曾经讨论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一是“不依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湖南运动；2.南洋运动；3.留法运动；4.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

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甚幸。学会甚幸。

弟泽东。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蔡林彬给毛泽东

共产党之重要讨论

润之兄：

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今子昇归国，再陈其略。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于有产阶级的惟理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惟理观与惟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比如到了饥的境地性之可能为吃；遇到困难的境地，性之可能为思（想方法）；处现经济制度之下，性之可能为"人剥削人"；处怒或挑剔（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之时，性之可能为"打"或"杀"。究其极这种可能性，与别的动物一样，没有别的高贵不同。总之人由低等动物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们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肯唯理观。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斯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椿大喜事！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惟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惟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孙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他们叹观止的地方！今日俄德革命之不同，根本即在此点，我今拟二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言时），取消国家。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
张君迈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马不牛，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比如生长于现政治下的工团主义（经济的职业的，而非政治的）充其量不过是运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比如三角同盟国有运动，自去年到现在，没生一点效，现在矿工为增加工钱减少煤价争议数月（矿工已发停工预告定期本二十五），政府公司丝毫不动，所以我们专门经济的职业的工团运动，经久不能超出“工钱物价问题”，如何能得到解放呢？至于现在俄的工团就不然了，“工钱”“物价”都由工团自定，生产管理与分配，工团与全国经济最高苏维埃共同执行。这才真算是解放。然而所以能达到这步，因为他获得了政权。现世经济政治早已打成一片。怎么会容许你单做经济解散呢？所以现在有两种说法最足延长现政治之危险而暗杀工人阶级：

（一）反唯物史观。以为以此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而不高尚！

（二）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使他们永世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

这两种危险的说法，凡冬烘先生（欧美如此）及资本家御用的改良派社会学者总是瞎眼说去，不怕害死工人！

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大战爆发，于是各国不真实的社会党及工党，尽向军国主义投降（即向资本家投降），尽变为叛逆，爱国的社会党和工党，有两个叛逆的总机关：一为第二国际党，一为万国工会。

忠于马克斯主义的布尔塞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与德李伯克奈希，罗森堡，所手创的斯巴达加斯团（不久亦改名共产党），及匈贝拉赓所组的共产党，组织“第三国际党”（即万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木斯哥成立，加入的团体共三十五个。高丽亦以劳动联合会的名加入，波斯，印度，土耳其等，以东亚民族解放大联盟的名义加入，独中日没有团体！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气焰的资本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俄十月革命成，各国犯了罪的革命党及工党又疑又怕，去年二月已死的第二国际党，在柏伦死灰后燃，开了一次大会，赞扬俄革命的占多数，诋毁的尽为犯罪已深（入了战时内阁），及执迷不悟的改良派，不久大多数纷纷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其中的大党如德独立社会党，法统一社会党，英独立劳动党，西班牙社会党，瑞士社会左党等等，并宣布与第三国际党商议加入条件。故今年七月万国共产党开第二次大会。中西南欧及美社会党都预会，中国亦有两个代表，但无团体名义。现中西欧各代表已返国，正在开全国大会讨论即刻加入。中西欧各社会党战时屈服于军国主义之下，多少违犯了主

义，此缘于平日改良派及修正派之恶劣影响，现在完全的马克斯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既在俄罗斯实现有效。于是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红色化。而各国社会党和工党大呈分裂之状。从中把持的无非是几个改良派，修正派，中立派的旧首领，这种首领在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中，不久即会遭淘汰。现在英，法，美，共产党（英八月成立的）业已成立，加入万国共产党，所以英，法，美的社会党非加入则不能立足（因违反工人的要求故），我今把美，中，西南欧巴尔干，及东亚的已加入或即将加入万国共产党的略举如下：

美，已成立三个共产党，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已与木斯哥大会）势力不大，首领为豆伯斯，因反对战争，现还关在牢里。美I.W.W.势力亦弱，但主张阶级战争，为美劳工的真正组织，已参预木斯哥大会。美势力最大的劳动联合会的领袖为刚伯斯，极旧极反动（木斯哥指名排斥）。社会党I.W.W.和都参与木斯哥大会，与第二国际党及黄色的万国工会脱离关系。

英，不列颠社会党与别的三个团体，自去夏商议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今年八月一日成立，加入木斯哥万国共产党。英共产党始拟不令劳动党加入（党员已近五百万），列宁力主可容其加入。独立劳动党已宣告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国际改造，现英劳动党阶级战争的色彩益明。援俄及国际运动甚力（近又派代表参预俄波和议）。三角同盟将与俄工团于今秋冬发起红色的万国工会，打破死灰后燃之老的黄的万国工会（他有七千万会员），反动的工党旧首领将被排斥。

法，统一社会党之极左翼，已组成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之一部。统一社会党今年二月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第三国际党协商加入，此次派二代表与木斯哥万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木斯哥加入的条件极严，大略如下：

1.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

2.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人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

二代表已返国，即将开全国大会，讨论加入条件。法工党首领为霞华，木斯哥指名排斥；要法工人将此人驱逐。

德，独立社会党去年十一月大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加入，昨派四代表与木斯哥第二次大会。加入条件与对法略同，要他排除右翼首领才准加入。独党十月将开会讨论此事。斯巴达加斯团改名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主要分子之一。德工党旧首领为莱琴，木斯哥指名排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已于前二月脱离第二国际党，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

比利时，社会党为爱国入阁卖主义的首领所把持。共产党已成立。

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已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劳动联合总会亦加入，社会党右翼的改良派将于下次大会被除名。意近日劳动运动占领工场，管理生产，绝非国有运动可比。

匈奥，其社会民主党与德多数党一样的与中产阶级联盟揽政权，在社会主义上已宣布死刑，匈共产党为发起万国共产党之一，奥共产党也是其中一员。

雅各斯拉夫，共产党运动极得势，此次城邑选举大获胜利，中产党皆失败，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团体有八，现组织政府，此次不应法命助波攻俄，社会党政府与有力。

保加利亚，战后破产，共产运动极盛，上次国会选举获选五十名之多。与中产阶级联盟的社会党一败涂地。现俄共产党的党纲，在保销行八十万卷。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罗马尼亚，战后军国主义大盛。共产党运动亦盛，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此次多脑河流域三小协约国，不听法命助波攻俄，即三国共产党之力。

东亚，印度共产党已成立，去年即加入木斯哥，我在法报见其宣言。

土耳其，共产党与今年八月成立。昨波斯，印度，埃及，土耳其代表与木斯哥二次大会之后，又在巴库开东亚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大会。印度又于八月成立八百万工人的联合会。法统一社会党及人道报派代表赴印度祝贺。高丽去年三月以高丽劳动联合会名义加入木斯哥，此次又有二代表与第二次大会，中日亦有代表，但不见团体名义。

以上所举系荦荦大者，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布尔塞维克与门色维克（先同属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开首是争党员加入的条件，布派主张极严格。门派主张宽大。其后布党主张极端的行以下的公式，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Soviets，而门派还主张与中产阶级联盟，所以十月革命不得不起。现在布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条件仍极严格，所以十月革命时的党员仅万人（极确实的分子），现在不过六十万。现在入党条件如下：（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分，须守党的“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现全俄政府每部的事纵多不过十余人担任，全国劳动联合总会五人担任）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此部专为党员做星期下午的义务劳动，以为社会倡率而设）。在十月革命前，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所以议院行动在各国社会党弊端百出，以致工人不信用政治行动，而在布党适得其反，他第一从根本上否定中产阶级的议院主义。第二以为应入到里面去打破他，一面党的群众在外面酿革命风潮，一面党的议员在议坛上酿风潮，队员亦须参预群众行动，利用选举战争为宣传运动，而不在得票多少。第三党的议员一言一语，皆须依中央委员会所授命的态度（革命的），一面在议院内做合法的工作，一面又在议院外做非法的工作，一等运动成熟，即打倒议院和政府，而做完全的革命行动。十月革命时，俄工团分子约百五十万，大多数反对布党的主张。不及数月布党在各工团中都组有党的团体，将反动的首领驱逐，一变而为多数赞成布党的主张。即如十月二十五日，乃是一种定期的革命，是日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列宁所提出的议案为将临时政府的政权移与全俄苏维埃。门党及中产阶级各党和克伦斯基都到会投票，结果工人与兵尽赞成将全政权移与苏维埃。于是克伦斯基只得跑了，这完全是一种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千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很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掉，所以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

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地土，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

没有纸了，我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再笼统说几句：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故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与工团的见到了的分子，业已改了倾向，我不信这种倾向会错的。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战胜的中产阶级又不知道要得到好多的赔款和殖民地，而战胜的国际的托辣斯的组织（指国际联盟）将越发巩固，工人真是动也动不得了！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
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彬。九月十六。

毛泽东复和森（蔡林彬）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六封信

（一）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1）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2）如足下之事，乃至察之业，然而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耶？收揽名士之策，日起日巧，有自命“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杨、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则所以自赴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纪韶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为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太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诫，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归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3）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寄自长沙

（二）

邵西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甚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堕其术中，以此总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足书生事业，益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厚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讲义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陈诸左右，增笔墨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今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如此而已。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古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如斯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半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

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度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严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收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姑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实，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教安。

一九一六年

（三）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言问，懒慵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行得慈母，盖举世昏之，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悲文师，人谁不思上进，而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徬徨，甚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杭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昨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今之天下纷之，毋亦诸人本身本位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任，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治天下之全耶，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位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樽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供阳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之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须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杂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为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之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之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本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则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自苦无知识，近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高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叶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为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所谓之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之今，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功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曾所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未定，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誉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之，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得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讨，探讨既得，既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远达天地，明其现在过去与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无不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觉不能理，愚者或震之为精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权此以对付百纷，驾御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之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道行，群妄自息，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不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实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甚解，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斗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争利一也，毁誉一也，数者当前，则只日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停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者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如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悉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

制度及多，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逐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之一部分而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父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陷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岂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之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得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距今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碍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住，既不教书，缺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齏，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为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泽　东谨上

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三日

（四）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在正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分，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四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分。

泽　东寄

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

（五）

邵西先生：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分，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美之“州”或德之

“邦”，是不容易创设的。又从中国现在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是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先生是很明白湖南事情的人，敬请将各条斟酌的修正，或要增减，见示，以便持赴沪上，从事进行，不胜至盼。

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六）

邵西先生：

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康南里二十九号，同住连我四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学，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幅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不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种，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前的两三年内，用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外文识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他动机和内容怎样，总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旅京学会出报的事，可实现否，只是这样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国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我想做一篇“具体鲜明热烈与新运动”的文章，无闲暇拘思的机会，恐怕不能做了出来，先生能指挥日常生活，将“上衙门”“下私宅”“作事”“读书”支配得那圆满得当，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望着先生，真是天上，北京此时想是很热，上海也热起来了，余话后谈，敬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一号）

（一）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新民学会的一种生活史。新民学会是一个生活体，新民学会的会员乃这个生活体的各细胞。新民学会有性命已三年了，会员由十几人加到五十几人，会员的足迹由一地及于国内国外各地，所做的事也由一件加到若干件。会员虽然现在大都在修学储能时代，但这个时代已很可贵。这三个年中的经历，在会是一种新环境，在会员是一种新生活，我们几十个人，在这种新环境里共同或单独营一种比前不同的新生活，是我们最有意义的事。第一期会务报告的职务，是将这三年中会及会员的生活择要叙述出来，做我们会及会员生活全史的头一段。

（二）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三）

现在述新民学会的第一次会——就是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成立，在湖南省城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到会的人如下：蔡和森、肖子昇、肖子暲、陈赞周、罗章龙、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桢、罗云熙。

通过会章。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第三条，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左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壹圆，每年纳常年费银壹圆；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本简章有不适应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章表决，推举子昇任总干事。是日叙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四）

自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学会成立至这年八月，四个月中，有两件可记的事：一、加入新会员。学会自开过成立会后，随即加入的会友，为下列九人：周惇元、何叔衡、李和生、邹泮芹、熊瑾玎、熊焜甫、陈章甫、傅昌钰、曾星煌。二、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至是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肖子昇。时子昇在楚怡任课，和森就居楚怡，日夕筹议。何叔衡、毛润之、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是时其他会友亦有几人行将外出，遂于六月尽间，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肖子暲处（陈、肖在此任课）开一会议。计到会者：何叔衡、肖子昇、肖子璋、陈赞周、周惇元、蔡和森、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陈启民、李和生等。因事未到者几人。这次讨论，集中“会友向外发展”一点，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是日叙餐。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

此时湖南政局乱极，汤芗铭、刘人熙、谭延闿、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互相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和森至京，与李石曾、蔡孑民二先生接洽结果，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乃函告子昇、润之、赞周、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之同

志。起初愿往极少。至八月十九，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自此往者渐众。此时会友往北者：和森、子昇、子暲、赞周、焜甫、芝圃、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章龙十二人。除章龙在北大文科，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外，余均在留法预备班（芝圃、和笙、星煌在保定班；和森在布里村班；子昇、子暲、赞周、焜甫、鼎丞、云熙在北京班）。此事在发起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国，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前进。此事的结果，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好的影响。但在中间，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

会友在京，初系散居。后来集居一处，地点在后门内三眼井胡同七号。同居的人如下：子昇、云熙、赞周、润之、焜甫、章龙、玉山（欧阳玉山于此后一年入会），和森亦由布里村搬来加入。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子暲与望成（刘望成于此后一年入会）则住于同胡同之第八号。到八年一月，子昇赴法。二月润之回湘，肖子暲赴沪。赞周诸人因法文班课堂由马神庙北大理科迁入西城翊教寺法文馆，居所事势上不得不变易，章龙亦改寓他处，三眼井胡同的同居生活，遂散。赞周等既至西城上课，乃改寓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后院，又是一个新的同居生活。此时子暲已由沪归，比在三眼井，便只缺了润之、章龙与子昇，同居还有八个人。同时在保定的芝圃、和笙、星煌三人与其余预备留法诸君四十余人，则同居于育德中学。预备期满，京保诸会友，便陆续赴法去了。

（五）

这里要述两件极不幸的事：即民国七年七月会友叶瑞龄之去世，及民国八年四月会友邹鼎丞之去世。

叶君名兆桢，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人和平中正，有志向学。于毕业归家的途次遇热，抵家即故。

邹君名彝鼎，湘阴人，与叶君同学同班。好学有远志，持身谨严而意志坚毅。七年十月赴北京留法预备班。因历年积劳得病，至此迸发。八年一月回湘，四月竟死。所做日记及论文数十本，朋友们想替他刊出其警要，但现在还没有刊。凡与他接近过的人，大概没有不觉得他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他有一个极爱念的未婚妻，临死寄给他一封信，可惜没有第三人看见，不能将他的遗墨存留。他是发起学会的一个重要人。他于学会之发起，既认为必要，便毫不游移。他于学会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丝毫不料他自己之不幸短命。他之从善如流，他之改过不吝，他之胸怀坦白毫无城府，他之爱人如己，他之爽快，他之勇敢，他之真诚，他之好学，他之对于道义之热情：——这些都是曾经和他见过面，或曾经和他相处较久的人所知道的。

（六）

民国八年一个年头里学会及会友在长沙方面的事，大要如下：

上半年无甚要事，只惇元在修业教课，叔衡在楚怡教课，润之在学生联合会办湘江评论周刊，颇有一点成绩。下半年乃有下列诸人入会：罗耻迂（宗翰），张颐生（国基），夏蔓

伯（曦），蒋集虚（竹如），易阅灰（克櫄），向警予，陶斯咏（毅），彭殷柏（璜），李承德（振翮），张伯龄（怀），唐文甫（耀章），沈均一（均），李钦文（思安），周敦祥，魏韫厂（璧），劳君展（启荣），谢维新（南岭），徐瑛，刘继庄（修秩），钟楚生（国陶），张泉山（超），姜竹林（慧宇）。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其始长沙会友对于会章条文，觉太简略，于是提议修改，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又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

至是，长沙会友，适用新会章，选举叔衡、钦文，为正副执行委员长；斯咏、惇元、润之、敦祥、韫厂、启民、文甫、集虚，为评议员。然自开会后，即进行驱张，会友多数出外，会务停顿至一年之久，会章虽更，职员虽举，等于虚设。巴黎会友，对于长沙举动，颇有违言。这时润之、耻迂、赞周、百龄等在北京组织一平民通信社，专为驱张之用。这年夏天，蔡和森于去国之先，在长沙发起“湘绣美术公司”但一时不易成立，迄今还没有具体的进行。刘望成（明俨）、欧阳玉山（泽）、杨润余三人，于此入时会。

（七）

九年的春夏，毛润之、李钦文等，因湘事由京到沪，赞周、焜甫、子暲、望成、玉生、百龄，分由北京、天津、长沙到沪，候船赴法。韫厂、君展、肫如，由湘到沪，练习法文，准备赴法。此时会友在沪计十二人。因赞周等五人赴法期近，遂于五月八日，在上海半松园开一送别会，在沪会员均到。讨论很长，大要如下：

1、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

2、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3、发刊会报：赞周、子暲都谓会友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则会报甚为要紧，主张急切出版，但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外，不送与会外之人，大众无不赞成。拟就在上海发刊，推赞周担任征集在法会友的文稿，润之担任在上海付印。后因湘事解决，会友归湘，遂缓发刊。

4、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决议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友决议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为“向上”）。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

5、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6、不设分会：学会前有在会友较多的地方设立分会之议，是日讨论，觉无设立的必要，设分会反有分散会友团结力之嫌。如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

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八）

赞周、子暲、焜甫、望成、百龄、玉生六人，以九年五月十一日由沪起身赴法，在沪会友，握手挥巾，送之于黄浦江岸。

这时张敬尧尚据湖南，会友于是有两种团体之发起，一为驱张后谋所以改造湖南者：为“湖南改造促成会”；一为与同志共同修学者：为“自修学社”，均在上海民厚里。六月，张敬尧给湘军赶去。会友之奔走京、沪及衡、永者，陆续回湘，一直到是年冬尽，长沙各会友的情形，略如下列：

陈启民　在周南任课，
陶斯咏　在周南任事，
钟楚生　在周南任课，
何叔衡　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周惇元　在通俗报馆任编辑，
熊瑾玎　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毛润之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事，
张泉山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课，
刘继庄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课，
蒋集虚　在第一师范修学，
易阅灰　同　上
夏蔓伯　同　上
姜竹林　同　上
谢维新　同　上
李承德　在湘雅医学院专门修学，
唐文甫　在明德中学修学，
邹泮芹　在修业任课，
彭荫柏　在文化书社自修，
易礼容　在文化书社任事，
任培道　在文化书社任事。

此时长沙会友所做的事，其具体可见的：蒋集虚、易阅灰、夏蔓伯等，尽力于第一师范之革新；何叔衡、周惇元、熊瑾玎等，尽力于通俗教育，办一种内容完好的通俗报。陈启民、陶斯咏、钟楚生等，尽力于周南女校之革新。

此时在长沙之会友尚有二种努力：一为创办文化书社，一为发起自治运动，均很得各方面同志的同情。此时蔡咸熙（畅），熊作莹（季光），熊作璘（叔彬），任振予（培道），吴德庄（家瑛）五人入会。

（九）

会友在北京、上海及长沙方面的情形略如上述。现述会友在法国方面的情形。

会友赴法者，自八年春肖子昇到法后；至八年秋罗荣熙、张芝圃、李和生、曾星煌到法；九年春蔡和森、蔡咸熙、向警予、熊作莹、熊作璘到法；九年秋肖子暲、陈赞周、熊焜甫、张百龄、刘望成、欧阳玉生到法；九年冬劳君展、魏韫广到法，于是会友到法国的共有十八人，除子昇于九年十月内回国外，余十七人截至九年底止，其情形大略如下：

罗荣熙	在法国中部克鲁邹地方一工厂内作电气工。
张芝圃	在法国北部香拜尼地方一工厂内作工。
李和笙	由巴黎西郊搬至张芝圃处同住养病。
曾星煌	在法国西南部一工厂作工。
蔡和森	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
蔡咸熙	在法国蒙达尼女学学习法文。
向警予	同　右（翻印者注：原件系直排印刷本，故为“同右”）
熊季光	同　右
熊叔彬	同　右
肖子暲	住巴黎西郊哥伦布，复搬至克鲁邹，与罗荣熙同住。
陈赞周	在法国非未里地方一工厂作散工。
熊焜甫	在法国西北部圣梅桑学校学习法文。
张百龄	在法国独尔学校学习法文。
刘望成	在法国芳丹白露学校学习法文。
欧阳玉生	在法国西北部圣梅桑学校学习法文。
劳君展	初到法国入南方一女学校学习法文。
魏韫广	同　右

（十）

会友之分在南洋、日本及国内各地的其情形如下：

在北京：	罗章龙	在北大文科，七年九月入学，至此两年半了。
	罗耻迂	九年四月后，独住平民通信社，年底将通信社收束，取道南京回湘。
在汉口：	沈均一	在明德大学，九年九月入学。
在南京：	周肫如	在南高补习班，南高创行男女共学，周君由上海女青年会入学。
在上海：	杨润余	在昆小路女青年会习英文，九年七月由长沙到上海就学。
在日本：	傅昌钰	在东京高工，六年由长沙赴日，七年入学。
	周晓三	在东京高师，七年由长沙赴日，八年入学。
在南洋：	张颐生	在星加坡道南学校及华侨中学任课，九年二月由长沙赴星。
	李钦文	在星加坡坤成女校任课，九年八月由长沙赴星。

（十一）

学会自七年创立至九年底，三个年内“具体”的情形，大略说完了。还有些“抽象”情形，也述于此。

我们学会很有些优点，然也有些缺点。优点是那些呢？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象“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

这些信条，都在无形中，只存在彼此的观摩和讨论中，没有明白的标举过。

因“不标榜”，多数会友彼此间从少面誉，“言必及义”，自歉和勉励的话，总较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因“不张扬”，学会虽则成立了三年了，社会上除开最少数相知的人朋友以外，至今还不知有我们学会的名字。因“不求急效”，会友无论求学做事，只觉现在是“打基础”，结果都在将来；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因“不依赖旧势力”，会友便都觉得我们的学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属于这个学会的各员，现在或将来向种种方面所做出来的种种的事，也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因此，我们学会从来没有和旧势力发生过关系，也没有邀过旧势力的人入会。——此外，我们学会会友还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头脑清新。多数会友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第二是富奋斗精神。多数会友大概都有一点奋斗力，积极方面，联合好人，做成好事；消极方面，排斥恶人，消减恶事。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各点，均能看出会友的奋斗精神。第三是互助及牺牲的精神。会友间大概是能够互助，并且有一种牺牲精神的。

学会虽有以上各种优点，但也有好多缺点：第一，学术根浅柢薄。会友大概多是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升学或毕业在专门以上学校的，还只有最少数，其学术的根柢自然是十分浅薄。第二，思想及行为幼稚。会友的思想，大概均不免幼稚。有一部分会友，于事不免率尔发起，率尔赞成，其行为陷于幼稚。第三，一部分会友做事多于求学。会友在现时本不是全力做事时代，因计划上及事势上之必要，不能不在此时做出相当的基础事。然如现在情形，则有一部分会友大概已在专门做事，牺牲未免太大了。第四，一部分会友间，尚无亲切之联络与了解。此点颇失学会精神，以后宜设法由不相认识和不甚了解的会友，互相认识而且了解起来才好。

一九二〇年冬刊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二号）

这一本会务报告乃专纪十年一月长沙会友三次会议情形。这三次会议，头一次是新年大会，在一月一、二、三号。第二次是本年一月常会，在一月十六号。第三次是本年二月常会，在二月二十号。这三次讨论，极为详尽，分纪如次：

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因湖南政局影响，好久没有开会。九年年尽，长沙政局略定，会友在此者亦达二十余人，遂谋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商定开会手续，发出一张通告：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一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4、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5、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7、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8、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9、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10、会友室家问题；

11、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12、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13、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14、临时提议。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时间：第一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第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各带餐费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一日，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色簇新。十时开会，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请毛润之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毛君说：我们学会久应

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致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将要讨论的各问题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圈出其余问题之几个，在今日讨论。毛润之谓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讨论，但不表决。众赞成。于是开始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问题有连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殷柏云：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张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主席请众讨论下面的问题：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毛润之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主张学会取潜在进行态度。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巴黎来信言我们学会好处在稳健，不好处在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至于会友个人相互间的态度，主张"互助""互勉"。众赞成上海的决议。（态度问题解决）主席提出"会友如何研究学术"的问题，毛润之报告巴黎会友对于共同或分别研究学术的进行（见肖子昇来信）。并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陈启民云：我觉得环境每把人扯之向下，所以会友集合一处，同居共学，是必要的。集合多人力量去改造环境，要容易些。熊瑾玎谓：同居、开会，两个办法，都是必要。何叔衡主张开办平民饭店。易礼容云：只要能住在一起，即职业不同，亦可以常相聚会。毛润之云：须组织一种公共职业才能同居，现

在且讨论怎样研究学术的问题。李承德云：我们不但要研究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文学、美学……都要研究。朱子有言：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会友也要采这种态度，我们不妨用种种的手段，去达到目的。毛润之云：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陈启民主张规定一个计划，在本年内研究几个主义，完期得到结果。毛润之主张暂作半年予算，研究五、六个主义。何叔衡君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彭殷柏谓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润之申明云：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

以下又讨论如何看书：有主张单独看书，以其心得来讲演者，有主张共同看一种书开会时各述所见者，尚未完全决定，惟每月开会一回专讨论学术，则已决定。未决定者，主张俟下次开会再决，新年大会不议。（研究学术问题大体解决）

于是进行讨论"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本来学会会章，久应修正了，前此多人主张把会章改成简略些，巴黎来信亦主此说，但是日忙于讨论各种问题，要将会章即行修正，实做不到。毛润之主张推定起草员，草定后由长沙方面会友开会表决，再征求巴黎及各地会友的同意。众主张即委职员起草。至于会费的添筹，为刷制会务报告和通讯集，主张每年加收一元。（会章及会费问题解决）

对于"新会友入会条件及手续并出会"的问题，是日讨论决定如下：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即为会友的信条）：（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

新会友入会的手续：五人介绍；通告全体会员（省去由评议部通过，因是日主张不设评议部之故）。

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

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十年一月二日。

（以上会员入会出会问题解决）

一月二号为聚会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会者十余人（昨日到会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会的人，主席（何叔衡）将昨天讨论及议决过的问题大略报告一番。继续讨论昨天未完的第一个问题：

"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以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润之：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同　上。

陶斯咏：同　上。

易阅灰：同　上。

易礼容：同　上。

邹泮芹：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什么事，不可一跃而几，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那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诊好。邹君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的多，故我赞成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我另有一个主张今可不提，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与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目的不妨大点，主用“改造世界”。

贺延祜：同钟。

彭殷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抛弃昨日“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都发言毕，相互略有批评。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众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殷柏（十人）。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祜（五人）。以上二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实是一致。于是主席又说：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二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都赞成。此外声明不作表决者有邹泮芹、张泉山二人。（目的问题解决）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原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泮芹：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祜：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殷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太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要做破坏工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予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彭殷柏谓：一点一滴的改造，亦须趋向共同目的。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其补剂也。邹泮芹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作工。毛润之谓：人人作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作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櫄、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殷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泮芹。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以上第二日完。中午叙餐。

一月三号，为集会第三日。首先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问题，仍依次发表意见：

何叔衡：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

陈启民：研究宜重比较，取精用宏。宣传宜兼重智识阶级，使无弃才。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周惇元：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做去。学校和饭店，皆吾人着手处。研究宜深。

熊瑾玎：先研究，而后从事下手之法。下手之法，宜重传播。学校以自办的为好。再则从事普遍之宣传，办报亦其一法，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发财不是为自己而发财，只要有目的，有组织。

彭殷柏：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文学、哲学、经济、政治，不偏废，各以所得互相交换。传播宜兼重智识阶级。组党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其可联络者。

贺延祜：研究、传播，甚要；尤宜自己投身到劳动界去。

陈子博：自己到劳动界去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组党分都市、乡村两方面，洪会可利用。

易阅灰：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

姜瑞瑜：发展个人特殊能力，利用机会。教育宜着重。

张泉山：主客两方面宜兼重，客观方面分三种方法（1）宣传。分为三：（a）学校；（b）小册子，（c）秘密演讲。（2）组织。（3）联络。分为三：（a）个人；（b）小团体；（c）大团体，如俄国。主观方面宜增高个人能力。

陈章甫：研究宜即时着手。宣传如文化书社，最有效力。我县自浏西文化书社成立，教育人员发生极大之忏悔，即其例。须从市民运动入手，多讲演，多联络，联络可仿颜习斋医病教人办法。饭铺、茶店，最好着手。组织菜园，实行从劳动界入手。夜学要多办。联络要自己到劳动界去，并宜及于女界。

邹泮芹：世界是积渐进化的，宜点滴改造，宜温和。从现时现地做起。注重教育实业。办教育实业要资本，但借外资，仍宜反对。宣传着重劳动阶级，为长时之宣传。教育是基本事业，从学校制造同志最为坚强有力，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募捐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由长沙而各省全国，积渐前进，久而可靠。办报注重通俗。

蒋集虚：做事要钱，筹办要从事实业，望各人分工进行。

易礼容：过激主义本不可怕，不研究自然怕他，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艺术家以暗示的方法行之。

陶斯咏：我所要说者，宜云："我个人即刻如何着手，"我的答复是："我个人要即刻读书"。

任培道：从自己读书做起。

毛润之：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依次发言毕，相互讨论，对于所举各种着手方法，多谓宜以必要而且切实可行者为主。主席遂将上面各人所述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左：

着手方法：

1、研究及修养：

A、主义；

B、各项学术。

2、组织：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3、宣传：

A、教育；

B、报及小册；

C、演说。

4、联络同志。

5、基本金：

组织储蓄会。

6、基本事业：

A、学校（又夜学）；

B、推广文化书社；

C、印刷局；

D、编辑社；

E、通俗报；

F、讲演团；

G、菜园。

于是主席以赞成上面六项各节为会友进行着手方法付表决，全体起立。(着手方法问题解决)

次讨论会友室家问题：

陈章甫报告巴黎会友来信的内容。并谓会友多感室家的苦痛，急宜设法解决。

毛润之谓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痛苦，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相继自述有室家痛苦者多人，有主张组织“夫人改造学校”者，有主张组织“工厂”者，有主张组织“女子工读学校”者，结果照巴黎来信，先组织“妇女成美会”，推举陶斯咏、易礼容、陈章甫、任培道为筹备员；究用何种救济方法，请四人筹商后得有结果，再行商决。

(以上室家问题解决)

次讨论“学会纪念日问题”：

一致主张以四月十七日为学会成立纪念日，各地会员是日分别集会叙餐。

次讨论“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大家认此为重要问题。惟“增进健康”一项，如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不便表决规定，应由会友个人去斟酌力行；但表决“增进娱乐”的各种集会如下：

1、游江会：阴历五、七、八三月择期举行三次以上。

2、游山会：春、夏、秋三季择期举行三次。

3、踏青会：三月三日。

4、聚餐会：每月一次，于每月例会日举行，每餐各备铜元二十枚。

5、踏雪会：遇雪临时集会。

6、毯　会：各会员自由组合。

(以上健康及娱乐问题解决)

此外尚有“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及“个性之介绍批评”三个问题，因时促不能讨论。等本年一月常会解决。

第三日自上午十时起讨论，至下午二时方散，是日全体至草潮门外河干拍照，大雪拥封，照后不现。

一月十六日，为长沙会友十年一月常会期，仍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二十一人。何叔衡主席：报告今天系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问题凡三：(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请大家先讨论第一问题：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

列席二十一人，依次发言：

何叔衡：我的计划狭小，将来仍当小学教员。想在我的本乡办一学校，在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同时不忘看书研究。以前想学外国文，但现觉年纪大了，不能学好。然还想学习日本文，以能看日本书为主。做事从最小范围起。

周惇元：目的在研究学术，想于文学及哲学上用一点功，将来事业则在教育。现在进行：想在两年学好英文。前想进学校，今觉中国学校无可进了。想在近筹一点钱赴日本，惟不易办。赴日虽不甚好，但一，可绝外缘，免去在国内时的纷扰；二、日本虽无独立文化，

但感受最快，并非无学可求。筹款困难时，或要借助官费。

彭殷柏：从前本想终身站在实业界，所以进了商业学校。后知商业学校不适个性，便把他丢掉了。从前我有一种野心：学好数国文字；对于形而上学，也想懂得一点大概；又想于实业上有所贡献，于海外贸易有所进行。但是现在变更了：觉得要使社会改造，非于经济政治上有所改造不可。前想留美，因无钱打止；后又想到法国去；去年以来又想赴俄，现仍想留法赴俄。在长沙，至多不过两年了。在长沙，除解决自己生活之外，还想帮助劳动组织。求学方面，还是初心，但文字只想学英俄两国了。

钟楚生：我自己觉得只能在教育界生活，并且愿意只在教育界生活。我从前本已进了中学，因故改入师范。师校毕业，因本省高等师范不好，不愿去，因此做了教员，因循至今，随便又是几年，将来仍想在教育上用功，想筹钱到日本去一次。

陈子博：俟中学毕业后再定计划，在长沙时，一面对于社会上做点事，对兵与工，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将自己的功课，预备一番。

谢南岭：我认改造社会，应当从最下级——乡村——做起，所以乡村教育，极愿尽力。师校毕业后，决定升学，或西南大学，或高师，或高工，升学毕业后，决在乡村中做事。改变普通人做便宜事做高贵事的心理态度。

张泉山：我从前只有求学上的计划，去年以来，又有事业上的计划了。我对于学问，想从数学、物理学、化学下手。现在有闲就读英文。我于自身生活以外，担负一个老弟的学费，因此当在长沙再留一年半，仍从事教员生活。

蒋集虚：想做一个教育者，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事业。师校毕业后，教书，积钱，再入高等师范，然后往外国留学。从事教育时，拟集合同志，自办学校。

毛润之：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罗耻迂：终身事业：教育。教育是为人类的，为社会的，所以对于社会学欲有所研究。研究的方法不能确定，或自修，或学校，或国内，或国外，至于目前，从阴历明年正月起，读英文。在五年以内，要使英文学到可以看书。

夏蔓伯：深信工学并行与脑体共用之理，想一面研究教育，一面学习工艺，这是目的。方法：第一决定在师范毕业，毕业后任教员几年，教书时并兼从事研究与练习工艺。十年后，再出洋。

邹泮芹：我的计划筹想了多年，几经修正，现在似乎有一点把握了。我意一个人的事业不外研究与发表两节。我个人想研究文学及哲学（广义之），拟以一年温习曾学过的各种自然科学，再以二年习文学，再以一年习英文。这四年中附带教课（不当主任），无课则事研究。四年后往日本，至少住一年，惟不愿进学校，因我从来反对他。此后再以五年求学，详细不能悬拟，或竟赴西洋亦难定。以上是我的十年研究计划，以后再从事发表。至我不赞成学

校，因学校不足成学。

易阅灰：我近来认定我自己最后要做一个教育者。预备工夫，先学外国文，至少学好英文、法文、日文，注重英文。将教育学与学外国文合为一起，看英文教育学。我又认学校无进的必要，决定在年半以内从事教书的工作。每天做四小时工，读六小时书。

陈启民：发言很长，记其大要。陈云：我个人计划，一是终身的，为终身读书计划。这是根据我自己的宇宙观和个性来决定的。我觉宇宙只是空间时间二者，时间是直线，空间是整块，都不是破碎的。我个性则是喜欢多方面。因此觉得宇宙间人之所欲学，皆吾之所欲学。宇宙间人之所曾论思，皆吾之所欲论思。文学、哲学、科学，皆吾之所欲学。我愿做一个学术界的托辣斯。学问暂时不能定系统。升学不升学，出洋不出洋，觉得皆不成问题。因学校不足以范围我，我可以利用学校，所以或者再入学校。至于出洋，世界上学问分两大支，一支属亚，一支属欧。我从前有一种见解，对亚洲想集中研究中国的学问，推及印度、日本。对欧洲则不能说集中那一国，所以想先研究亚洲学，这是我从前的想法。后来又想用西方的方法，求东方的学问，现在则想东西并进。至将来到外国去，以一国为常驻，以各国为游行，作一个学术界的猎夫，我于升学，不定在那一年和那个学校。至读书的时间，原无穷尽，死而后已。以上说终身的计划。再说目前的计划。为经济压迫，不能外出，但这正是成全我，因为我想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学。中国学的下手注重周秦；周秦以下，无学可说。宋受佛学影响，当别论，清为复古时代，自当研究。我想以历史的方法治中国的学问而集中于哲学和文学二面。我以为冷静方面的学问当在后，人事方面如政治、经济等当在先。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均大规模有组织，所以我对于西方学拟集中于政治、经济的方面。我从前有两年学好三国文字的计划，因事实阻碍，近又定了三年学好两国文字的计划。英文而外法文和日本文都是要学的。

贺延祜：我的计划随时变易，前学师范，无甚计划，毕业后教了几年课，想进高师，未果，现拟学医，因此想学英文，化学、生理学等。因经济不能独立，拟做两年事，集一点钱，再进医校，医系一种职业，可以救人。做事时兼学英文、化学。

吴毓珍：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因无钱恐不能去，现在还是筹钱。一面筹钱，一面读点英文。

陶斯咏：陈先生想做一个学问上的托辣斯，我只好做一个拣煤炭的小孩子。我在师范毕业后，因经济，不能升学，就想教课数年，储金升学，不料至今还是原样。久想邀伴自读，几经没法无成，去年想入北高，未果，去夏至南高，想入又未果。以后仍只在周南，一边做事，一边研究，从心理学，教育学和英文入手，同时想联络省城各处女友，我觉求友不一定要求胜，诸凡有志，即当联络。

任培道：从前许多计划都失败了，先前本想升学，后因经费及地点的困难未能，因决计当小学教员，一求增进经验，一求储积费用。在溆浦数年，亦无成效。去年想到法国去，也因无钱未成。因力辞校事，想在长沙专门对于学问用一点功。既到长沙，也不能实现，现在仍只好一面求所以解决生活，一面学习英文，再等机会升学。

吴家瑛：在学生时代计划和希望很大，及入社会经历数年，从前计划打消好多了！现亦无具体的计划可说，惟对于学问事业方面，总是抱一种（向？）前进行的意思罢了。

唐文甫：陈君以为宇宙是整然的，因此作成他的宇宙观而立定其计划。我的计划，也立于我的宇宙观，我觉得宇宙只是“美”。我觉得世界没有不美的。凡能引起我的美感的，我

就喜欢去研究。文学是能够表美的，诗歌尤是文学上表美的要品。因此，我欲于诗歌有所研究和造作。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也不管人人说好说歹，只求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此外哲学也想研究。凡求学一要有识，二要有胆，而胆第一，无胆则不能成学。吾愿戮(戳)破一切，做一个学问上的“冒失鬼”。年半内不出省，一面做一点事，解决生活，一面学英文及日文。年半后或入北大，或进南高，暂不定，自揣个性近于文学，将来想专力于此。

熊瑾玎：我觉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就早有发财的念头，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殖传》……看，常觉在中国这种社会底下发财有两条路：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做官要钻营，不愿干。经商我也试验了一下，因他种原因，停了。现在想从生产事业下手，从前与肖子昇等商量到东三省恳荒，因各种困难未成，现正在筹度他种方法。我觉私利可以不要，团体资本是该要的，增进我们的资本，方能发展我们的事业，苟可发财，不必择术。

以上个人的进行计划发表完。从前的朋友们，多将自己的计划看作秘密，不肯把他公开出来，因此别人不晓得他的计划，他也不晓得别人的计划，各人都打入闷葫芦里，要互助也无从互助，要结合同目的的人共做一样事也无从结合。这种“各想各”“各做各”的现象之结果：一，自己的计划如果偏了或错了，因无从得到纠正，便一直偏错到老死，所志无成，徒增怨悔，这类情形是我们常时看见的。二，自己的计划虽未偏错，而孤行无助，终归不能达到，这类也是常有的事。长沙同人鉴于此种弊失，乃有各述计划之举。各地会友均能同样举行，各述自己计划，以其结果刊登会务报告，大家看了，当得到种种益处。

上面个人计划述完，休息二十分钟，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

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大概从前的读书人，是照例不研究生活方法的；因此，竟弄成凡读书人社会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社会。吃饭问题，本来不容易解决，加以不研究，更不得不寻些湖涂方法去解决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除开一、二人因别种理由，不主张注重生活问题之外，其余对此问题都觉很为重要。讨论情形特记如次：

何叔衡：自身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

彭殷柏：常有三个问题，即求学、做事与生活，都难解决。但我觉得人只要有勇气，不应计及生活问题上去。罗素说：“应当想生活问题以外的事”我很相信。我们只要把求学做事的问题解决，生活不成问题。但我们生活，也要定一方向。许多方面的生活，如做官之类，我们不可去。只有教育界（除开别的新组织新生活）和作工，为我们所可采的方面。作工也有为难的地方，因为劳动界太无识了。所以我们做事，当有新组织才行。

唐文甫：在我们求学时，专心去解决生活问题，恐怕会要堕落，解决不了，便生烦闷。我现在在民治日报帮编新闻，一面不费多的时间一面可以得到少许报酬，用以生活并买书报。将来拟从事这一类一面可资生活一面便于研究的事。

陈子博：虽略有遗产，但父亲专制，不能容我自主；要脱离此种痛苦，非独立生活不可。现学未成，仍然困难。寒暑假中拟在文化书社服务，以所得工钱，供给学费。毕业后生活方法，要俟将来决定。

周惇元：暂任报馆事，解决生活。将来很想一切事不做，专门读书。但款须另筹。

张泉山：以教员为职业。

钟楚生：以教员为职业。

谢南岭：家寒，但能耐苦，物质上的生活很易解决。然无钱买书，将来升学，也很为难。近来想组织一个小小的工场，或印刷所，来解决生活。

夏蔓伯：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寄生虫；不惟自己，身上又有了两个寄生虫——妻、女。将来个人的生活方法，想从事手工业。现在师校尚未毕业，拟于年内着手办一小印刷局，以所获供给用项。毕业后以教员维持生活。家里有一父、二妹、一妻、一女；除父外，通是不生产者，故家庭生活，甚是危险。

易阅灰：我于消费，主张适当，不太奢、亦不太啬。饭取可口，衣取章身，房子求卫生通光气。至取得生活费的方法，暂为教员月薪，支出恐怕要以买书费为多。

贺延祜：生产（活？）暂时尚无方法，计划想学医，不能之时，仍在教育上做事，半工半读，消费不主太简，食住总以能卫生为好。衣以保暖为宜。

熊楚雄：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成问题，我们生活所以难解决者，就是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子弟。生活的方法，要想法子开辟。例如："送灰面"、"添洋油"两件小事，从前没有人干，经人开辟了，就是很好的生活方法。我们如果没有一点事做，也可以自己开辟途径。我对于生活费的使用，不大喜欢俭啬。因为生活奢一点，欲望必定也大一点，做事必定也勇一点。

毛润之：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艰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罗耻迁：生产方面：在教育上生活。消费方面：量入为出，不必俭。除自己解决生活外，还要解决家庭生活。

蒋集虚：物质生活，不外衣、食、住三项。现我决定家产一点不要，师校毕业后以教员为职业，与相知之数友同居生活，生活费互助，轮流升学。衣则十年内决定只穿布衣，食则每日一餐也可，住屋更可随便。至精神生活，则急要读书。我从前觉得人生无味，盖进化无已，没有底境，使人迷茫，觉得无味。近受杜威、罗素的影响，将凡事之无希望的方面，黑暗的方面，坏的方面，不去着想，专想有希望的方面，光明的方面，故觉颇有生趣。

邹泮芹：因要读书，生活问题也不得不计及一番。以我家论，本可自给。但能自己给书报费则更好。至于将来完全读书时期，便为难了。

陶斯咏：现在的生活：教书，学校办事。教书和办事的生活难靠，则烹饪，裁缝，编物。物质生活不困难；但自己不善理财，有钱不能储蓄。精神生活是一难事，因为要有学问才行。精神如鱼，学问是水，有学问精神才得愉快。

陈启民：精神生活，先前所说可以见大概，不重述，物质生活非个人所能解决，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生活的命。生活上太枯焦，太刻苦，必影响于心理。所以，我们身体上所需，必不可故意刻减。饮食衣服住居，都要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虽不要奢，总要"备"。生活的全体，非个人所能解决，个人只能尽力之所能去做。

任培道：现时生活，可以教书解决，衣食能安淡泊。

此时，吴德庄因事先去。各人依次述生活方法毕。互有讨论。周惇元云：劝善规过，最是要紧，我常感觉到虽时常有朋友谈论，总多闲谈，少有用诚恳的态度来讨论修学立身的问题的。希望会友注意此点。会面不为闲谈，劝善规过，讨论问题。又觉得我们在此时应该注重"自己改造"，不应加入团体太多，致牵涉许多事务，妨碍自己的进修。蒋集虚极赞周君的话，说："应该如此"。

陶斯咏云：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何叔衡云：朋友会面，宜多批评。至生活的切实方法，还须大加研究。毛润之不赞成熊瑾玎之消费主张，谓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此时何叔衡提议：想一个公众的生产方法，谓刚才有人提议办印刷局，我以为可以商议进行。毛润之云：文化书社有此计划，因“书社”只是发行一部，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一个编译社。夏蔓伯谓：如有人帮助组织，愿任进行。大家认此事甚属要紧，结果：决定另行筹议。“个性之介绍及批评”，因时间不早，未议散会。

各会友鉴：

第三号会务报告大略要本年年底才可编印。至通信集第四集稿已齐，本年八月可出。第五集的信稿，亟盼陆续寄到；极随便的信，极短的信（如明片）均请寄来。来件请寄长沙文化书社。

长沙发起俄罗斯研究会

长沙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瞻岵等，发起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事。二十一日午后三时，特假长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场，会议进行方法。到会者约二十余人，首由主席易寅村报告开会宗旨，继由陈家鼐演述俄自劳农政府成立之后，曾致电中国，宣告其国内情形，并表示对于中国极端的亲善。英法美等国先皆反对劳农政府，继见其确然成立，政绩甚佳，纷纷遣使通好。我国与彼为邻，不能不急起研究。并言曾在上海晤某俄人，得详询其政治实□，始知无识之人，所称均产共妻之说皆属讹言，某俄人并言极望中国人赴俄留学及作工互换知识云云。继经多人讨论，拟定简章，凡经会员三人介绍者，皆得入会研究。经费概由会中筹措。其会务列为三项：（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杂志。（二）遇有机缘及必要时，得派人赴俄国从事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此会成后，有益于湘人知识匪浅。当举定筹备员彭璜、毛泽东、包道平、何叔衡四人。俟筹妥后，即择期开成立大会云。

（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8月29日）

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

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十六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姜君咏洪自愿捐助百元，各会员亦均自认会费。将来关于派遣赴俄调查及发行丛刊等特别费用再行开会募集。因北京迭次来函称，俄代表到京已有接洽，湘省愿赴俄者既众，请先派一人来京。当决定派张丕宗君赴京，随同京团体赴俄。备信两函，一介绍于北京，一介绍【于】俄国。张君并决定于十七号起程北上。众均认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成〔陈〕腐之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结果决定四项：

（一）个人研究。会员各自搜集材料。

（二）开会研究。每星期六日下午会员自由至会所集会讨论。并于每年春秋开大会二次。遇有熟悉俄事之学者到湘则开临时演讲会。

（三）由会多备关于研究俄事之书报杂志，供众阅览。

（四）由上三种研究所得，合之其他特别译著，发行俄罗斯丛刊。

又因近日来会接洽愿赴俄者颇多，要求仿法文班办法开设俄文班，从事预备。当有郭开第君愿担任在船山学社开办一班，可聘在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云。

兹录该会简章于下：

第一条　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凡经会员三人介绍者得入会研究。

第二条　本会会务如下：

（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

（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

（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第三条　本会经费由会员自由捐助。

第四条　本会设干事三人，其职务如下：

（一）总务干事一人，总持会务，对外接洽代表本会。

（二）书记干事一人，任记录及文书事务。

（三）会计干事一人，经理会费出纳。

第五条　本会设通讯处于长沙省城潮宗街第五十六号。

（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3日）

《觉 悟》介 绍

“五四”运动时，天津的学生组织起初是男女分开的，这就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展，这两个组织的一些积极分子，感到需要一个比较紧密的、不分男女界限的组织，以便作一些新思潮的研究与宣传工作，于是就组成了“觉悟”社。据北京“晨报”报导，当时天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许多团体，然而其中“由纯粹的分子来结合而具有特别色彩的，确是微乎其微了，记者敢对诸君说，天津只有一个这种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这个团体就是‘觉悟社’，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做觉悟社。”①觉悟社成立时共有社员二三十人，后来略有增加。周恩来、邓颖超和已经牺牲的马骏、郭隆真等同志是这个社的主要成员。“觉悟”社成立后，北京大学一些进步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曾经到该社讲演。李大钊同志还向他们提供了意见。

“觉悟”社正式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成立后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叫做“觉悟”。“觉悟”原定于十月中旬出版第一期。由于社员忙于实际运动，所以延到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才出版。第一期上曾预告第二期“准于二月二十日出版，决不愆期”，但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一期，而且在当时的其他期刊上也没有见过第二期出版的广告。“觉悟”社成立后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领导骨干的被捕入狱，社员的分散，因此，到一九二〇年夏天就结束了。估计这个刊物的期数也不会多的。

“觉悟”第一期是大三十二开本，一百余页。比较重要的论文都是经过社员集体讨论后写成的，个人发表的文章又都用数目字的代号代替署名，因此作者无法考订。

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中说：“这个团体（按指“觉悟”社）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②。目前仅有的这一期“觉悟”，提供了不少能够说明“觉悟”社的活动和它的思想倾向的材料。

“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两篇纲领性的短论。从这两篇短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正象当时大多数的进步学生社团一样，“觉悟”社也是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着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和分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认为“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③。这已经表现了反对封建主义，憎恨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实际上已不可能满足于任何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就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好了准备。但另一方面，

① “现在的天津”，北京晨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② “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七期。

③ “觉悟的宣言”，第一期。

他们又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和宗旨，只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①。可见他们毕竟还没有找着真正能保证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科学理论，仍旧不能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他们把“人”的自觉看做社会发展日益进步的出发点。它说：“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自觉，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又说：“人生的环境，因着时间、空间，种种的不同同变迁，遂逼着人生出‘觉悟’；或者人因为各种事理的不同同变态，也生出许多‘觉悟’。”（见“觉悟”）同时他们还把“思想改造”，首先是学生的思想改造，看做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例如在“学生根本的觉悟”一文，他们列举了学生在心理上、态度上、行为上的三十二种弱点，说“总起以上种种的弱点来看，我们可以知学生界弱点不除，一切的觉悟全是空谈。没有觉悟，学生真正的责任也是永远做不到的”。

“觉悟”对于当时流行的一些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思潮，如“新村理想”、“工读主义”还是有吸引力的。第一期发表的“工读主义”一文，长达二万字之多。它对于“工读主义”的理解、主张，以及实行的办法，都作了系统的、具体的论述。它在解释“工读主义”时说：“‘工’是劳心的人，运用他的脑思去主使一切工作；劳力的人，运用他的五官百骸去发生一切动作，一同去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读’是从文字中得到种种的知识，去做一切的工作。”它认为“工”和“读”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人类的进化，是由‘工作’集成；成‘工作’的要素，知识是一个主要条件。我们要多促进人类进化的‘工作’，我们必须得有充分的知识”。因此，它主张：“人人应当工作，人人应当接续不断的读书”。它把“工读主义”分为两大生活期：一个是学校生活期，一个是社会生活期。学校生活期中的“工读主义”是以读为主，工为副的主要条件；社会生活期是以工为主读为副的主要条件。按照它所规定的工作范围，可分为贩卖、艺的工作、普通工作等三类，从生产到服务行业都包括在内。它企图通过“工读主义”，来达到“运用已具有的能力，吸取人生必需的知识，养成良好的精神同习惯，发展人类的天才，去适应人的生活，并且可以调剂人的生活”。从觉悟对“工读主义”的理解、主张，以及实行的具体办法等，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在“劳工神圣”这一口号的影响下，开始改变了对体力劳动的看法；但另方面，却说明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必须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才能真的做到“工”“读”相结合。因此，尽管他们想出了一套具体的办法，但是，仍然没有能够跳出空想主义的范围。

“‘急先锋’的女子”和“我们的姊妹”，是两篇反对封建道德提倡女子解放的文章。它们认为女子解放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思想革命”。就是：“破除迷信形式道德的观念”，“铲除男女心理不同的观念”，“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观念。”然后“实行解放”，即“与黑暗势力战争”。它们认为思想革命是“人人都能作到”，但是实行解放，“必得有魄力有毅力，本着良心主张，能与黑暗势力战争的人才能作到”。因此，就必须组织“小团体”，征求当“先锋”的同志。

“三个半月的‘觉悟’社”是“觉悟”社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也是我们研究“觉悟”社

---

① “觉悟的宣言”，第一期。

的组织和发展过程以及具体活动的唯一材料。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觉悟”社和当时其他一些进步社团比较，它具有下列几个主要特点：首先，它在组织上是比较严密的。该社的社员姓名一律不公开。它说：“社员用抽签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好替各人对外的姓名。”在吸收新社员时，为了要“预防名实不符的弊病”，因此，采取“严格的主义”，规定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并且介绍人要报告被介绍者的优劣点，然后经大家的批评，得全体社员的允许，方得加入。所以它的条件是要“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其次，是初步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在社员间进行互相批评，这是“觉悟”社最大的特点。因此，它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这样说：“那一天（按指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互相批评，结果是非常之好，颇能引起各人的兴味同奋斗。”第三，它充分发挥了民主精神。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如该社的目标、宗旨，以及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社务等问题，都是经过共同研究和反复讨论的。例如“学生的根本觉悟”和“工读主义”就是经过讨论后集体写成的，因此，就保证了它们在思想上对一些根本问题能有一致的看法。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觉悟的宣言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湖得很利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在这种时期内，我们天津有些学生也本着这种感想，集合起来，打算发行一种不定期小册子，用“觉悟”这两个字，做他的名字。这个集合的团体，遂叫他为“觉悟”社。

“觉悟”社的名字在社会上传布了三个半月，然而“觉悟”社的小册子，——“觉悟”——还没见他出版。社会上想要看他批评他的心，未免有“迫不及待”的情形，并且人人怀着一种“‘觉悟’到底是怎么样？”的念头，寻问催促的很急。但是外界催促的愈急，我们内部的恐惧愈甚。我们标榜的名字既是“觉悟”，我们小册子的内容，要没有一点“觉悟”的实质表现出来，对着社会实在是惭愧，并且还要夹着一种“哄骗”的成分在里头了。

因为恐惧，遂越发迁延。迟到现在，我们“觉悟”社内部的组织，经了几次从“觉悟”上得来的改变，稍稍有一点粗具模型的样子。我们小册子——“觉悟”——也经了几次变化，方敢大着胆子决定出版的日期，要在社会上露第一次的“面孔”。

“觉悟”的主旨同内容经几次的毁改。现在的结果是要本我们“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发扬宗旨的方法有四种：

一　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

二　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

三　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

四　灌输世界新思潮。

我们从这四种方法里，要表现我们能够“觉悟”的程度。但是，是否合于现代“觉悟”的潮流，我们很盼望社外边的人从旁观的态度上能够给一种严重的审查，深刻的批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至于“觉悟”的程度够不够，我们全是学生，决不敢说已经“觉悟”，并且也不能说是现在已经“觉悟”。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少 年》介 绍

"少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来是中共旅欧支部）出版的内部刊物，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在法国巴黎创刊，编辑所设在巴黎南区的一个小旅馆里（这里也就是那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中心机关），由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负责刻写蜡板和油印。由于刊物的内容充实，战斗性强，受到了旅欧中国工人和勤苦学生的热烈欢迎，但限于财力和人力，印数是很少的，现在也很难搜集。

"少年"是月刊，红色封面，十六开本，每期三十余页。"少年"曾停刊过两个月①，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复刊出版第七号，改为二十四开本，四十二页，通信处改为巴黎西郊华侨协社转交。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第九号出版时又声明自第十号起改为不定期刊。已见二、三、七、九、十、五期，第十期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九号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第十号封面印有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段话。"少年"的代售处是巴黎中国书报社和加拿大华人工会，中国的代售处是上海新青年社。

"少年"具有鲜明的党刊的特点，它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共产主义，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勤工俭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此外，还登载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世界工运、青运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消息。

"少年"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肯定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富强。第二期上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和第三期的"现在中国少年应有的觉悟"两文就是集中阐述这一问题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是周恩来同志以"伍豪"的笔名发表的。周恩来同志在文章中肯定共产主义是"能够解决世界乱象"的"救时良方"，对于中国也是一样。他说："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他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情况，认为开发实业是不必争论的问题，但究用何种方法来开发却大可注意。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因为中国不具备发展民族资本的条件："1.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2.民间多量资本，3.科学的人材与机械的自造，4.关税自定权，5.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平，在中国今日竟无一事可以备格"。何况，不管用外资内资，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不要说他无真正发展中国实业的可能性，便是有，我们也决不甘从属于他"。接着，周恩来同志分析和批判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指出"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共产主义者决不

① 见第七号封面。

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为政权在一个生产阶级手中掌着，并且要消灭阶级界限，所以只有共同的生产者，将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别，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分别了。劳动者是无祖国的，所以乃能联合起全世界的劳动者来消灭这个竞争和侵略的野心，而产生共同生产的大计划。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文章的结尾指出，中国实现共产革命以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这篇文章表现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鲜明的立场和革命远见。同样，"现在中国少年应有的觉悟"一文，也驳斥了武力统一和由资本家开发中国实业的谬论，强调中国必需走共产主义道路。

"少年"指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一个"先驱"或"前卫"，也就是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①。同时，"少年"也对在党的领导下的青少年组织的作用作了阐述，指出共产主义少年团是为党训练少年，培养候补人才和生力军的，团居于共产党的从属地位。共产党"完全是指导无产阶级群众走入共产社会独一无二的党"，而团的方针则是：1.在政治上受共产党的支配；2.作成群众的团体；3.注重教育事业。总言之，便是在无产阶级少年中本着共产主义的信条互图训练。至于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少年，除去普遍职务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职务："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考察并学习其活动的方法；这是我们旅欧的第一使命。其次，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朋友，乃我们认为立在同一被压制境遇下的人，且更多无产阶级的少年。……我们在勤工俭学生同工友运动中的一切参加，也是本着我们的职务，来为无产阶级少年谋全体利益的"②。可见，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基本上正确地理解和阐述了党所领导的青年组织的使命，正确地规定了自己在旅欧中国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任务。

由于交通隔绝，旅欧的共产主义者一时还不能和祖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密切的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是和中国共产党完全一致的。在"少年"的第二期上曾经号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而且向读者宣传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出"这种办法，乍看诚不能不诧异，然平心静气就中国现势一想，便不能不见其出于不得已。他这种办法，与现在德国共产党赞助民主派，共同抵抗反动党，用意实无大异。凡是明白事理之人，如何能不谅其苦衷？"第七期上登载了分析中国政党和社会各阶级的"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怎样在

①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第2号。

② "我们的职务"，第3号。

中国应用”一文，结论说：“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努力组织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之革命分子为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主力军，再逼迫其余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加入此联合战线，至少也要他们消极的离开帝国主义的牢笼不做反对的运动。在这战线上，我们应该用‘建设统一的独立共和国’为口号以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这是和中共二大文件精神一致的。另一方面，“少年”也强调这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一种手段，“在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①

不破不立，“少年”在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党的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粉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理论。“少年”曾经驳斥过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张，指出“他们的主张与活动方向，总而言之，不外趁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少年”揭露了他们的主张的阶级本质，他们的主张如果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就可安稳，至于农工，不但不能得利，而且至少一部分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绅与农工，生活方法不同，知识阶级原来是资本阶级（靠资本生活的）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资本阶级，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他们的“好政府”即使真能得到，也不过与英美等国的政府如一丘之貉，在这种政府下，劳动阶级还同样是生活不能得安的。②。此外，“少年”还驳斥了国家社会主义者，质问他们：“国家最高的统治权究竟在何种阶级手中握着？民主政治普通选举是不是欺人之谈？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是否便能消灭？自私的资本家是否便能容一切产业收归国有？农业问题又将作如何解决？且在中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外资将如何排斥，内资将如何聚集？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民主主义的‘好政府’如何能凑立起来？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是为了何人？”③这一连串问题都是击中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要害的，也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本质。

在旅欧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发行自己的刊物“工余”，经常散播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少年”用许多篇幅来和无政府主义作理论斗争。首先，周恩来同志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面目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少年”的态度是积极地作理论斗争，但对于他们的无理谩骂则置之不理，在“少年”第七号上说明了这一态度：“至于在形势上成为对敌——实则毫无所谓——的所谓的无政府‘党’人之随便乱说，

---

① “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第2号，引文按勘误校改过。

②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第2号。

③ “共产主义与中国”，第2号。

我们站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的青年同志，只有在学理上愿与无政府主义者辩驳讨论，若是出之以嬉笑谩骂的态度，完全不具有主义信仰的青年的精神，则我们绝不至认为有作相对的回报之价值，而但与对待无聊的反动者一样，虽然是太宽泛了，但其意义本是相等的——暂时只有'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①又说："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知高唱自由，忽视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群众意识，专门占据在抽象的观念上，发些空论，以迷惑群众。我们见到这种事实，自然不能忽视了我们当前的工作：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②。"少年"遵循了这一方针，和无政府主义者作了实事求是的论争，发表了一些颇有说服力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的焦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的"工余"杂志上发表很多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反对任何国家的谬论，说什么"共产党之革命志在夺取国家之权力以压制群众，我们无政府党之革命志在废除国家以解放群众"、"俄国革命之第一幕，波尔札维克党将土地从农人之手夺过来，然后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及强迫工人将十月革命所得之工厂而让于国家。""无论他（按指国家）是沙皇的或波尔札维克的，都要推翻他，无论什么都不肯让给他。""阶级战争是一件事，劳工专政又是一件事，不能混为一谈。阶级战争乃社会进化路上推演出来的一步。劳工专政本为强权的共产主义派所要造出来的方法。""数年来俄国之所谓劳工专政者，实际上不过共产党专制。劳工终日只知政党之竞争，而真正之阶级战争故无从实现"③。"我们不愿意治人，我们也不愿意为人所治。我们认定治人是一种罪恶，所以人家若问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我们很简单的回答，主张无政治"④等等。最可笑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法文的 Larousse 百科辞典上搬用定义来解释"政治"一词，用这个资产阶级辞典上的解释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少年"发表了"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七、八、十号）和"工人与政治"这两篇文章，彻底地粉碎了这些谬论。

前一篇文章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就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治运动等问题逐一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文章指出，无政府党人只知咬文嚼字，却"没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历史的常识，没有空间时间的观念，因之，你（按指无政府主义者）即没有社会进化的概念，所有社会的真实的关系你都看不出来，所有流通的事变表现在你的眼中都是死的，整个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进化之客观的事物的势力"，却认为它"本为强权的共产主义派所要造出来的方法"。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懂得什么是政党，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是：政党即是官僚，官僚是坏人；共产党也是政党，所以共产党也是坏人。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也说什么"阶级"、"阶层"，实际上对于社会的阶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并没有明了的认识，所见到的尽是一些散乱的民众，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人只有一些治人阶级——官僚资本家——是坏人，其余的都是平民，是好人，而"这些坏人都仿佛是一些海贼偶然打我们地上经过，而其余的平民都是归真返朴的"，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没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没有旧的思想习惯的包袱，因此"这些平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都好比中了传染病一样：

---

① "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第7号。

② 同上。

③ 以上均见"工余"8，11，13各期，转引自"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第7号。

④ "工余"，转引自"工人与政治"，第10号。

无人不中，无人不中到一样深浅。所以平民很容易一致，不须有什么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参谋机关为他指导方向，运用战略，即将这几个坏人打得一溃而散，永不回头。'这时候阶级也废止了，战争也消灭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当天就来了！”文章还引用了恩格斯的“论权威”中的话来驳斥无政府主义者盲目反对权力的谬论，同时也分十二点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①。在第十号的续文里，着重就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问题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揭穿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并没有打算要实现无政府主义，徒说一些玄学的混沌思想，如'彻底清源的去寻求人类生活真正的道路'、'自然界底事和人类真正生活底实际'、'当彻底的了解人与人类底自然现象与正当的意义'（见“工余”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号）。甚至你们对于社会革命毫不负责任，专拿一些'野心家'、'权利欲'、'官僚'、'魔王'、'拍马屁'……毫无意义的、只须不顾一切可以加之于任何人的谩骂名词来与反革命合作”。接着又正面论证了“革命就是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争斗底逻辑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根据资产阶级字典的定义，把“政治的运动”当作一个玄学的或教义的观念，当作一个“永久的实体”，借此来一般地反对政治运动，文章针对这一曲解反驳说：“在你们，你们以为政治就是治人的秘诀；这治人的秘诀就是由少数专做治人事业的人造的。这样的仿佛认定了社会上除开因阶级利益的冲突形成阶级统治底关系（即政治底关系）外，还有一些魔王专造一些政治的关系加入在我们的社会里。至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我们解决一切社会的问题都不忘却社会底阶级的关系。政治是由阶级对抗形成的。阶级底统治是政治底统治。阶级底争斗是政治的争斗；争斗即是作战，作战要使用战略，战略是政治的。使用战略就须要使用战略的人。因此，所有阶级争斗的问题，小而至于部分的要求，大而至于夺取政权，都是政治的问题。只须社会上有阶级的关系存在，我们都脱不了政治的网罗”。这样，文章就全面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在文章的附识中，作者表示还要就共产党的作用、中央集权、苏俄新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论争。

“工人与政治”一文是为了回答“工余”杂志上P.P.对于作者在“工人旬报”②上发表的“工人与政治”一文的曲解而写的。文章一开始就阐述了三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不是任何人可以煽惑得起来，也便不是任何人可以否认得下去；这种必然的步趋，完全是由他们的生活条件来决定的。“现在中国各广漠城市中的手工生产者和资本主义化的机械生产工人以及交通工人、运输工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完全改变了。他们为求他们在现社会的生活发展起见，对于政治上相当的权力和日光空气有同样的需要。我们试看现在国内工人阶级壮烈而且方在扩大的政治运动，就可以知道这种澎湃的趋势了。”第二，“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求经济的解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私利的阶级他怎样才能垄断生产手段？怎样才能屈服劳动者于隶属地位？他是使用什么方法以维持这种'垄断'继续这种屈服？不用说，是因为他把持了统治的最高权力在他的手里。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求经济的解放。为求经济的解放而争斗，是政治的争斗；因为经济权关连于政治权，有产阶级是凭借政权以巩固他的经济的掠夺制度。”第三，“阶级争斗，便是政争。因为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总是为着权力。罢工呢，当他蔓延及于全国的时候是摇动有产阶级的国

① “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第7号。

② 旅法华工总会的机关报，宗旨是“筹划侨工教育，唤醒阶级觉悟，贯输工人常识，供给正确新闻”，见“少年”第7号上的广告。

家基础的，这样也符合了政治的意味了。要想推翻有产阶级，要想打破国家，便是进行政治的争斗；要想创造我们自己阶级底机关去驾御钳制那般反抗的有产者，不论是何等样一种机关，那便是拿到了‘政权’。因为我们给‘政治斗争’所下的义解，便是被支配阶级努力去破碎支配阶级的政治权力的争斗。我们给‘政权’两字所下的义解，便是一阶级用以反抗别一阶级的组织权力”。接着，作者详尽地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最后总结说：“国家即统治的最高权力，原来不是圣灵的产物，所以不会由我们一个空洞的否认，便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他灰化。我们要废除国家，则当考究他的来源，找到他的去路，使用必然的手段，把他送尽（进）坟墓里面去。所以惟有马克思主义者，乃真实的能消灭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是丝毫不能影响到政治本身的实际存在的！”此外，第七号还从“共产国际”杂志第二十一期上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红工团国际”一文中摘译了一段“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篇文章从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推翻了有产阶级”这一假设出发，具体地分析了他们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即：在国内攻击反革命的斗争，用武力抵抗外国军队的干涉，组织大规模生产等，通过了这种分析证明，无产阶级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创造一个专门行政机关；一个专门生产机关；他们应该创立‘工人国家’”，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即不自觉地否认了革命。这是由于完全不明了社会争斗底实在性所致和对于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只有一点抽象的（并带有玄学的）概念底结果”。总的说来，“少年”上驳斥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的理论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自己写作的理论文章外，“少年”上还发表了列宁的“告少年”（即“共青团的任务”）、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离开政治的性质”（一八七三年在伦敦作）等著作的译文以及共产国际、少年国际的一些文件与消息。一九二三年五月出版的第九号为了纪念五一、五四和马克思诞辰，发表了“我们的呼声——敬告中国的工友和学生”（结尾说：“工人解放须要工人自身起来做；而共产主义者在被压迫的民族中更是处处要与民主革命派合力协作的。中国的工友学生呀！我们向你们的呼声是：革命！革命！为我们自由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呀！”），并从法文“人道报”翻译了一篇“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概括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

“少年”出版一年左右后，改为“赤光”，我们只见到第三十三期，是“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特刊”，是在五卅以后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出版的，也是三十二开的小册子，共六页，白色封面，油印，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的名义共同发行，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共产主义与中国

周　恩　来

从经济现状上立论

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但在中国，这种观感似乎尚未能深种于人心之中，有些知识界中人尚谈虎色变，有些人竟意存鄙视。至于无产阶级中人因为知识的幼稚和信仰者宣传的不力，竟致切身的问题莫由认识：这更是一个最大的憾事。

共产主义果与中国无缘么？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

我们不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赶机会，图改良在欧美已暴露了他们无能，我们也不必来走这条死路，乘火打劫，在中国不但做不到，便是有朝一日幸而从中取了一点渔利，于大多数贫民阶级又有何益？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

我为简明地解释这个关系，特把他分篇来说。

此篇先从经济现状上立论，以中国今日的情势，开发实业，似乎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必然趋向，其实究用何种方法来开发他。却大可注意。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舶来品是由国外输入的，狡猾的外国资本家不愿绕这个大湾，且不堪于其本国市场的竞争和劳动革命的迫切，他们都会来择肥而噬。利用中国的贱工，原料和无心肝的市侩，难得意的留学生，于是中国的铁路，航路，银行，工厂，矿山，邮电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了。不要等到将来，便是眼前的中国，试问一问"果是谁家之天下？"新银行团既在那里虎视眈眈，引虎入室的又有那归国的留学生，和特重外国语的学校学生，来唱里应外合的活剧。裁兵借外款，办实业借外款，限定留学生专学一点一偏的科学用退还的赔款来接济，这除掉眼光太狭的日本人有点异议外，欧美各国大都表示极端的赞意，其中心宁复可问！

排除外资而仍用袭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则其方法中所必须先决的条件：1、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2、民间多量资本，3、科学的人材与机械的自造，4、关税自定权，5、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平，在中国今日竟无一事可以备格。如此，而欲提倡国人投资，而欲空言抵制外货，而梦想军阀将变为财阀，这也无怪以暗结外股的张謇认为中国的实业家，以毫无企业能力的梁士诒称为中国财神，以只知浪费的督军视为中国将兴的财阀了。

且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不要说他无真正发展中国实业的可能性，便是有，我们也决不甘从属于他。

资本主义如是了，我们且看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开发实业方法果属如何。

讲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以为实业开发可以籍国家之力来一手包办，以免掉私人在企业上的竞争，生产集中，利用大规模的计划来开发缓进国家的实业，消除私人间的竞争：这是我们所赞同的。但是国家最高的统治权究竟在何种阶级手中握着？民主政治普遍选举是不是欺人之谈？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是否便能消灭？自私的资本家是否便能容一切产业收回国有？农业问题又将作如何解决？且在中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外资将如何排斥，内资将如何聚集？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民主主义的“好政府”如何能凑立起来？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凭籍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是为了何人？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也许有时候要提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迂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工团主义和英国行会社会主义，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虽至今还无法相容，但在经济制度上却有一个相同之点，便是都主张产业自治，都反对生产集中。工团主义是带有革命性的，所以还主张大同盟罢工，行会社会主义竟要以妥协与渐进的手段，民主主义的政治，来实现产业自治，结果乃变为劳动运动中的左右派了。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革命后而产业自治，试问以中国土地的广大，工人知识的幼稚，交通运输机关的不备，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压迫，民族性的散漫，从何而自治起？若知其弊而不得不以统一的机关为之施联络，为之图进步，为之谋便利，为之坚防御，则共产主义所主张的劳动会议制度和最高经济会议的组织乃正是使工人于工场管理，农人于田庄共产之外能得到个相当的集中和联结机关以便运用，这岂要徒说产业自治的人在那里鼓煽人心！再行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中要算最狡猾最调和的，其坏恰如受资本主义之毒最深的英国人性，以中国情形，要用他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也只好让那些到了湖南才知中国人穷的张东荪辈闭着眼睛坐在屋里乱讲去吧，好坏都与贫民无关，本来他们都是些英国绅士派的模仿者啊！

最后，我们要论到共产主义了，在共产主义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要占极重要的部分。我们本着他的见地，深知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他的生产渐趋于集中，乃在他的自由竞争，互相侵略；不在他的大规模生产，乃在他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不在他聚集工人到工场门口来，乃在他以少数工资换得多时间的剩余劳动；不在他利用科学，乃在他闭塞工人的知识，欲求保存这个产业革命后的优点

而消灭其毒，则除变更经济制度外实无他道。本来旧制度已束缚现在生产力的发达了，在自然趋势上，终久必归崩溃，但我们决不能明知其为害于世，复使他在中国得苟延残喘起来。

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为政权在一个生产阶级手中掌着，并且要消灭阶级界限，所以只有共同的生产者将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别，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分别了。劳动者是无祖国的，所以乃能联合起全世界的劳动者来消灭这个竞争和侵略的野心，而产出共同生产的大计划。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

由此看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

他所以为中国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至于抑止，则中国民族根性与科学革命产业振兴本已格不相容，还不能和现代生产力变化的趋势抗，那么，抑止的学说又有何效！转不过使无抵抗，宁静无为，知足常乐，隐遁的思想在中国人脑筋中多孳生点，好便于外国资本家的侵略掠夺罢！

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中国人诚然穷得不堪，但因开发实业，而接收外资，而受外人监督，想为我们所不忍为。提倡国内投资，不仅我们不愿为，亦且国家情势不得为，国际情势不许为。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

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

“宁缺无滥”：这是改造中国的必要精神。实业暂时可以不开发，新银行团的款子却不可以再借，资本家的机会却不可以多造，教育暂时可以不扩充，外国暂时可以不来，教会立的学校却不可入，中外资本家捐助的教育基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穆藕初资助的学费却不可要。

我们唯其知道教育实业的发展都系于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且更知其为当务之急，所以才大声疾呼宁舍去一时的小利而图全民族全世界永久的相安。我们唯知其急，所以才主张大家都赶紧团结起来到同一的旗帜下，以利进行。预备之期越短，我们所认为缺憾的也越少，绊脚的锁练也捆得越少了。

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至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

“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二二、八、十六。

（原载《少年》2期，1922年9月1日出版，署名：伍豪）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

周　恩　来

新近旅法学界中有些人集资编印了一种非宗教的册子，名《无所谓宗教》。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当做的事。在那本册子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要算是杰出之作，只可惜文中最后一段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殊令人大惑不解，且适足为全篇根据科学精神反对宗教的污点。著者曾谓“吾人不能于物质世间之外，复有非物质世间”，“……吾们的人生，是实际的人生”。“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这是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的问题，应让社会改革者去解决”。总此数语已知著者是接近唯物史观的了。著者信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然则科学精神又如何？著者说，“……种种社会上问题，我们发现了他的不安，我们便立当研究一个改革的办法，有了办法，我们立当去实验过了，如果有错，我们也可拿以再去更改。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又有去研究，去试验，终可以试验出一个最良最适的制度，除了我们不去试验，不肯改革，则终身困苦……”

我们试问问著者，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有一点不合于上边列举的话么？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间”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争斗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　”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铲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铲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试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

至著者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我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岂也受了罗素谓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暗示么？其实罗素所指多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来革命精神多出之热烈的情感，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这种培植情感使趋重“实际”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须要他，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牛顿没有他，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他，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们现在看来，牛顿有些地方的精神未免白用，但是安斯坦以前二百年的科学世界，果是谁的领域？且当其时，即至现在，又谁能说他是迷信？

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参加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与"信仰"之别（其实只说一"信"字便足），再申说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准此，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

共产党人对于他种为有产阶级作辩护，或是无形中阻人前进，引人空想未来天国的种种学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而更加上合乎"实际"的批评，这正因他有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决心，他决不能学自由论者之徒尚空想，还以为是乃本诸科学精神。为要解决物理学上的问题，所以牛顿，安斯坦各信他们的发见为"不易之良方"；为要"铲除社会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才信"共产主义为不易之良方"。假若我们对于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研究出来，急待试验的共产主义，信而又疑，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信仰，又何必谈"试验"，谈"改革"，相信安斯坦学说的人，才肯替他证明日蚀的移动是合于他的理论，替他奏此凯旋。那么，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凡是相信某种人的学说，对于其著作，无有不珍视之理，何况急待试验的学说，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

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著者止知俄党爱护好的首领，也知各国共产党人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么？即在俄国当日，此类事亦极多。

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

著者对于《资本论》亦曾读过未？不知其从何而证明"《资本论》所搜集之事实，即以最有力的暗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因为《资本论》搜集的"事实"（注意此两字），甚有伤"上层阶级"的体面，多是些残暴掠夺的罪状，遂谓马克思籍此与人以暗示，马克思本此以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下层阶级"当将握特权的"上层阶级"赶走，好消灭阶级界限，此不仅暗示，马克思且曾彰明较著地嚷出来了。但著者如此说法，不惧犯有拥护有产阶级的嫌疑么？然则又何解于"铲除痛苦的病根"与"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之言？若以宣布一种阶级一派人的罪恶便以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则《无所谓宗教》一书也具有宗教精神作用了。

至其谓"驱下层阶级以杀上层阶级，率共产教徒以制服异己……"我们第一须认清在共产主义中所认定的"上层阶级"与"异己"果属何人？共产党人指导劳动阶级驱逐有产阶级和附属他的军阀官僚，更使之由有产化为无产来尽人人劳动的义务。这种解脱人类全体，引人向善，并使之有路可走的精神，岂轻轻可以"报复争权"等字样抹杀掉的么？至于杀与不杀，那纯视反革命的举动如何为定，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除非著者与读者是抱无抵抗主义的人，尚可以"杀"字动人，然而又何解于"消灭此不平的政治组织"与"铲除痛苦的根源"之说，且更何解于"科学的精神"？

强他人迷信其教条，故基督教说爱之结果为杀。共产党人不仅不说那"爱仇如友"的空话，且也未尝"强他人同其信仰。"反过来，恐怕那有产阶级却正在利用宗教精神使人人麻醉于"自由思想"好听的名辞之中，无形中却为旧制度作了保证而不自觉呢！然则"十字军

之东征”“左手执《克兰经》右手执刀”的譬喻，也止有放在“上层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异己”身上为当了。

至于说到“得势”的赤俄，则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更使指导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充当先驱，乃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有何足怪！若谓“以首领之意旨强迫人民服从”，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再“人民”果何所指?若谓赤俄首领为拥护无产阶级利益起见强迫反革命派的人服从有类于罗马教皇，立意未免滑稽。著者试沉心想，今日世界除赤俄外，果是何种阶级的天下？我们果受了何人的强迫而须得服从？且所已得的自由又是什么？不要说实行反抗旧制度，反抗“上层阶级”了，便是为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而有所结合，有所主张，也要常常受那维持特权阶级的法律干涉，而社会上受了宗教精神之毒的人不一定是教徒更要轻蔑排斥你到了万分，并且有生以来便无形中受了各方教育的限制与暗示。试问自由在那里，自由思想更从何说起？旧制度旧思想既然把人心锢蔽得这样，一旦无产阶级为解放人类全体，而夺得政权，在过渡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对他如何能不加以限制？不然，还得请出“沙”，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好了，但又何必“改革”，又何必“实验”？又何必“实现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以图“铲除痛苦的根源”，而得到未来真正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呢？

著者自信为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了，但他文中这最后一段话，实太不科学的了，太不肯跳出旧思想的圈套中来自由思想了。

著者立论着眼在“掘去宗教之根”。但此“根”隐伏之所决非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凡是那描写出一个理想的天国，而无法实现的一切学说主义，都还有宗教迷信的毒根在内，即著者“成功即在目前”之言也都含有几分心理上不科学的宗教毒质在内想又为著者所忽略了。凡真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人，也都有责任去纠正他！

（原载《少年》2期，1922年9月1日出版，署名：伍豪）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第　一　号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周　恩　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

我们旅欧共产主义少年团体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曾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名义与同志们去过一封公信，诚恳地声明：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同时并向团中建议三事。此信当由同志李维汉（罗迈）携带回国，并委他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正式接洽，计时当已达到。

罗迈行后我们在此静待好长期中，忽得到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已抵赤都的消息，由不得我们不立即去信表示我们诚恳的敬意，同时并切实声明我们此间团体加入国内青年团一案亦已正式提向国内毫无犹疑。其后代表团由老辅同志复我们一信，希望我们"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在此名称组织之下而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改为"执行委员会"；同时并指示我们对于团中纲领的误解和在欧行动的方略。我们在今年一月得着这封信后，益觉我们团体的名称组织有急于改换的必要，于是乃有多数同志提议不待国内信至即实行改组，立即归属国内本团，以明我们去年六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执行委员会因此更进一步于二月间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实行改组。会期自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地点在巴黎郊外。会议内容，报告，演说后，第一案即为：依据去年十月总投票结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遵守其纲领并章程上重要原则，以确定本团体在欧之名称与组织。我们当即依此议定了我们旅欧之部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随即遵守国内本团章程上重要原则，依据我们旅欧特殊任务，议定旅欧之部的章程（原文见附件一），明白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至于旧日托罗迈同志带回国的三个提议，名称说已不成问题，纲领修改更由此次大会自动地决议撤销了。章程旧提者已多不适于用，现此新定者乃为我们正式向中央提出请求认可的现行条文。同志们，这便是我们旅欧少年同志依着共产主义的纪律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归依。我们更坚信你们必能欣然承诺，来指示我们旅欧的行动方略，——在我们看，这实是毫无疑义的。

在此次大会中，我们讨论的事件非常之多，详细的报告，不久将誊印有团务报告出来，此处不及详写，止先写个大概如下。

1、旅欧青年团的团员在开大会时总数已达七十二人，到会的代表为四十二人，全体人数分配为：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

2、开会时同志赵世炎为主席，同志任卓宣，薛世纶，赵光宸，穆清四人为记录，四日大会均如此未变。

3、通过案件约二十项，重要的为：

一、改组案——决定名称，议定章程（详情见前，不及）。

二、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

三、学生运动问题——主张维持勤工学生的总团结，同志们活动须量力而为，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

四、华工运动问题——决定维护现在我们同志所主持的“华工总会”，实力援助华工旬报——工会机关报——努力图华工教育实现，以便吸收同志。

五、内部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

六、《少年》出版问题——因留法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馀》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足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于是乃仍决定继出《少年》月刊。

七、经济问题——每个团员月担任十二方月费。

八、通过撤销前向国内中央希望修改名称改正纲领的两个提议（本来我们对于纲领内容怀疑之处早已打消了，此不过作一番形式上的撤销而已）。

九、请议决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案——议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十、请开除张伯简（红鸿）案——此为不服旧执行委员会警告红鸿决议提向大会之抗议，但结果仍被否决，接受执行委员会警告原议。

十一、弹劾张申府案——在大会中旅柏林同志们的代表伍豪(周恩来)声言因大会①及执行委员会②仍认R（张申府）为团员，而R在柏林地方会确已屡次声明退出少共，伍豪自己亦曾向中央报告过他持不同态度，因此无法为大会仍为团员的R做代表。因此遂有团员提议成立弹劾案。继追究R为何在地方会声言退出少共，乃推论到年前执行委员会因其于弹劾红鸿案罗织罪状过甚，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与以劝告，R不接受。嗣经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将此案不再追究，惟R仍不满意，辞“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置执行委员会不理，最后至大会始更发现其又有退出少年之声言。准此情形，大会认定R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R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惟R本为中

---

① 大会认旅欧少共全体人数为七十二人，申府确在此数之内。

② 前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乐生报告执行委员会永未接柏林地方会书记报告他R退出少共团体，且其报告信中更常言张申府出席发言建议，却未道及他退出少共事，直至此次大会，伍豪替柏林地方会廖焕星向大会报告柏林地方会事务，方始说出。

国共党党员，此种决议如何，实有报告中央请转达中国共党之必要，因此我们对于此事仍将有详细报告寄上，此处祇不过先说个大概。

十二、弹劾旧中央执行委员乐生（赵世炎）雷音（王若飞）伍豪（周恩来）石人（尹宽）林木（陈延年）案——准上项情形，大会当认旧执行委员五人处理R事过于懦弱疏忽，决议成立警告案。

4、选举新执行委员五人：捉掀（任卓宣），伍豪（周恩来），石人(尹宽)，裸体（汪泽楷），觉奴（萧朴生）当选。候补委员三人：大冶（刘伯坚），戈般(王凌汉)，钟声（袁子贞）当选。

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立即组成，推选伍豪为书记，石人主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事，裸体主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事，觉奴主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事，捉掀主任"出版委员会"事，并依大会一切决议，循序进行。本此，我们先写此第一封报告信寄上，至其他进行事项，与中央希望我们在欧期中应有之外方报告，自当陆续报告无误，兹先在此声明一下。

又本团旅欧团员在开大会时数目为七十二人，其中除R已为大会除名外，余七十一人中，有同志刘清扬亦已准备回国，同志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十二人已预备起程赴俄入东方劳大读书；除最后三人外，余人均为人德事稍有阻碍，现正多方设法，想不久当可成行。

再我们要慎重声明的，在我们此次大会将开会前，我们得到中央一月二日寄我们的信件，希望我们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的办法加入青年团，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正式代表亦已派回国去接洽加入事件，到莫的中国代表团又曾和我们表示过前述的改组希望，而我们自己又正在自动地召开改组的大会，于是我们乃在大会中诚恳地接受了你们希望我们的好意，而实行改组成上述的组织，附依于你们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同志们，这个办法，我们想你们一定予以谅解！

巧了在我们这封信尚未写完之时，我们竟得着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许可我们加入的公信，我们看着后真欣喜无量！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至中央命我们更改章程的六项和停刊《少年》的事，在纪律上我们当然是接受无疑，一俟执行委员会全体（我们现时止〔只〕有三人在巴得见此信，余二人尚在他地）观齐后，便当正式答复，迟缓处，尚望原谅！

专此，同志们，愿接受我们的敬礼！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　伍　豪

（于巴黎）

西欧的“赤”况

周　恩　来

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饭也没有吃饱，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本来在前数天我看山姊给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打开看后，自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给他们看了，有了筹画，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我现在在此一个人很静，并且来柏林尚未久，一切思潮，还没感受多少德意志的影响，所以写出来的大半要算我一年来居法的积感。以后有变化没有固不敢说，但现在确是如此，望你们看完我的信后，如有感想，也请赶快地相与讨论才好。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施珊说，用Anarchism（以下简作A.ism）的精神参加到C.ism里去，（原文不如此，这是我意会你的话）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C.ism也并非没有A.ism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通现象上说来，C.ism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C.ism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C.ism太唯物了。但就我想，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ism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因此C.ism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这与A.ism所主张的自由正同一用意。不过A.ism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据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在欧洲的A.ism，其势力渐渐等于零，固然，法国的Syndicalism（以下简作Sd.ism）是发源于A.ism的思想，而在那C.ism势力笼罩的赤俄，A.ism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这全可说不是A.ism灭亡的表征。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要想A.ists的鼓吹能摇动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法国Syndicat近来已改变了很多态度，而所谓C.G.T.的大多数

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

英国的Guild Socialism近已见衰，并且这种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他们的机关报《Guild Socialist》（去年改名的）既不见甚么大精采，而鼓吹的人也就是Cole一人出点大力，但Cole个人近来也有点赤色的同情了。英国人本来太保守，几个工业国家，C.ist的势力，数在英国最小，党员不过一万来人，机关报仅一周刊《The Communist》；鼓吹劳动教育的《Pbbs》月刊常常帮他的忙。此外还有两个月刊为《The Communist Review》和《Labouer Monthly》，前者是党中出的，后者则属于国际，新近俄国商务机关在伦敦出了一种月刊名叫《Russian Inormation and Review》，我还没买到看，想施以也许见着了。《The Young Communist》是月刊，为少年共产党人出的，Workers Dreadnought周刊和Data月刊，也还表革命共产主义的同情。英国的共产党出版界是如此，鼓吹的效力可说不甚大，小册子也出得不多（英、法、德三国比较起来，自以德为首，法次之，英则尚后于意、瑞（典）、捷、波诸国。）总之，谈劳动革命而期望于英国，未免近于妄想，从前马克思和克鲁泡得金全看到了。

法国劳动界的组织不如英、德多多，屡次C.G.T.大罢工全失败，每失败后退出Syndicat的工人总日见其多，这是一个顶可忧的事件。病原多在太受旧日Syndicat会议的拘束，他们活动的范围太狭了。不闻政治，固然也有好处（法国社会党人吃党的太多，朝三暮四的更不用说了）。但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运命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现今法国工人似乎也有点觉出旧日Sdism不尽可恃了。所以去岁C.G.T.的大会，便有C.G.T的革命派主张联络国际共产党与赤色工联。今年春，因去年末C.G.T的左派已占了多数，他们越发要改变色彩了。法国的共产党自前冬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去岁末马赛大会尤其见出他们的精采。法国本来是A.ism思想支配的地方，而现在C.ism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将来西欧如有万一希望，还须从法国动起，其要因由于现时欧洲的政权差不多全在英法手里拿着；英法彼此争雄，遂搅的全欧不安。德国及中欧诸国全处在被制裁地位；他们实难于发难。意、比意存观望，没有揭旗而为赤俄继的胆量。因此西欧的情形全看法国如何而定了。二月初，法德共产党有个联合的宣言，正是为此目的而作。最近传闻赤俄与法政府有所联络，如果属实，想必又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已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列宁、托洛斯基、金诺维夫等几个人，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德国的共产党号称三十万人，党势自较法为进步，只是他们现在处于被制地位，欲动不得。可以说德国共产党一有活动，法国莱茵河上的军队便可藉口长驱直入。而德法民族的观感又不像俄德，所以德国共产党也没托洛斯基那样的人说托罗斯基那样的大话，持列宁对待德国的同一见解。德法民族间的感情真太怀〔坏〕，除少数共产党与左派社会党人外，差不多彼此仇视的心理还都很甚。德人报复之念与法人重惩之心时时在那里颤动。不但德法如此，以至于英法间，法意间，德波间，法澳间，意塞间，希土间，法希间，法西间，荷比间，……都闹得一团糟。最可惧而最可厌的便是那些中产阶级的人，他们本没有像资本阶级的人有那样利害关系的冲突，而他们也赶着起哄，因此欧洲国际间，比旧日春秋战国时还闹的热闹。张申甫说："西欧近几年内未必有甚么大变。"这句话也可以说半对了。我再替他下个转语，便是"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

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在你们看也许嫌为词费，因为你们或者也知道了，也想到了，我写出未免后时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不过我要谢谢你们的，施以的思想实在与我以许多反映，其功并不在石遗，衫时下，而施珊的一封信，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再提要说一句，便是前年北京的"全武行"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不知施珊是否也由那次打出来的影响。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我前信——给施以，二八的——说，"若放我在国内，以同石逸在国外，其变动就许大些人，"这是我就各人力量说，实在是句真话，你们或不这样想罢？（下略）

施以按：伍这封信同下一封信是去年三月写的，两星期前才得收到。伍君到德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除组织旅欧东方少年C.P.（？）外，又出版《少年》半月刊，成绩很好。

（原载《新民意报》副刊《觉邮》2期，1923年4月15日出版）

《少年中国》介绍

“五四”时期的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可以说是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它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发起，经过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维持了六年多，到一九二五年间才因社员的分化而停止活动。会员最多时达一百人左右。学会的总会设于北京（一九二四年迁南京），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湖北、湖南、山东、天津和上海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则在法国的会员最多，设立巴黎分会，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也有一些会员。学会的组织虽然不甚严密，但会员们常常通过聚会和通信保持联系和讨论问题；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三年间还曾开过三次带有代表会议性质的大会，讨论学会的方针、任务和对于时局的态度等重大问题。会员的成分是很复杂的。李大钊同志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经担任学会的评议员、编译员和“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主任；会员中还有以后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杨贤江、候绍裘等其中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志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对于会务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即后来的青年党的骨干几乎都出自学会的会员，例如曾琦是发起人之一，左舜生曾经长期主持会务，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都是会员。一九二一年时，学会中产生了“应否采用某种主义”的争论，这在实质上是“要不要把学会变成社会主义的组织”的争论，后来没有能取得一致的看法，组织愈来愈涣散，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各行其是，有一大部分会员则不问政治，埋头于科学研究、教育和文学工作，后来颇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因此，学会的发展和分化过程清楚地说明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不同道路。

学会的出版物很多，除了“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外，还出过“会务报告”、“少年中国”月刊（北京总会负责编辑）、“少年世界”月刊(南京分会负责编辑)和“星期日”周刊（成都分会出版）等期刊以及“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等小册子。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是在学会的筹备期间发行的，每月一册，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到“少年中国”月刊出版时停刊，共出了四期。“会务报告”中的“会员言论”、“会员通讯”部分，提供了研究早期社员活动和思想情况的材料。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就创办“少年中国”月刊，由北京总会负责编辑，每年出十二期为一卷。第一卷第一期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出版（大约在三卷十一期以后，月刊有时不能按期出版，有几期封面上印的发行日期与实际发行日期是不相符合的，使用时应当注意）。第三卷出齐（一九二二年六月）后休刊七个月，四卷一期于一九二三年三月才出版，一九二四年五月，四卷十二期以后停刊。“少年中国”是十六开本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占刊物的主要篇幅，是会员所写的关于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论著与译文，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问题的许多方面，当集中讨论某一问题时，就出版专号，如妇女号（一卷五期），诗学研究号（一卷八、九期），新唯实主义号（一卷

十一期），法兰西号（二卷四期），宗教问题号（二卷八、十一期，三卷一期），相对论号（三卷七期）等。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会务报告”的继续，包括一些阐发学会的方针的文章、会务消息和会员的通讯，也出过两期“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号”（三卷二、八期）。这一部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着重介绍的。

一

“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发起人和最早的组织者王光祈，是五四时期的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他早年受过封建文化的深刻的熏陶，五四运动前又接触到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愿照抄西方国家的老路，认为这既不适合中国的民族特点，又不符合当时已经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潮流的精神，因此他总想独出心裁，揉合他所接受的中外各种文化政治思想，形成一个改造中国的纲领。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就是想建立一个研究和实行这一纲领的组织。在学会创立时，他的主张还没有成熟，只能用“少年中国”这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来表达，但一些基本思想已体现在学会的宗旨中，这就是：反对政治斗争，提倡社会事业，企图通过发展科学和文化教育、振兴实业来改造中国；在指导思想上，提倡兼容并包，不赞成确定一种主义。这条道路，不管它披着多么美丽的超阶级、无偏倚的外衣，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是提倡者所不愿承认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发展对象大都是正在高等学校读书或从事文教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光祈的主张很对他们的胃口，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通过学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争取团结和改造某些人；这种情况就使学会能够在一个时期内把不同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网罗天下人才”的繁荣假象，但毕竟不能避免最后的分裂。

王光祈在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宣言书中说：“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①学会的最初四项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说，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和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就是根据这一宣言的精神制定的。“会务报告”第一期记载了一九一九年一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王光祈在会上解释了四项宗旨，谈到“发展社会事业”时，他说：“现在中国一切腐败，皆待吾人改革，其所以独对于社会事业特别注意者，因同人等认为一切不良，皆原因于社会不良，故注意改革社会。所谓社会事业者，不过教育与实业而已。教育者所以革新一般思想，灌输各种知识；实业者所以改良吾人生活，增进物质上的幸福。”这四项宗旨是笼统含浑的，并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主义，王光祈也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惟本会既形成一个团体，大体上是完全相同的，譬如本会宗旨……根本既完全相同，所谓主义者，不过末节而已。”所以那次会

①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二二页。

议的出席者一致赞成“现在同人研究学问，思想宜极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

不过，总的说来，早期会员们最感到兴趣的仍是社会主义。“会务报告”第四期中有王光祈的一封信，他说：“（我）本来是研究外交的，因欲研究外交；故极留意世界大势，因留意世界大势，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但是要研究社会主义，非研究经济学不可，故近来极欲研究经济，觉得现在世界上一切组织，多不合理不满意，皆非根本改造不可。”当然这还决不等于接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的思想很混乱，有着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的倾向。王光祈虽然觉得俄国革命“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比较的差强人意”，但同时又认为“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另一个会员李璜虽然也自称研究社会主义，却表示反对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战争”，认为“现在俄国的社会革命，以致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因此他不希望中国“再蹈一八四八年的复辙与今日俄国社会革命现象”。这个人后来终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成为蒋介石匪帮的帮凶。

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同志等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创造少年中国是最终的政治目的，社会活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科学精神则是指导活动的理论。这个纲领比以前有了进步，但仍是非常空泛、模糊的，并不能真正指导和约束会员的活动。“少年中国”这个概念就不明确，从会员们的言论和通信看来，在十月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高潮、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影响下，大多数会员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贫穷的国家，一般是否定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前途的，但究竟应当采取哪样的社会制度，却没有一致的肯定的意见，因此“少年中国”的理想就成了空想，而在实质上始终不过是美化了的资产阶级王国而已。至于所谓科学精神，也是各有各的了解，有人了解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或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有人了解为自然科学、哲学或教育学中的某种学说，只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情况反映在刊物的内容上，形成它的两个特点：第一，“少年中国”上的言论并不受一个统一的思想支配，也很难说哪一篇文章是代表学会发言的；第二，“少年中国”的学术性较重，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脱离当前的政治实际，很少对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与主张。

王光祈在最初几期的月刊上写了好几篇论文发挥他的“少年中国主义”。他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想，完全脱离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制造了一个“少年中国”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社会主义的空想和学会的“兼容并包”的思想现状、劳工神圣的空谈和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轻视、在现有制度下的文教事业和脱离现社会的新村组织都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体现他的理想的完整系统。他首先说明，他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使中国人民的风俗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因此他反对国家主义（指资本主义）而欢迎一切以消灭阶级区别和国家界限为目的的主义。①但究竟中国应当采用那一种主义，他自己也还在研究之中，一时不能确定。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应

① “少年中国之创造”，一卷二期。

用任何一种主义的能力，当务之急不在确定主义，而在对中国人民进行训练，使他们在将来具备自由运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就是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既然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主义，那末根据什么指导思想来进行训练呢？王光祈认为，各种主义固然各有其特殊的地方，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有财产的观念，安那其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①，但也可以找出共同的地方，作为目前训练的内容。例如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就是各种主义所共同需要的训练。国家主义的组织是一种团体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组织是一种进化的团体生活，安那其主义的组织，是一种更进化的团体生活。对中国人说来，不但还没有资格过后二种团体生活，连国家主义下所必需的训练也没有。至于劳动习惯，不但社会主义有人人劳动的理想，国家主义也反对游惰，游惰的人多了，国家主义就要破产。因此，提倡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很感必要的，在中国尤其必要。他甚至说，各种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现在的中国人连作'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若是要他从事'人类'的组织，当然是不行的了。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要想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②。这样一来，"少年中国"所要做的事就多了，抽象地说，可以分破坏的训练与建设的训练两个方面，具体地说更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譬如中国人最缺乏团体的训练，我们学会便提倡组织种种团体。又如中国知识阶级大多数不习劳动生活，劳动阶级又无机会得受教育，故我们提倡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作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又如改造中国问题，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国劳动家起来解决。中国是农业国，劳动家中自以农民为最多，故我们学会提倡'新农村运动'，天真烂漫的农夫，便是我们热血青年的伴侣。又如我们觉得中国旧生活不好，便提倡小组织新生活。又如我们觉得中国人静的生活毛病很大，便提倡动的生活，主张奋斗。此外尚有种种训练，都是养成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并且是凡向光明方面走的人，必不可不如此的。"③按照王光祈的理论，似乎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可以超乎一切阶级和一切主义之外，抽象地进行上述种种训练，而无论是办教育或是从事出版与新闻事业，都可以不受社会上的统治思想的支配；学会的会员，也完全可以一方面"各有各的主义，而且是各人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同时却互不冲突地"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这种否认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说法，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而王光祈所说的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训练，尽管包括了"劳动"，实质上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

王光祈分析了实现他的主张所必需依靠的社会力量，指出人类可分三种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资产阶级。他的理想社会是无阶级的，"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但现代社会上还是有阶级的，应当从三种阶级找出有觉悟的人，使三个阶级互相接近，以实现理想社会。知识阶级中青年是最有希望的，他们应当加入农村或工厂的劳动阶级运动，传授知识给劳动者；在劳动阶级中，留法的华工最有希望，农民也是青年学生的唯一良友，而学生出了学校，从事工作以后，也就成了劳动者了；资产阶级中，华侨是有创造力开辟力的优秀分子，希望他们自己兴教育办实业，"为一种有组织有思想的

① "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一卷六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运动，与英美日本势力对抗，自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学会只有少数会员在南洋教书或工作，起不了组织华侨的作用；在法国的会员曾经在华工中进行活动，但并不是走的与工人阶级结合的道路，不过是怕他们“受了环境的影响，若不用之于正，将来回国亦要惹出许多祸事”①而已；到农民中去也只是空话。所以学会真正能做的仍不过是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会员们从事资产阶级的“教育”（包括新闻出版事业）和“实业”二者。学会要求会员每人都有一门专业和特长，有的做新闻记者，有的办学校当教员，有的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有的搞文学创作，有的开银行、办书店等等，从各个方面出发，趋向同一的目标——“少年中国”，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中国。

王光祈自己除了积极从事新闻工作外，对于超然于世外的“新村式”的小组织很感兴趣。一卷二期的月刊上发表了“讨论小组织问题”的许多通信和文章，记载了王光祈、左舜生、黄仲苏、宗之櫆等人对于“小组织”的意见。王光祈和左舜生是最初的倡议人，他们在彼此间的通信中表示，为了“避苦寻乐”，在这恶社会中，求得学术上的进步，精神上的快乐，保持高尚的人格，改善不良的生活方法，免除家庭的苦恼等等目的，不能采用不彻底的一面与恶社会宣战、一面又与之周旋的办法，而应当创造一个生活的根据，以便下死工夫与恶势力奋斗到底。左舜生提出一种实行新生活的“小组织”，也就是“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完全归公共使用和分配，子女也归集体负责教养。王光祈更具体地规定小组织设在都市的近郊，劳动方式是种菜园，每天两小时，翻译书籍三小时，读书三小时。种菜所得可解决物质的需要，读书可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通过译书，可以“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对于社会尽力；翻译的书，由自办的印刷所出版，利润一半给译者，一半归公。此外，还要附设平民学校，免费教育附近农家子弟，并且“常常到那些农家与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王光祈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掣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王光祈等提倡这种组织，本来也有把它当作理想社会的雏型与出发点的意思，宗之櫆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中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他们的“积极方面的最后目的”。他主张“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从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完全脱去旧社会的恶势力圈。我们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然后通过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用书报进行宣传和具体的指导与帮助，使各地的旧社会以它为标本一一改造，最后“分布全国，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再进一步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他说这就是“不用武力”，也“不用政治”，而是“从下面做起，用教育同实业去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和欧洲的社会党“用武力暴动去同旧社会宣战”的方法是不同的。这些理想虽然美丽动人，但提议的人单凭常识也知道这种世外桃源式的小团体的成败，主要决定于物质条件即经济上能否自给自足，因此黄仲苏和王光祈在通信中着重讨论了“生利的方法”，提出附设畜牧、苗圃、种子公司、选种经理店等，“对于农民有极大的补助，也有极厚的利可获”要不如此，“在现刻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我们立刻就要饿死了”。由此可见，这种以“共产”为理想的新村，最后仍旧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束缚。

① “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一卷六期。

王光祈不仅是空发议论，而且真正行动起来。一九一九年底，他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城市中的新生活”，提议在城市中组织一种“男女生活互助社”，以帮助青年脱离家庭压迫，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互助劳动的习惯，创造读书的机会，“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经过他奔走筹划之后，终于在当时文化界的名人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募集了一笔钱，正式发起了“工读互助团”。这个团体曾经吸引了几十个要求进步的男女学生，成立了三个组，实行半工半读，在北大等校举办了“素菜食堂”和从事洗衣、装订及制造小工艺等劳动，同时分别在各校听讲。“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在青年知识界中轰动一时，武昌、南京、天津、湖南、上海、浙江等许多地方的学生都想照样组织。王光祈在一卷七期的“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工读互助团”一文，详细叙述了它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组织和预算，它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以及将来的远景等等。他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分析了工读互助团的性质是一个“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不是一般的半工半读学校或职业学校，不是专门集体劳动的组织，也不是有资本有利息的合作社，更不是“蹴尔而与之”的慈善事业，因为“工读互助团的基本金，虽是捐助得来，但是那些捐助的人或是希望‘理想社会’实现，故努力出资，筹办一切。或是恐怕社会革命快来了，赶快把自己的钱贡献一点于工读互助团中，将来或者可以免去一场流血的革命”，而提倡的人，奔走的目的也“不是接济苦学生，是在创造新社会”。王光祈对工读互助团寄与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将来各地的小组织能够联络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使团员随便到什么地方，皆有工可作，有书可读，而办理久了，团员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然而，工读互助团并没有按照王光祈的主观愿望发展，而是在几个月之后就瓦解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的矛盾，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中，这两个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这也是一切新村式的乌托邦组织失败的根本原因。一部分团员从这一次失败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彻底放弃了对新村的最后一点幻想而坚定了用革命方式根本改造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心。这时王光祈已经到了德国，他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抹煞互助团失败的物质的原因而单纯强调“人”的原因，他说：“北京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之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其原因甚为复杂，或由于感情不洽，或由于经济破产，而经济破产之原因，又多由于团员不肯努力或和衷共济之故，故我敢断定此次之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完全是属于团员的心理问题，所以不能借经济压迫能力不足等等理由以自解”①。而他所谓“人”的问题也只是指个人的品德修养，没有和阶级性及经济基础联系起来看。他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受到了恽代英同志在通信中的批评。恽代英同志根据自己办“利群书社”的经验，说明“人”的问题是有的，要完全克服“妨碍了解、伤害团体的各个人的性格”是困难的，但如果正确地加以引导和帮助，不一定导致失败。恽代英责问王光祈说：加入互助团的人“原亦是向上加盲从而来的，他们身上纵然有些不免社会遗传的毒，但他们何曾便真够不上做这

---

① “会员通信”，二卷十一期。

种工读的事？况且若真他们够不上做这种工读的事，你以后工读互助团的运动，预备选怎样的人去？”可见过分强调“人”的问题是错误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至于物质的原因更不可忽视，恽代英说：“以我一年来利群书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商业，实有不免受经济压迫的地方。至于没有能力的少年，必要合起来做工自给，我真想他们牺牲了读书，还不知能否不受生活恐慌。我们还有些朋友在武昌作各种小工业运动，有的失败了，有的很谨慎养很少的人，还不过才可维持。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不知你何以这样轻看这些问题？”①

如果说，王光祈尽管有过多的空想，毕竟还具体做了一些尝试创造新社会的工作，那末，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却根本不想触及改造社会的问题，只打算在现有的制度下，按部就班地学习，以便将来成为一行一业的专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少年中国”。在月刊上发表的大量的会员通信，所谈的无非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曾经侈谈新村式小组织的宗之櫆，在一卷五期上发表的“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系统地发挥了这一派会员的主张。他这时已经觉得“高蹈远引脱离这个恶社会”是消极遁世的办法，不是青年所应实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全国青年组织一个大团体，与中国社会上种种恶习惯、恶风俗、不自然的虚礼谎言、无聊的举动手续，欺诈的运动交际，大起革命，改造个光明纯洁、人道自然的社会风俗，打破一切黑暗势力的压迫”。为了取得这样的成功，先要预备“奋斗的基础”与“奋斗的器械”，前者就是“高尚纯洁的人格，坚强不拔的意志，奋斗牺牲的精神”，后者就是“精明真确的学术，热忱真挚的气概，深远稳健的手腕”。少年中国的会员应当凭着这两种武器：“一方面战胜自己心中的黑暗，为自己造光明，一方面战胜社会的黑暗，为社会造光明。”这还只是消极的“破”的工作，此外还有积极的“立”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个人的新人格和中国的新文化。创造个人新人格的最好方法是“常常走到自然境界流连观察，一定于我们的人格心襟很有影响”；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方法是融合东西文明，研究科学，发展实业和教育。另外一些会员在通信中也片段地发表了大同小异的见解，不过有人比较强调“社交的修养”，认为“我们是人，应该从事于人的生活。人是要作社会的活动的，所以我们要习惯社会的生活，我们要想成一个社会里健全的人去征服社会改进社会，除非先把自己加入社会里去陶冶过”②；或者觉得除了社交以外，还要注意“服务”，提倡“做事”，“做事的价值比学问还大，做事自然产生学问，学问也要用做事做基础。救中国青年的良药是做事，是从做事内求学，从做事内思想”③；或者注意自然科学，或者注重社会科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各择一门专业，有的做新闻记者，有的办学校当教员，有的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有的搞文学创作，有的开银行办书店等等，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工作，只要各人尽了自己的本分，就可达到“少年中国”的共同目标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他们的职业尽管五花八门，却永远脱离不了通过“教育”与“实业”来改造中国的老路。

他们非常夸耀自己的“务实”，而非常轻视五四以后积极从事群众运动和宣传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的青年。研究自然科学的魏时珍说：“顷年以来，思想革新，诚甚盛矣。然试

① “会员通讯”，二卷十二期。

② 同上，一卷三期。

③ 同上，一卷六期。

登高远瞩，国内书报、刊行者何限，亦尝有专言精确科学者乎？亦尝有脚踏实地，本其钻研之所得，而后发为言论者乎？（大要皆道听途说或抄袭剽窃）。……吾国之人，患在空谈，将欲救之，非用实学，断不为功，今不出此，而又助之以焰，燎原之祸，吾惧其将及矣。”①宗之櫆也很瞧不起“时髦”的杂志，认为它们“简直不能做我们的模范”，“我们要彻底的做，不可趋仿时髦，迎合新中国少年的心理”他把月刊的文章分成三部分：鼓吹青年、研究学理、评论社会，而突出地强调了研究学理是“我们青年的天职，那些鼓吹青年同评论社会还不是我们的正事。我们学理不曾真正研究，怎么能鼓吹他人评论他人呢？”他讥讽那些著名的新杂志，“真正阐发学理的文字极少，只能够轰动一班浅学少年的兴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不增益，还趾高气扬的自命提倡新思潮”；也反对“对于一种事体，，一种现象，一种主义，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地了解与觉悟”，就拿出来鼓吹青年，对于社会问题不加研究和调查，就“徒然借着几个新名词，凭直觉的眼光，妄自提倡，妄自讨论。”他主张“少年中国”月刊应以研究学理一门为最主要，“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②。宗之櫆这样地把高深的研究和联系实际的通俗的宣传鼓动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向群众进行宣传的必要，提倡把学问锁在学者的书斋里。在他们的影响下，“少年中国”月刊带上了很重的书呆子气，脱离实际，几乎从来不对时局和青年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发表评论。至于他们自命高深的学理著作，既不通俗，也缺乏创见，虽然摆出了一副学者的面孔，实际的效果远不如他们视为浅薄的“趋时之作”，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学者的鄙视实际，鄙视群众的学术路线，早在五四时期，就已在群众性的文化思想运动中碰了钉子。

当时的大多数会员不赞成搞政治，闹革命，在学会的规约里，参加政治活动是悬为禁令的。学会在北京的会员有许多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五四运动前后，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他们一直是历次政治斗争和各项群众运动的积极组织者，而在上海的早期会员则多半是改良主义者，因此在胡适发表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前，上海的会员就针对北京会员的情况，提出了“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口号。在月刊一卷一期上发表的上海会员给北京会员的信里，上海会员主张应当和反动势力妥协，“发表文字，宜取绝端慎重态度”，以免学会和会员遭人“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他们希望会员们“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暂时忍辱，专从事于健全无妄之学术，求得真理，将来确定一种健全无妄之主义”；而千万不要“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这时，主持北京总会会务的王光祈趁李大钊同志回乡避难的机会，没有征得其他会员的同意，就以北京会员的名义回复了一信（也发表在一卷一期上）表示同情上海会员的建议，反对宣传主义，表示要限制会员在“本会宗旨以外之活动，必不使其影响于团体”，“倘有会员对于政治兴味极浓，急欲登台一试，或对于社会组织有所不满，急欲从事社会革命。本会同人对于上述两种会员，无论其成功失败，均不过问，听其自然”③。当然，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真正能引起反动当局的迫害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一次“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是主张政治活动与反对政治活动之争，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争。在法国留学或

① “会员通讯”，一卷三期。

② 同上。

③ 参看三卷十一期，“学会消息”中所载康白情，孟寿椿在杭州大会上的提案。

勤工俭学的会员看了这两封信后有所不满，来信驳斥了他们。在这封长信中指出学理与主义"并非截然两事"，研究学理，应当"切实有用于人生，不当与主义悬绝，徒尚空论"。他们反对少数人脱离实际地研究学术，而主张向多数人宣传有科学根据的主义，以便推动社会的改造。他们也驳斥了那种先研究学术，求得真理，再在"将来确定一种健全无妄之主义"的说法，因为所谓"将来"是漫无期限的，所谓"健全无妄"，也是没有标准的，势必"徘徊于不能定一主义之中，而无一定目标方向矣"。他们表示目前就应当接受一种主义作为行动的指针："为求计划之完密，自非采取他人研究已得之结论，参合目前人生的现象，定一种具体的主义不可。有一定主义，研究学术方切实，有切实的研究，方有主义正确明白之一日，然后人生方有光明之进步"①。但在法会员多半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和上海会员在思想立场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所不满的只是上海会员的过分妥协含混的政治态度而已。

应当指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学会是一个比较松懈的团体，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的重点并不在此的缘故。李大钊同志积极赞助和参加了学会的各种活动，如办刊物，讲演，学术讨论，发起工读互助团等，但似乎没有在学会中作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在月刊上发表过两篇论述青年运动的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卷三期），"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二卷二期）。后者基本上是国际主义的作品，而前者虽然基本上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但还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他认为"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的改造运动，一个是物质的改造运动。他一方面强调"物质改造"即改造经济制度，解放劳工的重要，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但同时又把"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的精神改造运动和物质改造运动并列，没有具体地分析二者的相互关系，更没有提到阶级斗争，因此他用来表达对未来的中国理想的公式："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以及他对此的解释，都给人以二元论和新村主义甚至托尔斯泰主义的印象。这也毫不奇怪，它正反映了当时（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李大钊同志在由民主主义者转变到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所遗留的痕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邓中夏同志则主要是从事实际活动，很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有一些同志如恽代英，在那一时期还处于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他在月刊上发表的讨论"少年中国"的文章和通信，分量并不下于王光祈，但就整个思想倾向说来，还带有改良思想和空想主义的残余，对于个人修养，教育和少数人的工读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而对于政治活动却很少提及。因此，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还没有形成旗帜鲜明的两条路线。但即使在这时，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李大钊同志不用说，就拿恽代英同志的言论来说，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他并不象大部分会员那样根本拒绝政治活动，而主要是不赞成"眼前虚张声势、毫无实际"的活动，或"侥幸成功"的"乌合盲动"，他说："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

① "会员通讯"，一卷七期。

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他注意教育和自我修养，也和宗之櫆等人所说的创造新人格不同，而是“想在最近期间努力于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这求平民真正的觉悟，雄厚的实力，以为各方面取用各种手段的预备”。他所阐述的“群众生活的修养”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是一个革命者所必需具备的优良的群众作风与道德品质，是能够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第二，他非常反对脱离实际研究学问，他要求“自命以研究学术创造少年中国的人，真挚的坦白的下一番反省功夫，你果然以什么动机去研究学术？照这样研究下去，你当真能在少年中国的创造方面，担任什么事？”他分析了几种求学的动机，一一加以批驳。有些人是想借研究学问博地位、赚金钱、出风头、闹名声，博一块金字招牌为进身之阶的；有些人受虚荣心或盲目的向上心所支配，无目的无计划地求学；有些人以浮辞为文学，以玄想为哲学，把它们当作“可以躲懒偷巧的学科”；这些人都只是“借创造少年中国的好名义，做遮饰他们鬼脸的盾牌”，谈不到真正对创造少年中国有益处。至于少数真正受求知心所鞭策，安心于长期研究学问，国内不够还要求之于国外的人，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短处，便是他们不知道学术研究与少年中国的创造有什么关系，究竟是个无目的的求求学，“每每不能对于学术有很真的兴味，很大的造就，更不能为社会供给最急的需要”。他强调今天的读书只是为将来的运动作“大预备功夫”那种认为“只要求的是一门学问，只要学问求得好，将来总要有些裨益于国家社会”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救国所最迫切需要的不一定是这些学问，远水是救不得近火的。恽代英同志的这一精辟的分析，对于学会中“板起学者面孔”的那一部分会员，可以说是当头棒喝。第三，也是和学会的发展最有关系的是，恽代英同志第一个提出了召开会员大会讨论方针问题。他很不满意许多会员只埋头于读自己的书和做自己的事，把读书和做事太看重了，而把学会的事业的根本问题即创造少年中国太看轻了。他认为结会的目的，“不是盼望成就广通声气互相标榜的一个无目的或目的不正不大的徒党，是因为不结会不能实现个在共同目的下有计划的分工与互助组织”；学会的会员对于根本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将来可能造成分裂，但在目前，不应当因主义和意见的不同而影响协力与互助。所以他主张会员之间往来要密切些，会员对于学会的团体意识要更明确些，才能使学会成为真正的有力的团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建议学会每年召开全体大会一次讨论会务，互相报告学习和工作情况，相互批评等。他的主张如果实现，学会至少可以成为一个能团结广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事有益的踏实的文化工作或社会事业的团体，使学会不致停留在松懈的徒有其名的现状，也不致于象一部分人所要求的那样乾脆成为纯粹研究学术的团体。

三

到了一九二一年间，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共产主义者酝酿着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们日常的言论和行动已明确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或者从改良主义、空想主义角度来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大多数的中间派会员仍旧在走着资产阶级学者的道路，对新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抱着漠视、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王光祈在一九二〇年底的一封通信中用这样的话概括了除共产主义者以外的多数会员的思想：“至于主义一层，我们会员中当初尚有少数信仰狭义的国家主义的，现多已改向新潮流的方面了。但是从前相信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现在又多入于怀疑了。这是我们相

信真理，不固执成见的确证”①。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员思想的向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和学会的兼容并包、宗旨含混、组织涣散、脱离实际等严重缺点不相容了。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的南京大会上，出现了关于确定主义与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的激烈争辩，形成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出席南京大会的会员共二十三人，虽没有正式的代表名义，实际却代表了各地和各派会员的思想，除了会上的发言外，不少会员在会后又通过书面提议或文章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讨论汇集为两期“少年中国问题专号（三卷二期、八期），是研究学会的分化过程的重要材料。南京大会的议程很多，包括关于月刊、研究会、丛书、会员间通讯、宗教信仰、恋爱和修改规约等问题，但中心议题则是宗旨主义和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共产主义者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等都参加了这次大会，积极地主张学会确定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

北京分会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集中了许多共产主义者，成为学会的最进步的部分，早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北京会员的谈话会上，李大钊同志就提出确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②南京大会以前，北京的会员为了准备大会提案，于六月十七日召开了一次谈话会，着重讨论了“本学会应否采用某种主义”的问题。会上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种，“（一）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质言之，这问题只是‘本学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二）本会不是无主义的，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会的主义。所谓少年中国，固不是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我们应就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顺应时代、适合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现时最流行的主义，在一般主义中，容或为吾人比较的表同情，然吾人不能以自己所不能全然赞同的别人的主义认为自己的主义。（三）人类社会的生活决不是一种主义所能够概括，现成的主义多得很，也不是个个全不同互相背反的，我们不能采用一个主义，而且没有这必要，然为会员入会标准起见，就一般主义中定一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四）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深愿我们同志能够养成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才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点希望。我们学会既然是一个‘学’会，所有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我们应该一方面为学理上的研究，一方面为事实上的观察，大家把这‘学’字完全做到了，我们自己的主义，理想的少年中国自然会涌现出来做我们实行的标准”③。南京大会和以后关于主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实际上也不出以上四种，而后三种意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坚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在北京会员中，抱第一种主张的显然占多数，因此，代表北京出席大会的全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同志在大会上全面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

邓中夏同志在大会上说，学会成立以来的两年的实践，证明学会的宗旨太空泛了。学会以往对社会没有起什么影响，主要是因为没有共同的主义。他说：“如果学会能决定一种主义，那么，到底是第三阶级（按指资产阶级）或第四阶级（按指无产阶级），到底是赞成私产或赞成共产，就表明了具体的态度，然后各方面的活动才有一致的趋向”，求学做事才不致误

① “会员通讯”，二卷十一期。

②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二卷三期。

③ “会务消息”，三卷一期。

入歧途，方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他自己当然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他认为有了共产主义做自己的理想，如从事教育工作就不会为统治阶级培养俯首听命的驯顺奴仆，如从事文学活动也不会写出专供士大夫玩赏的无病呻吟的文学，如从事实业也不会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家。邓中夏同志在这里已鲜明地划出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驳斥了那种认为各种主义可以并行不悖和不要主义只要实际工作的资产阶级谬论。他也驳斥了借口独立研究而否定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谬论，指出信仰一种主义固然不应本伦理的态度，而应对这种主义加以科学的研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须加以科学的研究，尽可信赖于别人研究的成果。"黄日葵、高君宇同志从不同方面补充了邓中夏同志的意见。黄日葵同志指出确定主义已是客观的必要，所以发生这问题，一是由于时代潮流的影响，会员不能满足于学会的主义不明的现状，同时"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而且会员在社会活动中"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引起误会"，所以不可没有共同的主义。高君宇则竭力驳斥了以左舜生为代表的认为"先做各种事业，自然会产生共同主义"的论调，他说："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南京分会的会员沈泽民同志和北京的共产主义者站在同一立场，指出使学会陷于困境的最根本问题是思想不统一。他说，少年中国学会果是学会，思想不统一不成问题，若少年中国学会果然还有事业的性质，那么非思想统一不可。在纯粹的学会中，思想统一所以不成问题，是因为纯粹学会的性质在乎研究讨论，以互相冲突为要，思想越不纯粹，成绩愈好。但是纯粹变做学会并不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本意，决不能因为我们在会务进行上发生障碍而遂自己缩小范围，由进行社会活动一变而为只管学术的研究。即使采取调和的办法，分工办事，读书的人自去读书，活动的人自去活动，"但是没有一贯的主义怎样可以使同会中这部分的人赞成那部分人的行为呢？"他的结论是，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使学会分裂。总之，共产主义者的主张的基本精神就是，把学会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众性团体。

恽代英同志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和北京的同志们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在会上最初坚持一九二〇年间的看法，主张保存学会为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团结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不想提出过高的要求，以免引起分裂，他说："应该注意学会现状，会员全体意见。主义的研究，非人人愿为，亦非人人有如许时力能为它的。我们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义，只可在大家中求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但是他和那种因为反对社会主义而坚持不确定主义的人是根本不同的。他在大会以后的一封通信中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在南京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我在南京态度和缓，其实是已失望，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终于令我想到破裂以达到最高的希望"。他在大会行将结束时，作了一个题为"学会前途的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讲演，指出了使学会分裂的因素是：主张有主义与无主义的决裂，主张参加现政界与主张绝对禁止的决裂，主张只对第四阶级做事的与反对的决裂，主张单纯讲学与反对者的决裂，由无共同一致之点所生不互相信任、不信任学会的感情的决裂以及在恋爱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上主张不一的决裂。他认为学会分裂是有好处的，与其将来会员为无组织的消极抵抗退会，不如为有组织的积极计划分裂，分裂了虽失去一部分朋友，但"以旗帜鲜明，亦易得一部分或更多的朋友"。恽代英同志在这封信中表明他已达到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立场并且想以这个原则来改造学会，他说："我想假定'促进生产工具公有'为

明确目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当然赞成，教育家文学家亦应赞成……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①。

除了共产主义者外，还有少数会员是赞成确定主义的，但反对袭用已成的主义，而主张“自创主义”。在法国的一个会员说：“采定主义，固然是必要，但是若不单为少年中国学会行事的方便，更要诚实的虑到中国的将来，那么，我们真正应该采定的主义还得自己创造”。因为主义“各有其起因与其重要条件，无无条件的主义，故无放之百世而皆适的组织。即如改革中国的方法，既不能全效法于法兰西俄罗斯之革命，而又不能不摄取其中最适用于我们的地方以为补助”。汤腾汉也说：“许多的主义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适用于彼，而不适用于此；适用于此，而不适用于彼。所以我个人看来，还是采集各种主义的精粹，再以我们据科学的方法，社会的情形，世界的趋势，研究得来的加在内面，熔化成个‘少年中国主义’。”当然，“放之百世而皆适”的主义是没有的，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所不能也不愿承认的。他们提出自创主义，实际上是对布尔什维主义表示怀疑，而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脱离了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寻找适合于中国特殊情况的主义，恰似缘木求鱼，最后仍旧徘徊在资本主义的绝路上。何况这一派会员一般并没有真正去摸索适合中国的主义，只不过是用上面的话来作抵制社会主义和为自己的踏步不前作辩护的借口而已。有的人则明显地表现出在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而社会主义才刚刚兴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和悲观心情。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张梦九认为要在这时规定主义，有两种困难：“（一）新陈不继。今日可谓是主义破产时代，自中国内乱十年，而民主主义破产；德俄奥相继革命，而军国主义破产；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改党纲，俄国列宁接受资本家条件，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一切破产。当这时旧主义既已破产，新主义尚未产生，而言规定主义，究竟规定什么呢？（二）种类复杂。再让一万步说，欧洲已经腐朽的东西，在中国还算神奇，欧洲虽是主义破产，而在中国仍不妨照抄一遍。但是照抄的着手，也很成问题。同一国家主义之中，而有军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分；同一社会主义之中，而有共产集产之分；同一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之中，而有正统派与修正派之分；同一无政府主义之中，而有有组织与无组织之分；现在国人想把欧洲的主义照抄一遍，试问如何抄法？……若作笼统的规定，与不规定是一样；若作精确的规定，请问应以何种主义之何派为标准呢？”后来成为臭名远扬的国家主义派头子的曾琦也以类似的理由反对把社会主义规定为学会的主义，并且诬蔑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为“抄袭”。不久以后，他就打着自己“独创”的国家主义的黑旗登上了反共的政治战线了。

学会的“元老”王光祈这时远在德国，对国内形势的发展是非常隔膜的，他仍旧沉醉在自己的主观臆想里，坚持保持学会的兼容并包的原状，为创造少年中国和确定主义“作预备工夫”。王光祈认为，学会中包括两种人：学者和事业家。对学者谈主义，似乎是多事，对事业家谈主义则实感必要。因此对于学者尽可“自由放任”听其自定，而事业家则有“速求共同主义之必要”。至于采取什么主义，“非有长时间之讨论与预备不可”。必须先研究现在世界上所有主义之理论历史及派别，调查各国实施主义之种种组织及实况，调查中国全国之生活状况及其组织，研究中国人之国民性，才能规定一种主义。他想创造一种比世界上现有

①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五月编印。

的主义（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在内）都更合乎世界最新潮流和中国国民根性的主义，而不赞成“昔之模仿日本”与“今之效法美俄”，他说“吾辈不怕不走，只怕走错，今日吾会所取之态度或可免‘走错’之讥欤？”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说：“今日会中虽不标明主义，而各人信仰，起码亦系社会主义，所未能一致者，不过实现之方法及其组织耳。”可见他仍恋恋不舍他那“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他在大会以前曾在通信中说：“我主张对于中国将来之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的组织，均用极具体的描写”，这一点恰恰是任何乌托邦的特点。到了南京大会时，他果然具体地描写了这一未来社会。他说少年中国学会的事业可分甲乙两种，甲种是地方基础事业，包括“小学校，农村，译书事业，编辑少年中国”，为正业，兼任地方上各校教员为副业；乙种是都市宣传事业，如担任各校教员，各报新闻记者，国外通信员，各工厂之工程师，加入其他社会事业之活动等。甲种事业的精神全在于由学会“自办”。步骤是先选择一块地方，办一半工半读之小学校，并租田十余亩为自耕之计，收入不敷即以译书或任他校教员为补助。小学校三年之后即扩充为中学校，又四年之后即扩充为大学，同时筹办工厂，大学生仍是半工半读。农事若有进步即扩充为新农村。少年中国月刊就在此地编辑，此地也就是学会“永久通信之地点”，学会的“大本营”。大本营建立以后，然后多多物色本地同志，进而为改造全省之计划，只要把一省办好，便可以立国。一年之内，改造省城空气，三年之内，改造全省空气，十年之内基础已立，再进而改造中国。这一套办法，基本上是他在一九一九年时提出的“小组织”的扩大版。不过添了一项乙种事业，要会员投身于都市中“一切已成熟之社会事业，改造他们内部的空气，战而不胜，即退回大本营，徐图再举”。时隔两年，中国的革命形势已起了极大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但王光祈仍沾沾自喜地停留在老地方，可见资本主义文化对于中国已不能灌输什么新的东西了。不但如此，他后来更倒退到把“少年中国运动”归结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强调把中国的“一切罪过都归之于社会的方面与人民的身上”，因为“政治之不良，系由于无良好社会，良好社会之所以不能养成，又由于无良好人民之故，所以我们应该先造‘人’”，中国之弱也是因为人民的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种种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压迫，军阀才敢专横”，中国人“不宜多骂人，只宜责自己”，应当努力于改造个人和整个民族，从事一种“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而无须去夺得政权。改造的指导精神就是要利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民族固有的文化思想。他在德国“深思苦索”的结果，“最后乃恍然大悟，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所以他要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把古人立礼制乐的“千古不磨”的本意，“整理培植出来，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他果真在德国刻苦地研究起音乐来，但当然对中国的改造丝毫没有什么贡献。他还在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他的计划的另一方面：以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为“民族生活的改造”，这同样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的办法。

国家主义的另一头目李璜这时虽然已肯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却还继续打着暂时不要确定主义的幌子来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确定主义应留意中国的“空间”和“时间”。“空间”是指中国的社会而言，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有浅近知识，了解当前社会性质的更不多，要大家了解和信从一个理想的主义是不可能的。在时间方面，他认为当时要实行共产主义安那其主义，当然要与外国资本的权力冲突，因为中国门户大开，土地便立刻被外国资本家的军队占领，不免要失败。他主张应该“按住情感，退一步设想”，在鼓吹主义与实行主义以前，

做许多预备工夫，一方面通过舆论，“使中国的多数人民能有适合改革的能力”，另一方面，使中国的改革与世界的改革能为一致的进行。因为现在世界交通方便，国际间的利害关系非常密切，一个国忽然改变得与众不同，有时且要妨害别国的利益，是一定要受干涉的。所以要希望一种主义在国内有效，须得要是国际的改革，作国际的预备。李璜的意见充分暴露了他的鄙视中国人民的力量而在帝国主义面前惊惶失措、奴颜婢膝的面貌。

最后，还有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本反对学会确定共同的主义。一派是脱离实际，自认为超政治超阶级的学者，他们说，少年中国学会不是“少年中国会”，所以标明“学”字，正是表示是个学术的团体，不必于“学”之外要求所谓主义。这样学会就不致分裂，会员可专心研究学术，将来未尝不可使学术界有点光明。他们认为创造少年中国的工作太多，而学会只能择其中一部分去做，这一部分最好就是研究学术，“日后中国无论变到怎样，学术这样东西总归是不变的”。他们主张学会应当标榜学术，吸收会员时，不管是否信仰宗教，也不管什么主义，是否加入政治活动，只要能在学术事业上有一部分贡献，而人品又不卑污就可吸收。这样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同时容纳许多主义，在同一旗帜下，各自发展，“使本会既不得因主义纷歧而解散，又不得妨碍各会员之个性，一举两得”。按照他们的主张，学会就只能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这派人中也有主张在学会下分设许多“科会”，分别研究各种科学，还有人则本来不想认真地办学会，因此提出不要“所望太奢”，可以“于学会内外，各以各之所信，去组织各的会社而大行‘兼差’主义。于会员之外，各以各之所喜，去结合自己心目中之主人，而大行‘兼爱’主义。至若吾会呢，祇是一个有限公司！”

关于政治活动问题，基本上是和主义问题相联系的。共产主义者坚决主张根据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政治活动，其他会员绝大部分表示反对。他们或者认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政治改革是无效的，目前的政界又非常腐朽黑暗，投身其中难免同流合污；或者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活动不如社会活动效果大，并且歪曲了中国的近代史来作证。他们说，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汪精卫都是失败者，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知有政治，不知有社会，只知从事政治活动，而不知从事社会改革。另一方面，严范孙、张謇、蔡元培、李石曾都是成功者，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从事于政治活动，而单从事于社会事业。其实这一派人所说的社会活动就是资产阶级的实业与教育，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他们中虽然多数坚持了不过问政治，甚至不参加社会活动的主张，长期保持埋头业务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状态，但的确也有不少人抱着“学而优则仕”和“待价而沽”的人生观，当中国的政治气候有利于他们的活动，能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时，就摇身一变，袍笏登场，大逞其官僚或政客式的学者了。可见他们所竭力反对的政治不过是革命的政治，劳动人民的政治而已。

南京大会和会前会后关于主义与政治活动的争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学会中的两条道路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已开始高举起鲜明的红旗，但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还用种种美丽的粉红色的辞令涂饰着自己的白旗。尽管还有人被这表面现象所蒙蔽，天真地说：“我敢说我们大家都是有主义的，而且主义都是相同的……我先试问：我们学会中有人做帝国主义的迷梦，希望少年中国作一个德意志的吗？我敢说没有。那么，我们学会中有甘心为资本家的走狗而希望少年中国仅仅成一个不彻底的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的吗？我敢说没有。……至少社会主义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的最合理想的政治组织了。那么我们的少年中国应是立脚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少年中国学会自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团体，而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徒”；

尽管南京大会最后表示不愿分裂，但分裂在事实上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

南京大会以后，学会的涣散情况有增无已。在国外的会员本来无法直接过问国内的会务，他们最多只能利用月刊发表文章和通信来表示意见。国内的会员有一部分一直没有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另一部分比较积极的也因政见不同而日趋分歧。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两年虽然开过两次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杭州，一九二三年十月在苏州），都只有少数会员参加，而且远不能代表各派的意见，南京大会上那种各执己见激烈而认真的争论已无法重复，学会的生命力也逐渐失去了。

共产主义者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想通过学会团结一部分爱国的和要求民主的知识分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政治活动和群众运动。例如未能出席杭州大会的北京的会员，就曾由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六人联名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①的提案，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了在这一革命中，知识分子应当选择的道路和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提案在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中国的经济破产、人民贫困、文化落后的现状后，指出"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而"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提案强调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而奋斗，在群众结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成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提案批判了大多数会员"要学脱尔斯太慢腾腾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减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还侈言改造少年中国，这真是甚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扑灭燎原之火了"，这实质上表明他们的"怯懦的心理"，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势力，"不敢而且不想动他分毫"。提案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号召"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并且提到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提案在最后分析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性质，指出会员应走的道路。学会是"知识阶级的团体"，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替治者阶级的丑行做知识上的盾牌，替治者阶级用深渊的学识解释、辩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自己却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第三是"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唤醒国人的同情"。提案号召会员们走第三条道路：文学家要不仅"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而且要"加入革命的民主

① "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三卷十一期。

主义运动”，在实际活动中指导民众；科学家要先将人民“从物质生活的羁勒中解放出来”，再对他们普及精神的食粮；工程师和实业家为了创造一个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也应当起来收复“全遭军阀和国际的帝国主义所蹂躏或强占了”的机会与地盘；总之，“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这个提案是一个充满战斗性和富于说服力的文件，用非常动人的词句表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策略的看法，初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这个文件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成立后的一年内，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修养上已大大提高一步。

北京会员的这一提案对于杭州大会显然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大会讨论政治活动问题时，在共产党员高君宇的提议下，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主张”的决议：“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于必要时得与以相当的协力”①。这和南京大会对比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的进步。应当指出，参加这次大会的只有十人，除高君宇、杨贤江两个共产党员外，中间分子占多数，因此共产党员的提议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也正因如此，大会自己也宣布此次会议“各项议决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并不求多数底服从”。可见这个决议并不能根本改变学会的面貌。在讨论主义时，大会不顾高君宇同志的坚持，又一次拒绝了马克思主义。

一年多以后，一九二三年十月，学会在南京和上海的会员又在苏州举行了大会，这时邓中夏和恽代英二同志因为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向大会报告了社会运动和政治趋势。这时的国内形势是，英美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借款和供给军火，支持军阀发动川湘战争和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直系军阀则大量出卖主权给帝国主义，同时用贿买国会议员的丑恶方法，“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还颁布了一套伪宪法，企图统一全国政权。大会反映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和和军阀的憎恨与忿怒以及发动青年进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要求，作出了“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的决议，作为创造少年中国的方针。在这个决议中愤怒地指出中国内政日益紊乱、外交日益险恶、英美法日帝国主义日益加强侵略的形势，批判了为外国文化侵略效忠、鼓吹“英美爱我”的买办知识分子和“颠倒于诗酒恋爱之中”与“只知从事于无目的的学问美术”的青年，决定会员的任务为“到青年中间去，以鼓吹预备而切实进行民族独立的运动事业”，达到“打倒国际势力，还我自由”的目的②。大会根据决议的精神，制定了学会的九条纲领：一、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注意英美帝国主义，以矫正一般人因对内而忽略对外，因对日本而忽略对英美的恶弊。二、为打倒军阀肃清政局。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四、唤醒国民注意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问题。五、推阐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因，以反证中华民族绝对非劣等民族。六、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七、注意青年团体生活的训练。八、反对现时智识界个人享乐主义的趋势。九、提倡华侨教育与边疆教育，以培养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国内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倒国际势力的压迫。③苏州大会的决议

① “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三卷十一期。

② “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四卷八期，

③ 同上。

和纲领的现实政治斗争性是很强的，这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员宣传的结果，但是也不能过高估计它的作用，因为，第一，和杭州大会一样，出席这次大会的只是会员的一小部分，他们通过的决议对全体会员没有约束作用；第二，决议和纲领都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过分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这一点是由于与会的多数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们所说的“到青年中间去”最多不过是向青年学生进行一些狭隘民族主义的教育而已。苏州大会决定今后月刊内容应当根据九条纲领，切实发挥，每期必有两篇以上的此类文字。此外，“对曹锟贿选态度，虽明知空言反对无效，仍决定发宣言申讨”①（这个宣言未见发表）。

共产党员虽然通过历次大会积极活动，争取改变学会的方向，但由于他们平时忙于党、团工作和工人运动，不可能花很大力量来做学会的组织工作，也由于学会生而俱有的弱点——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收到的效果很少。这时，国外和国内的国家主义分子如曾琦、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通过左舜生负责会务与月刊编辑的机会，在月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而在其他方面，月刊的脱离实际、鄙视群众的书呆子气更变本加厉，学会的向左、右、中三方面分化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在一九二四年的苏州大会上，共产党员与国家主义派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一九二五年南京大会作出改组的决议，推定中间分子五人为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分发调查表给各会员征求两方面的意见：（一）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②从许多会员的回答看来，共产主义者已放弃了把学会转变成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意图，或者主张解散，或者主张维持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形式。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最为坚决，他说：“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邓中夏同志也认为“主义如不相同，分裂亦好”，但提出“如在某点政策相同时，仍可建立联合战线”；恽代英同志则仍希望会员能在“要求民族独立与为人民本身利益奋斗各点可以合作”。另一方面，国家主义者已彻底暴露反对共产主义的真面目，李璜表示要在“澄清共产派后积极进行”，曾琦也说“对于反国家之分子不能容留同在一会”。此外，大多数人仍维持中间路线，希望维持学术团体的原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改组问题，学会无形之中就停止了活动。

在学会解散以前，“少年中国月刊”就已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四卷十二期后停刊。“少年中国月刊”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研究学会发展分化过程和会员思想的详尽资料，此外它的“诗学研究考”、“宗教问题考”和经常发表的文艺译作也有一定的价值。三卷以后的“附录”中常常登载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活动的材料如“旅德华人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纪事”（四卷八期）等，也是可以参考的。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

① 四卷八期附录一：本会近事纪（一）宁沪两地会员的苏州会议。

②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四五页。

《星 期 评 论》介 绍

一

紧接在六三运动以后，和北京的“每周评论”、湖南的“湘江评论”齐名，在上海出版了版式与它们完全一样的“星期评论”周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创刊，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五十三期后停刊）。这个周刊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获得了盛名，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起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目前的许多中国现代史著作中都把它列为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之一。但是，在研究这个刊物时，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它的两个主编，戴季陶与沈玄庐，都是后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戴季陶竟成为蒋介石国民党迫害共产党的直接帮凶。为什么这两个人在当时竟会以如此浓厚的兴趣来研究社会主义与劳动问题，他们所介绍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这个问题，在当时，由于民主革命阵营的分化还不明显，也由于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还只有初步的粗浅的认识，因此没有被提出来，但是在今天，就完全有必要与可能来加以澄清了。

“星期评论”和“建设”月刊一样，是在孙中山与国民党的指导与经济支持下出版的。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形成了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总危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也开始在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显示出来。孙中山热烈地同情和向往苏联，非常尊敬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但是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共合作以前，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旧三民主义学说，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中国。他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幻想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通过阶级调和来消灭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他也没有承认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的这种态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他所主持或在他影响下的一些刊物中。他直接领导的“建设”主要是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经济学说。“民国日报”中的左派所编辑的“觉悟”，起先也只有模糊的社会主义倾向，后来只是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才逐渐转变，终于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一度由共产党人担任编辑）。“星期评论”的特点则是从预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和劳动问题，明显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

戴季陶和沈玄庐从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潮，特别是从中国的六三运动吸取了教训，感到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抬头。为了反对军阀，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们还需要依靠工人的力量，但同时已非常敏感地看到民主革命阵营中的这一“隐患”了，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工人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和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企图骗取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信任，以便夺取对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不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愿

望发展。在第三号的"访孙先生的谈话"一文中，戴季陶通过介绍他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赤裸裸地说明了自己的企图。他说，从六三罢工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他要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免"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这就是他办"星期评论"的目的。

从同一动机出发，戴季陶和沈玄庐参加了酝酿发起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但他们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世界观和历史观说，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所常用的社会主义的词句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欺骗群众而披上的美丽外衣而已。沈玄庐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在他所执笔的"星期评论"发刊词中，他认为世界是人的思想创造的，社会变革的起源就是"人的自觉"。他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世界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人都有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的本能，本能得不到满足时，就要想，只要工人和农民"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过这样穷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想一下世界大事，就可以造成革命的形势了。这样的说法，当然不能解释革命的真正原因与动力。在其他的文章中，他编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原因来说明中国的社会。有时说，中国人抱"纯粹的子孙主义"，"打算减少他的子孙的劳动，增加他的子孙的所得，这种不平的心理，就造成一个不均等的社会"①；有时又说，中国的武人、资本家、地主所作所为的思想根源就是："把人类的本能看做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因为根本见解的错误，所以有强弱智愚的分别，从此就生了愚弄欺凌的心。又从这一片愚弄欺凌的心理上，便把同类的人视为非同类的物"，武人把士兵看成发枪炮的器具，资本家和地主把劳工看成锯子锉刀铁耙锄头的发动机，因此，"天下多少祸患，无非从'以人为物'的心理造成"②。照他的说法，只要中国人接受了"互助"的思潮，把"狭义的片面的子孙主义"化为"广义的普遍的子孙主义"，不再为子孙积累私有财产；或者人们都觉悟到凡是人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不能看成"物"，让人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能"，联合起来对"物"竞争；那末，世界上的一切危险就可免除，而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没有产生的根源了。他竭力提倡"阶级平等"，主张"凡是天下的'你'、'我'、'他'都可以当作一个人，团成一个'爱'"，不分穷富，合力建设新村③。因此，看到北京组织了"工读互助团"，他就如获至宝地竭力向人推荐，希望"各处推行这种组织。断没有在北京城里做得的事，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会做不得的。"他极口赞美说："中国的文明，不能不由最高的学府肩挑这等重担。生活与知识的大饥荒逼到眼前来了。工读！工读！！互助！互助！！我才望到你一线曙光，我希望你照遍十方世界！"④由此可见，沈玄庐是想用小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博爱、互助的虚伪说教来代替科学的革命理论，用"阶级平等"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消弭社会主义革命。

戴季陶和沈玄庐一样，用精神的原因来解释社会变革。他在"星期评论"的最初几期中

---

① "子孙主义"，第七号。

② "'人'与'物'"，第十二号。

③ "他就是你，你就是我"，第二十五号。

④ "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意见"，第三十号。

谈到五四运动时根本抹煞了运动的深刻的经济原因，歪曲了运动的性质，认为“这是‘科学’战胜‘迷信’的表现，这是‘科学万能’的证据，一定要有科学知识，方才晓得爱国，由科学知识发生出的爱国心，方才有真价值”①。他说五四运动表现了学生和商人的“组织能力”，这是“一切物，一切生物，一切人类，一切社会，一切国家的生成原起的大力量”，也就是“创造的真力量”②。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初步研究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于是开始搬弄一些唯物主义的论调，给自己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例如他和沈玄庐不同，对“工读互助团”始终抱怀疑态度，指出“在这一种生产制度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人的能力，作生产的工作，同时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③。他劝告“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④。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即阶级斗争问题上，他就暴露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他宣扬所谓中国人传统的阶级平等、互助、仁爱思想来抵制阶级斗争学说，他说：“中国人向来有一个士农工商一律平等的思想。农工这两个生产事业，尤其看得比商业重要。属于农工这阶级的人，向来也看得很高贵。就是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上面，也并没有把那一个阶级特别看轻”⑤；“我们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我中国从古以来，对于‘社会组织’就是极力排斥‘自利’，赞美‘利他’的。……我们这样大的土地，这样多的人民，真可以做成一个理想的‘平和国家’，理想的‘互助社会’”⑥；“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⑦等等。他一有机会，总要宣扬“平和的爱情”、“全体人民一律平等”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愈来愈明显化的时候，他尽力把阶级斗争说成是可以避免的“罪恶”与“过失”，企图加以抹煞与消弭。他歪曲了俄国革命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历史必然性，夸大了革命的流血与残酷的一面，说这些都是因为帝俄“政府专事助长‘阶级压迫’，使社会运动的进行不能健全发育”，以致农工阶级趋于“直接行动”；另一方面，“主张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人不肯用渐进的忍耐工夫，专用反抗的手段，加增阶级压迫的程度”⑧，“一般下级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下，没有接受合理的思想的能力”，终于造成“不幸的结果”——战乱与饥馑的惨祸。因此，他便一方面甜言蜜语地哄骗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否则对国家与人民都有不利。另一方面又谆谆告诫资产资阶和反动政府，叫他们学习狡猾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退让的精神”，而“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⑨。这一精神贯串在他所有的关于劳动问题的文章中。

戴季陶和沈玄庐实际上是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戴季陶故意夸大所谓中国的民族特点，叫中国人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也就是不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自己的国家。他说，虽然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而不是“国家的”，但是由于“各民

---

① “潮流发动地点的变动”，第一号。
② “中国人的组织能力”，第一号。
③④ “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第四十二号。
⑤ “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第二号。
⑥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第三号。
⑦ “孝慈”，第十号。
⑧ “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第四号。
⑨ 同上。

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分化——在德国成为修正主义，在英国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在法国成为工团主义，在俄国成为“多数派”。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而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各民族按照自己的历史特点和现在的境遇，采取自己的特殊方式去迎合这时代精神，就是它自己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歧路上，究竟应当学习英国、法国还是俄国，中心无主。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①。这就是说，中国人不要走俄国人的路。一方面抽象地承认社会主义，一方面却夸大民族特点，否认为十月革命所具体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策略之一，而中国五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是惯于使用这一技俩的，戴季陶正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什么是戴季陶所说的中国的民族特点呢？除了上面所讲的传统的“仁爱”精神等等外，他还捏造出一套关于中国的社会特点的理论来。他说，中国的工业还不发达，大地主也不多，劳动人民与剥削者的矛盾不大，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失业者过多的问题，而不是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就会被“无业游民”和“兵匪阶级”所接受，“一下爆发起来，挂上布尔什维克的假面，干他野蛮掠夺的勾当，那危险的境象恐怕比俄国还要加上几倍。到了那个时候，国里的‘生产机能’破坏了，外国人的势力一定也乘势侵进来了。……中华民国的国运，恐怕也就从此告终呵！”②这种说法，和张东荪所说的“伪劳农革命”简直毫无二致。显然，戴季陶害怕的并不是什么“兵匪”，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戴季陶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一贯的，他后来堕落为民主革命中的极右派决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社会主义，完全出于恐惧和敏感，他以资产阶级的“先知”自命，责备那些眼光短小，在临头的大难前熟视无睹的愚蠢的“自命实业家的人，和那讲学谈政的先生，把这个劳动问题，丢在脑后。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预备，什么样的改革，方才可以免除将来大革命的危险？真叫做一点的理解也没有。只顾研究大做寿大出丧的竞争方法。这真是中国前途顶危险的征候呀！”③可惜他的这番苦心并不能为统治者所体会，竟一再加“星期评论”以“过激”的罪名，这虽然替它添了不少的“声誉”却是违反编者们的初愿的，无怪戴季陶要大发牢骚，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看见有讲两句新话，作两篇新文字的人，便指鹿为马的说这是过激党那是过激党，却不晓得这些真有新学问有新知识的人，正是诚心诚意，在那里研究对付‘布尔什维克’的人啊！”④当江苏督军李纯表示要查禁“星期评论”时，戴季陶等不惜在刊物上公开表示态度，向他献策说：“现在是中国思潮震荡的时期，如果要压制负责任的公然出版品，就无异奖励不负责任的秘密出版品，压制的力量越是大，危险的程度越是加增。……压制就是危险，就是阻碍言论界‘自然淘汰’的进化，助长激越的风潮。请看我们‘星期评论’第三号‘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和第四号‘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两篇文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很希望当局执权的人，不要走错路了！”⑤这些“逆耳之言”虽然没有引起军阀的重视，却提供了我们了解“星期评论”的思想倾向的重要线索。

---

① 以上均见：“‘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第十七号。
②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第三号。
③ “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第二号。
④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第三号。
⑤ “本社给李纯的信”，第十号。

二

为了抵制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戴季陶等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在“星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纲领“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在纲领的序言中以五四运动为中心，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的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观念，没有真确，德谟克拉西的真义，不曾了解”，因此一直想依赖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和一般有势力的军人来治理国家，而放弃了作为“主权者”的任务，以致武人官僚政客当权，北方政府成了“卖国的本店”，南方的军政府“也是一个武人专制的隐身符”，国会又“不肯保持自己的权威”，结果是战争连年，“人民的苦痛，一天天的加增，是非不明，善恶不分，政治上的黑暗，固然到了极点，社会上的罪恶，也就走到黄河的尽头了”。就国际上说，欧战结束时，中国人民一度被“和平”、“正义”、“人道”、“民族平等”、“人类幸福”这些“极华丽极高尚极优美的名词”弄得眼花耳聋，满以为战胜国可以主张公理，“谁想这个凡尔赛会议决议的东西，依然是保障‘大国的强权’，依然是扶持‘军国主义’。我们这‘极大的小国国民’更失望到了极点了”。中国人民对于国内国际政治势力失望的结果，“感觉到非国民自己主张、自己选择、自己努力，不能够救国。所以把从前的那些‘依赖性’完全脱了，人人晓得做一个自由自主的国民，人人晓得结合起来，互相帮助，来建设这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序言接着指出这个全国人民大觉悟的时期，是一个“极危险的时期”，中国的思想界，迎着世界的新潮流而震荡起来，“‘布尔什维克’咧！‘阿拉奇士姆’咧！社会共产主义咧！种种的新制度新思想乘着这‘思想的震荡’都萌芽起来”，这些新思潮固然都应当研究，但是“我们国家的建设，社会的组织，在目前这个时代，是绝不能够照那几种的主义去实行的”，因此他们要提出一个“最合理的主张”作为建设的方针，以避免国家民族的“很大的危险”。

这个纲领分七章二十九条。第一章“主义”标明“信奉民主主义，主张废除一切用‘军国主义’‘阶级主义’做根据的制度和施政方针”以及“自由”、“平等”、“互助”、“人权”、“社会的均等幸福”、“世界的永久和平”等等原则。第二章“一般纲领”规定国家体制要“适合各地方各民族自由发展”，废除中央集权；采用代议制；允许给人民以“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方面的绝对自由。此外还有“司法和行政”、“废除旧制”、“宪法及选举”等方面的纲领，都不脱资产阶级民主的老套。外交纲领中提出废除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倒是反映了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要求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政策的纲领”，在其中提出“一切产业及征税制度，以维持‘社会的平等生活’，完成‘社会的互助组织’作终结目的”；国家要在法律上保护工农，“使农夫工人都能够脱离地主和资本家的不正当的压迫垄断”；要求从速制定“累进地价税法”以及关于劳动保险、就业和退休的年龄限制、养老金以及“工人农夫与资本家地主间的收益分配限度”的法律；把交通运输及“一切关系人民公共生活的事业”逐渐收归国有及地方公有。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具体化，目的在于在保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下，适当地调剂分配，缓和劳动人民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戴季陶在其他文章中所竭力推荐的所谓英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口口声声讲社会主义的人却连生产资料公有制都不敢提到，只想借劳动保险来解决工人问题、移民开荒来解决农民问题，这简直是对他们的一个讽刺。他们认为自己的纲领是“脚踏实地”

的，不是乌托邦和空中楼阁，然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想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恰恰是空中楼阁，至于依靠这个幻想中的共和国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更是十足的有害的乌托邦。这一点是戴季陶之流不能也不愿意承认的。

“星期评论”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认为这是救济中国的根本办法。戴季陶说，要达到政治上的“国民自决”，必须有经济上的“国民自给”，“中国人能够不靠外来的‘工业品’可以自存，那末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①他劝告工商业家要相信科学，集合力量，兴办各种的大工业。在第七号的“救国储金拿来做什么”一文里，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主张，要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努力做一件事业，就是办纱厂或布厂。他算了两笔账：一笔是日本纺织工业从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七年的扩张情况，另一笔是一九一八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纱与棉制品。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美国和印度输入中国的棉纱与棉制品加起来每年共值二亿五千万元，中国人如果筹出一亿五千万元来自己办纱厂，一亿元用在工厂上，五千万元用在改良棉种上，不到两三年就可以自给，五年之后就可以出口了。他甚至幻想趁这机会办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模范工厂，在其中实行八小时工作、男女同工同酬、附设工人补习学校、工人病院，实行保险、工人参加董事会（起先占十分之二，逐年增加到劳资双方平等为止），利润分配资本家得百分之五十、董事、经理和工人得百分之五十；等等办法。这样的工场将会吸引欧美和日本都来学习，“不但是可以救国，并且可以作改造社会的先声，建设新文明的基础，在世界上增进中国人的人权，加高中国人的名誉”。戴季陶也知道自己的乌托邦和中国的现实相距太远，一不能靠卖国的政府来实现，二不能靠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良心都已经被财迷住了，那里肯去为社会做工夫”，所以他竟异想天开地叫工人自己和“中流阶级”出钱来办，文章写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叫起“难”来了。

巴黎和会的骗局多少也教会了国民党人，使他们认识帝国主义不会真心帮助中国，“星期评论”是力主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它斥责和会“事实上就是强国的会议，……所标榜的‘自由’、‘正义’、‘人道’、‘民族自决’，都是虚伪的宣示，那些强国政治家的根本观念，仍旧不外‘强权即正义’。这样看来，靠‘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竟变做一种空想”②。但实际上国民党人远没有能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戴季陶不用说，他最多也不过把巴黎和会的“失败”看成威尔逊个人的主张受到英法等国政客阻挠的结果，是颇为可惜的事。由戴季陶郑重加以推荐的徐谦的一篇报道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的情况的文章，甚至反过来责备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似乎帝国主义之所以欺侮中国，一半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无能，保持不了自己的权利，他说：“权利义务，没有不相对待的，享权利的总须先尽义务，尽了义务方才可以要求权利。我国于欧战究竟尽了什么义务呢？……现在战事终结的时候，吾国也要争权利，无怪乎难得多数国家的承认了。”③照这样说，似乎中国人民保持自己领土的权利，也需要帝国主义加以“承认”了。他还说中国人即使争得了山东的权利也未见得有能力“享受”和经营管理，这就更加充分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自卑感和奴隶相。比较进步的朱执信也不能摆脱这样的自卑感，他说：“中国人对着世界，开口主张权利，闭口主张权利。我们这一个国家，仅仅不过四千多年，还是建筑在他人坟墓上的，有什么权利可以主张？有什么主张权利的理

① “国民自给与国民自决”，第一号。
② “拒绝签字”，第五号。
③ “答友问”（上），第十四号。

由？倘若我们自己甘心做坟墓，那末他人要在这坟墓上来主张权利，我们是拒绝不来的"。①孙中山则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他的欢迎外资的主张，他说，解决中国开发实业的资本问题，易如反掌，"其法为何？曰：欢迎外资而已，亦即欢迎机器而已"②。这就是说，中国可以依靠欧美各国在大战后过剩的机器和人才来发展实业，而各国也一定"乐成其事"。这些言论都说明国民党人还没有站到坚定的反帝立场上来。

"星期评论"对待苏联的态度是有两面性的。它不赞成苏联的制度，也反对"糊里糊涂，一点也不去研究俄国的劳农政治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只是瞎排斥，瞎害怕。"俄国革命后对华的真诚友好态度是符合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星期评论"认为"劳农政府的政策，从俄国国内的政治上讲，姑无论好不好；他已经宣言抛弃从前的罗马诺夫王朝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密约，我们应该认识他在这一点已经是可以和中国相容的。"③"星期评论"早就主张和苏俄恢复外交关系，但是又想看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不敢单独表示态度。戴季陶说，"中国是一个很弱的国，中国的国际交涉，处处时时，都是受各国影响的，都是不能独立的"，因此对俄"总不能够取与别的国太背驰的态度"。为了揣摸英美的政策，他们详尽地研究了英美对俄态度的逐渐变化。到了一九二〇年间，看到苏维埃政权愈来愈巩固，除了还在做侵略西伯利亚的梦的日本帝国主义外，各国都已放弃干涉政策，考虑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在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星期评论"就更加主张对苏友好了。一九二〇年四月，苏俄对华宣言发表，"星期评论"表示热烈欢迎，在第四十五号上登载了宣言的全文，并且评为"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戴季陶在"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意义"中说，回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俄国人民的政府"的这次对中国人民的通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在悲哀惨酷的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

"星期评论"上所发表的对内对外的政治与经济主张，表明它所反映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幻想。

三

劳动问题是"星期评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刊物上所占的篇幅最多，地位最重要。一九二〇年新年号（第三十一号）上的新年词"红色的新年"简直就是一篇歌颂"拿锤儿的"工人和"拿锄儿的"农民的赞歌。这首诗中有这样的一段："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星期评论"几乎每一期都有讨论劳动问题的文章或者介绍欧美、日本的劳动运动的资料，愈到后来，分量愈多；一九二〇年的五一节还出版了十大张的"劳动纪念号"（第四十八号）。这一切充分说

① "答友问"（下），戴季陶的按语中引，第十五号。
② "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纪念号，1920年10月10日。
③ "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第二十六号。

明，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的显示力量对于敏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了多大的影响。

戴季陶在“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第四一号）中分析了五四和六五运动（当时如此称六三运动）的经济原因和它与世界革命高潮的关系。他说：“单是从政治上看，似乎这两个大运动，只是恶政治激动起来的义愤。单从思想上看，也好象只是新思想对旧思想的激战。单就国际上看，更明明是受日本传统政策欺凌了多年的中国人所当然发挥的复仇运动”；这些原因总和起来，可以说是“由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会运动”。这一生活上的缺陷本来是早就存在的，不过许多人没有感觉到，或者没有认识出它的原因。世界大战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露出了破绽，产生了世界革命高潮，也就影响了中国。“这一个绝大的阶级斗争，恐怕比五年来世界大战争，景况还要凄怆，范围还要广大。我们这些在睡梦中吃了多少年说不出苦的中国人也就被这个大波涛的声音惊醒了”。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根源是在经济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基调”是在“平民生活的改造”，“但是这一个基调在运动的正当中，被许许多多律动的高腔遮住了，当时很不容易使人人都看明白”。运动以后，经济上的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日趋明显，劳动运动的意义，渐渐为一般社会所认识，罢工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劳动阶级的团结也渐渐具体地实现起来，资产阶级也就愈来愈退出五四时建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了。戴季陶的这一分析说明他对大势所趋，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因为他的确研究了国际形势和一些经济问题，并且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因而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无法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他曾在一些文章中解释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意义，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由“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工银制度”三根金柱作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严密的科学理论和大量的事实面前，戴季陶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他说：“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思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①但是，资产阶级的本能与立场又使他仍旧想逃避这个斗争，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麻痹工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希望资本家采取一些妥协调和的措施来缓和斗争，他这样地描绘自己的矛盾的心情：“一个人在感情上，往往总是希望和平，不希望争斗。明晓得这个和平是得不到的，这个争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②。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许多文章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写的。

“星期评论”最初企图把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劳动同盟章程”和美国黄色工会领袖刚伯斯的提议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把中国的工人运动限制在缩短工时、提高待遇、限制童工、男女同酬、组织工会自由等经济要求上。它一方面要求资本家赶快做“调和”的工夫，“对于‘工人的教育’、‘工人的安慰’、‘工人家族的待遇’、‘工人的保险’、‘失业者的救济’上面，切切实实的一件一件作起来”，否则“前途的危险是要不堪设想的”③。另一方面，它鼓励工人组织工会，同时又劝告他们“不可带政治的色彩，做一部分有政治的臭味者的利用品”，“应保持与雇主阶级的调和”④。它哄骗工人说，“要晓得罢工不是一件轻易做的事，必

① “新年告商界诸君”，第三十二号。

② 同上。

③ “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第二号。

④ “组织工会第一层的注意事项”，第十三号。

须认定'道德'、'公理'、'公义'","工人必须有严密信条，合于道德、公理、正义的组织"①。它特别注意"工人教育"问题，因为在戴季陶看来，最可怕的就是"毫无知识的工人"，他们"倘然有一天闹起'无意识的暴动'来，真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看怎么了！"所以，"单就'自命高贵人'的利害上讲起来，这'工人的教育'也是刻不容缓的"②，惟有它才可以免除将来激切的社会革命的危险。戴季陶提出一个"公道"的办法："资本家靠了工人赚钱，工人就应该靠了资本家识字读书"，他主张由资本家按照所雇工人数目的比例担负教育费用，创办学校，并且减少工时，给工人腾出时间来上学。戴季陶的打算，就是想对工人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使他们成为资本家的顺从的奴仆。

巴黎和会以后，世界工人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地发展着，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煤矿与铁路国有问题的提出，以及美国钢铁工人的大罢工给戴季陶指出，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已远远超出了国际资产阶级所妄想给它划出的圈子，在先进国中，"劳动问题的意义，也就从'改善劳动条件的问题'进为'改正工场组织'的问题，由'劳动所得的分配问题'进为'劳动者支配工场'的问题"了③。戴季陶看出英国工人所要求的国有，是"劳动者执权的国有，不是资本家执权的国有。是劳动者直接经营事业的工场组织，不是资本家经营事业的企业组织。比起以前的劳动纷议，专注意在劳动的条件的改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了"④；原来曾被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称为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美国，它的"产业界前途的暗淡比起英国来，还是厉害得多"⑤。戴季陶原来非常佩服英国资产阶级的调和手段，一再叫中国资本家和政府向它学习，但在这一个新的高潮前面，他发现调和手段也失灵了。一九〇七年以调解铁路罢工而出名的英国首相路易·乔治在处理这次煤矿罢工时虽然采取惯用的调和态度，也不过"暂时得一小康，却是根本问题，仍旧丝毫没有解决"，而过去一度受他欺骗的铁路工人也逐渐醒悟过来，掀起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罢工潮，"可见不彻底的调停，对于解决劳动问题，是没有效果的"⑥。同样，在美国钢铁工人的大罢工中，威尔逊的想调和劳资的愿望也遭到了双方面的反对，刚伯斯"在劳动者的信用，已经渐渐失堕"，"调和派势力日渐消沉"⑦。这就使一向最喜欢标榜"调和"的"星期评论"慨叹于世界上有名的调和者在"两面夹攻"下都得了神经衰弱病，大叫起"调和不是容易调得来的"了⑧。

但是，"星期评论"仍旧舍不得它的调和主义的说教，在"新年告商界诸君"（戴季陶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日在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新年宴会上的讲演，载于三十二号上）中又"情不自禁"地"诚心诚意"地"就中国的进步及和平着想"，作了"温情主义"的劝告说："诸君啊！现在民国九年了。各国的识者，人人都说：'一千九百二十年，是一个世界的难关，这黯淡的前途，还不晓得有多少的危险。'各位要晓得，现在的世界缩小了。关起门来做天下梦

---

① "上海罢工的将来"，第二号。
② "工人教育问题"，第三号。
③ "劳动问题的新趋向"，第十六号。
④ 同上。
⑤ "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第二十一号。
⑥ "乔治氏的对劳动手腕如何"，第十八号。
⑦ "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第二十一号。
⑧ "调和者与神经病"，第二十一号。

是不成的了。要享太平一国是享不来的，一个阶级更是享不来的。民国八年是多事的一年，我敢说民国九年更是多事的一年。请各位要注意世界的大势，从今天起，大大的一个发奋，唤起各人社会的良心，把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改善问题，拿来做一个民国九年的第一事业。谋公众的幸福，就是图自己的安全。倘若不然，社会革命的大洪水，恐怕不只是泛滥在工业先进国呢！”对于一些在他看来是“不识大体”，“没有远见”的资本家，“星期评论”也作了一些斥责。同时，“星期评论”继续尝试麻痹工人和工会工作者，竭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脱离政治的方向，局限在改善生活方面。戴季陶在“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劳动纪念号”）中，要求从事劳动运动的人，“暂时不要用什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因为那种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什么必要”他诬蔑上海工人的理解力判断力都很薄弱，只能谈“生活的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什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同时又诬蔑想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的人是“为私人一部分人的利益，用不正当的方法，利用群众的雷同性来作事”，或者“空口讲话，单想靠几个知识阶级的人，用意志和感情去激发劳动阶级的人，利用他们的受动性，以为这样便可自然生出一个协作共享的社会来。这种空想，是不中用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缺乏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基础，戴季陶的“调和论”无论在资本家方面或是在工人方面都不可能得到热烈的反响，他的一切努力徒然证明了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资产阶级政客的“心劳日拙”而已。

虽然“星期评论”对待劳动问题的态度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但是它对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在后期的“星期评论”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英国的劳动运动与三角同盟”（十八号），“英国的劳动组合”（一九一九年双十节纪念号），“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二十一号），“美国产业战的准备期”（二十三号），“日本劳动运动的新机轴”（二十三号），“国际劳动会议与日本劳动委员资格问题”（二十四号），“I.W.W.的沿革”（二十四号），“劳动会议与特殊国”（三十一号）“I.W.W.概要”（三十三号），“萨波达举(即怠工)的研究”（三十四号），“劳动问题的发生及其归趣”（四十一号）等等长篇资料或论文，详尽地介绍了各国的工人运动与工人组织，分析了欧战后工人运动的新趋向，给当时的关心工人运动的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对中国工人主要是上海的工人的工资、工时、劳动条件也作了一些调查（“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三十五号），在“劳动纪念号”中，更对上海一年来的重大罢工的性质和过程作了分析（“上海的同盟罢工”），对香港机器工人的罢工作了介绍（“香港机器工的同盟罢工”）；此外还发表了一些介绍各地工人农民生活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也还是很有价值的。在“劳动纪念号”上发表了施存统的“工读互助团的经验与教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应当首先彻底改造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的问题；“星期评论”的最后几期刊登了李汉俊（当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的几篇文章（“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五十号；“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五十一——五十三号）驳斥了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公开为资本家辩护的“在今天只希望工人对工人讲互助，而不希望工人对于资本家相冲突”的谬论，并且详尽地介绍了三个国际的历史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文章，在当时是起积极作用的。此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李大钊同志也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美利坚的宗教新村运动”（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新年号）和“五一运动史”（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劳动纪念号”与“新青年”同时发表此文）。

“星期评论”共出版了五十四期（在十八、十九两期之间插入一个一九一九年双十节的

纪念号），一般每期八开两张，双十节纪念号五张，一九二〇年新年号六张，劳动纪念号十张。“星期评论”除单独出售外，还随“民国日报”免费附送，销路是很广的。由于材料丰富，又标榜社会主义，提倡工人运动，“星期评论”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的确很受欢迎。虽然它在主观上并不想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因为要争取进步分子的同情，而且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达到尖锐程度、中国的革命风暴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他们也还能多少客观地介绍了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劳动运动的情况，没有作太大的歪曲，这就使它在客观上起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这一点，是编者们起初预料不到的，而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极为顽固的人颇不赞成戴季陶这样的投机。结果，虽然“星期评论”并没有遭到封禁，编者也明明知道一九二〇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酝酿时期，迫切需要革命的宣传，却突然以“本社言论受无形禁止”为借口，自动宣布“中止刊行，暂时以刊行本志同样的努力，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了①。这一点也充分说明“星期评论”不是一个革命的刊物。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附〕《解放与改造》（改造）介绍

列宁说过：“历史底辩证律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者的衣衫。内脏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懦怯地宣扬‘社会和平’（即是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充当国会议员的社会党人，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表同情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间的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多少是这样的。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人运动刚刚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开始传播，但是，由于十月革命和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的影响，中国的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力量虽然还很薄弱，却已经足以震动一部分敏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贩卖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货色，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否定中国应当走俄国人的路。在这里要加以介绍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解放与改造”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半月刊，第一卷共出八期，第二卷出十六期，均三十二开本。第三卷（一九二〇年九月）起更名“改造”，十六开本，每卷十二期，出至四卷十期（一九二二年九月）停刊。“解放与改造”以“北平新学会”的名义出版，主编张东荪、俞颂华和梁启超（“改造”的主编），主要撰稿人张君劢（张嘉森）等人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集团——研究系（由清末的立宪派和民国初年的进步党演变成的）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在民主革命中都是右派。“解放与改造”大量地登载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造

① “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第五十三号。

成了拥护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客观”地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假象，但是实际上它却从各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宣扬了修正主义和其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间，公开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宣战，暴露了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因此，研究“解放与改造”和“改造”的内容及其演变，有助于了解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情况。从这一角度说，这两个杂志是很重要的史料。

在创刊号的“宣言”与“第三种文明”这两篇文章里，说明了编者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的估计：“今天的世界不是以前的世界了，以前的世界早已过去了”①，“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按指资本主义）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除了一部分的政客还在那里讲什么非牛非马的国际联盟以外，恐怕觉悟的人已经是不少了”②。他们认为，“第三种文明”（指社会主义）的萌芽经过世界大战的春雨，已经茁壮起来，而大战后的各国革命则是催它成熟的阳光，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有欧西三岛（指英国）和亚东三岛（指日本）在支持着，“如果他们一有革命，世界必从风而靡。就好象一间破屋子止有两根柱子支着，两根柱子一倒，便都坍了。”③张君劢给张东荪的信中也说，到欧洲以后，“聆其先觉之言论，举社会岌岌不安之象，若物价之昂，罢工之多，租税之重，财政朝不保夕之状，乃疑及欧洲政治社会制度之不能久存与物质文明之不适于今后。”④可见世界资本主义腐朽衰退的情况，他们是充分把握了的。狡猾的耗子在洪水来到前就要搬家，敏感的张东荪之流也想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洪水中抓几根稻草来维持本阶级的生存。在他们眼中，“十九世纪以前的旧学说”已是“人家久已废弃的古董制度”了，要应付当前的危机，就得走“捷径”，也就是“研究欧美先进国几百年来积聚所得的最后最新的结果”⑤。但是，他们所说的最新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各色各样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如罗素、颉德（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奥斯、爱尔乌德（都是反动的社会学家）和倭铿（唯心主义哲学家）等人的哲学、政治、社会思想以及应有尽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他们就在“社会主义”的标签下，把这许多毒草贩给了中国人民。夹杂在这些毒草中也有少量有益的东西，例如苏联的宪法、土地法以及政治教育情况的介绍，列宁著作的片段译文等，但在编者心目中，决不是想把苏联的经验应用于中国，这可以用张君劢的话来证明：“海内之输入俄国学说者，其为思想研究之助乎？抑为中国对症求药乎？如曰为思想研究之助也，则吾以为无论何种学说，皆当输入，而决无所谓危险与不危险之别，故应否输入之说乃不成问题。若曰，对症求药也，则吾之所见，稍有异同。”⑥更不用说，他们在“输入”的时候，作了多少歪曲了。

“解放与改造”自命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它宣称第二种文明已经崩溃，全世界必将“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所谓第三种文明就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在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会为本位，经济上必定以分配为本位，制

---

① “宣言”一卷一期。

② “第三种文明”一卷一期。

③ 同上。

④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附录，一卷六期。

⑤ “新学会宣言书”，一卷一期。

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附录，一卷六期。

度上必定以世界为本位，社会上必定没有阶级的等次，世界改造以后，“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①讲到中国情况时也肯定地说：“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②，主张今后在中国不应再提倡个人主义的道德，应当提倡互助精神，培养合群的道德。笼统的说，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以后而来的一种新制度和新思潮，社会主义的精神是提倡劳动、互助，合群，反对个人主义等等，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社会主义决不仅仅是这些美丽动人的概念的堆砌，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它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透辟研究为基础的科学，它也不是学者们在书斋中探索的对象，而是要求和指导着一系列的实际革命行动的。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检查“解放与改造”上的宣传，那末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的全部的阶级性、科学性和战斗性都被阉割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空空洞洞、含含混混、没有火气、也没有生气，任何阶级都无须加以反对的文化思想与道德原则了。

“解放与改造”竭力否认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强调它是“全人类反对现在状态的一个共通趋向”，“一种浑朴的逆现社会的趋向”，“与现在相反的文明运动”等等。张东荪说：“当面的问题，既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又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既然文化普遍了所有的各阶级各民族，就应该把人类全体做一个目标去求全人类均衡的幸福，不应该把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做目标去求他们的幸福”。他用主观的原因解释新思想的发生，说一切新思想都是由于“对于环境不满足的直感”而起；就社会主义的发生来说，固然首先是出于无产阶级“对于雇主暴虐的环境起一种不满足的直感”但是对于这个环境，“却不只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利害要起不满足的感情，就是其他的人也有时觉得不满足。……所以对于现在状态的不满足，到了近代，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感想，对于现在环境的改造，到了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要求”，成了“各阶级共通的情形，不能说只是无产阶级要求社会革命”③了。另一方面，“解放与改造”又把社会主义说成是许多思想体系的混合物，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用张东荪的话来说，就是：“须知社会主义四个字是包括的”，一方面，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即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修正主义，都应当“包括”在内；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而不是仅仅改造一方面的，“凡是改造人生而合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无不把他综合起来”，这一来，各式各样的现代社会改良学说，只要在表面上骂一骂资本主义，或者空喊几声“互助”、“平等”之类的高调，就可以被“包括”到社会主义里面来了。以这一理论为根据，“解放与改造”几乎提出了几十种社会主义学说，或是说，下“第三种文明”的种子的人，从生物学方面讲来，是克鲁泡金与伐伯尔（法国昆虫学家），他们主张生物生活的要素是协助，不是互争；从社会学方面讲来是现代大多数社会学家（如颉德）；从法律学讲来是一些主张没有权利或主张法律是自我克制的法学家；从经济学讲来才是马克思派的“社会分配说”④；或是剽窃罗素的关于支配人类的两种冲动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能把私有冲动缩小到最小限度，创造冲动发展到最大限度的制度；或是搬运现代反动的社会学说，认为社会进化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竞争的结果，“社会的进步是向伦理的目的前进”，“文

---

① “第三种文明”，一卷一期。

② “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卷七期。

③ 同上。

④ “第三种文明”。

明的企图是在以服务律代替竞争律"，把社会主义说成文明的自然趋向①；不难看出，"解放与改造"送给读者的是怎样一种折衷主义的杂碎汤了。

在谈论社会主义时，张东荪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于是他向修正主义求救，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借以贬低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意义，他说："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斯便得到科学的基础，这个议论我是承认的。若是说社会主义以马克斯的学说为止境，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承认这句话。我们稍把近来讲社会主义的书来翻阅一下，便可以看见马克斯以后不晓得分了若干派。这便是马克斯学说不包括的证据。因为他的学说不包括，所以后人要去扩充他修正他。总之，现代的社会主义是经过无数的修正、无数的扩充的最后结果，不单是马克斯一人的学说了"②。根据这样的理论，"解放与改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

"解放与改造"进攻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矛头指向它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手法一样，"解放与改造"首先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经济定命主义"，然后借着批判"经济定命主义"来否定唯物史观。它硬说马克思主义是"片面性"的，过分强调了物质的作用而忽视了精神，完全否定了人的思想智力；唯物史观"不过是见到一方面，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人类的进化竞争，是合各种性质凑起来的，除了物质与经济的方面以外，也不能舍弃'智力'。所以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并不是主要的部分"③。它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二者间的相互作用的原理，认为经济因素和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美术这些"创造的势力"，"都有互为因果的关系，究竟孰先孰后，也难以论定"④。更进一步，它干脆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公开宣称精神先于物质而存在，"一时代的制度，是那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表现。……所以时代精神若是社会主义、互助、博爱……，那末，一定是有一种新制度来表现他的精神，是无疑了"⑤；因此，必须先改造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改造，可以算是物质生活改造的花。物质生活的改造，可以算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先有了花，然后才有果"。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任何改造运动都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造出新制度了，但"这种新制度和没有改造的旧精神冲突起来，也必使最新最善的制度失其效力"⑥。在这样地"击溃"了唯物主义以后，"解放与改造"就有充分的理论根据来批判马克思主义了，它说，所谓"正统派"或"极端派"马克思主义过分偏于唯物的方面，反而"足以妨碍社会的改良"⑦，甚至在思想界引起"反动"，产生唯神论的倾向；如果社会主义运动仅仅只讲科学的理论，就不能使人心满足，运动也不能得势，因此，为了"满足现在的人心，并且使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运动热心，就不可不加以伦理观和精神的要素"⑧，就不可不加以修正，"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⑨，"去马克思而返于康德"⑩。二卷七期上的"社会主义简明史"向读者推荐了新康德主义，说自从十九世纪末叶

---

① "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一卷四期。

② "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卷七期。

③ "社会主义的误解"，二卷二期。

④ 同上。

⑤⑥ "精神生活的改造"，二卷七期。

⑦⑨ "指导、竞争与运动"，一卷二期。

⑧⑩ "精神生活的改造"，二卷七期。

以来，马克思主义发生了“进化”，这表现在哲学上由唯物主义倾向于“新理想主义”即“全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全新康德主义结合就产生各种流派的修正主义。“解放与改造”的目的就是告诉读者，马克思主义固然是集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成（它把马克思主义说成“社会主义的成立期”），此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都高明，但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而修正主义无疑要比马克思主义更为高明。

其次，“解放与改造”着重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学说。他们既然把社会主义看成人类共同的理想，很自然就要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了。“解放与改造”通过种种方式宣扬阶级调和主义，认为把社会主义看成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一种误解。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说“除了阶级的利益外，其他的动机也可促成社会的进化”，“进化的动机不是经济的，却是智力的与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不应当着重一阶级的利益，不应当在竞争中只帮助一个阶级取得胜利，否则不能发挥各个阶级的创造力，反而不利于进化，所以“阶级的运动是反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当是为全社会的”①。他们提出所谓“社会连带”的伦理，强调改造社会要“全体谐和”：“社会是连带的，缺了甲，乙便不能生存，缺了乙，甲也不能生存。……做一个社会的修整就是把社会全体来修整一下，虽则成了一个新社会，但这个新社会仍旧是一个谐和的全体。……所以我们要改造社会，必定预定一个全体谐和的计划，若是只注目在一部分，将来必定有自相矛盾。”②他们还宣传“爱的协合观”，认为维系社会上的复杂关系的东西本来是“人类心中之爱”，这个“爱”是有“普遍性与永存性”的，“凡于爱的协合中，不能区分阶级，否则已属反乎协合之原始条件”，但是人类往往受“不良思想”和“不良制度”的蒙蔽，忘记了所以协合的原因，才产生“强者凌弱，富者欺贫”的现象。根据这种说法，社会上一部分人生活苦一些，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统治阶级想起了“爱”来，问题就解决了，可怕的倒是“一般憔悴垂死之人民，奔走呼号”，还没有觉悟到要“爱”自己的同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③。万变不离其宗，以上的任何一种“理论”，目的都是在于否认阶级斗争。另一方面，“解放与改造”表示对革命深恶痛绝，认为革命是社会发展中反常的“病理的”现象，“于社会前途很有许多危机”，他们很希望“支配阶级”能放聪明一点，按照反抗者的要求来“修正其制度”，万一支配阶级“冥顽不灵”，引起革命，就要造成很大的不幸，因为“用暴力来推翻旧制度，往往是直接的，卤莽的，而不经反想的，表现低级文化的特质”，使乌合之众得势而趋于极端并且产生“大权独揽者”，引起长期的社会秩序的混乱，文明的破坏与退步④。他们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趁机推荐一些反动的学说来和它对立，例如他们大力介绍了美国的反动学者奥斯的“社会的庶民主义”。根据这位奥斯的学说，“庶民主义是在青年时代，社会主义是在幼稚时代”，“社会运动是向着庶民主义的极轨而趋的，这种极轨就是社会的庶民主义”，社会主义既“融化”在这个“新庶民主义”中，就不能不抛弃两种“谬见”：一种“谬见”是“劳动者的利益与社会中其他各阶级的利益都不相同。阶级竞争是交战的呼声，并且能达到目的”，这种见解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一个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当做比其他阶级都来

① “社会主义的误解”二卷二期。

② “改造要全体谐和”，二卷五期。

③ “予之爱的协合观”，二卷七号。

④ “述爱尔和特氏论社会常态的与变态的改革之大意”，二卷五期。

得重大，乃是一桩极笨的事。……无论那一个阶级的利益，若果和全社会的福利相冲突，必定不能存在”。社会主义应当抛弃阶级战争而主张“阶级的互助，变得温和起来”。第二种“谬见”是社会革命，虽然现在还有人相信暴动是有力的，但只要“庶民主义的精神普遍起来，必定可以使多种利益互相配和，暴动就可以消灭了”。“解放与改造”竭力推荐这种“社会的庶民主义”，说它是两种极相反的势力，即产业主义（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合主义相交融的结果，它既可以免除少数人的专横自利，也可以免除多数人的专横自利，因此是“比较的适于社会主义的正统”的①。毫无疑问，这种能“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义，仍旧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

“解放与改造”还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角度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性质，把它说成是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生产者”进行统治的机器，有三种弊病：第一，生产的管理也归国家，国家的权力太大，要堕入官僚主义；第二：工钱制度还存在，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罢了；第三，既是以消费者为本位的组织，可能为消费者的利益而牺牲生产者的利益。他们提倡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说这种主义“所主张的经济组织，是新组织中的最好的。中国改造经济组织，最好的是取法这种。”②后来，张东荪等人在“改造”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与“社会主义研究”上大力宣传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且因此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

在否定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时候，不用说，“解放与改造”同时也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了。因此，“解放与改造”对苏联不会采取友好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为了冒充进步，“解放与改造”还不愿采取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立场，他们竭力表示对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没有意见的，而且是全心全意赞成的，所不满的只不过是这一革命所采取的手段而已。“解放与改造”曾经登载了一些比较客观的介绍苏联建设情况的文章，苏联第一个宪法的译文（一卷六期），婚姻法、离婚法和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俄罗斯之新法令三种”，一卷七期），土地法（二卷一期），并且从英文节译了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九一七年五月作，译文改名“鲍尔雪佛克之所要求与排斥”，载于一卷一期）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作，译文改名“建设中的苏维埃”，载于二卷六期）这两篇著作。张君劢表示他对于俄国革命，有两点是佩服的：“一曰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二曰排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行第一主义，可以去游谈坐食之辈。号为读书君子，稍知劳力之苦，庶不至以小民生命为儿戏；行第二主义，可以知政治上之兼并，终必陷于杀人流血，此世界大战是为殷鉴。此二端者真人类平等之理想而斯世大同之涂辙也。”③他还表示“不以杀人流血之有与多而诋毁俄国革命”。对于列宁，他们在表面上也是称赞的，如说：“俄蓝宁辈之所为，震惊一世之力，可谓前无古人”，“其于蓝宁则佩其主义之高，进行之猛，字之曰社会革命之先驱”等等。但在称赞的声音中透露出对于十月革命的歪曲，例如张君劢所谓“去游谈坐食之辈”无非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游手好闲而已，他所谓的人人劳动其实是包括资本家经营管理的“劳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劳动在内的。因此他在称赞之后接着就说：“吾之所不敢苟同者，则其政府之组织限于一阶级，而

---

① “奥斯氏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一卷三号。

② “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二卷一期。

③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附录，一卷六期。

私有财产之废也，皆出于强力，致不免同种相残。”①谈到列宁时，他们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个人英雄的角度来称道他个人的天才，根本没有把他看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在一些文章中把他比成“凿空探险”的冒险家，独断独行的“惑众自利者”、“窃权专横者”②拿破仑第三与袁世凯式的“假窃民意”的“豪杰”，杀人流血的暴君和“摩顶放踵”的“开山教主”③，可说是极丑化与诬蔑之能事了。这样的曲折巧妙的手法，比起军阀和官僚的谩骂所起的反动作用，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他们甚至借着歪曲列宁而否定了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所应遵循的普遍规律。张君劢强调俄国革命是列宁个人的天才与胆略所造成的，“此可一而不可再，可偶而不可常”，“可谓数百载而后一遇，有蓝宁之天才，有蓝宁之自信力，而后能致此震天撼地之业，若夫天才不如蓝宁，自信力不如蓝宁，而欲尤而效之，未有不画虎类狗者也”④。

张君劢为了更有说服力地反对俄国革命，特地找到了刚刚借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手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德国来作范例，推销所谓德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翻译了魏马共和国的宪法并加以详尽的评论（“德国宪法全文”，二卷八期，“德国新共和宪法评”，二卷九、十一、十二期），写了“德国革命论”（二卷三、四期）、“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二卷十四期）等长篇论文来评述德国革命。他首先一手遮天地肯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当权的德意志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俄国革命在目的上是一致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比较两国革命在方式和手段上的长短，他说：“于德俄革命以左之右之者，不在其社会主义之实行，而在其取采之手段”；“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亦有主义虽不完满，徒以手段不误，反得和平中正之结果者，俄德之革命是其比较也。”⑤他大事吹嘘德国革命的“循规蹈矩”、“蹈常习故”、“根基深厚，践履笃实”、“脚踏实地，远非俄所能及”。他强调德国宪法的“调和”精神，认为在这部宪法中表现了“苏维埃政治与代议政治之调和”（指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在镇压革命后，在形式上保持了所谓劳工会议），“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调和”（指德国宪法承认私有财产制，但又规定国家必要时可有赔偿地征收土地及大生产事业为国有），“劳工阶级与资本阶级之调和”（指宪法中规定罢工时劳资双方可以“平等协议”解决），是非常伟大的地方。资产阶级的内阁、国会和宪法是“共和建设之大本”，德国正因为保持了这一“大本”，所以能建设国家，中国和俄国没有能保持它们，以致“纷纷扰扰以迄今日”。张君劢认为，德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国民知识和道德水平都很高，而俄国人民由于缺乏知识和道德，才把社会主义搞得一塌糊涂。

张君劢又以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批评了俄国革命而表彰了德国革命，他说：“两国革命之异点，可以法律手段与非法律手段衡之”。俄国革命以少数人的力量更易国家的法律，不依“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这是“非法”，结果“其国必乱”，“虽有利国福民之美意，亦且变为祸国殃民之暴举矣”。俄国革命推崇劳动过度，“而至于排斥其他国民”，是不合平等的道理的，至于财产的没收、贫民专制的施行，如果以法治主义的大原则来衡量，“无不相叛谬”，所以，苏俄才“为世界所不容，其勇猛固可嘉，若谓当取法如此，则吾未之敢承”。

---

①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附录，一卷六期。

② “指导、竞争与运动”，一卷二期。

③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二卷十四期。

④⑤同上。

反过来看，德国就不是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偏于议会政略故，失于社会主义，而得于法律主义，俄以偏于革命手段故，得于社会主义，而失于法律主义"。于是张君劢得出结论说，中国应当参取二者的优点，"对于军阀之扑灭，当取革命手段，对于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政略，吾之为方针者大略若是"。图穷匕见，"解放与改造"所宣传的一切，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如果说，在空谈理论或评述外国问题时，"解放与改造"还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的遮羞布，那末在具体讲到中国问题时，它就不免捉襟见肘，处处露出反对社会主义、为资本家代言的真面目了。在创刊号上一面侈谈第三种文明，一面就强调中国特殊、中国落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人聚于一堂……大多数的人仍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够做和应当做的事，除了大力进行文化运动外，还要设法"变外货为外资"和"移民往各国需要人工的地方去"。按照作者的解释，吸收外资的目的，"在变纯粹消费阶级为劳动阶级，止要工厂能自给，本来不怕资本家。若果能行工厂立宪制，就是外人开的也不妨事"，可见为了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他们竟不惜公开表示欢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连社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了。在以后的各期中，"解放与改造"一再重弹"中国落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中国没有劳动问题"等等的滥调，抹煞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说："工业没有发达的国家，资产和劳动两阶级是没有多冲突的，因而阶级斗争也不能在他们的两阶级行的，已是明明白白的了"，既然没有人能说中国的工业是发达的，这个道理也就能应用于中国，中国目前应当是资本家与劳动者联合起来成一个"自给阶级"，共同对付"寄生阶级"①。什么是中国的"寄生阶级"呢？"解放与改造"举出两个，一个是"武人阶级"，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是当时中国一切进步势力都要反对的，但"解放与改造"攻击的重点却不在此，他们异想天开地想出另一个"寄生阶级"来作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共同敌人，这就是"包办制度"即"包头制度"。不错，包头是一个半封建的寄生阶级，但它首先是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服务、帮助资本家进行剥削的，他的利益在基本上是和资本家一致的，而"解放与改造"却借着攻击包头制度而美化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说什么"在各国，都是资本家虐待劳动者，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资本家的跋扈是很少的，雇主的暴虐也是很少的，即使有这种情形，劳动者也容易想法子去抵抗他们"，而真正制劳动者死命的却是"包办制度"。有了这个"包办制度"，资本家就得多费一分利润去养活他们，以致资本家失本"、"投资不稳固"；包头插在资本家与工人中间，一方面可以挟制资本家，另一方面又要压抑劳动者，所以是"生产方面的大障碍"。"解放与改造"主张中国应当组织一个资本与劳动并重的"两元社会"，打倒那妨碍资本家与工人直接交涉的"包办制度"，"若是一味的反抗资本家，还是隔靴搔痒"②。这些说法反映了资本家与包头的一定程度的矛盾，"解放与改造"多少是想借工人之手除掉把头制度，达到彻底资本主义化的目的，这在旧中国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解放与改造"企图转移工人的注意力，缓和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证明中国没有资格实行社会主义。

一九一九和二〇年间，进步的报刊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报道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揭发资

---

① "中国的阶级斗争"，一卷七期。

② "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一卷五期。

本家的残酷剥削，而自命宣传最新思潮的"解放与改造"却对此只字不提，一味大谈其"在工业未发之先，把极少数的工人团结起来，预先设法，或调和将来的阶级的冲突，或把生产机关归公有，免得工业发达，资产和劳动两阶级的冲突也就随之而起"①。为了缓和劳资矛盾，"解放与改造"大力宣传了改良主义的工会理论，强调"工会是消极的，但求改善工人们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境遇，不是积极的排斥雇主阶级。换一句说，就是工会是在现经济和现社会制度下面谋工人们的利益，不是推翻现经济和现社会制度的组织，希图从新改过"。他们还强调工会是"和平"的，工会不仅对工人"最有利益"，而且对资本家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资本家和有秩序有组织的工会订立集合契约，比较的简易而经济"②。不用说，这样的工会早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组织，而是劳资协商的机构了。"解放与改造"的有些作者甚至公开叫工人"不要打破资本主义"，反对"工人集合团体研究抵抗的方法——用总罢工去对敌"，而主张解决劳工问题的方针应当是"替工人想法子，使大资本家——雇主——觉悟，改变生产的组织和报酬的方法。这觉悟是改造的原动力，使资本家和工人大家融洽平等，就是改造的结果"，他提出使工人将来也可以处于资本家的地位共同发展经济的"资工协社"的办法，"由资本家出本钱，创设工厂，雇佣工人，工人虽不出资本，工钱以外也可以分到分利，好象股东和工厂的红利一样有利害关系"，这一来，"工人在工厂做工自然安心，自然愈加出力，公司的余利也可增多，那末工人受惠很多，雇主的益处也不少，不独同盟罢工可以消弭，就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解决许多呢！"③然而，这样的办法除了企图诱使工人俯俯贴贴甘受资本家的奴役之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解放与改造"也从另一方面暴露了自己的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立场，这就是对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道德水平与智慧的估计。五四运动以后，原来自以为是最干净、最聪明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都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中的最优秀的分子固然逐步改变了世界观，走上与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即使一般的群众，也多少要对劳动、对劳动人民赞美一番。知识分子思想面貌的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清楚地反映在五四以后出版的进步报刊中，但我们在"解放与改造"上却丝毫也看不到这种迹象。"解放与改造"虽然也唱过"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的高调，提倡"劳动阶级与知识阶级的混合"，并且说："中国人中最坏的就是士大夫"，"中国的知识阶级最没有互助的道德和团结的引力"，因此应当首先改造知识分子，才能加入到劳动阶级去，否则他们就要把劳动阶级染坏了④。然而这真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实际上"解放与改造"处处以轻蔑的口吻对待中国劳动人民。例如有一篇文章把中国工人说成"没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是"无事能干"的人，文章中引用一个资本家的话诬蔑中国的工人"没有受过教育，毫无知识，其愚笨简直同牛相象，任你如何指导，他们总是不懂"⑤。他们极力贬低中国工人的思想水平，除了出于资产阶级本能外，也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可以借口工人愚笨而推迟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例如张君劢就说："中国的贫民阶级非特知力不发达，即本能亦不发达，宅性不厚，无论何事不能为。故今日之中国非组织贫民专制

---

① "中国的阶级斗争"，一卷七期。

② "说工会"，一卷二期。

③ "上海的劳工问题"，二卷一期。

④ "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一卷三期。

⑤ "无事可做"，一卷三期。

之时，乃改造贫民性格之时，中国下级社会之人性不能逐渐改善，则一切社会革命皆为空谭，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①。

“解放与改造”中也谈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这方面，它的中心论点是从农民占中国人口最多数的现象出发，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超过工人运动的程度，认为在农业国里，劳动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应当在乡村，所以中国劳动问题的中心当然是农民问题②，只要“农民的人生观一变，农民的事业一发动，那末直接间接就可以影响到全国”③。但“解放与改造”所说的农村运动根本不是农民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农村改革，例如搞合作运动（包括信用合作社即平民银行，消费合作社即消费公社）、地方自治、普及教育等。“解放与改造”幻想在保持地主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这一切的改革，它提倡“就原有的乡董村正与本来的联庄会稍稍改变”，组织以一村或几个村为单位的农村小团体，举办学校和低利信贷机构④。它大力推荐欧洲某些国家中为农村资产阶级服务的“平民银行”，认为“可以解除农民经济上的压迫，给以向上发展的机会，养成互助协力的精神，树立平民教育的基础，使一般无知无识的农民可以渐渐懂得世界的新潮和人生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平民银行的设立实在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一定可以为中国的农民开一新纪元。中国一线的希望全在乎此”⑤。在中国农民迫切需要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宣传这样的改良主义乌托邦，其反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综上所述，“解放与改造”的资本主义立场是非常明显的；张东荪、张君劢之流打着宣传社会主义的旗子，偷运的完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货色，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革命运动的发展。

• • •

一九二〇年九月，“解放与改造”改组为“改造”杂志，编辑和撰稿人中增加了新从欧洲回来的梁启超和蒋方震（蒋百里）等。内容和以前也有所不同，主要是一般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减少，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的比重增加，出版了一些特辑，如“废兵问题研究”（三卷三期），“自治问题研究”（四期），“联邦研究”（五期），“社会主义研究”（六期），“教育问题研究”（七期），“军事问题研究”（九期），“制定省宪问题”（十二期）等，每期还经常发表讨论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的论文。“改造”除了继续评介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外，着重介绍了罗素、倭铿、杜里舒等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学说，还出了一个“相对论专刊”（三卷八期）。此外，梁启超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论文也在“改造”上发表。

“改造”的基本倾向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有些改变，那就是表现在“解放与改造”中的比较抽象、比较隐晦曲折、比较零散的论点，到了“改造”上已逐渐具体化、明确化和系统化了。由梁启超执笔的“发刊词”中声明名称虽改，“精神则犹前志也”，“本刊所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梁启超提出十六点作为“改造”的方针，这也可以说是研究系中的梁启超一派的政治和经济纲领。这十六条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不良制度”

---

①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二卷十四期。
② “农民解放与平民银行”，二卷五期。
③ “农村运动”，二卷十二期。
④ “我国劳农问题的研究”，二卷五期。
⑤ “农民解放与平民银行”，二卷五期。

是由"不良思想"所维持的，因此一定要先行"思想革命"，然后才能"颠复制度"；（二）在经济制度上，承认资本主义，在这一前提下，力谋调节和改良，"经济改造在使人人由劳动而得生存权为最低限度，同时对于自由竞争应有最高度之制限"，一方面"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另一方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三）在思想上，"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四）在国家体制方面，主张以地方为基础，削减中央权限；（五）反对"思想统一"，对于世界上有力的学说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反对"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提倡"忠实深刻的研究"；（六）强调整顿和发扬"中国文明"。由此可见，"改造"的主导思想是：在抽象地承认"劳动神圣"、"分配平均"的口号下，主张保持私有财产制，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个人主义；在"思想革命"的口号下，宣扬中国的封建思想；在"文化输入"的口号下，偷运各式各样的欧美资产阶级学说；在"反对思想统一"的口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提倡忠实深刻研究"的口号下，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在具体涉及中国问题时，"改造"回避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而在枝节的地方自治和废兵的空谈上大做文章。和"解放与改造"一样，"改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矛盾，他们想反对军阀与政客，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却不敢触及根本制度；他们感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同时又幻想能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因此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们迫切要求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条件下，为了缓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不敢公开为剥削制度辩护；他们一心想宣扬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但为了伪装"新"的面目，骗取进步知识界的信任，又不能不同时对社会主义思潮送些秋波。这样的一付两面派的面目，一直到和它属于同一政治系统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张东荪的"内地旅行之又一教训"，引起了与共产主义的正面论战时，才彻底被揭露。

配合着"时事新报"上的反社会主义逆流，"改造"上发表了许多长篇的论述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行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以三卷四期的"现在与将来"与三卷六期的"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书"为最重要。张东荪早在"解放与改造"上的评论中就已不断透露出反对社会主义的情绪，他所主编的"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这个报纸打着宣传新文化的招牌，而在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宣传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都是和当时进步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相对立的。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张东荪借着英国唯心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写了一篇"内地旅行之又一教训"，公开声称救中国的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振兴实业，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篇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深广发展时资产阶级右派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公开宣战的信号，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进一步分化的标志。限于篇幅，"时事新报"上只能发表一些短文，"改造"就担负了系统论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任务。

"改造"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理由是，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成熟壮大的工人阶级，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与阶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实业，如果过早宣传社会主义，就会为有野心的人所利用，借"兵匪"的手实行"伪劳农革命"，引起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中用所谓四种病概括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与"外力病"。

所谓“贫乏病”是说：“大多数人民因于生计，因本来物产不丰，加以连年天灾人祸，以致愈贫”，“外力病”是说：“自前清以来关税外交完全失败，外国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而为一以压倒中国。”这两个病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因为国内生产落后和外国资本的压迫，还没有发达起来，因此，“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当然，开发实业可以通过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另一条是资本主义。张东荪所说的另外两个病就是用来证明中国不能通过社会主义发展实业。张东荪说，中国大多数人民患着“无知病”，“和原始人类的状态所差未必甚大”，而“自民国以来，以连年内乱以致兵匪愈增多”（“兵匪病”），因此中国没有“市民”或“公民”（指资产阶级），工人和商人都是很少的，被统治者中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力量的阶级，只有“原始生活的农民与人性变态的兵匪”。张东荪无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飞跃发展，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和政治质量作了过低的估计，他说，“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阶级人数又少，并不能有何势力”，因此，“现在只能谈到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如果一定要宣传社会主义，工人不会听得进去，“独是兵与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而野心家就可以乘机利用这块招牌，引起破坏性的“伪劳农革命”了。这样的假革命，“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张东荪的这一谬论是他在“解放与改造”中诬蔑中国工人阶级的论点的总结与发展，其实在张东荪这样的资产阶级眼中，一切不愿做资产阶级的顺从奴仆的劳动人民都是“匪”，反对以“兵匪”为动力的“伪劳农革命”，不过是一个用来掩饰反对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实而已。

张东荪在否定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的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以后，把资产阶级抬了出来，强调要打倒军阀，必须靠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而这个力量已在发展了。他很高兴地说：“我近来觉中国各地的商会渐渐地增加势力，而交通口岸的商会尤有能力。试看现在的自治运动，便是中产阶级渐起的明证。……我们须知中产阶级能起立一分，便是他们背后的经济力强了一分”，将来就会出现一种叫做“财阀”的新兴阶级，“可用经济力制垂毙的军阀之死命”。张东荪认为这一趋势虽然还很缓慢，但是必然的，只要不发生“伪劳农革命”，中国一定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张东荪采取了非常巧妙的方式来宣扬资本主义，他说，用资本主义的企业开发实业，“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利”表现在：有了资本主义，“总是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虽其分配的程度不同，然不能说只有资本家得利而贫民丝毫无所增”；资本主义发达后，可以把阶级分明起来，造成一个“绅商阶级”，同时造成一个劳动阶级，才可以产生劳动运动，才有讲劳动人民教育的余地；最大的好处则是，资本主义可以“瓜代军阀而免去内乱”。张东荪继续他在“解放与改造”中美化中国资产阶级的谬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统是受自工头的。”他歪曲工头的本质，说这是中国下层社会的“寡头制度”的表现，是由中国工人阶级本身的缺点产生的。他说：“我近来以观察所得，知道企业的所以不能发达，原因全在中间阶级的做恶。……工头专门剥虐工人，以致工人道德堕落，终年怠业，则工人的受苦全在劳动界自身的制度可以无疑”，因此“在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分苛责资本家”，而目前由绅商阶级实行一些温情主义的措施，如在工厂设补习学校、分红制度、疾病保险与养老金等，对工人是更为有益的。这样说来，资本主义不但能使中国统一、安定和富强起来，而且简直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捷径，资本家也成了工人阶级的恩人，而大力宣扬资本主义的张东荪当然也可以保持“社会主义者”的

光荣了。

张东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根本看不到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力量。他假惺惺地用“自己人”的声口说，社会主义者应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既无力打倒军阀，又没有速效的办法来增加生产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我们便知道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他建议社会主义者与其现在即宣传社会主义和劳农主义并进一步组织团体，从而制造出伪劳农革命，不如“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第一件基础的事是，为了救济“无知病”，要发展“普通的文化事业”和“广义的教育事业”，以便“授知能于无知能者”，“陶冶”他们的人格。第二件事是用怀疑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他说：“与其看了几本书就深信不疑，不如看了几本书就动了怀疑之念。哲学的起源是怀疑，愈怀疑愈研究，研究的结果方有肯定，这是当然的理。若是并无研究而就以耳食之谭来干宣传事业，实在要不得。甚（至）于看了几本书，一路看书一路宣传，亦未必妥当，最好是从容地彻底研究，不必急于确定。因为不愿意‘轻信’，方有‘真信’，因为要求‘真信’，方不愿意‘轻信’。所以现在中国的现状不能立刻实行何种主义，正是给我们以从容研究的时机”。第三件事是，为了救济贫乏病，应当办消费协社和“因利协社”（即信用合作社），这“在今天已不是主张的问题，乃是实际需要的问题了”。张东荪所说的第一件基础的事的实质是向工人阶级进行为参加生产所必要的教育，并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意识，麻痹他们的阶级觉悟；第三件事是想办几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来装点“社会主义”的门面，这两件事都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会去做，而中国的资本家恐怕还没有他那样的“远见”，接受不了他的忠告，因此他无非是在放空炮而已。至于第二件，才是他的真正的企图，他想把社会主义变成学院式的研究题目和讲坛上的空谈，阻碍实际的宣传工作，而提出“怀疑”的态度来动摇进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更是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惯使的伎俩，用心是颇为险恶的。

在三卷六期的“社会主义研究”特辑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申说”里，张东荪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反对在目前作社会主义宣传的理论。张东荪重复了他把研究和宣传、理论和实践截然分开的惯技，捏造出所谓“信仰上的社会主义”与“学理上的社会主义”，说这两者“完全是两个东西”。他诬蔑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热心的青年”把社会主义当作宗教，“本不需有真理为其根据，只要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就够了”，他们象佛教徒用种种诡辩回护佛教那样地爱护社会主义，“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其实仍是从信仰的动机而出，不过外面穿了一件理性的外套罢了”。他提出有“极冷静的头脑”的学者们来和这群热心青年对立，认为应当由这些学者们把“信仰上的社会主义”与“学理上的社会主义”分开，尽量把学理上的书籍翻译出来，使人家都得着共同研究的机会，吸取先进民族的经验和教训，在学理上把社会主义推进一步，以创造出来一种更圆满的社会主义。根据张东荪这位“学者”冷静的研究的结果，“现在各种社会主义皆有缺点”，“一切社会主义都是正在研究修正中”，出现最晚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虽然“在比较上是最圆满的”，毕竟是英国的产物，“虽其根本原理可以普遍应用，然而不能不有多少变化”，应当研究一下中国的“同业公会”以便在中国寻找欧洲中世纪基尔特的“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一些贡献正未可知。”可见张东荪的“研究”也还没有达到“圆满”的境地，中国究竟何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看来很渺茫了。张东荪在文章的开头表示自己相信“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经过这样一番学理的论证以后，到了文章的末尾，他却振振有辞地说：“我有一句要言：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

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更换言之，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这一段话，应当说是张东荪赤裸裸的招供。

这时，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梁启超也积极地参加了战斗。梁启超早在清未，就在“新民丛报”上反对过孙中山与朱执信等人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的主张，力争中国不必行、不能行、也不可行社会主义。当时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实际上是主观社会主义，是保证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梁启超和孙中山的论争在实质上不过是民主与改良之争，但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是一贯敌视社会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和蒋百里等人到欧洲游历了一趟，亲眼看到了欧洲各国经济破坏、阶级斗争尖锐化和社会主义力量日见壮大的趋势，感到“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有些非社会党的政治家，眼光锐敏，办些社会主义的立法，想要缓和形势，只是积重难返，补牢已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①于是他想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找一条妥善的出路。他在“改造”三卷六期上发表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他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挽救中国的资本主义、抵制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纲领。

梁启超也从歪曲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矛盾出发，强调“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变为劳动者（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之劳动者）”。中国人的第一问题是“有业无业”，而不是“有产无产”，一般人如果能有“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就象进了“天堂”一样，提心吊胆，“唯恐失坠”，想叫他们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闻之将掩耳而走”，何况这样的人在全国中不过占“千百分之一二”，如果只为他们打算而忘记了其他的大多数的人，当然是错误的。梁启超突出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借此抹煞了中国劳动人民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把“中国人失却劳动地位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外国资力之朘削压迫”。他攻击外国资本家“安坐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以择吾肉而吸吾血……而彼辈在本国因受劳动阶级反对所生之损失乃于我焉取偿”，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阶级将“非自国内纵分，而自国际上横分，压制阶级掠夺阶级之大本营在伦敦、纽约、巴黎、大阪诸地，而凡居于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压制被掠夺之阶级也。”为了最有效地抵制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人必须协力发展本国的生产，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严守一个“公例”，即“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不用说，这样的“社会主义”正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

梁启超表示他也想找一个好办法，一面可以发展生产，一面又可以防止资本阶级的发生，但这个办法实在找不出。要说将现在仅有的一些企业交给工人共管吧，又嫌数量太少，对于全国无补，反而打击生产力；要说由国家经营生产吧，现在的国家又不行；要说组织协社吧，则农业与手工业协社，保守的农民未必能接受，而消费协社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又没有发展的余地。想来想去，只有依靠“将本求利”的资本家。梁启超在这里重复了张东荪式的“资本主义害在将来而利在目前”的谬论，指出资本家的出现虽然要有掠夺行为，但至少有

① “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第十二——十四页。

二点可以欢迎。首先，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靠资本家掠夺后剩下来的“余沥”而免于死亡；其次，可以产生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才有所凭借。资本家的作用既然是这样两面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界限就划不清了，“资本阶级应专认为社会主义之敌耶，抑一方面应认为敌、一方面又应认为友耶？其界限遂纠纷不易明”。在梁启超看来，社会主义者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既不应当也不能够抗拒，但也不应旁观，因为资本主义本非社会之终局的目的，不过借以为过渡，“过渡之事物而一任其自然之运，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社会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一方面加以矫正，一方面加以疏导。所谓“矫正”就是要通过政府的立法和社会的监督，“奖诱警告资本家”，使他们觉悟到“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失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所谓“疏导”则是极力提倡各种“协社”，“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以移于协社之手，则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以成立矣”。至于对于劳动阶级，可以帮助他们组织工会，以准备将来的运动，但在今天，不宜劝他们“为主义之运动或为他种政治问题的运动”，以免厂主关厂，工人失业饿肚，削弱工人的力量和锐气。此外，三卷六期的“社会主义研究”专辑和以后的各期中还发表了其他作者的一些大同小异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点在于，除了一篇表示赞成资本主义、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以外，都表示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但反对在目前就实行，所持的理由也无非是生产不发达之类。不同点在于，有些人主张今天不妨宣传社会主义，不必怕因此引起“伪劳农革命”，或许正因为作了宣传，反而能防止“伪劳农革命”。这个差别不是主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概念非常模糊，各种流派混杂不清，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宣传不宣传，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文章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逻辑上说，都是混乱的，正如一个作者自己承认的：“我说实话，我连一本资本论还没有看完哩，中间许多名词还要请教专门家解说，不仅是够不上欢迎什么反对什么，就是连研究二字，还说不上。”因此，即使作为反面的教材来说，这些文章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不仅以自己的言论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而且他们后来的行动也充分证明他们是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极右派与投机分子，他们在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实质上也背叛了民主革命，因此，不久以后，他们就组成“国家社会党”，成为蒋介石匪帮的帮凶，终于遭到中国人民的彻底的唾弃。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

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

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父母早亡，依靠祖父过生活。一九〇五年考入永平府中学，一九〇七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在那里，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了当时所谓的新学，对社会生活也有了较多的了解，表现了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的，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五五二页）大钊同志在当时的沸腾的政治生活中，就看到了新的共和国的"隐忧"，表现了他对于祖国命运的深刻的关怀。他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文章中就以极其愤怒和沉痛的心情，揭露了北洋军阀盗窃国权、侵蚀共和的罪恶行为。他尖锐地指出，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一九一三年冬，大钊同志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留学日本期间，大钊同志那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他曾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神州学会"，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大钊同志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刻奋起反对，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在这些文件和论文中，大钊同志列举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国民奋起自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百折不挠之志气"，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励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坚持到最后胜利。大钊同志积极从事反对卖国贼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他严正地驳斥了美帝国主义代言人古德诺所谓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抨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凯的"毁新复古"之徒，并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所谓"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于这样的丑类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所有这些，突出地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本色。

一九一六年夏，大钊同志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钟报"（后改为"晨报"）编辑（时间很短），并且立即参加了由"新青年"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大钊同志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主观武断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落后的人生观；并热情地歌颂了新生力量，相信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势力。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中，大钊同志以不可遏止的热情，表现了他那种迫切要求"青春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

中华”而斗争。他希望中国青年必须怀抱“乘风破浪”的伟大气魄，打掉民族自卑感，“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去为人类造幸福。他相信中国的进步是无穷无尽的，“青春中国”的“再生”是必然的。大钊同志这种对未来的信心、希望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于激励中国青年的进取心，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

一九一六年秋，保皇党人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大钊同志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尊孔”，认为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符”，把孔教列入宪法，完全违背了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大钊同志还把反对尊孔的斗争，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他指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或者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和变化着的，道德的演化也必然要遵循这个规律。“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因此，凡是旧道德，在当时也许是进步的，但到了今天就没有可取的地方了。为了便利新道德的确立，对于一切陈腐的、僵死的旧道德，必须加以“人为之力”，促使其迅速崩溃，“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大钊同志坚定地相信，新生事物在诞生之前，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困苦，但终将冲破障碍，得到发展。他反对一切封建迷信和偶象崇拜，宣传真理的“权威”，指出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压迫，法律的禁止，始终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辉；真理是一定要胜利的。因此，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革命，就不怕“断头流血”。

一九一七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钊同志由于他所具有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信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很快就认清了这一革命的实质，并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就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同年十一月，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著名的论文，竭力赞扬十月革命，热烈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他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接着，他又发表了“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是二十世纪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钊同志这些文章，代表着中国先进分子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的良好开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新的觉醒。

一九一九年初，大钊同志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等文中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他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指出“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并吞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号召亚洲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清楚地看出了帝国主义必然要死亡的命运。他明确地指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殖民地附属国对帝国主义宗主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强大民族要求解放，乃是这个时代的不可抗拒的潮流。这种认识是五四爱国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前提之一。

“五四”前夕，大钊同志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在“现代青

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他要求青年看清世界发展的潮流，明确努力的方向，他说，现在世界上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

大钊同志是"五四"前后革命文化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一九一八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得到了在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从事革命活动的机会。同年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并与王光祈等人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为了配合"新青年"的反封建斗争，又与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国民"月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了"新潮"月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九一九年二月，"晨报"改组了第七版（副刊）以后，由大钊同志负责编辑。在他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晨报"副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个"专号"发表了大钊同志的"'五一节'杂感"，第一次扼要向中国人民说明了"五一节"的由来，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将得到蓬勃的发展。

在"五四"前，大钊同志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宣传鼓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大钊同志高举反帝的旗帜，向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坚决地揭露了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强盗分赃的本质，斥责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所谓和平纲领"十四条"的骗人的鬼把戏。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有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有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喊出了打倒"强盗世界"的口号。

五四爱国运动，特别是"六三"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大罢工，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开了广阔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大钊同志在"每周评论"和"新生活"上发表了许多短小精悍的杂文，向反动统治势力进行猛烈的攻击，号召中国人民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并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把马克思主义诸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的一条金线"。

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宣扬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的主张。大钊同志立即在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里给胡适的谬论以严厉的驳斥。他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社会制度得到根本的改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早的一场论战，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公开决裂。大钊同志在这次论战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阵地，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从一九一九年底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钊同志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并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社会历史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全体人民"生产衣食的方法"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是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最后原因。他批判了那些对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认为心的变动必然受到物质环境所支配，因此，只有求助于"物的势力"，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变动的原因。他认为政

治、法律、伦理等“精神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在这些“表面构造”之下，还有“经济的构造”作基础。因此，他指出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都是服务于封建经济基础，巩固封建专制的工具，他认为要想谋求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就必须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可以导致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的全部解决。而为了要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否则“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他还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号召一切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不要空谈理论，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从事建立工人团体的实际活动。

一九二〇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对团结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同年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在北京会见了大钊同志，经大钊同志的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同年五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也相继成立。大钊同志是北京小组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他和邓中夏等同志在京汉铁路长辛店开办了工人夜校，出版了向工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

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他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以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传介绍苏俄的实况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大钊同志强调指出，十月革命所喊出的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口号，唤醒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促使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对于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十月革命所喊出的口号，听起来“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中国人民要想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必须坚决倒向苏俄一边，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因此，全国人民必须严厉监视外交当局，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不许一味信承帝国主义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为了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大钊同志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他列举事实，说明了所谓“华盛顿会议”、“四国银行团”、“门户开放”等等，完全服务于帝国主义共同宰割和奴役中国的罪恶目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践踏摧凌”的结果，致使中国人民“沦降于弱败的地位”，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人民必须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联合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组成反帝的“民主联合阵线”。

在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大钊同志阐发了反对封建主义，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的绝对必要性。他明确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平民政治”将取代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并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配作中国革命的先锋。他指出：要想在中国实行真正的“平民政治”，就必须打倒一切特权阶级，必须打破虚伪的议会制度，为此也就必须首先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

同一时期，大钊同志批判了历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而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不是单纯钻进故纸堆里去考证历史资料，而必须通过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寻找出真确的历史证据，从而得出“进步的真理”。大钊同志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反对那种“完全拿贵族当中心”或者以个人传记为中心来写历史的方法。

为了粉碎反苏分子的造谣中伤和无耻诬蔑，使人们了解俄国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后俄国的现状，大钊同志发表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文章，介绍了苏俄革命的现状，推崇了列宁的伟大人格。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大钊同志赞扬了苏联人民的革命成就，转述了苏联人民同情中国革命、盼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的友情。当列宁逝世的哀音传到中国以后，大钊同志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来追悼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他指出列宁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解放者，列宁之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莫大损失。大钊同志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的关系和巴黎公社的历史等。尽管由于资料不足或者了解不够，有时对某些历史事实不免还有一些误解，但是大钊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贯串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胜利，国际资本主义必然死亡。

大钊同志还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分配诸原则，驳斥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诬蔑，指出“只有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钊同志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时他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京汉路和正太路工人组织的建立者。在一九二三年京汉路工人的大罢工中，大钊同志是积极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关于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的过程中，大钊同志是党的政策的积极的宣传者和执行者，对于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以湖南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运动。鲁、豫、陕等省的农民纷纷组织自卫武装，掀起了蓬蓬勃勃的红枪会运动。大钊同志立刻觉察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列举材料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和农民日益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认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和那种害怕农民武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大钊同志指出农民的自卫武装——红枪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一个伟大的势力”，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因此，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必须积极地去组织和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运动向着健康的、正确的道路发展。

一九二四年五月，大钊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大钊同志领导了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反对北洋军阀的善后会议的斗争，以及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关税自主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大钊同志领导了北京学生市民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示威运动。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次示威中，大钊同志头部受伤，但是他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指挥着群众的行动。

“三一八”惨案后，大钊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顾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通缉，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虽然有人考虑到他的安全，劝告他离开北京，但是他认为党的工作比个人的安全更为重要，婉言谢绝了这个劝告。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大钊同志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问，但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同时被捕的还有大钊同志的妻女，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不顾革命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悍然绞杀了大钊同志和同时被捕的其他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临刑前，大钊同志从容不迫地步上敌人的绞刑台，

作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共产主义的真理必然胜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最大轻蔑。

大钊同志光辉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和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相符合的。他的思想中的某些特点，正是上述历史过程某些特点的具体而深刻的反映。因此，当我们阅读大钊同志遗著时，就不难发现：当他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候，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往往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错综交织的，以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里面还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甚至当他已经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时候，我们也不难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大钊同志力求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并且积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作斗争，这就使得他在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改正。一切旧的思想影响并没有阻挡住大钊同志前进的道路。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他的某些观点在后人看来：“当然是未必精当的”；但是，“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是我们在阅读大钊同志遗著时应该保持的正确态度。

大钊同志壮烈牺牲离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了。象三十多年前那种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的乌烟瘴气、暗无天日的黑暗和混乱局面，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青春之中华”已经屹立在世界上。而大钊同志当年憧憬的“赤旗的世界”，也正在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所证实着。大钊同志那种“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诚实谦和的高尚品格，和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紧紧跟随时代前进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榜样。

大钊同志的道路是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正确的道路。

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李大钊选集》）

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

萧　三

组织"新民学会"——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也被迫"参战"，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把德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山东半岛转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去掠夺罢了。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还是继续有效。

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仍然不停止。每一派军阀都勾结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作自己的后台老板。各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些封建军阀势力来加紧剥削中国人民。

那时候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兵灾、匪灾（全省各县都发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灾（一九一五年全省三十四县受灾，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水灾不断），使得人民活不下去。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亲眼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的状况和人民的痛苦情形，从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进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社会的观点。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几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同学中间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蔡和森①、何叔衡②、陈昌③、张昆弟④等。这些人也大都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或壮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并且自己从事过劳动。他们都抱着远大的志向。毛

---

① 蔡和森同志，湖南湘乡人，生于一八九二年，家贫，做过牧童、商店学徒，学过手艺。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和毛泽东同志是很好的朋友。"五四"后组织中国青年们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己也和母、妹（即蔡畅同志）等同去。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遣送回国。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主编党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和森同志在党内不懈地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正确的国际的路线，反对错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力排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坚持正确的领导，終使"五卅"运动获得了伟大的成果。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夏季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广东党的工作，不到两个月为英帝国主义探悉、拘捕，引渡到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被刺刀戮得稀烂。

② 何叔衡同志，湖南宁乡人。是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内最初的党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一九二一年和毛泽东同志同道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之后，他与瞿秋白等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撤出中央红色区域时，被敌包围，这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不动了，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附近，坠岩殉难

③ 陈昌同志，号章甫，湖南浏阳人，生于一八九四年，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友。他长于演说；后加入共产党，作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曾去水口山，作工会主任。一九三〇年从上海去湘西贺龙部，经澧县，叛徒告密被逮捕，解往长沙，严刑无口供，英勇地牺牲了。

泽东同志的言论、行事，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很大的影响，他自然成了他们的表率。他们经常研究求学为人的道理，讨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等等问题。

在这时期，全国人民的觉悟渐渐提高了。对推动和促进全国青年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觉悟起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新青年”杂志，是在一九一五年开始发行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对封建的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主张“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古文，提倡白话，鼓吹科学和民主。这刊物到了湖南，由于我们尊敬的教员杨怀中先生的提示，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同志，首先注意这个刊物，并且热烈地和同学们谈论刊物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在这种形势和影响之下，毛泽东同志渐渐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要联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结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在长沙城的各个学校里发现一张不大的油印的启事，上面写着简练的几行文字，记得大约三百来个字。第一句是：“嘤鸣求友”（引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末尾签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泽东”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笔画）。

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城内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起初只有几个人，到后来就有了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一番酝酿，结果组织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里（他家在溁湾寺租住的“为痴寄庐”），集合了十三个人（有些人未能到会）。在吃午饭的前后，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会章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讨论时他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显、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就在这一天，新民学会成立了——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大家推毛主席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作副总干事。

学会的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赙，不狎妓……”等条文，含着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精神。这里重要的是，长沙城里先进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

学会的会员，最初绝大部分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有少数其它学校的。渐渐不仅其它学校的有志青年，并有个别进步的中小学教员加入了新民学会。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即思想进步的意思，但那时候还不流行这样说）。

学会经常开会，讨论学术或时事问题。会员们都精神奋发，努力上进。

新民学会对后来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学会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内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著的活动者。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的页子。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反革命杀害

④ 张昆弟同志，湖南益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生于一八九四年，幼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因无力升学，在家耕田。一九一三年考入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志等志同道合，治学、品行在班上总是最好的。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与蔡和森同志等同被驱逐回国，即由北京中共组织派为铁路工作的特派员，曾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仍在北方做工人工作。一九二八年成立红军第五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与贺龙同志一起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于鄂西洪湖地区英勇牺牲。

的、牺牲的郭亮①、向警予②、陈昌、罗学瓒③、张昆弟、蔡和森，夏曦④、何叔衡等同志，以及还有许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了的会员——他们的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伟大的革命事迹，永垂不朽！

假如说，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五四"时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那么新民学会就是一个核心的组织。它的会员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运动中都是有力的支柱。而毛泽东同志自然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到后来一部分最先进的会员，又切实地作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学会就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了。因此新民学会是湖南——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起过秘密党小组的作用。而这些大都是毛主席的影响，他的进步、正确的思想，大无畏的作风，形成了一种革命的风气和传统所致。

到北京去——接触马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九一八年六月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在那时候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⑤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法国作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湖南（以及全中国）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就都因无力升学而觉得苦闷，听到了勤工俭学的办法，认为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好机会。"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主席与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备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所谓四等仓（实即货仓）从上海放

---

① 郭亮同志，号靖茄，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身材矮小，精明能干，是湖南工人群众的优秀领袖，曾任湖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被派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长沙英勇地牺牲了。

② 向警予同志，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最能干的妇女领袖，能说、能写、能作。曾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委的宣传部工作。一九二八年春，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汉口法租界捕房所逮捕，同年五月一日晨四时在武汉慷慨就义，这一事件曾使得全国震动。

③ 罗学瓒同志，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同志同班。五四运动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湖南省委工作。一九二八年在浙江省委工作时被蒋匪逮捕，牺牲了。

④ 夏曦同志，湖南益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湖南作学生运动，作由共产党所组织成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员。曾任中共湘区（省委）委员，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时牺牲。

⑤ 蔡元培（一八六八年——一九四〇年），浙江绍兴人，清末翰林，曾留学德国。中国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家。一九〇四年冬，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于上海。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一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学术思想自由，聘请李大钊等进步人士讲学。对于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很有关系。一九二七年一度支持蒋介石反共，但后来又因为反对蒋介石对革命的屠杀政策，于一九三〇年与宋庆龄、鲁迅诸先生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一贯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

洋去法国。

这个运动，当时在另种意义上，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又一结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

毛泽东同志帮助青年们实现这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自己不出国。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作，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动乱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九月间毛主席到了北京，过着穷苦的公寓生活。杨昌济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作教授，毛泽东同志和第一师范的几个旧同学，仍经常去请教。杨先生介绍毛主席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小职员，登记来馆看书报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务，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计较地位与金钱，能够糊口就得了；在图书馆里能得到自己读书的机会，他很高兴。

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优秀的进步的学者，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介绍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领导者。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搜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他自己除讲学外，就住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学们常到图书馆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告诉他们阅读的方法。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主席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年十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上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毛主席在北京一面在图书馆工作，一面继续自修。他还是又学又问，除读书外，常去拜访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北京大学那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的作用，大学里进步的学术团体也多。毛主席在工作余暇时常到北大去旁听，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在北京。毛主席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见闻，这时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毛主席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回长沙——开展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放洋去法国的同学、青年之后，毛主席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作斗争。

三月里毛主席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除继续组织、团结青年外，并和一般对张敬尧统治表示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广泛联系。

新民学会的组织现在发展到了长沙以及湖南各地许多学校，会员有学生，有个别中小学

教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核心力量。

为了维持生活，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每周教几个钟头的历史课，但月薪不到十元。

这时候，一个狂风暴雨似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了。

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又是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宣传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

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运动，但这个民主主义“从 1914 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它在这时候进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②。这个民主主义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在和会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战时强迫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却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战时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夺去了，——巴黎和平条约有条文规定，都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人民愤激的了不得。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其亲日派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不反抗，实际是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行事。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③。“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④。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的两万五千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五月七日那天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个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我那天也参加了，那时候正在北京法文预备班学法文）。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卖国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三十二个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五月六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这一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都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全国人民都奔向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组织，要求行动。

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张敬尧压迫无效。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一个字数不多、热情奋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传单，第一句是：“同胞们，起来！”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积极活动。六月三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了。当天发出争回青岛的宣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60 页。

② 同上书，第 545 页。

③ 同上书，第 546 页。

④ 同上书，第 545 页。

言。长沙学生于这一天全体罢课。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响应。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彭璜①、柳直荀②等都是毛主席的朋友，同志。毛主席自己实际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

学联这时主要的活动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

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办法和经验，七月中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它的基层组织为救国十人团，在一个多月之内这种十人团在长沙就达到四百多个）。

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动，作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

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

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

全湖南省、全中国在这时候都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许多活动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了，现在更敏锐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

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度，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③。

这一段话，精辟正确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它的意义、价值和作用。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月三日以后，更加高涨了，更加扩大，深入了。

根据记忆和许多史料的记载：六月三日北京的学生们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

六月五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为北京学生声援。

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也起来响应。

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

六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要求惩办卖国贼。

北京政府不得已于六月九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六

① 彭璜，号殷柏，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湖南的学生领袖，一九二二年死。

② 柳直荀同志，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一九三三年，在湖北洪湖革命战争中牺牲了。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693页。

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果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因此五四运动——正如毛主席说的——“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①。

作为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起了推动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即“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②的运动，普及于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各抒所见。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除上述两篇外，一九一九年五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狂人日记”，一九一九年四月发表“孔乙己”，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郭沫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发表“女神”新诗集。那时刊物中较有份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主席觉得，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主席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我还记得，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主席曾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时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也在“新文艺”栏里写过几则杂感）。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

“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了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七月二十一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二十八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3页。

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主席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主席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

“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长沙发生一件被父母强迫嫁一有钱人的新娘在花轿以剃刀割颈自杀的事，毛泽东同志在报上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此事，引起各报讨论，成为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在他初期革命活动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

领导“驱张运动”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心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行动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十一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十二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①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个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个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迅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主席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时，一面团结湖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一九二〇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五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六月十一日从长沙仓卒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一个大胜利。反军阀和民主运动的胜利。它壮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时给全国人民以大的兴奋。

毛主席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为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

苏俄政府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俄政府“……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它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

---

① 冯玉祥这时当旅长，属于直系。一九二六年他在绥远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他也参与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蒋介石集团间一直存在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曾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①。

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格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毛主席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七十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当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和承认真理的毛主席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主席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主席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长沙为基地。

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密切地联系。这个学会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

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又特别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开展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问题。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在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主席回到了长沙。

宣传！组织！斗争！

在这时期毛主席在长沙作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主席于是受聘作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兼作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师范毕业就教师范）被聘请作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的级任兼国文教员。

从一九二〇年夏天起毛主席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

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

接着就作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

① 见“苏俄致中国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

蹦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闿、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决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

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主席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①

毛主席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同时毛主席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密切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十月十日“国庆节”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了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

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闿，取得了湖南政权，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

毛主席还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下层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这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②，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主席刚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的一项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文化书社”，在全省大量推销各种新的书报。他吸引一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这个书社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书社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

---

① 见“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

② “韩非子”里面的话。

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去了（其中有任弼时①、萧劲光等同志）。

十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加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活动，成为了共产主义者。

毛主席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设共产党作了各种准备。整个五四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劳，——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②。

这里需要补充叙述的是，毛主席在作那些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作了一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现在还有人记得，他曾经从毛主席那里领到许多小册子，拿到街上去卖，价钱非常便宜。那些小册子的名称有：“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册子的文字很通俗，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谈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团结起来革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阶段上对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其一定的——桥梁与先锋的——作用。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学生运动、文化界知识界的运动。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于是用最大的精力来作工人运动。

找到了更好和工人接近的语言

现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懂得：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基本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毛主席除组织、领导一般的、社会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运动。

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在当初是颇不容易的。在开始的时候，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怀着满腔热忱，并甘心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接近群众，渐渐也当群众的先生。

毛主席下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去。农家出身的他，素来就具有一项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领——他能找到和工人群众接近的大众的语言。他的诚恳的心，老实朴素的态度，简单、透彻的语言，能够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难的事物，最深奥的道理，毛主席都能

---

① 任弼时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自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党的历次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三年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红军第六军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政后，任二、六两军团组成的第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693页。

给工人们解释得清清楚楚，使他们理解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是最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引人入胜，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努力学习的。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

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来走去，总希望遇见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

经过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

回来后，毛主席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毛主席就热心认真地办过工人夜校，这时更加扩大了他和工人的联系）。

突破了一点之后，毛主席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丛中去。

毛主席来到铜元局——湖南造币厂，找工人谈他们的生活、工资……工人觉得客人很关心他们。

毛主席走进成衣店，和裁缝们慢慢谈他们的工作、衣料、收入……

人们坐人力车来到家里，毛主席请车夫进来喝茶，和他谈话。后来派罗学瓒同志专作人力车夫的工作，常和车夫漫谈，长谈。为人力车夫办夜校时，毛主席曾亲自给他们教课。

湖南第一纺织厂成立了，开工了。无政府党人在纱厂里颇有影响。毛主席过河去，找到了纱厂工人，谈了许多。

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毛主席，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

一九二一年冬天，毛泽东同志曾乘着长株、株萍铁路的火车，去到安源，深入矿井。由长沙几个路矿工人的介绍，认识了许多矿工。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长沙后，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当初也是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后来刘少奇同志也到了安源，这里的工人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壮大了，当时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称。）

交几个工人作朋友，通过他们，可以认识和团结千百个工人——这是毛主席的主意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和工人们接近了，给他们办夜校，办补习班、识字班，教育他们，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讲工人们应该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道理。

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毛主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通过他们，通过行动、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

宣传——组织——行动，联系起来，长沙——湖南的工人运动蓬蓬蓬蓬地发展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毛主席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结了。

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毛主席等就这样开始奠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此稿是本社整理的萧三同志谈话记录，付印时，他因病未能细校，如有错误，由本社负责。请勿转载。）

毛 泽 东 自 传

一 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问题表，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要求他答复，我自己觉得很是抱歉，因为我提出的都是很琐屑的问题，其欠缺礼貌，正如日本的移民官吏。但是他却毫不在意。他对于我所提出的对于各方面五六类问题费了十几个晚上答复我，但是关于他自己和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作用一点提到得很少。很明显地，他认为个人是无关重要的。所以我想要他给我一些关于他私生活的一件事，是绝望的了——正像我所遇见的其他的红党一样，他只喜欢谈委员会、团体、军队、议决案、战斗、战术、办法等等，而不谈他个人的经验。

有一个时期，我以为他之所以不谈主观或个人的事情，是为了礼貌客气，或是为了对我不信任，或者是为了他们的头上悬有赏格而恐惧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了事情并不如此。事实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实在都认为这些私人的琐事是并不重要的。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共产党员大都能够把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娓娓地说出来，但只要他和红军一发生关系，他就把他自己置之脑后了。如果你不固执地问他，那末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你就不会听见的了。你所能够听到的只是一堆关于红军的，苏维埃的，党的故事。他们能够一一列举每次战斗的日期和经过，以及千百个他们曾经来往过，造成的历史，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红军曾经到过那里。在这红军后面，有一种他们正在斗争着的观念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我对于这个发见感觉到颇为有趣，可是我的报告却因此而更加困难了。

有一天晚上，当毛氏满意地把一切别的问题答复了我以后，翻到我这张以“个人历史”为标题的问题表。“你结婚几次了？”他一见这一个问题，不禁笑了。——后来外面竟有谣言，说我问毛氏有几个妻子。他对于供给自传是否必要的问题总是怀疑着，但我和他抗辩着，说从某种原因看来，这是比别种事情的报道更为重要。我说：“当人们有几位读了你所说的话，他们当然更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一种人。而且你对于外边流行着关于你的谣言，也该加以纠正。”

于是我报告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说他法文讲得很流利，又有一些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而已，又有人说他肺病已达第三期的了，另外又有人竟说他是一个发狂的疯人。他很和蔼地惊奇着，人们竟费了这许多的时间来幻想他，于是同意了我纠正这些风传的主张。把我所预备好的那张问题表看了一下说：

“比方说，我并不依照你的这些问题回答，只把关于我的生活的一个大略告诉你，你以为怎样？我想这样更容易明白我的为人，而同时也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正需要你这样！”

我们就开始谈话，费了几个晚上，谈话的时候，我们真像秘密阴谋家一样，躲在一个洞里，伏在一只用红布罩着的桌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我奋笔疾书，从晚上开始，直到要倒下去睡觉时为止。吴亮平坐在我旁边，时时打断毛氏的柔和的南腔——“鸡”不是像很

好的北方的“chi”那样沉重，而变成了很浪漫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变成“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氏凭他的记忆来述说一切，我则照他所说的用英文记下来。以后又把这个笔记重译成中文请他改正。下面就是这个谈话，我并不想写成很好的文艺作品，只是都曾经过耐心的吴先生修正过，所以自信是不会失真的了。

我在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我父亲的名字是毛仁生，我母亲未出嫁时的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回到了就是我生下来的乡村里，做小买卖和一些别的事业，克勤克俭，稍稍积集了一笔小小的款子，他便买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那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从这几亩田上我们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以每人七担计，这样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积余。用这一点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一笔小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田，这样一来我家就成了“富农”了。那时我家每年可以有八十四担谷的收入。

当我只有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田地的时候，家中的五个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一个弟弟和我。我们增加了七亩田地的时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个小弟弟。可是我们依旧每年有四十九担谷的积余，这样我的父亲慢慢地得发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米的卖买。用这种方法他又赚了一些钱。当他成了富农之后，他继续这樁卖买，而且作为主要事业，用了大部分的时间。至于田地的管理则雇了一个长工，此外再叫孩子和妻子都到地上劳动。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田地上的工作。我父亲并不开商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谷米收买下来，转售给城里的商人，如此他赚到了钱。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时候，他便添雇一个短工，所以在这个时候，吃饭的人便增加到七个。我们吃的很省，但终是吃的很饱。

当我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校里读书。在那里我一直读到十三岁。早上和晚间我在田间工作。白天我读孔子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顽固派，粗暴而严厉，常常痛打学生。为了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我不敢回家，因为怕挨打。我莫名其妙地走向县城去，以为县里是在某处的一个山谷里。瞎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兜了几个圈子，走了这许多时候，还没有离开我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以后，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形有点改善了。我父亲的暴厉态度比从前稍微好一点，而教师也温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动得到如此的结果，使我深受了影响。这是一个胜利的“罢工”啊！

等我学会了几个字之后，我父亲开始叫我记家里的帐。并且叫我学习打算盘。因为我父亲固执着要我学这些事，所以在晚上我就开始学习这些东西了。他是一个很严厉的教师，对于我的懒惰，常常表示厌恨。假如没有帐记的时候，他仍叫我到田间去工作。他为了性情暴戾，所以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们。关于钱这样的东西，他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不好的东西。每月十五日，他对于他的工人们，特别开恩而给他们鸡蛋和饭吃，可是永远没有肉。而对于我则既无肉又无蛋。

我母亲是个和善的女人，宽厚而富于情感，永远愿意把所有分给别人。在饥荒的时候，她可怜那些穷人们，常常送米给他们。但当我父亲在面前的时候她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不赞

成慈善的，关于这一件事，在我家里常常有口角发生。

我们家里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我，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有时候甚至工人们所组成的，是在野的反对党。可是在反对派的“联合战线”上，意见不能一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反对任何明显的情感的表现，也不赞成对统治力量的公开反叛。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办法。

但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方法，便是引用经书或是用父亲自己的话，作为我自己有力的辩护。我父亲惯用不孝和懒惰两种罪名来责备我。我却引用经书上的话来说服他，说父慈则子孝。说我懒惰，则我用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的话来反驳。我说你年纪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应该多做工作。而且我宣言：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的力气要比他大得多。

这个老年人——我的父亲——继续“积聚财产”，后来大家竟称他为这个小乡村里的大财主。他不再用购买的方式来增多土地；却接受了许多别人田地的抵押。他的资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对于他的不满继长增高。在我们家庭里，辩证法的斗争是始终不断地发展着。①我特别记起一件事。当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正当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两人发生了争论。我父亲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说我贪吃懒做。这事触怒我了。我责骂他，而且要脱离家庭。我母亲跑着追我，竭力劝我回去。我父亲也劝我，可是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了一个池子旁边，用自杀来要挟，说若是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投水。在这种僵局之下，为了停止内战起见双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赔罪，作为求饶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允许不打我，则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于是战争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停止了。从此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反叛的方法来保护我的权力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宽和些了；反之，当我保持驯善服从的时候，他只是骂我打我得更甚。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用严厉态度作为教子的政策失败了。我学会了去仇恨他，我们反对派真正建立了一个联合阵线去对付他。因为这样总是对我有利。如此之后，我的工作也勤快些，我很仔细地记帐，他也没有批评责备我的口实了。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记帐一事是足以胜任的。我母亲是目不识丁的。他们两人都是从农家出身，所以我成了家庭里的“学者”。我读会了经书，可是不喜欢经书。我最喜欢读那些中国的传奇小说，而对于那些关于叛变的故事则尤其喜欢。我读过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志和西游记。那时候我还年幼，是在我的老教师谨慎提防之下偷读的。我的老教师恨这些非法的书籍，认为都是坏书。我常常要把这些书带到学校里去读，当老师走过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掩住。我的许多同学也都这样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我们几乎都能背诵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讨论。像这种故事，我们所知道的比乡村里的老人还要多。他们也爱听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们互相交换讲述。我相信这些书对于我后来影响很大，因为这些都是在记忆力强盛的年纪里读的。

最后我离开了小学，其时我是十三岁。我开始整天在田间帮助雇工工作，白天做一个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间就替我父亲记帐。可是我还能够继续读书，除了经书之外，我一有机会就吞咽一切我所能够找到的东西。这事使我父亲很懊恼，他希望我能熟读经史，特别是在他有一件诉讼失败了之后。事实是如此的，他的对造在法庭上引用一句很适合的经典，结

---

① 毛氏追述到这些事，老爱引用这些幽默的政治名字，来当做说明，而一边大声笑着。

果他败诉。我常常在半夜里，把我房子里的窗户遮没，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就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这书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以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是因为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介绍这些东西到中国来。而我父亲却以为看这些书籍，是徒然费时失业。他想我学一些经书一样的实用东西，可以使他在诉讼中得到胜利。

我继续阅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些小说里面，没有关于耕种土地的农民们的事迹。所叙述到的人物，不外是些战士，官吏，或者文人；永远看不见一个农民人物。对于这一件事，整整有两年，我得不到解答，后来我把小说的内容加以分析。我发现了：小说里面的人物们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民的统治者，他们都不必从事操作，因为他们土地的所有人，很明显地是有着农民们在代他们工作的。

我的父亲毛仁生，早年中年，都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把佛教的教训给予她的孩子，而我们也曾对于父亲的不相信神表示焦虑过。当我还只九岁的时候，我曾经和母亲郑重其事地把我父亲不相信神的问题加以讨论。那时和那时以后，我们用了许多方法想劝醒他，可是结果失败。他只骂我们，我们受了他攻击的威胁，只好让步，另想别法。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们有所往来。

可是，我所阅读的书籍，开始慢慢地在我的思想上发生影响，我自己也慢慢地对神的信仰开始怀疑了。于是我母亲为我忧虑，责备我对于信仰仪式的不虔诚。可是我父亲毫无表示。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帐，在路上，他遇见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看见他，忽然慌张地逃跑了。可是我的父亲更觉得惊恐了，事后他对于这次神秘的脱险，总是不能忘怀。从此以后，他开始虔信佛教了，并且常常烧香点烛。但是对于我的与日俱增的无神论，老头儿仍然置之不问。只是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自己向神祈祷。

《盛世危言》使我发生了恢复学业的愿望。对于在田地上的工作渐渐感觉到厌倦。我父亲当然反对我。我们常常为了这件事而争论，最后我脱离了家庭。我走到一个失了业的学法律的学生的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又从一位中国老学者读了些经史古籍，也读了许多时务文章和一些新书。

在这个时候，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事情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校外面，我们学生看见了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了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面的一件大事变的始末。

那年有一次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流为饿殍。灾民们派了一个代表到抚台衙门里请求救济。但抚台粗暴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多得很呢。我常常吃得很饱的。"当人民听到了抚台这样的答复，他们怒吼了。他们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并且发动了一个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满洲衙门，斫断了作为官厅的标志的旗杆，逐走了抚台。事后，户部派了一位姓张的大员，骑马出来，晓谕人民，说政府正在想法帮助他们。很明显的，这个姓张的约言，的确是很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责备他和"乱党"勾结。受到斥职的处罚，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事变的领袖，许多的人被枭了首，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将来"谋反者"的一种警告。

对于这件事变我们在学校里有好几天的讨论，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们，对"谋反者"表示同情，但他们都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明白这是对于他们切身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他们之感觉兴趣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是一件惊人的事变。我却觉得"谋

反者"们都是些像我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民，所以我对于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痛恨。

不久之后，在韶山的哥老会①和一个地主之间发生了一种冲突。这个地主到法院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很有势力，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败诉了。可是他们不但不屈服，反而反叛了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建筑了一个强固的根据地。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并且散布谣言，说当哥老会举起造反之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了一个小孩去祭旗。反叛者们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庞铁匠的。最后他们被压制下来了，庞铁匠被逼逃跑。后来他终于被逮捕，杀了头；可是在我们学生看来，他确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们都同情这一次的叛变。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在我们乡里粮食异常缺乏。穷人们向富农要求帮助，他们开始了一种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虽然粮食缺乏，可是他仍然从我们乡里把大批米谷运到城里去。他运出的一批米被穷苦的乡人扣留了，于是他愤不可当。我对他不表同情。可是同时我对于乡人们的方法也不满意。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本地的小学堂里出现了一个"维新派"教员，他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他是"维新派"，因为他反对佛教，要想驱除神和上帝。他劝人民把庙产兴学。他是一个遭受指谪的人物。我称赞他，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年青的心灵上，留着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我的心灵早已是反叛的了。在这个时期中，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在我读过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就是那么一句："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它叙述日本如何占领高丽、台湾、和中国在安南、缅甸等地方主权的丧失。在我读到了这些话的时候，我对于祖国前途，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

我父亲已经决定把我送到湘潭一家米店里去当学徒，这家米店他很熟识。在起初我也不反对，觉得这或者会是很有兴味的事。可是后来我听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新学校，我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决意要到那里去。这学校是在湘乡县我外婆家地方。我的一个表弟是那里的学生，他告诉我这个新学校和"新教育"的改革情形。那里不注重经书，而注重西方的"新学"。教的方法，也是很"维新的"。

我和我的表弟到那里去报了名。我说我是一个湘乡人，因为我误以为这个学校是专为湘乡人开的。到后来当我发现了这学校是不限籍贯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贯。在这个学校里，我缴了一千四百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及书籍用品费。最后我父亲对于我进这个学校的事同意了，因为许多朋友，竭力主张这个学校可以增加我的赚钱能力。这是第一次我走到离开家里五十里路远的地方。那时我是十六岁。

在这个学校里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一些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个可注目的事情是其中有一位教员是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可是很容易看出来辫子是假的。人们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看见过有这许多儿童们在一块。他们大多是地主们的弟子，穿着很值钱的衣服；农民们能够供给子弟们到这样的一个学校来是很少的。我穿戴比别人寒酸，我只有一身较为体面的衣服。学生们不穿大褂，只有教员们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许

---

① 是贺龙同志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

多阔学生都看我不起，因为我平常穿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可是我也有阔学生做朋友，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这两个中有一个是现在的作家，住在苏联。

我不被人喜欢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校里湘乡人是很关重要的，而属于湘乡的某乡则更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乡，而上下两乡，为了地域关系，总是不断地斗争。这一乡的人不肯与另一乡的人并存。我在这一个斗争里的局面里严守中立，因为我并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方面的人都瞧我不起。我觉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这个学校里我进步很快。教员们都喜欢我，特别是那些教古书的教员们，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却无心于经书。我正在读着我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报，叙述着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一本叫做《新民业报》，是梁启超主编的。我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了。我崇拜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我的表兄非常感激——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反革命者，土豪劣绅阶级的一份子，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营垒。

许多学生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为了他的那个假辫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讲述关于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几句美丽的句子：

小雀唱歌，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是可爱的，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彷彷是一张新的图画。①

在那个时候我只感觉到日本的美，在这个歌里感觉到她战胜帝俄的一些骄傲和威力。我没有想到也会有一个野蛮的日本——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样。

这便是我在“假洋鬼子”那里所学到的一切。

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人都死了——虽然新皇帝宣统(现在的溥仪)已经统治了两年。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君主制度的人，实在，我还认为皇帝以及官吏们都是很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只要康有为维新的帮助。我那时埋头读古史，对于尧、舜、秦皇、汉武等的政绩大为向往。那时候我也读了一些外国史地。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论文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一名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在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华盛顿获得了胜利，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本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彼得大帝、卫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二　长沙时代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想要到长沙去。这是一个大城，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二十里之遥。听说这个城是很大的，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人，许多的学校，以及抚台衙门。总之它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进一个专为湘乡人设立的中学。在那年冬天，我请求我的一个

① 这首诗歌，显然是日俄战争终了之后，春天开庆贺胜利宴会中所唱的。

高等小学里的教员介绍我到那里去，他允许了。我步行到长沙，非常地兴奋，又恐怕也许会不准我进城，根本不敢希望我真会变成这个大的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居然毫无困难地进去了。但政治急变，我在那里只住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难。这件事情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发动的。我被这故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富于刺激性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一个著名的国民党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得如此，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我的政治意见，思想是很混杂的。我还没有放弃我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崇仰。并且也不十分明瞭他们中间的不同。所以我的论文里，我主张应该把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召回来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反对外国投资运动因了川汉路的建筑而开始发动了。同时人民对于立宪的要求普遍地传播着。皇帝对于这个回答，只是下旨设立一个咨政院。在我的学堂里的学生愈来愈趋激烈了。他们用反对猪尾巴（辫发）的手段来表示他们排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把我们的猪尾巴先行剪去，但别的一些起先答应也要剪去的人，到后来都迟疑地反悔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而且后来用强迫手段把他们的辫子剪去，做我们的剪子的牺牲者有十余人之多。这样子，在一个短短的时期中，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一跃而为主张取消一切辫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变人的观点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个在法律学堂的朋友发动了对于猪尾巴故事的大辩论，双方都提出相反而对立的论据。这个法律学生以经书为辩论的根据，坚持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我自己和其他反对蓄辫者，站在排满的政治立场，提出了一种反对的理论，驳得他们体无完肤。

在黎元洪领导下的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变换得很剧烈。有一天一个革命党，得到了校长的允许，到中学堂里来作了一次惊人的演讲。在大会上七八个学生站了起来，对满清加以猛烈的攻击，拥护他的主张。并且号召建立民主国家。人们都全神灌注地谛听着。当那个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的一个官吏——在被激动起来的学生前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差不多连呼吸的声音都停止了。

听了这一次演说之后四五天，我决定要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和几个朋友从同学那里集了一些钱，决定到汉口去。听说汉口的街道是很潮湿的，非穿雨鞋不能行走，我就到一个在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皮鞋，这军队驻扎在城外。我被驻防的军队拦阻住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紧张。兵士们已经发给了子弹，他们正向这边冲过来。

叛军已经沿着粤汉铁道线前进，战争爆发了。在长沙城外发生了一次大战。同时城里面起了一个叛变，城门被中国工人攻占。我得了其中一个工人的援助，得以进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个高地去观战。直等到我看见了“汉旗”在衙门上飘扬——所谓汉旗也者，是一块白布中间有一个“汉”字——我才回到校里，其时它已经在军队守卫之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府组织了起来，哥老会里两个有名的会员被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是设在以前省咨议局的房屋里，议长是谭延闿。原来的省咨议局被取消了。在革命者所搜查出来的满清文件里，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写成的。徐氏现在已经六十岁了，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那时候他把他的手指斩断，以表示他的诚恳的决心。他的呈文的开头是下列两句话：“请求召开国会，予向诸君（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断

指告别。”

新都督和副都督其存在的时期很短。他们俩并非坏人，的确颇有些革命意志的。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于是地主和商人对他俩表示不满。没有几天之后，当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两个人的尸身躺在街上。谭延闿对他们发动了一个有组织的叛变。原来谭氏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啊。

这时候有许多学生投军。一队学生军已经组织成功。在这些学生军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改变方针参加正式军队，真实地帮助革命。那时候清帝还没有退位，所以这个战斗时期经过得相当长久。

我在军队里的饷银是每月七元——可是这已经超过我现在在红军里所得的饷银了。这七元钱我按月用去二元伙食。我还要买水。因为兵士必须要到城外去挑水进来，但是我是学生出身，不愿意去挑，只好向挑水夫买水用。我每把余下来的钱，都费在报纸上，我对于读报一件事简直有些儿疯狂。鼓吹革命的报纸，有《湘江日报》。里面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在这栏中，第一次学习了这一名词。我也和别的学生们和兵士们讨论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只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我读了一些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的小册子，我很热心地写信给好几个同级的同学，讨论这一问题，可是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写回信给我并且表示同意。

在我那一队里，我最喜欢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其余的都是鄙俗不堪，甚至于有一个是流氓。我曾经劝说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营长以及士兵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我能写，读过不少书，他们对于我的“大学问”都表示尊敬。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到这时还未定局。清朝还未完全放弃政权。而在国民党中，却发生了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人们都说湖南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的战争。有许多的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反对袁世凯，湖南军队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觉得革命已经过去了，就决定退出军队，回到书本子上去。我只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正有许多学校在开办起来，而以报纸为媒介，吸引新的学生。我对于学校的好坏没有一定标准来评判，对于进什么学校也毫无主见。可是当我投考以前，我看见了一个“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不需要什么学费，供给膳宿，并且还稍有津贴。这是很引人注意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广告。它说了许多关于制造肥皂如何与社会有利的话，说它会如何地富国利民。于是我便改了我的投考警察学校的方针，而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那里也交了一块钱的报名费。

在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一个法政学生，他催促我进他的学校。这个法政学校，我也读到了它的一则诱人的广告。这广告预约着许多美妙的事情。它允许在三年中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知识的学程，并保证三年毕业之后，学生会立即变成京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这个学校，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预约的一切复述一遍，请求他们寄学费给我。我把将来做法官和京官的前途，对家里描画成一幅光明的图画。我就在法政学校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一方面等候着我父亲的回信。

命运又由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形式来拦阻我了。另一位朋友向我建议，说国家现在正是在经济战争之中，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专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也在

这个商业中学里付了一元的报名费。结果我投考而且被录取了。可是同时我还继续看广告，有一天我读了一则广告，述说一个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好处。这是由政府主办的。课程很丰富，听说教员们也都很能干，我决定了最好是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以后写信给我父亲告诉了我的决定。他很高兴。我父亲是素来赞美经商的。我进入了这个学校，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了我和这个新学校之间有困难存在，因为那里有许多功课的讲授是用英文的。我和许多别的学生不同，英文程度甚低；简直只知道字母。觉得这种局面是很讨厌，便在一个月的末尾退了学。我又继续着翻阅广告。

我第二次的学业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用一块钱报名，经过了入学考试，发榜时以第一名录取。这个学校很大，学生很多，毕业生也是很多的。那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很喜欢和这位教员接近。这一位教员借一部《御批通鉴》给我，这部书里面有乾隆皇帝的圣旨和御批。

正在这个时候，长沙的官办火药厂爆炸，起了很大的火，可是我们学生都觉得这件事新鲜有趣。好几吨的子弹和炸弹都爆发了，火药燃烧起来变成一片很强烈的火焰，比起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一月以后，谭延闿被袁世凯所驱逐。袁氏那时正操纵着民国的政治机构。汤芗铭代替了谭延闿，而他开始替袁氏筹备登基。

我对于第一中学不大喜欢。它的课程限制得很严，规则也是一无足取。在读了《御批通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我自己读书自己研究，也许对我更为有益。六个月以后我便离开了学校，自己排了一个自我教育课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去读书。我对于这件事很规矩很认真。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所耗去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当图书馆开门的时候我就进去，在正午的时候，我仅仅休息片刻，去买两个糕饼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图书馆里直到它关门才出来。

在这个自我教育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了世界地图，并且很有兴趣地加以研究。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莎的《群学肄言》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法意》。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我把他们胡乱混在一起了。

这时我冒充了湘乡县人住在同乡会馆里。有许多兵也住在那里，都是些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们毫无事事，而且都是很穷。在会馆里学生和兵士常常吵架。有一天晚上，这种怨仇爆发，继之用武。兵士攻击并且想打杀学生们。我躲避到厕所里，直等战争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我的家里不肯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因为我不能够再在会馆里住下去了，便开始找寻新的住所。同时我正在认真地思索我的前程，认为我最适宜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一则很动人的布告，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兴趣勃勃地研究它的好处；不需要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等等。我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去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试验的论文。我把我的计划，写信告诉我的家庭，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允许。我替我两位朋友写了论文，自己也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都录取了——所以，实际上我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以为我为朋友捉刀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的，只是一件友谊事情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做了五年的学生，对于后来一切的广告的引诱，不再注意。最后我确实得

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遭遇了不少的重要事情，而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也开始形成了。在这里我把在社会行动中的最后的经验学会了。

在这个新学校里有许多的规矩，而我对于这些规矩赞成很少。我反对自然科学定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我特别不感兴趣，我不愿意读，所以在这些课程里，我得到的分数都很低。我所最恨的是静物写生的必修课程，以为这是极端愚蠢的事。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画的最简便的东西，很快地画完了就出教室。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说是代表李白诗"半壁见海日"一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说这就是蛋，自己认为满足了。图画这门课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课程都很好，所以一平均我的别种低级分数都给扯过了。

这里的一个中文教员，学生们替他起个绰号叫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瞧不起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经是我崇拜的人。我被迫只好改变我的文章作风。我就阅读韩愈的文章，学习了旧的古文辞藻。所以，敬谢袁大胡子，假使是需要的话，我今天还能够写出一篇可观的古文。

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是英国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的是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决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把一种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灌输给他的学生们。受了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论文，题名叫做"心智的能力"。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的论文很受杨昌济老师的称赞。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批评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读它的时候兴趣极为浓厚。在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的纲领。有一天我看见《民报》上登载着两个中国学生徒步旅行中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的打剑炉的事。这件事非常地鼓动着我。我想要模仿他们，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我应当先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于是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遍了五县，和我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这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们供给我们吃食，供给我们睡觉地方；我们足迹所至都受很好的招待与欢迎。这个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后来成为在易培基手下的一位国民党官吏。易氏那时就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高级官吏，他替萧瑜谋得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氏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宝贵的宝物，在一九三四年捞款潜逃了。现在他在大连藏身。

为了感觉到要向外发展非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伴侣不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那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能耐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条件。后来我收到了三封半响应的信。一封是罗章龙的回信，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封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寄来的。那所谓半封回信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番话之后，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那时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围聚集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后来就是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国事和命运，有着广大的势力。它是一小群态度极为认真的人，绝对不讨论身边琐事的。他们所说所做，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谈情说爱，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逼切了，要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我对于女人不感觉

兴趣。在我十四岁时，我父母亲替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他同居过——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承认她是我的妻子，而在这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念她。关于女人的“媚人”的讨论，在那时候的青年生活中，通常是占有重要的一页的，可是我的侣伴们不仅不讨论这个，即使是日常生活普通事情，也拒绝讨论。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对我谈起要买些肉，他在我的面前把他的仆人唤来，向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烈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假期里，我们在田野里走着，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假如遇见下雨，我们就把衣服脱下，说这就叫“淋浴”。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我们也把衣服脱下，说这就是“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游戏。已经下霜了的日子，我们还要露宿，甚而至于在十一月里，我们还在冷水里游泳。这些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这一个名词之下进行的。也许这件事对于我的体格，的确有不少帮助，因为后来我在华南许多次的进退行军里，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受赐匪浅的。

那时候我和许多在别的乡镇城市里的学生和朋友们，组成了一种很广大的通信关系。慢慢地我开始觉得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别的朋友，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这七八十人中有许多人后来都变成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经加入过新民学会的较为著名的共产党员有：罗迈——现在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里面；何叔衡——中央苏区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枪杀；萧子璋——作家，现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叶立云（译音），中央委员，后来叛变投降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萧铮（译音），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个签名者中之一，不久以前病故。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候另一团体组织成功了，这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译名），是类似新民学会的一种组织。它的许多会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有：温得应（译音）——该社社长，在反革命中被蒋介石枪杀。林彪——该社社员，现任红军大学校长。同样，张豪（译音）——现任白军工作负责人员。在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互社”（译音），有些会员后来也加入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是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青年战士，组织了好几个急进的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确立了一种势力。①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多少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才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梁、康二人我早已抛弃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一种

① 这样的团体在天津的是“觉悟学会”，吸引一些急进的青年到组织里来。周恩来是创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女士——现在的周恩来夫人；马钧，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枪杀；孙肇俊，——现任国民党官吏。

奇怪的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都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

我一九一二年考入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三　革命的前奏

在毛泽东讲着他过去的一生事迹的时候，我注意着一个旁听者，至少是和我同样地发生兴趣。这就是他的夫人贺紫莲女士。很明显的，他丈夫所告诉我的许多关于他自己以及共产党运动的事实，是她从前所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而且不止她一人，毛氏在保安的许多同志，也都如此。后来，当我向别的红色领袖们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志，常常围拢来，兴趣极浓地初次听到这些故事。虽然他们在一起共同工作了许多年，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生活，这些日子他们是认为黑暗时代，人们只有在加入共产党以后才开始真实的生活。

这是另一夜里，毛氏两腿交叉着坐着，背靠在两个铁的行军箱子上，燃着了一支纸烟吸着，找着了前一天所讲故事的线索，接下去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当中，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许多次数的报名费也包括在内！从这个数目中我要把三分之一耗费在报纸上，因为通常定一份报纸，总是按月一元。我还常常在书摊子上买些书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这种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面。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我没有走上井岗山以前，我对于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种日报的阅读，从未中辍过。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母亲死了。这样我回家的兴趣更加淡薄了。我决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时候是北京——去。湖南有许多学生都计划着要到法国去，用"工读"的方法去读书。法国在欧战中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的青年去为她做工。在离开中国以前，这些学生预备在北平学习法文。我帮助把这种运动组织起来。在这一群出洋的学生中间，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后来都变成著名的急进分子。徐特立也受了这一个运动的影响，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员位置，跑到法国去，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加入了共产党。

我陪了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还有补助，我却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国家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假使我把时间化在中国，那时祖国是更为有利。那些决意要到法国去的学生，从李石曾——现在中法大学的校长——学习法文，可是我没有。我个人另有计划。

我在北平觉得费用太大：我是从朋友那里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非马上找寻职业不可。杨昌济——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找寻一个职业，他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杀了。李大钊为我找到了工作，是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八块钱——数目不算少。

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们都不屑和我接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到图书馆来看报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们，都瞧我不起。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象傅斯年、罗家伦之类，我对于他们特别感觉兴趣。我想去和他们交换

一些关于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意见，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不失望。为了要旁听大学里的功课，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在新闻学会我遇见了好几个同伴，象陈公博，他后来是南京一个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又一跃而成了所谓“第三党”的一份子；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给我很多的帮助。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枪决了。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的时候，我也遇见了张国焘——后来却是国民党的走狗了；康白情——他后来加入了美国加利佛尼亚洲的“三K党”（“!!!”——斯诺），还有段锡朋——后来是南京政府教育次长。在这里我也遇见了而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她是我从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氏对我最有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兴趣继长增高，我的思想也越加急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形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在这时候，我还是很混沌，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小册，很受了一些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北大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这座古城的美给我了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一间小屋子里共有七个人拥住着。晚上我们七个人挨得紧紧地睡在一个坑上，挨得透不过气来。当谁要翻身的时候，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广场上，我对于北方的早春，生了向往之情。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素色的寒梅盛开着。杨柳枝头悬挂着水晶似的冰柱子倒垂在北海上，使我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天珠玉树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的无数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美。

一九一九年之初，我和要到法国去的学生一同到上海。我的钱只够买到天津去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向前进了。可是，正象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的，有一位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仰孔子的坟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曾经洗过脚的那条小溪边，也到了圣人渡他的幼年生活的小镇。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颗古树，相传是孔子手植的，靠近后代为他所立的历史上有名的庙旁边，我居然看见了这颗树。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个弟子——颜渊所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去拜访了孟子的生长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东的神圣的山，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而且写过些爱国的诗句的。

可是当我到了浦口，我又分文不名了，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如何能离开浦口。可是祸不单行，车上一个贼又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了。嗳呀！怎么办呢？但是，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遇着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萨”。他借给我买鞋子以及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的钱。这样我安全地完毕了我的旅途——同时对于我的新鞋特别当心了。上海我知道已经有一笔款子募集好了送学生到法国去，同时为我还预备了一笔钱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们上了轮船之后，我就向长沙进发。

我所记得的，我第一次到北方去所值得纪念的旅行是这些：

我在北海溜过冰。曾经绕洞庭湖走过。又在保定的城墙上绕着走了一圈。在三国志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墙，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绕过一个圈子。最后我登过济山，谒孔墓。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觉得是步行游湖南以外的有价值的成绩。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为积极。五四运动之后，我把大部分时间，化在学生政治活动上面。我主编《湘江评论》，一种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还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都猛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极了的人。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他去职，并且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那时孙中山在那边已经很活动——鼓动反对他。于是张敬尧禁止了《湘江评论》的出版，作为学生反对他的一种报复行动。

此后我又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发动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斗争，扩大而为普遍的反军阀的运动，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策进这个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是得到相当成功的。张敬尧被谭延闿所推倒，在长沙建立了一种新的统治局面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分裂而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一种更远见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遇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之影响也许比任何人还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曾经去拜访他，请他能赞助湖南的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关于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湖南开始着手组织。在那里我觅得了一个教员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纲领——意思是真正的自治。对于北方政府非常不满，相信假使能够和北京脱离关系，那末湖南的现代化当更为迅速。所以我们的团体竭力鼓吹和北京政府"分离"。我那时是美国的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主义的坚决的拥护者。

谭延闿又被一个名叫赵恒惕的军阀逐出湖南了。赵恒惕以"湖南自治"为号召达到攫取他私人利益的目的。他假意拥护自治，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一种主张。可是当他一攫取了政权之后，却用着大力压制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赞成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新湖南报》上，公开鼓吹这种改革。有一次我们领导了一次捣毁湖南省议会的活剧，省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的地主豪绅。这一次暴动的结果是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充满着胡说霸道和吹牛的词句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的一件大事变，把那些统治者们都吓慌了。可是，当赵恒惕握得了政权，他背叛了他以前所倡议的一切主张。反而特别猛力地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攻击的目标转向了他。记得在一九二〇年有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发起了一个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的示威运动。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来了。有些示威者曾经试想在会场升起红旗来，可是被军警所禁止。示威者指出依照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们置诸不理。他们说他们不管什么宪法不宪法，只知道执行赵省长的命令。从这次以后，我渐渐相信只有由群众行动得来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为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北游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够找得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

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之后，便从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者）翻译的，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思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实践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便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年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①

四　国民革命时代

毛泽东当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那样的组织存在着。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马麟——第三国际的一个能力很强的长于煽动的代表——到了上海，接洽和中国党的联络。不久之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而差不多同时候，一群中国的留法学生，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设立一种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想起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还不过是十六岁的青年，那么它的成绩实在已经很可观了。除了苏联，它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共产党。并且也除了苏联以外，是唯一有着足以自豪的自己的强大武装队伍的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氏继续讲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主要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是中国最有名的知识界的领袖。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我对于这方面的兴趣的发展，陈独秀的助力也不小。在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我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陈的坚决的信仰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对于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那一年的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而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在别的省分和城市中也组织起来。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会里有陈独秀、张国焘（后来叛变而投到国民党里了）、杨民哉（译音）、谭平山、陈公博（后来成为了汉奸）、刘燕青（译音）、殷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杀）、李达、李森（译音）等。在湖北的党员有项英、恽代英、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学校主席）、许白昊、施洋。在山西的党员有高宗裕（译音）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的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别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杀）。王精美（译音）和邓恩明（译音）是山东支部的发起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学生们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它的成立差不多是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是发起人

① 毛氏以后再没有提到他和杨开慧女士的生活。从种种方面看，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她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大革命中的一个青年领袖，最活动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他们是被当时湖南新青年所庆贺着，认为是“最理想的浪漫史”。这好象是由一种“试婚制”开始的，而很明显地他们彼此是很专爱而忠实的。后来，杨开慧女士，大约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枪杀了。

中唯一的中国女子）。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在德国也有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时间稍迟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别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时是书记——已经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包含矿工、铁路工人、雇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等。那年冬天一个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了。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而在农民中做的工作很少。大的矿厂的大部分工人，而学生则几乎是全部被组织起来了。在学生与工人两方面都有好几次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枪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译音）和庞人龙，结果是引起了对于赵恒惕的普遍的公愤。被枪杀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劳工运动的领袖，这一派的基本人员是工业学校学生，是和我们反对的。可是在这一件事件中，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是援助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组织湖南省总工会。可是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妥协，经过磋商之后，阻止了他们所干的许多躁急而无谓的行动。

我被派遣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赵恒惕运动。第二次党大会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在上海开会，我本想是要去参加的。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错过了机会。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动工会的工作。下一年春天，湖南发生了几次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承认工会的罢工。大部分都胜利了。五一劳动节湖南全省举行一次总罢工，而这次罢工，表明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到达了空前成功的地步。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举行的。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了反抗北洋军阀的联合阵线。这时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我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代大会。三月里回上海，一面担任共产党党部的工作，一面又担任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除我之外，还有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同工作，调整国共两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将军来任顾问，别的苏维埃顾问也从苏联来了。国共的联盟开始领导普遍全国的革命运动。那年冬天我在上海抱病，回湖南休养。可是回到湖南以后，我把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组织了起来。

在从前我还没有充分了解在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及接着的政治运动的大波浪当中，湖南农民的斗争性才十分明显。我离开我在养病的家，开始农村组织工作。在几月之中我们组织了二十多个的农民协会，惹起了地主们的仇恨。他们请求当局逮捕我。赵恒惕曾派军队追寻我。我便逃往广州去。我到那里，正是黄埔学生战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广西军阀刘震寰的时候，广州城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溢乐观空气。正当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编辑，这是国民党政治部的喉舌。它后来在攻击和批评戴季陶所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有很活动的势力。我又负责担任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工作，并且为这种目的开设了一班训练班，由二十一个不同的省分的代表来参加听讲，其中有从内蒙来的学生。来广州不久，我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其余林伯渠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的很多。在共产党内，担任农民工作的特别任务，根据着我的研究和我在湖南组织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做《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另一本叫做

《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所发表的意见。那本书主张一种急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内加紧农民组织。陈独秀拒绝由共产党中央机关发行这一本小册子，这本册子后来在广州《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在湖南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的。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满意。我们慢慢地分离了，虽然我们中间的斗争要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工作，直至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企图实行他的第一次政变。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协调，国共联合阵线重行确立之后，我又到上海，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这年五月由蒋介石领导召开的。我在上海负责主持共产党的农民部，从这里又被派到湖南去视察那边的农民运动。同时，在国共两党的联合阵线之下，在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北伐。

我在湖南视察了五县——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做报告给中央委员会，催促在农民运动里采行新路线。次年早春，当我到了武汉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我出席提出建议，主张普遍地把土地重行分配。在这一次会议上，有彭湃、方志敏和两个俄国共产党员——约克（York）及窝隆（Volen），决议接受了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五次大会讨论。可是中央委员会加以否决了。

当共产党中央第五次全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还是在陈独秀操纵之下。虽然那时候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行动，在上海、南京开始向共产党进攻，可是陈独秀还是抱温和态度与武汉的国民党相妥协。而且抑制了各方面的反对，采行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那时候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一方面。我现在想起来，假使那时的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对地主斗争，那么苏维埃也许能早一步而更有力的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竭力反对。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并且把农民革命在这时候的可能性估计得太低。结果在大革命危机的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会，不能通过一种完美的土地政纲。我的农民运动应该加速深入的主张，甚至没有提出讨论，因为那时的中央委员会为陈独秀所操纵，拒绝提出来考虑。全会议决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这样就把土地问题抛开了。用这一个地主的定义，要想发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完备而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土地经济的特殊性。可是，会议之后，一个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不管共产党对它的态度如何萎缩，和国民党对它如何歧视，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高级长官和军队司令们开始要求镇压这种农民运动，他们称农民协会为“流氓协会”，认为它的行动和要求都太过火。陈独秀把我从湖南调开，认为我应对湖南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负责任，并且猛烈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的举行了对于有组织的工人们的大屠杀。广州也实行了同样的举动。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事变，好几千个农民和工人被反革命份子所枪杀。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和共产党的合作，把共产份子从国民党里以及武汉政府里驱逐出去，可是这武汉政府不久也消声匿迹了。

这时候许多的共产党领袖们接受党的命令离开中国，到俄国、上海或别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到四川去。我请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做湖南党省委书记。可是十天之后，他又急急

地下令叫我回来，责备我组织反抗唐生智的暴动。唐那时是武汉的统治者。党务在这时候混乱不堪，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武汉国共合作的崩溃，促成了陈独秀领袖的没落。

五　苏维埃运动

有一次我和毛泽东谈到关于一九二七年春天那些争辩不决的事情，在这里提到它，我觉得很有趣味。他对我说，这不是他自传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生活中的转变经验的个人回忆看，是颇为重要的。

我问毛氏，他认为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国共合作政府的解体，以及南京独裁政府的整个胜利，谁应该负最大责任。毛氏把最大的罪过放在陈独秀身上，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使党失去了决定的领导权，等到当继续妥协明显地将要有大祸的时候，又使党失去了自己的路线。"

对于失败的第二个负责者是鲍罗庭——苏联籍的首席政治顾问。毛氏说鲍罗庭临时完全转换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急进的土地重行分配政策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时，他又竭力地反对了，他的动摇徘徊，是丝毫没有逻辑根据的。毛氏说："鲍罗庭站在陈独秀的右边一点点，他准备不顾一切去讨资产阶级的欢心，甚至以为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也无不可，而结果果然下令解除。"依照毛氏说法，罗埃（Roy）——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是"仅仅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庭两人的左边一点点，而且只是站着而已。他只能口里说说，可是议论虽多，却并不提出任何实施的方案来。"毛氏以为在客观地看来：罗埃是只饭桶，鲍罗庭是个夸大狂者，而陈独秀是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出卖党的人。

"陈独秀实在见工人们有点怕，见武装起来的农民尤其怕，最后遇到武装暴动的实现，他竟连知觉都失掉了。再也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害了他，使他走向惊惶和失败。"

那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完全独裁者，甚至于不和中央委员会磋商就采取重要的决议。"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拿出来给其余党的领袖看，甚至也不和我们讨论"。最后还是罗埃促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把一件文件交给鲍罗庭，要求党实行没收土地。罗埃得到了这文件的一份，他立即拿去给那时的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汪精卫看。这一幕滑稽剧的结果，是人人皆知的。共产党被武汉当局从国民党里驱逐出来了，它的势力倒了，而且不久武汉政府本身也被蒋介石推倒。

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指挥权，不是贡献"意见"，而是命令，而且中国共产党是无权否决的。于是武汉的失败，形成了俄国对于世界革命性质的一个争执的转点，这个时期的不久之后，俄国的反对派被打倒了。托落茨基的"永远革命"理论被驳倒了。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国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为出发点，它现在已到达保障世界和平的地位了。

可是毛氏也承认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更积极的政策，即使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就在工人和农民中创立了共产党武装队伍，那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的势力也未必能被击败。"可是苏维埃要是能在南方有一个很大的发动，能够得到一个根据地，那末以后无论如何不会被消灭的……"

在他的自叙中，毛氏已经说到苏维埃的开始。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赤手空拳地斗争着，要从失败中重建新的胜利。他继续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贺龙、叶挺领导之下的第二十军，和朱德合作，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南昌暴动，这就是红军组织的开始。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开除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我从一九二四年广州第三次会议以来，一直是党政治局的一员。对于这个决议，我是主动的。在这次到会的其他十个人之中，有：蔡和森、彭孔塔（译音）和瞿秋白。党采取了新路线。一切和国民党的合作的希望，是暂时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十足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再负起民主革命的责任来了。长期的政治权力的公开斗争就此开始。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暴动"的这个运动。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下列五点：（1）省党部完全脱离国民党，（2）组织工农革命武装队伍，（3）没收中，小，大地主的财产，（4）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势力，和国民党脱离关系，（5）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在那时候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提出来作为口号。

当九月间，以湖南的农民协会为出发点在发动普遍的暴动上，我们已经成功了。工农军队的基本单位也已成立。入伍者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汉阳矿工，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哗变部队。这早期的革命武装队伍，被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其中第一旅是由汉阳矿工组成的。第二旅是由平江、浏阳、醴陵以及湖南另外两个县分里的农民保卫队组成的。第三旅是由叛弃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队的一部分组成的。这一支军队组成是得到湖南省委员会的准许的，但湖南省委员会及我们的军队的一般纲领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那时候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种观望政策，并不积极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民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与国民党通声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手段正达到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红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唯利是图的，我的遭受枪决，对于他们没有特别利益，他们已经答允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打算脱逃，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过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脱逃的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去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地方，在一个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着直到日落。兵士们搜寻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碰得到他们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被发觉，虽然有五六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获了。到后来，黄昏到了，他们不再搜寻我了。我马上出发，爬山越岭，整夜地跑着。我没有鞋，脚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了一个农民，他待我很好，允许我借宿，后来又领导我到了邻县。我身边还有七块钱，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保卫队那里的时候，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新军成立以后，我担任了党前敌委员会的主席，武汉卫戍司令俞沔都（译音）担任第一军总司令。俞氏多少是受他的部下逼迫而勉强出来担任的；不久以后他背叛了红军，参加了国民党。他现在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小小的军队，一面领导农民暴动，一面向南移动穿过湖南省。它必须击破千万的国民党军队的防线，打了许多次的仗，败退了几次。纪律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在士兵和长官之中，有许多的动摇分子。有许多逃兵。俞氏逃走之后，军队到达宁国，便又改

编了一次。郑豪（译音）被任命为残留军队的——约有一旅之众——指挥；可是后来他也叛变了。不过在第一队里有多数人，自始至终忠实不渝，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红军里——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杨录生（译音）现为红军司令。这一小队，最后爬上井岗山的时候，人数只剩一千名左右。

因为秋收暴动的纲领没有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又因为第一军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损失，又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这种运动无疑是要失败的，所以中央委员会这时候决定排斥我。我的政治局与前敌委员会的职位均被免职。湖南省委会也攻击我们，称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可是我们还是把军队在井岗山团结着，十分相信自己所走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后来的事实也充分为我们证明了。新兵参加了，这一师人又补充了，我担任了总指挥。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在井岗山打定了基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湖南边境茶陵地方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完成；它的主席是杜仲宾（译音）。在这个苏维埃中我们实行了一种民主政纲，采取一种迟缓而能正常发展的温和政策。这样井岗山得到了党内盲动份子的责难，他们要求一种恐怖政策，焚掠杀戮地主来丧他们的胆。第一军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战略，所以头脑热烈的人就称我们为“改良主义者”。他们对我攻击最烈，因为我不采行一种较为“急进的”政策。

两个以前在井岗山附近的土匪的领袖，名叫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加入了红军。使红军实力增加到将近三旅之众。王、袁都被任为旅长，而我是军长。这两个人虽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经投降过国民革命军，现在他们准备对反动势力作战。当我在井岗山的时候，他们俩可算是忠实的共产党徒，执行着党的命令。可是后来，当他们单独被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回复了土匪脾气，结果是被那时已经组织化苏维埃化的有自卫能力的农民们所杀。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到达了井岗山，我们的队伍会合了。我们共同起草了一个计划，组织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慢慢地把共产势力在湖南、江西、广东边境各县中，稳定团结起来，以此为根据地，再向更广大的区域发展。不过这个策略是与党的建议相冲突的，因为党有着急速发展的伟大理想。在军队里面，我和朱德要同两种倾向斗争：第一种是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第二种向南撤退到广东边境，这我们认为是“败退主义”。那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主要工作有二：（1）分配土地，（2）建立苏维埃。我们想把群众武装起来加速这些步骤。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贸易，宽和地对待被俘虏的敌人部队，一般地说来，是民主的温和主义。

一九二八年秋天，井岗山上召集了一个代表会议。到会的是井冈山以北的苏维埃代表。关于上面所说各点，苏区里的党代表中，意见还是很纷歧，在这次会议中，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充分地发挥出来。少数人说：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很狭窄。大多数人，则相信我们的政策会成功。当议决案提出来，并且说明苏维埃运动将来如何会得到胜利的，议案是很容易地通过了。可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一个运动。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开会报告书到达了井冈山的时候，这批准才算接到了。

在这次会议里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此以后，党的领袖中，和在农业区域里的苏维埃运动的领袖中的意见的不协调，才消除了，党的一致重又建立了起来。

第六次会议的议决案，综合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和秋收暴动的种种经验，下了赞成对于土地运动应该重视的结论。大约在这时候，红军开始在

中国别的地方发现。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暴动，这些暴动奠下了新苏区的基础。在西方的贺龙，和在东方的徐海东，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也加入了。一九二七年冬，方志敏和邵式平在江西的东北部沿福建边界，也开始了一种运动。这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彭湃率领了一部分忠实的部队，到海陆丰组织了一个苏维埃，可是因为接受了盲动主义的政策，不久就被消灭了。不过它的军队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挥之下，离开那区域，与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络，后来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

一九二八年春天，游击队在李文龙、李绍祖（均译音）领导之下，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一带活动。这一个运动，以吉安的周围为根据，这些游击队，以后成了第三军的中心干部，而吉安本县，则成了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福建西部，由张鼎承、邓子恢（谣传被杀）、傅柏翠（后变成社会民主党）等主持组织了苏维埃。

在井岗山“反对冒险主义之斗争”时期中，第一军击退了白军两次争夺山寨的企图。井岗山的确是我们所要创造的这种活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而且所产的谷物，足够维持小小的军队。它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本地名称是叫大小五井（真真的井岗山是附近的一个小山，已经早已放弃了）。这是从周围五个大井得名的——大、小、上、下、中五个大井，在山上的五个村子，就跟着这五口井而命名的。

我们的军队在井岗山会合之后，重行改编了一次。有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总司令，我是政治委员。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何键的部队暴动哗变以后，井岗山又增加了许多军队。红军第五军就从这些部队中产生出来，总司令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平（在长征贵州遵义遇害），黄公略（一九三一年在广西被杀），和滕代远。

来了这些军队以后，山上的情形，变得很坏了。军队没有冬天的服装，粮食也非常稀少。有好几个月我们差不多靠吃红薯过活，士兵们呼喊着他们自己作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红薯！”——在他们看来，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红薯。把彭德怀留在井岗山上，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阵线。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第一次在山上的逗留，就此告终了。

这时候第四军，开始打通江西南都的斗争，发展得很快很成功。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本地的红军会合了联合起来。我们把军力分开继续向永定、上杭和龙岩进发，在这几县里，都成立了苏维埃。在红军未到以前，在这些区域里旧有的武装民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帮助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很快地建立在一种稳定的基础上。靠了农村群众运动和游击战，红军的势力伸张到几个别的县分，但是共产党则到后来才完全握到这权力。

红军的情形在物质与政治方面都开始进步了，但还有不少坏的倾向。譬如说：“游击主义”是一种弱点，反映着缺乏纪律，夸张民主观念和组织的涣散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土匪性质”——不肯安静下来，认真去做政府指派的工作，好动、好变、好新、好事。此外还有军阀主义的遗留，有些司令官虐待甚至鞭打士兵，凭个人的好恶，对部下妄加轩轾。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西部红军第四军举行了第九次党会议之后，许多弱点都被克服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改善的方法，释除了许多误会，采用新的方法，这在后来奠定了红军高级意识形态的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的那些倾向，是很严重的，而且被党和军事领导中的托洛茨基派分子，利用了来破坏这一种运动的力量。对于这种坏的倾向的一种猛烈的斗争开始了，有几个人因此被取消了党里的地位和军事指导权，其中以刘恩空

（译音）——一个司令，为最好的例子。一度发觉他们企图把红军领导到抵抗敌人更为困难的地位上去的一种方法，破坏红军，几次失败之后，他们的阴谋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他们竭力攻击我们的纲领以及其他我们所赞成的一切。经验证明了他们的错误，他们被免除了职位，福建会议之后，他们的势力完全消灭了。

这次会议，准备了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下一年就有了一些光明的胜利。江西南部，差不多全部为红军所占领。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集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的将来的纲领。出席的分子是本地的党、军、政府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土地政策经过一次长时期的讨论，对于“机会主义”——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们所领导着的——的斗争战胜了。会议又决定实行重行分配，加速组织苏维埃。到那时为止，红军只是组织了地方和县区的苏维埃。在这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一个新政策，农民报之以热烈兴奋的拥护，这拥护在几个月之后帮助红军击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六　红军的生长

毛泽东的陈述，至此开始从“个人历史”的范畴里出来，把个人不知不觉地升化于一个大运动的事业之中，在这个大运动里，他虽然占着一个主要的地位，可是你不能清楚地看见有他个人存在着。这里不再有“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有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有个人生活经验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旁观者作为历史材料叙述的有关集体人类命运的客观记载。

当他的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追问关于他自己的事似属更为需要了。“他”在那里做了什么事？“他”在那时候担任什么职务？“他”对于这种情形保持何种态度？我的质问，引出了一些有关他自己的一些参加，写在这故事的最后一章里。

慢慢地红军对于群众的工作改进了，纪律严谨了，在组织方面的新技术也发展了。各地方的农民阶级开始自动来帮助革命了。在井岗山时代，红军已经叫士兵们坚守三条简单的维持纪律的规则，那是：（1）迅速服从命令；（2）不许没收穷苦农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从地主阶级没收而来的物品立即直接交给政府处置。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为了要获得农民阶级的拥护起见，曾作重大的努力，在上面所历举的三条以外，又加上八条规则，这八条是：

（1）离开一家人家时，把门板（睡觉用）放在原处。

（2）把你们睡时所用的草席卷好交还。

（3）对老百姓要温和客气，随时帮助他们。

（4）一切借用的物件都要归还。

（5）一切损坏了的东西都要赔偿。

（6）和农民交易要规矩。

（7）买东西要付钱。

（8）要讲卫生，厕所要设在离人家很远的地方。

最末两项是林彪所添加的。这八项实行的成绩日见进步，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军纪，牢牢记着，常常能背诵出来。另外还教三项别的责任，作为红军的基本目的：第一、对敌人

要抵抗到死；第二、把群众武装起来；第三、要募集款项帮助斗争。

一九二九年初，有几队在李文龙、李韶九领导下的游击队，被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朱瑞任政治委员。同时，朱培德的一部分民团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由一个国民党司令罗炳辉领导着，来投共产军的。这一位罗司令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加入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正式的红军干部，组织成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仲豪任指挥，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后来伍仲豪在战争中阵亡而由罗炳辉接任的。

就在这个时候红军第一军团组织成功了，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治委员。它包含了由林彪指挥的第三军，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党的领导权交付给前敌委员会负责，而我是该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第一军团已经有了一万人以上，编成了十师。除了这支主力军以外，还有许多的地方的独立旅，赤卫队和游击队。

对于军事之胜利的发展，除了这一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之外，红色战略也很有关系。我们在井岗山上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供给了红军籍以生长的游击战术所采的方法的总线索。这些口号是：

（1）敌进我退！

（2）敌止我扰！

（3）敌避我击！

（4）敌退我进！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大致说来，红军一放弃了这种战术，就不能胜利。我们的军队是很小的，敌人的力量要强过我们十倍至二十倍，我们的财源和军火也是受限制的。只有巧妙地混合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才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他们是有广大的资源和优越的基础来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战术，不论现在或将来，是在攻击中力能集中它的主要力量，而以后又很快地散开。这意思是要避免阵地战，而用一切方法去迎击在行动中的敌人队伍而歼灭之。在这种战术的基础之上，红军的惊人的活动力和敏捷有力的"突击"力发展出来了。

在扩大苏维埃区域这一点上，红军的纲领，是主张波浪形，或潮汐形的发展，而不主张采用不平稳的跳跃式推进方式，以至在占领区域里没有深强的稳固力。这种政策很合实用，正如上面所说过的战术一样，它是从多年的集体的军事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这些战略，有些人激烈的反对着，而主张集中一切武器于红军的手里，并吸收一切的游击部队。故喜欢攻击而不喜欢稳健；喜欢前进而不喜欢保守后方；喜欢对大城市加以声势盛大的攻击，辅之以暴动与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操纵了党与苏区以外的地方，势力很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足以迫使红军，违反临阵经验而去接受它。这路线的一个结果，是对长沙的攻击，另一结果，是向南昌的进军。但是这两次冒险中，红军不愿停止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方暴露给敌人们。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移到江西北部，攻击并且占领了许多城市，给予国民党军队许多打击。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第一军团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前进，在这一次的进军中，第一军团汇合了彭德怀的部队，彭的部队曾经一度占领过长沙，但为避免为扩大优越的敌人军队所包围，是被强迫撤退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怀不得不离开井岗山，在江西南部活

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部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联合了朱德和红军的主要部队。经过了一度会议之后，决定彭德怀的第三军应在江西、湖南边境活动，而朱德和我则向福建推动。一九三〇年六月，第三军和第一军团重行建立了联系，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第一和第三军团合并了成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之下，我们达到了长沙城外。

大约在这时候，中国工业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功了，我被推为主席。红军在湖南的势力是很普遍的，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我的名字在湖南农民中很有名，国民党政府为要捕获我，不论杀死或活捉，曾悬了很大的赏格，朱德和别的红党领袖也是如此。我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我两个兄弟——毛泽洪、毛泽丹——的妻子，以及我的儿子，都被何健逮捕了。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枪决了。其余后来得到了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伸张到我自己的乡村里，因为我曾听见人家讲，说当地的农民，深信我不久就要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天空飞过，他们一定说里面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正耕种着我的田地的人，说我要回来视察我的田庄，来看土上的树木有没有被伐。假如伐去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的。

但第二次攻击长沙失败了。大批的援军开到城里，防卫得甚为坚固；九月间，外加有新军队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这一次围攻中，只有一次重要的战争，这一役红军消灭了两旅敌军。可是红军不能争得长沙，几星期后，便向江西撤退。

这次的失败，促成了我们内部的大团结。阻止了红军去攻打武汉而免遭损失——这是少数人要求的。那时候红军主要的任务是招募新兵，新的农村区域的苏维埃化，而最主要的是在占领区域里，彻底巩固苏维埃的政权。在这一种纲领之下，攻击长沙显见是不需要了。而且这种攻击的本身是含有冒险的成分的。如果把第一次的占领作为一种暂时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建立国家政权，那么这种努力，也许可以认为有益的，因这在国民革命运动上所产生的反动是很大的。当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术上的错误。

我此时只得无礼地暂时打断毛氏的叙述，再提到一些关于李立三的有趣的批评。李立三是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学生时代已经参加革命了。那时候他常来往上海、汉口两个地方——在这两处，共产党有它的“地下”总部，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后，才把共党的中央委员会搬到苏区去的。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员中最聪明的一个。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研究”。他留在那里很长久。

现在继续讲下去：

但是有人那时候把红军的军事力量和在本国政治背景中的革命因素估计得太高了。他相信革命将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掌握全国的政权了。他这个信念，是被那时候正在进行的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长期而丧元气的内战所鼓励，表面上看来，仿佛是对我们十分有利的。但是依照红军的看法，敌人们是正在准备对苏维埃大举进攻，只要内战一停止，敌人就会发动。所以红军应该加紧戒备，决无余暇来从事那可以得到惨败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一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

① 从这些土地上所得来的租金，在大革命时期中毛氏用来进行湖南的农民运动的。

在湖南方面失败了，红军退回江西，特别在吉安占领以后，红军里的“恐怖主义”被克服了。少数人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立即在党里失去了势力。但是，在“恐怖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队发生了一个危机。第三军团的一部分，赞成执行恐怖路线，要求和其他军队脱离。可是彭德怀竭力和这种倾向斗争，在他指挥之下的军队保持了团结，服从最高当局的意志。但是由第二十军少数人起来反叛，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军官和政府官吏，对我们作政治的攻击。这事发生在富田地方，称为“富田事变”。富田是靠近那时的苏维埃区域的中心吉安县的，所以这件事变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许多人看起来觉得革命的命运，就靠这一个斗争的结果如何而定。幸而这叛变，不久就被压平了，这全仗第三军的忠诚，党和军队的团结，以及农民阶级的拥护。领导反叛者被逮捕了，别的反叛者也被缴械肃清了，我们的路线重又建立了起来，恐怖主义被确定地镇压下去了，结果是苏维埃运动以后得到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时南京方面已彻底明瞭了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势力，在一九三〇年之末，开始了向红军举行第一次围剿①。敌人的军队的总数超过十万，开始包围了红色区域，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之下，分五路进攻。红军那时能动员的军队，总数约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略，迎击并克服了这第一次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沿用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略，以主要军力，向每一个单位分别攻击。我们让敌人的军队深入苏区，然后用超越的人数突然对这些孤立的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攻击，我们获得了便利游击的地位，包围他们，这样把数目远过我们的敌人所享受的军事优势，逆转过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击败了。我相信假使红军在这次围剿开始以前不能成就三个条件，这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三个条件是：（1）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之下，团结起来；（2）偏激的路线的清算；（3）党对AB团（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刘地藻等）以及其他在红军中和苏区里的积极的反革命份子的胜利。

仅仅休息了四个月以后，南京又在何应钦——现任军政部长——的最高指挥之下，开始第二次围剿。兵力超过了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那时一般认为红军的情形是很不利的。苏维埃政权所管辖的区域很窄狭，财源有限，设备简陋，而敌人的物质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过红军。可是，迎击这次的进攻，红军仍旧握住它以前赖以取胜的战略。让敌人的军队深入苏区，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攻击敌人的第二路，击败了他们好几旅人，消灭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接着我们很快地接连攻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击退了他们。第四路没有作战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被歼灭。在十四天之内，红军作了六次战争，进军八天，以决定的胜利结束之。其他六路被击溃和败退之后，由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一路军，没有经过重大的战争就撤退了。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自己指挥着三十万大军，来作肃清“赤匪”的最后努力。他有最有能力的指挥官帮助他，象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等，每人都负责一主要路线前进。蒋介石希望用一鼓占领苏区急速地把“赤匪荡平”。开始以一天八十里的行军，深入到苏区的中心。这供给了红军最有力的作战条件，不久就证明蒋介石战略的严重错误。主力只有三万人，辅以一连几次的机警的游击战，在五天之内攻击了五股不同的敌人。在第一次战争中，红军

---

① 这一次围剿在杨前（译音——译者）所著的《中国的共产党现状》一书（一九三一年南京出版）里写得很详尽。

俘获了许多的敌人军队，大批的军火，枪械和其他设备。到九月里，蒋氏第三次的围剿证明失败了，在十月里便把军队撤退了。

这时候红军进入了一个比较和平发达的时期，势力扩张得很快。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也组织了起来，我被选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在同月里，发生了宁都大暴动，国民党的第二十八路军有二万人以上叛变了来加入红军。这些军队是由董振堂、赵搏生率领的。赵氏后来在江西阵亡，董氏则今天仍是红军的第五军团司令。红军第五军是从宁都暴动的军队产生出来的。

红军现在开始它自己的进攻了。一九三二年在福建漳州打了一次大仗，占领了这个城池。南方则在南雄击败了陈济棠，在蒋介石的阵线上，则大举攻占乐安、黎川、建宁、泰宁等县。一度攻打赣州，但没有占领。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后，直到西北长征开始，我自己把我的时间，差不多全部用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而把军事的指挥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们。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了第四次，——也许是最惨败的一次——围剿。①在这一期间的第一次作战中，红军缴了两师人的械，俘获了两个师长。第五十九师的一部分被消灭，而第五十二师，则完全消灭。这次作战是在仅仅在乐安县的大笼坪和桥汇一战中，红军就俘虏了一万三千人的敌人军队。国民党的第十一师，——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几乎等于全部消灭，差不多全部缴械，它的师长又受了重伤。这一次作战，有决定全局的力量，第四次围剿随即告终。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前敌总指挥陈诚，——认这次的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这样急速地推进军队的，他那时候对人说，从他的意见看来，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的任务”而且是一种“无期的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就把他革去了最高指挥的职位。

为了他的第五次即最后一次的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采取最新的战术和战略，在第四次的围剿中，经他的德国顾问们的建议，蒋介石已经开始采用封锁和碉堡制度。在第五次围剿中，他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这上面。他用他的军队，实行严厉的封锁，整个包围了苏区，他很小心地前进。建筑汽车路，碉堡和战壕。他避免把他的主力军队接近红军，他们谨慎地在防御工事后面作战，他们只作短距离的前进，并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掩护着。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叛变中，没有能和蔡廷揩联合。第二个错误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了错误的单纯防卫战略。在阵地战上，迎击广大优越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种战争上，红军的技巧和精神都是落后的。

---

① 关于对苏维埃区域征讨的次数，在反共战争的许多记载上，说得非常纷歧。有些作者，总计“围剿”的次数有八次之多，可是这几次南京的大动员中间，有若干次，纯粹是自卫性质。红军指挥官们，只说有五次主要的反共“围剿”。这五次中南京军队直接参加作战的大概人数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人数十万。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人数二十万；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人数三十万；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人数二十五万；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人数四十万，（“动员了”九十万人以上，进攻三个主要的苏区）。在一九三二年中，南京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征剿，但是那年蒋介石在红色区域的四周，动用了约五十万人防御。这反是红军大举进攻的一年。显然，一九三二年的南京军的防卫战，因为被当作反共“围剿”来宣传，就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红党们并不这样地加以讨论，蒋介石也一样。

这些错误的结果，加上蒋介石围剿的新的战略和新战术，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惊人的数目，和优越的技术，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乃不得不改变它在江西的情形了。其次，民族的政治情形，影响了整个局面，迫使我们决定将主要活动迁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进攻满州和上海，苏维埃政府已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对日宣战。这宣言为了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着苏维埃中国而不能实行。接着它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军队结成联合阵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愿意和任何的白军合作：（１）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与红军的攻击；（２）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３）武装民众举行抗日战争。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围剿开始。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于苏维埃都城瑞金，举行了革命成绩的检阅。在这会议上我提供了一个长的报告，就在这会议上选举了现在这一批中央苏维埃政府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开始准备长征。这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正是蒋介石发动他最后一次围剿的一年以后。在这一年中，差不多毫不休止地作战和争斗，双方都遭受到很重大的损失。

一九三五年正月，红军主要部队，达到了贵州遵义。接着的四个月中间，红军不断地向前行进，并举行了最猛力的搏斗和战争。经过了许多的困难，渡过了中国最长最深而最危险的河流，爬过了一些最高而最崎岖的山道，经过了凶猛的土人区域，穿过了旷无人烟的大草原，受尽风暴雨雪，被全中国白军军队的半数所追逐，经过了一切自然障碍物，和当地的军队作战，冲过了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陕西，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西北部，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的根据地。

红军胜利的长征，到达了甘肃、陕西，而没有损伤主要军力，是有两种原因的：第一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第二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构成分子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和超人的忍耐力与革命的热情，中国的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斗争。在这种决心之中，它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最后的决定的胜利获得了解释。

它的不可征服的另一原因，是由于革命干部的异乎寻常的干练英勇与忠实。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穑、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青云（译音）、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等许许多多优秀同志们，还有许多已把生命献给革命的人们，——他们都为同一目的而工作，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以及今后新起来的别的许多人们，定会把这一个运动领导着，达到最后的胜利。

现在我们正企图在中国造成一个统一战线，请求各党各派，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及有诚意抗日的各军队，和我们联合起来，担当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务。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为了救国，造成这一种战线，和建立彻底的中国民主政治，都是必要的。我的工作和目的，也正和党和红军的工作目的一样，此后要尽全力以求达到这一个鹄的。①

---

① 在这里附带声明，毛泽东口述的自传，是用第一人口气的，和这里发表的一样。但毛本来要求我用第三人口气发表。如果这样一改，就失掉了许多价值，准确性和趣味。有一家美国杂志愿意分期登载这些稿子，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作为自传的形式，而不用传记的形式。那时我无法与

毛见面，得到他的许可，而且这些稿子，如果因为毛泽东个人这一点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牺牲太大。所以，由我个人负责，保持原来自传的形式。后来就在《亚细亚杂志》（Asia）分期发表，曾引起各方面广大的注意和评论。现在就把这已发表过的，作为本书的一章。——斯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启明书局一九五〇年出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1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636
SS号=10273503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